

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第一卷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



毛泽东

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第一卷）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主编 逢先知 冯蕙

副主编 陈晋 李捷 熊华源 吴正裕 张素华

中央文献出版社

参加本卷编写的有：

吴正裕 熊华源 黄允升 许蕾

《毛泽东年谱》OCR版说明

本电子书为OCR版，全文未经校对，个别字句可能存在差错，仅供学习参考。如需复制文本引用，请与纸质版核对。如发现差错，请将出错处向本网站指正。

www.mzdbl.cn

出版说明

《毛泽东年谱（1949—1976）》是一部记述毛泽东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他逝世 27 年间的生平、业绩的编年体著作，比较全面而充分地记录了他的各种活动，特别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决策过程，反映了他的思想理论和工作方法等。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苦的探索。这一探索经历了复杂而曲折的过程。年谱如实地反映这一探索过程，既记述了毛泽东正确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思想、理论、决策及所取得的成就，也记述了他的失误和严重错误及其所带来的损害和教训。从这部年谱中，还可以了解毛泽东在这 27 年间是怎样工作和生活的，具体到几乎是每一天的情况。

毛泽东是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和决策者，因此这部年谱在很重要的方面反映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他逝世的 27 年间党和国家的历史。

这部年谱的编写，体现了资料性、学术性、传记性相统一，采用客观记述方法，编写者不作评论。年谱以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材料为主要依据，发表了大量未编入毛泽东著作集中的讲话和谈话，内容十分丰富而翔实。

关于这部年谱的编写体例，作以下几点说明：

一、按年、月、日顺序记事，少数条目根据叙事的需要采

用纪事本末的写法。具体日子考订不清的写旬，旬考订不清的写月，月考订不清的写季。用旬、月、季表述的条目，一般放在该旬、月、季的末尾，有的则视情况酌定。只能判定时间为某年的条目，一律放在年末。

二、记述谱主的活动，一般省略主语。

三、某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或与谱主有关的大事，均列条目按时间顺序写入年谱。

四、对人名、地名、事件、组织等，一般都作注释。相同的，原则上每一卷只注一次，放在第一次出现的地方。其中，人名注释，主要介绍这一人物在所在卷的时间段内的职务。

谨以这部年谱纪念毛泽东 120 周年诞辰。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2013 年 12 月

目 录

1949年10月—12月·····	(1)
1950年·····	(66)
1951年·····	(275)
1952年·····	(458)

1949年 五十六岁

10月1日 下午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和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及全体委员宣布就职。会议一致决议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施政方针；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1〕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同日 下午三时，出席三十万军民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接着，按电钮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然后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

〔1〕1949年10月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本书编者行文中简称“中央军委”。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再设立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1954年9月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在本书编者行文中简称“中共中央军委”。

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当群众游行队伍欢欣雀跃地高喊“毛主席万岁”的时候，毛泽东连呼：“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

同日 为侨胞题词：“侨胞们团结起来，拥护祖国的革命，改善自己的地位。”

10月2日 晨，修改外交部部长周恩来〔1〕致各国政府的公函和新华社发表公函的新闻稿，批示：“立即发表，于本日见报。俄、英文广播，亦须立即发出。”晚上，收阅苏联政府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致周恩来外长的照会。照会通知，苏联政府已收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确信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意志的代表者，决定建立苏联与中国之间的外交关系。苏联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

10月3日 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苏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苏建交的报告；研究苏联政府同原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的立场，决定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任命王稼祥为中国驻苏联大使〔2〕。会议同意外交部发出声明，通知原国民党政府驻外使馆，一律停止活动，听候交接。

同日 新华社起草关于中苏建交的新闻稿，报道苏联政府以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署名的照会电达中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表示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中两国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1〕周恩来，当时还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政务院总理。

〔2〕王稼祥，当时还任外交部副部长。1951年1月又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同日 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开幕。毛泽东为会议题词：“认真作好出版工作”。

10月5日 致电林彪〔1〕和中共中央华中局〔2〕并告湖南省委，指出：“程潜、陈明仁〔3〕按其现在的表现看来，似乎均有决心站在我们方面。”“你们根据陈部现有人数给以两个军六个师的正式番号是适当的，军委已决定给以第二十一兵团，第五十二军、第五十三军及第二一四师至二一九师的番号。我已将此点向程潜、陈明仁、李明灏〔4〕三人谈了，他们同意这样做。十月十日左右，陈明仁、李明灏二人由此动身经汉返湘，请待他们到达谈清楚后，再定宣布及实行的步骤。”“为使该兵团从陈明仁起，全体官兵，安心供职，增强其彻底改造的决心，表示我们对程、陈及该兵团看成和自己人一样，我们认为如有可能，应在该兵团编整及纪律做得有些成绩的时候，给他们补充一批人枪，其来源可从对

〔1〕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1949年12月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1951年11月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2〕1949年12月，中共中央华中局改为中南局，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中军区改为中南军区。

〔3〕程潜、陈明仁，原国民党军将领，1949年8月率部在长沙起义。程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湖南省军政委员会主任（后称主席）1949年10月19日、11月、12月，又先后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1952年3月又任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陈明仁，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湖南临时省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1949年11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司令员。

〔4〕李明灏，原国民党军将领，1948年到华北解放区，对促成1949年8月程潜、陈明仁起义做出了贡献。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委员、秘书长。

白崇禧〔1〕作战的缴获中取得。这样一做，可以增强我们对该部的领导权及发言权。再则在湖南全省平定及土改实行以后，即在大约一年以后，如该兵团表现好，而我们的地方部队，例如独立师、团等又可以集中时，可以考虑编一个军加入该兵团，使陈明仁有三个军。这对于改造该兵团是有作用的。”“程、陈、李提议现在就可以取消湖南军政委员会，程潜到北京任职，陈明仁专任军职不挂省主席名义。我向他们表示，军政委员会需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取消太快，程、陈部下可能发生误会，对全国影响也不好。省府改组亦宜在全省平定，陈明仁率部向前线推进之时，方有理由实施。目前几个月内，陈的主席职衔仍应兼着，惟陈的实际工作，可以着重于治军。”“程潜、李明灏都说湖南有失业军官十五万人之多，纷纷找他们安插，是一大问题，他们不胜其烦。我说，此是一社会问题，国家有责任有步骤地给以谋生出路。”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少数民族“自决权”问题致第二野战军前委，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及各前委电，指出：“关于各少数民族的‘自决权’问题，今天不应再去强调，过去在内战时期，我党为了争取少数民族，以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它对各少数民族特别表现为大汉族主义）曾强调过这一口号，这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但今天的情况，已有了根本的变化，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基本上已被打倒，我党领导的新中国业经诞生，为了完成我们国家的统一大业，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分裂中国民族团结的阴谋，在国内民族问题上，就不应再强调这一口号，以免为帝国主义及国内各少数民族中的反动分子所利用，而使我们陷于被动的地位。在今天应强调，中华各民族的友爱合作和互助团结，

〔1〕白崇禧，1949年4月被任命为国民党政府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此点望你们加以注意。”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山东分局并告华东局电，指出：“国民党散布谣言，说王耀武、杜聿明、黄维〔1〕等均被我们杀了。为揭破此点，程潜、陈明仁、李明灏三人由京返湘路过济南时，将留济南一两天看一看王、杜、黄等人，并可能到泰山、曲阜浏览一下，请作准备，并妥予招待。”

同日 复信马叙伦〔2〕：“闻病甚念。务请安心休养，不限时日，病愈再工作。有何需要，请随时示知。敬祝早日恢复健康。”并在马叙伦请病假信上批示：“请林老〔3〕去看马先生一次，要他静养。会议暂不要邀他。”

10月6日 复电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福斯特、总书记但尼斯，感谢他们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热烈祝贺。指出“美国共产党人在援助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而反抗美国帝国主义的反动对华政策的英勇奋斗中，享有一个特殊光荣的地位”。

10月7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邓子恢、谭政、萧克、

〔1〕王耀武，原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第二绥靖区司令官。1948年9月在济南战役中被俘。杜聿明，原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1949年1月在淮海战役中被俘。黄维，原国民党军第12兵团司令官。1948年12月在淮海战役中被俘。

〔2〕马叙伦，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理事、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1949年10月19日又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兼教育部部长。

〔3〕指林伯渠，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秘书长。

赵尔陆〔1〕电，指出：“同意五日十二时电〔2〕五个军靠拢作战的部署。”“白崇禧指挥机动，其军队很有战斗力，我各级干部切不可轻敌，作战方法以各个歼灭为适宜。”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叶剑英、方方〔3〕并告华中局电，指出：广州军管会及广州警备机关名单除照你们所拟外，应加李章达、张醇村、吴奇伟〔4〕三个党外人士为军管会委员。你们拟

-
- 〔1〕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三书记（1951年11月任第二书记、代理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第二政治委员。1949年12月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2年11月又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谭政，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50年3月任第三政治委员 1951年7月又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副书记。萧克，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第一参谋长。1950年6月任中央军委军训部部长。赵尔陆，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第二参谋长。1952年8月任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
- 〔2〕1949年10月5日12时，林彪、邓子恢、谭政、萧克、赵尔陆给中央军委的电报说：今后向广西进军仍以5个军采取较靠拢的并进，如敌与我决战，则我亦能作战；敌退，则我仍能向前推进。如我兵力太分散，则遇作战机会而不能战，而遇敌退时，由于各路兵力不足亦无法堵住敌人。
- 〔3〕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1年4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广东省军区扩编为华南军区时任司令员 1949年10月、12月又先后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2年6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代理司令员。方方，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三书记。1949年10月19日又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0年10月又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
- 〔4〕李章达，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1949年10月19日又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广州市副市长。张醇村，无党派民主人士。吴奇伟，原国民党军将领，1949年5月率部在广东东部、福建西部起义。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

定省政府名单时应注意吸收若干党外人士。

同日 为转发中共浙江省委五月至八月的工作报告，起草给华中局、华南分局、二野前委、西北局、一野前委的批语，指出：“浙江省委这一报告很值得注意，务请你们加以研究，避免重犯错误。这一报告的写法也是很新鲜的。”浙江省委报告说：关于军事工作，对俘虏处理得很粗糙，没有经过审讯就大批地遣散，造成了成群结队沿途抢劫，危害人民很大。关于会师工作，目前游击区党内不纯比较严重，而南下干部中，主要是过分夸大了这一面，存在对当地干部不信任及某些狭隘观点。

10月8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湖北省政府干部配备问题给华中局的电报稿。将其中“副主席及委员和厅长副厅长中最好能有若干民主人士担任”一句中的“最好能”改为“必须”；在电报稿末尾加写一句：“原名单中民主人士太少。”

同日 薄一波〔1〕在中共中央华北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和平解放绥远〔2〕问题时，传达毛泽东指示：“以我之人，加傅〔3〕之人，兴我之政。”

10月9日 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

〔1〕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委员。1951年12月又任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

〔2〕绥远，省名。1954年6月撤销，原辖地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

〔3〕傅，指傅作义，原国民党军将领，1949年1月率部在北平接受和平改编，并对董其武率部在绥远起义作出了贡献。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1949年10月19日、12月又先后任水利部部长，绥远省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绥远省军区司令员。

沫若、陈叔通〔1〕当选为副主席。会议建议中央人民政府以十月一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纪念日。

同日 致电王首道〔2〕：“杨开智〔3〕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其老母如有困难，可给若干帮助。”同时，又电杨开智：“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

10月10日 晚十一时，就如何占领广州和歼灭白崇禧主力问题，为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邓子恢、谭政、萧克、赵尔陆等并告叶剑英、陈赓〔4〕电，指出：“十日七时电悉。（一）你们已抓住桂军四个师于祁阳以北，其余敌军亦正回援，我军有在湘桂

〔1〕李济深，当时还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主席。沈钧儒，当时还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郭沫若，当时还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1949年10月19日又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陈叔通，当时还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952年7月又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2〕王首道，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长沙市军管会副主任。1950年4月又任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1952年4月任中共交通部党组书记、交通部副部长。

〔3〕杨开智，杨开慧的哥哥。

〔4〕陈赓，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0年2月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省军区司令员；同年3月又任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1951年3月、6月又先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1952年4月任代理司令员兼代理政治委员。1952年7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

边区歼白〔1〕主力之可能。闻之甚慰。（二）完全同意你们的提议，陈赓兵团即由韶关、英德之线直插桂林、柳州，断敌后路，协同主力聚歼白匪。此计划如能实现可以大大缩短作战时间，请即径令施行。（三）邓华兵团〔2〕及曾生、林平〔3〕等部独力相机夺取广州。如何部署，由叶、方、邓、赖〔4〕筹商电告。（四）现至湘潭之二野部队，必要时可令参加祁阳地区之歼白作战。”十一日晚十二时，又为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等并告叶剑英、陈赓电，指出：十一日十时电悉。“关于不要迫使广东之敌退入广西一点，我们认为也是对的，因此十五兵团暂时不应进攻广州。除一部位于韶关、英德一带外，主力似应由英德以北向西南攻占德庆、高要一带，割断两广联系，使广州处于孤立地位。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则广州一带之敌在我十五兵团与曾生、林平等部东西威迫之下，有可能发生内变，向我接洽投降或改编。如果是这样，则我仍可能早日解放广州，这对于以干部及某些物资接济广西是有利的。”

〔1〕白，指白崇禧。

〔2〕邓华兵团，指邓华任司令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

〔3〕曾生，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两广纵队司令员。1949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林平，即尹林平，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粤赣湘边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9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副政治委员。

〔4〕叶，指叶剑英。方，指方方。邓，指邓华，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兵团司令员。1950年7月、10月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3兵团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1951年6月任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1952年6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代理司令员兼代理政治委员。赖，指赖传珠，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政治委员。1950年10月任中央军委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

同日 和朱德〔1〕致电“长治”舰〔2〕全体起义人员：“庆祝你们的英勇的起义行动。由于国民党军海军内的爱国官兵陆续起义，人民海军已在迅速发展。希望你们努力学习，积极参加建设中国人民海军和完成解放中国全境的伟大事业。”

同日 复电赵锡光〔3〕：“新疆和平解放，全国欣慰。望南疆驻军全体官兵，团结一致，为改造自己成为人民军队而努力。”

10月上旬 同刘少奇〔4〕、周恩来等研究并草拟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机构以及政务院所属各部门的负责人人选名单。十月十三日晚，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人民政府各机构负责人的人选名单。十五日，中共中央召集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协商政府各机构负责人的人选名单，并请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在十六、十七两日对这个人选名单进行研究，提出修正意见。十八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一届政协常委会联席会议，会议讨论并最后确定了中央人民政府各机构负责人的名单。

〔1〕朱德，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1949年11月又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2〕“长治”舰是原国民党军海防第一舰队的旗舰，1949年9月19日在上海吴淞口外起义。

〔3〕赵锡光，原任国民党军新疆警备副总司令兼南疆警备司令、整编第42师师长。1949年9月率部起义，同年1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副司令员兼第9军军长。

〔4〕刘少奇，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

10月11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复张宗逊〔1〕并告彭德怀〔2〕及中共中央西北局电，指出：“（一）昨日中央会议已决定十八兵团由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3〕同志统率入川。（二）向胡宗南〔4〕作战的兵力，除十八兵团外，尚须令刘金轩〔5〕部及七军予以配合。在占汉中一带后，刘金轩部除守卫汉中为中心一带地方外，是否以适当部分进入川边策应十八兵团，依那时情况再定。七军须准备进占陇南文、武、成、康〔6〕一带。（三）向汉中一带进攻的时间，大约在十二月上旬或中旬，请令有关各部于十一月下旬准备完毕。”

同日 复电彭德怀：“十日九时电悉。同意你约包尔汉〔7〕至酒泉商谈。”

10月12日 晨三时，复电林彪，指出：“因为据你们十日七时电，白崇禧全力增援祁阳以北之敌，该敌已完全陷入被动地位，有在湘桂边界聚歼白匪主力之可能，故我们同意你们以陈赓

〔1〕张宗逊，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1952年10月任中央军委第四副总参谋长。

〔2〕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9年11月第一野战军与西北军区合并后，任第一野战军兼西北军区司令员。1949年12月又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1950年10月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2年7月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3〕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司令员。1949年10月13日被任命为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这时均未到职）1950年6月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2年11月又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

〔4〕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

〔5〕刘金轩，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陕南军区司令员兼第19军军长。

〔6〕文、武、成、康，指甘肃省文县、武都、成县、康县。

〔7〕包尔汉，当时任新疆省临时人民政府主席。1949年12月任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兼省人民法院院长。1951年11月又任全国政协委员。

兵团由现地直出桂林抄敌后路之意见。但据你们十一日十时电，敌原拟增援之兵力，现已停止于东安、冷水滩、零陵〔1〕之线，并未北进。似此，无论祁阳以北地区之敌被歼与否，白崇禧均有可能令其主力退至广西中部、西部及西北部，背靠云贵，面向广西东北部及东部，采取游击战术，不打硬仗，与我相持，我军虽欲速决而不可得。此时，因陈赓已入广西，广东问题没有解决，广西问题亦不能速决。如我军向广西中部、西部及西北部迫进，则白匪退入云贵。如四野跟入云贵，则不能分兵解决广东问题。如四野不入云贵，则解决白匪的责任全部落在二野身上。因此请你考虑这样一点，即在桂林、柳州以北，祁阳、宝庆〔2〕以南地区采取围歼白匪的计划是否确有把握，如确有把握，则你们的计划是很好的，否则我军将陷入被动。为了使问题考虑成熟起见，目前数日内陈赓兵团以就地停止待命为宜。”

同日 晨六时，复电林彪并告叶剑英、陈赓、方方、邓华、赖传珠，及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3〕，指出：“（一）你们十一日二十一时电的意见很好。即如敌守广州或我军有可能

〔1〕零陵，后并入湖南永州。

〔2〕宝庆，今湖南邵阳。

〔3〕刘伯承，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至1950年2月\1949年12月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1950年11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1951年2月兼政治委员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1949年12月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0年2月兼新成立的西南军区政治委员。1952年8月又任政务院副总理。张际春，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49年12月又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办公厅主任、组织部部长。李达，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参谋长。1950年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在广州或广州以外求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时，则陈、邓两兵团〔1〕仍继续向广州前进，但请陈邓注意先以必要力量直出广州、梧州之间，切断西江一段，断敌西逃之路，不使广州敌向广西集中。如查明广州一带之敌向广西逃窜时，陈赓兵团即不停留地跟踪入桂。如广州一带之敌并不向广西逃跑，则陈邓两兵团仍执行原计划占领广州不变。（二）祁阳以北被歼之七军、四十八军四个师，是桂系精锐。桂系正规军虽尚有四十六军三个师，四十八军一个师及五十六军两个师（此军位于桂林、全州间），但都不是精锐。桂系以外各军更差。因此，四野以主力由祁阳、武冈之线向桂林、柳州之线前进兵力已很充足。但如何进法，值得考虑。数日内可以看清白崇禧的部署。如果白崇禧集中全力守零陵、全州一带，你们可以集中兵力南进，试行抓住该敌。如白崇禧鉴于此次精锐被歼的教训（此次被歼是出于白崇禧意料的）向桂林、柳州之线大规模撤退，则我军似不宜集中前进，而宜分两路并列前进，以一路出柳州以北，以一路出桂林，两路互相策应，仍可随时集中作战，使白匪不能向贵州退却。（三）二野五兵团请令其迅向贵州前进，并令十八军先出贵阳。”

同日 晨七时，致电陈毅〔2〕：“请邀集刘晓、粟裕〔3〕

〔1〕陈、邓两兵团，指陈赓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和邓华任司令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

〔2〕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上海市委第二书记（1950年1月任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司令员。

〔3〕刘晓，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部部长，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市委党校校长。粟裕，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副司令员。1949年12月又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1年1月任中央军委第二副总参谋长。

诸同志拟一个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名单草案，党员占半数多一点，党外民主人士占比较少数，共约三十人左右，于明（十三）日交我为盼。”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彭德怀、甘泗淇〔1〕并告西北局电，指出：“（一）伊宁民族军〔2〕必须有一人为新省〔3〕军区副司令，已见前电。（二）民族军应改名为人民解放军，他们已有此意，并要求我们派政治工作人员去。此事及应编师的数目及具体番号，待你至迪化〔4〕与民族军负责人商量后再定。（三）民族军应有一部开迪化，另一部开乌苏。此事待与赛福鼎〔5〕商量后，再告。（四）新疆党的领导机关应成立分局，同意以王震〔6〕为书记，徐立清〔7〕为副书记”。“自治区只有民主同盟〔8〕，尚无党的组织（应该建立党的组织）是否可以同盟负责同志数人临时参加分局会议，待考虑后再告。”

〔1〕甘泗淇，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政治部主任。1949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51年8月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2〕伊宁民族军，指1944年9月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三区人民，为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而组织起来的民族军。

〔3〕即新疆省。1955年9月撤销省建制，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4〕迪化，今乌鲁木齐。

〔5〕赛福鼎，即赛福鼎，艾则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代理主席。1949年10月、12月又先后任政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新疆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2年6月又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四书记。

〔6〕王震，当时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1950年11月改称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1兵团（1949年12月兼新疆军区）司令员。

〔7〕徐立清，当时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副书记。1950年11月改称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1兵团。1949年12月兼新疆军区）政治委员。1950年10月任中央军委总干部部第二副部长。

〔8〕指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

10月13日 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邓子恢、叶剑英、陈赓电，指出：“据香港十月十日电称，‘（一）据空军高级人员方面获悉，蒋电李、白〔1〕，弃守广州，坚持广西；并表示，今后对李、白做法，当不予干涉。（二）据熟悉桂系的人说，桂残军如退入桂境，当会大部逃散，丧失战斗力。现白匪正大量廉价售卖枪支给地主，拟大量组织地方反动势力，并在桂东演习坚壁清野，连谷种都要毁灭’等语。请加注意，务不使粤敌逃入广西。”

同日 在林彪、邓子恢、谭政等十月十二日表扬第四十军、第四十一军和第四十九军歼灭白崇禧主力的电报上批注：“被歼灭者是七军两个师及四十八军两个师，地点在祁阳以北。消灭这些部队时白崇禧坐视不救，自己退到桂林，各军退到东安、零陵、冷水滩一带，听任七军、四八军苦战四天被歼干净。”同时，将此件批转程潜阅。

同日 彭德怀，指出：“关于由陕入川兵力，已与贺龙、伯承、小平一起确定为十八兵团，不牵动其他部队。”“歼胡〔2〕作战时间，不应太早，应待二野进至叙、泸〔3〕、重庆之线，然后发起攻击，时间大约在十二月上旬或中旬，由军委确定。”“二野主力两个兵团，现到常德、湘潭之线，大约十二月可到川南。二野陈赓兵团本月可协同邓华兵团占广州，下月入桂协同四野主力歼白，大约明年十二月可入云南。”“担负西北任务的三个兵团，以两个兵团（即第一第二兵团）担任地方工作，另一个兵团（即十九兵团）待宁夏工作结束后，不担任地方工作，开至天水、宝鸡、潼关之线专门整训，作为国防机动兵力，以备不虞（此点在数月前已电告）。”

〔1〕李，指李宗仁，1949年1月21日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白，指白崇禧。

〔2〕指胡宗南部。

〔3〕叙、泸，指四川叙府（今宜宾）、泸州。

“经营云、贵、川、康〔1〕及西藏的总兵力为二野全军及十八兵团，共约六十万人。西南局的分工是邓刘贺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为军区司令员，邓为政治委员，刘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邓力群〔2〕电：“据彭德怀同志十月十二日电称：‘为了解自治区情况，及对自治军〔3〕给以适当照顾，请其派军事政治代表，乘中苏班机飞哈密，由我驻哈第二军派汽车送来酒泉，商讨自治军编制为国军及其他政策。这些事事先取得他们同意再办，似较稳妥。如认为必要，请通知邓力群同志转达’等语，请即转商是否可行并复。”

同日 为转发饶漱石〔4〕十月十一日关于在上海附近松江县创造召开全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经验的来电，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负责人电，指出：“你们看了松江县的经验后，请即通令所属一律仿照办理。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代表大会〔5〕来，并能开得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重要的。务望仿照办理，抓紧去做。并请你们选择一个县，亲自出席，取得经验，指导所属。”

〔1〕康，指西康省，1955年撤销，所辖金沙江以东地区划归四川省。1956年原所辖昌都地区划归西藏。

〔2〕邓力群，当时是中共中央派驻新疆的联络员。

〔3〕自治军，指1944年9月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三区人民，为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而组织起来的民族军。1949年9月民族军发展到一万四千余人。

〔4〕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政治委员。1949年12月又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

〔5〕应为代表会议。

同日 复电饶漱石：“松江会议成功，极为欣慰。”“请你抓住松江经验，要华东各地省委、区党委、地委负责同志，亲自出席若干县，取得经验，以利推广。”

同日 复信冯友兰〔1〕：“十月五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同日 为上海市纸业革新促进会题词：“你们提倡由纸的商业转变为造纸工业，改良土纸及推广土纸使用范围，都是好的。你们用土纸抄写我的几篇文章，我是感谢你们的。现在我给你们写了几句话，但请你们不要用为广告。”

10月14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广州。原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阎锡山于十一日到台湾；代总统李宗仁于十三日到桂林，不久又从南宁去香港。

同日 致电中共湖南省委：“湖南大学教授罗仲言即罗章龙来信，申述他自被开除党籍后十七年中从事教育和著述工作的成绩，说他并无危害党和革命的行为。请派人至湖南大学调查是否属实电告。”

10月1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南分局并告华中局电，指出：“我军即入广州。你们可以奉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照前定名单〔增加李章达、张醇村、吴奇伟三人〕立即发表广州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就职布告，及广州市人民政府（叶剑英为市长，李章达及我方一人为副市长，朱光〔2〕为秘书长）的就职布告。待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开会时再行追认。”

〔1〕冯友兰，哲学家。当时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哲学系教授。

〔2〕朱光，当时任中共广州市委副书记。1949年11月又任广州市副市长。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邓力群并告彭德怀电，指出：“自治区〔1〕军政代表至彭处谈话，第一步是询问情况，在彭对情况未明了前难于提出初步方案。此次出席政协的赛福鼎、阿里木江〔2〕二人，不久可由京乘飞机赴酒泉与彭见面，一切问题均可和赛、阿二人商谈。故自治区暂时可以不另派代表去酒泉，待赛、阿与彭谈话并回至伊犁后，如有必要再派代表为宜。”

同日 复信张仲实〔3〕：“杂志〔4〕名称，请郭沫若先生写为好。另写了一句话作为杂志创刊号的题词。”毛泽东的题词是：“我希望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极大地发展和巩固起来”。

同日 发出由张枫〔5〕转卫立煌〔6〕的电报：“西江电诵悉，极为感谢。谨此奉复。”卫立煌十月三日从香港致电毛泽东：“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从此全中国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向往衷心尤为雀跃万丈。敬电驰贺。朱副主席、周总理请代申贺忱。”

10月16日 接受苏联首任驻中国大使罗申递交国书。致答词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伊始，即承苏联政府首先响应愿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我相信，中苏之间的友谊，将因贵国政府的这一决定，日益发展和巩固起来。我相信，经过贵大使的努力，贵

〔1〕指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地区的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的人民，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于1944年11月举行武装起义后形成的三区人民自治区域。

〔2〕阿里木江，当时任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塔城区分会主席。

〔3〕张仲实，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处处长、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理事。

1949年11月又任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干事会研究出版部主任。

〔4〕指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出版的机关刊物《中苏友好》杂志。

〔5〕张枫，即饶彰风，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港澳工作委员会委员。

〔6〕卫立煌，1948年任国民党军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因没有积极执行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被软禁于南京。1949年1月去香港。

我两国的合作，将日趋密切，同时将有利于共同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

同日 致电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指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成立，表示德国历史的根本转变。曾经是两次世界大战策源地的德国，曾经是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中心的德国，现在已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建立而加入了人民民主国家的行列。

10月17日 复电林彪并告叶剑英、陈赓，指出：“广州敌逃跑方向，不是向正西入广西就是向西南入海南岛。我四兵团似应乘胜追击，直至占高要、德庆、封川、高明、新兴、云浮、郁南、罗定等县，必要时并占领梧州，然后停下来休整待命，听候你的统一部署入桂作战。因为占领上述诸县，一则可能歼灭逃敌一部或大部，使十五兵团易于攻取海南岛，消灭残敌，平定全粤；二则即是对于入桂作战完成了部队的展开。是否可以这样做，请按情况酌定。”

10月19日 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会议任命董必武、陈云〔1〕、郭沫若、黄炎培〔2〕为政务院副总理，谭平山、谢觉哉、罗瑞卿〔3〕、薄一波、曾

〔1〕董必武，当时还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1950年5月又任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副主席。陈云，当时还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950年10月下旬任书记处书记）、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重工业部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

〔2〕黄炎培，当时还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轻工业部部长、中国民主建国会常务委员会召集人。

〔3〕谭平山，当时还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中国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央常委。谢觉哉，当时还任内务部部长。1950年5月又任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副主席。罗瑞卿，当时还任公安部部长。1950年9月又任中国人民公安部队（1951年9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2年11月又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山、滕代远、章伯钧、李立三〔1〕、马叙伦、陈劭先、王昆仑、罗隆基、章乃器、邵力子、黄绍竑〔2〕为政务院政务委员，李维汉〔3〕为政务院秘书长；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徐向前〔4〕为总参谋长，聂荣臻〔5〕为副总参谋长。会议还任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和委员，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和委员，政务院所属各委、部、会、院、署、行的负责人员，并决定由周恩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同日 复电林彪并告叶剑英、陈赓，指出：“你们准备先以

-
- 〔1〕曾山，当时还任纺织工业部部长（1952年8月改任商业部部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1952年8月又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滕代远，当时还任铁道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司令员。章伯钧，当时还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交通部部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中央政治局秘书长、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李立三，当时还任中共中央职工工作委员会委员书记、劳动部部长、中共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 〔2〕陈劭先，当时还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王昆仑，当时还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1949年11月任中央常委罗隆基，当时还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宣传委员会主任。章乃器，当时还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召集人。1952年8月又任粮食部部长。邵力子，当时还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1949年11月任中央常委黄绍竑，原国民党军将领，1949年8月和贺耀祖、刘斐等在香港通电声明脱离国民党政府。当时还任全国政协委员。
- 〔3〕李维汉，当时还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政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政协秘书长。
- 〔4〕徐向前，当时还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 〔5〕聂荣臻，当时还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司令员、北京市市长。1950年初又任中央军委代理总参谋长。

大迂回抄断敌退云南之路，这一计划是很好的。”“西南重心是四川，我二野主力必须于十二月占领叙府、泸州、重庆一带，贺率十八兵团则于一月占领成都一带，并迅速扩占全川，布置明年春耕，方有利于生产建设。因此不论白崇禧是否退云南，我三、五两兵团只准备以一个军（即十八军）进占贵阳，并经营贵州；其余五个军、两个兵团部及二野直属队，均由湘西分路直取叙、泸、渝（留一部于遵义一带），务于十二月达到该地区，设立西南军政委员会，统筹西南全局。”“根据你所说的大迂回方案，估计白崇禧部可能有一半或更多被我歼灭于广西境内，退到云南去的或者不很多。现在假定白匪主力退至云南，加上贵州之敌亦退至云南，加上云南卢汉〔1〕等部，共有敌军十五万人左右，我仍应只以陈赓兵团十万人，加上地方游击部队（据说有二万余人）去对付，方有主动。因为路远粮缺，往返不易，如去两个兵团（二十万人、有陷入困境之虞。估计陈赓以十万人入云南，采取各个歼敌方法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不过时间略为延长些罢了。”“刘、邓于明日或后日由京经汉赴湘，指挥二野向四川进军。三、五两兵团，请令其补齐棉衣，进至湘黔边境待命。”

同日 复电彭德怀、习仲勋〔2〕，指出：“高凌云〔3〕仍当第二师师长。该师开回陕北与陕北伊盟部合编，加强战力，作为陕

〔1〕卢汉，当时任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云南绥靖公署主任。1949年12月9日率部在昆明起义。

〔2〕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1950年2月任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政治委员。1949年12月又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2年8月、9月又先后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3〕高凌云，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第二师师长。

北伊盟警备部队，如此对外影响较好。左协中〔1〕在政协会后有进步，应在陕西给以适当位置〔例如省府委员〕。”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中局电：“你们十七日吸收李任仁〔2〕为广西副主任或副主席的意见是正确的，云逸〔3〕正和李任仁谈此事。我军占领广西全省后还要物色其他民主分子参加工作。”

10月20日 主持召开中央军委第一次会议。会议讨论中国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全国未解放地区进军和今后的建军问题，决定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下成立国防研究小组，主持今后国防的研究设计事宜。毛泽东在会上就整个作战情况及部署等问题发表讲话。他说：现在我们对付帝国主义有两个中心：一是上海，一是天津。进军西南，由刘、邓三个兵团及贺龙一个兵团共六十万人承担，任务是解放云、贵、川、康。贺龙直下川北、川康边，刘、邓则从大别山到峨眉山，估计今冬除昆明外，西南可全部解放。解放昆明因陈赓需大迂回，时间较长。进军西北的新疆问题，一野先头部队已于十月十五日到达哈密，正与陶峙岳〔4〕交涉先去一个师，陶很欢迎。拟于十一月至十二月到达北疆、南疆，否则再迟，一下雪明年生产就不能布置，军队吃饭成了很大问题。西

〔1〕左协中，原国民党军将领，1948年5月率部在陕西榆林地区起义。

1949年12月任陕西省人民政府委员。

〔2〕李任仁，曾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委员、广西省临时参议会议长。1947年冬在香港参加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

〔3〕云逸，即张云逸，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二书记、广西省委书记（1952年8月改称第一书记）1949年12月又任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

〔4〕陶峙岳，原任国民党军新疆警备总司令，1949年9月率部起义。起义部队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陶任司令员。

南也同样。我们这样的军队进去，吃饭是很大的问题。要看到我们这样大的军队是很大的生产力，明年必须很好地布置生产。海军自两只大军舰过来后，我们已占优势。两只大军舰起义都不是共产党员搞的，这证明中国人的心都已变了。空军现在力量很弱，上海、南京受敌人飞机威胁很大。土匪问题，有个时候闹得很厉害。我军大举向前进军，这些土匪就像头上的小虱子一样，梳子梳过后残留下来了。不肃清这些土匪，谁都不高兴。现在已打得差不多了。讲到战后军队组织问题，毛泽东说：那个时候，兵团根本就不要了，甚至军也可考虑不要，因为师减少了。部队就可以转出大批干部，一定要想法很好地转。另外还有四十万的旧军官，我们原则上对这些人都要有个安置，不安置是不对的。对旧职员也要很好处理，使这些人都能有事做有饭吃。他说：这次军委会增加了新人员，新的血液，这反映了我们的国防情况。过去，前方打仗忙，军委就我们几个人来搞，我们主要靠野战军、军区指挥。军队里面主要靠三大民主，发扬兵教兵、兵教官、官教兵，使军队很快就能打仗。淮海战役时，甚至是即俘、即教、即补、即战。现陈粟部队百分之八十是俘虏成分。他们都坚决作战，全靠我们的革命精神，同他们互亲互爱。我们军委会反映了我们的国防，这说明我们老革命首先从旧军队分化出来，后来逐渐增加新的成分。现在增加的几位，我们希望真正团结起来，来研究些问题。我赞成张文白〔1〕先生的提议，组织个国防研究小组，由

〔1〕张文白，即张治中，字文白。曾任国民党政府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对新疆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军委委员。1949年12月又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

张先生当组长，刘斐〔1〕先生当副组长，蔡先生〔2〕、傅先生〔3〕当组员，聂荣臻，我们的作战部部长李涛，还有罗瑞卿，也可以当组员。

同日 致信斯大林：“兹介绍王稼祥同志给你。王稼祥同志到苏联的任务，除担任我国驻苏大使并以我国外交部副部长资格兼管对东欧各新民主国家的一般的外交事务外，同时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资格（他是我党的中央委员）和你及联共中央接洽有关两党之间的事务。请你及联共中央同志们站在同志的立场上随时对他给以指导，使他的工作获得较多和较好的成就。我在这里预先向你表示谢意。”

同日 晚上，宴请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高岗〔4〕、林伯渠、聂荣臻、李济深、张澜〔5〕、程潜、王稼祥、李克农〔6〕参加。毛泽东在宴会上说：形势的发展速度必将加快。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从哈尔滨打到广州，按原来的估计这是需要两年的时间。

〔1〕刘斐，原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参谋次长。1949年8月和黄绍竑、贺耀组等在香港通电声明脱离国民党政府。当时任中央军委委员。1950年3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部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

〔2〕指蔡廷锴。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军委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

〔3〕指傅作义。

〔4〕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书记（1952年8月改称第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2年11月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5〕张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

〔6〕李克农，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1950年12月又任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1951年7月又任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党委书记。

10月21日 致信胡乔木〔1〕：“我军于昨日到达迪化。请写短评一篇，能于明日见报为好。关于人民解放军入新消息及评论，不要有‘占领’字样，均称到达某地；评论中并应提到得到新疆军政当局同意并欢迎人民解放军迅速开进的。”

同日 复电艾斯海提·伊斯哈科夫〔2〕并转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全体同志和伊犁、塔城、阿山三区全体同胞，感谢他们对新疆和全国解放的祝贺，指出伊犁、塔城、阿山三区人民的奋斗，对于全新疆的解放和全中国的解放，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同日 复电包尔汉并转新疆省临时人民政府全体委员，感谢他们对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祝贺，指出：“望与人民解放军及全新疆各民族人民团结一致，推行《共同纲领》，为建设新新疆而努力。” **同日**和朱德复电新疆回族总教长马良骏并转全疆回族同胞，感谢他们对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祝贺，指出：“希望你们协助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团结各族人民，遵照《共同纲领》，实行真正的人民民主，为建设新新疆而努力。”

10月22日 为新疆阿合买提江等五人不幸遇难〔3〕题写碑文为民族解放及人民民主事业服务而牺牲的阿合买提江·卡斯米同志、伊斯哈克伯克·木奴诺夫〔4〕同志、阿不都克里木·阿巴

〔1〕胡乔木，当时任新闻总署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毛泽东的秘书。1950年春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2〕艾斯海提·伊斯哈科夫，当时任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组织委员会临时代理主席。

〔3〕阿合买提江，原任新疆省政府副主席、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阿合买提江等5人在1949年8月27日来北京参加新政协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

〔4〕伊斯哈克伯克·木奴诺夫，原任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三区民族军总指挥。

索夫〔1〕同志、达力立汗，苏古尔巴也夫〔2〕同志、罗志〔3〕同志们的精神永垂不朽！”十一月二十二日，致电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对新疆人民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第一批代表，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表示深沉的哀悼，指出阿哈〔4〕买提江等五位同志生前为新疆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最后又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业而牺牲，值得全中国人民的永远纪念。”

10月2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彭德怀并告西北局电，指出：“自治区领袖阿哈买提江等五人为出席政协的第一批代表，因飞机在西伯利亚失事不幸牺牲。赛福鼎等三人为第二批代表。赛福鼎为代替阿哈买提江的领袖人物，曾留学莫斯科，做过新疆省政府的教育厅长。据我们了解，此人是好的，此次已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他现申请入党，我们认为是可以的。”“民族军是较有训练的维吾尔族的人民军队，在过去数年中以自己的革命行动钳制了国民党反动军队十万人，对于中国革命起了相当大的配合作用。维吾尔族人口三百余万，为新疆的主要民族，过去反动派压迫新疆人民主要地就是压迫维吾尔族。现在人民解放军入疆，维吾尔族及各族人民表示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只有和维吾尔族（以及其他各族）建立兄弟般的关系，才有可能建设人民民主的新疆。因此，一万四千人的民族军，应使之和人民解放军一道，分布全疆各地，作为人民解放军联系维吾尔族、吉尔吉斯族、蒙古族等民族的桥梁”。

同日 在赛福鼎十月十五日向中共中央写的人党申请书上批

〔1〕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原任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

〔2〕达力立汗·苏古尔巴也夫，原任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三区民族军副总指挥。

〔3〕罗志，原为新疆中苏文化协会成员。

〔4〕唁电中将“合”字写为“哈”字，是由于译音的不同。

示：“同意赛福鼎同志入党。此信由赛本人带交彭德怀同志即存彭处。待新疆分局成立后，由赛同志向分局履行填写入党表手续。”

10月24日 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接见绥远军区负责人高克林、姚喆、裴周玉（1）和傅作义，谈对绥远起义部队的团结改造以及同非党人士长期合作问题。周恩来、薄一波、聂荣臻参加。毛泽东说：绥远和平解放谈了大半年，现在才实现第一步。现在要走第二步，就是实现合作。这一步很重要。其意义何在？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对绥远起义人员实行团结改造的方针早已定下来了，工作要有步骤地开展。双方过去是敌人，现在成了朋友。合作后也要估计到可能发生一些问题，还要经过艰苦的工作与斗争。不能很快，快了就会出毛病。我们对起义人员的方针是又团结又改造。只有团结，没有改造不行。从改造中逐步肃清过去反动派的一切遗迹和对他们的政治影响，以马列主义思想代替国民党的反动思想。不能用粗暴的方法，要像下小雨一样，才能渗透进去。要按照他们的具体情况和能够接受的程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强迫灌注。对那些坚决反对改造和破坏改造的反革命分子与特务，必须打击与镇压。现在共产党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又有了政协全国委员会，我当主席有责任使各方面都有利，使别的党派也有利，否则会引起不满，会被人骂，甚至会被推翻。中国永远是党与非党的联盟，长期合作。双方要把干部都当成自己的干部看，打破关门主义。这次政府的名单中，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还是一半一半好，要搞五湖四海。中国已归人民，一草一木都是人民的，任何事情我们都要负责并且管理好，不能像踢皮球

（1）高克林，当时任中共绥远省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绥远省军区政治委员。姚喆、裴周玉，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绥远省军区司令员、政治部主任。

那样送给别人去。国民党的一千万党、政、军人员我们也要包起来，使所有的人都有出路。

同日 出席中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党组会议。在陈云讲到党的有些干部对民主人士不放心和怕麻烦时，毛泽东说：现在党内同志不懂得如何与党外人士合作。这个问题不简单，眼光要看到全国与全面。

同日 为祝贺“海辽”号轮〔1〕起义致电方枕流船长和全体船员同志们：“庆贺你们在海上起义，并将海辽轮驶达东北港口的成功。你们为着人民国家的利益，团结一致，战胜困难，脱离反动派而站在人民方面，这种举动，是全国人民所欢迎的，是还在国民党反动派和官僚资本控制下的一切船长船员们所应当效法的。”

同日 审阅新华社关于进驻新疆的人民解放军逮捕原国民党军队中反动分子的新闻稿，批示：“乔木：此类新闻，不应在全国发表，也不应在西安、兰州的广播台上广播，只可在哈密等地地方报纸上发表。”

同日 为捷克文版《新民主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书所写的序言在《人民日报》发表。序言说：“捷克共产党的同志们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文献和我所写的关于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论文以捷克文出版，这是中国共产党所引以为荣的。”“欧洲的有关亚洲命运的一切读者们，由于阅读这些短篇的文件，特别是由于阅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六十条《共同纲领》，将获得关于新中国的基本常识。我相信，捷克的同志们为帮助欧洲读者认识新中国所作的努力，对于国际革命运动乃是一个可感谢的贡献。”

〔1〕“海辽”号轮是原国民党政府招商局的运输轮船，1949年9月19日在由香港驶向汕头途中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政府。

10月2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西北局并彭德怀电，指出：“贺〔1〕在京事毕，明日或后日动身回西北。他到西安后，请彭决定在十一月上旬在兰州或酒泉或西安开一次西北局会议，讨论各项问题，包括贺及十八兵团离开西北进入四川问题，西北军政委员会名单及各省政府的最后确定问题等。”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中局并告湖南省委电，指出：“陈明仁挂名为主席的临时湖南省政府，目前一二个月内如尚无必要实行改组，则不必马上改组，仍照现时状态做下去，待一二个月后再行改组为我党占比较多数同时网罗各方民主人士在内的统一战线上的省政府，那时可重新审定名单。”

同日 为推动各级地方政权的建设，将中共中央华中局关于召开各界代表会的指示转发给华东局、二野前委、西北局、一野前委，请他们“加以研究，并下发所属参考”。

同日 复信许志行〔2〕，指出：“你在上海教书甚好，教书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不荒废课业，不要来京。如遇假期，可以来京一游，看一看仍回去教书。”

10月26日 复电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同志们：“接到你们的贺函，使我十分愉快和感谢。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八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我庆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

〔1〕贺，指贺龙。

〔2〕许志行，1919年冬在武汉同毛泽东相识，1926年曾应毛泽东的邀请到广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当时在上海格致中学任教。

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同日 复电感谢阿尔及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来函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复电说：中国人民是从帝国主义长期侵略压迫下求得解放的，因此对于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具有热烈的同情和坚定的信心。我相信，阿尔及尔人民在阿尔及尔共产党领导下和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援助下，终将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

同日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1〕、董必武、林伯渠出席，薄一波、聂荣臻列席。会议决议事项主要有：（一）政府工作人员实行薪水制问题，指定陈云、薄一波、聂荣臻、李立三、杨立三〔2〕开会，并吸收其他有关人员参加讨论，拟定初步办法，交政治局审定。军队中实行薪水制问题，一并加以讨论。（二）关于政府各部与党的领导机关的工作关系问题，由周恩来起草一个指示，提交政治局讨论。（三）关于目前统一战线及共产党干部与非党干部合作问题，由刘少奇起草一个指示，提交政治局讨论。（四）关于政权系统中的党组及党委的组织和工作要点，由安子文〔3〕起草一个指示，提交政治局讨论。（五）关于王明〔4〕尚未按照二中全会决定对所犯错误写说明书，刘少奇已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三日代表政治局和王明谈话，指出王明不尊重二中全会决议、拖延不写说明书是不对的，并催他从速写好说明书。政治局认为刘少奇所采取的立场是正确的。王明必须

〔1〕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北京市委书记、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1951年2月又任北京市市长。（2）杨立三，当时任食品工业部部长、中央军委总后勤部部长。

〔3〕安子文，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49年11月又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1950年9月又任人事部部长。

〔4〕王明，即陈绍禹，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兼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

遵守二中全会决定，从速写好声明书，交政治局审阅。（六）罗章龙来信要求恢复党籍事，应令湖南省委通知他，由于他在一九三〇年采取了分裂党的立场，擅自组织他自己的所谓中央和地方的非常委员会。因此，当时党中央为维护党纪起见，采取了开除他的党籍的办法，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他现在来信要求恢复党籍，决定不允许。

10月27日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出给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的命令，指出：“中央人民政府业已成立，华北人民政府工作着即结束。原华北人民政府所辖五省二市改归中央直属。中央人民政府的许多机构，应以华北人民政府所辖有关机构为基础迅速建立起来。”

同日 复电包尔汉，指出：“迪化伪监委行署应予撤销。公物档案希派员接管，造册具报政务院中央监察委员会。原有人员之生活无着者，酌予维持。”

10月28日 为请苏联帮助防治鼠疫问题致电斯大林：“张家口以北地区发生肺鼠疫，死六十余人。已蔓延至张家口，死四人。威胁平津。请你考虑是否可以空运生菌疫苗四百万人份，血清十万人份至北京应用，所需代价，当令中国政府以物物交换办法照付。再则，前次苏联政府派来以马意斯基同志为领队的三十多人的防疫队，在东北进行防治鼠疫的工作，成绩甚大，东北人民及中国卫生工作者极为感谢，现他们正在返苏途中。如可能，请你考虑，苏联政府是否可以再派一同样的防疫队来北京转往张家口帮助我们进行防治鼠疫工作。倘蒙允诺，不胜感谢！”三十日，又致电斯大林：“承你派送专门医生、防疫队和大量药品到北京来，甚为感谢。”

10月29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攻击金门岛失利的教训的通报，以急电发给各野战军前委、各大军区。通报指出：“据第

三野战军粟裕、袁仲贤、周骏鸣〔1〕三同志十月二十八日致第十兵团叶、陈〔2〕及福建省委电称，十月‘二十七日八时电悉。你们以三个团登陆金门岛，与敌三个军激战两昼夜，后援不继，致全部壮烈牺牲，甚为痛惜。查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之最大者。其主要原因，为轻敌与急躁所致。当你们前次部署攻击厦门之同时，拟以一个师攻占金门，即为轻敌与急躁表现。当时，我们曾电你们，应先集中力量，攻占厦门，而后再转移兵力攻占金门，不可分散力量。但未引起你们深刻注意，致有此失。除希将此次经验教训深加检讨外，仍希鼓励士气，继续努力，充分准备，周密部署，须有绝对把握时，再行发起攻击。并请福建省委，用大力为该军解决船只及其他战勤问题。至失散人员，仍望设法继续收容’等语，特为转达，请急转告各兵团及各军负责同志，引起严重注意。当此整个解放战争结束之期已不在远的时候，各级领导干部中主要是军以上领导干部中容易发生轻敌思想及急躁情绪，必须以金门岛事件引为深戒。对于尚在作战的兵团进行教育，务必力戒轻敌急躁，稳步地有计划地歼灭残敌，解放全国，是为至要。”

〔1〕袁仲贤，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代理参谋长。1950年4月任中国驻印度大使。周骏鸣，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副参谋长。

〔2〕叶，指叶飞，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兼福建省军区司令员、福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1年12月又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陈，指陈庆先，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参谋长。

同日 就董其武〔1〕部改编问题复信薄一波，指出：“绥远两个军及一个骑兵师，可以编入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序列，并颁发番号；所列两军及骑师的军事指挥人员亦可照准，惟须与政治委员及政治部主任同时委任，方能使政治工作在军中建立威信，此点请与傅宜生〔2〕商酌。”“在绥远军队中实行认真的政治工作制度是一件大而艰难的事，必须事先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并须由傅宜生亲自领导方能行得通，否则难免出乱子。”

10月30日 为转发薄一波十月二十九日关于华北各城市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分局等的批语：“这个报告总结了华北各城市所开各界代表会议的主要经验，写得清楚明确，可为一切各界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会议所取法。因此，请你们认真研究一下，并且印发给全党干部研究（中央已印二千余份发给中央直属各部委社院校的同志们）；同时请你们用电报发给你们所属各市委省委区党委并转发到地委县委及一切中小城市的党委，引起全党干部的注意。同时，希望你们注意总结你们自己在这一重大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报告中央，是为至盼。”薄一波报告总结的主要经验是：城市各界代表会议，一般都以前生产上的重要问题为议题。推选代表既要有严肃性，又要有广泛的代表性。每次会议，应抓紧解决为广大群众所迫切要求解决的一两个问题。决议后一定要贯彻执行，不能执行的不要决定；决定了但行不通的，应向代表和群众说明道理，加以解释，以示信于人民。使每个代表都有发言的机会，是开好代表会议的关键。

〔1〕董其武，原国民党军将领，1949年9月率部在绥远起义。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1949年12月又任绥远省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绥远省军区副司令员。1950年底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3兵团司令员。

〔2〕傅宜生，即傅作义，字宜生。

各界代表会议一定要和当前实际工作密切结合。

10月31日 致电林彪并告邓子恢、叶剑英、陈赓及刘伯承、邓小平。电文如下：“关于兵力部署的几点意见：（一）我们已占领广州及广东的大部，广州、香港、澳门之间的海上残敌尚未肃清，陈赓兵团即将入桂作战，内外敌人可能窥伺广州。白崇禧匪部如被程子华〔1〕、陈赓切断逃往云南、安南〔2〕的道路，有东窜入粤可能。因此在广西问题彻底解决以前，邓华兵团（两个军）必须全力镇守广州（主力）、韶州〔3〕（一部）之线，不要进攻雷州半岛，更不要攻海南岛。华南分局决定邓华兵团迅速离开广州南进的计划是不妥当的。必须等候广西问题解决以后，从广西调出四野一个至两个军到广州、韶州线，邓华兵团方能南进。（二）全国国防重点是以天津、上海、广州三点为中心的三个区域。二野入云、贵、川、康后，三野只能防守华东，置重点于沪、杭、宁区域，以有力一部准备取台湾，没有余力兼顾华北。现在华北只有杨成武〔4〕三个军及其他六个二等师位于京、津、山海关一线，一旦有事，颇感兵力不足。除令一野以杨得志兵团〔5〕（三个军十万人）位于宝鸡、天水、平凉区域，有事可随时调动外，四野在广西问题解决后，拟以五个军位于两广，担任广州为中心之两广国防；以三个军位于河

〔1〕程子华，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13兵团司令员。1950年11月任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副主任（1952年10月任党组书记、代理主任）

〔2〕安南，越南的旧称。

〔3〕韶州，今广东韶关。

〔4〕杨成武，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司令员兼天津警备司令部司令员。1950年6月又任京津卫戍司令部副司令员。1951年2月又任新组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司令员。1952年8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参谋长。

〔5〕杨得志兵团，指杨得志任司令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19兵团。

南，准备随时增援华北；其余各军，位于湘、鄂、赣三省并以主力位于铁道线上，可以向南北机动。在目前三个月至五个月内，四野除完成各省剿匪任务外，如能做到（甲）解决广西问题，（乙）修通粤汉、湘桂两路（这是极重要的），（丙）利用铁路运输完成上述国防部署，就是完美无缺的。请你们十分注意粤汉、湘桂两路的修复和守备。（三）陈赓、程子华须同时向柳州、南宁动作，方能完成围歼白匪任务。现敌鲁道源兵团〔1〕似正准备由桂林以南转入柳州地区，估计是准备去云南的。而我陈赓部刚才解决粤敌，须休息若干天方能行动。程陈两部何时可以开始入桂作战，望告。（四）据有经验者称：由百色入云南的道路上瘴气（恶性疟疾）为害，不利行军。因此，陈赓部在解决广西问题后应准备循柳州、贵阳道路入滇，不一定走百色。（五）你们意见如何望告。”

同日 就华中成立军政委员会等问题，致电林彪、邓子恢和中共湖南省委并告刘伯承、邓小平，指出：“程潜、程星龄〔2〕和我们谈得很好。我对程星龄谈的许多话，已托他向你们转告。请你们十分注意拉好对程潜、程星龄、李明灏、唐星〔3〕及其他进步分子的关系，争取他们和我党进一步靠拢，站在《共同纲领》基础上，打击反动分子，改造陈明仁部，以利民众运动的发展。”“华中须准备成立以我党为中心的统一战线的军政委员会，

〔1〕鲁道源兵团，指鲁道源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11兵团。

〔2〕程星龄，程潜的堂弟，曾任国民党政府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参议。1948年12月至1949年8月在长沙参与程潜、陈明仁起义活动。当时任政务院参事、湖南省人民军政委员会顾问。1950年4月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3〕唐星，原国民党政府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参与1949年8月程潜、陈明仁的起义，任首席谈判代表。当时任湖南省人民军政委员会委员。

以为管辖六省〔1〕军事、政治、财经、文化等项工作的过渡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拟以林彪为主任，邓子恢、程潜为副主任，委员须网罗六省党内党外重要人物。”“关于组织华中军政委员会〔2〕及请程潜当副主任事，我们已和程潜、程星龄谈过。程潜表示愿就副主任，在林彪领导之下从事工作。”

11月2日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出席，薄一波、聂荣臻列席。会议决定事项主要有：（一）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二）决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国政协委员会、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中负责的共产党员，直接受中央政治局领导，不另设党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署设联合党组，罗荣桓〔3〕为书记。决定周恩来为政务院党组书记，董必武、陈云为第一、第二副书记。（三）为整饬党纪，决定组织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朱德为书记。同意陈云关于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所属各部门在最近数月内分别召集水利、农业、粮食、茶叶、丝绸、猪鬃皮毛油脂、煤炭、钢铁、机器制造、电器、税务、财政等一系列会议。

同日 为转发中共浙江省委十月二十七日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华中局、西南局、西北局等的批语，指出：浙江省委提出的几个带政策性的问题，“各省都有，值得注意，请转发所属省委区党委市委地委连同自己在反霸减租斗争中所得材料加以研究，以其意见汇报中央为盼”。浙江省委提出的农村中几个带政策性问题是：减牛租问题，雇工增加工资问题，对恶

〔1〕指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6省。

〔2〕1949年12月正式成立时名称为中南军政委员会。

〔3〕罗荣桓，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检察署检察长、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1950年4月、11月又先后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总干部部部长。

霸地主的工商业的处理问题，在强大农民运动威力下对有的主要的恶霸地主向政府自首的处理问题，积谷、公谷、庙谷、祠堂谷的处理问题，反霸中没收的森林及公共森林的管理问题，一切公田、公地是否减租的问题。

同日 关于对旧人员处理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中局、湖南省委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和前委电。电报在援引新华社总社发来的一件投书的内容之后，指出：“（一）关于投书内所称之湖南盐务办事处遣散多数旧人员一事，请湖南省委派人查明情况并拟具处理意见电告。（二）关于新华社九月十六日《六评白皮书》社论中所称对待旧人员的原则及办法，中央曾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有了指示，全国各地党的组织、人民解放军及人民政府必须一律遵照执行，必须避免过去北京、上海、南京等处粗鲁地不负责任地遣散大批旧人员（北京万余人，沪、宁二万余人）的错误，不要重犯。最近西北局关于处理旧人员问题有一具体办法〔1〕、中央业已转发你们参考办理，请加注意，并转告所属注意为要。”

11月4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粟裕、唐亮、张震〔2〕、周骏鸣并告华东局电：“同意你们戌东〔3〕电所述定海作战方案，我们认为你们采取慎重态度，集中优势兵力，事先作充分准备，力戒骄傲轻敌的方针是正确的。”

同日 复电林彪并告邓子恢：“十一月二日电悉。你对陈明仁部所取方针是正确的。六十二师俘虏兵如尚未分散，可以拨补陈部。”林彪二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提出的对陈明仁部的方针

〔1〕指中共中央西北局1949年10月14日关于对旧人员处理问题的指示。

〔2〕唐亮，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震，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参谋长。1952年4月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

〔3〕戌东，即11月1日。

是：加紧政治上与组织上的改造，学习革命道理，提拔进步分子，改正错误思想，分批集训落后干部，而当前以政治改造为主。电报中还说到陈明仁要求将俘虏的国民党军六十二师的官兵补充给他的部队。

同日 阅中共上海市委十一月一日给中央的电报转述的英国侨民致英政府备忘录要点。转述的要点中说：英侨情况，现亦略好转。对身受政府一视同仁之待遇，无不感激。惟对某些税收制度及劳资问题，尚有意见。天津之合并征收所得税及营业税，并照“付税能力”强定工商税，对工商业有严重不良影响。惟上海之营业税法及印花税法，系参酌本市实际情况而定，人民无不称善。毛泽东批示：“薄一波同志：请将此项情报抄送黄敬〔1〕，并收集上海税收办法，加以研究。”

11月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局电，指出：“关于暂时不建立华东人民政府而建立华东军政委员会以为过渡时期的政权机关及该委员会名单问题，陈、刘〔2〕返沪后谅已转达我们的意见。现请你们迅即加以考虑并将具体名单于本月十五日前电告，以便连同华中及西北两项名单由中央作最后审定提交中央政府通过。我们认为建立此项华东临时政权机关的时机业已成熟了。”

同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彭德怀并告西北局电，指出：新疆省军政委员会问题，“现应考虑者，新疆既有联合省政府又有联合军区，并以彭为司令员兼政委，似乎不必再设军政委员会了”。

同日 阅聂荣臻关于卫生部问题的报告，批送刘少奇、

〔1〕黄敬，当时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天津市市长。1952年8月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

〔2〕陈、刘，指陈毅、刘晓。

朱德、周恩来、聂荣臻、杨尚坤〔1〕，指出：“（一）卫生部错误检讨〔2〕，由尚昆印发中央及军委各部、委、会、社、院、校负责人参考；（二）卫生部所作关于行政会议报告书及所附参考资料，牵涉军事、政治、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应由尚昆印发各政治局委员及薄、聂、陆、乔、陈〔3〕，以待中央讨论，分别采取政府立法或行政命令的方式推行，此次卫生行政会议上只能当作建议通过，不能作决定。”

同日 复电原身边警卫员翟作军：“你恢复党籍并受命做民运工作，为你庆贺，希望你服从上级指示，努力奋斗，为人民立功。”

11月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贺龙并告西北局彭德怀及刘伯承、邓小平电，指出：“同意贺龙同志六日意见〔4〕。为了统一指挥十八兵团及其他临时配合作战部队，为了领导川西北地方工作，在未与西南局会合前，需要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机关。此项机关似可称为川西北军政委员会，以贺龙为主任统一领导军事、政治、党务、民运等工作。何人为副主任及委员名单，请贺提出先在此次兰州西北局会议上斟酌通过，电告中央作决定。”

〔1〕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直属机关委员会书记。

〔2〕指卫生部1949年11月3日对于工作中的方针原则和政策性的重大问题没有向中央请示报告等错误所作检讨的申明书。

〔3〕薄，指薄一波。聂，指聂荣臻。陆，指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52年9月改任副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乔，指胡乔木。陈，指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马列学院副院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毛泽东的秘书。1952年11月又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4〕1949年11月6日，贺龙致电中共中央并西南局，建议：对陕南、川西北进军，在与西南局会合前，须有统一的党委组织及指挥机构实施领导较为适宜。

11月9日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彭真、林伯渠出席，薄一波、聂荣臻列席。会议讨论并通过《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组织中国共产党党委会的决定》、《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建立中国共产党党组的决定》、《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陈赓并告叶剑英、方方电，指出：“各方情报指明，白崇禧部在无法逃往云、贵时，将往越南，此种企图已日益明显。白匪如真逃往越南，将给胡志明〔1〕及我们自己以很大困难。因此，除程子华兵团着重切断白匪经柳州、退贵州，经百色、退云南的道路外，我四兵团应着重切断白匪退越南的道路，应尽一切可能不使白匪退往越南。”

同日 致电林彪、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并告陈赓，指出：“据广东南路区党委六日电称，湛江只有敌四千余人，我有一个主力师配合南路纵队，即可歼灭湛江之敌，全面解放雷州半岛，可以加强南路支援解放广西及琼崖的基地等语。我曾告诉你们，在广西问题解决以前，邓兵团〔2〕主力的任务在于保卫广州区域及广韶线〔3〕而不要去南路，这是正确的，你们亦已同意这样做。但如果去一个师，即可解决南路问题，则是可以的和必须的。由邓兵团（不是由四兵团）分出一个师（可以是一个最强的师）去南路，协同梁广纵队〔4〕肃清南路之敌，有很多好处。如果你们亦同意，即可作此部署。”

〔1〕胡志明，当时任印度支那共产党（1951年2月改名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兼政府总理。

〔2〕指邓华任司令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

〔3〕广韶线，指粤汉铁路广州至韶关段，今京广线的一段。

〔4〕梁广纵队，指梁广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

同日 就赴苏联访问的时间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王稼祥电：“我们已请柯瓦廖夫〔1〕通知斯大林同志，请他决定毛主席去莫斯科的时间，我们认为毛主席可于十二月初动身去莫斯科。至于恩来同志是否应随毛主席一道去莫斯科，或于毛主席到莫后再定恩来是否去及何时去，此点亦请斯大林酌定。”

11月1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东局电：“九日电悉。你们既已召集三十几个党外政协代表征询对华东政权机关的意见，可以再征询一次，以其意见于十一月二十日以前电告，不得再迟。”

11月11日 致电林彪、黄克诚〔2〕并告陈赓、刘伯承、邓小平：“苏名作家西蒙诺夫同志等一行是否已到衡阳及如何往广西前线参观作战事宜，望电告。请你们十分注意此事，妥为招待及护送，确保其安全而又能顺利获得参观军队生活、军队作战及地方群众活动等方面的实际材料，以利其为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写一部著作，如他们愿意继续随四兵团入滇应表欢迎，并一样妥为保护。”

同日 审阅修改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复聂荣臻、薄一波、张南生、张致祥〔3〕的电报稿。在电报稿中的“同意所提调任改编董其武部两个军七个师之师以上政治干部配备全部名单”一句之后，加写：“所有这些政治工作干部必须调集一起，有计划地给以去绥远军队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的训练，并完全研究明白，

〔1〕柯瓦廖夫，当时任苏联驻中国专家总负责人。

〔2〕黄克诚，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省军区政治委员 1950年3月又任司令员 1952年10月任中央军委第三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

〔3〕张南生，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51年2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致祥，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然后派去，否则不要派去，务望注意为要。”

11月12日 致电斯大林：“感谢你欢迎我到莫斯科去。我准备于十二月初旬动身。同时请你允许柯瓦廖夫同志与我一道同去。他已对苏联专家的工作作了安排，他去不会影响工作。”

同日 致电刘敬宜、陈卓林以及中国、中央两航空公司〔1〕全体员工：“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全体员工在两公司总经理领导下，毅然脱离国民党反动残余，投入人民祖国怀抱，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特向你们表示祝贺、欢迎和慰问。希望你们团结一致，为建设人民航空事业，并为保卫留在香港的祖国财产而奋斗。”

11月13日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物价问题。在陈云作关于制止物价猛涨的发言后，毛泽东说：邓子恢、饶漱石十一月二十五日来京，拟开会议，准备讨论财经问题。首先是党内问题，要有决心。决定由财经委员会研究后提交政务院，讨论准备发行公债的问题。本月底召开的政府会议上，由陈云同志作报告，讲一讲如何做到逐步平衡预算，求得明年稳定的问题。对财经问题应在党中央通过一个决议，这个决议由陈云负责起草。明年冬季开始土改，大体要在三至五年内完成，准备发一通知。华中提出的以农村为中心，也是有毛病的。中心是在城市，不管工业的大小，因为它总有手工业，手工业比农业是进步的。军区部队准备明年进行开垦，由聂荣臻起草一个通知。

11月14日 致电粟裕并告陈毅、饶漱石：“舟山群岛共

〔1〕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是原国民党政府的两个民用航空公司。1948年底，这两个公司将营业机航基地从上海分别迁移到香港和广州。1949年11月9日，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敬宜、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卓林由香港飞抵北京，发布全体员工起义通电，同时有11架飞机飞回大陆。

有敌军五万人，并有颇强的战斗力，你们以两个半军进行攻击是否足够？鉴于金门岛及最近定海附近某岛作战的失利，你们须严重注视对定海作战的兵力、部署、准备情况及攻击时机等项问题。如果准备未周，宁可推迟时间。提议你们派一要员直赴定海附近巡视检查一次。”

同日 就大量吸收培养少数民族干部问题，致电彭德怀和中共中央西北局，指出：“据青海省委迭次反映，马〔1〕匪余党，在许多地方煽动群众，组织反抗。此次兰州会议〔2〕上请予以严重注视。除大力剿匪，省委地委县委集中注意做艰苦的群众工作，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外，各级政权机关均应按各民族人口多少，分配名额，大量吸收回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参加政府工作。在目前时期应一律组织联合政府，即统一战线政府。在这种合作中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此外，青海、甘肃、新疆、宁夏、陕西各省省委及一切有少数民族存在地方的地委，都应开办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或干部训练学校。请你们注意这一点，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

同日 会见邓宝珊〔3〕，同他进行长时间的谈话。

11月15日 复信周世钊〔4〕。信中说：“兄过去虽未参加革

〔1〕马，指马步芳，曾任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国民党青海省政府主席。

〔2〕指1949年11月17日至22日在兰州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北局扩大会议。〔3〕邓宝珊，曾任国民党军第21军团军团长、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1949年初率部起义。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1949年12月又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

〔4〕周世钊，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校长。

命斗争，教书就是有益于人民的。城南学社诸友来电亦已收到，请兄转告他们，感谢他们的好意。兄为一师校长，深庆得人，可见骏骨未凋，尚有生气。倘有可能，尊著旧诗尚祈抄寄若干，多多益善。”“除台湾、西藏外，全国各地大约几个月内即可完成军事占领。但大难甫平，民生憔悴，须有数年时间，方能恢复人民经济，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及提高人民政治觉悟水平，这些任务均有待于文教工作的协助。”

同日 复信毛煦生〔1〕：“前后三函奉悉，迟复为歉。先生仍以在乡间做事为适宜，不要来京。家计困难，在将来土地制度改革过程中可能获得解决。先生过去在辋重营担任任何职，记不清楚了，便时尚祈见示。毛紫奇〔2〕尚在人间否？”

11月17日 复电程潜：“仇亦山〔3〕先生来京赐教，极表欢迎。惟仇先生体弱，冬季北上是否适当。为避寒计似以开春北来为宜，如无此种顾虑则可随时动身。请与仇先生商定见示为盼。”本日，又复电仇鳌：“先后两电均敬诵悉。来京赐教，极表欢迎。何日命驾，尚祈电示。”

同日 复信李介侯〔4〕：“耿侯〔5〕兄自一九二八年在湘赣边界之宁冈县见过一面，随即率队返湘南以后，未再见过。传

〔1〕毛煦生，辛亥革命爆发后曾和毛泽东在湖南起义的新军中共过事，那时他在辋重营当文书。

〔2〕毛紫奇，即毛子奇，辛亥革命爆发后在湖南起义的新军辋重营任营长。

〔3〕仇亦山，即仇鳌，字亦山，中国同盟会会员。曾任国民党政府铨叙部次长、国民参政员。1949年对湖南和平解放作出贡献。当时任湖南省人民军政委员会委员。

〔4〕李介侯，毛泽东少年时相识的乡村教师李漱清的儿子。当时在长沙经商

〔5〕耿侯，即李耿侯，李介侯的哥哥。1925年经毛泽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在湘南牺牲。

闻殉难，似属可信，时地则无从查问了。尊翁〔1〕健存，可为庆贺，尚祈转致问候之意。”

11月19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什么是恶霸地主问题的电报，起草中央给华中局、华南分局、西北局等的批语，望他们将这个电报转发所属注意。华东局的电报说：一般地说来，恶霸即是地主阶级当权派，但有若干当权派的地主不一定是恶霸。必须从具体情况与具体人物及具体事实，特别是群众的要求与斗争的目的出发，而不能从抽象的概念出发。

同日 为转发第二野战军前委对贵州新区工作策略问题的指示，起草中共中央给华中局、华南分局、华东局、西北局各负责人的批语：“请转发所属注意。我们认为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二野前委指示的主要内容是：（一）在策略上提出团结多数，打击少数，不可树敌过多，防止过左是对的，但不可笼统地提出集中力量打击中央系的方针。（二）市和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以早开为好。（三）处理杂色武装问题时，要依据不同对象，权衡利弊，审慎处理。（四）中央明确规定，所有国民党机构的全部人员包括军队官兵、政府员工和工厂职工全部收容起来，一个也不要遣散。你们不宜人为地规定工人待遇比旧职员高，尤不可在目前条件下去提高工人待遇，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带有危险性的办法。（五）新区问题极其复杂，应从各方面发现与研究，望多请示报告，以便取得我们的帮助。

同日 复电宣布脱离国民党当局的前资源委员会驻港员工：

〔1〕指李漱清，乡村教师。毛泽东少年时常去他家看书、请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十四日电〔1〕悉，甚为欣慰。即望团结一致，坚持爱国立场，保护祖国财产，以待中央人民政府的接收。”

同日 复电兰那地夫〔2〕：“你在十月十二日的贺电收到了，十分感谢你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热情的祝贺。全中国人民读到你的电报里所表现的印度革命人民的兄弟友爱，都将感觉欢欣和骄傲。印度人民是亚洲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伟大民族之一，它的过去的命运和将来的道路和中国有许多类似之点。”

11月21日 就任弼时〔3〕赴苏联治病问题致电斯大林：“中共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同志患病甚重，苏联大夫认为他需要去莫斯科治疗，我们同意这种意见。未知是否可行，请予示复。”次日，接到斯大林表示同意的复电后，又致电斯大林：“拟令任弼时同志随两位苏联医生一同赴苏联，如蒙同意请即电告，并请通知两位医生与任弼时同志同行。”

11月23日 就解决西藏问题致电彭德怀并告贺龙、习仲勋、刘伯承、邓小平，指出：“经营西藏问题请你提到西北局会议上讨论一下。目前除争取班禅〔4〕及其集团给以政治改造（适当地）及生活照顾外，训练藏民干部极为重要。西藏问题的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就现在情况看来，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任第二位的责任。因为西北结

〔1〕指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贸易处国外贸易事务所驻香港员工吴志翔等35人于1949年11月14日给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等的电报。电报中宣布与国民党反动政权脱离关系，保护在港资产，听候人民政府接收。

〔2〕兰那地夫，当时任印度共产党中央总书记。

〔3〕任弼时，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秘书长。

〔4〕班禅，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当时在青海。

束战争较西南为早，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据有些人说平坦好走，班禅及其一群又在青海。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有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打西藏大概需要使用三个军，如何分配及何人负责指挥现在还难决定。但西北局现在即应于藏民干部准备问题及其他现在即应注意之问题作出计划。”

同日 和朱德复电班禅额尔德尼：“接读十月一日来电〔1〕，甚为欣慰。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希望先生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

同日 审阅修改彭德怀给班禅额尔德尼的复电稿，加写一段话：“西藏解放已可预期。尚望先生号召藏族人民，加紧准备，为解放自己而奋斗。”

11月2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东局电：“上海第二届各界代表会应选出四十人左右的协商委员会。其职权为在各界代表会闭会期间向市政府提出建议案，并为下届各界代表会准备议程及议案。请参考北京《人民日报》所载北京第二届各界代表会所选举的协商委员会。”

同日 下午四时，就歼灭白崇禧部的部署致电林彪并告陈赓：“根据四野二十二日谍息，白崇禧决于二十三日起令其所部共十六个师，由博白、郁林〔2〕、北流、容县、岑溪之线，向廉

〔1〕1949年10月1日，班禅额尔德尼从青海发电报给毛泽东和朱德，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期望西藏早日解放。

〔2〕郁林，今广西玉林。

江、化县〔1〕、茂名、信宜之线攻击。这是歼灭该敌的好机会，为此请你们注意：（一）陈赓所率四个军，除一个军仍照陈赓前提部署由罗定、容县之线迂回敌之左侧背外，主力似不要进入广西境，即在廉江、化县、茂名、信宜之线布防，置重点于左翼即廉江、化县地区，待敌来攻而歼灭之。同时以一部对付余汉谋〔2〕之配合进攻。（二）桂林方面之我军迅速分数路南下，攻敌侧背，置重点于左翼，即宾州〔3〕、贵县、郁林之线，但未知时间上来得及否。（三）白匪主力既确定向雷州半岛逃窜，我程子华兵团即应分数路宽正面，第一步向百色、南宁之线第二步向龙州、南宁之线攻进，以期尽歼逃敌于龙州、海防国境线上。（四）以上是否可行，请按情酌定。”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西北局并告华北局电：“关于伊盟〔4〕划归华北问题，原由薄一波同志与马明方〔5〕同志商定，由马回西北局转达征求你们同意后实施。因马去东北参观，故你们尚不知道此项决定。现据你们来电表示同意，即请径与华北局商定交接事宜，并注意要使交接双方都感满意，并恰当地处理奇子祥〔6〕问题及伊盟与傅、董〔7〕关系为要。”

〔1〕化县，今广东化州。

〔2〕余汉谋，1949年8月被任命为国民党军华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3〕宾州，今广西宾阳。

〔4〕伊盟，即伊克昭盟，今属内蒙古自治区。

〔5〕马明方，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1950年2月任第三书记 1949年12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50年1月又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席。1952年9月、10月又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副政治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6〕奇子祥，即奇天祥，原国民党政府伊克昭盟准格尔旗保安司令，1949年11月5日率部起义。

〔7〕傅、董，指傅作义、董其武。

11月25日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出席，饶漱石、李富春〔1〕、薄一波、聂荣臻列席。会议决定：毛泽东定于十二月初访问苏联，在毛泽东出国期间，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由刘少奇代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由朱德代理；全国政协主席由周恩来代理。会议指定陈云、薄一波、李富春、饶漱石、邓子恢拟定预算问题预案。

同日 致电贺龙：“据周士第〔2〕等来电，主张早日发动向胡宗南进攻，我意待你在西北局会议完毕，回到十八兵团再行发动进攻为适宜。”

同日 复电林彪、谭政、萧克并告刘伯承、邓小平：“二十三日电悉。如刘、邓需要，同意你们意见以七个师交刘、邓指挥人川作战。”

同日 为答谢越南民主共和国来电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复电胡志明，指出：“中越两国同处反帝国主义斗争前线，随着两国人民解放斗争的胜利发展，两民族的友谊必将日臻亲密。”

11月26日 就各地修机场的经费问题，批示聂荣臻、刘亚楼〔3〕：“各地修机场是一件大事，必须认真办理，只能用必不可少的钱，不能随意开大预算，请你们发一统一指示。”

11月27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贺龙、李

〔1〕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东北局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1950年4月又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重工业部部长。

〔2〕周士第，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18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刘亚楼，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

井泉〔1〕电：“（一）为协同一致全歼川、康各敌之目的，军委决定贺、李所部（十八兵团及其他）应受刘、邓、张、李〔2〕指挥，我们不直接指挥贺、李，以免分歧。（二）贺、李发给刘、邓之电报，同时发一份给我们。（三）以上望遵照为要。”

同日 就吸引胡宗南部到重庆聚歼的问题，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并告贺龙、李井泉：“据报蒋介石令胡宗南以汽车八百辆运其第三军到重庆。请注意：（一）是否能吸引更多的胡宗南部到重庆。（二）我向重庆方面攻击之各军是否有必要稍为迟缓其行为，以利吸引较多之敌军据守重庆而后聚歼之。因为蒋介石自己在重庆，可能打一个聚歼汤恩伯〔3〕于上海那样的好仗。”

同日 就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南分局并告华中局、华东局、西北局等的电报。电报指出：“你们必须充分注意广东全省市的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各市各县均应召开。你们必须将这种市的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看成是团结各界人民，动员群众完成剿匪反霸，肃清特务，减租减息，征税征粮，恢复与发展生产，恢复与发展文化教育直至完成土地改革的极重要的工具，一律每三个月召开一次。”对湖南、江西、湖北、河南四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电报要求华中局及四省省委必须充分注意给予指导，按时召开，总结经验，交流经验。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倡导评奖运动的指示，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的批语：“兹将华北局十一月二十二日关于倡导评奖运动作为一项新的领导方式的指示转发给你们，请

〔1〕李井泉，当时任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副主任。

〔2〕张、李，指张际春、李达。

〔3〕汤恩伯，1949年1月被任命为国民党军京沪杭警备总司令。

加注意，并转所属参考，依据当地情形斟酌采用。”

11月28日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董必武、林伯渠出席，薄一波、聂荣臻、李富春、饶漱石列席。会议研究一九五〇年全国收支概算和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问题，以便在新的一年里减少现钞发行量，平抑全国物价，减少财政赤字，安定民生，逐步地恢复和发展生产。

同日 就占领重庆的部署问题复电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并告贺龙、李井泉，林彪、谭政、萧克：“我所顾虑者，是怕重庆敌人利用我西路三个军尚要十二月十号才能占领泸州，我十一、十二等军向重庆进得太早，不敢据守，向上游或向成都逃掉。但如你们认为罗广文〔1〕被歼后，重庆已无多兵防守，势必早日逃走，不如迅速占领重庆，较为有利，则你们早日夺取重庆的计划是适当的。如重庆之敌并无逃走之意，则十一、十二军于歼灭罗广文后，于重庆上游渡江占领江北一段，然后看情形再定攻城计划，似较适宜。请依情况发展酌定之。”十一月三十日，第二野战军主力部队解放重庆，蒋介石于当日晨逃到成都。

同日 复信毛禹居〔2〕：“惠示并诗敬悉，极为感谢。此间情形，泽连〔3〕当可面达。顺问阖族各前辈同辈后辈人们的安好，贵宅各兄弟子侄的健康。”同日，复信毛泽荣〔4〕：“接到你的信，极为高兴。我这里的情形，可问李祝华〔5〕、毛泽连二位便知。托毛、李带上皮衣料一件，为弟御寒之用。”

〔1〕指罗广文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15兵团。

〔2〕毛禹居，即毛宇居，毛泽东的房兄和私塾老师。大革命时期曾参加中国共产党。

〔3〕泽连，即毛泽连，毛泽东的堂弟。

〔4〕毛泽荣，毛泽东的堂弟。

〔5〕李祝华，毛泽东的堂表弟。

11月29日、30日 主持召开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列席会议。会议讨论《一九五〇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概算（草案）》、《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草案）》等。毛泽东在二十九日的会议上发表讲话。关于财政概算，他说：去年预算增加五倍，今年增加一百多倍，各部门为了工作，预算都很大，但这个家当就这么大，只有这些钱，因此必须把支出和收入碰一下头。总收入和总支出都是五百九十四亿斤（市斤）小米，每斤合洋钱五分，总共等于二十九亿五千万银洋。在收入项目内，公粮收入占百分之四十一一点四，税收占三十八点九，合计尚差一百一十二亿斤小米，就要靠发行公债来弥补这个赤字。在支出项内，明年准备养九百万人，其中军队五百七十万人，其他人员（包括留用人员）三百三十万人。所有人员，从中央到地方，在业务以外都要进行生产。后年可以准备三百万人转入生产。现在，我们的建设费只占百分之二十四，文教卫生费只占百分之四点一，军费则占百分之三十八点八，行政费占百分之二十一点四，所以实际上这还是一个战争预算。关于发行折实公债问题，他说：今年票子发得多，又加上防疫，设立三道封锁线，因此使全国物价高涨。这个预算的目的，就是明年不能像今年这样印票子，否则物价还会涨，明年可以做到比今年发得少。公债发两亿分就等于两亿银钱。有的主张发多，有的主张发少。发多了不妥当，发少了不解决问题，目的还在收回通货，请同志们研究一下。公债等于折实储蓄，要解释清楚，有借有还。参加会议的把预算草案带回去，要给各党派主要负责人（常委）、各地区负责人知道一下。如果不懂得全局，他就不好工作。从这个预算中可以看到，我们还是有办法的。如果后年能将军队从五百七十万减到三百万甚至二百五十万就好

多了。“飞鸟尽，良弓变”，变为生产的，不是“良弓藏”。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过三关以后就好办了。第一关战争，第二关土改，到社会主义这是第三关就好过了。

11月30日 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复西北局、一野前委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及前委电：“十一月二十四日电悉，同意西北局扩大会议议决第一野战军与西北军区合并，以彭德怀兼军区司令员，习仲勋为军区政委，张宗逊兼军区副司令员，甘泗淇为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第二兵团兼甘肃军区，与原甘肃军区合并，以许光达〔1〕兼军区司令员，原甘肃军区司令员徐国珍为副司令员。第十九兵团兼陕西军区，以兵团首长兼军区首长。”

同日 致电祝贺由英国进步人士发起的英中会议在伦敦开幕。贺电指出：“对于英中会议的召开，谨致热烈的祝贺。中国人民欢迎一切加强中英人民友谊的努力，并希望这种努力获得成功。”

12月1日 同张澜、李济深、郭沫若、黄炎培、沈钧儒等十二位民主人士座谈，磋商毛泽东访问苏联时签订中苏条约事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参加。

同日 审阅杨立三本日关于一九五〇年全国军费预算会议召开前拟要各大军区编造预算的报告，批示：“刘、朱、周、聂并告杨立三，同意此件意见。开会时请你们注意指导，因此事与全国财政预算有密切关系。”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山东分局电，指出：“斯大林同志今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七十大寿，中央决定送山东出产的大黄芽白菜大萝卜大葱大梨子作寿礼。”“你们采购上列各项物品〔大黄芽白菜大葱大梨大萝卜〕时，请注意选择最好的。”

〔1〕许光达，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2兵团司令员。1950年6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同意华中局关于纠正乡村干部不良作风的决定的电报稿，加写一段话：“除在华中各省实行外，华东、西北、西南及其他有类似情形的地方均须注重纠正同类错误，尤其是乱打乱杀乱捉必须防止及禁止，决不能放任。”

同日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出席，薄一波、聂荣臻、饶漱石、李富春、邓子恢、安子文列席。会议通过准备提交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讨论通过的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华东军政委员会、中南军政委员会、西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政委员会、绥远省军政委员会等的负责人员名单，以及绥远、陕西、甘肃、青海、宁夏、贵州、广西、北京、上海、内蒙古等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的负责人员名单。

12月2日 晚七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一九五〇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概算》、《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等。毛泽东讲话，指出：国家的预算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里面反映着整个国家的政策，因为它规定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举例说，概算草案中关于养活所有旧军队和旧公教人员的问题，这就是政策问题。人民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应该采取负责的态度，只有这样才是对人民有利的。我们的情况概括地说来就是：有困难的，有办法的，有希望的。我们的财政情况是有困难的，我们必须要向人民说明我们的困难所在，不要隐瞒这种困难。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向人民说明，我们确实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既然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的事业就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的情况会一年比一年好起来，估计明年要比今年好。在三年五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事业可以完全恢复；在十年八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发展。毛泽东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必须设

立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这样一级的有力量的地方机构，才能，把事情办好。应该统一的必须统一，决不许可各自为政，但是统一和因地制宜必须互相结合。在人民的政权下，产生像过去那样的封建割据的历史条件已经消灭了，中央和地方的适当的分工将有利而无害。

同日 复信柳亚子〔1〕：“十一月四日信早已收到，因忙迟复为歉。车中信未见，厚意敬领。题字册〔2〕便时当代询，周公〔3〕确有吐握之劳，或且忘记了。文史机关事〔4〕大略亦因此，便当询之。”

12月4日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出席，薄一波、聂荣臻、李富春、饶漱石、邓子恢列席。毛泽东就土地改革和财经工作发表讲话。他说：土地改革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继军事斗争以后的第二场决战。因为这次土地改革工作是在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条件下进行的，同以前在战争期间与资产阶级隔绝的情况下进行是不同的，所以需要更加谨慎，领导机关要掌握得很紧，随时了解情况，纠正偏向，以求少犯错误。土地改革将分配地主土地和分配富农土地分为两个阶段有好处，便于保护中农。关于财经工作，毛泽东说：财政经济工作已成为中央和中央局的主要议程，应该认真研究财政经济问题，并进行适时的宣传，使人民了解情况和政策。在城乡关系中，从有城市的时候起，城市就是中心。在工

〔1〕柳亚子，诗人。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1951年7月又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2〕指柳亚子1949年送请毛泽东等题字的《羿楼纪念册之一》。

〔3〕指周恩来。

〔4〕指筹备建立中央文史研究馆一事

商关系中，应当工业是中心，因为工业是生产价值的。在公私关系中，应当国营经济是中心，因为国营经济虽然在某些地方数量较小，却是集中的和处于领导地位的。在劳资关系中，应当依靠工人阶级，而不是依靠资产阶级。

同日 审阅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二次工作会议的决定，批示聂荣臻并告李涛〔1〕：“配备人员时，注意尽可能提拔原四方面军干部，此点务须注意。”

同日 阅邓拓〔2〕关于人民日报社工作问题的报告，批示胡乔木：“此事应早日解决，不应拖得太久。邓拓意见似乎是好的。”邓拓在报告中建议：人民日报社增调懂业务的领导骨干；以德、才两项标准为主，调整编委、组长与编辑人员，实行逐级个人负责制；挑选部分得力记者到各大行政区建立联系，组织各区的通讯报道；各省市普遍设立特约通讯员。

12月5日 复电粟裕：“你十二月初赴江浙召开高干会完毕后请来北京与聂、李、刘〔3〕商量作战办法。待商好后再定攻击舟山群岛的时间。大体上可以推迟至明年一月或二月间举行攻击。”

同日 阅刘亚楼等关于各地机场修复问题的报告，批示：“我们同意此种办法〔4〕请华东军区及各军区即照此办理，请中

〔1〕李涛，当时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

〔2〕邓拓，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1952年6月又任人民日报社社长

〔3〕聂、李、刘，指聂荣臻、李涛、刘亚楼。

〔4〕刘亚楼等1949年11月28日关于修复机场的经费问题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提出，各地机场大的修复工作，除华东外，可以暂缓一步。华东范围内，则要首先修复与行将执行的战斗任务有关联的机场，修建程度限于为执行战斗任务所需要的范围，以免经费开支过大。

财委〔1〕即照此支付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经费而拒绝支付一切可以减省的经费。”

同日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军委关于一九五〇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号召全军，除继续作战和服勤务者而外，应当负担一部分生产任务，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借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人民解放军参加生产，不是临时的，应从长期建设的观点出发。重点在于以劳动增加社会和国家的财富。各军区首长必须指导所属，从一九五〇年春季起，实行参加生产建设工作，借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并节省一部分国家的开支。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实施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指示给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军区的通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本日发表关于一九五〇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你们看到后应即加以研究，就自己管辖范围内使一切可能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部队和机关积极地适当地实施起来，注意避免过去军队参加生产建设时所犯过的错误，区分前线 and 后方，区分具备了参加生产的条件的部队和机关与目前尚未具备此项条件的部队和机关，考虑地方条件和资金条件，适当地解决这一问题。这是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将使部队和机关的生活获得改善，使国家节省一部分开支，并将在全国人民中产生良好的影响。”

12月6日 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苏联访问，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到西直门火车站送行。同行人员有陈伯达、师哲、

〔1〕中财委，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的简称。

叶子龙、汪东兴〔1〕。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苏联专家的负责人柯瓦廖夫陪同赴苏。

12月11日 和朱德就云南省国民党军起义复电卢汉：“佳电〔2〕诵悉，甚为欣慰。云南宣告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展，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现我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治委员已进驻重庆，为便于具体解决云南问题，即盼迅与重庆直接联络，接受刘邓两将军指挥”。“又为向云南与全国人民正式宣布此次起义并取得各方谅解计，似以另发一通电，对过去作进一步检讨，再由我方电复并于互相同意后发表，较为妥当。”

12月16日 中午十二时（莫斯科时间——编者注），抵达莫斯科北站，受到苏联领导人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孟希科夫、葛罗米柯〔3〕等的欢迎。毛泽东发表书面演说：“我这次获有机会访问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首都，是生平很愉快的事。中苏两大国人民是有深厚友谊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苏维埃政府根据列宁斯大林的政策首先废除了帝俄时代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内，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又曾几次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国人民在患难中，得到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这种兄弟般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欢迎仪式结束后，乘车前往莫斯科郊外的原斯大林别墅（姐妹

〔1〕师哲，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叶子龙，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处长、政务院秘书厅副主任。

〔2〕指1949年12月9日卢汉关于宣布云南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给毛泽东、朱德等的电报。

〔3〕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当时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孟希科夫，当时任苏联对外贸易部部长。葛罗米柯，当时任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

河别墅)下榻。

同日 下午六时，到克里姆林宫同斯大林进行会谈。参加会谈的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1〕、布尔加宁、维辛斯基〔2〕。毛泽东说：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问题。中国需要三至五年的和平时间，以便把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和稳定国内局势。中国这些重大问题能否解决，取决于是否有和平的前途，因此，中共中央委托我向您了解，如何和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保障国际和平。斯大林说：中国目前并不存在直接的战争威胁。和平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如果我们齐心协力，不仅能够保障五至十年的和平，而且能够保障二十至二十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和平。当毛泽东谈到中苏友好同盟和互助条约问题对，斯大林说：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讨论并作出决定。需要弄清楚，是应当宣布保留一九四五年缔结的苏中友好同盟条约〔3〕，还是应当声明将对它进行修改，或者现在就对它作相应的修改。又说：这个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的，这就意味着这个条约的签订是取得了美、英同意的。即使对某一条款的修改，也会在法律上给美、英以口实，他们会提出修改有关千岛群岛、南库页岛条款的问题。毛泽东表示：我们采取的行动，必须符合公众最大的利益。这个问题需要好好考虑一下。惟中国社会舆论有一种感想，认为原条约是和国民党政府订的，国民党政府既然倒了，原条约就似乎失了存在的意义。毛泽东提出，最好能解决苏联向中国提供贷款的问题。斯大林表

〔1〕马林科夫，当时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2〕维辛斯基，当时任苏联外交部部长。

〔3〕指1945年8月14日中国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示：贷款这件事可以做到，如果你们想现在完成协定手续，我们也同意。

12月17日 召集陈伯达、叶子龙、汪东兴等开会，批评陈伯达当天外出一天未请假，并宣布以下纪律：（一）外出要请假。（二）保密。代表团内的事情一概不得对外讲。（三）不准向苏联接待部门索要任何东西。（四）注意节约用电。

12月18日 致电刘少奇，向中共中央通报会见斯大林和中苏第一次会谈情况。电报提出：“请你和恩来商量并召集政治局诸同志加以讨论，目前是否有签订一个简单通商协定（包括新疆在内）规定每年交换货物的品种及总数量之可能与必要，以便决定恩来是否来此。”二十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同意毛泽东十八日来电所提问题，并加以准备。二十一日，刘少奇和朱德、周恩来复电毛泽东：“今日政治局会议，大家赞成如果苏联同意现在签订关于旅顺、借款、航空及通商协定，恩来同志即去莫斯科一次。借款、航空两协定已有成稿，通商协定亦可将我们输出苏联货物及苏联输入中国货物的种类和大体数量提出，贸易部长亦可同恩来同志去莫一次。因恐天气不好，并准备一个月时间来回坐火车。但是如果苏联方面并不准备现在签订借款、航空、通商诸协定，只准备就旅顺驻兵问题及对一般政治问题发表一个声明，则恩来同志去莫似无必要。”

同日 复电林彪，指出：“庆贺你们歼灭白崇禧的伟大胜利〔1〕。”“同意你的部署，即陈赓略作休整即入云南，四野入桂 各军休息二十天，大部分散剿匪，另以四十三军及四十军准

〔1〕1949年11月上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主力和第二野战军一部发起广西战役。此战役解放了广西全境，歼灭逃入广西的白崇禧集团十七万三千余人，两万人逃入越南。

备攻琼崖。”“渡海作战，完全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的经验不相同，即 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四五万人）的全部兵力，携带三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力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因为潮水需十二小时后第一次载运船只方能返回运第二次，而敌可用海空军切断我之运输，故非选择时机一次载运一个军渡海登陆，并能独力攻进，建立基地，取得粮食，便有后援不继，遭受重大损失之危险。”“整个中南六省的工作重心，已由军事转到经济与土改，希望你们于明年一月间成立中南军政委员会，集中力量领导全区经济工作，并积极准备土改条件。”

12月19日 致电刘少奇、周恩来，指出：“缅甸政府要求建立外交关系问题，应复电询问该政府是否愿意和国民党断绝外交关系，同时请该政府派一负责代表来北京商谈建立中缅外交关系问题，依商谈结果再定建立外交关系。此种商谈手续是完全必要的，对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都应如此。如果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公开宣布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则我方亦应去电该国叫它派代表来华商谈建立外交关系问题，同时可将电文大意公开发表消息，如此主动权仍然操在我手。你们对此意见如何？”

同日 致电聂荣臻、刘亚楼：“请你们讨论一下，假如在一个月至两个月内举行一次或数次对长江口外敌舰的空袭，需要多少飞机，其中战斗机若干，轰炸机若干，我们自有若干，需援助若干，告我们为盼。”

12月21日 出席在莫斯科大剧院为斯大林七十寿辰举行的庆典。毛泽东在致祝词中说：“斯大林同志是世界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也是中国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他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并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作了极其杰出和极其广泛的贡献。中国人民在反抗压迫者的艰苦斗争中，深切地感觉到斯大林同志的友谊的重要性。”当晚，致电中共中央：“本（二十一）日庆祝会除苏联各共和国代表讲话外有十三个国家的代表

讲话，在这十三个国家中由我代表中国第一个致词，受到盛大欢迎，三次全场起立长时间鼓掌。”

12月22日 晨，就准备对苏贸易条约等问题致电中共中央：“据稼祥说，波兰、捷克、德国都想和我们做生意。似此，除苏联外又有这三个国家即将发生通商贸易关系。此外，英国、日本、美国、印度等国或已有生意或即将做生意。因此，你们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其范围和数量要有一个大概的计算。”

同日 找柯瓦廖夫来住处谈话，并要他把这次谈话的记录交斯大林。其中提到：希望在十二月二十三日或二十二日举行预定的会见，打算下一步谈判解决以下问题：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协定、航空协定，拟请周恩来前来莫斯科完成签字手续。

同日 晚上，出席苏联在克里姆林宫为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举行的盛大招待会。席间，代表中国向斯大林敬酒。什维尔尼克（1）建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人民领袖毛主席干杯。宴会从晚上八时持续到次日晨一时。

12月24日 晚十一时半，在斯大林的别墅同斯大林会谈。参加会谈的，中方有陈伯达、王稼祥，苏方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2）。会谈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国际共产主

（1）什维尔尼克，当时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2）贝利亚，当时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当时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义运动的一些问题。斯大林只字未提中苏条约。

同日 复电刘少奇：“截击李弥、余程万〔1〕不令入越极为重要。如三十八军能立即入滇则甚好。”“可要越共派一个政治上负责的代表团来中国，此代表团亦可公开用中越亲善会名义来，到时可予以公开欢迎。”“关于援助武器、弹药、医药、物资问题同意先给一部，然后逐步增加，使越共善于掌握这些物品。”

12月25日 致电中共中央，通报第二次中苏会谈情况。电报说：“昨（二十四）日晚上十一时半，第二次会见斯大林同志于他的别墅〔我们住的是他的另一个别墅〕，长谈五小时半，到今晨五时才毕”。“谈了很多问题，谈到恩来是否应出国的问题、安南〔2〕问题、日本问题、印度问题、印尼问题、东方情报局问题、西欧问题、华莱士问题、东方各国革命策略问题等等。”大意是：“政府主席既已来此，内阁总理又来，则在对外观感上可能有不利影响，研究结果还是认为恩来以不来为宜。”“和胡志明政府建立外交关系是对的，用武器、弹药、医药、物资及干部帮助胡志明是必要的。在中国承认胡志明〔3〕之后，苏联亦可承认。”“欧洲情况与中国完全不同，中国不要外国援助（指直接援助）而用自己力量取得胜利并巩固了胜利，欧洲则不是这样，需要自己力量和外部力量相配合才能胜利，例如东欧各国就是如此。”电报中还说：“斯大林同志每天都打电话给招待我们的人，询问我的生活是否安适，表示特别的关心。”

〔1〕李弥，当时任国民党军第6编练司令部司令兼第8军军长、“云南省人民反共救国军”总指挥。余程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26军军长兼滇东南“剿匪”指挥官。

〔2〕安南，越南的旧称。

〔3〕这里指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

12月29日 复电刘少奇，指出：“请告林、邓、谭〔1〕，四野前委应改名为中国共产党中南军区委员会（简称军区党委会、林、邓、谭所提委员二十人及正副书记均同意，惟须增加若干人，例如叶剑英、张云逸、李先念〔2〕、方方、陈正人〔3〕、黄克诚等，因为他们是各省军区的司令员、政委，应当参加。此外，如林平、曾生等是否应增加，请林、邓、谭酌定，报告中央批准。”

同日 致电刘少奇：“请告刘、邓〔4〕转知卢汉及云南我军，只可在李弥、余程万之先头阻止其向越、缅前进，不可向其后尾威胁或追击，以免该敌过早退入越南。卢汉及我军均应向该敌进行政治工作，策动该敌起义。”

同日 致电饶漱石：“请将下列各方面情况电告：（一）你们对上海外商征税比较对华商征税税率高低程度如何？（二）全国概算中分配华东之收入数额有完成把握否？（三）全华东区内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共有多少县开过了，尚有多少县未开过？市的代表会议（三万人口以上的）是否均已开过？一九五〇年一二三月内，全华东区所有县市均应开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可以做到否？（四）此次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的经验及结果如何？”

12月30日 致电陈云：“上海市委亥江〔5〕致中央电称，

〔1〕林、邓、谭，指林彪、邓子恢、谭政。

〔2〕李先念，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北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陈正人，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1950年9月又任江西省政协主席。1952年11月任建筑工程部部长。

〔4〕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

〔5〕亥江，即12月3日。

上海有许多大型中型工厂负债甚多，难于维持，要求政府贷款，否则有大批倒闭危险等语。上海工商业家是否确有这样大的困难，政府是否已允许贷款及贷给多少，资本家叫得那样凶是否符合实际情况，是否有借此抵制公债的意图，你的看法如何，盼告。”

12月31日 复电林彪：“转来邓、赖、洪〔1〕二十七日电已悉。同意该电所取方针，即努力争取在旧历年前进攻海南岛，但以充分准备确有把握而后动作为原则，避免仓卒莽撞造成过失。为此，邓、赖、洪应速到雷州半岛前线亲自指挥一切准备工作，并且不要希望空军帮助。”

同日 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接见中国留学生，并给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学生任湘题词：“开发矿业”。

〔1〕邓，指邓华。赖，指赖传珠。洪，指洪学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1950年7月改称第13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0年10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1951年6月兼后勤司令部司令员）。

1950年五十七岁

1月1日 复电彭德怀，指出：向苏联提出的四项要求中没有粮食，迪化、吐鲁番、奇台区域十余万人的粮食如何解决？是否可从甘肃运去？如不可能，是否须向苏联交涉，请其由阿拉木图方面接济一年或两年，而由满洲〔1〕方面以粮食归还苏联。是否你认为只要有运输工具（汽车），则可以由甘肃运送粮食入疆，而不要苏联接济粮食？望电复。你提出新疆二十四万人的百分之七十的费用要由中央帮助，我认为必要的，至少头几年须要这样做。请中央加以确定。你给我的电报，当于日内抄送斯大林同志。

同日 致电胡乔木：“广西全境，广东之南路及雷州半岛，西南全境（除李弥、余程万二部及西昌胡宗南〔2〕一部外、西北全境，残敌均已肃清。请用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致各野战军的贺电，电稿写好后告我看一下再发。”

同日 《人民海军报》发表毛泽东为该报创刊的题词：“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

同日 罗申拜会毛泽东。毛泽东说：最近几天，从北京获

〔1〕满洲，中国东北地区的旧称。

〔2〕胡宗南，1949年11月被任命为国民党军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参谋长。

悉，缅甸和印度政府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政府对此问题的立场是，告缅甸和印度政府，如果它们真诚希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它们就应该首先同蒋介石断绝一切相互关系，断然放弃对这个政权的一切支持和援助并对此发表声明。在这些国家政府接受中国政府上述建议的条件下，缅甸和印度政府可以派遣自己的代表到北京谈判。还有消息说，英国和英联邦的其他国家最近也将采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步骤。在谈到中国军事形势时，毛泽东说：迄今为止，国民党军在大陆的全部主力已经被粉碎。在四川和西康省内有四十万左右国民党部队被俘并转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四万胡宗南集团残部撤往西藏和南方的一切退路都已被切断，他们在近期内就会被消灭。云南省境内还有不足三万国民党军残部分批逃往昆明西南方向，但他们的下场已经注定。在谈到自己的健康状况时，毛泽东说：经过两周的休息之后已有好转。最近四天睡眠正常，一天八小时，并且不用服安眠药。感到自己精神饱满多了，但外出散步时，在户外还不能超过一刻钟，感到头晕。因此打算再静养一周，并彻底恢复正常的睡眠。毛泽东表示：休息一周后，想拜会什维尔尼克、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贝利亚、马林科夫、华西列夫斯基〔1〕和维辛斯基等。这些拜会将采取平常谈话的方式，不会谈任何专门的题目或讨论实质性问题。在此期间，希望会见斯大林，进行实质性会谈。实质性会谈结束后，打算向列宁墓献花圈，参观地铁，去几个农庄看看，去剧院看戏。罗申表示，对毛泽东的所有愿望明日即报告政府。谈话结束后，共进午餐。

同日 柯瓦廖夫遵照斯大林的指示，会见毛泽东并进行交

〔1〕华西列夫斯基，苏联元帅。当时任苏联武装部队部部长。

谈。关于毛泽东对塔斯社记者谈话〔1〕事，毛泽东说：这种形式和谈话内容非常好，我无任何意见和补充。关于我在这个谈话中表示打算参观苏联的几个地区和城市问题，我想参观列宁格勒是一定的，至于按我过去说的去苏联其他城市或地区的事，未必有可能了，因为我准备在莫斯科逗留到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在这期间，我想同斯大林同志再会见几次，以便讨论对记者谈话中提到的问题和其他问题。会见结束后，师哲私下转告柯瓦廖夫：如果联共（布）中央某位政治局委员能到别墅来看望毛泽东的话，他会非常高兴。

1月2日 苏联《真理报》发表毛泽东对塔斯社记者的谈话。记者问：中国目前的情势如何？答：“中国的军事正在顺利进行中。目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在转人和平的经济建设。”问：毛泽东先生，您在苏联将逗留多久？答：“我打算住几个星期。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问：您所在考虑的是哪些问题，可否见告？答：“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此外，我还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以便更加了解苏维埃国家的经济与文化建设。”

同日 晨三时，致电刘少奇：“本（二）日发表我和塔斯社记者谈话，请嘱乔木、陈克寒〔2〕注意，照塔斯社稿译发为要。”

同日 晨四时，致电中共中央、彭德怀并请转发邓小平、刘

〔1〕 这个谈话，是为了打破西方通讯社散布的所谓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的谣言，由苏方代毛泽东起草的。

〔2〕 陈克寒，当时任新华社社长。

伯承、贺龙：“（一）德怀同志十二月三十日关于西藏情况及入藏路线的电报业已收到阅悉。此电请中央转发刘、邓、贺三同志研究。（二）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

“我意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四月〔1〕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十月以前占领全藏。为此，建议：（甲）请刘、邓、贺三同志于最近期内（例如一月中旬）会商一次，决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并立即开始布置一切；（乙）迅即占领打箭炉〔2〕，以此为基地筹划入藏事宜；（丙）由现在（一月上旬）至四月中旬以前共三个半月〔3〕内，被指定入藏的军队，应争取由打箭炉分两路，推进至西康、西藏的接境地区，修好汽车路或大车路，准备于四月中旬开始入藏；（丁）收集藏民，训练干部；（戊）闻西藏只有六千军队，而且是分散的，似乎不需要我在上次电报中提议的三个军，而只需要一个充足的军或四个师共约四万人左右的兵力，即已够用，惟需加以特殊政治训练，配备精良武器；（己）入藏军队可定为三年一换，以励士气。（四）进军及经营西藏是我党光荣而艰苦的任务。西南刚才占领，西南局诸同志工作极忙，现又给以入藏任务，但因任务重要，且有时间性，故作如上建议。这些建议是否可行，请西南局筹划电复为盼。”

同日 晚十一时，致电中共中央：“（一）最近两日这里的工

〔1〕 这里的“四月”及下文中的两处“四月”，据1950年1月10日毛泽东关于进军和经营西藏问题的电报，均应为“五月”。

〔2〕 打箭炉，今四川康定。

〔3〕 这里的“三个半月”，据1950年1月10日毛泽东关于进军和经营西藏问题的电报，应为“四个半月”（1月上旬至5月中旬）

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昨一月一日决定发表我和塔斯社记者谈话，已见今日（二日）各报，你们谅已收到。今日下午八时，莫洛托夫、米高扬二同志到我处谈话，问我对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我即详述三种办法：（甲）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做有极大利益。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 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乙）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仅说到两国当局对于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在重要问题上的一致意见，而不涉及详细内容，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几年再说。这样做，中国外长周恩来当然不要来。（丙）签订一个声明，内容说到两国关系的要点，但不是条约。这样做，周恩来也可以不来。当我详细分析上述三项办法的利害之后，莫洛托夫同志即说，（甲）项办法好，周可以来。我仍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同志说，是的。随即计算周来及签订条约的时间。”“你们收到此电后，请于五天内准备完毕。希望周恩来偕同贸易部长及其他必要助手和必要文件材料，于一月九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不是坐飞机）来莫斯科，由董必武同志代理政务院总理。对外不要发表，待周到莫后才发表。”“以上是否可行，五天准备时间是否足够，是否还需多一两天准备时间，有无叫李富春或其他同志同来协助之必要，均请考虑电复。”

1月3日 晨四时，致电中共中央：“昨日下午十一时电谅达。周恩来同志出国来苏须在政务院会议正式通过，并报告此行系为谈判及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旧条约比较在旅大问题上可

能有部分的变更，但具体内容尚待谈判。为防御日本及其同盟者的可能的侵略这一目标及承认外蒙独立则仍为新约的基本精神、贷款协定（我们提出的要求是三万万美元，分几年支付，我们所以不提较多的要求是因为在目前数年内多借不如少借为有利），民航协定（有利于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及贸易协定（和苏联确定易货范围对于我们确定发展生产的方向是有利的，同时亦有利于和其他外国订立通商协定此外还应约集政府委员之在京者开一座谈会作同样报告。在两次会议上，应指出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同日 下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周恩来于一月九日动身去苏联准备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1月4日 晨四时，复电江青（由刘少奇阅转）“一月一日来电已悉。同意你去新区看一看，但须得少奇同志同意。如果他同意的话，则应以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员的名义由中央组织部写介绍信给新区党的组织。因此还须和廖鲁言〔1〕同志谈好，并得到他的同意。到新区后注意只收集材料，不发表意见，并须顾到不要给当地党政以较多的麻烦。以上统向少奇同志接洽，由他作决定。”**同日**晨四时，复电胡乔木：“一月二日电悉。中央新年贺电已阅，甚好。专就西南解放写一评论是必要的，写好送少奇同志看过后即可发表。”

同日 上午十时半，致电中共中央：“为便利于商谈大连、

〔1〕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政务院参事室副主任（1950年9月任主任（1952年8月、11月又先后任政务院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旅顺问题，请周带欧阳钦〔1〕来莫，并要他带材料，特别有关大连、旅顺两地中苏关系中权益的材料。”

同日 致电陈云：“感谢你一月一日的复电。此外，陈、薄十二月十六日、十二月二十六日给我及中央两电，中财委十二月二十七日给各地财委指示电，均已收到阅悉，我对这些电报感到很大的兴趣。”陈云、薄一波十二月十六日的电报说：政务院已通过第一期公债一万万分的发行条例，明年一月五日开始发行。针对工商界的顾虑，打算在发行公债时适度增发新钞，使银根不过紧，以达到既推销公债，回笼货币，又避免物价下跌、工商业受困的目的。十二月二十六日的电报说：中财委正集中公粮使用及收购华中民粮，力求掌握若干机动粮食，以应付粮荒与粮价上涨；苏湘赣三省公粮征收面窄，地富负担过重，有层层附加现象，有的产量估得过高，已嘱各地注意改正；税务、盐务会议估计可增加税收三十五亿斤小米，来源是减少偷漏税和提高部分税率。

1月5日 晨六时，复电中共中央，指出：“谈判要点及准备工作，你们所指出的各点都是必须注意和必需准备的。既然是谈判，就须要展开谈一谈，将我们的观点说清楚。恩来动身后，请中央继续研究，随时以意见电告。关于贸易方面的材料，如果有五天内来不及准备好的，亦可于恩来走后继续准备，随时电告。”

同日晚九时，致电中共中央：“请注意两件事：（一）改订中苏条约等项问题在政务院会议及政府委员会讨论时，请嘱到会人保守机密。（二）周率十余人动身以前，或在旅途车上，应召集这些人宣布纪律，不许乱说乱动，一切要听指挥。”

1月7日 晨六时，致电周恩来并中共中央：“今（七）日上午一时维辛斯基来谈三件事：（一）可以满足我们购买飞机汽

〔1〕欧阳钦，当时任中共旅大市委书记。

油的要求。(二)可以满足我们勘修小丰满水电堤坝的要求。(1)以上二事的复信明(八)日可交给我。(三)建议我外交部给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去一个声明,否认前国民党政府代表蒋廷黻继续为安理会中国代表的合法地位。维辛斯基说,如果中国发了这个声明,苏联准备采取一项行动,即如果蒋廷黻还留在安理会为中国代表(据称还要当安理会今年的主席),则苏联将拒绝出席安理会。维辛斯基以此征求我的意见。我当即表示,中国外交部可以发表这样的声明。我并说,我的电报一月七日到北京,中国外交部周恩来外长署名的声明可能在一月八日或一月九日发出去。我问他,此项声明除发给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及联合国秘书长外,是否还需要同时发给苏、英、美、法等安理会会员国?他说,可以发,苏联根据中国的电报就可以行动。此事他声明是以外长资格征求我的意见,我已正式表示同意。请你们于接电后迅为办理,争取于九日恩来动身前发出此项声明的电文,除发联合国秘书长及安理会外,并以电报通知苏、英、美、法等国外交部,附以致联合国电文。此事办理情形望告,并告以一月九日是否来得及发出。”晚十二时,又致电刘少奇、周恩来:“兹拟就周致联合国大会主席、联合国秘书长及安理会十会员国政府(不给南斯拉夫)的声明电,请照此发去为盼。”一月八日发出的周恩来外长致联合国声明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代表留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是非法的,并主张将其从安全理事会开除出去,特此电达,希予采纳照办为荷。”

同日 晨六时,复电周恩来并中共中央:“对英、印等国外

(1) 1950年1月4日,毛泽东致刘少奇电报中,曾提到关于小丰满水电站危急情形,说昨(1月3日)已综合东北及你处材料用我的名义写了一信给斯大林同志,请其派人帮助勘修。

交处置两电及一月五日八时出入口贸易电均悉。关于出入口贸易问题，务请注意统筹苏、波、捷、德、匈及英、法、荷、比、印、缅、越、罗〔1〕、澳、加、日、美各国在一九五〇年全年出入口的种类及数量，否则将陷入被动。恩来离京后，请少奇、陈云、一波注意此事为盼。”

同日 晨七时，将斯大林一月六日来信用电报转发刘少奇。斯大林的信中说：“收到你转来的关于建议苏方出售各种商品的国内来电，也收到了有关新疆的来电，以及你关于小丰满水电站的来信。所有这些问题正在以莫洛托夫同志为首的委员会进行研究，我不怀疑这些问题将会获得完满解决。”

1月9日 复电林彪并中共中央东北局：“一月四日两电均悉。（一）完全同意由四野调十余万人至东北及热河〔2〕从事生产，解决华中南地区土地不足的困难。上月路过沈阳时，我曾向高岗同志提出从四野调两个军至东北从事生产，高岗同志表示同意。此事如东北局别无不同意之处，即可开始着手调动，以便赶上春耕。具体办法由四野与东北局直接商定，并告诉我们。”

1月10日 复电陈云、薄一波：“（一）一月七日电〔3〕悉。此项报告甚好，盼能继续。（二）各项计划均好，用军队修筑天兰、天成、成渝、叙〔4〕昆、滇黔、黔桂、湘桂诸线甚为必要，望即着手布置进行。（三）去年十月一日以后在中财委领导下开了多次专业会议，除铁路、钢铁、农业三项已见一月七日

〔1〕指暹罗，泰国的旧称。

〔2〕热河，省名，1956年1月撤销，所辖地区分别划归河北、辽宁和内蒙古自治区。

〔3〕指陈云、薄一波1950年1月7日关于财政经济的几项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

〔4〕叙，指叙府，今宜宾。

来电外，其他各项会议结果的要点我手边没有材料，请于数日内分项写一报告给我，未知你们能腾得时间否。如你们无时间，可否要你们的秘书写，经你们看过发来。不要太繁，每项几百字即够。”

同日 就进军和经营西藏问题，致电中共中央并请转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及西北局：“（一）完全同意刘、邓一月七日（1）电之进军西藏计划。现在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认我们，对于进军西藏是有利的。（二）按照彭德怀同志所称四个月进军时间是从五月中旬算起，则由一月中旬至五月中旬尚有四个整月的准备时间（我前电写成三个半月是写错了众只要刘、邓、贺加紧督促张国华〔2〕及十八军等部，在时间上是来得及的。（三）经营西藏应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叫什么名称及委员人选，请西南局拟定电告中央批准。这个领导机关应迅即确定，责成他们负责筹划一切，并定出实行计划，交西南局及中央批准。西南局对其工作则每半月或每月检查一次。第一步是限于三个半月内完成调查情况，训练干部，整训部队，修筑道路及进军至康藏交界地区。有些调查工作及干部集训工作，需待占康藏边界后才能完成，并为促成康人内部分化起见，务希于五月中旬以前占领康藏交界一带。（四）关于西北局方面应协助之事项，请西南局与西北局直接遇事商定，并请西北局筹划各项应当和可能协助之事项，指导所属妥为办理。（五）关于中央负责之一部分侦察工作，请聂〔3〕令二局〔4〕注意办理为要。”

〔1〕应为1月8日。

〔2〕张国华，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第18军军长。1950年1月下旬又任中共西藏工委书记。1952年2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司令员。

〔3〕聂，指聂荣臻。

〔4〕指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情报部二局。

同日 就解放海南岛作战问题，复电林彪：“（一）一月六日电及转来邓、赖、洪〔1〕一月五日电均悉。（二）既然在旧历年前准备工作来不及，则不要勉强，请令邓、赖、洪朝不依靠北风而依靠改装机器的船这个方向去准备，由华南分局与广东军区用大力于几个月内装置几百个大海船的机器（此事是否可能，请询问华南分局电告、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三）海南岛与金门岛情况不同的地方，一是有冯白驹〔2〕配合，二是敌军战斗力较差。只要能一次运两万人登陆，又有军级指挥机构随同登陆（金门岛是三个不同建制的团又无一个统一的指挥官，由三个团长各自为战），就能建立立足点，以待后续部队的继进。（四）请要十五兵团与冯白驹建立直接电台联系，并令冯白驹受邓、赖、洪指挥，把琼山、澄迈、临高、文昌诸县敌军配备及敌海军情况弄得充分清楚，并经常注视其变化。（五）同时由雷州半岛及海南岛两方面派人（经过训练）向上述诸县敌军进行秘密的策反工作，勾引几部敌军于作战时起义，如能得到这个条件，则渡海问题就容易得多了。在目前条件下，策动几部敌军起义应该是很可能的。此事应请剑英、方方、冯白驹诸同志特别注意用力。华南分局应加以讨论，定出具体的策反办法，并于三四个月内获得成绩。”

同日 复信谭世瑛〔3〕：“惠书及大作诵悉，甚为感谢！尊况如何，甚念。如有意见，尚望随时示知。”

1月11日 致电粟裕：“请回答下列问题：（一）你们对舟山群岛之敌有无办法进行策反工作，你们是否进行了此项工作，

〔1〕邓、赖、洪，指邓华、赖传珠、洪学智。

〔2〕冯白驹，当时任中共琼崖区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司令员。

〔3〕谭世瑛，毛泽东在湖南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的同学。

结果如何？（二）你们对舟山群岛进攻的准备工作做到了什么程度，船只的准备是否增加了？（三）叶飞对金门岛进攻的准备工作如何，何时可以攻金门岛？（四）你何时可到北京与聂荣臻、刘亚楼同志会商？”

同日 在王稼祥、陈伯达陪同下晋谒莫斯科红场的列宁墓，并献花圈。花圈的缎带上用中俄两国文字写着：“献给列宁——革命的伟大导师。”

同日 拜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王稼祥、陈伯达陪同。

1月13日 复电饶漱石：“（一）一月九日报告收到，阅悉甚慰。（二）土改准备工作中改造区乡政权极为重要，并须如期完成，否则不可能进行土改。（三）为要在今年冬季进行土改，必须在今年春夏秋三季完成土改的各项准备工作，时间颇紧，必须十分抓紧督促才能有成。（四）华东军政委员会似宜早日成立执行职务。”

同日 致电林彪，指出：“中南全区要在今年冬季进行土改，则今年春夏秋三季必须完成土改的各项准备工作，时间颇紧，必须妥为计划督促，才能有成。饶漱石一月九日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在今年一二三月农闲时间华东各省普遍开一二次区乡农民代表会议完成区乡政权的改造，作为土改先决条件之一，这是极重要的，否则即不能进行土改。你们是否已令各省进行此项工作。”

同日 分别致电叶剑英、高岗、习仲勋，请他们将在广东、东北、陕甘青宁所进行的各项重要工作，其中所包含的问题及解决方法，择要电告。

同日 致电刘少奇：“（一）我今（十三）晚去列宁格勒，两天可返莫斯科。（二）刘亚楼及苏联顾问柯托夫等四人已交涉

好可以来此，请通知聂荣臻。（三）可即任命萧劲光〔1〕为海军司令，此点亦请告聂荣臻。”

同日 晚十时，复电刘少奇：一）同意一月十三日电贯彻征用命令征用外国兵营，并准备着让美国将所有在华之旧领馆全部撤走。（二）同意由上海军管会直接接收或征用美经合署留沪物资〔2〕。（三）接管伪政府留港资产问题，请你于外交部及中财委提出办法后酌定，我对此事无意见。（四）维辛斯基今晚来谈，建议我国向联合国去电派遣自己的代表出席联合国以代替国民党代表，因现在为国民党代表问题安理会斗争颇紧张，苏联支持我国声明主张开除国民党代表，美、英等多数国家反对开除，故中国有进一步表示之必要，惟时间可待一星期后再去电报。我同意他的建议，代表团首席人选请中央考虑电告，待恩来到此商决。（五）我今天不走，改于明（十四）晚十时动身去列宁格勒，十五日在列城留一天，十六日回来。同行者稼祥、伯达、师哲、汪东兴，留叶子龙及技术人员在寓工作。中央电报可照常发来。”

1月14日 复电粟裕：一月十二日电悉。华东军区部队生产及整训情形盼告。

同日 晚九时，和王稼祥、陈伯达、师哲、汪东兴乘火车去列宁格勒访问。

1月15日 抵达列宁格勒。直接由火车站到波罗的海参观。毛泽东走下汽车，在冰层上来回踱步，举目眺望。苏联的陪同人员说，这里冰层有一至一点五米厚。毛泽东说：我的愿望是要从

〔1〕萧劲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12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0年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

〔2〕指美国经济合作总署中国分署存放在上海准备用于援助蒋介石打内战的物资。

海参崴—太平洋的西岸，走到波罗的海—大西洋的东岸，再从黑海边走到北极圈。那时才可以说，我把苏联的东西南北都走遍了。随后毛泽东参观了基洛夫机器制造厂，冬宫艺术馆即沙皇的办公室、寝室、藏书室，卫国战争中列宁格勒战线的防御工事和十月革命时炮击冬宫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晚上，毛泽东到基洛夫歌舞剧院观看芭蕾舞《巴亚捷尔卡》。当晚，下榻于斯莫尔尼宫。

1月16日 乘火车离开列宁格勒，十七日返抵莫斯科。

1月17日 晨五时，致电刘少奇：我们一行已于今日上午三时半由列宁城返抵莫斯科。

同日 晚十时，致电刘少奇：“（一）对越南政府要求建立外交关系，应立即答复同意。起草了一个复文，请于明（十八）日广播发表，同时由内部电台发胡志明。（二）请将越南政府要求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声明，由我外交部转送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毛泽东为外交部部长周恩来起草的给越南政府的复文如下：“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外交部部长黄明鉴先生：我很荣幸地接到贵部长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五日要求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电报。我现在通知贵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是代表越南人民意志的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愿意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借以巩固两国邦交，加强两国的友好和合作。特此电复并希察照为幸。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一九五〇年一月十八日”十八日下午三时半，又致电刘少奇：“今早发给你的给越南的复文，须增加几句，如尚未发表，请即增加进去，然后发表。如已经发表，即作罢。”〔1〕

〔1〕1950年1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毛泽东起草的给越南政府的复文，是按他1月17日给刘少奇的电报中发回的复文稿刊印的。

“增加的文字如下：复文第一句‘我很荣幸地接到’下增‘贵国政府主席胡志明先生一九五〇年一月十四日的声明及’等二十五字，下接‘贵部长’。复文最后一句‘即希察照为幸’，‘为幸’二字删去，加入‘并祝贵国国运昌隆，人民安乐，胡志明主席及贵部长身体健康’等二十五字，下接‘中华人民共和国’。”

同日 致电中共中央转彭德怀、习仲勋：“（一）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拟讨论的各项均妥。其中陕、甘、宁三省今冬只在部分地区进行土改，取得经验，推迟至明冬普遍进行土改，是比较妥当的。（二）包尔汉主席于会后来莫斯科是可以的，惟时间上是否来得及，须待二十五六日才能决定，那时当有电报通知。”

1月18日 复电刘少奇：“一月十七日电悉。（一）美国撤退在华的一切官方人员，此事对我们极有利，惟民主人士中害恐美病者可能对我们征用外国兵营等行动有所不满，请注意解释；（二）英国代办胡阶森〔1〕到京时我们提出些什么问题和他谈，请中央约外交部人员讨论一下，规定方针、态度及具体内容，写成书面文件，并事先告我为盼。”

同日 下午五时半，致电刘少奇：“（一）今日下午四时半与恩来通电话（他已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二十日下午五时可达莫斯科），觉得章汉夫〔2〕资望方面有不够之处，可作副手。出席联合国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以洛甫〔3〕担任为适宜，现起草了一个致联合国电报，如中央同意即请于明十九日发出并公开发表。（二）据恩来说，高岗、富春都认为洛甫可充外交代表，惟未事

〔1〕胡阶森，当时是英国政府指定的负责同中国谈判中英建立外交关系问题的临时代办。

〔2〕章汉夫，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

〔3〕洛甫，即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辽东省委书记。1951年4月任中国驻苏联大使。

先征得洛甫本人同意。请你于发表之同时去一电给洛甫，说明因时间关系不及征求他同意，请他谅解，至动身去联合国的时间另电通知。（三）政府委员会完成任命手续可待将来第六次会议为之。如你认为有必要，可于明十九日邀集政府各副主席及各党派主要负责人一谈。（四）因恩来即到莫斯科，故照会用李克农名义。（五）此照会和上次照会一样，于发出电报后，并分送在京苏、捷、波、英、法、荷等国外交人员。（六）新华社发布新闻时，须介绍张闻天是中共中央委员，曾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及各项革命工作。（七）办理情形望告。”

同日 起草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致联合国照会〔1〕，全文如下：“一九五〇年一月八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周恩来部长曾向联合国发出照会，要求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将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非法代表予以开除。此项照会，已承赖伊〔2〕先生复电表示收到，并转达安全理事会各会员国。现在我再通知你们，主席先生和秘书长先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业已任命张闻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会议和参加联合国工作包括安全理事会的会议及其工作的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我并请求你们，主席先生和秘书长先生，回答我的下列两项问题，即（一）何时开除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非法代表出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我认为这样的反动残余集团的非法代表到现在还留在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是完全不合理的，应当立即开除出去；（二）以张闻天为首席代表的合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团何时可以出席联合国及安理会的会议并参加工作，我认为应当迅速

〔1〕致联合国照会正式发出时，署名改为外交部部长周恩来，文字、标点等也有一些改动。全文载1950年1月20日《人民日报》。

〔2〕赖伊，当时任联合国秘书长。

出席会议并参加工作。以上各项，请予速复为盼。”

1月19日 晨五时，致电刘少奇并告胡乔木，其中说：“用乔木名义写了一个谈话稿，请加斟酌发表。”毛泽东起草的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向新华社记者的谈话，驳斥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一月十二日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的长篇讲演中所制造的“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即整个中国居民的广大地区和中国脱离与苏联合并”等谣言。指出：“美国帝国主义者们在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扫荡之下，除了造作这样的谣言之外，已经没有别的更好办法了。所谓中国共产党是苏联的走狗，苏联已经或正在或将要吞并中国这类低能的造谣诬蔑，只能激起中苏两国人民的愤慨，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此外不会有别的结果。”

1月20日 晨一时，复电刘少奇：“（一）十九日各电均悉。同意你的意见，先给尼赫鲁（1）去电，大意谓同意雁谒森（2）先生为临时代表，到北京谈判建立外交使团的初步与程序事宜。对英国答复则应当拖一下。外交部的同志们不了解拖一下的作用，认为‘陷于僵局’，这是不对的，这里并没有什么僵局，主动权完全握在我们手中。拖一下的时间请你和李克农商定之。（二）同意为西藏问题所拟发之声明。（三）空运团事待与周商后答复。”

同日 晨七时，致电刘少奇：“今早一时电谅达。复尼赫鲁电全文的措词须加斟酌，因为此项复文即是对英国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复文的样本。请令外交部写一草稿电告我们看一下，此项复文迟数天发出并不要紧。为了研究这个复文，请令外交部将印

（1）尼赫鲁，当时任印度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2）雁谒森，曾在国民党政府时期任印度驻中国大使馆秘书。

度第一次来文、我第一次复文及印度第二次来文的三个全文清出发来。又我和英国来往电全文亦请发来。”

同日 周恩来、李富春等一行到达莫斯科。周恩来在车站发表讲话说：“我这次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来到莫斯科，参加关于巩固中苏两大国邦交的会商。”下午五时，毛泽东在住地与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等商议同苏方会谈问题。

同日 晚十二时，致电刘少奇：“如果英国援印度例，也提出同样要求，我们亦可让胡阶森来谈设立外交使团的初步与程序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仍可与之谈判英国在联合国对待国民党代表的态度问题，在伦敦、香港、台湾等地对待国民党各种机关的态度问题等，这些仍属于设立双方外交使团的先决问题，即属于和国民党断绝关系范围内的问题。如其答复与行动是矛盾的，我们仍可拖它一个时期。接收英国兵营问题则属于建立外交关系以后向其大使提出的问题。现在不要提出。”

1月21日 和周恩来等十二人参加苏联举行的列宁逝世二十六周年纪念会，会后由斯大林陪同在莫斯科大戏院观看关于列宁生平的电影，并出席斯大林举行的酒会。晚上，对周恩来说，要向代表团的所有成员宣布纪律：（一）所拟文件不能遗失，不能泄露出去；（二）个人不能私自出去会客，有事要请假；（三）日常生活中有困难找李富春同志解决，不能向苏方接待部门索要东西。周恩来随即召集代表团所有成员开会，宣布以上纪律。

同日 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驳斥艾奇逊造谣的谈话在《人民日报》发表。随后苏方对中国不以外交部部长名义发表声明感到不快，认为中国采取的方式减弱了力量。毛泽东认为，对苏方的不快没有必要去作什么解释，中国发表这份对美国帝国主义者

辟谣文件，根本不需要用外交部部长的名义，以新闻总署署长谈话的形式就可以了，这是恰当的。

1月22日 晚上，同斯大林进行第三次会谈，商谈中苏签订新约和两项协定问题。参加会谈的，中方有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陈伯达、师哲（翻译）苏方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费德林（翻译）。斯大林提出：现有协定，包括条约在内，都应修改，尽管我们曾经认为还是保留好。这些条约和协定之所以必须修改，是因为条约的基础是反对日本的战争。既然战争已经结束，日本已被打败，形势发生了变化，现在这个条约也就过时了。毛泽东说：我们应当通过条约和协定来巩固我们两国现有的友好关系。友好同盟条约应当把保证我们两国繁荣昌盛的东西固定下来，而且还应当规定必须防止日本侵略的重演。这两点是我们的新条约同现有条约的根本区别。新的条约应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方面的合作，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合作。毛泽东还提出，在新的条约中应当规定就国际问题两国进行磋商的内容。斯大林说：签订友好合作条约时加进这一条是不言而喻的。接着讨论中长铁路问题。斯大林问，你们对中长铁路问题有哪些建议？毛泽东说：也许需要像旅顺口协定那样，把在法律上保持中长铁路协定效力的原则作为基础，而实际上允许修改。斯大林说：就是说，你们同意宣布在法律上保留现有协定，但要作出相应的实际修改。毛泽东说：我们应从中苏双方的利益出发。在新的协定中要指出，共同的经营和管理要继续下去，但中方应在其中起主要作用，还要研究缩短协定的有效期限，确定双方的投资比例。斯大林说：如果讲共同管理，那就要轮流担任领导职务，这样才更合逻辑。至于协定有效期限，我们不反对缩短。周恩来提出，改变双方的投资比例，代替现有的对等条件，改为中方投资占百分之五十一，苏方占百分之四十九。苏方坚持各占百分之五十不变。在相持不下的情况下，中方提出，这个问

题以后进一步研究。在讨论旅顺口和大连问题时，毛泽东表示，我们应从中苏双方的利益出发。斯大林说：我们认为旅顺口协定是不平等的，既然我们主张修改协定，那就要改得彻底。的确，这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不便，我们不得不同美国人作斗争。毛泽东说：在这个问题上，只有一点令我们不安，这就是这有可能给苏联造成不良后果。斯大林提出：在这种情况下，您是否认为下面这个方案是可以接受的：宣布在**同日本**签订和约以前旅顺口协定仍有效，签订和约后，苏联军队将撤出旅顺口。或者可以提出另一方案：宣布保留现有协定，而实际上要从旅顺口撤军。毛泽东说：我同意斯大林同志的意见，并认为在**同日本**签订和约以前旅顺口协定仍应有效，签订和约后将失去效力，苏军将撤走。〔1〕对大连问题，斯大林指出：我们不打算保障苏联在大连的任何权益。是否把大连变成一个自由港，由中国自己决定。毛泽东表示：我们认为，旅顺口可以作为我们进行军事合作的基地，而大连可以作为苏中经济合作的基地。关于贷款协议问题，毛泽东表示：贷款协定的条件总的来说对中国是很有利的，年利率仅为百分之一。斯大林说：我们向人民民主国家贷款利率为百分之二，给中国以低的贷款利率，是因为中国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这次会谈持续两个小时，中苏双方在主要问题和原则问题上达成一致。

1月23日 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开始同苏方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就新条约和各项协定的内容进行具体会谈。在协商新条约条款时，周恩来谈了中方的意见。苏方按照中方的基本

〔1〕在以后的具体会谈中，根据中方的要求，规定苏联不迟于1952年末从旅顺撤军。

思想写了一个草案。周恩来看后，认为有许多重要内容没有写进去，同王稼祥等商量后报告毛泽东。毛泽东说：我们自己重搞一个。

1月24日 同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研究中苏同盟条约的具体条款。由周恩来起草的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草案，在条约名称上增加“互助”二字。经毛泽东同意后，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送交维辛斯基。苏方对条约草案没有提出原则修改，只在文字上作了些改动。

1月25日 晨五时，致电刘少奇，指出：“二十四日，经我们起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送交维辛斯基。现正起草第二个文件，即关于旅顺大连中长路协定，大约今日可以完成草案，并已决定在三天内准备好第三个文件，即中苏易货协定。总之，工作是颇为顺利的。”“兹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发上，请中央加以讨论，并以意见电告。请勿外传。”

同日 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同意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并电告毛泽东。

1月26日 致电刘少奇：对英国前驻北京领事高来含本月十六日转达英政府的两项意见如尚未回答，望以下列拟就的书面意见交外交部，由宦乡〔1〕司长约高来含至外交部当面宣读，容许其记录带回报告英政府。书面意见为：“中英两国外长的换文，表示了双方政府对于建立外交关系的同意。因此，胡阶森先生可以英国政府代办的身份来北京谈判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初步的与程序的事宜。”

1月29日 在刘少奇关于同胡阶森谈判中英建立外交关系问题的电报上批示：“请周复。胡阶森来时应与谈英国与蒋介石

〔1〕宦乡，当时任外交部西欧非洲司司长。

关系问题及建立外交关系的其他问题，而不要谈收回兵营问题。见荷〔1〕领事时，如彼提交换对印尼的承认，应允予报告上级考虑。”

1月31日 晨七时，致电刘少奇：“（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一件，中苏关于中长路、旅顺口、大连协定一件，附议定书一件，贷款协定一件，附议定书一件，以上五件草案均经双方看过修改过，今日再谈一次即可大体定案。此五件明一日起可以陆续发给你们。（二）中苏贸易协定一件，附表（定货单）二件，日内可将草案交去，尚须数日方能大体谈好。（三）同过去情况不同的，即是苏方已应我方要求将中长路、旅顺口在三年内无条件交还给我们；大连则在一年内将产权交还给我们，惟自由港地位待对日和约订立后解决，系为应付美国，实际上亦完全由我处理。”

2月1日 和周恩来致电刘少奇。电报说：“请替我们问候胡志明同志，他在为越南民族独立与建立越南人民民主政权的英勇斗争中起了领导者与组织者的作用。中越两国已互相承认，并即将建立外交关系，苏联已承认越南，其他各新民主国家估计亦可能承认。”“我们为越南加入以苏联为首的反帝民主大家庭致深切的庆贺，并祝越南全境统一早日实现，胡志明同志及其战友们身体健康。”

同日 致电刘少奇，发去为我国外交部起草的关于准备同巴基斯坦建交给该国的复文。复文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正式接到巴基斯坦驻苏大使喀莱西先生于一月二十九日函托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转来关于巴基斯坦政府希望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与主权的基础上尽早建立中巴外交关系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同意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

〔1〕荷，指荷兰。

权的基础上尽早与巴基斯坦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欢迎达朱丁先生作为巴基斯坦政府的特派员前来北京就有关建立中巴两国外交关系的初步的程序的事宜进行谈判。”

同日 和周恩来致电刘少奇急转陈云、薄一波：中苏贷款协定的附件规定，在借款和还款期内由中国以剩余的战略物资供给苏联。现在苏联要求供应钨、锑、锡、铅四种。我们除告以铅为我国入口货，无力外销，其余三种物资剩余愿首先满足苏联需要。你们有无新的意见，望立电复。

同日 阅王震、徐立清一月二十三日的报告。报告说：新疆现在业已获得和平事业的顺利推进。王震想在四月初率十五个干部到阿拉木图和塔什干参观一个月，学习联共在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等民族工作中的经验，和这些区域的农牧业生产建设。毛泽东决定将这个报告转送斯大林，并在报告上批注：“王震同志是新疆党政军的总负责人，是一个忠实的和有才能的同志。”

2月3日 致电刘少奇：“我们意见，刘斐宜任水利部长，而不宜在章伯钧领导下任交通部长，贺耀祖〔1〕可任交通部长，陈铭枢〔2〕可任农林部长。唐生智、黄琪翔〔3〕可以分任湘粤两省副主席。”

〔1〕贺耀祖，原国民党军将领，1949年8月和黄绍竑、刘斐等在香港通电，声明脱离国民党政府。当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1950年3月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

〔2〕陈铭枢，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1950年3月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部长。

〔3〕唐生智，原国民党军将领，曾参与湖南和平解放的工作。当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委员。1950年4月又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黄琪翔，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监委员会秘书长。1950年3月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司法部部长。

2月4日 在住地同前来莫斯科商谈中苏民航协定的刘亚楼谈话，说：我们不仅应该有强大的陆军，还应建立强大的空军，强大的海军。现在有起义的伞兵第三团，将来要归空军建制。有一支跳伞部队好，以此为基础，加强党的领导，结合跳伞技术训练，可以不断提高这支跳伞部队素质。

同日 致电粟裕：“（一）前起义过来的伞兵第三团，现在还有多少人，跳伞技术程度如何，他们中间的政治工作进行得怎样，有无党员的发展，一般的政治情绪如何，望电告。（二）这批伞兵盼加强对他们的政治训练，我们需要以这批伞兵作基础训练一个伞兵部队，作为台湾登陆作战之用。”

2月5日 致电刘少奇：现将中苏关于中长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草案及其议定书，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国的协定及其议定书和中苏两国外长换文共六个文件全文发给你们。你收完这六个文件后，可先提交政治局讨论，并应准备于签字前一日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及全国政协常委座谈会，给大家传阅，并作解释性的报告，以便取得大家同意。

2月6日 致电刘少奇：二月一日苏联驻华盛顿、伦敦、北京大使馆受苏联政府之托，曾以召开国际军事法庭逮捕审讯日本五大细菌战犯的照会送给美、英、中三国政府。我外交部想已收到这一照会，应立即以全文在全国各报首页发表，并以李克农副外长名义立即起草复文，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完全同意苏联政府的提议，在最近根据一九四六年四月三日远东委员会的决议召开国际军事法庭，逮捕并审讯罪大恶极损害人类的日本五大细菌战犯。

同日 和周恩来、王稼祥等参观莫斯科的汽车制造厂、飞机制造厂。

2月7日 和周恩来参观莫斯科的集体农庄。

2月8日 晨，同周恩来研究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和各

项协定中的有关具体问题。

同日 致电刘少奇，主要内容有两点：（一）就瑞士准备与中国建交，发出为外交部起草的给瑞士的复文。复文提出：“在 贵国政府与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残余断绝关系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愿意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 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瑞士联邦之间的外交关系，并望贵国政府 派遣代表来北京就此项问题进行谈判。”（二）就中国与英国建交的有关问题提出重要原则：“估计英代办胡阶森即时到京，望告外交部于胡到后，当其来访时，提及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初步与程序的事宜，即应告以其中最重要者为英国与蒋介石反动派残余的关系问题，因英国现已与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即不应同时再与国民党政府作任何外交来往，而英国代表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及其他组织中竟继续承认国民党代表为合法，拒绝接受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这在建立中英外交关系上是不可能不解决的先决问题。”

2月9日 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并同意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中苏关于中长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草案，苏关于贷款的协定草案。会后，刘少奇电告毛泽东。

2月10日 晨五时，复电刘少奇：“（一）同意粟裕调四个师演习海战。（二）借款议定书〔1〕前言数句，意即为中国对苏联之报酬，不宜删去。（三）条约及协定各件双方应于同日发

〔1〕指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协定的前言中写道：“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同意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要求，给予中国以贷款作为偿付苏联所同意交付给中国的机器设备及其他器材之用。”

表，日期另告。（四）伯达为新华社写了一篇社论，经我们看过，明日可发给你们，请与乔木斟酌，于条约发表之日同时发表。”

同日 和周恩来致电刘少奇：中苏民用航空协定草案如另电所告。此草案为苏方提出，在此以前已经多次磋商，现在大体上可以同意，望令聂荣臻、李克农、钟赤兵〔1〕并由陈云或薄一波同志主持讨论一次，提出你们的意见。

2月11日 听取汪东兴、叶子龙关于给苏方保卫、服务人员送纪念品的报告后说：我们在莫斯科住了这么久，他们工作周到，服务热情，应该送点有中国特色的纪念品给他们，向他们表示感谢。

2月12日 晨四时，复电林彪：“二月十日二十时电悉，同意四十三军以一个团先行渡海，其他部队陆续分批寻机渡海。此种办法如有效，即可能提早解放海南岛。”

同日 晨六时，致电刘少奇：“兹起草致党内电报一件，请于收到时加以斟酌迅即发出为盼。”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于二月十三日发出的致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的电报说：“新的中苏条约和协定即将于日内签订并公布，各地于集会讨论及发表意见时，应根据新华社社论的立场，不要发表不适当的意见。”

2月14日 晨五时，将对新华社社论《中苏友好合作的新时代》的修改意见电告刘少奇、胡乔木，并嘱：“请乔木负责改好校正无讹，并请少奇同志精校一遍，务使毫无遗憾，与中苏双方所发表的条约及协定内容完全一致。否则参差不齐，影响很坏。务请注意，至要至要！”

同日 同斯大林出席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中苏友好同盟互

〔1〕钟赤兵，当时任中央军委民航局局长。1950年10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政治委员。

助条约》和《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的签字仪式。代表中国签字的是中国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代表苏联签字的是苏联政府外交部部长维辛斯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规定：一旦对日和约缔结后，苏联应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和财产无偿移交中国政府。苏联军队从旅顺口撤退，中国政府偿付苏联自一九四五年以后在此处的建设费用。大连的行政由中国政府管辖，苏联在大连临时代管和租用的财产于一九五〇年内由中国政府接收。《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规定：苏联政府给予中国政府的贷款以美元计算，总数为三亿美元，年利为百分之一。签字仪式结束后，斯大林举行招待宴会。席间，毛泽东对斯大林说：今天晚上，我们要举行答谢宴会，也就是告别宴会，希望您光临。斯大林说：我从来没有到克里姆林宫以外的地方出席过宴会，对你们的邀请，我们在政治局会议已讨论过了，决定破例接受你们的邀请。

同日 晚上，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和夫人，为庆祝中苏友好条约和两个协定的签订，在莫斯科大都会饭店举行盛大鸡尾酒会，招待苏联党政军领导人，以及各人民民主国家驻苏联使节、苏联知名人士等。斯大林率领苏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出席酒会。席间，毛泽东举杯祝斯大林大元帅健康，并祝中苏友好万岁。斯大林也几次举杯祝毛泽东和周恩来健康。

2月15日 致电刘少奇，指出：苏方“已决定派空军保卫

上海〔1〕，并且不久可到，其数为一个空军旅。此事须作许多准备工作，例如修理机场，保卫机场，在机场附近肃清特务等，但又要保守秘密，以便飞机用火车秘密运沪，待敌机空袭时一举歼灭之。请你考虑叫粟裕来京面告此事，由他回去秘密准备一切”。

同日 《人民日报》发表《中苏两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缔结条约与协定的公告》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同时刊登新华社社论《中苏友好合作的新时代》。

同日 晚上，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在北京举行盛大宴会，并发表演讲，指出：“中苏两大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是久已存在的，然而，只有到了今天，由于中国人民历史性的胜利，这种深厚的真诚的友谊，才用条约的形式把它确定下来，因而就使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开始了一个完全新的时代。”

2月16日 出席斯大林为欢送毛泽东、周恩来一行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盛大宴会。

2月17日 晨七时，和周恩来复电刘少奇：“关于新区土

〔1〕1950年2月6日，上海遭到蒋介石集团飞机的轰炸，中国曾要求苏联提供空军保护。斯大林同意给予支援，但提出苏中要签订一个秘密协定，规定在苏联的远东边疆区和中亚地区、中国的东北和新疆，“将不向外国人提供租让权，不许第三国或其公民以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投资的工业、金融、商业和其他企业、机关、公司和组织从事活动”。毛泽东不肯签订这个文件，但考虑到当时美、英都是敌视中国的西方国家，为照顾中苏团结这一大局，作了让步，同意把它作为条约的《补充协定》。这以后，斯大林表示要把在东北的敌伪财产和北京的苏联财产由中国接收，苏联向中国提供空中保护。

改征粮指示草案电收到。一般甚好，而且亟须适时发出。惟第四部分因涉及分配土地问题本身，可否暂缓发表。因斯大林同志曾在我向其报告土改政策时，提议将分配地主土地与分配富农土地分成两个较长的阶段来做，即使目前农民要求分配富农多余的土地，我们固不禁止，但也不要再在法令上预作肯定。我们虽对中国半封建富农作了解释，并说明对资本主义富农并不没收，他仍举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为例，要我们把反富农看成是严重斗争。他的中心思想是在打倒地主阶级时，中立富农并使生产不受影响。去年十一月政治局会议时关于江南土改应慎重对待富农的问题亦曾提到过，因此事不但关系富农而且关系民族资产阶级，江南土改的法令必须和北方土改有些不同，对于一九三三年文件及一九四七年土地法等，亦必须有所修改。故我们主张目前政务院只发表新区土改征粮指示的前三部分，而将第四部分留待我们归后讨论。如须修改，则可推迟至四月再行发表另一关于土改本身的文件。如同意，可向党外民主人士解释第四部分为今年秋后方始实行的政策，不妨从长计议，待毛主席归后再行决定及发表。”

同日 晨七时，致电刘少奇并中共中央政治局，指出：“我们一行十四人于今十七日夜车离莫归国。离莫时将发表车站告别词，故应公开报道。我们准备在西伯利亚途中参观一两处工厂，抵沈亦将停留一两天，故行程较通常日期为长，亦可稍为错乱一般人的计算。”“我们走后，尚有贸易问题、新疆经济合作问题、民用航空问题、军事问题、专家合同问题留待解决”，“由富春、稼祥、亚楼、季壮〔1〕、赛福鼎组成代表团，富春负总责，继续商谈上述各项问题”。

〔1〕季壮，即叶季壮，当时任贸易部部长。1952年8月又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同日 上午九时，致电刘少奇即转饶漱石：“积极防空保卫上海，已筹有妥善可靠办法，不日即可实施。上海工厂不要勉强疏散，尽可能维持下去。但对上述防空办法务须保持秘密，以期一举歼敌。我们今夜动身回国。”

同日 下午六时，和周恩来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看望使馆工作人员和留苏学生，与他们共进晚餐。毛泽东鼓励留苏学生：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学好专业知识，回国后为革命和建设服务。毛泽东还接见了革命烈士郭亮的儿子郭志成，在他的笔记本上题词“为人民服务”。同时为在莫斯科农学院学习的留学生江明题词“农业机械化”。

同日 晚上，和周恩来等一行十四人乘专列离开莫斯科回国。苏方在车站举行隆重欢送仪式，到车站送行的有莫洛托夫、米高扬、布尔加宁、维辛斯基等苏联党政领导人和留下继续谈判的李富春等中国代表团成员。毛泽东发表告别演说。他说：“留在苏联的时期内，我们曾经参观了许多工厂和农场等，看见了苏联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看见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同志和联共党的教育之下所养成的革命精神与实际精神相互结合的作风，证实了中国共产党人历来的信念，即：苏联经济文化及其他各项重要的建设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我们在苏联首都莫斯科以及在十月革命策源地的列宁城，受到了热烈的招待，当我们离开这伟大的社会主义首都的时候，特向斯大林大元帅、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致衷心的感谢。”

2月21日 和周恩来等一行下车，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参观生产自动推进联合收割机的制造厂。

2月23日 致电刘少奇、高岗：“我们一行因沿途参观今二十三日可到伊尔库茨克。计二十六日可到满洲里，尔后拟于海拉尔、齐齐哈尔、哈尔滨、长春、四平街、铁岭各停留一二小时至三四小时，到沈阳拟停留一两天。请高岗同志通知上述各地负责

同志保守秘密，每处只要少数负责干部迎接招待，不要使多数人知道，尤其不要公开发表消息。尔后至打虎山、锦州、山海关、唐山、塘沽、天津，均拟略作参观，均要保守秘密。到北京下车时，亦只要有少数党内党外人士（一百人左右）至车站迎接，不要使多数人知道，待到北京后方才发表消息。请照此布置为盼。”

2月24日 和周恩来等一行下车游览伊尔库茨克市区，了解少先宫的工作情况，并参观茶叶包装工厂。这里加工的茶叶主要是从中国进口的，在苏联销售。

2月26日 在专列到达中苏边界时，致电斯大林：“我们一行现已到达中苏两国的边境。当此即将离开伟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时候，谨对于您和苏联政府诸位负责同志的盛意招待，深致谢忱，并祝福苏联在您领导之下的强盛不已。”在中国边界的满洲里车站，由叶子龙和汪东兴代表毛泽东、周恩来向苏联专列上的保卫人员、服务人员送去二十箱水果，并致谢意。

2月27日 乘专列到达哈尔滨〔1〕，住颐园街一号。稍作休息后，和周恩来到哈尔滨车辆厂视察。在途中，问陪同的市长饶斌：广告牌上为什么都是外国字，过去的宣传画为什么还未涂掉？又说：我们应当学会管理城市和改造城市啊！到了车辆厂，了解到这个工厂有五千工人，工厂建得早，设备陈旧等情况后说：设备虽然陈旧，但很重要。你们要保护好、管理好这个工厂。越是大工厂，越要管理好，发挥好作用。哈尔滨市是全国解放最早的城市，这个厂又是全市最大的厂子，所以应给全国做出

〔1〕哈尔滨，当时是松江省的省会。松江省于1954年6月撤销，所辖地区划归黑龙江省。

好样子。在国际旅行社，向原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李延禄〔1〕提出要编写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写出来对党对人民有益处。回到住地，又和周恩来接见松江省和哈尔滨市有关负责人。毛泽东说：我们刚刚建国，首要任务是肃清国民党残余，同时要集中精力恢复经济。还有很多工作，但这两项是重点。

同日 晚上，应中共松江省委负责人的请求，为松江省委题词“学习”、“奋斗”、“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并为《松江日报》题写报头。应哈尔滨市委负责人的请求，为哈尔滨市委题词“发展生产”；为哈尔滨市第二届团代会题词“学习马列主义”。

2月28日 中午，到达长春。和周恩来等视察市区，因大街小巷不见行人，问当地一位负责人这是为什么？当弄清是搞了戒严后批评说：搞戒严，不让老百姓出来，这样太脱离群众了。随后，吉林省和长春市的负责人随即解除了戒严。

同日 晚上，到达沈阳，和周恩来等住和平宾馆。立即接见中共中央东北局、辽宁省、沈阳市的负责人。听取他们简短汇报后，在高岗等陪同下共进晚餐。

3月1日 同中共中央东北局、辽宁省、沈阳市的负责人谈话，重点讲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毛泽东说：我们的基层组织是贯彻中央精神的，总的形势是好的，但是还存在问题，包括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在内。这次我和恩来同志路过东北，主要想了解一下东北的工作情况，了解东北地方工业生产情况。发现浪费太大。我在哈尔滨提过不要大吃大喝，到沈阳一看比哈尔滨还厉害。我和恩来不是为了吃喝，搞那么丰盛干什么？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成啊！中央三令五申，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艰苦奋斗，你们应做表率。

3月2日 上午，和周恩来看望在沈阳工作的苏联专家，听

〔1〕李延禄，当时任松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取他们对经济建设的意见和建议。下午，视察沈阳橡胶厂，到了每个车间，询问工人生活和工作情况等。在听取厂长汇报后，肯定了这个工厂的工作。

同日 复电李富春、王稼祥、刘亚楼并告中共中央：海军定货，可分两年购齐，均由借款中拨付。一九五〇年可先购人海军武器及一部分海军舰艇，其余舰艇及海防炮可留待一九五一年购入。空军定货，也要分为今明两年交货，如新增加之轰炸机两队、驱逐机一队，则可改至一九五一年一月再交货，算入明年借款支付项目。今年度借款六千万美元，已用去四千万美元，其余二千万美元，应作为海、空军今年度定货支付之用。

同日 和周恩来致电李富春、王稼祥并告董必武、陈云、薄一波及外交部：同意捷克斯洛伐克商务代表团于三月初、东德商务代表于四月初到北京进行谈判。望由王大使代表我政府表示欢迎。

3月3日 在中共中央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讲话，讲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问题、访苏观感和我国经济建设问题。毛泽东说：最近我们和苏联订了一个条约，这个条约的前途是很大的，在全世界会发生很大影响。这两个大的民族、两个大闰，用同盟条约的方式团结起来了。我们中国共产党应当切实地执行这个条约。全国人民在这个条约签订以后，会比过去更好地团结起来。这个条约是起这样的作用：团结了全国绝大多数，孤立了极少数分子。我们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要积极地做一些工作，要与苏联建立经济建设的互助，文化建设的互助。从现在起经过多年之后，这种互助会发生很大影响。为了对付帝国主义及其同盟者，我们要做许多工作。这个条约的签订对于巩固远东与世界的和平，有重大的意义。我们参观了苏联一些地方，使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他们的建设历史。他们现在的工厂有很大规模，我们看到这些工厂，好像小孩子看到了大人一样，因为我们的工业水平

很低。但是，他们的历史鼓励了我们。我们参观了列宁格勒、莫斯科、西伯利亚的几个工厂，我们又看到了那些已经发展起来的农庄，问了这些工厂、农庄发展起来的历史。他们现有的许多大工厂在十月革命时还很小或者还没有。汽车工厂、飞机工厂在十月革命时只能搞修理，和我们现在差不多，不能造汽车，不能造飞机。过了若干年以后可以造一些，但造的数目也很少，那时比欧洲小国丹麦造的还少，而现在一个工厂一年能造出几万台汽车。这一历史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这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从极小的修理汽车、修理飞机的工厂，发展到制造汽车、制造飞机的大工厂。其他方面，将来我们的发展也是很大的。现在没有的，将来我们可以制造出来。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经验，我们可以用他们的经验。现在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经济建设。我们还有很大的困难，在我们身上负担有几百万军队、几百万政府工作人员，我们把国民党的烂摊子收起来了，这么多人要吃饭。今年要提出把这个负担逐渐减轻，以便我们能够投资于经济建设。东北条件比全国好，早把敌人赶走了，土地改革也完结了，已经转入到经济建设。东北是全国的工业基地，希望你们搞好这个工业基地，给全国出机器，出专家。我们现在从关内送一批知识分子来，以便将来给全国训练专家。

3月4日 晚十时，和周恩来等一行回到北京，在火车站受到党政军领导人朱德、刘少奇、李济深、张澜、林伯渠、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等，以及苏联等驻中国大使馆主要成员的欢迎，并检阅了仪仗队。

3月6日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由周恩来报告访苏经过。刘少奇、朱德、陈云、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出席，薄一波列席。

3月10日 接见参加外交部首批驻外大使学习班的袁仲贤、

耿飏、王幼平、谭希林、彭明治、姚仲明、王任叔、黄镇、吉雅泰、倪志亮、曹祥仁、冯钱、姬鹏飞、韩念龙〔1〕。毛泽东说：听说你们不久就要出国赴任了，总理要我和你们谈一谈。你们是新中国的首批驻外大使（当然首批中应包括已去苏联的王稼祥同志），大都是从部队征调来的高级干部，都是将军。将军当大使好！现在建国伊始，百废待举，各个部门、各行各业，都需要干部。我国和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需要大批外交干部。我们新中国的外交是“另起炉灶”，需要新的外交干部。解放军历来是我们培养干部的地方，所以中央决定从部队挑选一批干部。现在的高级干部中懂外语的很少，那也不能不派大使啊！暂时不懂外语，也可以当好大使。汉代的班超、张骞不是也不懂外语吗？但他们出使西域，不但能够不辱使命，而且功绩卓著。将军当大使好，好在哪里？首先，你们出去我们放心，因为你们不会跑掉。第二，你们中间有好几位是参谋长，参谋长擅长调查研究，当然政治部主任也善于调查研究。所以，你们到国外当大使仍要发扬在部队的长处，也要开展调查研究。刚才谈到，暂时不懂外语也可以当好大使，但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你们还是要像总理所说的，学点驻在国的语言文字，只有懂得外语，才能阅读当地报纸，才能和别人交谈，也才能做好调查研究。不过，对于通过调查而了解到的情况，必须加以研究，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研究很重要，只有通过研究，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凡事都不会孤立地

〔1〕从1950年4月至9月袁仲贤、耿飏、王幼平、谭希林、彭明治、姚仲明、王任叔、黄镇、吉雅泰、倪志亮、曹祥仁、冯钱、姬鹏飞，被中央人民政府分别任命为中国驻印度、瑞典、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缅甸、印度尼西亚、匈牙利、蒙古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保加利亚、瑞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首任大使。1951年5月韩念龙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中国驻巴基斯坦首任大使。

，存在要看到事物间的联系。比如，在一个地方看到有冷却塔，再观察一下周围，看到配套的建筑设施，经过分析综合，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发电厂。再如，一个国家要出兵事先总有很多迹象，如动员、军事运输增加以及舆论变化等等。通过对这些迹象的研究，就可以得出是否要打仗的结论。从报刊和书本中，也可以获得很多有用的东西。有时，从报纸上看到一条不起眼的消息，经过研究，也许能从中发现一个大问题。谈到调查研究，我们不妨学学宋代的沈括，他每到一个地方，总要把那里的城镇关隘、山脉河流，详细记载下来，并绘成地图，还把当地的土地物产、风俗人情都了解得一清二楚。所以，当朝廷派他和辽国进行划分边界的谈判时，他对有关数据、资料十分熟悉，脱口而出，对答如流，使辽国占不了便宜。总之，要重视调查研究，重视学习。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有其自己的优点和长处，我们要通过研究，认识和学习别国的长处。资本主义国家的长处也要学。资本主义的政治不能学，但是他们在经营管理、生产建设中的好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学是为了用，要把学到的好的东西运用到国内建设中来。毛泽东对即将担任驻瑞典大使的耿飚说：你是到西方国家去，要了解和学习他们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中瑞关系的建立，不但将使两国人民之间、我国和北欧国家之间的友谊得到加强和发展，而且也将有助于世界和平。

同日 复电林彪：“三月七日电悉。同意你和子恢来京一叙，时间如你们能早来，可于接电后即动身。因粟裕本日可到京，有些事可一起商谈。子恢同志务盼同来，因土改中对待富农的策略问题需要和他商量。”

3月11日 复电张治中：“寅微〔1〕电敬悉，极感盛意。

〔1〕寅微，即3月5日。

先生现正从事之工作〔1〕极为重要，尚希刻意经营，借收成效。”

同日复电程潜：“电示敬悉，极感盛意。”

同日 晚上，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和各民主党派为毛泽东和周恩来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后回国举行的宴会。毛泽东在宴会上勉励大家：“团结一致为国内建设和国际和平共同努力。”

3月12日 关于征询对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复电邓子恢并告林彪、饶漱石、叶剑英、彭德怀、邓小平。电文如下：一）子恢寅真〔2〕电悉，同意你不随林〔3〕来北京开会而派李雪峰〔4〕来。（二）请就你们现正召开的各省负责同志会议中征询关于对待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电告我们，即是说在今冬开始的南方几省及西北某些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不但不动资本主义富农，而且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看解决半封建富农问题。请你们考虑这样做是否有利些。这样做的理由：第一是土改规模空前伟大，容易发生左偏向，如果我们只动地主不动富农，则更能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并防止乱打乱杀，否则很难防止；第二是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空气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特别显得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将特别显得尖锐，如果我们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看动他们，则将显得我们更加有理由，即是说更加有政治上的主动权；第三是我们和民

〔1〕指张治中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在广州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而进行的工作。

〔2〕寅真，即3月11日。

〔3〕林，指林彪。

〔4〕李雪峰，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办公厅主任、组织部部长、职工工作委员会委员。

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现在已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组织上都形成了，而民族资产阶级是与土地问题密切联系的，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起见，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似较妥当的。关于暂时不动富农的问题，去年十一月有饶漱石、邓子恢、李富春三同志参加的政治局会议〔1〕中，我曾提出过，惟未作详细的分析和未作出决定，现在已到需要作决定的时机了，决定之后需要修改土地法及其他有关土改的文件，并颁布出去，以利新区各省土改干部的学习，方有利于今年秋后开始土改，否则将错过时机，陷于被动。因此，不但请中南局，而且请华东局，华南分局，西南局，西北局的同志们对此问题加以讨论，并请将此电转发所属各省省委各市市委加以讨论，将赞成和反对的意见收集起来迅速电告中央，以凭考虑决策，是为至要。”

同日 下午，约梁漱溟〔2〕谈话，并共进晚餐。毛泽东在梁漱溟谈到“得天下易治天下难”时说：治天下固然难，得天下也不容易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共产党靠大家，大家为国家齐心协力，治天下也就不难了。晚餐后，毛泽东说：梁先生从前在山东、河南农村搞过乡村建设，你可以去看看那些地方解放后有何变化？故地重返，会有得益的。然后你再去东北老解放区看看，比较比较。梁先生如同意，具体行程由李维汉、徐冰〔3〕安排，他们会通知地方政府接待的。后来，梁漱溟于四月至九月中旬先后参观了河南、山东、平原〔4〕三省的农村和东北三省的城市与农村。

〔1〕指1949年12月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2〕梁漱溟，无党派民主人士，曾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1951年11月被补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3〕徐冰，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1950年12月又任人事部副部长。

〔4〕平原，省名。1952年11月撤销，所辖地区分别划归山东、河南两省。

九月二十三日晚上，毛泽东再次约梁漱溟谈话，了解他外出参观情况。毛泽东说：你看了新解放区，又看了老解放区，但都在北方，还没看到南方，你还可以再到广东看看。在梁漱溟谈到对朝鲜战事迫近东北深感不安时，毛泽东说：中美之间现在还没有打起来，但硬是打到你的头上，又怎么办？只有还击，以牙还牙。

3月14日 复信龙伯坚〔1〕：“去年十一月十一日大示收到读悉。吾兄参加革命，从事卫生工作，极为欣慰。新湖南报名是湖南同志们起的，与从前报名偶合〔2〕，引起你的高兴，我亦与有荣幸。旧词无足取，不必重写。尚望努力工作，为民服务。”

同日复信刘揆一〔3〕：“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大示奉悉，极为欣慰，迟复为歉。征粮流弊，政府已发令纠正，不知近日有所缓和否？匪祸必剿，首恶必办，是为定则；惟剿办须有策略步骤，以期迅速解决，安定全境。湖南匪患闻已大体解决，是否如此，先生所知如何，尚祈便中见告。”

同日 复信蒋竹如〔4〕：“得示极慰，迟复为歉。惠我瑶章，弥见勤勤恳恳，深情厚义，如对故人。律诗是一种少数人吟赏的艺术，难于普及，不宜提倡，惟用民间言语七字成句有韵而非律的诗，即兄所指民间歌谣体制，尚是很有用的。弟于律诗不会作而好读，前复东园兄信请他抄其旧作寄我，未见寄来，却似

〔1〕龙伯坚，原名龙毓莹，五四运动时曾主编期刊《新湖南》。当时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卫生处处长。

〔2〕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新湖南报》与五四时期龙毓莹、毛泽东先后主编过的期刊《新湖南》名称相同。

〔3〕刘揆一，字霖生，清末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华兴会创始人之一。当时任湖南省人民军政委员会顾问。

〔4〕蒋竹如，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长期从事教育工作。

乎因此引出了吾兄寄来的许多大作，使我非常高兴。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倘蒙多寄大作（寄重庆诗未收到八极表欢迎。”

同日 复信张辉周〔1〕：“去年十二月十六日来信收读。北游之议甚伟，唯宜暂缓，目前仍就原地工作，不必远游。令孙亦宜就现地按政府规程入学。”同时给张辉周题词：“努力进修，老当益壮。”

同日 复信郭士逵〔2〕：“去年十月五日来信收到，迟复为歉。先生处境困难，深为系念。工作问题，仍以就近设法、等候机会为宜，不宜远出省外，徒劳往返。”

同日 复信胡崇诚〔3〕：“去年旧历九月十八日大示奉悉，极为欣慰，迟复为歉。承惠瑶章，弥见推爱。尚祈时赐教意，以匡不逮。”

3月1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方方、高岗电：为讨论军事和土改等项问题，拟请各区负责同志来京开会一次，请你们五位于接电后数日内即动身来京。林彪、粟裕二同志已到京，剑英刚从武汉回粤，请方方来京一次。

同日 就西南军区第十八军和与其配合的西北军区部队向西藏进军的后勤保障问题，作出指示：“进军西藏，不吃地方。”

3月19日 致信程星龄：“周介掬〔4〕先生信一件寄上，请商颂公〔5〕或首道〔6〕酌予处理。我因不明周先生情况，未

〔1〕张辉周，即张挥周，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2〕郭士逵，1925年毛泽东在韶山一带开展农民运动时，遭到湖南军阀赵恒惕通缉，郭士逵曾帮助毛泽东脱险。

〔3〕胡崇诚，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的同学。

〔4〕周介掬，抗战前曾任国民党政府湖南省警察厅厅长，晚年卖字为生。

〔5〕即程潜，字颂云。

〔6〕首道，即王首道。

作答复。周信内说，希望得米，程颂公不给，又称须得毛委任方有效，似乎社会舆论对他不太好。究竟情形如何，是否应给予帮助，请先生按情酌定。”

3月20日 就苏北区党委要求中央加拨粮食和食盐救济苏北灾民一事，批示：“董老：此事请你予以处置，并请以结果告我，二千万斤粮食、一千万斤盐是否可以照拨，并及时运付？”同日复电张治中：“寅佳〔1〕电悉。（一）同意先生来京面叙，何日启程盼告。（二）沿途护卫请剑英布置。”

3月27日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出席，林彪、李雪峰、方方、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聂荣臻、粟裕列席。林彪、饶漱石先后汇报中南、华东情况。林彪汇报后，毛泽东发言，主要内容是：渡江及大进军以来，做了几个工作：（一）打仗，是一恶战。（二）剿匪。（三）征粮、公债、收税。前两仗都受欢迎，第三仗一打，则“共产党不好了”，只剩解放军了！（四）华东、中南及西北部分的减租减息。（五）城市工作〔接收、管理、肃奸、文教〕，几个月中接收了全国的城市。饶漱石在讲到每个大战役后，军队必须有整顿，地方党政也需要整顿时，毛泽东插话说：“一年一大整，半年一小整，因为情况发生了变化，不改造就要犯错误。”

3月28日 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粟裕汇报华东军事情况和攻台准备，邓小平汇报西南军事、财经情况及西藏问题。邓小平在讲到各界代表会议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关门主义时，毛泽东插话说：“共产党员不能太多，多则无力，不多不少则力量大。”

〔1〕寅佳，即3月5日

同日 阅张鼎丞（1）三月二十五日关于再战金门“我处相对劣势”的报告，批示粟裕：“先打定海、再打金门的方针应加确定，待定海攻克后拨船拨兵去福建打金门。是否如此，请考虑告我。”

3月29日 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彭德怀汇报西北情况，高岗汇报东北工农业情况。毛泽东在插话中说：“新区土改以前，均不应组织民兵。”

同日 阅第十八军党委草拟的进军西藏口号二十四条，批示：“小平同志：口号有些不适当，又太多，请你动手修改，或重拟一单。”

3月30日 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方方汇报广东工作，薄一波汇报华北工作。

同日 致电斯大林：“为北京人民大学与南京大学我们曾向苏联政府聘请六十名教授和教员（关于此问题，我在莫斯科时已有专函给你）。现在北京人民大学已招收了三千以上的学生并开始上课，该校教育计划是以苏联教授、教员教课为主而制订的，没有苏联教员，课程无法进行。因此希望按照我们已提出的计划物色教授和教员，并迅速派他们到中国来。”

3月31日 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陈云报告财政情况，聂荣臻报告军事工作。陈云说：财经统一后，财政情况有所好转。争取物价平稳的三个条件大体具备了，（一）战争完结了，（二）每月货币收支接近平衡了，（三）我保有的物资数量充裕了。

同日 阅空军政治部三月三十日为请示出版一个刊物的报告，批示“照办”，并题写《人民空军》刊名。

（1）张鼎丞，当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省军区政治委员。1952年8月、9月又先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四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

3月 应北京大学负责人的请求，为北京大学题写校徽。

4月1日 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彭真汇报北京市工作，黄敬汇报天津市工作。

4月2日 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饶漱石发言说：全国统一步骤，意见是一致的。在前进路上，可能产生副作用。所谓副作用，在上海具体说，就是因为银根紧有可能使上海的大资本家倒台。果如此，对国家是害多利少的。我们有性急的，如企图利用轰炸使工业内迁，经主席指出，我们开朗了，实际是做不到的。二月六日轰炸之后，我们又急了，无办法，又想提内迁。后经主席来文说不要内迁，有办法，我们就很高兴。林彪发言说：我觉得应坚决完成任务，必须使金融物价稳定，要坚决，没有想到松紧问题。邓小平发言说：问题的提出很重要。因为从另一方面考虑问题，常常是必需的。统一办法实行以后，物价稳定，解决了历史性问题，是一个大成绩。物价稳定对发展生产是有利的，必须从稳定物价的基础上来想办法，不能动摇这个原则。牺牲这个原则去拉拢资产阶级是不对的。银根紧，将来是有利的，但在当前是一个难关，是难过的！照顾私人资本，今后主要方式是国家订货。陈云发言说：问题甚大，各有困难。物价不稳，内外有责难。稳了之后，又发生新的困难。上海是特殊问题，利于通货膨胀，但全国各地稳定之后是好的。最后，毛泽东说：基本工作是平衡收支，稳定物价。好转已经开始，但不稳固。要稳固，必须：土改以恢复农业，调整以恢复工业，整干以执行政策。两全其美是可能达到的，必须去掉一些毛病。决定要调整工业，可以调李富春同志来中财委任副主任，专管工业。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各地关系。整干（整掉命令主义）在各地进行，中央可发一电报。

同日 为转发华北军区关于纠正军队生产中的偏向的指示电，起草中央军委给各中共中央局、各军区的批语：“兹将华北军区三月三十一日关于纠正军队生产偏向指示电一件发给你们，望转

发所属参考并纠正自己部队中的偏向，是为至要。”指示电指出军队生产中出现的偏向是：集中力量搞生产，放松了剿匪任务；工具未准备好，劳动量过度；管理松懈，引起战士逃亡；生产动员时片面强调分红，对增加国家财富和减轻人民负担的精神强调不够。

同日 应马叙伦要求为《人民教育》杂志创刊号（五月一日出版）题词：“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同时复信马叙伦：“示悉。遵嘱写了几个字，是否可用请酌。”

4月3日 审阅钟赤兵、唐凯〔1〕三月三十一日关于中国民航的经营方针问题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批示：“所拟方针可用，具体实施办法，请与周总理、聂参谋长商酌办理，并与空司〔2〕协商配合。”报告建议民航的经营方针为小飞机的原则和采用企业制。

4月5日 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邓小平发言说：军队减人应是确定的方针，主席提出的保留四百万是合理的。整编应与将来的国防建设联系起来。粟裕发言说：从战争在近五年内不可能爆发出发，军队可以减少。毛泽东说：人员与财政之间的矛盾，战争与和平的矛盾，这是问题的本质。两三年内是否有仗打？可能几年内没有仗打，又有一种可能就是打。如果明后年打，留下四百万也够，足以应付必要情况。现在裁一点，以解决军事与财政的矛盾，即裁去一百五十万。因为美国要注意两洲〔3〕，如果不注意则亚洲连续胜利，平均对付两处增加了它的困难，打不起来的。如果要打，我们有四百万。希望商定下来，

〔1〕唐凯，当时任中央军委民航局副局长。

〔2〕空司，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的简称。

〔3〕指欧洲、亚洲。

将来再看。四百万的军队是学校也是生产队。经济计划现在还谈不到，但陈云同志说得很好，要想法使穿衣吃饭点灯自己解决。不解决就不能工业化。需要修铁路，从国际意义上说，是修川汉铁路与西北铁路，要与苏联接通。十年计划完成这两条铁路。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我们恐怕用不上。第一是自力更生，第二是靠苏联与新民主国家。

同日 阅陈毅关于公债、税收等问题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电报，复电陈毅：“卯支〔1〕电悉，所取方针和中央的方针是一致的，望审慎去做。中央会议六日可完，漱石八日可动身参加上海十日开始的会议〔2〕，我们是支持你们的。”陈毅的报告提出的方针是：动员党政和人民团体积极做好解释工作，并严办乘机捣乱的坏分子，对工作方式和税目方面的毛病进行检讨并加以改善；召开党内会议，说明公债和税收任务新老解放区和城乡均应分担，共同克服困难；召集财经各部人员开会，在不妨碍中央财政部部署的条件下，考虑一些必要松动和辅助的步骤。

同日 复信毛宇居：“历次各信及最近长函均收，甚谢。诸承关怀，具见盛意。惟轶事有些内容不适合，似以不印为宜，原稿奉还。复颂兴居佳胜！乡友便祈致候。”

4月6日 主持三月二十七日开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最后一次会议。李雪峰、薄一波、彭德怀先后发言，都谈到富农问题。最后，毛泽东发言。他说：不动富农的策略，是必需的，而且是可能搞的，因为蒋介石倒了，土匪肃清了。抗日战争中，有八年未分地，地主土地也未分。当我们看到战争要来，争取群众，就搞了一个《五四指示》，那时怕搞过了，把自己孤立起来。

〔1〕卯支，即4月4日。

〔2〕指上海市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当时有人说右了，有九条照顾。一九四七年战争残酷，农民与农村干部结合，推翻了《五四指示》，说它右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扫地出门。犯的错误的最多的也是在一九四七年，打红了眼，地主富农不分了。一九四七年我军开始反攻，三大战役之后，形势就不同了。《五四指示》分成两个小段解决，先搞地主，以后再搞富农。现在，只有皖南区党委的回答才是肯定地说不动富农，其余大部均主张要动富农出租部分的。我还是提议今天不动富农。至于恶霸，则不是以富农身份去没收他，但也不能规定“恶霸富农”。土地改革这个战争，比渡江、剿匪要大，要复杂，要激烈。这是一场恶战，要搞三至五年全部解决。慢比快些好，出乱子少些，也不会太大地影响生产。土地平分，也可以考虑，好处是快。但现在战争已经完了，可以考虑不那么平。不平，可以用其他办法如税收来补偿的。

4月9日 审阅周恩来关于中苏条约和两个协定有关情况的报告，批示：“此报告请周印若干份，于今日印好，明日分发准备参加此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的一百七八十人，每人一份。”“此次政府委员会会议，除周、陈、林、邓〔1〕四同志讲话外，张治中、程潜、张澜、李济深、黄炎培、郭沫若等六人似亦宜给以讲话机会，请周酌定通知他们做准备。此外，为解释婚姻法，王明似亦宜略作说明。”

同日 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参加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情报部二局、五局全体会议的代表，并讲话。毛泽东说：你们的会开得很好。以为把蒋介石打败了，国内就没有敌人了，是错误的。帝国主义还存在，还强大，国内还有帝国主义的走狗。你们已经打了一个胜仗，还要再打一个胜仗，两个都胜利了，才算是全胜利。

〔1〕周、陈、林、邓，指周恩来、陈云、林彪、邓小平。

毛泽东为他们题词：“第一仗已经打胜了，应即整顿队伍打第二仗，争取全胜。”

4月10日 主持召开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中苏条约和两个协定有关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在周恩来作报告时插话说：中苏两国协商的问题，第一是有关两国的问题，第二还要是重大问题，如对日和约问题就是有关两国的重大问题。有些即使是重大问题，也不一定都与两国有关，那也就不一定商量。还有如大连为什么不讲交还，这表示大连就是我们的，不存在这个问题，剩下的是自由港问题。中苏条约只限于与苏联有关的问题，大连自由港这一点不同，与美、英等国都有关系，所以我们只讲在缔结对日和约后再处理，到时看情况。中苏条约订下来比不订好，订下来，就有了依靠，可以放手做别的事。现在把两国的友谊在条约上固定下来，我们可以放手搞经济建设。外交上也有利。为建设，也为外交，而外交也是为建设。我们是新起的国家，困难多，万一有事，有个帮手，这减少了战争的可能性。

同日 审阅修改陈云准备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作的报告稿，拟题为《关于财政状况和粮食状况的报告》，并批示：“陈云同志：此件很好，都可发表。请你看一下即送周付印，明日发给到会诸人。”十三日，致信周恩来：“陈云报告请阅后付印。今晚七时的政府委员会，请考虑要参加统一战线工作会议的各省同志到会旁听一下。”

同日 审阅林彪准备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作的关于中南工作情况的报告稿，批示：“已阅，请周即付印。”

同日 复信张有晋〔1〕：“去年十二月十九日赐函诵悉，远

〔1〕张有晋，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数学教师。

承教益，极为感谢！谨此奉复，敬颂道安！”

同日 复信毛照秋（1）：“去年十二月十八日来信收到。家中困难，应在土地改革后在生产中去陆续解决。你父亲旭梅（2）健在，甚慰，请你代我致问候之意。祝你工作顺利！”

同日 复信田厚卿（3）：“去年七月一日来信收到（所称五月二十七日的信则未收到穴积压甚久，迟复为歉！先生是否即第四师范之田厚卿，过去经历情形，有暇尚祈见示。工作问题是否已获解决亦望见告。”

4月11日 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周恩来作关于中苏条约和两个协定有关情况的报告，林彪作关于中南工作情况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西南工作情况的报告。在多位委员发言后，毛泽东讲话。他说：我们曾经指出，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是巩固革命胜利的两个基本条件。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签订中苏条约，对于我们国家有重大的意义。我们是处在一种什么情况之下来订这个条约呢？就是说，我们打败了一个敌人，就是把国外反动派所扶助的蒋介石反动派打倒了。国外反动派，在我们中国大陆境内，也把他赶出去了。但是世界上还有反动派，就是我们国外的帝国主义。国内呢，还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有朋友。我们同苏联的关系，应该在一种法律上，就是说在条约上，把它固定下来，建立同盟

（1）毛照秋，毛泽东的族侄，当时在乡务农。

（2）旭梅，即毛旭梅，毛泽东的族兄。

（3）田厚卿，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和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关系。帝国主义者如果准备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请好了一个帮手。这个条约是爱国主义的条约，又是国际主义的条约。会议批准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

4月12日 主持召开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扩大的第四次全体会议。会议听取陈云关于财政状况和粮食状况的报告。毛泽东就财政经济问题发表讲话，他说：陈云同志方才报告的着重在财政，以后要注意经济。这六个月来在财经方面打了一个胜仗，是有成绩的。这是各级政府和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但还有不少缺点和毛病，可以来个总结，将缺点修正一下。过去注意财政也是对的、必要的，从去年十二月搞概算，平衡收支，达到稳定物价，有了一个开始的好转，但还不是基本的好转。要基本好转还要三年即到土改完成，还要依靠调整经济和调整工商业，还要在支出方面想些办法。土改中动不动富农问题，我们现在的意见，原则上是不动为好，因为现在没有战争。一九四六年《五四指示》即不动富农，到了一九四七年在战争中为了争取群众无形中冲破了那个界限。土地平分是个大事情，很怕乱。又要改，又怕乱，干部又不足。规定有今年搞的，有明年搞的，还要做准备工作，仍会有些乱，然后去争取少出乱子。整理经济方面，很重要。以前集中力量搞财政是对的，以后要转到工商业方面。《共同纲领》中说五种经济要各得其所，现在私营经济感到无合法地位，公营经济中也有不得其所的。要在经营范围、原料、市场价格、周转资金等方面，将私营经济真正作为国家五种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四月到九月的六个月中，中财委要召开一些工商业会议，调整工业要有所准备，要工商业者、公营企业参加，由政府领导，把口号变为实际，否则人家说我们讲空话，未能实行《共同纲领》所规定的。在支出方面，要想些办法。现在军队有五百六十万，可以减少一百六十万，即剩四百万。要加强空军、海军、炮兵、

工兵等技术兵种，减少陆军。但并不是要大裁军，是把愿意回家、有家可归的送走，给路费，也要训练一下，并使他们家乡组织欢迎他们。将来国际环境稳定，我们全国实行征兵制以后，军队留二百万到二百五十万就差不多。国家经济的根本出路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形态，变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有三种东西即粮食、棉花、煤油，这是几十年来进口货的大宗，中国的外汇主要买这些东西。只有这三样东西靠自己，经济建设问题才能彻底解决。

同日 阅全国统战会议工商组讨论会的一份发言记录稿，写多处批语。在发言记录稿谈到“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处，批写：“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在发言记录稿谈到对私营工商业的限制和排挤处，批写：“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在发言记录稿谈到私营工商业“要求划分阵地，要河水不犯井水，我们不允许”处，批写：“应当划分阵地，即划分经营范围。讲得很幼稚。”在发言记录稿谈到“国营经济是无限制地发展”处，批写：“这是长远的事，在目前阶段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在发言记录稿谈到“我们的政策，是要‘与民争利’。但他们所谓的‘民’，是资产阶级。我们则要争于人民有利的事情。我们说，我们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老百姓点灯’。但这里的‘州官’是人民，我们放火可以，你们点灯就违反群众利益”处，批写：“完全错误的说法。”在发言记录稿谈到“‘与民争利’，表现在粮食、花纱布、火柴、百货、盐的控制”处，批写：“除盐外，应当划定范围，不要垄断一切。”“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粮、布、油、

煤)的一定数量,例如粮食的三分之一等。”在发言记录稿谈到“百货公司必须建立,不然即不能稳定物价”处,批写:“建立百货公司,并不是代替全部商业。”在发言记录稿谈到“大资本家要停工,我们就让他停工。我们有钱,就接收过来”处,批写:“这是不对的。”

同日 修改林彪本日关于中南区部队复员问题给邓子恢、谭政、赵尔陆、陶铸〔1〕的电报稿,加写一段话:“应积极地提出复员是为了返回家乡发展生产和建设民兵,回乡后应服从区乡政府领导,在人民中起模范作用,而不可乱来。”

4月13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会议听取和批准陈云《关于财政状况和粮食状况的报告》。毛泽东就陈云的报告发表讲话说: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过去六个月在整理收支、稳定物价方面的工作有了很大的成绩。财经委员会的方针是正确的。工作中还有一些缺点,应当注意改正。我们国家的财政情况已开始好转,但整个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有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和国家军政费用的大量节减。今后几个月内政府财经领导机关的工作重点,应当放在调整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以及公私企业各个部门的相互关系方面,极力克服无政府状态。《共同纲领》规定,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这必须充分实

〔1〕 陶铸,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1951年2月又任中共广西省委代理书记(1951年11月任华南分局第四书记)。

现，方有利于整个人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现在已经发生的在这方面的某些混乱思想，必须澄清。

同日 和江青致信向振熙〔1〕：“向老太太尊鉴：欣逢老太太八十大寿，因令小儿岸英回湘致敬，并奉人参、鹿茸、衣料等微物以表祝贺之忱，尚祈笑纳为幸。”

同日 致信杨开智、李崇德〔2〕：“来信收到。你们在省府工作，甚好，望积极努力，表现成绩。小儿岸英回湘为老太太上寿，并为他母亲扫墓，同时看望你们，请你们给他以指教为荷。”

4月14日 复信刘揆一：“四月二日大示诵悉。退押一事，原是地方根据农民要求办理的，现已令其停止。”

同日 复信熊子容〔3〕：“两信及文稿均收到，研究有心得，思想有进步，可喜可贺。五月来京时，可以面谈。”

4月15日 阅中南财委四月十三日给中财委的报告。报告中说：武昌私营纱厂四家，因催收税债，紧缩发行，银根吃紧，成品卖不出去，据多方调查，确系岌岌可危。毛泽东批示：“陈云同志：此件所述厂家似应予以维持。如何，盼告。”

同日 本日出版的《人民空军》创刊号刊载毛泽东的题词：“创造强大的人民空军，歼灭残敌，巩固国防。”

4月16日 复电陈毅：“删午〔4〕电悉。税收问题和失业问题能照正确原则解决，取得各方同意妥慎进行，甚好甚慰。目前处在转变的紧张时期，力争使此种转变进行得好一些，不应当破坏的事物，力争不要破坏，或破坏得少一些，你们把握了这一

〔1〕向振熙，杨开慧的母亲。

〔2〕李崇德，杨开智的妻子。

〔3〕熊子容，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4〕删午，即15日午时。

点，就可以减少阻力，就有了主动权。会议〔1〕情形，望随时电告。”

4月18日 复电契尔文科夫〔2〕：“去年十二月七日来电我由苏联回来后方才看到。兹依你的要求写了一篇短文，但你的限期早已过了，是否还有用，请你酌定处置。”毛泽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3〕》一书写了《季米特洛夫与中国人民》一文。文中指出：季米特洛夫同志在一九三六年七月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而写的专文中，认为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在建立这个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必须同“左”倾宗派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斗争，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季米特洛夫同志所作的这些结论，对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一时期正确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很大的帮助。一九四二年中国共产党进行整风运动的时候，中央委员会要求全体党员学习季米特洛夫同志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的结束语，他在这里谈到干部政策以及宣传工作必须通俗易懂的问题。

同日 复信毛森品〔4〕：“前后两信均收甚慰，因事迟复为歉。钦明〔5〕兄为革命牺牲，不胜叹惜，亦是光荣之事。所述干部工作中之缺点，所在多有，现正加力整顿，期能有所改进。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其步骤似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进去，不宜由弟推荐，反而有累清

〔1〕指1950年4月15日至23日召开的上海市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2〕契尔文科夫，当时任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保加利亚部长会议主席。

〔3〕季米特洛夫，曾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保加利亚部长会议主席。1949年7月2日在苏联逝世，终年67岁。

〔4〕毛森品，毛泽东在湖南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和湘乡驻省中学读书时的同学。

〔5〕钦明，即毛钦明，毛森品的哥哥。曾与毛泽东同学。1928年牺牲。

德，不知以为然否？风便尚祈随时惠示周行。”

同日 复信李淑一〔1〕：“来信收到。直荀〔2〕牺牲，抚孤成立，艰苦备尝，极为佩慰。学习马列主义，可于工作之暇为之，不必远道来京，即可达到目的。肖聃午亭〔3〕两位老先生前乞为致候。”

4月19日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关于在报纸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和失业问题，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林伯渠、彭德怀出席，聂荣臻、薄一波、李立三、陆定一、陈伯达、乌兰夫〔4〕列席。在讨论决定时，有人说各地反映都有压制批评的事，受到批评就不高兴，甚至拒绝接见记者，还有叫去反省的。毛泽东说：谁叫记者反省就要他自己反省，谁拒绝接见就撤换谁！有许多人写信给我们，不管他是什么人，是很有好处的。党中央与中央政府应该有专门机关，来处理这类的事情。又说：我们的报纸需要提高一步，有许多消息确实是不忠实的，不合实际情况的，根本把事情的面目搞错了！有些新闻因为没有分析，所以缺乏说服力。批评这个武器不要拿在反动分子手中去。我们需要了解资本家的动态，报纸上应该有他们的文章。《进步日报》上资本家的文章，我总是读的。应该允许一部分抱资产阶级观点的人同时存在。就是在消灭了资产阶级之后，

〔1〕李淑一，柳直荀的妻子。当时是湖南长沙福湘女子中学教师。

〔2〕直荀，即柳直荀，毛泽东的早年战友。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湖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中国工农红军第2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共鄂西北临时分特委书记。1932年牺牲。

〔3〕肖聃，即李肖聃，李淑一的父亲。午亭，即柳午亭，柳直荀的父亲。

〔4〕乌兰夫，当时任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书记、政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绥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1952年8月、9月先后改称绥蒙军区、蒙绥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要消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许多时候。基本的理论书籍还是要出版，否则思想就混淆了。在讨论失业问题时，李立三说，上海失业最为严重，失业工人三月份十万，四月份十五万，还可能增加。毛泽东问陈云：拿出四亿斤粮食来救济失业工人，可以吗？陈云答：可以的。救济经费是可以拿出来的，但方式应研究，不要把总工会置于火炉之上，处于被动地位，变为斗争对象。

同日 复信左作霖〔1〕：“三月二十三日来信并照片一张收到，深为感谢。你的志向很好。加强进修，多做有益于人民的工作，必会为人民所欢迎，尚祈努力以赴。”

同日 复信熊科易〔2〕：“三月二十六日来信收到，极为欣慰。国事多艰，尚祈相与努力。参加工作是很好的，唯弟不识兄之情况，未便有所主张，似可与惇元〔3〕兄等商酌为之。”

同日 复信向明卿〔4〕：“去年十月十二日来信早已收到，因事迟复为歉。令侄向钧〔5〕同志是共产党员，一九二七年曾任衡山县委书记，是个忠实的能干的同志，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被捕，光荣殉难。以上这些，先生可以报告湖南省委。惟抚恤一事，须统一行之，不能只顾少数，如省委未能即办，先生亦宜予以体谅。”

同日 复信谭天佑〔6〕：“来信并附天民同志照片收到，极为感谢。天民同志为革命事业牺牲生命，深为悼念。尚望我兄努力进修，多做与人民有益的工作。”

〔1〕左作霖，当时在长沙启新钱庄工作。

〔2〕熊科易，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3〕惇元，即周世钊，字惇元。

〔4〕向明卿，杨开慧的舅父。

〔5〕向钧，曾任中共湖南省委农民部部长。1928年1月24日在长沙牺牲。

〔6〕谭天佑，革命烈士谭天民的弟弟。谭天民，曾任湘乡县农民协会委员长、中共茶陵特委书记。1927年牺牲。

同日 复信罗驭雄〔1〕：“二月十四日大示敬悉，深感盛意。所指干部中的缺点错误所在多有，必须整饬。倘有所见，尚祈随时示知。来京一节，似可从缓，工作或学习均以就近从事为宜，未审尊意以为然否？”

同日 复信谭秀德〔2〕：“去年十二月十四日来信收到，甚为感念。周辅仁烈士殉难牺牲一节，可向当地人民政府报告备案。” **同日**复信文运昌〔3〕：“接到了你的许多信，感谢你的好意，因忙迟复为歉。吾兄健存，儿孙众多，可为庆贺。地方工作缺点甚多，应当纠正。如有所见，尚望随时见告。泽民、泽覃〔4〕均已殉难，知注并闻。”

同日 复信贺晓秋〔5〕：“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所说各项工作缺点，应当改正，如有所见，尚望随时告我。接到晓明一信，我分不清谁是兄谁是弟，请你来信说明。”

4月2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军队复员工作给邓子恢、谭政、赵尔陆、陶铸，陈毅、饶漱石、粟裕，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彭德怀、习仲勋、张宗逊的电报：一）四月十二日林彪同志给邓、谭、赵、陶关于中南区今年复员五十三万至六十万人的电报谅已收到。我们希望这个复员工作能于五月至八月四个月内做到，以便节省出九月至十二月共四个月的经费，减轻人民一

〔1〕罗驭雄，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2〕谭秀德，周辅仁烈士的妻子。周辅仁，毛泽东青少年时的同学。1928年牺牲。

〔3〕文运昌，毛泽东的表兄。

〔4〕泽民，即毛泽民，毛泽东的大弟。1921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9月牺牲。泽覃，即毛泽覃，毛泽东的二弟。192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4月牺牲。

〔5〕贺晓秋，毛泽东姑父的侄儿。晓明，即贺晓明，贺晓秋的弟弟。

部分粮税负担。请中南局专为此事开一次会议，详尽地讨论一下，并订出在四个月内分批复员而又不乱子的具体计划和具体办法。此种计划和办法希望能在五月一日以前电告我们审阅，并请电告四个月内分批复员五十三万至六十万人这项巨大工作有何困难，是否可以克服这些困难。（二）请饶、陈、粟亦照上述意图做出华东区复员计划，亦于五月一日以前电告我们。华东区只留下军队及地方武装共一百万人。（三）请刘、邓、贺考虑一下是否可以亦照上述意图办理复员工作，只留下军队及地方武装八十万而又不乱子。（四）请彭、习、张考虑电告西北方面可以复员多少人，并是否可于四个月内办理完毕。”

同日 审阅刘少奇四月十八日报送的《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草案）》，共三十五条。此件由胡乔木起草，经刘少奇修改。刘少奇将第三十三条“中国共产党万岁！”改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胜利的领导者与组织者万岁！”；将第三十五条“毛主席万岁！”改为“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毛泽东审阅时，将第二十四条“台湾、西藏和其他待解放区的人民，努力协助全国解放事业的完成！”改为“台湾、西藏和其他待解放区的人民，准备一切可能条件，配合人民解放军的适时进军，解放自己，完成统一！”。并批示杨尚昆广印发政治局各同志及乔木、陆定一、陈伯达、李立三、聂、薄，星期三讨论。”

《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后增至三十八条，于四月二十六日发布。

同日 下午，同李维汉、徐冰等谈统战工作问题。毛泽东说：对民主党派及非党人士不重视，是一种社会舆论，不仅党内有，党外也有。民主党派是联系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政权中要有他们的代表才行。我们对民主党派要给事做，尊重他们，当做自己的干部一样。要团结他们，使他们进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如解决党派经费、民主人士的旅费等。大家对《共同纲领》

没有意见，但一到了具体问题就又不行了。像学校不收民主党派分子，某地委看见民主党派材料就把它撕掉，对党外人士像踢皮球等等，都是不对的，也是不公平的。资产阶级要求平等、博爱、自由。我们这样做就不平等，也不博爱。要实行民主，现在许多人有好多气没有机会出，要让他们出。除了泄漏秘密、破坏性的，都让人家说。要出的气不外是两种，一种是有理的，一种是无理的。对有理的应接受，对无理的给他讲理。我们要有气魄，不怕骂。不让讲话，就会闹宗派主义，党内也一样。蒋介石不肯给人家自由，我们要给人家平等、博爱、自由。

4月22日 阅陆定一四月二十一日关于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工作计划的报告，批示：“定一同志：文教委员会工作已有计划，甚好。党的宣传教育工作亦应当有一个计划。”

4月23日 复电陈毅，指出：“目前几个月确实应当用大力来做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维持生产与救济失业的艰巨工作。”

同日 对中央军委关于号召捐救济粮事给各部队军政首长的电报稿作修改（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近几个月来，上海因为遭受敌人封锁与轰炸及物价稳定、银根抽紧等原因，失业工人大增，共有二十万人，并有增至二十五万之势。此外，各地失业工人，南京五万，武昌十万，重庆六万，广州五万，京津共6万。全国共失业工人约六十万。他们生活极为困难，为了争取工人群众坚决站在我们方面，中央同意全国总工会筹措一笔失业救济金的提议，号召工人做义务工一天，以所得工资援助失业工人。（二）我认命解放军对工人阶级兄弟的困难，应有同情并给予援助。为此我们提议，全军每人捐出一斤米，作为失业工人救济金。望在部队中进行动员，通过开军人大会的方式响应每人捐一斤的提议，并将结果电告我们。在报道时只提粮食总数，不要提每人一斤米，以免暴露总人数。

同日 会见傅作义、董其武等，朱德、周恩来、薄一波、聂荣臻参加。

4月25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减租的总结报告，起草中央发至县委一级的批语：“兹将中南局四月二十日关于减租总结电转发给你们，请你们加以研究。特别是关于‘有许多民主人士说我们说话不算话，上边的规定，下边可以任意改变，这种状况必须纠正’，‘由于战争已经结束，乡村改革一点，已引起人们突出的注意，关起门来办事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由我们自己提出而由各民主党团举手赞成的一切政策，我们自己必须首先坚持执行’，这些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务望各地同志注意。”

4月27日 复信王新元〔1〕：“四月二十六日来信收到。已告统战部李维汉部长，如李介侯到时设法令其入学。”

同日 应上海南洋模范中学一些学生四月二十三日来信的要求，为他们的壁报《青锋》题写报名。

4月28日 致电饶漱石、邓子恢、邓小平、彭德怀，请他们就下列各项予以电复：（一）目前春耕状况如何，所属各省区党委是否已集中主要注意力从事春耕生产的组织和领导，农民缺乏种子、肥料及食粮的问题是否可以得到解决，今年是否有争取一个丰收年成的希望，此事关系极为重大，务望注意。（二）华东局、中南局各担任起草一个土地法草案，是否已在着手，我们希望你们能于五月十日起草完成，五月十五日以前送到中央，是否能做到。除一个一般的土地法外，是否还需要发一个关于土改工作的指示，规定土改工作中的许多具体办法，你们是否正在准备起草此项指示。华东局已经准备了为着土改目的而使用的七万二千个干部，并准备于土地法令公布后的几个月内加以集中整训

〔1〕王新元，当时任轻工业部副部长。

及学习土改，中南局及西北局关于此项干部的准备情况如何？（三）整训干部已经成了极端迫切的任务，各阶层人民相当普遍地不满意我们许多干部的强迫命令主义的恶劣作风，尤其是表现于征粮收税和催缴公债等工作中的上述作风，如不及时加以整顿，即将脱离群众。你们对于此项整训工作是否正在筹划，有无关于整干的计划（步骤）及指示。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批语，将刘伯承、贺龙、邓小平四月二十七日来电转发各中央局、各军区党委参考。并批示：“刘、朱、周、聂阅后发。请聂于日内召集有关人员讨论，将东北、华东、西北三区军队缩减为一百万人的具体计划做好，交我为盼。”来电提出：寒们已遵照中央意图，确定了将所有部队缩减到八十万的初步实施方案，并决心贯彻执行，估计是不会出大乱子的。

同日 阅中共中央华东局四月二十六日关于浙江、苏南夏征不收为好的请示电，批送陈云、薄一波：“浙江、苏南以不征夏收为好，如何请酌复。其他灾情严重区域是否征夏收，亦请考虑。”

同日 复信夏永新〔1〕：“四月十二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尚望就现在工作岗位努力从事，加强进修，是所企盼！”

同日 阅中共湖南省委四月二十六日关于唐生智去北京晋见毛主席的电报，批送林伯渠、聂荣臻：“请于唐生智到京时去车站接一下，并指定住处。”

同日 批示胡乔木：“海南岛即将全部解放，请起草一个贺电，待榆林港解放时即发表。”

同日 审阅聂荣臻四月二十八日给罗贵波的复电稿〔2〕。

〔1〕夏永新，毛泽东领导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时的学生。当时在江西省人民政府卫生厅工作。

〔2〕中共中央派驻越南党的联络代表罗贵波，1950年4月15日致电中央军委，请求解释毛泽东关于“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建立和发展根据地的思想。

复电稿说：“所问‘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的解释，答复如下：主席的这一军事原则是在民族民主革命战争中，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创建革命的根据地，巩固根据地，再依托根据地，扩大发展根据地，既反对保守主义，又反对冒进政策，使巩固根据地与发展根据地相结合的原则。所谓波浪式的推进，就是根据地扩展到某一境地，就要暂时停止推进，而进行新区的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建立人民武装等项巩固工作，到新区已经可以作为依托再行推进。请参看‘毛选’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毛泽东批示：“同意。”

4月29日 晨，修改刘少奇准备本日在北京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干部大会上的讲话稿后，致信刘少奇：“报告略有些修改，已送恩来阅后还你。陈云在请假中不看文件，没有送他看。修改的主要点如下：不要说‘今年是困难的最后一年’，因今后几年内都会有困难，而且仍将是相当严重的困难，不过将一年一年地减少罢了。其他说到困难‘很快就可以过去’的话都删掉了。举东北为例一段合并到前面一段中去。国际形势一段说得策略一些。解释富农策略一段觉累赘，留待将来去说。纠正命令主义一段说得全面一些，并且不要太突出地去说财经干部。口号加了一句〔1〕。如时间来得及，请于你讲后即刻付排，送清样给我再看一次，然后发表。”

4月30日 发布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自一九五〇年五月一日起实施。婚姻法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

〔1〕毛泽东加的一句口号是：“全中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合作万岁！”

同日 将邓子恢四月二十五日关于起草土改条例意见的电报转发饶漱石，作为起草土改法令的参考，并征询他的意见。邓子恢的电报着重申述了主张动富农出租土地的理由。

同日 复信田厚卿：“四月二十二日来信收到。吾兄既与总工会会有联系，即宜继续此种联系，听候他们分配工作。对于过去历史经验加以分析反省，是必要和有益的。希望你与时进步。”

5月1日 下午三时，和朱德、刘少奇、宋庆龄〔1〕、李济深、张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检阅首都各界群众和人民解放军的游行队伍。

同日 复电邓子恢并告饶漱石：“四月二十五日电悉。（一）鉴于富农出租地数量不大，暂时不动这点土地影响贫雇农所得土地的数量也不会大，现在我的意见仍以为暂时不动较为适宜。（二）但你们可根据你们自己的各项意见起草一个土改法令草案，由子恢同志于五月十五日以后中央开会时带来（子恢同志动身日期另外通知），在中央会议上作最后的讨论和决定。（三）如华东局是赞成暂时不动富农出租土地的，则请华东局起草一个和华中不相同的土改法令草案，以便在中央会议上对照讨论。”

5月2日 复信谭世瑛：“四月二十四日来信收到，情意殷厚，极为感谢。生活困难，极表同情。弟于兄之情况不甚明了，不知如何可以为助。倘于土改时能于兄有所裨益，或于乡里故交获得援手，则似以就近解决为上策，未知以为然否？”

5月5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转发华东局关于镇压反革命暴动及处理群众性骚动事件报告的指示稿。在指示稿说到群众性的非武装的抢粮骚动，我在场武装部队应首先竭力劝阻，如劝阻无

〔1〕宋庆龄，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1950年5月5日又任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主席。

效，则可对空中鸣枪驱散群众处，加写一句话：“绝对不可向群众开枪。”

5月7日 为中央军委情报部召开的全国军事情报会议和全国战略情报会议题词：“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同日 复电李富春：“五月二日的信收到。（一）同意你留在东北工作半个月，休息半个月即来京。（二）高岗同志至少要休息半个月。”

同日 复信文润泉〔1〕：“一月十六日来信收到，甚以为慰。唐家托现在尚有多少人，有饭吃否，十哥、十七哥〔2〕还在否，便时请你告我。文凯〔3〕先生宜在湖南就近解决工作问题，不宜远游，弟亦未便直接为他作介，尚乞谅之。运昌兄连来数信，已复一信寄白蚌口，不知他接到否？南松〔4〕兄第二次来信已收到，感谢他的好意。”

同日 复信文凯：“来信收读。先生工作问题，似宜就近设法解决。”

同日 复信王汝霖〔5〕：“一月三十一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征粮中出了许多弊病，政府已有令纠正，不知结果究竟如何，便时尚祈详举见告为盼！”

同日 复信张鼎〔6〕：“去年十月二十五日来信，又毛泽覃等照片，收到。感谢你的好意。入党事要在当地经过一定规章办理。”

〔1〕文润泉，毛泽东的表兄。

〔2〕十哥即文泮香，十七哥即文梅清，他们是毛泽东的表兄。

〔3〕文凯，毛泽东的表兄。

〔4〕南松，即文南松，毛泽东的表兄。

〔5〕王汝霖，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6〕张鼎，早年曾在毛泽东主办的湖南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学习。

同日 复信邓冰〔1〕：“去年十二月惠书敬悉，极为感谢。先生工作岗位，似以在原地为适宜，不必远游，未知以为然否？”

同日 复信余长茂〔2〕：“去年十二月惠书敬悉，甚为感谢。吾兄从事教育事业是很好的，尚望继续努力。”

同日 复信凌汉秋〔3〕：“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来信收到，甚为感谢。工作问题，请在当地设法解决，不要来北京，因京中人浮于事，不易解决。”

同日 复信庄严〔4〕：“去年十二月十日惠书敬悉，极为感谢。吾兄从事教育事业是很好的，希望继续努力。风便尚祈时示周行。”

同日 复信文士员〔5〕：“四月二十五日来信收到，极为感谢。吾兄从事教育工作极好，尚望努力进修，改进人民教育事业。”

同日 复信赵浦珠〔6〕：“惠书及大作收到敬悉，甚为感谢。乡间减租土改等事，弟因不悉具体情形，未便直接干与，请与当地人民政府诸同志妥为接洽，期得持平解决。风便尚祈时示周行。唐家托诸亲友并致问候之意。”

同日 复信粟济世〔7〕：“一月一日惠书敬悉，极为感谢。征粮弊病甚多，政府已有令纠正，未知实际效果如何？剿匪取宽大政策期收速效，根治则有待于土地制度之改革。先生如有所见，尚祈随时赐示为盼。”

〔1〕邓冰，当时在广东龙川景韩中学任教。

〔2〕余长茂，毛泽东青少年时的同学。当时在湖南平江任教。

〔3〕凌汉秋，当时在湖南株洲。

〔4〕庄严，毛泽东青少年时的同学。当时在湖南南县协安乡中心国民学校任教。

〔5〕文士员，毛泽东青少年时的同学。当时在长沙育群中学任教。

〔6〕赵浦珠，辛亥革命爆发后，曾同毛泽东在湖南的新军中共过事。

〔7〕粟济世，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同日 复信林谷生〔1〕：“三月十日来信收到。林蔚同志死事极可痛惜，将来自应与全国各地死难同志一同有所纪念。”

同日 复信周振岳〔2〕：“去年十月九日来信收到，甚慰。参加工作事尚望就近设法。”

同日 复信李鑫〔3〕：“去年十二月来信收到。工作问题，应在当地设法解决，不要来北京。”

同日 复信陈国生〔4〕：“来信收到，甚慰。望你们在湖南设法求得工作，不要来北京。乡间情形可来信告我。”

同日 复信毛贻华〔5〕：“三月九日来信收到。工作事尚望就近设法解决，我现在难于为助，尚祈鉴谅。”

5月8日 复信毛逸民〔6〕：“一月三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感谢你详细地将乡里情形告诉我。乡里贫苦人民生活困难，烈士家属更加困难，暂时只好忍耐一点，待土地改革后就可能好一些了，那时人民政府也可能给人民以一些帮助，例如贷款等，人民就可以逐步改善自己的生活。烈属的照顾是全国范围内的事，全国有几百万户烈属，都要照顾，自未便单独地特殊地照顾少数地方。但最困难的人民，当地人民政府在减租时土改时及青黄不接的岁月，应当尽可能给以照顾。你在乡里做工作，很好，可以常常来信，告我以乡中情形。请你替我问候乡里的同志们，希望大家努力和进步。”

〔1〕林谷生，革命烈士林蔚的哥哥。林蔚，原名林乔生，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1928年牺牲。

〔2〕周振岳，1925年曾受郭亮所派护送毛泽东由长沙去广州。

〔3〕李鑫，早年曾和毛泽东共过事。当时在江苏吴县务农。

〔4〕陈国生，毛泽东堂妹毛泽建的过继女儿。

〔5〕毛贻华，毛泽东的房叔。

〔6〕毛逸民，毛泽东的族叔。当时任中共湘潭第三区区委宣传委员。

同日 复信陈峰仙〔1〕：“去年十一月来信收到，极为欣慰。希望你努力进修，为人民事业继续工作。齐泰〔2〕情形不清楚，你可以写信去汉口第四野战军政治部询问或可得其梗概。”

同日 复信周芝麟〔3〕：“去年十二月惠书敬悉，甚为感谢。周玉麟同志死事望兄就近陈明湖南当局备案，便与全国英烈一体议恤。”

同日 复信李静蓉〔4〕：“去年十一月十三日来信收到，极为欣慰。在莫斯科时曾看见志成，情形是好的，大约不要很久可以毕业回国。你在湖南工作很好，如工作需要，不必来北京。”

同日 复信黄谱臣〔5〕：“一月二十四日来信收到，很高兴。兄在广西铁路方面工作，很好，希望你继续努力此项工作，不必往别处，也不必回乡。你的夫人是否仍是罗合楼〔6〕先生的次女，如是，请替我向她致问候之意。”

同日 复信龙亦飞〔7〕：“去年十月来信收到。王基永同志殉难，极为痛惜。兹幸遗孤成立，业已就学，为之喜慰。抚恤及帮助令郎等工作或学习事须与全国同类情形者同样办理，未便某处独异，请向当地党政陈明情形听候处理。”

同日 复信王云晓〔8〕：“去年十一月来信收到，有志上

〔1〕陈峰仙，李求实的妻子。当时在重庆大学做女生宿舍管理员。

〔2〕齐泰，即李齐泰，李求实和陈峰仙的儿子。当时在长春航空学校学习。

〔3〕周芝麟，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周玉麟，周芝麟的弟弟，早年参加革命，1928年牺牲。

〔4〕李静蓉，原名李灿英，郭亮的妻子。郭亮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1928年牺牲。志成，即郭志成，郭亮和李静蓉的儿子。

〔5〕黄谱臣，毛泽东的姻亲。

〔6〕罗合楼，毛泽东元配罗氏的父亲。

〔7〕龙亦飞，革命烈士王基永的妻子。

〔8〕王云晓，毛泽东青少年时的同学。

进极好。工作问题希望就近设法解决。”

同日 复信毛春轩〔1〕：“去年十二月来信业已收到，甚为感谢。浪秋、迪秋〔2〕诸位均宜在家工作，不要来北京，以免浪费时间。”

同日 复信郭建人〔3〕：“去年十一月来信收到。现在人民政府工作甚好，望于工作中加强学习，对于过去有所批判，以期日进有功。”

同日 复信刘庆勋〔4〕：“去年十月六日信及附件早已收到。吾兄从事工业技术是有益的，希望继续努力，为人民利益而服务。”

同日 复信刘致强〔5〕：“去年十一月来信及自传收到。关于过去历史，希望先生有所批判。工作以在现地为宜，不要来京。”

同日 复信黄滨〔6〕：“你的信收到了，谢谢你。你在宁乡工作甚好，希望你努力将工作做好。”又及：“江青向你致问候之意。”

同日 复信张四维〔7〕：“一月十六日来信收到。吾兄已在盐业公司获得职业，甚好，应就此项工作努力，取得成绩与信任，不要来北京。北京人浮于事，不好安置。前已复一信，未知收到否？”

同日 复信张一权〔8〕：“惠书敬悉，感谢你的好意。北京人浮于事，兄来不一定有好处，学习和工作，可就当地谋之，

〔1〕毛春轩，毛泽东的远房叔祖父。

〔2〕浪秋即毛浪秋，迪秋即毛迪秋，分别是毛春轩的儿子、侄子。

〔3〕郭建人，1925年参加韶山农民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脱党当时在湖南零陵县人民政府工作。

〔4〕刘庆勋，毛泽东青少年时的同学。

〔5〕刘致强，当时居住在贵阳。

〔6〕黄滨，原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

〔7〕张四维，大革命时期曾参加韶山农民运动。当时在中国盐业公司湖南省公司工作。

〔8〕张一权，毛泽东青少年时的同学。

未审以为然否？”

同日 复信王一凡〔1〕：“元旦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工作事以就近设法解决为好。”

同日 复信刘忠获〔2〕：“贵友娄先生〔3〕有志研究极好。惟来京一事由弟推荐颇有未便，希望他另想办法。”

5月10日 致电粟裕：“你的计划何时举行舟山群岛作战，准备工作如何？盼告。”

同日 复信易克燠〔4〕：“两次惠书均收到，甚感盛意。工作岗位已觅定否？总以就近解决为宜。教育法令尚多阙如，只能边做边像，故无从寄奉。”

同日 复信刘涤清：“来信收到，承以各地情况见告，极为感谢。如有所见，尚望随时告我为盼！”

同日 复信王砺初〔5〕：“惠书敬悉，甚感好意。所指工作中的缺点，正在注意纠正，吾兄倘有所见，尚祈随时示知。生活困难，极表同情，希望能就近获得解决。”

同日 复信方觉民〔6〕：“去年十二月来信收到，极为感谢。所指工作中的偏向，现正注意纠正，吾兄倘有所见，尚望随时示知。吾兄从事教育工作极为有益，尚祈按照新方向加以改造，福利人民。”

〔1〕王一凡，毛泽东青少年时的同学。

〔2〕刘忠获，大革命时期参加过北伐军。后到过延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乡村小学教师、校长。

〔3〕指娄伯平。当时在湖南一所中学工作。

〔4〕易克燠，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5〕王砺初，毛泽东青少年时的同学。

〔6〕方觉民，早年曾在毛泽东主办的湖南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学习。当时任湖南新化大复初级中学副校长。

同日 复信薛世纶〔1〕：“四月十九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吾兄从事教育工作极为有益，尚望加强进修，继续努力。风便尚祈时惠好音。”

同日 复信罗元燮〔2〕：“两函均收到。生活困难，极表同情，望在长沙等处设法获得适当解决。情况如何，尚盼示知。”

同日 复信曹直明〔3〕：“去年十二月来信并附件〔4〕收到，感谢你的好意。附件已付卫生部研究。”

5月11日 为转发中共北京市委摘报的一封来信，起草中央给华东局并转浙江省委等的批语：“接北京市委送来浙江工作同志张景鑫一信〔5〕，特转给你们。这种违反政策及命令主义的工作作风，是不能忍耐的，必须实事求是，彻底检查，切实纠正，并以结果报告中央。各省各县有同样情形的，必须检查纠正，并厉行整党整干，彻底纠偏。”

5月12日 致电邓子恢：“（一）土改法令起草情况如何，五月十五日是否可以送达中央。（二）请令湘、鄂、赣三省省委各派一个熟悉情况懂得政策的同志来中央参加土改会议，如省委书记不能来则派副书记或秘书长来，中南局亦需派一个适当的同志来。以上共四人，务于五月二十三日到达中央。（三）子恢同志自己准备于六月五日左右来中央参加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并参加中央最后决定土改法令草案之会议，何日动身，届时另电通知。”

〔1〕 薛世纶，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2〕 罗元燮，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3〕 曹直明，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4〕 指曹直明编著的《伤寒六经辨证类钞》。

〔5〕 这封信是由参加南下工作团在中共浙江省宁波地委工作的原清华大学学生鲍洁如写的，信中反映了该地区农村工作中的一些违法乱纪情况。该信由清华大学张景鑫转交北京市委。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湖南减租问题给中南局的电报稿，加写一句话：“目前春耕时期一切应以春耕为重心，减租斗争以不延误春耕为原则。”

同日 复电饶漱石并告邓子恢：“五月九日电悉。（一）刘瑞龙、谭启龙〔1〕可于五月二十日到中央。（二）陈丕显〔2〕可以不 来，但请叫陈丕显同志将苏南征粮偏差及纠正情况，春耕中食粮、种子、肥料等如何解决的及现在苏南春耕情况，苏南灾情及救济情况等三项问题，向中央作一有具体内容的较详细的报告用电报发来，以便答复黄炎培〔黄炎培报告苏南情况并陈补救办法之意见书，已送你处谅收到，请抄发陈丕显研究如材料不足，须经过调查研究，可于六月十日以前做好发来。特别注意调查川沙、南汇、奉贤三县情况。据黄炎培说，此三县有灾民二十万，征粮不但不减免，且要重征，以致三县农民种子没有，肥料不施，食粮不足，农民体力大减难于下田工作等语，是否属实，应派员详查，按照实事求是精神，有则说有，无则说无，是则是，非则非，逐一查明，并加分析具报。”

同日 致电谭政：“关于在四个月内复员五十三万到六十万人的问题，你们是否已经或正在召集会议讨论办法，结果如何，盼即详告。”

同日 复信文南松：“正月来信收到了，感谢你的好意。运昌兄给我多次信，我回了一信，寄南县白蚌口，不知他收到没有？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

〔1〕刘瑞龙，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农村工作委员会书记。谭启龙，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副书记兼省委办公厅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

〔2〕陈丕显，当时任苏南区党委书记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苏南军区政治委员。1952年3月任中共上海市委第四书记。

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十哥、十七哥还在否？十一哥健在甚慰，他有信来，我已回了一信，不知他收到否？你说乡里缺粮，政府不发，不知现在怎么样？还是缺粮吗？政府一点办法也没想吗？来信时请详为告我。”

同日 复信傅君实〔1〕：“来信收到。你是土改过程受打击的人，当此情况下，宜有以善处。生活困难，希望能就近获得适当解决。”

同日 复信谭辛震：“惠书敬悉，甚感盛意。京中人浮于事，先生工作以在当地就近设法解决为宜。”

同日 复信毛煦生：“来信收到。北京人浮于事，先生不宜远游，仍以在乡工作为适宜。毛紫奇先生之家属，祈代致问候之意。”

同日 复信毛爱桂〔2〕：“来信收到。令兄爱棠〔3〕于一九二七年参加北伐军，在广东曾见过一面，以后即未见过。有人说已牺牲了，极为可惜。这是为国牺牲，是光荣的。”

同日 复信毛泽益〔4〕：“来信收到。贻全〔5〕亡故，深致悼意。借款事我记不起了，大概是有的。兹寄上人民币〔6〕二百五十万元，以应急需。收到时请告知为盼。”

同日 复信叶健农〔7〕：“各次来函及电报均已收到。你热心研究新知识，很好。工作问题，如能在重庆获得解决，以在

〔1〕傅君实，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2〕毛爱桂，毛泽东的族叔。

〔3〕爱棠，即毛爱棠，毛泽东的堂叔，1927年在湖北武昌牺牲。

〔4〕毛泽益，毛泽东的房弟。

〔5〕贻全，即毛贻全，毛泽东的房叔，毛泽益的父亲，乡村教师。

〔6〕这里指旧人民币。1955年3月1日起在全国发行新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币一万元。

〔7〕叶健农，原名叶建隆，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重庆为好。如要来京，则请直向最高人民法院沈钧儒院长通信询问有无适宜工作，或先入短期学习机关加以学习然后参加工作。”

同日 复信毛远悌〔1〕：“两次来信都收到了，很高兴。你做印厂工作极好，应将此项工作做好，不要来北京。学习事将来有机会时再说。远翔〔2〕是否尚在革大，有一信请转交。远翔略历我忘记了，便时请告我。”毛泽东给毛远翔的复信如下：“两次来信收到，甚为高兴。你应在湖南设法求得工作，不要来北京，这里人浮于事，不好安置。你的文字已通顺，用力学习，当会有更大进益。”“你父母相片收到，请你替我问候他们。”

同日 复信周文楠〔3〕：“来信收到，甚慰。接你母亲去东北和你一道生活一事，我认为好的。我可以写信给湖南方面发给旅费。惟你母年高，一人在路上无人招扶是否安全，是否需要你自己去湖南接她同去东北方为妥当，请你考虑告我。如你自己去接，我给湖南的信即由你带去。附件〔4〕还你。江青她们都好。”六月十四日，致信王首道：“毛泽覃同志的岳母周老太太年已六十，住在湘潭韶山我的家里已有十余年，同当地人民的关系甚好，是一个好老人。她的女儿周文楠同志在沈阳法院工作，现回家去看老太太。老太太前有去东北依其女儿之意，但尚未作决定。如老太太去东北，请你考虑是否可以给以旅费的帮助。如可能，在通例上说得过去的话，则帮助之，如不可能，则要她仍住现地不动，请与文楠同志商酌办理。”之后，王首道给予了旅费的帮助。

〔1〕毛远悌，毛泽东的房侄。当时任湖南省总工会工农印刷厂经理。

〔2〕远翔，即毛远翔，毛泽东的房侄。当时在华中人民革命大学湖南分校学习。

〔3〕周文楠，原是毛泽覃的妻子。当时任沈阳市人民法院刑事庭庭长。

〔4〕指周陈轩写给女儿周文楠的信。信中叙述了她自己在湖南韶山一人生活、无人照顾等情况。

同日 复信邹赓鹏〔1〕：“去年十二月来信收到，甚为感谢。乡里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大家努力生产，会慢慢好起来的。泽民已去世，知注并闻。”

同日 复信游为善〔2〕：“去年十一月来信收到。有志学习新知识，为民立功，甚为钦佩。工作问题以在当地就近设法解决为好，不宜远游。”

5月13日 为转发邓小平五月十一日关于整风、春耕情况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上海市委等的批语，指出：“其中所说整风步骤，我们认为是正确的，请你们亦照此项步骤部署进行，即先整县委书记以上，再整广大干部。”邓小平的报告说：西南局确定整风对象着重于军队各级干部和地方三万左右的骨干，其中又以县以上干部为主。在步骤上，地方拟先由省、区党委集中县委书记以上干部整风，然后经过他们去领导三万人的整风。

同日 为转发陈毅五月十日关于上海打退四月危机的报告〔3〕，起草给邓子恢、叶剑英、邓小平、彭德怀、薄一波、高岗、彭真、黄敬的批语。批语指出：“上海打退四月危机的经验及目前采取的各项政策〔4〕，是各地大城市党委值得研究的，请将此

〔1〕邹赓鹏，早年在韶山开染坊，并经营药材、杂货，与毛泽东家有商务往来。

〔2〕游为善，毛泽东青少年时的同学。

〔3〕指陈毅1950年5月10日给毛泽东、中共中央和华东局的上海三月、四月综合报告。

〔4〕1950年3月和4月，上海社会秩序比较混乱，敌特活动表面化，税收、公债政策受到攻击，劳资关系紧张，人心浮动。这些情况以4月上旬为最紧张。上海市在解决上述问题稳定局势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他们的经验和采取的政策主要是：调整公私关系，实行公私兼顾政策；改善劳资关系，照顾双方利益；适当减少税收；救济失业工人；开展自我批评，纠正工作中的缺点，等等。

项报告转发各主要城市党委研究。”次日，复电陈毅并告饶漱石：

“（一）五月十日报告收到，甚好甚慰。所取方针是正确的二（二）六月征税减少一千亿的问题，待研究后由陈、薄〔1〕答复你。

（三）我们决定六月中旬召开政协全国委员会通过土改法令并讨论调整工商业问题，你不是全国委员会委员，但有些问题须事先和你商量，请你于六月一日来中央一次，留两三天，即可回去。如果你觉得马上来为好，亦可以马上就来。如何，盼复。”

5月14日 为转发中共云南省委关于严禁村政权浪费的指示，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村经费支用浪费是一极严重现象，云南省委发了严禁指示，西南局已通知所属遵行。望各地检查此事，按照情况采行为盼。”

同日 致电邓子恢：“为讨论土改及其他问题，请你于六月一日来中央开会，如何盼复。”

同日 复电彭德怀：“五月二日来电早已收到，兹复如下：（一）同意西宁至黄河沿的修路建仓计划及所需经费。（二）同意修筑张掖至西宁的短程公路。（三）同意修理西宁飞机场及玉树着陆场。”

5月15日 致信黄炎培：“粮税事，我告陈、薄后，已有复信〔2〕，兹付上请阅。如有意见，请再告。原件尊处可抄存，后还我。”

同日 复信毛宇居：“迭接数函，极为感谢。乡间情形，尚

〔1〕陈、薄，指陈云、薄一波。

〔2〕陈云在1950年5月9日致信毛泽东，就黄炎培向毛泽东反映的华东公粮和上海税收任务过重及实行合理负担不够好等问题作出说明：华东公粮任务比之老区不能说重，在执行合理负担政策方面还比较稳当。但上海现在的税收计划，比中央分配数稍大一些。我们已告上海，将加派数字减去；中央分配数字仅为估算，不应认为是固定任务。

望随时示知。邹普勋（亨二）〔1〕如十分困难，病情又重时，如兄手中宽裕时，请酌为接济若干，容后由弟归还。另纸请交邹普勋为祷。”毛泽东给邹普勋的复信如下：“五月七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贵体渐愈，甚慰。尚望好生保养。你家里人口多少，生活困难至何种程度，你自己还能劳动否，便时尚望告我。”

同日 复信张伯任〔2〕：“去年八月二十五日惠书敬悉，极为感谢，迟复为歉。工作事以在就近设法为宜。现况如何，便时尚希见示。”

5月16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西北局五月十三日关于甘肃工作的指示，起草中央给华东局、中南局、西南局、华北局的批语：“兹将西北局关于甘肃工作的指示转给你们，这是一种很值得注意的情况，西北局对此采取了正确的对策。请你们注视自己区域情况的发展，并及时采取适当对策为盼。”西北局的指示说：最近甘肃平凉、海原、固原〔3〕、皋兰等地连续发生群众性骚乱、匪特阴谋暴动事件。为扭转混乱局势，请甘肃省委迅速坚决执行下列六条要求：（一）省委即与野司商量，分派负责干部，配备必要兵力，到已经发生事故和可能发生事故的各地区协助工作，召集有各族、各界中上层代表人物参加的协商会议，商讨对已发生和可能发生的事件的解决办法；（二）组织起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参加的协商委员会，任用少数民族人士做工作；（三）拟订在全区内同敌特阴谋武装叛乱作斗争的通盘计划；（四）调集优势兵力，彻底消灭继续顽抗的匪特武装力量；（五）目前甘肃工作仍以全力清匪，肃特，团结各族人民，深入群众工作，安定社会秩序和恢复生产为基本方针，今年是否实行土改须慎重考虑；

〔1〕邹普勋，小名亨二，毛泽东少年时的私塾同学和邻居。

〔2〕张伯任，毛泽东青少年时的同学。

〔3〕海原、固原，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

(六)抓紧整训干部,严格检查干部作风,纠正政策执行中的偏差。

同日 复信周容〔1〕：“去年八月惠书敬悉,甚感盛意,迟复为歉。组织问题〔2〕,未便率尔介绍,应就当地有所表现,向当地组织请求,听候解决。”

同日 复信周起鸮〔3〕：“去年十月来信收到,甚为感谢。菊年现名周文楠,在沈阳人民法院工作。先生仍以在现地工作为好,虽不适意,犹胜于失业者,尚希安心从事,然后徐图改进。”

同日 复信朱琨〔4〕：“去年八月来信收到,甚为感谢。有志学习甚好,宜就当地设法入学,不必远游,未知以为然否?”

5月18日 为转发粟裕关于占领舟山群岛后的处置意见,起草中央军委给广东军区、第十五兵团并告中南军区的批语：“据粟裕同志五月十六日致七兵团关于占领舟山群岛后的处置称：‘所有各岛敌之机场、码头、仓库、军营及各种交通、各种建筑设备,应妥为全部看管。特别敌海岸前沿阵地工事,副防御设备,及纵深要点工事,应指派专门部队警备看管,不准破坏。发现群众乘隙拆毁破坏各种建筑设备,应予以防范制止,并动员说服服从我军各项规定。至匪军侵犯群众利益,搬用木料砖石,修筑工事等,亦需说服他们〔5〕,暂时忍耐,待秩序恢复,经我军许可后,再作处理’等语,我们认为这一处置是正确的。海南岛、广东海中的各岛及沿海岸线亦应照此处置。过去你们是如何处理的,望告。”

〔1〕周容,又名周赞襄,1920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与毛泽东相识。

〔2〕指周容请求毛泽东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事。

〔3〕周起鸮,周文楠的侄子。

〔4〕朱琨,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小教书时的学生。

〔5〕这里指说服舟山群岛上的群众在人民解放军占领该岛后,暂不拆毁原国民党军修筑的工事,收回自己的木料砖石。

5月19日 关于军队整编复员由中央复员委员会统一处理问题，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张宗逊、甘泗淇并告华东、中南、西南、东北各军区负责人的指示，指出：“军队整编复员问题，中央已组成一委员会，周恩来同志为主任，聂荣臻同志为副主任，统一处理复员人数、时间、回家生产补助费、地方欢迎安置等项问题。西北方面应统一办理。集训一周到半月，时间太短，发半个月至三个月经费问题，亦尚须考虑，容后电告。”

同日 致信黄炎培：“兹收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同志报告（1）一件送上请察阅，阅后请予掷还为荷。”本日，致电陈丕显：“（一）删辰（2）报告收到，谢谢你，并已转给黄炎培看，使他明了情形。（二）仍请你对川沙、南汇、奉贤三县情况派专人去（或你自己去）作一次调查，对于黄炎培所说因征粮引起农民无力耕种等项作一切合情况的答复。”

同日 复信丁张秀清（3）：“去冬承惠珍品，极为感谢。兹有薄物数事（4）奉上，尚祈晒纳为幸。”

同日 阅齐长庚（5）来信，在信上批示：“齐先生：请持此件去最高人民法院沈院长处一询，如无办法则去统一战线部李

（1）指苏南区党委1950年5月15日给毛泽东的三月、四月综合报告。报告谈到苏南各城市近期出现的物资滞销、生产缩减、不少私营工商业歇业、大量工人失业的情况和采取的对策，还谈到为帮助苏南农村40多万灾民解决口粮、种子、肥料问题所采取的措施。

（2）删辰，即15日辰时。

（3）丁张秀清，北京市居民。1949年10月1日她参加开国大典游行后，怀着感恩心情，剪下自己养的兔子毛，织成一条围巾和一双手套，敬献毛泽东主席。

（4）指两只火腿、两只板鸭和一大包海米。

（5）齐长庚，齐白石的侄孙，1949年秋毕业于法律专业。当时写信给毛泽东请求帮助解决就学问题。

维汉部长处一询，或可获得解决。”同时批送沈钧儒、李维汉：“请对齐长庚先生所提就学问题给予帮助，如有法律学校则进法校，否则进人民革命大学亦可，是否可行，请面告齐先生。”

同日 阅邓华五月十七日关于帆船对敌舰作战情况给中央军委并四野司令部的报告。报告中说的是第十五兵团第四十三军某部的三只小帆船（四五十人）同三四艘敌舰作战的英勇事迹。毛泽东批示：“转三野并抄送海司〔1〕：这是人民海军的首次英勇战绩，应予学习和表扬。”

5月20日 就财经工作致电饶漱石并告邓子恢、邓小平、彭德怀、高岗：“你托廖鲁言带回的口头意见已收到，都是对的。其中说中央及中财委的政策方案都是正确的，但中央的业务机关分配给地方的具体任务与工作布置有很多太重行不通，是指一些什么事，请列举具体内容电告以便纠正。”“嗣后凡有中央业务机关规定任务方案在地方上窒碍难行者，请各区负责同志一经发现立即电告以便改正。”“各中央局主要负责同志必须亲自抓紧财政金融经济工作，各中央局会议必须经常讨论财经工作，不得以为只是财经业务机关的工作而稍有放松，各分局、大市委、省委、区党委亦是如此。中央政治局现在几乎每次会议都要讨论财经工作。”

同日 阅沈阳市人民政府关于铸毛泽东铜像给新闻摄影局的公函，批示：“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并在来函中“修建开国纪念塔”处批注“这是可以的”；在“铸毛主席铜像”处批注“只有讽刺意义”。

同日 接受印度首任驻中国大使潘尼迦递交国书。致答词说：中印两国，国境毗连，在历史及文化上均有悠久而密切的关

〔1〕海司，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的简称。

系，近世纪来，又都为挣脱自己民族的厄运，进行过长期而勇敢的斗争。存在于贵我两国人民间的了解、同情与关怀是深切的。现在中印两国正式外交关系的建立，不但将使已存在于两国人民间的友谊日益发展与巩固，而且与此而俱来的亚洲两大国家人民的真诚合作，必将大有助于亚洲与世界的持久和平。

同日 主持召开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常委会已经好久没有开会了，以后不管有无问题，要定期开。我提议至少每月开一次，作为一条法规定下来。全委会开会，政府委员会委员不是全委会委员的，一个办法是站在门外看，另一个办法是出席会议，而且有表决权，旁听列席是不大好的。另外，是否邀请些人列席全委会？起义人员、少数民族、文教、工商等各方面提些代表列席，可以发言，没有表决权。这样各方面的人都有，就可以听各方面的意见。军事、财政、经济、文教、土改、政治等整个情况让大家了解一下，讨论出一致办法，就会统一意志，就能加强团结。另外，应该欢迎各方面多提出一些议案，把政府工作者的毛病，人民不欢喜的事情都提出来，正确的就采纳，不正确的就解释。全委会要作成一些决议，交中央人民政府考虑采纳。

5月21日 阅海军司令部关于建议成立华南海军司令部的请示报告，批示聂荣臻：“嗣后凡军委所属各部门如海、空、炮、工、坦克等，有所呈请均须先经你审议提出意见交我核定。目前这种状况，应予改变。”

同日 复信毛桂昌〔1〕：“数次来信，均已收到，感谢你的好意。你家生活，应在土地改革中听候当地人民政府酌量分配土地，从努力生产中求得解决。”

〔1〕毛桂昌，毛泽东的房叔，大革命时期曾参加韶山农民运动。

同日 复信熊筱蠹〔1〕：“三月来信收到，极感好意。尊著经验谈，已付此间医务机关研究。”

5月22日 复信黎锦熙〔2〕：“五月十七日惠书敬悉。所提大辞典处各点〔3〕均可同意。并和胡乔木同志说了，他也同意。请用电话和胡同志接洽为荷。”

5月24日 就指导全党整风运动问题致信胡乔木：全党整风运动即将开始，这件事已成当前一切工作向前推进的中心环节。这一环节不解决，各项工作便不能顺利地向前推进了。中央已指定了一个三人委员会，你为主任，负责审查各地整风文电并起草复电；尔后则负责注意这个运动的发展，替中央起草指导文电，并注意报纸刊物的报道和指导。各地整风指示文件均须经中央审查，已到者请你即于两三日内总阅一遍，邀集安子文、萧华〔4〕谈一下，逐一起草复电，或者还须总复一电。

同日 就给陈明仁、张轸〔5〕部补充兵员问题，为中央军委起草复邓子恢、谭政、陶铸并告林彪电：“五月二十二日电悉。你们补充陈明仁的计划是好的，张轸亦须予以补充，表示一视同仁。”**同日** 阅关于西藏代表将于六月四日抵达香港的来电，批送周恩来：“西藏代表必须来京谈判，不要在港谈判，请加注意。”

〔1〕熊筱蠹，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曾去日本学医。

〔2〕黎锦熙，语言学家。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教师。当时任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总主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

〔3〕指黎锦熙在来信中提出的关于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机构归属、人员编制以及辞书编辑事业应合理发展等方面的意见。

〔4〕萧华，当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1951年12月又任中央一级机关总党委第四书记兼中央军委总党委第一书记。1952年又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

〔5〕张轸，国民党军起义将领。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1军军长。

同日 阅章士钊〔1〕关于荐用李悦〔2〕的来信和李悦的自传，批示：“请周酌办。章士钊只荐此一人，似宜用之。”又在李悦自传上批示：“李自谓已六十六岁，有妻室之累，无儿可依，觉悟前非，力图晚盖，精力尚能做事，希望给予一工作。”

5月25日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今天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对社会是需要的，有利的。私营工商业统统要拿到政府的翅膀之下来，是有理由的，因为适应了人民的需要，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当然，资本家要拿走一部分利润，那是必需的。私营工商业是会长期存在的，我们不可能很快实行社会主义。现在我们有广大的国营工商业，需要把这些企业搞好。要有所不同，一视同仁。有所不同者，是国营占领导地位，是进步的，把位置反转过来是不行的，因为私营工商业比较落后，这一点必须公开说明，我曾同几个资本家说过。其他则一般的应当一视同仁，如收购、采办、出口以及市场。在私人工厂中，也可以有模范工作者和劳动英雄，也应当有生产竞赛。总的说来，这种政策对于国家和人民是有利的，这个利是超过对资本家的利益。裁员问题、失业救济问题，都应该是一样的，一视同仁，或者如陈云同志所说的“不分厚薄”。这个精神在《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3〕中已经有了，即统筹兼顾。

同日 阅湖南衡山县县长高怀亨五月十七日给中央人民政府

〔1〕 章士钊，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1951年7月又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1〕 李悦，曾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次长。1955年2月任湖北省政协常委。

〔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2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

的报告。报告对符定一（1）（原籍衡山县）在给高怀亨的四次信中对农村减租退押问题所持的态度，提出了批评意见。毛泽东批示：“送周总理、李维汉部长、林老（2）阅，请统战部考虑是否应将衡山县来件送符定一先生一阅，并告诉他他去信中有些话写得 不妥。”六月一日，致信李维汉：“因衡山县长要回信，请用统战部名义回衡山一信，说明与符谈话情形，并指出衡山县长的立场是正确的。但退押事可以不提了，因湖南现已停止退押，符也没有钱可退，他现在确实很穷。”

5月26日 致电颜惠庆（3）家属：“颜惠庆先生因病逝世，无任悼念，特电致唁。”

5月27日 就整党整干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分别给华东局、西南局、华南分局并中南局、西北局等的复电，同意他们关于整党工作的指示。在给西北局的复电中还指出：“惟你们所列学习文件有几种太长，只应摘出其中有关当前急需的一部分 而不应该读全文，因读全文将反而减少效力，’并且在时间上也不可能。”

同日 致信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胡乔木：“各地整党指示都有严格的时间性，复电各件请即阅即发。如来不及看来件，看复电即可。各地来件都是可行的。”

同日 致信刘亚南（4）：“兹有湘乡四都凤音乡大平坳文氏兄弟四人来信，付上请你看一下。他们对当地区乡政府的工作

（1）符定一，文字学家。辛亥革命后在湖南全省高级中学后改名湖南省立第一中学）任校长时，毛泽东在该校读过书。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1951年7月又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2）指林伯渠。

（3）颜惠庆，外交家。当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

（4）刘亚南，当时任湖南湘乡县县长。

有些不满意的话，未知实际情形究竟如何。假如可能的话，请你派一个同志去调查一下，以其结果告我。文氏兄弟都是贫农，信上则替地富说话，是何原因，亦请查明告我。至于文家（我的舅家）生活困难要求救济一节，只能从减租和土改中照一般农民那样去解决，不能给以特殊救济，以免引起一般人民不满。”

5月2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北局电：“同意你们五月二十八日关于执行中央整党整干指示的决定。惟文件内凡将整风整干四字连在一起时，整风之风字改为党字。”

同日 阅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一九五〇年新解放区夏征公粮的决定，批送周恩来：“此两件你是否看过？其中未规定不许各级层层摊派负担，并且说‘各大区提意见报中财部备案即可’，是否又有层层加重的危险？是否有去一电叫各地不要层层加重之必要，请酌办。”

同日 阅聂荣臻本日报送的准备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作的军事报告的大纲。大纲说：今年四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为了适应整个国家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情况，人民解放军在今年夏秋间应实行整编，由现在的五百三十万人，整编成为四百万人。四百万人的编制原则是：为了建设空、海军，开办新的学校，和海空系统的编制均由各大军区数目内拨出等，其人数须较原来确定的略为增加，而将原来规定各大军区的数目略为减少。陆军统编为国防军和公安部队两种。今后的国防军，以军为指挥单位，各军直属各大军区，兵团和野战军机构，除参加攻台部队外其余均撤销。毛泽东批示：“同意各项原则，即可照此拟定编制表。”

5月29日 阅中共中央西南局五月二十七日报送中央审查

的同西藏谈判的十项条件，批示李维汉：“除第八条〔1〕应加‘西藏领导人员’数字外，均可同意。请你起草复电。”

同日 批示杨尚昆：“土地改革法草案请于今日先印样张，送我校阅，然后付印。”

同日 就召开第一次高等教育会议，同教育部负责人谈高等教育工作。毛泽东说：现在文化教育领域中的进步力量还小，马列主义的力量比起资本主义的力量来要小得多。旧式学校是资本主义的，我们的新式学校要办成社会主义的。教育要改革，要变，但是不要急，要有步骤地变，一个时期可以少变一点。许多人怕改得快，改得多，这主要是怕丢饭碗。教育改革要同整个社会的变革配合好。几十万知识分子失业必须救济，一百万失业工人也必须救济。教会学校的政治课和宗教课都搞选修课。政治课暂时维持原状，实际上放松一点。我们在这方面发动攻势要谨慎，不要使自己陷于被动。社会在进步，失业问题得到解决，教育的改革就可以更大些。

5月30日 致信安子文：三中全会因时间关系，党的组织问题及整党问题不可能有专题报告，希望你准备一个半小时左右的发言，将已发的《关于发展与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的要点讲一下，会后择其可发表者写成一篇文章公开发表。

5月 为《北大周刊》纪念“五四”题词：“祝贺‘五四’三十一周年，团结起来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6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为国际儿童节的题词：“庆祝儿童节”。

〔1〕第8条原文是：“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采取协商方式加以解决。”毛泽东在“由西藏人民”之后加上“及西藏领导人员”7个字。

6月2日 复电中共中央华北局：“五月三十一日报告收到。我认为你们现在所取调整工商业和改善公私关系的政策是正确的，望照此执行。”华北局的报告针对华北工商业不景气的情况和原因，提出六条对策：第一，使干部透彻了解四个朋友必须合作、五种经济必须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统筹办理的道理，纠正“左”倾情绪。第二，消除私人工商业者的思想顾虑，重申政府稳定物价政策，不使物价暴涨暴跌。第三，要划分经营范围。国营贸易除了有关国计民生的粮、煤、油和生产工具等主要物质必须掌握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外，其他商品应让给私人经营。第四，对私人工商业须有专门组织机构来领导。第五，教育工人无论在公私企业中都要把维护、发展生产当成自己的责任；对经济工作干部要加强政策教育，以保证正确地执行党的经济政策。第六，提议除重工业和规模宏大的轻工业应归中央直接经营外，其余国营工业委托省营。

同日 复电中共中央中南局：“五月二十五日子恢同志关于三、四两月的报告收到。我认为你们所取调整工商业、改善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及其他工作方针是正确的。”邓子恢的报告中提到的城市工作的方针和办法是：（一）减轻负担。（二）调整公私关系。（三）确实保证交易自由，取消议价办法。（四）改善劳资关系。（五）办理失业救济，主要是以工代赈。（六）用一切办法制止物价下跌。（七）逐渐做到有计划的生产。

6月4日 复信刘少奇：“此件〔1〕看过，很好，很有用。有些修改，请再酌。说富农的部分长了，反而不清楚，有些则说得不大适当，故删去一大部。加上一九四六年以后一段经验，借

〔1〕指刘少奇准备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作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的草稿。

以纠正一部分同志已经有了的一种错觉，说过去的‘左’倾错误是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土地法大纲》上规定了没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原故。如果没有这段说明，则不能纠正此种错觉。所谓生产力，是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亦称生产手段）两部分。所谓生产资料，在农村中，首先是土地，其次是农具、牲畜、房屋〔1〕等。粮食是农民利用生产资料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我们将从地主手里没收的粮食亦和其他被没收的东西列在一起称为生产资料也是可以的，因为这种粮食具有资金的性质。所谓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对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即财产的所有权关系。生产资料的使用，例如农民使用（租用）地主的土地，只是地主对于土地的所有关系的结果，这种所有关系表现为佃农对地主的隶属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即是生产关系。过去许多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二元论（甚至是多元论）的错误，将生产关系和使用关系并列，又将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并列，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把问题弄得很糊涂，划错了许多人的阶级成分。曾于一九四七年冬季叫乔木〔2〕写了一个文件，题为《中国各社会阶级及其待遇的规定》〔3〕，其前面两章是我写的，说明了这个问题，可以参看。”对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草稿的修改主要有：在报告谈到过去地主阶级造成的历史罪恶之处，加写：“除对极少数犯了重大罪行的地主，即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及坚决反抗土地改革的犯罪分子，应由法庭判处死刑或徒刑而外，对于一般地主只是废除他们的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废除他们这一个社会阶级，而

〔1〕这里的“房屋”指作为生产资料的房屋。作为人们生活用房的房屋，毛泽东把它列入生活资料。

〔2〕乔木，即胡乔木。

〔3〕这个文件的全称是《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

不是要消灭他们的肉体。”在报告谈到保存富农经济部分，加写一九四六年以后一段经验：“在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十月这一时期内，华北、山东及东北许多地区的农民群众和我们的农村工作人员，在实施土地改革中，没有能够按照中共中央在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颁发的基本上不动富农土地财产的指示，而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行动，将富农的土地财产和地主一样地没收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一时期，是中国人民和国民党反动派双方斗争最紧张最残酷的时期。土地改革中发生偏差，也以这一时期为最多，侵犯了一部分中农的利益，破坏了一部分农村中的工商业，并在一些地方发生了乱打乱杀的现象。发生这些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当时紧张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同时，也由于我们的大多数农村工作人员没有土地改革的经验，他们不知道正确地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方法，划错了一部分人的阶级成分，将某些富农当成了地主，将某些中农当成了富农。鉴于此种情况，中共中央乃于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颁发了《土地法大纲》，将富农和地主加以区别，但允许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同年冬季，中共中央颁发了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文件，毛主席发表了《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1〕的文告，任弼时同志也发表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演说。从这时起，农村中发生的某些混乱现象就停止了，土地改革走上了正轨。为了使我们的同志今后在各新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中不要重复过去的错误，指出过去的经验是有必要的。我们现在是处在完全新的情况下，我们建议的土地改革法，采取了消灭封建制度保存富农经济的方针，也是完全必要的。”

6月6日—9日 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究财政经济形势，确定中国共产党在

〔1〕即《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任务。

6月6日 向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交《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并作《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书面报告指出：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要争取这三个条件，大约需要三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为了实现整个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报告提出要做好八项工作：（一）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二）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三）人民解放军在一九五〇年复员一部分，保存主力。（四）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五）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以及灾民的救济工作。（六）认真地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克服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和迁就主义倾向。（七）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八）坚决地执行中央关于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关于加强党和人民群众联系、关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关于全党整风等各项指示。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解释了书面报告的战略策略思想，指出：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

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

同日 致信黄炎培：“兹有《整党文件》一本，送上一阅，可以了解情况。先生如有意见，希予示知。原件阅后请还我。”

6月7日 致信黄炎培：“介绍陈丕显同志和先生一谈。他是中共苏南区党委书记，是苏南方面的主要负责人，上次我给先生看的那份报告就是他写的。先生给我的意见书一个月前就寄给陈同志看了，他表示对先生致谢意，但认为有些与事实未尽符合，谈时请详询之。”十三日，黄炎培致信毛泽东说：承介见陈丕显同志，专谈了三个半天。

6月9日 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作总结报告。毛泽东说：七届二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胜利。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是中国从古未有的大胜利，也是一个带世界性的大胜利。当然，在我们的工作中是有些缺点、有些错误的。这次会议只是集中了几个问题，检讨了我们的缺点和错误。今年的整风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我们要谨慎地对待统一战线工作。要向干部说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是必要的。统一战线工作在少数民族工作中间的确很重要。全国有几千万兄弟民族，这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条件不成熟是不能进行的，进行会出毛病。关于土改问题，毛泽东在回顾了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的历史后指出：那时候情况很紧张，应该团结绝大多数人，这个道理也对。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现在战争停了，我们又决定不动富农。那时候，就是要动富农，不动富农，那是不可设想的事情。苏联也有过这样的情形。他们搞军事共产主义，对富农不准备搞的，后来因为敌人进攻得很厉害，资本家对他们的态度也

不好，才对富农从各方面直接没收。苏联搞新经济政策，废除军事共产主义，是在战争停了以后。我们现在也是在战争停了以后，才不动富农。北方战争早已停了，所以去年土改缓和得多了。现在在全国除了台湾、西藏尚待解放，战争都停了，因此给了我们一个可能，对富农可以现在不去搞他。

6月上旬 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期间，对粟裕建议由中央派刘伯承或林彪主持台湾战役一事，决定解放台湾之战仍由粟裕指挥。

6月11日 审阅修改陈云准备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作的关于经济形势和调整措施的报告稿，加写两段话：“有些人提议由政府制订投资条例或公司法，我们认为有此必要，现正在起草中。”“最近三个月来，中央劳动部召集了一次各省、市的劳动局长会议，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召集了一次各大城市的工商局长会议，中央财政部召集了一次各大城市的税务局长会议，详尽地讨论了有关劳资关系、调整工商业和调整税收诸问题。这三次会议均有私人工商业代表参加。我现在报告的，大都是这些会议的共同意见和结论。”

6月12日 审定《中共中央关于日本情势的声明》稿，将最后一段话改写为：“自有共产主义运动以来的历史，特别是世界第二次大战以来的历史，都是和历来的反动派，和各国帝国主义，和现在的美国帝国主义的一切妄想背道而驰。反动派的历史都是失败的历史，革命人民的历史都是胜利的历史。反动派有时也显得很猖獗，取得一些镇压人民的‘胜利’，但最后无不失败。革命人民有时也会遭受一些挫折，但最后无不胜利。全世界的历史都是这样写的，无一例外。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就是最近的证据。”

同日 复信陈铭枢：“尊著〔1〕略读，未能详研，不敢提出意见。惟觉其中若干观点似有斟酌之必要，便时再与先生商略。存放甚久，迟复为歉。”

6月14日 下午，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并致开会词。毛泽东说：土地改革问题为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自然，其他各项报告都是重要的，凡有意见都可发表，凡有提案都可付审议，只要能行者都应采纳。我们有伟大而正确的《共同纲领》以为检查工作讨论问题的准则。《共同纲领》必须充分地付之实行，这是我们国家现时的根本大法。我国的一切人民事业均正在循着新的轨道向前发展，每天都可看见进步，看见成绩，任何困难都不能阻止人民事业的前进。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及其选出的全国委员会，是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界民主人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组织，在全国人民中有很高的威信。我们必须巩固这种团结，巩固我们的统一战线，领导全国人民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6月15日 审阅修改聂荣臻准备向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作的军事报告稿，加写四段话：“在这个时期〔2〕内，原在对方的许多爱国军人率部起义，参加了人民解放军的行列。这对于迅速地瓦解敌军及较好地维持地方秩序，是起了作用的。”“若从去年四月二十一日人民解放军开始渡江作战之日算起至今年五月为止，则歼敌数为正规军一百八十三万人，非正规军及土匪九十八万人，共计二百八十一万人。”“华东、中南、西南三区还没有详细的报告来。这三区荒地较少，军队垦荒不多，但种菜养猪等工作则已在普遍地进行。西南区的人民解放军因剿匪还是严重

〔1〕指陈铭枢论佛法书。

〔2〕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作报告时这一段时间。

任务，其生产任务今年尚不能过多。”“为此目的〔1〕，人民解放军的各部分，包括起义部队在内，必须巩固地团结起来。全军必须维持良好的纪律，改善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全军应在今年复员工作做好之后，从今年冬季开始，来一次从上至下的整风运动，克服一切不良现象。必须教导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不要骄傲自满，不要以功臣自居，不要看不起起义部队和地方部队，而要谦虚谨慎，耐劳耐苦，对敌人很勇敢，对同志对人民则很和气，借以团结全军全民完成自己光荣伟大的任务。”修改报告稿后于晨一时批送周恩来：“此件请于十五日上午付印，下午即发给全委到会人。”

6月16日 阅中南军区陶铸等六月十日给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报告和中南军区党委关于部队整党工作指示。报告说：七月开始中南军区全军整风，特将指示报中央审查，请早日批准。毛泽东为总政治部起草转发这个指示的批语和复陶铸等的信。批语如下：“发给各军区党委参考。中南军区既能够一面办理复员工作，一面进行整党，则其他军区亦可照此进行，不必等到秋后。”复信说：同意六月十日关于部队整党工作指示。

6月18日 复信谭祖尧〔2〕：“来信收到。请持此信与中共中央统一战线部接洽，看是否有适当的工作，或短期性的学习机会。来信已付统战部。”同时在谭祖尧恳求给以工作和学习机会的来信上批示：“请统战部酌办。”

6月19日 复信宋庆龄：“宋副主席：两次来信及附件均收到了，又承惠赠珍物，谨致谢意。”

〔1〕指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提高一步，发展空军、海军和其他技术兵种的建设，足以对付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行为，有效地保卫国家的安全，巩固国际的和平事业。

〔2〕谭祖尧，毛泽东青少年时的同学。

同日 复信马叙伦：“另件奉还。此事宜速解决，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营养不足，宜酌增经费。学习和开会的时间宜大减。病人应有特殊待遇。全国一切学校都应如此。高教会已开过，中小两级宜各开一次。以上请考虑酌办。”

6月23日 主持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闭幕会，并致闭幕词。毛泽东说：“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战争一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这一关我们大家都过得很好，全国人民是满意的。现在是要过土改一关，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和过战争关一样也过得很好。”“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只要人们在革命战争中，在革命的土地制度改革中有了贡献，又在今后多年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有所贡献，等到将来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的时候（这种时候还在很远的将来）人民是不会把他们忘记的，他们的前途是光明的。”“要达到巩固革命统一战线的目的，必须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采取这种方法时所用的标准，主要是我们现时的根本大法即《共同纲领》。”“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人说来是用专政的方法，就是说在必要的时期内，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们成为新人。对人民说来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说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们做这样做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这种教育工作是人民内部的自我

教育工作，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

6月25日 朝鲜战争爆发。二十七日，美国决定派出海军和空军入侵朝鲜领海、领空，进攻朝鲜人民军。同时命令第七舰队向台湾海峡出动，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既定部署。三十日，又命令美国陆军在朝鲜参战。

6月27日 复信张峻明〔1〕：“六月二十日来信收到，甚为感谢。反映各种情况，极为高兴。湖南现正开始干部整风，几个月后，某些缺点或可改正，但究竟如何，还要看整风教育是否得力。乡间情形如有所见，尚祈随时示知为盼。”

6月28日 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周恩来作关于目前国际形势和他就美国总统杜鲁门声明〔2〕所发表的声明的报告。毛泽东讲话，强调指出：中国人民早已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杜鲁门在今年一月五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时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美国这样地暴露了自己的帝国主义面目，这对于中国和亚洲人民很有利益。美国对朝鲜、菲律宾、越南等国内政的干涉，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全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都将站在被侵略者方面，而决不会站在美帝国主义方面。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在刘少奇作关于土地

〔1〕张峻明，毛泽东的同学张超的侄子，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担任主事期间同他有过接触。

〔2〕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美国政府决定以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美国第七舰队随即奉命向台湾沿海出动。

改革法的报告后，毛泽东说：在土改法颁布之后，如关于农民协会、人民法庭以及划阶级等问题，都须要有些文件来作说明。除了刘少奇副主席的报告可以当作说明书之外，各大行政区也还须要做出关于土改的实施步骤的说明，这是应当做的一个工作。

6月29日 就《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致信刘少奇：“资本主义国家，只有法国在拿破仑第一〔1〕时代及其以前比较彻底地分配了土地。英国是经过资本主义侵入农村破坏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并不是我们这样的土地改革。德国、意大利大体也是如此，但比英国还不彻底，还保存了许多封建遗踪。日本则封建的土地制一直严重地存在，直至日本投降后才由美国人进行一种极不彻底的‘土地改革’，现在仍有严重的封建主义。美国则从来没有封建主义，由欧洲移民进去一开始就生长资本主义的农业，故农村市场特别广大。只有林肯〔2〕时代解放美国南部几州的农奴〔3〕，是一种反奴隶制的斗争。各国历史既如此复杂，大都和我国现在这样先进行土改，后发展工业的情况不相同，故以不写国际历史一段为宜。国际历史和中国相同者，只有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

6月 应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转达的全校师生的请求，为清华大学题写校徽，一连写了六个，并说明“右下草书似较好些”。

7月1日 阅周邦式〔4〕六月十六日来信，批示李维汉：

〔1〕拿破仑第一，即拿破仑波拿巴，是法兰西共和国第一执政、法兰西第一帝国和“百日王朝”的皇帝。

〔2〕林肯，美国第16任总统。他主张维护联邦统一，逐步废除奴隶制度，在1862年颁布了解放黑奴的《解放宣言》。

〔3〕这里的“农奴”应为“奴隶”。

〔4〕周邦式，字长宪，五四运动前后曾与毛泽东等组织读书会。当时在重庆女子师范学院任教。

“周长宪，北大毕业，教了三十年书，政治背景不详，看其来信，似不太坏的人，要求来京就业或学习。是否可以许其入革大学习，请查告。”

7月6日 致电粟裕并告陈毅、饶漱石：“现有重要任务委托粟裕同志执行，请粟裕于七月十六日前将三野事务处理完毕，于七月十八日来到北京接受任务，粟来时可随带秘书及参谋人员数人。”

7月7日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由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研究保卫国防、组建东北边防军问题。十日，周恩来再次主持会议研究这个问题。

同日 复信聂荣臻：“本日会议决议事项〔1〕同意，请即按此执行。原件存我处。”

同日 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通过成立“联合国军司令部”。八日，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

7月10日 复电粟裕并告陈毅、饶漱石：“来电悉。有病应当休养，可以缓来，但仍希望你于八月上旬能来京。那时如身体已好，则担任工作，如身体不好则继续休养。”

7月11日 阅程潜七月十日关于解决湖南夏荒问题的来信，批示：“中南局、湖南省委：兹将程潜所提关于湖南民食的意见发给你们。所称再拨二千万斤赈济米一点请即加研究，如有必要宜即照拨并宜速办。”同日，复信程潜：“来信敬悉。增拨二千

〔1〕指1950年7月7日中央军委召开的讨论保卫国防问题第一次会议决议的事项。共5项一、部队调动部署。4个军3个炮兵师限7月底全部调往安东（今丹东）、辑安（今吉林集安）、本溪等地集结。二、指挥机构组织。以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华为副政治委员。三、后勤工作准备。四、兵员补充准备。统由总后勤部订出实施计划，限期完成。五、政治动员工作。总的是在保卫国防安全的口号下，进行政治动员，具体计划由总政治部起草一个指示。

万斤米并将先生来信也发给他们了。”

7月12日 审阅由刘少奇起草的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电报稿。电报说：中共中央现已组织派到苏联的宣传工作参观团，共有团员三十八人，翻译员七人，共四十五人。预定在苏联学习和参观三个月。你们是否允许他们于最近起身赴苏？毛泽东批示：“以后派这类参观或考察团，以人数少而精（五人左右真能思考问题者）、研究问题少而专更为有益，并带好的翻译员。”

同日 为转发华北军区七月十日关于绥远军区军政干部会议情况简报，起草中央军委给中南、西南、西北各中央局及军区的批语：“在起义部队中的领导机关应为军政委员会及军政组制度，不应如主力一样为党委制，以便吸收起义将领参加一起工作，利于团结和改造部队。”

同日 给卫士李银桥题词：“努力学习，学好后再做工作，为人民服务。”

7月13日 审阅周恩来报送的《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关于部队调动部署，决定提出将调四个军、三个炮兵师、四个高射炮团等部队共约二十五万五千人，最后调动的部队限八月五日前到达东北指定地区。关于指挥机构（1），决定提出以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为副司令员，萧华为副政治委员，李聚奎为后勤司令员。毛泽东批示：“同意，照此执行。聂另抄存案并照办，原件还我。”

7月14日 阅新华社布拉格分社七月十三日致总社转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说：德国统一社会党邀请我党派代表团出席该党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的全国代表大会，现该党经捷共中央来电话催询我党派代表团的姓名、人数及何日能到柏林。毛泽东批送刘少奇：“请你即决派去的人选及办法，日期已很近了。人选似

（1）这个指挥机构后来没有成立。

以王大使〔1〕为适宜，请与周商酌。”同日，审阅修改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王稼祥的电报稿，在末尾加写一段话：“德共是欧洲大党，此行甚关重要，故希望你去一下。你能否由南俄动身直接去柏林，以便按时赶到，盼复。”

7月15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粟裕、唐亮、张震、周骏鸣并告陈毅、饶漱石的复电：“午寒〔2〕电悉。既然董、罗〔3〕亦有思想准备，我们同意你们的混编办法，但请你们注意混编时的政治说服工作，使董、罗及其干部感到满意，以便争取他们进步和安心工作。”

7月16日 阅北京农业大学校长乐天宇六月二日写给刘少奇的《由米丘林摩尔根学说到团结问题的报告》〔4〕，批示：“这个报告里所表现的作风是不健全的，乐天宇思想中似有很大的毛病。”又阅《人民日报》编辑部七月五日给李维汉的信和附上的北京农业大学一位助教反映乐天宇工作中的问题的一封信，批示：“必须彻查农大领导并作适当的处理。此件应与乐天宇六月二日的报告一并讨论。”

7月17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致中共中央华东局，唐亮、张震、周骏鸣转粟裕电：“毛主席前电粟，要他于八月上旬来京，依情况或留京休养，或担任工作。现粟已去青岛休养，甚好。请粟于八月上旬来电报告身体情况，如病重则继续在青岛休养，不要来京，如病已愈则盼来京。”

同日 阅聂荣臻七月十五日关于释放阎锡山系统战俘的报

〔1〕指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

〔2〕午寒，即7月14日。

〔3〕董、罗，指董宋珩、罗广文，原国民党军将领。1949年12月先后率部在成都地区起义，起义后部队开到华东地区进行改编。

〔4〕乐天宇在报告中对别人反映他在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对待摩尔根学派问题上犯有简单粗暴的错误，有所说明和辩解。

告。报告说：华北军区请示释放阎锡山系统之战俘（中将、少将级）四十二名。经总政交公安部审查，认为此批战俘在教育过程中均表示认罪，且过去多系副职，少数主官亦罪恶不大，家庭多住老解放区。可否同意分批释放，请批示。毛泽东批示：“同意释放。”

7月18日 为转发公安部政治保卫局关于匪特暗害阴谋及我保卫工作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各军区党委并转各省、市、区党委及军师党委的批语：“请你们加以充分注意，指导所属加强保卫工作，彻底粉碎国民党匪特的暗害阴谋，有效地保卫一切党的领导同志、工作干部及党外民主人士，是为至要。”

同日 审阅修改由刘少奇起草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祝贺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的电报稿，加写一段话：“我在这里遥祝伟大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统一社会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圆满成功，整个德国被帝国主义者强迫分裂的现象早日结束，完整的统一的民主的德国早日建立，德国整个民族在德国统一社会党和德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之下早日获得解放。”并批示：“请周于今日下午交外交部译好，并电发柏林，务使柏林于明十九日能收到，并抄一份给德驻京大使。原稿用后交胡乔木发表。”

同日 阅吴启瑞〔1〕五月二十二日来信，批示：“请陈丕显同志酌办。写信者是有八个孩子的母亲，在锡师附小当教员，请求将她的三个孩子加入苏南干部子弟班。”七月十九日，复信吴启瑞：“五月来信收到，困难情形，甚为系念。所请准予你的三个小孩加入苏南干部子弟班，减轻你的困难一事，请持此信与当地适当机关的负责同志商量一下，看是否可行。找什么人商量由你酌定，如有必要可去找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同志一商。我是

〔1〕吴启瑞，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数学教师王立庵的儿媳。当时在无锡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任教。

没有不赞成的，就是不知道该子弟班有容纳较多的小孩之可能否？你是八个孩子的母亲，望加保重，并为我问候你的孩子们。”

7月19日 将吴耀宗等的中国基督教会三自革新宣言〔1〕批送周恩来：“吴耀宗文件是很有用的，请考虑用内部文件方式电告各中央局及各省市市委，并要他们注意赞助。”

同日 中共中央华北局致电绥远省委，指出：“由于绥远形势发展，毛主席最近召集薄、聂〔2〕和傅作义、邓宝珊谈话，决定进一步解决绥远问题，允傅方编两个军，两省政府合并”。

7月20日 阅华东防汛总指挥部七月十八日关于安徽、河南两省水灾情况的报告，就根治淮河问题写批语给周恩来：“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请邀集有关人员讨论（一）目前防救、（二）根本导淮两问题。如何，请酌办。”

同日 致信斯大林〔3〕。信中说：在研究了我国出动到中朝边界上的部队之空中掩护问题，以及我国空军转人使用喷气式飞机并接收两个苏联空军师的一切器材的问题之后，我们欢迎您的提议，并对您及苏联政府给我们的帮助致特别感谢之意。我们拟将您派来掩护我们部队的喷气式空军师，驻扎在沈阳附近，两

〔1〕吴耀宗，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副主席、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组主任。中国基督教会三自革新宣言，指《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其中提出中国基督教会及团体的基本方针应是：肃清基督教内部的帝国主义的影响，警惕帝国主义利用宗教的反动阴谋；培养一般信徒的爱国民主精神，实行自治、自养、自传。这个宣言后来在195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

〔2〕薄、聂，指薄一波、聂荣臻。

〔3〕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修改后发出。

个团驻鞍山，一个团驻辽阳。这样驻扎，在与驻在安东〔1〕附近的我国空军混成旅所属驱逐团协同动作之下，可以解决掩护部队以及保护沈阳、安东、抚顺工业区的问题。

7月21日 为转发彭真七月十八日关于北京市整风工作计划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大市委、省委、区党委的批语，指出：“其中许多经验我们认为各省委、区党委特别是各大中城市的党委值得采取，或部分采取的。”彭真报告中提出准备采取的做法，主要有：（一）首长负责，亲自动手。

（二）各单位的工作总结和思想作风检讨，通过各该组织的领导机关进行。（三）用人民代表会议的形式检查工作、检查工作人员的作风。（四）整风重点是自上而下地总结工作，检讨对中央方针政策的执行情形、经验教训及工作作风。（五）政权和群众组织系统的整风中，党与非党干部一视同仁，但在检讨个人思想、作风时，不以党员的标准去要求非党干部，民主人士的整风学习完全听其自愿。

7月26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赓〔2〕的复电：“七月二十二日十三时电悉。我们认为你的意见是正确的。越军应先打小仗，逐步锻炼能打稍为大一点的仗，然后才可能打较大的仗。目前不要直打高平，先打小据点，并争取围城打援是适当的。”并批示：“刘、朱、周、聂阅。”

同日 复电南非达兰士瓦州印度人大会主席达杜：“六月十八日来电收到。我代表中国人民完全支持你们对于南非联邦政府歧视中、印及其他亚洲人民的所谓‘种族隔离法案’的合理的抗议。”

7月27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邓子恢、谭政、赵尔陆、李

〔1〕 安东，今辽宁丹东。

〔2〕 陈赓当时奉派越南民主共和国，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协助越共中央和越南人民军总部组织指挥抗击法国侵略军的边界战役。

聚奎、苏静〔1〕的复电：“四十三军的集结位置，目前可以照你们的布置，即以主力位于雷州半岛，以一个师位于海南岛。”

7月 为《美洲华侨日报》创刊十周年题词：“为保卫祖国、拥护世界和平而奋斗。”

8月1日 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布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指示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除西藏、台湾等处尚待解放，各地残余土匪尚待剿灭之外，已经基本上结束。国家的伟大的经济建设工作和文化建设工作，已经开始。今后人民解放军的任务，除必须解放西藏、台湾及剿灭残余土匪外，主要的就是要进行国防建设，准备对付帝国主义的可能侵略，维持国内治安，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同时，也要尽可能地参加国家的经济建设工作和其他工作。”“鉴于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一般的文化水平太低的情况，为了要完成伟大的新任务，就必须提高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的文化科学与技术水平，并从军队中培养大批的从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因此，中央决定，全军除执行规定的作战任务和生产任务外，必须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使军队形成一个巨大的学校，组织广大指挥员和战斗员，尤其是文化水平低的干部，参加文化学习。”

8月3日 复电彭德怀：“六月二十九日电悉。我们对班禅的地位，终须有适当安置，先就班禅集团内选择适当人员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工作是需要的，请物色候选人报告中央，以便在适当时候发表（你们先勿公布）。计晋美〔2〕可以来京。”

〔1〕李聚奎，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副参谋长。苏静，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副参谋长。1952年3月任中央军委军务部部长。

〔2〕计晋美，即詹东·计晋美，当时任班禅行辕堪布会议厅主任委员。

同日 将钱昌照〔1〕关于经济计划的意见，批送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请他们在现正准备的一九五一年计划及某些工作的三年计划中，将钱昌照建议各项加以考虑。

8月4日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美国武装侵略朝鲜后中国应该采取的对策问题。毛泽东讲话指出：如果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国。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适当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

同日 为转发杨得志、李志民〔2〕关于第十九兵团复员工作的总结报告，起草中央军委给各中央局及军区党委的批语，指出“我们认为十九兵团的经验是很有用的，请加注意”。报告总结的主要经验是：一、采取自上而下，先干部后群众，先党内后党外，稳步前进的方法，进行动员。二、复员人员离队前，进行集训，各级军政首长亲临慰勉，讲明复员的重要意义，宣布我们的方针是妥善安置，并教育复员人员回乡后处处为人模范。

8月5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复高岗电：“八月四日电悉。（一）边防军各部现已集中，八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但应准备于九月上旬能作战。请高岗同志负主责，于八月中旬召集各军、师干部开会一次，指示作战的目的、意义和大略方向，叫各部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务使士气旺盛，准备充分，部队中的思想问题必须予以解答。我们当令萧劲光、邓华、萧华参加这次会议。（二）在上述方针下，部队的集结部署由你按情况酌定。三十八军如以调驻四平铁路沿线为有利，可即照这样调动。”

〔1〕 钱昌照，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兼计划局副局长。

〔2〕 杨得志、李志民，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兵团（1951年2月改属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政治委员。杨得志1952年7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

同日 接见邓华。毛泽东说：杜鲁门在朝鲜看样子不会罢手。你在给军委关于美军可能在朝鲜东西海岸中腰部，实施陆海空三位一体的登陆作战，这个分析很有见地。你们集结东北后的任务是保卫东北边防，但要准备同美国人打仗，要准备打前所未有的大仗，还要准备他打原子弹。他打原子弹，我们打手榴弹，抓住他的弱点，跟着他，最后打败他。我还是那句老话，在战略上藐视他，当作纸老虎，在战术上重视他，当作真老虎。八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但应准备于九月上旬能作战。我们刚刚给高岗打了电报，要他们于八月中旬召集边防军各军、师干部开会，指示作战的目的、意义和战略方向。务必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

同日 阅曾希圣〔1〕等八月一日就皖北灾情报告及生产救灾工作意见致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东军政委员会并转中央的电报。电报说，淮北二十个县、淮南沿岸七个县均受淹。毛泽东阅后批送周恩来：“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八月份务须作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如何，望酌办。”

同日 复信黄炎培：“大示诵悉。麦去看蒋〔2〕，似乎是替台湾起些壮胆作用，别的似乎还谈不到。但我们的准备是必要的。”

8月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批语，将中南局八月一日关于在南方不应强调组织生产互助组问题的指示转发给各中央局参考。中南局的指示根据中南许多地方在夏季生产中不适当地强调组织生产互助组，致使下层组织强迫命令，破坏了正常生产的情况，

〔1〕曾希圣，当时任皖北区党委书记兼城市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指驻日盟军最高司令、“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 1950年7月31日由日本飞抵台湾，同蒋介石会商如何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

指出南方地区一般是人多地少，劳力并不缺乏，应先集中解决合理负担及减租退租，搞好水利建设，保护与增殖耕畜等问题，而不应强调组织生产互助组。

同日 阅中共中央华北局八月二日关于宣化市的错误问题致分局、各省市市委并报中央的电报，批示薄一波、刘澜涛〔1〕：“宣化市此种行为〔2〕似应在报纸公开揭露，予以批评，借以教育全党。是否适宜这样做，请考虑告我。”

同日 致信王首道：“湖南教育界民主人士王季范〔3〕、周惇元二先生是我早年师友，有意来京一游，拟予同意。如果你们也赞成的话，请考虑为他们二位办理由长沙到北京的车票及章淼洪〔4〕同志的车票，并酌给路上用费，由章淼洪同志伴同来京。以上请予酌办为盼！”

8月7日 阅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本日报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全国进出口会议情况摘报，批示：“周、刘、朱、陈、薄、李富春阅后发。文尾两个问题〔5〕，特别是第二个问题，请周找

〔1〕刘澜涛，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1950年9月又任政务院华北事务部（1952年4月撤销）部长。1951年12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副政治委员。1952年4月又任政务院华北行政委员会主任。

〔2〕指在宣化市第三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会议主持人和有的党员干部，不让出席会议的代表充分发言的错误行为。

〔3〕王季范，毛泽东的表兄，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教师。1950年11月任政务院参事。

〔4〕章淼洪，毛泽东的亲戚。

〔5〕全国进出口会议情况摘报中向中央请示的两个问题是：（一）易货问题。在一般不许易货的原则下，准备允许冷货易货和与不通汇国家进行易货。这在争取进口物资上是有利的。（二）中南区公私双方一致要求允许汉口开放问题。根据目前我们航运设备能力有限，而汉口外销物资很多的情况，允许有油柜和冷藏设备的外轮，经过特许，到汉口装货，直放国外是有利的。

有关人员一谈，予以解决。又：政务院所属各部每次召集会议决定政策方针，都应如中财委所属某些部门一样，做出总结性报告，呈报我及中央书记处看过，经同意后，除用政务院、各委或各部自己名义公告执行外，有些须用内部电报通知各地。其方式就如这个电报一样。过去有些部门这样做了，有些部门尚未这样做，请周通知所属一律照办。军委所属各部亦然。”

8月8日 复信粟裕：“罗瑞卿同志带来的信收到了，病情仍重，甚为系念。目前新任务〔1〕不甚迫切，你可以安心休养，直至病愈。休养地点，如青岛合适则在青岛；如青岛不甚合适，可来北京，望酌定之。”

同日 阅一封反映大学毕业生分配中学用不一致问题的来信，批送周恩来：“此事〔2〕是谁人负责，请加处理，将此信发交处理机关的负责同志重加审查，并将结果告我为盼。”

8月9日 为转发中共北京市委八月七日关于北京市召开区人民代表会议经验的初步总结，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大城市市委及省委、区党委的批语：“我们认为大城市的各区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是必要的和有益的，请各大城市市委考虑实行。”

8月10日 复信蒋竹如：“七月三十一日来信收到。顷询革大，据称该校研究班九月间可收留若干人。似此，兄如有决心，并能吃苦（该校伙食不大好），可以来此入学研究。大作同时收到，甚谢！”

8月11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并告饶漱石电：“同意八月八日来电所述各项检讨及各项方针和办法。我们认为这些检

（1）指组建东北边防军。粟裕当时任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因病未到任。

（2）指大学毕业生分配工作。

讨及所提方针、办法是正确的，是适合华东我军的情况的，望即鼓励全体同志照此执行。台湾决定一九五一年不打，待一九五二年看情况再作决定。金门岛可决定在一九五一年四月以前不打，四月以后待命再打。”“撤销三野前委，组织军区党委及其人选均同意。关于部队在三年内（一九五一年春季开始）加强文化教育一项任务问题，最近军委有训令发出，你们收到后请根据华东我军情况考虑实施办法。”“我们感觉在方针政策和工作计划的报告请示方面，华东军区和中央军委的关系，比较华东局和中央的关系，其密切的程度要差一些，此点请予以研究和改正，以便不但在若干具体事件的解决方面，而且在方针、政策和工作计划的解决方面（这方面是更加重要的）你们与我们之间保持更密切的联系。”

8月12日 审阅修改《中央关于调整若干工作关系问题的指示（草案）》，批送周恩来：“此件似宜先印若干份，在政府党组征求意见，并加以讨论，取得同意，然后发出。”指示草案指出：中国革命已取得决定性胜利，成立了统一的中央人民政府，过去在长期农村环境中所形成的农村观点和一揽子的工作方法必须彻底改变，而以集中统一的整体思想和分工合作的科学方法来代替。指示草案提出了需要调整的几个方面的关系。

8月14日 阅周恩来关于西藏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说：我拟于本星期三会见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只谈西藏为中国领土，我们很愿以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但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必须退出西藏。印度与中国在西藏的商业贸易关系完全可以保持。不但中印之间可以和平相处，即连中印之间的尼泊尔及巴基斯坦等国与中国，一样可以和平相处。西藏代表团是地方性或民族性的代表，他们应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来商谈和平解决的

办法，西藏代表团总有办法到北京的。毛泽东批示：“同意这样办。公约十章〔1〕待代表团到时作为谈判条款似较妥，目前不要发表，也不交印大使。”

同日 致电金科奉〔2〕：“欣逢朝鲜解放五周年纪念，我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及中国人民向阁下及朝鲜人民谨致 祝贺之忱。中国人民热烈拥护朝鲜人民为抵抗美帝国主义侵略及 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而进行的正义战争，并深信朝鲜人民一 定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8月16日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董必武出席，薄一波、聂荣臻、李富春列席。会议内容为：薄一波作关于农业税问题的报告，讨论私营企业暂行条例、铁道部政治部隶属问题。

8月18日 复电高岗：“（一）八月十五日送来你在边防军

〔1〕指中共中央西南局1950年5月起草、后经中央同意的中央人民政府同 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10项条件。这10项条件是：（一）西藏人民团结 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大家庭来。（二）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三）西藏现行各种 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 级官员照常供职。（四）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 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五）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 变更，西藏 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六）发展西藏民族 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七）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 活。（八）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 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九）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 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 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 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不咎既往。（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 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人民解放军的经费 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实行买卖公平。

〔2〕金科奉，当时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

干部会议的报告收到了，这个报告是正确的。（二）萧劲光同志来告有关边防军的各项问题，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三）边防军完成训练及其他准备工作的时间可延长至九月底，请你加紧督促，务在九月三十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

同日 复电中共中央西南局：“你们关于向昌都进军各电均悉。今年如能进到昌都当然是很好的，问题是：（一）甘孜到昌都一段很长道路是否能随军队攻进速度修筑通车；（二）昌都能否修建机场及是否适于空投；（三）一个师进攻昌都是否够用，藏军似有相当强的战斗力，必须准备打几个硬仗，这方面你们有足够估计否。我们对于以上几点尚不清楚，请分析电告为盼。”

同日 阅王明八月十七日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来信〔1〕，批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杨尚昆：“王明的声明书应在十一月上旬七届四中全会开会以前写好，并送交政治局。王明的笔记本及武汉时期的报纸，请尚昆清查是否尚有保存。以上两点，由尚昆口头通知王明。”

8月19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东局八月十七日关于组织人民法庭的指示，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的批语：“华东局关于组织人民法庭的指示是正确的，望你们亦就需要情形发这样一个指示。”华东局的指示规定：在匪特活动较为频繁及定于今冬进行土地改革之县份，首先建立人民法庭。应在干部较强、工作基础较好的县，先由县长或县委书记甚至专员，亲自审讯及办理一二个案件，作为示范，并吸取经验，教育干部。

〔1〕王明在信中要求中央明确指出他应在多长时间内写成声明书，对他在十年内战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所写各种文章、小册子及其他文件进行检讨；提出为了进行检讨，希望将1937年12月会议散会时收去的笔记本还给他，希望借用武汉时期的《新华日报》和延安的《新中华报》。

8月20日 将中共上海市委八月十四日关于上海党政群机关团体编制情况的报告，批送周恩来：“此电两项建议值得注意，请考虑指示各地，省及大市照此办理，成为制度。又，各地整编总结，报来者少，请考虑去电催送总结。”上海市委的两项建议是：（一）编余员工处理问题。老弱残疾人员，一般可早日给资遣散，工务局六七十岁有多年工龄的老工人，无家可归者以包下养老为宜。（二）编制委员会撤销后，凡有关编制问题，应指定专门机关继续负责指导。

同日 阅聂荣臻八月十九日请示报告。报告提出：如美帝的侵略战争继续打下去，虽然我们有了第一步的部署，仍恐不足以应付事变，应于关内机动地区再行配备第二线兵力。建议于九月秋收后将西北军区第十九兵团三个军集结起来，移至济南或郑州洛阳地区休整，作为机动。毛泽东批示：“德怀同志：兹将聂荣臻建议一件发给你。十九兵团是否可以照聂建议部署，请加考虑，电复为盼。”

同日 复信徐海东：“七月十七日来信收到。病有起色，甚慰。我们大家都系念你，希望你安心静养，以求全愈。”

同日 复信黄炎培：“来示并剪报收到，极好，遇见凌先生〔1〕时，请代我向他致谢意。他的文章写得很生动，观点也是正确的。”

同日 致信李达〔2〕：“校名照写如另纸，未知是否合用？我不会写更大的字，你们自己去放大。”

8月21日 将关于印度对我态度演变之综合报告批送胡乔

〔1〕指凌其翰，曾任国民党政府驻法国公使。1949年10月9日，同使馆其他爱国人员致电周恩来，宣布起义，表示同国民党政府脱离一切关系。1950年6月9日，回到北京。随后写了回国途中的见闻记《从法国归来》，在8月3日、4日的《光明日报》连载。黄炎培读后从报纸上剪下此文函请毛泽东一阅。9月，凌其翰被任命为外交部专门委员。

〔2〕李达，哲学家。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湖南大学校长。1952年11月任武汉大学校长。

木：“对印度、巴基斯坦和印尼三国的宣传，请特别加以注意，勿使反动派获得借口。”

8月23日 阅中共中央西南局八月二十日关于攻占昌都之准备工作的报告，复电西南局并告西北局。电文如下：“八月二十日电悉。（一）你们力争今年占领昌都并力争留三千人巩固昌都的计划是好的，你们可以照此作积极准备，待本月底下月初判明公路已通至甘孜无阻，即可实行进军，期于十月占领昌都，这对于争取西藏政治变化及明年进军拉萨，是有利的。（二）现印度已发表声明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惟希和平解决勿用武力。英国原不许西藏代表团来京，现已允许。如我军能于十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当然也有别种可能）、现我们正采争取西藏代表来京并使尼赫鲁减少恐惧的方针。西藏代表到京时，我们拟以既定的十条（1）作为谈判条件，争取西藏代表签字，使十条变为双方同意的协定。果能如此，则明年进军拉萨会要顺利些。你们于占领昌都后只留三千人在那里过冬，今年不进拉萨，并将主力撤回甘孜，在西藏方面看来，可能觉得是我们向他们表示好意的一项措施。（三）三十架飞机事在筹备中，但需时间，短期内你们不要靠望。（四）你们一万六千人由甘孜向昌都进军，粮食全靠部队携带及牦牛载运，其中三千人须有过冬粮食，准备撤回的主力一万三千人至少须有往返期间三个月粮食，甘孜是否已有这样多的粮食，部队及牦牛是否有这样大的运输力，仍望查告。（五）昌都等处可能购买一部粮食及肉类，你们是否已准备一批金银及藏民需要的货物如绸、茶等带去。”

同日 就中共中央西南局八月二十日报告提出的攻占昌都

（1）指中共中央西南局1950年5月起草、后经中央同意的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10项条件。

需要高空运输机问题，批示：“第七项〔1〕请周督促空司尽速筹备，并以情况告我。三十架飞机要是高空使用的，驾驶员亦须适合此项条件，请加注意为盼。”同时，致信李涛：“西南军区为进军西藏，需要三十架高空运输机，请询空司是否已着手筹备，飞机和驾驶员何日可以筹妥，最近三四个月内有希望否，问明告我，并加督促为盼。”二十四日，阅李涛当天送上的报告，获悉三十架飞机问题最快于明年一月才开始实现后，批示：“周筹备，务于明年一月或二月或三月能有三十架（连现有九架）高空机。”

同日 复信罗石泉〔2〕：“来信收到，甚以为慰，在地方上做些有益于人民的工作较为适宜，不必来京。”

同日 复信夏百源〔3〕：“惠书诵悉。张昆弟〔4〕兄死事弟亦不甚清楚，只知其工作地点是湖北洪湖区域，时间大约在一九三〇年左右。吾兄乡居灌园不是坏事，倘能就近赞助土改，即是有益于人民的。”

同日 复信易克堦：“来信收到，生活困难，极表同情。工作问题，以向现在各机关学校任职而熟悉吾兄情况之友人谋之为适宜，最好能在长沙方面获得解决。”

同日 复信陈叔同、陈泽同〔5〕：“来信收到，甚慰。工作

〔1〕指进军昌都需要30架高空运输机。

〔2〕罗石泉，毛泽东的元配罗氏的堂兄。1925年参加韶山农民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是乡村教师。

〔3〕夏百源，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4〕张昆弟，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新民学会会员。1930年在湖北洪湖地区牺牲。

〔5〕陈叔同，1927年夏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1927年冬，和妹妹陈泽同在家乡茶陵参加工农革命军，并任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妇女部部长。同年12月上井冈山，在工农革命军第1师师部做文书。1928年6月被派遣回茶陵组织农民暴动，失败后同党组织失去联系。

问题，以在当地设法为适宜，不必远道来京。”

同日 复信李漱清：“惠书收到，极表同情，已将尊件转寄湘潭县人民政府酌量办理矣。”

同日 复信盛隆机〔1〕：“来信收到，甚为感谢。工作问题，以就近向熟悉吾兄情况之友人谋之，较为适宜。”

同日 复信蒋浩然〔2〕：“来信收到，甚谢。尊府参加革命工作者甚多，令弟〔3〕为国牺牲，极为光荣。”

同日 晚上，周恩来带雷英夫〔4〕到毛泽东住处，由雷英夫汇报中央军委作战局关于朝鲜战局的研究结果：敌军可能在仁川、元山、南浦等地登陆，以在仁川登陆的可能性最大。毛泽东认为：作战局的分析和判断有道理、很重要。为此，和周恩来决定：（一）检查督促东北边防军各项战备工作情况，严令其务必在九月底以前完成一切作战准备工作，保证随时可以出动。（二）将敌军可能在仁川等地登陆的情况告诉朝鲜和苏联政府，并告朝鲜对此应有应付最坏情况的准备。（三）总参谋部和外交部要密切注视朝鲜战局的变化。

8月24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复陈赓电：“八月二十二日电悉。同意你们的作战计划。为了保证此役胜利，似应在干部中灌输连续作战的思想，以便对付谅山敌人来援而又可歼灭时的情况，以及在东溪、七溪敌人歼灭后高平之敌可能逃跑或向南增援的情况。判断敌方统帅部可能不预料我方〔5〕现已能够集中二万余人在一处作战，可能以为仍不过几千人或一万人，因而从谅山派出三四

〔1〕盛隆机，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2〕蒋浩然，他的父亲同毛泽东的父亲有较多的商务往来。

〔3〕指蒋梯空，1925年参加韶山农民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牺牲。

〔4〕雷英夫，当时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作战局副局长。

〔5〕这里的“我方”和下文中的“我军”、“我”、“我方”，指越南人民军。

个营或四五个营向东溪、七溪增援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如果敌只派出三、四、五个营增援，而又地形有利，我军战力充足，则我军于解决东溪、七溪后就有可能歼灭此援敌。如果此援敌被歼灭，则敌方统帅部可能迅速改正其对我方力量过低之估计，而命令高平之敌逃跑，或于我打谅山援敌时命令高平之敌放弃据点向南增援，夹击我军，则我军于歼灭谅山援敌后又有可能要向高平援敌作战，如不作战则只好让高平之敌逃跑。假如出现此种情况，则我军有于二十天左右时间内要打大小三四个仗之可能。因此，（一）照你们估计的情况及计划在四十天内从容歼灭边界之敌，这样是很稳妥，是很有利的；（二）照上面估计的情况，则须准备在二十天左右打大小三四个仗，如能打胜则是更有利的，但不知越军有此能力否？”并批示刘、周阅发，再送朱、林、聂、李涛。”

8月25日 就准备对付台湾敌军可能向潮汕及海陆丰登陆袭击，为中央军委起草复邓子恢、谭政、赵尔陆并叶剑英、方方电：“华南分局转来潮汕地委未寒〔1〕电已悉。台湾敌人向潮汕及海陆丰举行登陆袭击是极有可能的。你们必须：（一）加强侦察工作，务使我军在敌举行登陆袭击之前，获得可靠情报；（二）加强兵力，请考虑从西面抽调一部兵力（例如一个强的师）及一部炮火加强东面，确保潮汕及海陆丰沿海防线，并派一个军级指挥部去担任指挥，遇敌袭击时能坚决歼灭之；（三）加强党政军民各方面的作战准备，清除干部中的和平思想，军队及地方武装解除其生产任务，集全力于准备作战。该区情况及你们意见盼告。”

8月26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西北局八月十五日关于整风问题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市委等的批语：“下面是西北局的整风经验，我们认为是正确的，请你们加以注意，其

〔1〕未寒，即8月14日。

中有可以在你们区域采用者，请加采用为盼。”西北局整风的主要经验是：（一）各省市均采取总结工作的方法，整训县、区、乡干部。（二）自上而下整顿领导，结合自下而上检查工作的方法，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三）对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及时加以解决。（四）领导应集中力量注意解决各单位的主要问题，使干部从具体工作的改进中得到思想上的提高。（五）从总结实际工作经验中创造一套新的工作制度和办法。（六）整风主要是整顿领导。

8月2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高岗、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饶漱石电：“为了事先商量几个重要问题，以利应付时局及制定三年计划，准备提交十一月或十二月开会的党的四中全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讨论，请你们五位同志于九月二十五日来京开会，会期五天左右。”

同日 致电彭德怀：“为了应付时局，现须集中十二个军以便机动（已经集中了四个军、但此事可于九月底再作决定，那时请你来京面商。”

同日 阅邓华、洪学智、解方〔1〕给高岗并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兹选定兵团侦察科长崔醒农，第四十军第一一八师参谋长汤原仲，第三十九军参谋处长何凌登，炮八师副师长黄登保，以驻朝鲜大使馆武官名义，去朝鲜了解情况，收集材料。毛泽东批示：“周：请令这些人和柴君武〔2〕一同来京，由你面授机宜，然后去朝工作。”

〔1〕解方，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3兵团参谋长。1950年10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

〔2〕柴君武，应为柴军武，后改名柴成文，当时任中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一等参赞。

8月29日 阅西南军区八月二十四日给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预计十月中旬占领昌都。毛泽东批送周恩来：“请注意进攻昌都的时间。请考虑由外交部适当人员向印度大使透露，希望西藏代表团九月中旬到达北京谈判，我军就要向西藏前进了，西藏代表团如有诚意，应当速来，并希印度政府予该代表团的旅行以可能的协助。”**同日**，就催促西藏代表团马上动身来京，又批示：“周：去电申健〔1〕叫西藏代表团马上动身来北京，很有必要。电中请说明希望该代表团接电后迅即动身乘飞机至香港，转乘广九、粤汉、京汉火车，九月中旬到达北京。”

同日 复信郭梓材〔2〕：“来信收到，极为欣慰。北京人浮于事，吾兄工作问题，还以就当地熟悉吾兄情况的友人筹谋解决，较为适宜。愚见如此，尚祈斟酌。”“刘天民〔3〕先生同此致候〔刘先生来信没有收到父”

同日 复信罗元燮：“六月来信收到，生活困难，极为同情。因弟不明了吾兄情况，未便向各机关介绍。兄可持此信及前信向适当机关接洽，主要靠自己说明经历，经当局者研究，或可获得解决。如须经过学习过程，亦以照办为宜，尚希自行酌定。”

同日 复信余千山〔4〕：“七月九日惠书敬悉，甚慰。尚望

〔1〕申健，当时任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负责办理西藏代表团经印度到北京谈判事宜。

〔2〕郭梓材，毛泽东的私塾同学，辛亥革命时一起在长沙参加新军，大革命时期参加韶山农民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湖南湘潭猪鬃厂会计。

〔3〕刘天民，郭梓材的妻子，杨开慧的好友。大革命时期曾在毛泽东、杨开慧的影响下参加革命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湖南湘潭市政协委员。

〔4〕余千山，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努力进修，从事新的教育工作。”

同日 复信陈寄生〔1〕：“惠书读悉，甚以为慰。先生所从事的学术，因我未曾研究，不能赞一词；惟觉中国的历史学，若不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势将徒费精力，不能有良好结果，此点尚祈注意及之。”

同日 复信张赌〔2〕：“来信收到，甚为感谢。先生既在湖北有工作，似乎不必来京，就在那里将工作做好，较为有益，尚祈斟酌。”

8月31日 阅华东军政委员会八月二十八日转报的苏北区党委对治淮意见的电报，批示：“周：此电第三项〔3〕有关改变苏北工作计划问题，请加注意。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并早日告诉他们。”

同日 复信谭世瑛：“五月来信收读，又承赠以长歌，深感厚意。生活困难，极为同情。现在到人民政府所属机构做事，或到学校教书，薪金甚微，对于家口众多者不易贍给；又须人相当学校学些马克思主义观点，方能齐一步调，有共同作风。以吾兄状况观之，能就近获得工作职位，为最好；否则须远出参加短期研究班的学习，须准备吃很大的苦楚，又难于贍家，未知有此决心否？”

8月 为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4〕} 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

〔1〕陈寄生，长期担任中学教师，研究过少数民族历史。

〔2〕张嶠，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在湖北武昌实验中学工作。

〔3〕这一项的内容是：“如今年即行导淮，则势必要动员苏北党政军民全部力量，苏北今年整个工作方针要重新考虑，既定的土改、复员等工作部署必须改变，这在我们今年工作上转弯是有困难的；且治淮技术上、人力组织上、思想动员上及河床搬家，及其他物资条件准备等等，均感仓促，对下年农业生产及治淮均受很大影响。”

〔4〕这次会议于1950年8月7日至19日在北京举行。

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

9月1日 就机密电报应用有线电发出问题，致电陈毅并告饶漱石：“在此所谈各问题，你写电报时，为保密计，请用有线电发来，不要用无线电。嗣后凡机密电报，均请注意用有线电，不用无线电。只有非机密者用无线电。党政军均是如此。党政军对下面亦应如此，凡有有线电设备之处，均用有线电，以达保密之目的。在此敌我斗争日益尖锐之时，保密问题值得引起我们极大注意。”

同日 阅中共中央华北局秘书处支部整党整干经验的材料，批示安子文：“中央系统整风工作现在不知已开始进行否？是什么机关领导的？我认为应由中央组织部领导，由安子文同志负主责，由中央、军委、政务院、工青妇各系统各指定几个人组成委员会，领导整风工作。华北局此件可印发各机关作参考材料。如何进行，盼告。”

同日 复信黄炎培：“大示敬悉，承赠大作《红桑集》，极为感谢。南方各省有丰收之望，北方亦有此种情形，检陈华北局报告〔1〕一份，可以一阅，阅后请予掷还为荷。”

9月3日 复信高岗：“八月三十日来信收到。兹复如下：（一）友军〔2〕作战方面，可能发生如来信所说的困难。但估计一时尚不便改变，还须打一个时期〔也有此种必要〕，到无可打了，损伤也大了，就会逐渐改取守势。友方人员的后备力甚大（已动员报名百万以上），装备是有的，故估计可以坚持颇久的时间。（二）二千辆汽车，可以筹办。（三）铁道纵队待需要时可调动，目前尚不需要。（四）弹药北移有必要，请即办。（五）整个空

〔1〕指中共中央华北局1950年8月29日关于秋收、秋耕、秋种工作的指示。

〔2〕指朝鲜人民军。

军攻防计划，是照顾了你所说的情况的，正在筹办。（六）必须以现代战争观点教育部队，切记不可轻敌，你的意见是正确的。柴君武可于九月上旬或中旬率少数人以大使馆员面目去实地调查作战情况，当令其于中旬或下旬送回第一批调查结果，即可以之教育部队。专人研究，请即就东司〔1〕及十三兵团设立，并进行研究。林、粟〔2〕均病，两萧〔3〕此间有工作，暂时均不能来，几个月后则有可能，估计时间是有的。（七）对省级主要同志只讲边防，不讲其他。（八）工业迁移，问题甚大，以从积极防空着手，主要的不迁，只迁某些部分为宜。以上各项中，有几项须具体去做的，当由周副主席负责予以解决。”

9月5日 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周恩来作外交报告，他说：由于美国的干涉，朝鲜战争将走向持久的局面。美国在侵略台湾、朝鲜后，又入侵我国领空，射杀我国人民。我们要充分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随后毛泽东讲话，指出：对于朝鲜人民，我们是需要给以帮助和鼓励的。朝鲜人民对于中国革命有过很大的帮助，中国革命的几个阶段中都有他们的帮助。因此我们在今天应当尽力地去帮助他们。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朝鲜战争持久化的可能性正在逐渐增大。过去，我们对于朝鲜战局的估计有速决和持久两种可能性。所谓速决，就是朝鲜人民军乘胜追击，把美军和李承晚^{〔4〕}的残余伪军赶到海里去。现在美国在朝鲜已经增加了它的军队，因而战争持久的可能性也就随之增加了。最后的胜利还是属于朝鲜人民的。

〔1〕东司，东北边防军司令部的简称。

〔2〕林、粟，指林彪、粟裕。

〔3〕指萧劲光、萧华。

〔4〕李承晚，当时任韩国总统。

美帝国主义在今天是有许多困难的，内部争吵，外部也不一致。它在军事上只有一个长处，就是铁多。另外却有三个弱点：第一，战线太长，从德国柏林到朝鲜；第二，运输路线太远，隔着大西洋和太平洋；第三，战斗力太弱。但是，美帝国主义也可能在今天要乱来。假如它要那样干，我们没有准备就不好了，我们准备了就好对付它。所谓那样干，无非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打原子弹，长期地打，要比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长。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

9月8日 对华东军区九月五日关于第九兵团北调执行办法的报告作批示：“九兵团全部可以统于十月底开到徐济线，十一月中旬开始整训。该兵团在徐济线整训期间仍归华东建制，惟装备及整训方针计划受军委直接指挥为适宜。”

同日 阅聂荣臻本日报送的柴军武写的《目前朝鲜战争局势报告提纲》。聂荣臻附信说：柴军武昨日返京，今下午约他一谈，因我方使馆人员不能下去，故了解情况不多，亦不深刻。现将书面报告草稿先呈上，如要面讯时请告时间。毛泽东批示：“请周约柴君武〔1〕一谈，指示任务和方法。十三兵团同柴去的几个人是否要其来京与柴一道面授机宜，请周酌定。柴等出发之前，似应约李周渊〔2〕大使一谈，告以柴等任务，征求金〔3〕的同意，俟得同意后方能出发。”

〔1〕柴君武，应为柴军武。

〔2〕李周渊，当时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

〔3〕金，指金日成，当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

同日 阅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九月六日关于吴耀宗、刘良模（1）等发起的中国基督教会三自革新宣言签名运动的各方反映的报告，批送周恩来：“此事不宜太急，太硬性，致失去团结较多的人的机会，造成对立，对吴、刘运动开展不利，请设法影响吴、刘。”

9月9日 审阅周恩来报送的罗瑞卿关于建立中央警卫局的报告。罗瑞卿九月五日给周恩来的报告中说：筹建警卫局确有必要，不应再拖延。警卫局的建制归公安部，但同时受党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领导。政务院的领导不直接领导警卫局，以免头绪太多，解决问题不集中。报告建议将中南海内党与政两方面的行政工作统一由杨尚昆负责。现在行政不统一，警卫工作存在一些困难。周恩来在报告上批示：“拟予同意，送请主席批示，刘、朱、任传阅。”“杨尚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以代齐燕铭，利于事权统一，虽有党政两办公厅合一之嫌，但因管辖不多，亦无大不妥。请主席核定。”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惟杨尚昆兼任政府办公厅主任，党政不分，尚宜斟酌。”

同日 为转发川南区党委关于整风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的批语：“下面这个整风经验很值得注意，各地省、地、县三级整风务须吸取川南的经验，着重检查工作，端正政策。”报告中提出整风必须掌握的几项原则：一、领导下决心，大力发扬民主，启发下级干部与群众检查领导，科以上党员干部整风为重点。二、首长亲自动手。三、及时了解研究情况，不断作思想动员。四、紧紧掌握密切结合总结工作的原则，不使整风分散精力去整个人生活细节或发生其他的偏差。

（1）刘良模，当时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事工组主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候补委员。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东北局九月三日关于沈阳农学院整风情况的电报，起草中央宣传部给各中央局并各省市宣传部的批语：“关于学校整风问题，东北局九月三日指示是正确的，请转所属学校党委参考。你们那里学校整风是否发生过如像沈阳农学院那样的不良现象，望加注意并向中央作报告。”东北局的电报中，讲到沈阳农学院这次整风，未在党内及领导干部中首先进行，就发动非党教职员检查工作，结果形成群众整干部，干部之间闹对立。而所提意见多限于生活作风问题，没有引导教职员对贯彻教育方针和执行党的教育政策方面提意见。为此，东北局指示：应以教学方针及党对学校教育政策的执行情形为整风重点；整风应限于担任行政工作的党员干部，主要是领导干部；对非党教职员不要进行如干部那样的整风；严格防止和纠正在整风中离开原则，闹私人成见和宗派斗争的行为。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中南局九月一日转报的河南淮阳地区夏季征粮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发至地委一级的批语：“兹将河南夏季征粮经验一件发给你们，值得引起极大注意。今年全国秋征工作，必须党政全力布置，加强领导，务必避免河南淮阳区那样的极端恶劣现象，切勿大意，是为至要。”报告中讲到淮阳地区夏季征粮任务过重，干部强迫命令，贫雇农负担加重，不少地方发生卖牲口、当青苗、卖树、借债等情况，多数地主要赖不交夏征粮。

同日 阅中共上海市委八月三十日关于上海失业工人救济工作情况给中央及华东局的报告，批示李立三：“（一）此件可转发各地参考。（二）请考虑发一通知，叫各地调查解放前失业工人究有多少，以便考虑包括这批失业工人的救济问题。我意只要有可能，他们是应当救济的。如果不太多，譬如说只有几十万人，是可以考虑救济的。”

同日 为转发第四十八军开展连队民主运动的计划，起草中

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给各大军区党委及政治部的批语，指出：“希望你们亦发动所属在有领导有秩序的条件下，开展一次连队的民主运动，提高连队官兵觉悟程度，改善连队官兵关系，达到连队爱兵尊干加强战斗力之目的。四十八军的计划，可发给各军参考。”

同日 收到一封匿名信，写批语，其中说：“这封信表示对于党的组织状况和干部政策的一种看法，认为党内注重用庸才，不重用能干的人，对此很表悲观，希望改进。这封信的用意是好的，他所指出的有些情况值得注意；但根本看法是错的。党是从群众中生长起来的，群众的文化程度和政治水平是和党的组织状况有联系的，此种状况当跟着经济工作和教育工作的改变而改变，也只能由此而改变，而且也不能由一次二次整风就会将大批农民出身的干部的文化及政治水平有极大提高。XX一类人看不起民主人士的观点，代表了农民的某些狭隘思想，经过教育和历史演进是会改变的。问题是在教育和更多的革命经验，而不是什么提倡‘尚贤’、‘尚同’可以解决的。”“这封信的作者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对于农民的狭隘思想很看不惯。其实，工农干部经过教育是可以进步的。”在信中讲到做干部工作的同志，不能只是老实可靠，还应有英明的见地和敏锐的观察分析能力处，毛泽东批注：“这个条件，责之于一般干部，未免有些苛刻。忠实是首先的条件，我们的干部一般是忠于人民的，作者却看不起他们。”

9月10日 阅北京一位小学教师反映群众生活疾苦的来信。信中说：现在政府各机关在北京买了上万处大房子做办公室和宿舍，卖大房子的房主又买中小房子自住，造成不少租房住的贫寒市民无房住并房租大涨；政府公布供应“八一面”、“九二米”有好几个月了，可是粮米铺更多的是价贵的“头号粉”、“白细米”。毛泽东批示：“彭真阅后送周办。此两问题确实须作适当的解决。”

9月11日 阅中央军委民航局党委关于整党工作的补充指示。

指示指出，民航机关处在统一战线的环境，这一次整党应以检查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为最重要的内容。毛泽东批示李维汉：“如你认为有必要，请将此件内关于整党中应注意统一战线工作的检查问题，摘录要点，起草一电报，向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市委及政府党组作一介绍，请各地党委注意，凡在统一战线环境中工作的党要检查党的统战工作。”

同日 致信陈郁⁽¹⁾：“转来石家庄电业局全体职工给我的信及天津电业局第三发电厂全体职工给我的签名信，均已收到。请你转告两处电业职工同志们，感谢他们的好意，希望他们团结一致，努力工作，为完成国家的任务和改善自己的生活而奋斗。”

9月12日 为转发河北省政府直属机关整风经验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的批语：“整风中党员与非党员配合进行问题，河北省人民政府的经验很可注意，望加研究参酌办理。”河北的报告说：这样做可以加强党与非党干部的联系；有利于党员与非党干部互相鼓励与启发；解除党员与非党干部之间的各种怀疑和思想顾虑；整风中领导上要紧紧掌握党内严党外宽的原则。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北局九月十日关于绥远工作近况和存在问题的报告，起草中央给西北局、西南局、中南局、华东局及西北军区等四个军区党委的批语：“关于改造绥远傅部⁽²⁾及绥远地方的工作总结，华北局的意见是正确的，发给你们做参考。你们所属起义部队的改造工作全般情况如何，望加以总结，向我们做一次专题报告。”华北局的报告说：由于坚持执行对起义部队团结改造的方针，八个月来绥远在改造起义部队和地方工作方

(1) 陈郁，当时任燃料工业部部长。

(2) 指原隶属傅作义的董其武部。

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存在的问题准备采取以下措施：（一）除继续做好团结改造上层的工作外，要加强群众工作，给群众做出几件善政来；（二）采取有效办法加强政治工作，逐步树立党对部队的领导，达到改造和巩固部队的目的；（三）继续剿匪肃特，镇压反革命，安定社会秩序；（四）在整党整干中克服一些同志在改造起义部队问题上存在的“左”倾情绪和畏惧困难、失却信心的思想偏向。

9月13日 就检查督促中央政府各部门向中共中央报告工作问题，致信周恩来：“政法系统各部门，除李维汉管的民族事务委员会与中央有接触外，其余各部门，一年之久，干了些什么事，推行的是些什么方针政策，谁也不知道，是何原因，请查询。中财委所属各部门，经过中财委向中央反映，有些是慢一些，但大体是好的；也有若干部门，例如重工业，燃料，农、林、水利等还没有反映。文委系统状况，略同于财委。以上情况，请作一总检查，并加督促。”

同日 审阅薄一波本日送审的一九五一年预算草案，批示薄一波：“要有详细说明及两年比较，否则无法审查。因此（一）概算表须列出今明两年比较数字及明年比今年增减数字，表尾说明栏内亦要将今明两年的比较变化加以说明，方明历史演进；（二）各部分支出预算，须另造几张详表，指明每部分中的各项细目，例如军费的各项细目及两年历史比较，投资的各项细目及历史比较（例如工业投资的各项细目及两年的历史比较，其中如铁路投资要有每一条铁路的预算数字，水利投资要有每一条河流的数字，文教费要有每一项文教事业的数字及比较），其他类推。此项工作务请于九月二十五日以前办好送我。关于要有详细内容，还在八月政治局讨论此事我就向你提出了。”

同日 复电南非联邦杜邦城南非印度人大会会议联合书记

A·I·梅尔、J·N·兴赫：“我代表中国人民完全支持你们反对南非联邦政府歧视及压迫南非洲非白色人民（包括印度及其他亚洲人民）的主张，并祝你们会议成功。”A·I·梅尔与J·N·兴赫于八月十七日致信毛泽东，信中说：南非联邦印度人大会将于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五、十六、十七三日在约翰内斯堡召开一个重要的会议，讨论马兰政府对于南非联邦非白色人民的日益凶狠的进攻。为了重申我们对民族隔离及南非五分之四以上的人民的基本人权受到否认的问题的态度，这次会议是极其必要的。如蒙来函支持我们的会议，则我们反对肤色压迫的决心将大大地增强。

9月1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同意以大战略区为单位在上海设办事处的电报：“各中央局及各大军区党委：接上海市委九月十二日电称，‘六月初至八月底，市委接到各区委反映，有关各地区来沪购物受骗、贪污、将公款私存私营行庄等事件，达十一件之多。……建议中央电告各地，以大战略地区为单位（包括大城市）在沪设立办事处，统筹各单位贸易和采购事宜，并与沪工商办事处取得联系，避免此间多头及商人谋取非利的弊端，是否有当？请裁夺’等情。中央认为上海市委的意见是正确的，请你们即以大战略区为单位（包括大城市）在上海设立办事处，统筹各单位贸易采购事宜，并与上海工商办事处取得联系，避免各项弊端。对于各区过去派赴上海人员所犯错误，应予检查，给以必要处罚。”

9月15日 侵朝美军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朝鲜战局发生急剧变化。

9月16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邓子恢、谭政、赵尔陆、苏静并告各军区党委的复电。复电同意他们对广东广西五个军的部署。在讲到歼灭由越南窜入之国民党军残部时，复电指出：惟请注意我军“两师兵力不要太迫近越南边界，要距边界远一点，如匪军由越回窜，则诱其深入百余里或二百余里，然后我军以必要力量

切断其来路，由西向东歼灭之，切忌打得太早，迫其逃入越境，麻烦甚大”。在讲到主力各军明年的剿匪工作、军事训练、文化训练和生产任务须作必要的调整，不使互相冲突时，指出：“凡有匪的地方，必须争取于明年彻底剿灭；文化教育须用大力推行，军事训练亦须占有一定时间完成一定整训任务，务使武器不生锈，装具不遗缺，战斗意志不降低。为达上述目的，则生产任务不能太多，应以改善部队生活为主，不以增加国家财富为主。如不减少生产时间，则文训与军训两项任务即不能完成。此问题为全军共同问题，除请你们考虑外，亦请西北、西南、华东、华北、东北各军区负责同志加以考虑，以其意见电告为盼。”同日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邓子恢、谭政、赵尔陆并告张云逸、莫文骅、李天佑（1）的复电：“你们十五日二十三时四十分电及张、莫、李十五日电均悉。张、莫、李所提意见是正确的，但须令我军注意不要超出国界。”

同日 为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起草给各大军区党委并告各中共中央局的电报：“地方党的整风工作，业已普遍进行，并向中央发来了许多报告，提出了许多好的经验；但军队党的整风工作是否已在进行及如何进行的，除少数有反映外，大多数尚无反映。我们希望各军区党委务于九月底或十月初向我们发来一次报告，概述全区部队第一期整风情况，如何，盼复。”

同日 阅西康区党委九月六日关于建立东藏自治区域（2）

（1）莫文骅，当时任中共广西省委第二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省军区副政治委员。1950年11月又任广西省政协副主席。李天佑，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省军区副司令员。

（2）即后来在1950年11月建立的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属于西康省之内），1955年10月划归四川省后改称甘孜藏族自治州。

人民政府问题给中共中央西南局并第十八军张国华、谭冠三（1）等的报告，批示：“刘、周、朱、任、李维汉同志：区域自治问题，牵涉很广，有西藏、青海、宁夏、新疆、甘肃、西康、云南、广西、贵州、海南、湘西等处，有的须成立内蒙那样的大区域政府，有的须成立包括几个县的小区域政府，有的是一个县或一个区的政府，疆域划分，人员配备，政策指导，问题甚多，须加统筹。此电所称东藏自治区域，是与西康省政府并立的，还是属于西康之内的？其疆域如何？是否事前得到中央批准？请维汉查告，或去电询问。”

同日 就抗议美机美舰侵袭我领空领海问题，批示：“周：东北及上海、山东沿海（渔民发现的）均继续发现美机或美舰侵袭，置之不理是不妥的，若每次抗议则不胜其烦，似宜每隔十天或半月汇集多案抗议一次，请酌办。沿海事件，军委有材料。”

同日 阅新华社九月十四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二二期刊载的《各地公家采购人在津乱抓物资破坏统一采购》一文，批示：“周：此件第二篇所述天津情况，与上海市委所反映的上海情况相同，请与一波商，适用上海建议由各区派人在天津设联合办事处，如何，请酌定。”

9月18日 就云南省军区在复员军人复审工作中将副班长以上干部和精壮战士全部继续留在部队一事，批示：“周：云南经验很好，请摘转各地。留下精壮是很必要的。”

同日 复信张维（2）：“来信收读，甚以为慰。令堂大人八

（1）谭冠三，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第18军政治委员。

（2）张维，早年同毛泽东有较多交往。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教授。

十寿辰，无以为赠，写了几个字借致庆贺之忱。”毛泽东写了“如日之升，如月之恒”八个字。

9月20日 发布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所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对该图案的说明，业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特公布之。国徽图案说明：国徽的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

同日 审阅修改周恩来起草的关于朝鲜人民军作战方针致倪志亮转金日成的电报稿。电报全文如下（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九月十八日电悉。请转告金日成同志：我们认为你的长期思想是正确的。朝鲜军民的英勇是令人感佩的。估计敌人在仁川方面尚有增加可能，其目的在于向东延伸占领，切断朝鲜南北交通并向三八线进逼。而人民军必须力争保住三八线以北，进行持久战方有可能。因此，请考虑在坚持自力更生、长期奋斗的总方针下如何保存主力便于各个歼灭敌人的问题。在目前主力暴露于敌人阵前，相持不下，消耗必多，而敌人如果占领汉城〔1〕则人民军后路有被切断的危险。因此，人民军主力似宜集结机动，寻敌弱点，分割歼灭敌人。在作战上，必须集中兵力，每一次作战以少数兵力及火力，分路钳制多数敌人，而以多数兵力（三至五倍）及火力（二倍以上）的绝对优势，围歼被我分割的少数敌人（例如一个团）。作战最忌平分兵力，最忌只能击溃或阻止敌人而不能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只要能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哪怕每次只歼灭敌人一个团一个营也好，积少成多，就可逐

〔1〕汉城，今名首尔。

步将敌人削弱下去，而利于长期作战。如果美军火力配备强，一时难于突入分割，则宜考虑先以李承晚伪军为对象，集中主力，每次歼灭其一二个团，每月歼灭其一二个师，半年后即可尽歼伪军，翦去美帝爪牙，使美帝陷于孤立，然后各个歼灭之。在持久战的原则下，必须充分地估计到困难方面，一切人力物力财力的动员和使用，必须处处作长期打算，防止下级发生孤注一掷的情绪。敌人要求速决害怕持久，而我人民军则速决既不可能惟有以持久战争取胜利。以上所陈，系站在朋友和同志的立场提出供你们参考。是否有当，尚祈考虑见复。”二十八日，美军占领汉城，朝鲜人民军实行战略退却。

同日 阅中共中央华北局薄一波、刘澜涛九月十九日关于华北工农业情况和意见的综合报告。报告就解决华北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不断增大问题提出意见：（一）采取适当的步骤停止农产品价格继续下跌。国营商店应依据高于市价的牌价大力收购粮棉，动员各级合作社、私商有计划地收购粮棉；同时，应组织工业品下乡，相应地完成回笼货币的任务。（二）适当降低某些工业品价格。在工商业中贯彻薄利广销的方针，加速商品与资金的流通。毛泽东批送周恩来、陈云、薄一波、刘少奇、朱德、任弼时：“我认为华北局的意见是正确的，请陈、薄即根据华北局所提各项召集有关人员开会，拟出具体方案，于数日内向中央报告一次，并迅即推行。此事极为重要，不能久延不决。”

同日 阅高岗九月十八日给倪志亮并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估计我军进入朝鲜境内以后，鸭绿江桥可能被炸，部队庞大的供应将依靠公路汽车为主。我们对朝鲜公路、铁路情况了解甚差，请向朝方要一详细的公路路线图并注明各地桥梁宽度、水深，以便准备和筹划器材。毛泽东批示：“周：这种电报打得很不好，去一电制止，请阅发。”毛泽东为周恩来起草的复高岗并倪志亮的电报是：“（一）不要向任何方面表示我军有出国的意图，向

朝鲜调查作战情况或要路线图只在不涉及此种意图时才可以，否则不要做；（二）高十八日致倪电表示了上述意图，很不妥，嗣后东北与倪一切向朝鲜交涉的事项均须经过外交部，不要直接处理。”

同日 致信罗荣桓：“你宜少开会，甚至不开会，只和若干干部谈话及批阅文件，对你身体好些，否则难于持久。请考虑。”

同日 致信黄克诚、王首道并告邓子恢：“据说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现正进行在我的家乡为我建筑一所房屋并修一条公路通我的家乡。如果属实，请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是为至要。”

9月21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复陈赓并告中共中央中南局、广西省委及韦国清的电报。电报说：“九月二十日电悉。（一）歼敌八百，缴获甚多，甚慰。（二）敌图重占东溪，给我以运动战的机会，你们的部署是对的。如果等了多日而敌不来，则可考虑包围七溪歼击援兵的方法，可能打一个较大的运动战，敌人是一定会增援的，敌人还不知道我方的虚实。（三）敌人意图是极力争夺边境区域，这种争夺战，可能延长几个月。如能在争夺战中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那是很有利的。因此你们要注意训练几千新兵以便随时补充缺额，要储备我军几个月所需的粮食。粮食不足时广西省委应负责接济并运至友境，汽油及其必需物资亦由广西负责，随缺随补，由陈赓与云逸直接商办。（四）为准备扩充炮兵，应在现有炮兵部队中多安副职，随战随学，以使我方每次作战缴获炮类（只要有炮弹）就能迅即使用为原则。（五）俘虏久留费用甚大，遣送赴欧亦甚麻烦，请与胡、武〔1〕商量是否可以在训练一个短时期后（例如两个月），即向敌方遣送，借以

〔1〕胡，指胡志明。武，指武元甲，当时任越南民主共和国国防部部长、越南人民军总司令。

扩大影响，瓦解敌军。此种俘虏遣送回去，即使再当兵，战斗力亦必大减，利于缴枪，如此反复多次，可以造成敌军瓦解潮流。俘虏必须留在越南境内，由广西送粮食去，万不可送俘虏来广西，前已电告你们了。”毛泽东并批示：“刘、朱、周、聂阅后发。”

同日 为督促治淮工程早日开工，批示：“周：现已九月底，治淮开工期不宜久延，请督促早日勘测，早日做好计划，早日开工。”

9月2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薄一波、刘澜涛并告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的电报：“你们九月二十三日报告中所提关于农业方面的各项改进办法，除举办农民银行一项应请中财委考虑提出意见外，其余各项都是可行的。其中有关农业部办理者，请你们直向该部洽商办理；有关水利部办理者，请你们向水利部接洽并帮助该部拟订华北全区水利计划，送政务院审查，纳入全国水利计划内一同办理。”

同日 复电彭德怀：“九月二十三日电悉。同意你偕徐立清同志于十月二日或三日来京商谈新疆工作问题，张宗逊同志的工作亦待你来京面商后再作决定。”

同日 复信黄炎培：“示悉。报头早几天已写寄吴晗⁽¹⁾先生，顷吴先生电话告我，已经收到，并已转付报社了。”

9月25日 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致祝词说：“你们是全中华民族的模范人物，是推动各方面人民事业胜利前进的骨干，是人民政府的可靠支柱和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号召全党党员和全国人民向你们学习，同时号召你们，亲爱的全

(1) 吴晗，当时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兼民盟北京市支部主任委员。

体代表同志和全国所有的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同志们，继续在战斗中学习，向广大人民群众学习。只有决不骄傲自满并且继续不疲倦地学习，才能够对于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作出优异的贡献，并从而继续保持你们的光荣称号。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这两件事都有赖于同志们和全体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一道，和全国工人、农民及其他人民一道，团结一致，协同努力，方能达到目的。”

9月下旬 为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题词：“战斗英雄们，你们是人民解放军的模范人物，希望你们继续努力，更加进步，为建设强大的国防军而奋斗！”

9月27日 阅罗瑞卿五月十九日关于全国经济保卫工作会议总结，批送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阅后交罗瑞卿，指出：“保卫工作必须特别强调党的领导作用，并在实际上受党委直接领导，否则是危险的。”

9月29日 批示胡乔木：“以后请注意，只说要打台湾、西藏，不说任何时间。各党派贺词中一九五一年任务我已全部删去，因其中有打台湾、西藏一项。”

同日 将南京市人民政府九月二十六日关于南京市失业半失业人员的救济情况报告，批示李立三：“此件有些意见应当采纳。解放前失业者须确定救济。加强对失业工人的政治教育确是重要的。各地报告收齐后，宜作总结发一指示。”

同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复陈赓并告中共广西省委电：“（一）同意采取谨慎态度，先打小据点，然后相机打可打之敌，务使确有把握，每战获胜，不打无把握之仗。（二）所需粮食，望与广西省委直接洽办。”

9月30日 周恩来在国庆节庆祝大会上发表《为巩固和发展

人民的胜利而奋斗》的讲话。讲话针对朝鲜战争郑重声明：“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这个讲话经毛泽东审阅修改。

同日 致电斯大林：“尤金〔1〕同志在这里工作了两个多月，对我们帮助很大。但是，关于帮助编辑毛泽东选集的工作现在还没有完结，还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并且希望他到山东、南京、上海、杭州、南昌、长沙、广州、汉口、西安、延安、沈阳、哈尔滨等处参观，并向我们的干部们作一些讲演，这样又需至少三个月时间。以上两项工作，共需四个多月的时间。因此，我请求你允许尤金同志在中国工作的时间延长至一九五一年的一月底或二月底。是否可以这样做，请予电复为盼。”十月九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同意尤金留中国到年底。

同日 复信罗隆基：“来信并承转齐老先生〔2〕惠赠各件〔3〕，均已收到，甚为感谢。请将我的谢意转致齐先生为荷。”

同日 复信胡志洋〔4〕：“来书敬悉，甚为感谢。如有革命大学一类学校可进，先生似以在长沙等地进这类学校研究一时期再做工作较为适宜，尚祈斟酌为荷。”

9月底或10月初 审阅修改中央军委关于重申保密纪律的训令稿。在训令稿讲到“责成各部首长切实认真的领导此项工

〔1〕尤金，苏联哲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主编。

〔2〕指齐白石，画家。当时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名誉教授。1951年7月又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3〕指齐白石送给毛泽东的他作的国画《鹰图》、一副篆书对联“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以及自己使用多年的石砚。

〔4〕胡志洋，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作”处，加写：“对全军保密工作加以检查，并规定整理办法，望于一个月内（即十月二十八日以前）将检查和整理情形向我们作一次专题报告，不得延误，是为至盼。”并批示：“刘、朱、周、任、聂阅后交李涛办。”“李涛：如十月二十八日各军区没有报告来，请注意拟电询问。”

10月1日 上午十一时，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庆祝大会，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和群众游行队伍。晚上，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

同日 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麦克阿瑟向朝鲜发出“最后通牒”，要朝鲜人民军无条件“放下武器停止战斗”。当天，斯大林来电要求中国立即派出至少五六个师到三八线，以便让朝鲜组织起保卫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战斗。深夜，金日成紧急约见倪志亮，向中国政府提出出兵支援的请求。

10月2日 晨，审阅修改周恩来致倪志亮即转金日成电。电报全文如下（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九月三十日经志亮同志电告情况已悉。一方面军八个师既被敌隔断，请考虑有无可能将该八个师分为两部分，以四个师将笨重武器破坏，分为许多的小的支队，从敌人间隙中分路撤至三八线以北，而以四个师在南朝鲜分散为许多小支队，倚靠人民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牵制大股敌人使其不能北进。二方面军所率五六个师现已撤至什么位置，是否可以于数日内全部撤至三八线以北？总之，你们的军队必须迅速北撤，愈快愈好，如遇敌人阻挡，亦应破坏笨重武器，分路从敌人间隙中插过来不能撤者则留在敌后坚持分散游击以上建议，妥否，请立复，并盼以具体情况见告。”晚上，审阅修改周恩来致倪志亮的电报稿，加写一段话：“请告金日成同志，除照今晨电尽可能将被敌切断的军队分路北撤外，凡无法

撤退的军队应在原地坚持打游击，切勿恐慌动摇，如此就有希望，就会胜利。”

同日 晨二时，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高岗、邓华的电报：“（一）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行动身来京开会；（二）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三）请邓将准备情况及是否可以立即出动即行电告。”

同日 关于派志愿军人朝参战问题，致电斯大林〔1〕。电报说：（一）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二）我们认为既然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

〔1〕这份电报未发出，可能起草于当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之前。原准备在会议作出派兵入朝参战决定后发给斯大林，后因会上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故将电报搁置下来。根据俄罗斯总统档案馆档案，1950年10月3日，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曾就毛泽东关于中国暂不出兵的初步意见电告斯大林。内称：“我们原先曾打算，当敌人向三八线以北进攻时，调动几个师的志愿军到北朝鲜帮助朝鲜同志。但是，经过慎重考虑，我们现在认为，这一举动会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第一，靠几个师很难解决朝鲜问题（我军装备极差，同美军作战无胜利把握、敌人会迫使我们退却。第二，最大的可能是，这将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结果苏联也可能被拖进战争中来，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极其严重了。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必须谨慎行事。”“因此，目前最好还是克制一下，暂不出兵，同时准备力量，这样做在把握与敌作战的时机上会比较有利。”

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三）这两个问题中，首先的问题是中国的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只要我军能在朝境内歼灭美国军队，主要地是歼灭其第八军（美国的一个有战斗力的老军），则第二个问题（美国和中国宣战）的严重性虽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时的形势就变为于革命阵线和中国都是有利的了。这就是说，朝鲜问题既以战胜美军的结果而在事实上结束了（在形式上可能还未结束，美国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承认朝鲜的胜利），那么，即使美国已和中国公开作战，这个战争也就可能规模不会很大，时间不会很长了。我们认为最不利的情况是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持成为僵局，而美国又已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于破坏，并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对我们不满（他们很怕战争）（四）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将预先调至南满洲^{〔1〕}的十二个师（五六个不够）于十月十五日^{〔2〕}开始出动，位于北朝鲜的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一面和敢于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敌人作战，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情况；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五）根据我们所知的材料，美国一个军（两个步兵师及一个机械化师）包括坦克炮及高射炮在内，共有七公分至二十四公分口径的各种炮一千五百门，而我们的一个军（三个师）只有这样的炮三十六门。敌有制空权，

〔1〕南满洲（旧称），指沈阳至大连铁路线以东的庄河、安东（今丹东）、通化、临江、清原和沈阳西南的辽中等地区。

〔2〕后来改为10月19日出动。

而我们开始训练的一批空军要到一九五一年二月才有三百多架飞机可以用于作战。因此，我军目前尚无一次歼灭一个美国军的把握。而既已决定和美国人作战，就应准备当着美国统帅部在一个战役作战的战场上集中它的一个军和我军作战的时候，我军能够有四倍于敌人的兵力（即用我们的四个军对付敌人的一个军）和一倍半至两倍于敌人的火力（即用二千二百门至三千门七公分口径以上的各种炮对付敌人同样口径的一千五百门炮、而有把握地干净地彻底地歼灭敌人的一个军。（六）除上述十二个师外，我们还正在从长江以南及陕甘区域调动二十四个师位于陇海、津浦、北宁〔1〕诸线，作为援助朝鲜的第二批及第三批兵力，预计在明年的春季及夏季，按照当时的情况逐步使用上去。”

同日 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战局和中国出兵援朝问题。毛泽东认为出兵朝鲜已是万分火急，但会上多数人不赞成出兵。会议决定十月四日召开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出兵入朝作战问题。毛泽东要周恩来派飞机到西安，接彭德怀到北京参加会议。

同日 张有晋：“几次来示均敬悉，甚为感谢。遵嘱写了船山学社四字，未知可用否？”

10月3日 中南海怀仁堂观看西南各民族文工团、新疆文工团等联合演出歌舞。柳亚子经毛泽东提议，即席赋词《浣溪沙》〔2〕。随后，毛泽东步其韵奉和一首，题名《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

〔1〕北宁线，指北京至沈阳的铁路，今京哈线的一段。

〔2〕柳亚子所作的《浣溪沙》词为：“火树银花不夜天。弟兄姊妹舞翩跹。歌声唱彻月儿圆。不是一人能领导，那容百族共骈阗？良宵盛会喜空前！”

团圆。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

10月4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朝鲜战局和中国出兵援朝问题。毛泽东首先让大家讲讲出兵的不利情况。不赞成出兵或者对出兵存有种种疑虑的人，陈述的理由主要是：我们打了这么多年仗，迫切需要医治战争创伤；建国才一年，经济十分困难；新解放区农村土改和城市民主改革还没有进行；国民党留下的众多土匪、特务、反革命分子没有肃清，人民政权还没有完全巩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差和无制空、制海权，等等。他们的意见是，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打这一仗。毛泽东说：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他最后宣布，明天继续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同日 审阅修改周恩来复倪志亮的电报稿。在复电稿说到根据目前情况，我武官参观组不要去三八线以南，应分两个小组处，毛泽东加写：“一个调查平壤附近及平壤安东线、平壤辑安线的各种情况，一个调查平壤元山线及元山清津线及其以北山区的各种情况，平壤元山线至三八线之间的情况如有可能亦应略作调查，但勿深入。”

同日 复信高希舜〔1〕：“九月二十九日来信收到，甚为感谢。吾兄既任美术学院院长，是否尚有可能去革大学习？如决意去学，可持此信去中共中央统一战线部询问，是否该校第四期可以容纳，然后再作决定。”

10月5日 上午，让邓小平去北京饭店接彭德怀到中南海，谈中国出兵援朝问题。毛泽东对彭德怀说：昨天你没来得及发

〔1〕高希舜，画家，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北京私立京华美术学院院长。

言。我们确实存在严重困难，但是我们还有哪些有利条件呢？彭德怀说：昨天晚上我反复考虑，赞成你出兵援朝的决策。毛泽东问：你看，出兵援朝谁挂帅合适？彭德怀反问：中央不是已决定派林彪同志去吗？毛泽东谈了林彪的情况后说：我们的意见，这担子，还得你来挑，你思想上没有这个准备吧？彭德怀表示：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毛泽东说：这我就放心了。现在美军已分路向三八线冒进，我们要尽快出兵，争取主动。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摆摆你的看法。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朝鲜战局和中国出兵援朝问题。讨论中仍有两种意见。周恩来支持出兵援朝的主张。彭德怀发言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毛泽东针对林彪提出的美军高度现代化，还有原子弹等观点，说：它有它的原子弹，我有我的手榴弹，我相信我的手榴弹会战胜它的原子弹，它无非是个纸老虎。经过会上的充分讨论，大家统一了认识，会议最后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会议还决定由彭德怀率志愿军入朝作战，并决定派周恩来、林彪去苏联同斯大林会谈。

同日 《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为纪念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一周年纪念专刊的题词：“中苏两国人民的团结极为重要，这两国人民团结了，世界人民的团结就不困难了。”

同日 阅罗瑞卿十月三日关于公安部队建设情形的报告。报告说：公安部队的质量，根据本年三月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指示的“公安部队数量不宜太大，但质量必须精干”的原则，各地在调拨公安部队时，似宜有适当的注意。毛泽东批示，请聂荣臻和罗瑞卿“协同与各中央局负责同志面商解决，以结果告我”。

10月6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复陈赓电：“十月四日两电均悉。（一）先集主力歼灭东溪西南被我〔1〕包围之敌，然后再看情形

围歼高平南逃之敌，此种计划是正确的。如果东溪西南之敌能在几天内就歼，高平逃敌又被抓住，谅山等处之敌又不出援，或虽出援而我军能分出一部予以阻隔，使之不能妨碍我军对东溪、高平两敌之作战，则你们可以取得两个胜仗。因此，你们除对东溪西南之敌必须坚决彻底加以歼灭，即使伤亡较大也不要顾惜、不要动摇（要估计到干部中可能发生此种情况）以外，并要对高平逃敌确实抓住，不使逃脱，并要对谅山等处可能出援之敌有所部署。只要对上述三点处理恰当，胜利就是你们的。（二）发表战报要说老实话，歼敌一个人缴敌一支枪，即说一个人一支枪，不要说两个人两支枪，养成朴实作风。”

同日 就各国元首致电毛泽东祝贺中国国庆一事，批示：“周：各国贺电均应回电致谢，请令外交部起草。”八日，审阅外交部起草的对各国贺电的复电，批示“照发”。

10月7日 同彭德怀、聂荣臻研究出兵援助朝鲜的各项准备工作。

同日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

10月8日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全文如下：“彭、高、贺〔2〕，邓、洪、解〔3〕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各级领导同志们：（一）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

（1）这里的“我”和下文中的“我军”，指越南人民军。

（2）彭、高，指彭德怀、高岗。贺，指贺晋年，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3）邓、洪、解，指邓华、洪学智、解方。

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二）中国人民志愿军辖十三兵团及所属之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四十二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与所属之炮兵一师、二师、八师。上述各部须立即准备完毕，待令出动。（三）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四）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五）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六）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目前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于我们有利，于侵略者不利，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

同日 就派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问题致电金日成：（一）根据目前形势我们决定派遣志愿军到朝鲜境内帮助你们反对侵略者；（二）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三）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方勤务工作及其他在满洲境内有关援助朝鲜的工作，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负责；（四）请你即派朴一禹〔1〕同志到沈阳与彭德怀、高岗二同志会商与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作战有关的诸项问题。（彭、高二同

〔1〕朴一禹，当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务相。1950年10月25日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

志本日由北京去沈阳。)

同日 派周恩来、林彪代表中共中央去苏联，同斯大林商谈抗美援朝和中国如果出兵〔1〕苏联给予军事物资援助，特别是向志愿军提供空军掩护的问题。

10月9日 起草周恩来致倪志亮并告高岗电：“中央已委托高岗同志负责处理一切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问题，嗣后关于此类事务均向高岗同志直接接洽，由高岗同志答复。坦克学校和军官学校的问题请高处理。”

同日 致电彭德怀：“据倪志亮十月八日电，金日成告倪称据友方〔2〕息敌将在平壤以北之新安州登陆等语，请加注意。”

10月10日 致电金日成并告彭德怀：（一）庆祝人民军克复蔚珍、竹边地区的大胜利。（二）现敌军大部北进，后方空虚，建议凡人民军无法北撤者均留于南朝鲜，开辟敌后战场，这在战略上是必须的而且是很有利的。如有人民军四五万人留在南朝鲜担负此项任务，则对北部作战将大有帮助。（三）敌似正在准备从镇南浦至新义州一线可以登陆之海岸举行新的登陆作战，切断平壤至新义州的交通线，而这一交通线是必须保护的，请彭与朝鲜同志研究保护方法，如敌登陆则应坚决歼灭之。”

同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复陈赓电，指出：“（一）越军大胜，极慰。（二）越军经此次胜利，必能提高一步。越军还年轻，只有从今后多次作战中才能逐步学会近敌作战的各项技术和战术。中国同志帮助他们要注意自己的方法和态度，使他们乐于接受，而不可将关系弄坏。中国同志必须随时检讨自己的方法和态度，只许做好，不许做坏。（三）战役结束后须休整二十天至一个月，

〔1〕当时周恩来是带着两种意见，即出兵或者不出兵，去同斯大林商讨的。

〔2〕指苏联。

总结经验，补充兵员，进行近战教育及政治教育，选定下一次作战的目标，做好下一次作战的计划。（四）这次胜利是在敌人统帅部没有预料越军一次能集中二万余人及战斗力提高的情况下取得的。敌人得了此次经验，必要谨慎些。”“在今后半年内外，越军须建设一个总数五万人左右的正规军，而有和法军地面部队一万人的两倍以上的火力（即法军一万人如有大小炮一百门，则越军五万人须有大小炮二百门以上），准备一次能歼灭法军一万人。”“此项计划，请你在此次休整期内和越南同志商量做出并电告为盼。”

同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这个指示经毛泽东审阅修改。

10月11日 复电彭德怀并告高岗、邓华：“十月九日、十日各电均悉。（一）同意四个军及三个炮兵师全部出动集结于你所预定的位置，待机歼敌；（二）已电华东调一个高射炮团于十月十四日从上海开动赴沈阳转赴前线，请高注意接转；（三）其他各项已另复。惟空军暂时无法出动。”

同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复陈赓电：“九日电悉。为了争取边界战役的完满胜利，必须鼓励士气，全歼拉本⁽¹⁾兵团及七溪守敌。当攻七溪时，谅山等处法军还是可能增援的，此点应预先估计到，并作阻援或打援部署。”

同日 对袁仲贤关于印度对西藏问题态度的报告，批示外交部：“应告袁大使：（一）西藏是中国领土，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首先希望不经战争进入西藏，故要西藏代表团九月来北京谈判，该团故意拖延，至今尚未动身。现人民解放军已向昌都前进，数日内可能占领昌都。如西藏

（1）拉本，当时是法国军队驻越南七溪池区的指挥官。

愿意谈判，代表团应速来京。（二）朝鲜问题应照周总理九月三十日演说内容答复之，即中国不能坐视其邻人受侵略而置之不理，扩大战争的责任应由侵略国担负。外交部拟电送阅。”

同日 致信王首道：“张次崙、罗元鲲〔1〕两先生，湖南教育界老人，现年均七十多岁，一生教书未作坏事，我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张为校长，罗为历史教员。现闻两先生家口甚多，生活极苦，拟请湖南省政府每月每人酌给津贴米若干，借资养老。又据罗元鲲先生来函说：曾任我的国文教员之袁仲谦〔2〕先生已死，其妻七十岁饿饭等语，亦请省府酌予接济。以上张、罗、戴三人事，请予酌办见复，并请派人向张、罗二先生予以慰问。张、罗通讯处均是妙高峰中学。戴住新化，问罗先生便知。”

同日 复信罗元鲲：“赐示敬悉，甚为感激！先生及张次崙先生一生从事教育工作，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保持政治清洁，年老贫苦，甚为系念。已商由湖南省人民政府王首道主席予以协助。袁吉六夫人亦在其列。张先生及袁夫人请代致敬意。”

10月12日 致电陈毅：“请令宋时轮兵团〔3〕提前北上，直开东北，何日能开动请告。”

同日 阅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十月十日关于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总结报告。报告指出：在部队思想建设上有两个重要问题亟待解决：一、部队中相当普遍地发生着和平麻痹情绪。首先要在

〔1〕张次崙，即张干，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任该校校长。

罗元鲲，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历史教师。

〔2〕袁仲谦，即袁吉六，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国文教师，1932年去世。袁仲谦的妻子姓戴。

〔3〕宋时轮兵团，指宋时轮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9兵团（1950年11月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序列）。宋时轮1951年6月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副司令员。

干部中传达这次会议的精神，树立战斗队思想、新爱国主义思想及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的动员。二、部队中英模立功运动贯彻不够普遍。这次会议要求各部队应大力推行这个运动，经常宣传英模事迹，中高级干部立功者亦应予以适当奖励。毛泽东将这个报告转发至军队师党委一级和地方的省市区党委，要求他们对上述两点研究并执行。

同日 阅斯大林、周恩来会谈后于十月十一日联名致毛泽东的电报。电报说，苏联可以完全满足中国提出的飞机、大炮、坦克等军事装备，但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须待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才能出动支援志愿军的作战。毛泽东决定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此事。

同日 致电彭德怀、高岗、邓华、洪学智、韩先楚〔1〕、解方：“（一）十月九日命令暂不实行，十三兵团各部仍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二）请高岗、德怀二同志明日或后日来京一谈。”同时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饶漱石、陈毅电：“（一）十月九日命令暂不实行，东北各部队仍就原地进行整训，暂不出动。（二）宋时轮兵团亦仍在原地整训。（三）干部中及民主人士中亦不要进行新的解释。”

10月13日 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中国出兵援朝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即使苏联不出空军支援，在美军越过三八线大举北进的情况下，我们仍应出兵援朝不变。当晚十时，毛泽东把这个决定电告在莫斯科的周恩来：“（一）与高岗、彭德怀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专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重组人民军。两个月后，

〔1〕韩先楚，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3兵团副司令员。

苏联志愿空军就可以到达。六个月后可以收到苏联给我们的炮火及坦克装备，训练完毕即可攻击美军。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二）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三）真日〔1〕菲里波夫〔2〕和你联名电上说，苏可以完全满足我们的飞机、大炮、坦克等项装备，不知它是用租借办法，还是要用钱买，只要能用租借办法，保持二十万万美元预算用于经济、文化等项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则我军可以放心进入朝鲜进行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四）只要苏联能于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除出动志愿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外，又能出动掩护空军到京、津、沈、沪、宁、青等地，则我们也不怕整个的空袭，只是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如遇美军空袭则要忍受一些损失。（五）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只对上述第三、第四两点没有把握，因此，请你留在莫斯科几天，和苏联同志重新商定上述问题，并以电报速复为盼。”

10月14日 晨一时，致电陈毅：“（一）宋兵团后尾部队酉俭〔3〕全部离开上海、常熟地区是可以的，宋兵团仍照前定计划在泰安、曲阜区域集结整训一时期待命开东北；（二）高射炮团仍须即开东北；（三）上海人民代表会议何日开幕盼告。”

同日 晨三时，致电周恩来，通报朝鲜情况和中国人民志愿

〔1〕真日，即11日。

〔2〕菲里波夫，斯大林的代称。

〔3〕酉俭，即10月28日。

军入朝参战意见。其中说：“美是否进攻平壤及何时进攻平壤，似乎尚未作最后决定。”“金日成指挥的朝鲜各个尚能战斗的部队在三八线坚决对敌，南部人民军撤至三八线以北有五万余人，大部留在南朝鲜”。“彭德怀同志在安东研究情况后，认为如果我军能以一个军进至平壤东北方面约二百公里之德川县山岳地区，而以其余三个军及三个炮兵师位于德川以北之熙川、前川、江界地区，则第一，可能使美伪军有所顾虑而停止继续前进，保持平壤、元山线以北地区至少是山岳地区不被敌占。如此，则我军可以不打仗，而争取时间装备训练。第二，如元山、平壤两敌向北进攻德川等处山岳地带，则我军可以必要兵力钳制平壤之敌而集中主力歼灭由元山方向来攻之伪军，只要歼灭一二个或二三个完整的伪军师，局势就大为松动了。彭及高岗同志均认为打伪军有把握，他们和我一样，都认为参战为必需和有利。”

同日 同彭德怀、聂荣臻研究中国人民志愿军渡鸭绿江计划和出国后的作战方案。

同日 晚九时，致电周恩来，通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方针和部署：（一）京政治局会议决定参加朝鲜战争并按此布置 X（1）方面工作。（二）彭德怀同志明（十五）日返安东，在安东布置两三天即去德川与金日成会面。（三）我已告彭，在他到德川研究情况后，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构筑两道至三道防御阵线。如敌来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如平壤美军、元山伪军两路来攻则打孤立较薄之一路。现在的决心是打伪军，也可以打某些孤立的美军。如时间许可，则将工事继续增强。在六个月内，如敌人固守平壤、元山不出，则我军亦不去打平壤、元山。在我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

〔1〕原文如此。

和地上均对敌军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去攻击平壤、元山等处，即在六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我们这样做是有把握的和很有利益的。（四）美军现尚停留在三八线，它进攻到平壤需要时间，由平壤再向德川进攻又需要时间。如平壤美军不向德川进攻，元山的伪军估计也难于单独进攻，这样就给我军的开进及修筑布防的时间。（五）我军决于十月十九日开动，先头军步行二百公里至德川需七天，休息一两天，可于十月二十八日在德川、宁远线以南地区开始构筑工事。全军二十六万人渡过鸭绿江需要十天时间，即要到十月二十八日才可以渡江完毕。（六）为着准备在十一月内在敌进攻德川区域时打一个胜仗，我们决定还是出发二十六万人（十二个步兵师、三个炮兵师）均开进为好。在工事已经修好，敌又固守平壤、元山不敢来攻的情况下，再将军队的一半左右开回中国境内练兵就粮，打大仗时再去。（七）在我军开进半数修筑工事期间，朝鲜人民军方面还是继续抵抗，尽可能迟滞美伪两军前进为有利。（八）马上通知菲里波夫同志。”

同日 阅法舫法师九月九日给巨赞法师的信。信中建议，在征得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和李济深副主席同意后，请他们担任中国佛教的保护者。毛泽东批示：“《共同纲领》已予各种宗教以信仰自由的保护，不须要再说个人保护。”

10月15日 晨一时，起草周恩来致倪志亮转金日成电：“请即派一位熟悉道路的同志于十月十六日到安东接引彭德怀同志和金日成同志会面。如倪大使找不到金日成同志，则请倪大使派人去安东接引。”

同日 晨一时，致电高岗并邓华、洪学智、韩先楚、解方：

“（一）我人民志愿军决于十月十八日至迟十九日开始渡江前进，粮食等项则应立即前运勿延为要。（二）彭德怀同志本日或明日返安东。”

同日 晨五时，致电高岗、彭德怀并告邓华：“（一）三八

线上之美英伪军十三日已占金川，准备继续向平壤进攻，美陆战师准备从镇南浦登陆协攻平壤，由中路前进原拟向元山集结之伪第六、第八两师有转向平壤攻击的消息。（二）我军先头军最好能于十七日出动，二十三日到达德川地区。休息一天，二十五日开始筑工事制敌先机。第二个军可于十八日出动，其余可在尔后陆续出动，十天内外渡江完毕，请酌办。（三）粮弹是否已开始渡江输送，请高电告。”

同日 晚九时，致电周恩来：“请再与苏方一商，可否从商订掩护城市的喷气式空军中先抽调一个师来北京，以保护首都的空防。”

同日 阅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十月十四日关于近日市场情况的报告，批示薄一波：“投机风潮应估计会要来的，请速筹对付办法，并以告我为盼！”

同日 阅外交部办公厅十月十四日关于捷克斯洛伐克打算编辑出版毛泽东著作的报告，批示外交部：“请告捷克同志，这些文件（1）暂勿印行，待几个月后中国正式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发行以后，再行选印。”

10月17日 下午五时，就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头部队出动时间致电彭德怀、高岗并告邓华、洪学智、韩先楚、解方：“（一）先头两个军请准备于十九日出动，明（十八）日当再有正式命令；（二）请彭、高二同志于明（十八）日乘飞机来京一谈。”

10月18日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研究中国

（1）指捷克斯洛伐克中央军事出版处拟在1950年底以前编辑出版的毛泽东军事著作，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自由”出版处拟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集中收入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等。

出兵援朝问题。会上周恩来汇报去苏联同斯大林、莫洛托夫等商谈中国出兵援朝问题的情况，彭德怀汇报志愿军准备入朝的情况。毛泽东听取大家的意见后说：现在敌人已围攻平壤，再过几天敌人就进到鸭绿江了。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会议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按预定计划于十九日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

同日 晚九时，致电邓华、洪学智、韩先楚、解方并告贺晋年：“四个军及三个炮师决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十九晚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河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四时即停止，五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为取得经验，第一晚（十九晚）准备渡两个至三个师，第二晚再增加或减少，再行斟酌情形，余由高岗、德怀面告。”

同日 阅中共中央华北局十月十五日关于绥远非党干部提出的批评意见给中央的报告，批示薄一波：“行政会议讨论的问题，是否党员事先都要讨论？除某些特别重要问题外，一般问题可以事先不要讨论，提到行政会议上与非党人员一起讨论，似要活泼些，请叫绥远试试这样做。”

同日 “联合国军”占领平壤。

10月19日 致电邓子恢、谭政并告饶漱石、陈毅，刘伯承、邓小平、贺龙，习仲勋、马明方：“（一）为了保卫中国支援朝鲜，志愿军决于本日出动，先在朝鲜北部尚未丧失的一部分地方站稳脚，寻机打些运动战，支持朝鲜人民继续奋斗。在目前几个月内，只做不说，不将此事在报纸上做任何公开宣传，仅使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知道此事，以便在工作布置上有所准备，此点请各中央局加以注意。（二）四十八军可以在明年三月再行集中，如有特别情况需要提早集中时再通知你们。”

同日 复信刘天民：“来信收到，甚谢。李耿侯已牺牲。李介侯现在北京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情况尚好，知注并闻。”

同日 复信李云杭〔1〕：“两次惠书，并赠大著，极为感谢。在工作中学习是很好的。尚希孟晋不懈，完成教学目的。”

10月20日 为转发中共察哈尔〔2〕省委关于调整城乡关系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察哈尔省委的这一文件是正确的，全国各省市区均应推行”。察哈尔省委的报告，提出了为促进城乡物资交流使工商业继续好转的几项措施：一、大力掌握物价，使工农业产品在价格上保持适当的比例；二、吸引私商下乡经营农副产品；三、活跃市场金融，允许私人依法经营银钱业，进一步贯彻借贷自由政策；四、工业上坚持以销定产的方针；五、商业上继续贯彻薄利多销的方针。

10月21日 鉴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渡江后，美军和南朝鲜军迅速大举北进，直向中朝边境逼近，毛泽东决定放弃原定先组织防御的计划，改取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方针。晨二时半，就志愿军打好出国第一仗致电倪志亮、柴军武即转彭德怀，并告邓华、洪学智、韩先楚、解方及高岗、贺晋年：“（一）伪首都师由咸兴向长津前进。伪三师似将进至咸兴。伪六师改由破邑向北，目的地第一步在德川，第二步可能向熙川。伪七、八两师第一步向顺川、军隅里、安州，第二步可能向泰川、龟城。以上五个师的最后目的地是江界、新义州一线。截至此刻为止，美伪均未料到我志愿军会参战，故敢于分散为东西两路，放胆前进。（二）估计伪首、伪三两师要七天左右才能进到长津，然后折向江界。我军第一仗如不准备打该两师，则以四十二军的一个师位于长津地区

〔1〕李云杭，毛泽东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友，曾参加新民学会。

〔2〕察哈尔省，1952年撤销，所辖地区分别划归河北、山西两省。

阻敌即够。四十二军的主力则宜放在孟山以南地区（即伪六师的来路），以便切断元山、平壤间的铁路线，钳制元、平两地之敌，使之不能北援，便于我集中三个主力军各个歼灭伪六、七、八等三个师。（三）如伪六师（较强）由破邑（在铁路线上）至德川的路上能有朝鲜人民军一部作有力的阻击，则该敌可能要到十月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才能占领德川，如果我四十军（全部）能于二十三日赶至德川、宁远地区，则可以绕至伪六师的后方（由东面绕至南面铁路线附近），让出正面给他军使用（三十八军或三十九军）如果太迟，则敌将先占德川。（四）此次是歼灭伪军三几个师争取出国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的极好机会，如何部署，望彭、邓精心计划实施之。（五）这一仗可能要打七天至十天时间（包括追击）才能结束，我军是否带有干粮？望鼓励全军，不惜牺牲，不怕艰苦，争取全胜。（六）彭、邓要住在一起不要分散。”

同日 晨三时半，致电邓华并告彭德怀及高岗：“（一）你们是否已前进，我意十三兵团部应即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二）如部队渡河须有机构在安东指挥，则可留适当同志率一部机构留在安东，你和其余同志率必要机构即往彭处为宜，望酌定。”

同日 晨四时，致电彭德怀、邓华：“（一）请注意控制平安南、平安北、咸镜三道交界之妙香山、小白山等制高点，隔断东西两敌，勿让敌人占去为要。（二）敌人测向颇准，请加注意。（三）熙川或其他适当地点应速筑可靠的防空洞，保障你们司令部的安全。”

同日 晚八时，致电彭德怀、邓华：“（一）现得悉伪六、八两师二十日经德川向熙川推进。（二）我四十军欲先敌赶至德川

时间上是否来得及，如不可能则似以在熙川附近地区部署伏击为宜，请酌定。（三）四十二军亦照你们原来部署为好。”

同日 致信胡乔木：“外国通讯社如对志愿军有反映，请注意在四五天内不要登载在《参考消息》上。”

同日 致信胡乔木：“昨日《光明日报》上吴耀宗的文章〔1〕，可以广播，《人民日报》应当转载。”

10月22日 晨七时，就速定围歼南朝鲜军第六、八两师的部署问题致电彭德怀、邓华：“（一）彭二十一日十六时电悉。（二）据伪二军团长二十日十六时三十分称，第六师，正集结顺川、新仓里间，拟命其进抵新义州。第八师，正集结江东、成川间，拟命其进抵满浦镇。该军团参谋长**同日**命第七师主力集结成川、顺川间休整，但严禁进抵顺川。伪二军团指挥所在三登。据此判断，如数日内，敌机尚未发现我军开进，则伪六师将经新安州进至博川及其以西地区，伪八师将进至军隅里及其以北地区，伪七师则在顺川地区作预备队。如二十一日六、八两师继续前进，则本（二十二）日六师可能进到新安州，八师可能进到军隅里。因此我军行进路线必须避开定州、博川、军隅里一线及其以北约二十公里地区不走，而走以北路线，否则，就会过早被敌人发觉，敌将停止前进，或竟缩回去。而此次作战，则以在博川、军隅里及其以北地区围歼该敌为最有利。请按此意图，速定部署，迟则恐来不及。（三）另据伪一军团长二十日十时称，美十军团长命令该军团之首都师，即由咸兴向北青、城津推进，第三师集结咸兴。并谓美十军团部正向咸兴移动，其任务为指挥伪一军团作战（按美十军团由原在汉城之美陆战第一师及原在大邱之美第七师组成，海运元山登陆）。据此，似敌暂不去长津，于我有利。但彭电

〔1〕指吴耀宗《怎样推进基督教革新运动》一文。

派一个师占领长津及派必要兵力控制妙香山、杏川洞，仍甚必要，请速实行。还有小白山，也应派兵控制，确实隔断东西两敌。因我军在西面发起战斗后，东面伪军可能回援。（四）如果我军能同时包围伪六、八两师，则于战局最为有利，我四十军应担任包围一个师，三十九军应担任包围一个师。当战斗紧急时，除伪七师必然增援，我可歼该敌外，现在平壤之伪一师，亦应估计可能增援，你们也要准备对付该师。东面伪军虽亦可能回援，因路远，难于赶到。平壤美军则增援可能性更少。”

同日 上午九时，就立即占领妙香山、杏川洞复电邓华、洪学智、韩先楚、解方并告彭德怀、高岗：“（一）二十一日二十一时电悉。（二）敌进甚速，请照彭电立即用汽车运一部兵力去占领妙香山、杏川洞，先运几个营去也好。（三）无论用汽车运兵运物及步行的人马武器都不要再走宣川、定州、博川、军隅里线及龟城、泰川、球场线，上述地区，几天之后都可能被敌占，而应取该线北面的道路前进。（四）新义州、铁山、宣川地区应由你们派一部兵力固守。（五）调一个军至安东问题，待商定后再告。”

同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张宗逊电：“战事紧急，十九兵团部及主力两个军，须于接电后一个月内即十一月二十四日以前，完成一切出发准备工作，待命开东北，另一个军则可于十二月内出发。”

同日 阅章汉夫同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关于西藏问题的谈话记录，批示：“西藏为中国内政问题，任何外国无权过问，简单地答复之。”

10月23日 就朝鲜战局问题，复电彭德怀并告高岗：“二

十二日戌时电〔1〕悉。你的方针是稳当的，我们应当从稳当的基点出发，不做办不到的事。朝鲜战局，就军事方面来说决定于下列几点。第一是目前正在部署的战役是否能利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全歼两个三个甚至四个伪军师（伪三师将随伪六师后跟进，伪一师亦可能增援此战如果是一个大胜仗，则敌人将作重新部署，新义州、宣川、定州等处至少在一个时期内不会来占，伪首、伪三两师将从咸兴一带退回元山地区，而长津可保，新安州、顺川两点是否保守也可能成问题，成川至阳德一段铁路无兵保守向我敞开一个大缺口，在现有兵力的条件下，敌人将立即处于被动地位。如果这次突然性的作战胜利不大，伪六、七、八师主力未被迅速歼灭，或被逃脱，或竟固守待援，伪一、伪首及美军一部增援到达，使我不得不于阵前撤退，则形势将改到于敌有利，熙川、长津两处的保守也将发生困难。第二是敌人飞机杀伤我之人员妨碍我之活动究竟有多大。如果我能利用夜间行军作战做到很熟练的程度，敌人虽有大量飞机仍不能给我太大的杀伤和妨碍，则我军可以继续野战及打许多孤立据点，即是说，除平壤、元山、汉城、大邱、釜山等大城市及其附近地区我无飞机无法进攻外，其余地方的敌人都可能被各个歼灭，即使美国再增几个师来，我也可各个歼灭之。如此便有迫使美国和我进行外交谈判

〔1〕指彭德怀 1950年10月22日戌时关于目前战役计划给毛泽东并高岗的电报。电报提出：半年内我军的基本方针，是保持长津、熙川、龟城以北山区和长甸河口、辑安、临江线渡河交通，争取时间准备反攻条件。目前我无制空权，东西沿海诸城市甚至新义州在敌海陆空和坦克配合轰击下是守不住的，应果断地加以放弃，以分散敌人兵力，减少自己无谓消耗。目前战役计划一面以一个军钳制敌人，一面集中三个军寻机消灭伪军两三个师，争取扩大巩固元山、平壤线以北山区，发展南朝鲜游击战争。

之可能，或者待我飞机大炮的条件具备之后把这些大城市逐一打开。如果敌人飞机对我的伤亡和妨碍大得使我无法进行有利的作战，则在我飞机条件尚未具备的半年至一年内我军将处于很困难的地位。第三，如果美国再调五个至十个师来朝鲜，而在这以前我军又未能在运动战中及打孤立据点的作战中歼灭几个美国师及几个伪军师，则形势也将于我不利，如果相反，则于我有利。以上这几点，均可于此次战役及尔后几个月内获得经验和证明。我认为我们应当力争此次战役的完满胜利，力争在敌机炸扰下仍能保持旺盛的士气进行有力的作战，力争在敌人从美国或他处增调兵力到朝鲜以前多歼灭几部分敌人的兵力，使其增补赶不上损失。总之我们应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

同日 晨七时，就全歼南朝鲜军第六、八两师的部署问题，复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一）彭、邓、高二十二日各电均收到。（二）据所收最后情报，伪二军团指挥所二十二日由江东折返成川，伪六师、八师二十二日进至顺川、成川铁路线以北之北仓里、新仓里地区，有两师并列经德川向熙川集中攻击的意图，如无障碍，估计该两师明二十四日可能到德川或德川附近。因此，我车运控制杏川洞、妙香山一带之部队，务须争取于二十四日拂晓，至迟于二十五日拂晓以前，到达上述地点，否则将失去先机。

（三）作战部署，以四十军位于熙川正面及温井、云山地区，三十九军位于云山、泰川地区，三十八军位于熙川东南地区，待敌向熙川攻击之时，然后分数路出发包围攻击之，这即是彭二十二日十时电及邓、洪、韩、解二十二日十二时电的意见，我认为是适宜的，总以利于以主力插到敌人的后面和侧面，全歼六、八两师为原则。（四）敌首都师已确实向北青、城津东进，暂时不去长津，而平壤之伪一师及英二十七旅均将向新安州前进。一个美

军降落伞团（大约有二三千人）已在顺川降落。故我对伪六、八两师的战斗发起后，第一步，伪七师会增援，第二步伪一师及英二十七旅亦可能增援（美军已令英二十七旅向新安州如果把这一切敌人的主力各个歼灭，而举行追击时，在顺川地区可能遇到美伞兵团。此次作战，如能将上述一切敌人逐一歼灭，并控制新安州、顺川、成川、新邑、阳德线铁路及其以南一带地区，并一部伸出至谷山、遂安、伊川、新溪地区，使平壤、元山两敌互相孤立，不能联系，则我将处于主动，敌将处于被动。因此，此次战役必须集中尽可能多的兵力，准备连续打几个仗。四十二军去长津者似以一个师附一个炮兵团即够，而以该军主力位于小白山作战役预备队似较适宜。是否可行，请彭酌定。（五）已令杨成武抽调六十六军开安东，先头师今日从天津出发，主力明日出发。到后，一个师担任维持新义州、定州线交通，主力在安东为彭、邓的预备队，该军到后受彭、邓指挥，请邓留人指示该军，将一切有关志愿军的誓词口号及其他办法交给他们，并与该军沟通电台联系。（六）三十九军在新义州、铁山一带可以不留兵。（七）我各部派遣远出之侦察队均要伪装朝鲜人民军，而不要称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借以迷惑敌人。”

同日 下午二时，致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一）敌进甚速，伪六师二十二日已到价川，小部到宁边，伪一师有一个团到军隅里，估计此两部今二十三日均可到宁边，明二十四日可更前进若干里。请速令四十军主力即在温井地区荫蔽集结，以一部控制熙川，不要去云山、宁边与敌过早接触。三十九军即在龟城地区集结，亦不要去泰川。该两军侦察部队不要到定州、博川、宁边、球场去了，要注意避免和敌打响，要将熙川、温井、龟城一线以南地区让给敌人，诱敌深入，利于歼击。三十八军应迅速前进。（二）伪八师二十二日尚在德川以南之大坪里、北仓里，

走得较慢，但今二十三日可能到德川，或其附近。”

同日 下午五时，致电邓华、洪学智、韩先楚并告彭德怀：“敌进甚急，捕捉战机最关紧要。两三天内敌即可能发觉是我军而有所处置，此时如我尚无统一全军动作的处置，即将丧失战机。因此，你们应迅速乘车至彭处，与彭会合，在彭领导下决定战役计划，并指挥作战。何日动身，何日可到，望即告。”

同日 致电陈毅、张震：“（一）请令宋时轮同志即来北京。（二）宋兵团须从速进行政治动员和军事训练，并准备先开一个军去东北。”

10月24日 晨六时，致电彭德怀：“（一）人民志愿军司令部的组成拟即发布命令，除中国同志外请与金日成商量，以一个朝鲜同志为副司令兼副政委或者以一人作为副司令、一人作为副政委，如何请复。（二）如何发布作战公报，请与金商其内容，每次均须得你并报我同意，方式由朝鲜广播台先发表，新华社再转播。此事须妥为商好，以免两歧。”

同日 上午八时，致电高岗并告彭德怀、邓华：“六十六军先头师到安东后，请即令其前进控制新义州、铁山线（暂不去宣川、如敌来攻则阻击之，巩固该线于我手中。该军主力位于安东，在该军未与彭、邓沟通电台通讯以前请你予以指挥。该军应即编入志愿军序列，请你将志愿军的各种办法指示他们。”

同日 下午五时，致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今日情报，伪六师向楚山、北镇方向进攻，伪八师经宁远到熙川后向江界进攻，伪一师（战力颇强）已到宁边似将向泰川、龟城进攻。请你们注意诱敌深入山地然后围歼之，敌人至今还不知道我情况。（请注意白头山制高点。）”

10月25日 晨一时，就十月二十四日美机三架侵入我国辽东辑安县（1）上空一事，批示：“周、外交部：请将此事及十五、

十六日所出同类事件，加入外交部已起草的抗议电中，于二十六日夜拍去。”

同日 晨六时，就向鸭绿江进攻的敌军动向和我军任务问题致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电报说：据昨二十四日情报，此次被美军驱使向鸭绿江冒险进攻的敌军有伪六师、伪八师、伪一师、伪七师、英二十七旅。我军第一仗必须准备和上列五部作战，并至少歼灭其中三个师，才能初步解决问题。四个美国师在平壤为中心地区；两个美国师正在元山登陆中；两个伪军师，在北青、咸兴、元山线。三八线以南极为空虚，只有一个土耳其旅（新到）及三个残破的伪军师。因此，人民军大活跃。只要北面打一二个胜仗，南面的活动将更高涨。请令六十六军准备阻击或部署歼灭英二十七旅。请高在鸭绿江中准备多数船只以备桥梁破坏时用。桥梁破坏如不大应随破随修，并调查临江一带船渡是否容易。

同日 晨六时，致电彭德怀、邓华并高岗：“新得情况如下：（一）伪六师之第二第七两团经桧木洞昨日到达接近江边之古场，今日当可到楚山城，这就威胁我辑安、长甸河口〔2〕两处交通线，请速作处置；（二）八师两个团估计今日可到熙川；（三）美二十四师和英二十七旅一道已过新安州、清川江，据说美军战斗力比伪军为弱，但第一仗似以打伪军为主为适宜；（四）美二十五师维持平壤至大田交通线，美骑一师守平壤、镇南浦一带，以上两师均不能动，美第二师似在平壤南北，情况不明，伪七师主力

〔1〕辽东省和辽西省于1954年合并成立辽宁省，合并时辽东省的一部分县市划归吉林省。辑安县，今吉林集安市。

〔2〕长甸河口，位于辽宁宽甸县南部。

尚在江东，其一个团附属于伪一师已到宁边。”

同日 晨六时半，致电彭德怀、邓华：“现在为止收到的一切消息中，只有伪六师谍报参谋称，据难民报告，十九、二十两日夜间有六十辆汽车载有八路军由新义州到昌城郡之新仓等语，此外任何方面尚无我军到达的反映。平壤和东京美军方面均认为几天内就可以到达鸭绿江，此外有些人认为金日成还想在江界组织最后抵抗。”

同日 下午五时，致电彭德怀、邓华：“（一）敌已开始发现我军。昨二十四日夜伪某部称，敌主要为八路军，企图经云山、温井山路集结北镇。又空军夜间侦察报告称，敌军车辆正自江界络绎南下等语。估计今明两日被敌发现必更多。（二）请考虑于明二十六日或二十七日先抓住一两部敌军围攻不使逃脱，吸引敌主力增援，是否妥当请酌定。（三）伪一师确到宁边、龙山洞，请告三十九军注意抓住。伪七师主力尚在江东。”

同日 关于志愿军领导机构设置和主要干部配备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第十三兵团党委并转各级党委并告东北局电：“（一）为了适应目前伟大战斗任务的需要，十三兵团司令部政治部及其他机构，应即改组为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及其他机构；（二）彭德怀同志为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前已通知、邓华、朴一禹、洪学智、韩先楚四同志均为副司令员，邓华、朴一禹二同志均兼副政治委员，解方同志为参谋长，政治部、后勤部及其他机构的负责同志均照旧负责；（三）党委组织亦照原名单加入彭、朴二同志，以彭德怀同志为书记，邓华、朴一禹二同志为副书记。”

同日 南朝鲜军一个加强营由温井（距离彭德怀的指挥所所在地大榆洞仅十几公里、向北镇进犯，被志愿军第四十军一个团将其大部歼灭，打响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第一仗。第一

次战役开始。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提议的将十月二十五日这一天作为志愿军赴朝作战的纪念日。

10月26日 晨二时，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高岗电，通报南朝鲜军第一、六、八师行动情况：“（一）在富榆洞与我军接触的是伪六师第二团。该师之第七团，有一个营进至桧木洞，其余在熙川附近清剿。该师之第十九团，在熙川修机场。估计此两团今二十六日将向第二团增援。昨报该师去楚山，是参谋人员弄错。（二）伪八师之第二十一团，二十四日即从苏民洞向北，大约昨二十五日到了熙川一带。该师之第十团、第十六团昨二十五日还在松亭里及德川一带，大约今二十六日可能向熙川前进，可能留一部在德川保护机场。（三）伪一师自己有三个团即第十一团、第十二团、第十五团，又附属伪七师之第八团，故该师共有四个团。在利洞与我一二〇师接触的一个团如确系伪一师所部，则该师主力可能向利洞增援，请注意。”

同日 晨四时，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贺晋年、张秀山（1）电：“请直接指挥六十六军，给以任务和领导，迅速沟通电台联系，以利保卫新义州、铁山一带地区，阻止或歼灭英二十七旅等部的可能进攻。”

同日 晨五时，致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美二十四师、英二十七旅已在新安州一带渡过清川江，请令三十九军勿去龙山洞、宁边，暂时避开（如果可能的话）美英军，以免被其胶着，而应由泰川向云山及其以北方向前进寻伪一师作战，与四十军、三十八军配合，首先歼灭伪一、伪六、伪八等师，然后再打美英

（1）张秀山，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部长、职工委员会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

军。如伪一师与英美军在一起则暂时也不要打伪一师，待伪六、伪八歼灭后寻机再打该敌。如何，请按情况酌定。”

同日 下午二时，复电彭德怀并告高岗：“十月二十五日戌时电悉。（一）先歼灭敌人几个团，逐步扩大，歼灭更多敌人，稳定人心，使我军站稳脚跟，这个方针是正确的。（二）伪六师之第七团确仍向楚山冒进。请高令五十军注意，从辑安及长甸河口两处对岸阵地向楚山逼近警戒。惟该敌可能在楚山先我建立据点，五十军如要攻击，应先作好准备，应估计这部分敌人是较强的。（三）伪一师指挥所已到云山，其第十二团进抵温井里附近。其第十五团在第十二团后跟进。其第十一团在云山以南。附属该师之伪七师第八团位置不明，估计亦抵云山一带。请告三十九军注意分割歼灭该师。三十九军应以有力部队隔断伪一师与博川一带之美英军。（四）我四十军歼灭伪六师第二团后，其第十九团（分得很散）可能集中向温井方向前进，请令四十军注意。（五）伪八师两个团今二十六日可能到熙川，其另一个团（第十团）今日可能留在德川，请告三十八军注意。（六）我军第一个战役须确定以歼灭上述三个伪军师为目标，分为几个大小战斗完成之，然后再打美英军。”

同日 下午四时，复电彭德怀、邓华、韩先楚、洪学智并告高岗：“十月二十六日七时电悉。美二十四师向碧潼，英二十七旅向新义州，这是过去几天的计划。今后几天则有三种可能：第一是伪一师被我围歼时向北增援伪一师；第二是照原计划进攻碧潼、新义州不变；第三是在博川一带观望形势。我应以第一种可能为基点，令三十九军迅速进至云山、温井线，以有力一部隔断伪一师与美英军的联系，以主力配合四十军一部保证迅速歼灭伪一师（战力较强，且有四个团），然后改向南面防御，待伪六师、伪八师均被我歼灭后，看情况再定对美英军作战的部署。以上请酌办。”

同日 晚十一时，就歼灭南朝鲜军第一、六、八师的部署，致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一）截至此时所得情报，伪六师正以其第七团主力、第十九团全部向温井增援，利于我四十军各个歼击。（二）伪八师指挥所已到熙川，三个团已到一部，估计明二十七日可全部到熙川，我三十八军如在明二十七日夜发起攻击，须以伪八师全部为目标而分割围歼之。（三）美二十四师称一师（指伪军）在云山被包围，美二十四师被阻不能前进，但决心歼灭共军等语。请令三十九军以有力一部钳制美二十四师使其暂时不能向北面增援，以利全歼伪一师；三十九军主力并配合四十军一部以全歼伪一师为目标是很必要的，尽可能勿使该敌逃脱。（四）在伪一、六、八师歼灭后，请令四十二军以一个师占领宁远、德川、孟山，派出几个支队分路袭扰价川（伪二军团指挥所在此）、顺川、成川等处，威胁美二十四师、英二十七旅之后路，并使平壤美军难于北援。”

10月下旬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事宣传指示稿，加写一段话：“美国如果竟敢在此时爆发世界战争，则其失败将更彻底，因为现在美国的军事准备尚未完成，而和平阵营势力则大于美英势力。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但不能听任美国侵入中朝边界而置之不理。”

10月27日 上午十时，复电彭德怀并告高岗：“十月二十六日十八时电悉。（一）宋时轮已来京面谈，九兵团定十一月一日起车运梅河口地区整训，前线如有战略上急需可以调用，如无此种急需则不轻易调用。（二）元山登陆之美军系由汉城移去之美陆战第一师，由大邱移去之美步兵第七师及美第十兵团部，估计有三万人左右，号称五万不可信。该敌早已船运，因受元山港水雷威胁迟疑不敢登陆，现在始登陆。过去因该两师美军未登

陆，伪三师须守备元山、咸兴一带，致伪首师孤军东进，该师长表示恐惧。原拟俟美军登陆后接防元山、咸兴线，让伪三偕伪首一起东进。现在我军出现，其计划可能变更。是否将以伪三、伪首向长津进攻，以美军一部出长津以南策应，目前尚不能定，因平壤、元山间二百公里地区向我敞开着，元山本身亦受威胁。（三）伪八师今晨已从熙川逃至球场洞，目前似只有伪六师尚有希望。在打伪六师时，伪八、伪一仍可能增援，请注意。（四）你们指挥所应移至安全地点，现在的位置不好。”

同日 上午，邀正在北京的王季范和周世钊到中南海。在谈话中，毛泽东谈到政治和宗教的关系问题。他说：在中国历史上，道教、佛教、五斗米教、明教、白莲教、天主教、八卦教，都常与政治有联系。周世钊问：主席今天为什么有这种闲情来谈宗教与哲学的问题，朝鲜局势不是很紧张吗？毛泽东说：朝鲜局势日趋紧张，这段时间我们为了讨论这个问题，有很多天是睡不着觉的。但是，今天我们可以高枕而卧了，因为我们的志愿军已经出国了。他说：我们急切需要和平建设，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有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抵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帝的侵略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我们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们的头上，以台湾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我是不打无把握之仗的。这次派志愿军出国，我们中

央一些同志经过周详的考虑研究，制定了持久战的战略，胜利是有把握的。

同日 晚十时，致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一）据此间所收情报均说伪六师之第二团被围并说已被歼，与来电所说不符，望查告。伪六师第十九团向温井增援，其第七团在古场被我切断后路；似此，如打得好，可能全歼伪六师。（二）伪八师只有一个营在熙川，主力已撤至球场有向温井进攻说，似此，以熙川为攻击目标之部署已不适宜，请按新情况酌定。”

同日 致电彭德怀：“暂时不宜发表作战新闻，待战役告一段落再发表为宜。”

同日 阅北京市二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的送请政府建议中共中央考虑在天安门前建立毛泽东大铜像的提案，批示：“周总理：不要这样做。”

10月28日 亲视任弼时遗体入殓，并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执紼，将灵柩移至劳动人民文化宫灵堂。随后，为纪念任弼时逝世题词：“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任弼时于十月二十七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四十六岁。

同日 上午十一时，复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一）你们两个新的部署电都是很好的，以一一八师及五十军一部围击伪七团于楚山、桧木洞之间（请注意于两三天内包围而不歼灭，让其大唤大叫），吸引一、六、七、八等四个师北援，以便主力聚歼。你们的聚歼部署极为正确。（二）你们指挥所应速建坚固的防空洞，立即修建，万勿疏忽。”

同日 下午四时半，复电彭德怀、邓华并高岗：“十月二十八日八时电悉。（一）庆祝你们的初战胜利。（二）目前全战役的关键有两点，一是确实抓住古场、楚山之伪七团不使逃脱，如此则伪一、六、八师非增援不可，有仗可打；二是我三个军全部

到齐并完成战役展开，如此则我攻击时猛速有力，保证歼敌。”

同日 晚十一时，致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据志司〔1〕报称，博川敌进占长山面，在泰川以南与我一一五师接触等语。果如此，则极好。请令一一五师北撤，在定州、宣川、泰川、龟城一带之友我部队，兵站人员，一律西撤，让该敌深入泰、龟、定、宣区域以利尔后歼击。此种意图原是你们提出的，极为正确，望令上述各部执行（一一五师尚未执行）。”

同日 为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起草致华东、中南、西北、华北各军区政治部电，批准云南省军区关于在起义部队的军、师、团三级组织军政委员会的建议。指示各军区所属部队凡有较多起义军官参加的军队，在团以上各级均可组织军政委员会，以利团结和改造。

同日 为转发华北军区党委召开的高干会议情况的报告，起草给各大军区党委并转至军级党委的批语：“我们认为华北军区党委会十月二十六日向军委的报告是正确的，这是按中央方针所作的具体计划和切实处置。请你们参照此文件，做出自己的具体计划和切实处置，并尽速报来，是为至要。”报告说，到会干部一致拥护中央和军委对朝鲜问题的决定。会议要求军队为适应新的形势，从各方面迅速地顺利地由和平到战争的转变。会议讨论决定了几个问题：（一）彻底克服和平麻痹思想；（二）建立与改变组织机构，培养干部；（三）加强战备；（四）部队训练。

同日 阅袁仲贤十月二十六日关于梅农〔2〕同申健谈西藏问

〔1〕志司，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的简称。

〔2〕梅农，当时任印度外交部外交秘书。

题的报告，批送周恩来并外交部：“申健答得很正确〔1〕，态度还应强硬一点，应说中国军队是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无论西藏政府愿意谈判与否及谈判结果如何，任何外国对此无置喙的余地。”

10月29日 晨六时，致电彭德怀、高岗：“东面伪首、伪三及美七师共三个师由咸兴向北进攻的可能性极大，必须使用宋时轮主力于该方面方有把握，否则于全局不利。请你们考虑第二十七军十一月一日由泰安直开辑安或满浦，直上前线外，余两个军是否接着开通化、辑安地区休整待命，以备必要时使用，盼复。”

10月30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致第九兵团、第十九兵团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及各军区电：“据志愿军司令部十月二十九日报告称，‘我四十军与温井南朝鲜军数日战斗中了解敌战斗特点如下：一、敌战斗力弱。冲锋或反击，必须依赖火力支援，怕近战（怕刺刀、手榴弹二、攻击精神差。以小部队〔一个班或多至一个排〕向我袭击，攻不动则退守，只要我组织好火力发起冲锋即逃跑。三、炮火猛烈，步枪射击技术差。每当进攻与撤退前，必须以炽烈炮火掩护，昼则进攻，夜则退回，并宿汽车上。四、对已失阵地，立即以空军侦察及依地面炮火指示目标，以三四架飞机扫射

〔1〕1950年10月26日梅农约请申健谈西藏问题。梅农说中国军队进入西藏的消息如为事实，印度政府深感遗憾。他并向申健提交了印度政府关于西藏问题致中国政府照会的副本。申健指出，在印度报纸上时常看到中国“侵略”的字样，在印度政府照会上也使用了，这样的用法是不对的。中国军队进入中国的领土西藏是不能叫侵略的，正如印度政府的军队进入印度联合省或孟买不能叫侵略一样。梅农说，印度仍望中国用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申健说，中国政府始终愿用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军队不能进入西藏。

轰炸。五、工事构筑简单，并缺乏工具。炮兵阵地多在开阔地或公路上，装备笨重，不能上山。六、每日天明后，均以一至四架飞机，在敌住地周围几十里内低空盘旋，侦察扫射。七、特务活动积极，多化装难民，携带军图、短枪、手榴弹等，在我住地打黑枪，焚烧弹药、汽车、村庄，以及向空军联络（以白手巾等）。八、对付敌坦克并不困难，敌一师十五联队，原配属五辆坦克，被我击毁四辆’等语。按最近数日几次小规模战斗已将南朝鲜反动军约一个师歼灭，正在继续逐步歼灭敌军中，歼灭各部分敌军，是有把握的。”

同日 晚八时，复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一）庆祝你们歼灭伪八师四个营的胜利。（二）你们三十日九时的部署是很好的。我方对敌人数量、位置、战斗力和士气等项均已明了，我军已全部到齐展开，士气高涨，而敌人对我方情况则至今不明了（只模糊地知道我军有四万至六万人），因此，你们以全部歼灭当面敌人伪一师、伪七师、英二十七旅、美二十四师及美骑一师一部及伪六师、伪八师残部为目标是完全正确的。只要我三十八军全军及四十二军一个师能确实切断敌人清川江后路，其他各军、师能勇敢穿插至各部分敌人的侧后实行分割敌人而各个歼灭之，则胜利必能取得。（三）在大作战时请注意使用六十六军，以厚兵力。”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陈赓电：“如果胡志明同志同意的话，我们同意你回北京，将来有必要时再去。”

10月31日 上午十时，致电宋时轮、陶勇〔1〕，并告陈毅、饶漱石、张震，彭德怀、邓华，高岗、贺晋年：“（一）九兵团

〔1〕陶勇，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9兵团（1950年11月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序列）副司令员。

全部着于十一月一日开始先开一个军，其余两个军接着开动，不要间断。（二）该兵团到后受志司指挥，以寻机各个歼灭南朝鲜首都师、第三师、美军第七师及陆战第一师等四个师为目标。该敌现位于城津、咸兴、元山及以北一带地区，有分路向临江、辑安方向进攻模样。（三）兵站事务须自设机构办理。”

同日 批示聂荣臻：“请将志司、志政〔1〕（包括前十三兵团司、政）前后所发各项口号，动员令，入朝注意事项，作战注意事项等集成一起，即日派人送往宋时轮应用，为要。”

11月1日 审阅修改中央军委致宋时轮、陶勇并彭德怀、邓华，高岗、贺晋年等电。电报说：“伪六师及伪八师一部已被歼；我正向伪一师、伪七师及伪八师残部围歼中；并拟派有力兵团沿清川江进至军隅里、安州一线，切断美二十四师、美骑一师及英二十七旅的退路，隔断其与平壤敌之联系，造成我在清川江与鸭绿江下游的中间地区全歼该敌之态势。”“以宋兵团为第二线兵团，决定改变集结地区于沈阳及其周围，以便今后机动使用。”**同日**晚七时，致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请考虑以四十二军现至杏川洞一带的一个师，迅速占领宁远、德川、孟山诸点，并以一个团前出至孟山以南，占领阳德、成川间铁路线，防止平壤、元山两方敌人的可能出援。”

同日 晚九时，复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刚才收到你的十一月一日九时全军作战部署，甚好，甚慰。”彭德怀的作战部署是：我军钳制美二十四师，一部彻底破路、破桥，阻止敌之运输。军主力控制于适当地区，以便从敌侧后出击，围歼该敌。

11月2日 晨三时，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邓华电：（一）首都师主力仍在北青、城津线及其以北，其十八团之第一

〔1〕 志政，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的简称。

营到咸兴西北之新兴里，请告四十二军注意。(二)美二师本(二)日从平壤及其以南地区向北移动，请告三十八军注意控制安州、军隅里，阻止该敌北进，一二五师迅速以一部由德川向顺川、成川等处活动，威胁平壤。”

同日 晚七时，复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一)宋、陶(1)先头二十七军主力(两个师及军部)照你们意见开辑安，其一个师则依高岗同志建议迅开朔州从正面对付大安洞之敌，保障后方交通线，俟任务完成后再开辑安归队。(二)请注意使用三十八军全军控制安州、军隅里、球场区域，构筑强固工事，置重点于军隅里，确实切断清川江南北敌之联系，歼灭美二师北援兵力及伪六、七、八师余部，并尽可能向南伸出直到平壤附近。只要此着成功，即是战略上的胜利。一二五师，则控制德川据点及顺川、元山间铁路线。我三十九军、四十军、六十六军及五十军主力，则担任逐步地各个地歼灭清川江以北以西之敌伪一师、美骑一师、美二十四师、英二十七旅等部。能于半个月内达成任务，即是很好的。以上请按情酌定。”

同日 晚十时，复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一)各电均悉甚慰。全局关键在于我三十八军全军以猛速动作攻占军隅里、价川、安州、新安州一带，隔断南北敌人联系，并坚决歼灭北进的美军第二师，此是第一紧要事，其余都是第二位。(二)伪八师全部及伪六师之十九团都在清川江北岸之胡沙洞、凤舞洞等处。只有伪七师在清川江以南之军隅里、松亭、价川等处。”

11月3日下午三时，复电彭德怀、高岗并告宋时轮、陶勇：“(一)同意彭建议二十七军使用于新义州东北方向；(二)

(1) 指宋时轮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陶勇任副司令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

九兵团其余两个军应位于沈阳附近休整待机。”

同日 阅北京大学曾昭抡〔1〕等三百多人于十月联名致毛泽东的信。信中抗议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威胁中国的安全，表示决心贡献出最大力量为保卫祖国而奋斗。毛泽东批示胡乔木：“此件天津《进步日报》已发表，北京《人民日报》及《光明日报》似亦可以发表，请酌办。”次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发表了这封信。

11月4日 上午九时，阅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民主党派十一月四日关于全力拥护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批示胡乔木并徐冰：“此件请乔木即印清样七份，印好后以四份分送毛、周、刘、朱，以三份交徐冰，请徐冰于今日下午再找李济深、黄炎培、罗隆基三人一阅，取得同意，于今日下午七时以前退回我。”

同日 晚十时，致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一）据伪总长四日十四时五十分令二军团称，‘为适时地夺回德川、熙川，望第二军团担负此次攻击作战，并限五日十二时前提交新作战计划及攻击时间’等语。敌于收集各部略加整理后有向我军举行反攻之可能，请令我军各部注意，于其反攻时各个歼灭之，尤其注意德川方面。（二）目前敌各部甚混乱。美二师出动两个团，一在顺川以北，一在顺川布防，平壤空虚。美二十五师有一个野炮营在新安州，起掩护作用。请令我三十八军彻底击溃当面之敌，使其组织不成新防线。”

11月5日 晨一时，复电彭德怀并告高岗：“（一）十一月四日十五时电悉。同意你的部署，请你按当面情况酌量决定。”

〔1〕曾昭抡，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北京大学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1950年12月又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

(二) 德川方面甚为重要，我军必须争取在元山、顺川铁路线以北区域创造一个战场，在该区域消耗敌人的兵力，把问题摆在元山、平壤线的正面，而以德川、球场、宁边以北以西区域为后方，对长期作战方为有利。目前是否能办到这一点请依情况酌定。”

同日 晨二时，致电彭德怀并告高岗：“为了迷惑人的目的，目前还是不宜以联合司令部的名义发表战报，而应以人民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发表战报，但在战报中应当有几句话提到此次作战有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部队（简称志愿部队，对外不称志愿军，对内则称志愿军）参加，并且打得很勇敢。战报起草后请发来看过，然后发表。”

同日 晨三时，致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一）我三十八军对当面之敌伪七师部队似尚有机会歼灭其一二个团，请令该军尽可能争取之。（二）敌有可能乘我疲劳组织反攻一点亦请注意，令各部不要松懈。”

同日 晚十时，就第九兵团的作战任务和指挥问题，复电彭德怀、邓华并告宋时轮、陶勇及高岗：“（一）各电均悉，部署甚好。（二）江界、长津方面应确定由宋兵团全力担任，以诱敌深入寻机各个歼敌为方针。尔后该兵团即由你处直接指挥，我们不遥制。九兵团之一个军应直开江界并速去长津。”

同日 阅聂荣臻十月四日关于第九兵团行动问题的报告，批示李涛：“即以二十军开辑安、江界待命。宋时轮应去江界指挥。二十七军暂在现地待命（南市洞、安东一带）。二十六军及兵团部在抚顺一带休整。”

同日 抗美援朝战争第一次战役从十月二十五日开始到本日胜利结束，共歼敌一万五千余人。将敌人赶到了清川江以南，挫败了“联合国军”感恩节（十一月二十三日）前占领全朝鲜的企图，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

11月上旬 作《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颜斶齐王各命前，多年矛盾廓无边，而今一扫纪新元。最喜诗人高唱至，正和前线捷音联，妙香山上战旗妍。”

11月7日 阅柴军武十一月六日关于金日成准备公开说明中国人民志愿军已来朝鲜协助作战的电报，批送周恩来：“请拟复，金演说中应提到有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在朝鲜人民军统一指挥之下配合人民军反抗侵略者，有几句即可。演说的主要内容，应说人民军各军。”

同日 第九兵团三个军十二个师秘密入朝，担负东线作战任务。

11月9日 关于争取在一个月东西两线各打一两个仗，把战线推进至平壤、元山一线区域，复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并告高岗：“（一）八日十五时电〔1〕悉，目前部署及下一步作战意图，均很好，请即照此稳步施行。（二）苏联汽车不久可到第一批，损车虽多，是可以补充的。以平均每天损车三十辆计一个月损车九百辆，打一年仗也不过损车一万辆左右。并且损坏之车，有些可以修好，有些可以取回若干零件，又可缴获一部，故汽车是完全有办法的。（三）要修几条（不止一条）宽大公路通达德川、宁远、孟山区域，这是极重的战略任务，后面各路均须修好修宽，请抓紧办理。（四）争取在本月内至十二月初的一个月内东西两线各打一二个仗，共歼敌七八个团，将战线推进至平壤、元山间铁路线区域，我军就在根本上胜利了。请高、贺〔2〕用一切可能方法保证东西两线粮弹被服（保障御寒）之供给。”

（1）指彭德怀、邓华、朴一禹 1950年11月8日15时关于各线战情及部署 给毛泽东并高岗的电报。电报讲到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以逸待劳，便于后方运输，拟仍采取诱敌深入、各个歼灭的方针。

（2）贺，指贺晋年。

11月11日 阅聂荣臻本日关于攻打金门问题的报告。报告说：在目前情况下，攻打金门的任务，似宜暂时放弃，以便集中人力、物力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新情况。如同意，则应明示华东解除明年攻打金门任务，同时修建好五个机场妥为保护外暂不增建，船只的修建亦暂时停止。毛泽东批示：“同意，但在福建的三个军不能减少。”

11月12日 复电彭德怀：“各电均悉。关于与朝鲜同志合作的各项意见都是适当的。商谈时请注意方式，采取委婉曲折的与温和的态度。并要有这样的精神准备，即有些意见通不过，争论和分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着，要待打了很多的胜仗，中国同志的意见在事实上多次证明是正确的，那时才会被朝鲜同志所赞同和信服。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也是很自然的。此间拟向菲律宾波夫同志有所建议，待有结果再告你。”

同日 为转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抗美援朝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大军区并转省市区党委的批语：“北京市委十一月十二日的报告是正确的，你们亦应照着这个方向去做；并随时纠正抗美援朝运动中所发生的偏向。”报告分析了北京市抗美援朝运动的形势，以及已经萌发的偏向，提出把抗美援朝运动继续推向前进的四点意见：（一）首先应肃清美帝国主义在华的影响，不应勉强群众参军。（二）群众抗美援朝的具体行动，应该以多数群众可能办到的事情来号召。（三）普遍号召工人努力生产节约，学生努力学习，机关工作人员做好工作，工商界反对投机操纵、囤积居奇。（四）在郊区扩大抗美援朝运动。

同日 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美军陆战第一师战斗力据说是美军中最强的，我军以四个师围歼其两个团，似乎还不够，应有一个至两个师作预备队，九兵团的二十六军应靠近前

线。作战准备必须充分，战役指挥必须是精心组织的，请不断指导宋、陶完成任务。”

同日 阅李漱清十月二十八日的来信，在信上批写：“漱清先生：李耿侯、李贡侯、李德深〔1〕三人为革命牺牲，均应发给光荣纪念证件，请持此往湘潭县府洽办为荷。”

11月13日 审阅由周恩来起草的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电报稿，加写一段话：“据我的观察，朝鲜的战局，是可以转变的。现在我志愿军十六个师在朝鲜西北战线方面，已给了敌人第一个打击，已经初步地立稳了脚跟，只要能再给该线敌人（八个师）以一个至二个较大的打击，就能将该线的防御局面改变为进攻局面，而这是有可能的。东北战线方面，我志愿军仅有两个师，敌人（五个师）还很猖獗，现正增派八个师去，准备给敌人一个打击，转变该线的战局。”

11月14日 致电叶剑英、方方，并告邓子恢、谭政及张云逸、莫文骅、陈漫远〔2〕、李天佑：为对付台湾匪帮可能向广东进犯，有增强广东兵力之必要。为此必须提前肃清广西匪患，以便从广西抽出一个军增强广东。我们希望广西全省主要匪患六个月内能够肃清，明年五月一日以前调出一个军去广东。

11月15日 为转发邓小平十一月七日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西南局综合报告，起草中央给华东局、中南局、华南分局、西北局的批语，指出：“我们认为邓小平同志在这个报告里所提出的各项意见都是正确的，请你们注意研究，在你区有可采纳者则酌量采纳之。”邓小平报告的主要意见是：（一）应从战争作准备，积极支援朝鲜。除正规兵团充实编制外，立即开始扩大二十

〔1〕李耿侯、李贡侯，李漱清的儿子。李德深，李耿侯的儿子。

〔2〕陈漫远，当时任中共广西省委副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

万人的地方武装，以利巩固后方秩序和将来补充前线之需要。（二）加速土改步骤。（三）解决好民族杂居地区的减租、退押及土地问题。在这些地区进行土改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认真地实行了区域自治或成立了联合政府；第二，必须是少数民族人民大多数赞成并举手通过。原则上确定土改前对少数民族地主只减租，不退押，在少数民族中不提反霸。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西南局关于西南反革命活动情况及处理计划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的批语，指出：“我们认为西南局十一月十日关于西南反革命活动情况的分析及处理计划是很好的，特发给你们参照办理，并可转发给所属省市区党委作参考。”同时复电西南局：“十一月十日关于西南反革命活动情况的分析及处理计划是很好的，可即照此执行。此项文件应发给所属省市区党委及地委阅读，使他们明了全般情况及整体计划。”西南局的报告说：西南封建势力特别强大，而且又是蒋介石长期经营和最后失败的地方，匪特与封建势力紧密勾结，反革命活动一直很厉害。特别是美帝国主义从朝鲜仁川登陆以后，各地反革命的活动更为猖獗。由派遣和潜伏的匪特为领导，以反动的封建势力为基础，利用帮会流氓等，采取分散、隐蔽、小股活动、暴动等方式，从城市和农村、内地和边境，向我发动全面进攻。西南局的报告提出了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具体计划。

同日 审阅胡乔木起草的《综合十一月七日至十三日各方对朝鲜战争的反映》〔1〕，加写三句话：（一）“总之，各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志愿军入朝继续表示慌乱，毫无办法。”（二）“在英国大多数保守党、自由党和工党的报纸，都不赞成与中国决裂，都主张慎重。”（三）“各新民主国家领袖和人民对中国志愿军

〔1〕这是提供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及第9兵团的参考材料。

抗美援朝表示极为兴奋，我国的国际地位已因此举而大为提高，国内人心亦极为振奋，恐美空气大为低落，各方表示团结一致，支持我英勇的人民志愿军。”

11月16日 为转发西南军区剿匪简报第四号，起草给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及广东省军区，广西省委及广西省军区并告邓子恢、谭政、赵尔陆的批语，指出：“西南军区对于剿匪工作极为认真，剿匪中执行的各项政策亦是正确的，故取得了很大成绩。广西解放在西南之前而剿匪成绩则落在西南之后，为什么这样，请你们加以检讨并以结果告诉我们。我提议广西军区从十二月份起仿照西南办法每月发一次剿匪通报，总结战绩，纠正缺点，务使全省匪患在几个月内基本解决。如何，盼复。”

11月17日 致电叶剑英并告方方及邓子恢、谭政：“（一）你十一月二十一日动身去广西甚好。（二）广东必须迅速地和广泛地展开土地改革工作，你们布置如何盼告。（三）只要广东的土改完成，广西的土匪消灭，即使蒋介石登陆进犯也是容易对付的。（四）你们必须统筹两广，将两广作为一个对付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登陆进犯的统一单位，不要只顾一省。”

同日 复电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南军区党委并告华南分局，指出：“你们派陶铸去广西帮助工作很有必要，陶铸是否已动身去了，如未应速去。我已电叶剑英同志去广西帮助一时期，叶定十一月二十一日动身去，叶不宜离开广州过久，大概在广西住一个月左右即须东返，因此陶铸应在广西久留一会，直至剿匪问题基本解决然后回来。”“为了对付敌人可能在广东登陆进犯，必须准备使用五个至七个军。除广东现有三个军外，拟在五个月后从广西抽出一个军（位于梧州待机），使用陈明仁部当作一个军，以上五个军确定用于广东。此外，准备于明年三月集中的第四十

六、第四十八两个军拟位于衡州〔1〕机动位置，依情况需要，可以使用于北方，也可以使用于广东。” “为此必须用全力剿灭土匪，陈明仁部应加紧训练一个月，于十二月二十日左右向广西出动参加剿匪，任务完成即开广东。陈明仁部到广西剿匪考验一次是很必要的。” “广东修通几条主要公路很有必要，应立即办理，所需费用由政府开支。”

同日 致电陈毅、饶漱石，指出：“目前军事工作极为重要，除军队的整训，海、空、炮、工各兵种的建设，公安部队、地方部队与民兵的建设等项重要工作外，闽、浙两省剿匪工作极为重要，特别是福建匪患必须使用四五个主力师用全力穷追猛打、限期肃清，该省剿匪成绩较他省为差，必须检讨原因。我提议从现在起，和广泛展开土地改革工作相配合（福建必须迅速实行土改），限六个月内剿灭一切成股土匪，责成叶飞、鼎丞〔2〕全力以赴，做出成绩。只要福建的土匪消灭，土改完成，即令蒋介石登陆进犯，也是容易对付的。” “华东一切工作要以美国和蒋介石登陆进犯为假想的基础去作布置。”

同日 致信胡乔木：“一切有关朝鲜主力战场的新闻，都应将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部队联在一起说，不应只提人民军而不提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如‘新华社十五日讯’那样，这样的电讯发到前线 and 全国都没有好处。关于朝鲜消息，塔斯社的一些不关重要的电讯都不应转发，新华社应自己派人去采访发电，或在北京根据内部情报自己写电讯。报纸应写社论鼓励志愿军。《参考消息》上，无根据地乱安题目，帮助美国人恐吓中国人，也应加以整顿。”

〔1〕衡州，今湖南衡阳。

〔2〕鼎丞，即张鼎丞。

11月18日 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并告高岗：“（一）你们释放一批俘虏很对，应赶快放走，尔后应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二）敌方对我实力还认为是六万至七万人〔1〕，‘并不是一个不可侮的势力’，这点对我有利；（三）美、英、法对我毫无办法，悲观情绪笼罩各国，只要我军多打几个胜仗，歼灭几万敌军，整个国际局势就会改观。”

11月21日 阅彭德怀、邓华等十一月五日关于志愿军入朝作战十天的情况给中央军委和东北军区司令部的电报。电报提出，为使各军能连续作战，建议军委将预定补充之兵员分批拨来，每一战役后立即补充，这样比轮番换班休整有利。毛泽东批送周恩来：“这是老报，今天再看，他们的意见是对的，不是换班休整，而是有缺即补，连续作战。请加注意。十二月份，宋兵团须补一批，估计五六千人，十三兵团也许还要补一点，估计四五千人，共约万人。明年一月起，大约每月须补一万一二千人。请按此筹划为要。”“请电话询高岗，对宋兵团所要求的棉帽、棉鞋、棉手套、棉大衣，是否已在前送，送到什么程度？”

11月22日 为转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情形及今后计划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委的批语，指出：“中央希望一切还没有做报告的中央局、分局，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均于今年年底以前做一次专题报告，不要延误。”同时为中央起草复北京市委并告华北局电：“十一月十九日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报告收到，内容甚好，望即照此执行，并望华北局转发华北各省委市委参照办理。”北京市委的报告概述了解放以来北京市处理反革命分子的情况和成绩，总结了镇反工作的经验。这些经验主要是：认真执行中央关于对反革命

（1）这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的兵力共9个军30个师，三十八万余人。

分子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以及打得又准、又稳、又狠的方针；采取分别主次先后的处理步骤。报告确定当前北京市镇反活动的重点是清理国民党特务案犯，处理外国间谍特务及反动会道门。

同日 就加紧准备防空问题，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各大军区并转分局、省市区委及军区的电报：“据华南情报局十一月十九日息：‘美帝近将派二千余空军人员赴台湾，图假蒋匪名义轰炸大陆。闻台匪现正为此批人员赶修房屋及进行其他准备工作’等情。这是完全可能的，你们应即加紧准备防空，特别是沪、宁、杭、榕、厦、穗、汕、青、济、京、津等处要迅速准备妥当，战胜敌人的空袭，切勿麻痹疏忽，是为至要。”

同日 就加强入朝作战部队思想教育和物资准备问题，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第十九兵团党委并告各大军区的电报，指出：“你们应在十九兵团部队中进行充分的思想动员，要有同美国人作战的高度的思想准备，要准备克服各项可能的困难，只要能如此，美国人是可战胜的，美国军队比起蒋介石的某些能战的军队其战斗力还要差些。至于装备等项待你们到达山东后当为你们解决。”“各军区，特别是华东、华北、华南，同样须对部队进行打美国人的教育，提高斗志，准备随时打击侵略者。”

同日 为转发中共福建省委十一月十九日关于剿匪和土改的报告，起草给中南局、华南分局、广西省委并告西南局、西北局的批语，指出：在时局紧张的情况下，必须限期剿没股匪，加速进行土改，发展地方武装和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我党我军方能取得主动，否则有陷入被动的危险。福建是和两广同样解放较晚，土匪甚多而尚未肃清的省份，过去福建省委认为今冬明春不能大规模地进行土改，现在他们接受了中央及华东局的意见，决定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召集地委书记及军分区司令会议，重新布置工作，将土改与剿匪相结合，扩大土改县数至三十六个县。此种

计划很值得广东、广西两省仿行，请邓、谭，叶、方，张、莫〔1〕诸同志加以研究，并提出意见告我为盼。

同日 为转发川西区党委关于执行西南局几个问题决定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所属省市区党委的批语：

“我们很需要各省委、大市委及区党委对剿匪、土改、肃反、保密及建设地方武装等几项重要工作的报告，请督促所属省市区党委向你们做此项报告，并即转发中央。现将川西区党委的一份报告发给你们作参考。”川西区党委的报告，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就建设地方武装、镇压反革命、加速土改步骤、保密等问题提出了具体执行意见。西南局同意这个报告，并于十一月十八日转发所属各省区党委和上报中央。

同日 审阅修改胡乔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时事宣传最近应注意之点，在文稿末尾改写一段话：“时事宣传必须密切地联系到加强国防军，加强地方武装，加强民兵，加速和加宽土地改革，加强剿匪，加强防奸和镇压反革命活动，加紧恢复和发展生产等项重大任务，以便与各种动员工作相结合。”

同日 致信胡乔木：“请你负责用中央名义起草一个指示，纠正写电报的缺点，例如：不要用子丑寅卯、东冬江支等字代替月、日，要写完全的月、日，例如十一月二十二日；署名一般要用完全的姓名，不要只写姓不写名，只看报的人完全明了其人者允许写姓不写名，例如刘、邓，陈、饶等；地名、机关名一般必须写完全，只在极少数情况下允用京、津、沪、汉等省称；还有文字结构必须学会合乎文法，禁止省略主词、宾词及其他必要的名词，形容词和副词要能区别其性质，等等。请你为主，起草

〔1〕邓、谭，指邓子恢、谭政。叶、方，指叶剑英、方方。张、莫，指张云逸、莫文骅。

一个初稿，再邀杨尚昆、李涛、齐燕铭、薛暮桥〔1〕及其他你认为有必要邀请的同志开会一次或两次，加以修改充实，然后送交我阅。”

11月23日 致电中南军区、华东军区、西南军区，指出：“你们三大军区各有土匪若干万均待限期剿绝，建议华东军区仿照西南、中南两军区办法，每月发布一次内部的剿匪通报。你们三大军区的剿匪通报，除发给所属各省各军及我们外，同时发给其他两大军区以资观摩比较。”

11月24日 复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洪学智并告高岗、贺晋年：（一）你们本日七时的作战部署是完全正确的，望坚决照此执行。（二）请你们充分注意敌人降落伞部队在我后方降落，应控制必要武装力量及汽车在你们及后勤部手里，准备随时扑灭这些空降敌人。敌人已有一组谍报人员在云山以东地区降落，并称正向鸭绿江边移动，请注意扑灭。（三）请你们充分注意领导机关的安全，千万不可大意。（四）此次战役中敌人可能使用汽油弹，请你们研究对策。（五）你们释放美俘的行动，已在国际上收到极好的效果。请准备于此次战役后再释放一大批，例如三四百人。”

同日 “联合国军”发动“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

11月25日 志愿军为粉碎敌人的总攻势，发起第二次战役。

同日 上午十一时左右，三架美军轰炸机突然飞临大榆洞志愿军司令部上空，投下几十个凝固汽油弹，正在作战室的毛岸

〔1〕齐燕铭，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兼秘书厅主任。薛暮桥，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

英、高瑞欣〔1〕牺牲。志愿军司令部决定将这个不幸事件报告中央军委。

11月28日 晨五时半，复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洪学智，并告高岗、贺晋年，宋时轮、陶勇：（一）庆祝你们歼灭伪二军团主力的大胜利。（二）目前任务是集中我四十二军、三十八军、四十军、三十九军歼灭美骑一师、第二师、第二十五师等三个师的主力。只要这三个师的主力歼灭了，整个局势就很有利了。（三）美骑一师（两个团）正向德川、顺川、成川之间调动，目的在巩固成川、顺川地区阻我南进。我四十二军应独力担任歼灭该敌。（四）美九军团指挥之第二师、第二十五师，在球场、院里、军隅里、价川一带，我三十八军、四十军、三十九军应担任攻歼该敌。这是很重要的一仗，望令各军努力执行之。”

同日 晚十二时，复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洪学智，并告宋时轮、陶勇，高岗、贺晋年：“你们十一月二十八日午时给西线各军电及**同日**十五时给九兵团电均是很正确的。此次是我军大举歼敌根本解决朝鲜问题的极好时机，西线争取歼灭五个美英师及四个南朝鲜师，东线争取歼灭两个美国师及一个南朝鲜师，是完全可能的，整个战役准备打二十天左右，分为许多个大小作战，中间包括几次小休整，每次少者一天二天，多者三天四天，整顿队势，接着再打，这样就全体说来，牺牲反会比较少一些，比较更节省些。望你们鼓励士气，争取大胜。”

11月30日 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洪学智，并告高岗、贺晋年，宋时轮、陶勇：“（一）请不要提出过冬休息的口号，只在两个战役之间作必要的休息整训。此种整训只要情况许

〔1〕毛岸英，毛泽东的长子，当时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俄语翻译和机要工作。高瑞欣，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参谋。

可，在一个大战役之后，可以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如情况许可则延长，不许可则缩短。部队整训宜在前线适当地点实施。打残破了的部队，可以在较安全的地点，但以在鸭绿江以南朝鲜境内由各军军部直接掌握和监督为有利。以上是否可行，请考虑酌定。

（二）此次作战规模很大，东西两线各军伤亡可能超过四万人，请高岗同志加速对新兵的征集训练工作，争取于十二月中旬有几万人补入部队。新兵征训情形望告。”

同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关于加强对群众来信工作的报告。报告指出：各中央局、省委、地委设立处理信件的机构或指定专人负责，并建立起各种必要的制度，是把这项工作做得更认真周到的关键所在。毛泽东为中央起草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各中央局，分局，并转所属大市委，省委，区党委：兹将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十一月二十九日给毛主席关于处理群众来信问题的报告发给你们。我们同意报告中所提意见，请你们对群众来信认真负责，加以处理，满足群众的要求。对此问题采取忽视态度的机关和个人，应改正此种不正确态度。望加检讨，并盼电复。” **同日** 致电方方并告邓子恢、叶剑英：“今冬争取完成十一个县的土改是适当的，望照此努力实施。海南岛方面也要用大力督促实行土改。”

同日 复信邹蕴真〔1〕：“来信收到，学习结业，甚好。弟近日稍忙，暂不必会面。工作问题，请与学校当局筹商解决。”

11月 为全军保卫工作会议题词：“保卫工作十分重要，必须尽力加强之。”

〔1〕 邹蕴真，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新民学会会员。当时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结业，后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12月1日 中午十二时，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洪学智并宋时轮、覃健〔1〕：“（一）伪二军团向三登集中，美二十四师由平壤开三登一带，伪一师现到肃川，有开顺川、慈山讯，美骑一师在顺川、慈山并未过大同江，因此我四十二军亦不应过大同江而应在大同江以东向成川、三登一带寻伪二军团残部及美二十五师作战，从侧面威胁平壤。请酌定。（二）美七师主力及伪三师一个团由惠山西犯，企图切断我厚昌、长津间补给线，请宋、覃令在厚昌之一一个师向东迎阻该敌，务使该敌不能西进。”

12月2日 晨五时，为中央军委起草复彭德怀、邓华、朴一禹、洪学智、解方并告高岗、贺晋年电：“一日电〔2〕悉。如果安州、新安州一带之敌确已退至肃川以南，则我西线各主力军应在肃川、顺川之线以北地区调整位置，休息四天至五天，整顿队势，补充粮弹，准备继续作战，配合东线，扩大战果。如果安州、新安州一带尚有敌人，则应待歼灭该敌后，再作调整。我四十二军则应待歼灭新仓里之敌后，再行停止。大约再看一两天，再下调整令为宜。”

同日 晚十二时，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邓华并宋时轮、覃健电：“（一）庆祝我九兵团的两次歼敌大胜利。（二）据新华社驻通化记者报告，三十日下午，侵占惠山镇之敌军搬运物资，有撤退模样，惠山镇以西之新架坡镇敌军，已于三十日午后撤退，敌军侵入惠山镇兵力约二千五百人等语。美七师似已从惠山镇撤退。我二十六军驻厚昌之一一个师，除留一部仍驻该地向东警戒外，主力可以南下作战。（三）我九兵团除应加紧歼灭被围之敌

〔1〕覃健，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参谋长。

〔2〕指彭德怀、邓华等1950年12月1日关于各军停止战役追击给中央军委和东北军区司令部的电报。

外，并应准备与必然增援之两个李承晚师和美三师一部作战。”

同日 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洪学智并告高岗：“在调整部署，休息数天，并弄清敌人部署后，请考虑以四个至五个军攻击顺川、肃川线，以必要兵力突破并伸入该线以南钳制大部敌人，集中主力歼灭顺川、慈山地区之一个美国师（现在是骑一师、夺取顺川、肃川一线及其以南一块地区，然后在该线以南构筑防御阵地，以一部兵力（一个军左右）防守之，主力便可移至平壤、元山间作战。为此目的，六十六军似应在此战结束后才能东移。四十二军则可于休息数天后即向平壤以东三登一带寻求小股敌军作战。以上是否可行，请考虑酌定。”

同日 复电李烛尘、毕鸣岐、朱继圣〔1〕等：“你们在十一月三十日给我的电报〔2〕看到了。你们认清了美帝国主义者发动侵略中国和朝鲜的反动性质，你们不受他们的欺骗，不怕他们的恐吓，坚决地站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立场上，并在十一月三十日举行了正义的示威游行，这是值得欢迎的。美国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人民做了很多的欺骗宣传，一切爱国者都不应相信这些欺骗言论。美国帝国主义者侵略朝鲜，侵略中国的台湾，轰炸中国的东北，并使用各种流氓手段恐吓中国人民，一切爱国者都应有决心反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不受他们的恐吓。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军的英勇行为，是值得赞扬的。全国工

〔1〕李烛尘，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兼天津市分会主任委员、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1952年7月又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毕鸣岐、朱继圣，当时任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

〔2〕指1950年11月30日天津市工商业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示威游行大会给毛泽东的电报。

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工商业家，凡属爱国者，一致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完全正确的。我希望全中国一切爱国的工商业家，和人民大众一道，结成一条比过去更加巩固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统一战线，这就预示着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神圣斗争中一定要得到最后胜利。”

同日 复信黄念田〔1〕：“惠书并承赠黄季刚先生所为词及先生著作，均已收到，极为感谢，先生努力进修，为人民教育事业服务，甚为佩慰。尚希不断努力，日进有功，是所企望。”

12月3日 晨一时，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宋时轮、陶勇、覃健并告高岗、贺晋年：“我九兵团数日作战，已取得很大胜利，不但在下碣隅里地区将陆战第一团及其他数部增援队基本歼灭，而且在新兴里地区将美七师一个多团完全消灭。敌方在数日内可能增援的部队，只有两个李承晚师和美七师一个多团。如我军能将这此增援队各个歼灭，在朝鲜战局上将起很大变化。因此，（一）请宋、覃考虑，将二十六军迅速南调，执行打援任务；（二）对柳潭里地区之敌，除歼灭其一部外，暂时保留一大部，围而不歼，让其日夜呼援，这样便可吸引援敌一定到来，使我有援可打。如果柳潭里地区之敌被我过早歼灭则援敌一定不来了，他们将集中咸兴一带，阻我南进，对我下一次作战不利。以上意见是否可行，请宋、覃就当面情况统筹决定为盼。”

同日 下午五时，致电彭德怀、高岗：（一）我军粮食草料就地取给（事后如数偿还）是否确有把握；（二）大同江现在是否结冰，何时结冰，能否在冰上通过人马车辆。以上二项，请彭查明电告。（三）由新安州、满浦两点通到平壤的两条铁路，是

〔1〕 黄念田，黄侃（字季刚）的儿子，当时任四川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黄侃，音韵训诂学家和文学家。

否已在抢修，何时可以修好，用两条铁路运送全部军用物资至平壤区域，是否充分可能。此点，请高查明电告。”

同日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关于改变一九五一年部队教育时间比例的指示。指示如下：“军委曾于本年八月一日颁布指示，自一九五一年开始，全军教育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现为适应目前形势的发展，需要加紧部队的军事训练，特将部队训练教育的时间重新规定如下：甲、各军区一般部队训练时间比重为：军事百分之六十，政治百分之三十，文化百分之十。乙、离职的速成中学：文化百分之八十，军事百分之十，政治百分之十。丙、某些起义部队：须要继续改造者，可规定政治百分之六十，军事百分之三十，文化百分之十。丁、各军事学校：按各学校计划执行。”

同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同金日成会谈。毛泽东谈的主要内容是：（一）战争问题。战争有可能迅速解决，但也可能拖长，我们准备至少打一年。朝鲜方面也应作长期打算，并仍应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我们认为必须敌人承认撤出朝鲜，而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才能谈判停战。最好我们不仅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汉城，主要是消灭敌人，首先是全歼伪军，对促进美帝撤兵会更有力量。美帝如承认撤兵，联合国有可能在同意中苏参加的条件下，主张全朝鲜人民在联合国监督下，选举自己的政府。但美帝和蒋介石一样，诺言、协定都不可靠，故应从最坏方面着想。（二）政策问题。政策对不对将影响一切关系。第一，对敌关系。在战场上是要坚决消灭敌人的，但敌人一经放下武器，便应宽待俘虏，有时还须释放几个军官，以利瓦解敌人。第二，对人民关系。应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以孤立少数敌人。动员人力物力，不要使其枯竭，不要使人民不满，要救济被难人民。对各民主党派要团结和教育他们。凡带群众性的团体及其行动，即使是受敌欺骗，对敌动摇，也要争取和

改造他们，只对那罪大恶极的投敌分子才应严惩。在这里，防“左”也防右，而且要反复多次。第三，对友关系。军队相互间、中朝两军间，均应注意团结。我们要求中国人民志愿军要拥护朝鲜劳动党，拥护金首相，拥护朝鲜人民政府，爱护朝鲜人民军，要搞好双方关系。中国人民志愿军一般纪律是好的，但最近仍查出有十多件破坏纪律的事，前方已决心严办，并向当地人民认错。（金日成说：中国志愿军的纪律是最好的。）第四，上下关系。党内军中，均应有民主，在民主讨论民主批评基础上的集中，是最有力的。（三）领导问题。你们现在比从前是更强了，不是弱了。当你们越过三八线直向大邱进攻不计后方空虚的时候，你们是最弱了。现在你们既懂得胜利又懂得失败，有了经验，你们就更强了。（四）统一指挥问题。中朝双方决定：成立不对外公开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以统一指挥两国军队作战和前线的一切活动；联合司令部下属两个机构，即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和朝鲜人民军参谋部，合驻一处办公；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朝方金雄〔1〕为副司令员、朴一禹为副政治委员。这次谈话，后由周恩来整理经毛泽东审定，于十二月四日夜以中共中央名义通报给彭德怀。

12月4日 下午一时，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和宋时轮、陶勇、覃健：（一）伪首、伪三两师因火车甚少其主力由步行撤退，何时到咸兴尚难定。敌已下令由下碣隅里以飞机撤走被围之美军五、七两团，望宋、陶、覃迅速控制下碣隅里飞机场不使敌军撤走，并对五、七两团之南退部队予以歼灭，只留下其在柳潭里地区之固守部队围而不歼，以利钓鱼。（二）请宋、陶、覃将黄草岭、古土水、下碣隅里、困水里至柳潭里一带详细敌我

〔1〕金雄，当时任朝鲜人民军前线司令官。

情况，防敌飞走部署及打援部署电告为盼。”

同日 下午一时，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洪学智并告高岗、贺晋年，宋时轮、陶勇：“（一）平壤敌似正准备撤退。（二）请派出几个有力侦察队附电台迫近镇南浦、平壤、三登之线进行威力侦察，观察情况，并增加敌人恐慌。该敌现在一夕数惊，极为恐慌。（三）请指定人民军一个三千至五千人的师及党政人员位于接近平壤地点，准备于查明敌人确已撤退时进平壤维持秩序。（四）我志愿军休息五天后，如平壤敌未退，则准备先打平壤附近之敌，然后包围平壤，研究攻城办法。如平壤敌已退，则向三八线攻进。”

同日 晚十一时半，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洪学智并告高岗、贺晋年：“大体上可以确定平壤敌人正在撤退，其主力似已撤到平壤至三八线之间，其后卫似尚平壤以北及东北地区。你们应于明五日派一个师或一个师的主力，向平壤前进，相机占领平壤。”

同日 审阅刘亚楼十二月三日关于志愿军空军人朝作战的方针问题的报告。报告说：我们现正在训练第一批空军部队。我认为，不应过早地零碎地使用训练出来的空军部队，而应在它达到一定数量时，选择一个适当时机集中地分批地使用，直接掩护和配合前方地面部队，完成一个战役或战斗，解决一定的战斗任务，如此才能有效地发挥空军的威力。如果训练好一个大队马上使用一个大队，零零碎碎地去同敌人进行空战，结果必然形成和敌人拼消耗，这对于我方是不利的。毛泽东批示：“刘亚楼同志：同意你的意见，采取稳当的办法为好。”

同日 晚上，为新华社写关于我军正向平壤进攻的新闻稿：“本社记者从朝鲜战场发来的消息：在朝鲜人民军与我国人民志愿军大举反攻的情况下，美国侵略军的第二师、第二十五师，土

耳其旅，李承晚匪军的第六师、第七师、第八师等部，受到了歼灭性的打击，各该部残敌，均向南面狂奔逃命。在此次作战中受打击较少的美侵略军骑兵第一师、步兵第二十四师，英澳第二十七旅及李承晚匪军的第一师等部，则交番掩护，节节南逃。英勇的朝鲜人民军和我国人民志愿军全线追击，业已占领安州、新安州、价川、肃川、顺川、成川、江东等城。东线方面，被朝鲜人民军及我国人民志愿军在咸兴北面长津湖一带地区所切断和包围的美侵略军陆战第一师、步兵第七师两个师的主力，已被歼灭一大部分，残敌继续被歼击中。又咸兴向北面增援的敌军，已被数次击溃，并受到了歼灭性的打击。侵占城津、清津及鸭绿江边惠山镇等处的美侵略军步兵第七师一个团及李承晚匪军的首都师、第三师等部，正在慌忙地向咸兴、元山方向逃窜。东西两线敌军，恐慌万状，急于逃命。平壤城内之敌，正在罪恶地屠杀人民，焚毁物资及该城发电设备，大火弥漫平壤城。朝鲜人民军和我国人民志愿军正向平壤方向攻进中。”五日晨一时，批示胡乔木：“此件请即刻广播，并于五日见报。”

同日 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编辑的《抗美援朝专刊》题写的刊名，在《人民日报》发表。

同日 阅安子文十二月一日关于天津市党的一般情况的报告。报告说：天津市委提出积极发展党的方针，在发展党的工作上是有成绩的，但也犯有错误，主要是急于求成，降低入党条件，并用突击方式发展党，造成新党员的思想不纯和党的组织不纯。毛泽东批送刘少奇退安子文：“（一）此件有些问题请少奇同志考虑告安子文同志；（二）此件可印送各大城市党委作参考；（三）应专门召开一次各大城市党委组织部长会议，解决建党和整党问题。”

12月5日 晨七时，复电彭德怀、宋时轮并告高岗：“（一）彭十二月四日二十四时电所述战役部署甚好，望即照此执行。十

二月四日十八时电所述经验总结〔1〕，亦是很好的。此次西线歼敌二万余，是一个大胜利。金日成已回朝鲜，关于方虎山部队〔2〕的使用问题，请直接向金提出。（二）宋、陶、覃十二月四日二十二时五分电部署意见很好，望即执行。除歼灭被围之敌及准备打援外，如能以一个军的主力再歼灭社仓里地区美三师的两个团，则意义极大。”

同日 阅安子文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关于各地区贯彻中共中央一九四八年九月关于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决定的情况的报告，批示安子文：“（一）此件决定不发，前已向谈过，现检出还你。（二）目前时期（一九五〇年）只宜强调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不宜同时强调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以免分散注意力。此种方针，大约要到一九五一年或更迟一些，才能改变。” 12月6日为新华社写关于解放平壤的新闻稿：“本社记者从朝鲜前线报道：朝鲜人民军和我国人民志愿军本日解放平壤。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侵略军以及李承晚匪军残部，向平壤以南溃退。朝鲜人民军和我国人民志愿军的正规部队，于十二月六日下午二时进入平壤城。”

同日 晚十时，复电彭德怀并告高岗、宋时轮，并请彭将此电转金日成。电文如下：“十二月六日十一时电悉。（一）在敌人已退出平壤的情况下，我西线主力可以在现地多休息几天，即

〔1〕指彭德怀1950年12月4日18时给毛泽东、高岗、宋时轮的电报中所述的经验。主要是：一、在敌我技术装备极端悬殊的情况下，力避在固定阵地作战，要使用长期手段调动敌人，乘其立足未稳，火力未展开时，予以猛攻。二、充分利用夜间战斗。战斗发起，力争黄昏开始，拂晓解决。三、要渗入敌后方，首先打掉其火力阵地与指挥所，威胁敌战役供应线。

〔2〕指方虎山任军团长的朝鲜人民军第5军团。

可以休息到十二月十二号左右，从现地出动，以便准备得更好些。（二）建议金日成同志及联合指挥部及志愿军司令部，移至德川以南适当地点为宜，必须注意隐蔽防空的条件，不可大意。（三）请高令铁路司令部赶速抢修至平壤的两条铁路及顺川至元山的铁路，以及大同江上被敌人破坏的几座桥梁。（四）方虎山军团应速向南朝鲜出动，不要派到元山方面去。（五）在九兵团附近的朝鲜第三军团应受宋时轮同志指挥，向北青、咸兴线袭击正在退却中的敌人，不应到丰山方面去，因为丰山区域及其以北以东的敌人都已经退走了。此点请金日成同志对第三军团下达命令。（六）在江界地区及定州地区集中的人民军两个军团，请金日成同志速令其接受彭德怀、金雄、朴一禹三同志的指挥，随志愿军一起向平壤以南出动，配合志愿军作战。（七）请金日成同志速派党政人员入平壤，恢复政权，维持秩序。（八）以上各项望分别电复。”

同日阅周扬〔1〕本日的来信，批示：“周扬同志：你的讲演词〔2〕已看过，很好，可即发表。你去参加土改的地区如果是湖北，而你又有兴趣的话，可去江青那里看一看。江青在武昌第二区新屋乡姚家湾。她那里有些经验可作参考。她最近一信付你一阅，阅后请交乔木同志一阅。”

12月7日为中央军委起草复邓子恢、谭政、赵尔陆电：“十二月四日转报广东对海南岛海防部署及准备于敌入侵时的作战方案是正确的，望即转令广东军区照此执行。”

同日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宋时轮、陶勇、覃健电：“你们是否已注意你们指挥所的防空隐蔽问题，请将你们的防空情况

〔1〕周扬，当时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

1951年2月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2〕指周扬在文艺界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上的讲演词。

电告。”

同日 致电陈毅、唐亮、张震、周骏鸣并告中共中央华东局：“十二月四日剿匪经验通报〔1〕，甚好甚慰。业已转发中南、西南、西北各中央局、军区及粤、桂两省参考。”

12月9日 为转发中共南京市委十二月七日关于南京学生反美控诉运动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委党委的批语：“南京市反美帝控诉运动的经验很好，各大城市均可参照进行，请加研究运用为盼。”报告谈到的经验，主要是发动学生联系自己的切身体会控诉美帝国主义，揭穿它的欺骗宣传，克服崇美、恐美思想，并召开全市学生代表的控诉大会和举行全市学生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示威大游行，激发反美爱国热情，推动抗美援朝运动。

12月11日 上午十时，就美军准备从朝鲜撤退的情报，致电彭德怀、高岗、宋时轮：“（一）密息，美国陆军总参谋长柯林斯奉命到日本和朝鲜前线，和麦克阿瑟、沃克〔2〕及其他美军高级将领会商之后，认为联合国及美国的军队在朝鲜的态势已无希望。柯林斯认为，在目前朝鲜人民军及中国志愿军进攻的速度和范围的条件之下，由于美军在人力及装备上遭受了极大的损失

〔1〕陈毅、唐亮、张震、周骏鸣1950年12月4日报送的关于华东军区剿匪经验的通报中说：华东地区剿匪的主要经验是，当股匪被合围、合击给予歼灭打击后，残匪必然混乱、动摇、分散、隐蔽，潜入地下活动，故必须继之展开全面的群众性的驻剿、搜捕。清剿股匪时，必须严密组织，不予匪特以流窜空隙，并应不断地教育部队，尤其是政策、纪律教育，保证以坚决的精神对付散匪、潜匪。正确地掌握贯彻政策十分重要。

〔2〕沃克，当时任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1950年12月23日在作战败退途中因车祸身亡。

以及士气的极端恶化，美军不能组织长期的防御。柯林斯已将上述情况及其意见向美国联合参谋部作了报告。从柯林斯上述报告中证明，他已给予麦克阿瑟以适当的指示，命他准备船只，并集结军队于一定的港口，以便进行撤退等情。从外国通讯社的报道看来，汉城正在准备撤退。上述情报是否正确，大概不要很久就可证明，至迟在我十三兵团到达开城等处迫近汉城时，可以证明。为了不使部队松气，上述情报不要下达。（二）麦克阿瑟已集中大批船只及舰队于咸兴以南的兴南港，并公开宣布第十兵团（阿尔孟德少将所部）就要从该港撤退。元山之敌昨十日业已从海上撤退。据合众社十日电称，陆战师等部被围军队，昨十日有二百余辆卡车由陆一师师长史密兹少将率领，冲出包围，逃抵兴南港。似此，黄草岭地区被围敌之各部现已没有战场上统一指挥的官长了。许多通讯社报道，中国军队打得极为英勇，美军处境很惨，损失很大。”

同日 阅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十二月七日关于广州市机关物资疏散情况给中南局并中央的报告，批示：“周：广州这样做，似不妥，请去电指示。”十二日，中央电示华南分局并告中南局及各中央局，指出：现时广州所进行的防空疏散工作已超越预备范围，必须立即纠正，并迅速将目前工作中心转到抗美援朝、剿匪、肃特、土改、练兵及海防方面。

12月13日 关于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复电彭德怀并告高岗，指出：“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此次南进，希望在开城南北地区，即离汉城不远的一带地区，歼几部分敌人。然后看情形，如果敌人以很大力量固守汉城，则我军主力可退至开城一线及其以北地区休整，准备攻击汉城条件，而以几个师迫近汉江中流北岸活动，支援人民军越过汉江歼击伪军。如果敌人放弃汉城，则

我西线六个军在平壤、汉城间休整一时期。”“明年一月中旬补充一大批新兵极为重要，请高加紧准备。”

12月14日 复信张次崙：“十月三十日惠书，并为中苏条约致贺一函，均已收到，甚为感谢！生活困难情形，极为系念，已告省府有所协助。”

同日复信蒋竹如：“迭接来信及惠大作，均已收读，甚为感谢！人校后情形如何，懋斋〔1〕诸兄均好否？懋斋来信已收到。”

12月15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高岗、彭德怀电：“陈赓同志从越南回来。为研究朝鲜战争经验，现令其到志司一行，请保证他往来的安全。”

12月17日 致电彭德怀并告高岗及宋时轮、陶勇：“九兵团此次在东线作战，在极困难条件之下，完成了巨大的战略任务。由于气候寒冷、给养缺乏及战斗激烈，减员达四万人之多，中央对此极为怀念。为了恢复元气，养精蓄锐，以利再战，提议该兵团在当前作战完全结束后整个开回东北，补充新兵，休整两个月至三个月，然后再开朝鲜作战。在此期间内，即由西线六个军，配合朝鲜人民军，在南朝鲜作战。每一战役，以歼灭美李军一万人左右至多两万人为目标，兵力似已够用。因为在南朝鲜作战，补给线甚长，好打的战役机会，须经过精心选择和充分准备才能获得，太多的兵力也用不着。只有在进行最后决战的时机，才需要增加大的兵力。如果在两三个月内有使用更多兵力的机会，亦可照高岗同志提议，考虑将杨得志兵团使用上去。”

12月18日 为转发志愿军司令部关于第三十八军在第二次战役中作战经验的报告，起草中央军委给各中共中央局、大军区

〔1〕懋斋，即田士清，字懋斋，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他和蒋竹如都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

并转各省市区委、省军区等的批语：“兹将我志愿军三十八军在第二次战役中的经验总结，转发给你们，这是极重要的经验，望注意研究。在志愿军的作战经验中证明，我军对于具有高度优良装备及有制空权的美国军队，是完全能够战胜的。”报告总结的主要经验是：携带足够干粮是战役顺利进行的主要保证；到达攻击位置，军、师、团、营均应组织坚强的观察所，沟通电话，及时了解战场情况；迂回部队之先头应加强炮火，遇敌抗拒时，即以炮火轰击，配以小部队围歼或驱逐之，使主力继续前进；为彻底消灭敌人，部队应不怕疲劳，采取大的迂回包围，猛插敌后，断敌退路；部队发起攻击时，首先以精干部队突破敌阵地，抢夺敌炮兵，使敌失却支援，使我顺利歼敌；对突围之敌应采取头击、腰击、尾击三种打法，力求先将敌人打乱，再分股分段歼灭之。

同日 复信陈叔通：“来示诵悉，已告陈云、薄一波两同志酌办。全国有五百万工商户，其中商业行户大约有三百万，在整个经济事业由旧的轨道转入新民主主义轨道中，当有一大批商行和手工业需要转业和改组，这是不可避免的，政府应当妥为指导这件事。”

12月19日 就镇压反革命分子的策略问题，复电黄克诚并告邓子恢：“十二月七日的综合报告收到，很好，你们的方针是正确的。对镇压反革命分子，请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使社会各界没有话说。”

12月20日 致电斯大林：“航空工业专家赤干诺夫等同志设计组于中国搜集初步材料后于十九日返苏。我们拟派重工业部副部长何长工（1）同志偕助手二人去莫斯科与苏联航空工业部同志具体研究恢复与组织中国航空工业生产的问题，以及商谈为各工厂所需某些设备和材料之订货并聘请苏联专家等问题。苏联政

（1）何长工，当时任重工业部代理部长。

府是否同意彼等前往，盼告。”二十三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您可以派何长工同志及其两位助手前来莫斯科，与航空工业部商谈恢复与组织中国各航空工厂问题。我们亦准备供应你们所必需的器材和设备以及派遣制造摩托和飞机的专家。”

12月21日 复电彭德怀并告高岗及宋时轮、陶勇：“十九日二十四时电悉。答复如下：（一）在你所述的情况之下，九兵团即在咸兴地区休整，只将重伤病员运回东北，抽出干部回东北带训新兵，较为妥善。（二）杨得志部现已集中徐州、济南间地区，开了干部会，朱总去讲了话。如有必需，三月中参战无问题。目前仍以在徐、济间整训一时期为宜。待要使用之前一个月可开至沈阳、安东间，补一部新兵（该兵团九个师，平均每师只有六千余人，极不充实），如友方〔1〕装备那时已到，可将装备改换即开朝鲜参战。（三）你对敌情估计是正确的。必须作长期打算。

（四）美英正在利用三八线在人们中存在的旧印象，进行其政治宣传，并企图诱我停战，故我军此时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然后进行休整是必要的。（五）打法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即目前美英军集中于汉城地区，不利攻击，我应专找伪军打。就总的方面说，只要能歼灭伪军全部或大部，美军即陷于孤立，不可能长期留在朝鲜。如能再歼灭美军几个师，朝鲜问题更好解决。就此次战役说，如果发展顺利，并能找到粮食，则春川、加平、洪川地区可能寻歼较多的伪军。（六）在战役发起前，只要有可能，即应休息几天，恢复疲劳，然后投入战斗。在打伪一师、伪六师之前是这样，在打春川之前也是这样。总之，主动权在我手里，可以从容不迫地作战，不使部队过于疲劳。（七）如不顺利则适时收兵，到适当地点休整再战，这个意见也是对的。（八）增加汽车，速

〔1〕指苏联。

运棉鞋、大衣、棉衣、被毯，极为必要。请高岗同志设法解决。”

12月22日 主持召开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就时局问题发表讲话，指出：总的形势，对帝国主义是不利的，对我们是有利的。多少时候是如此，朝鲜战争后更是如此。我们这一年做得不错，当然缺点不少。统战工作要加强，今后各方面工作都要深入。明年在今年基础上，按照今年步骤进行。并不是由平时转为战时，而是我们革命并未完，因此明年是继续今年的步骤进行下去。

同日 审阅修改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关于联大非法通过“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决议〔1〕的声明》稿。在声明稿中的“我们坚持以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为和平调处朝鲜问题的谈判基础”之后，毛泽东加写：“美国侵略军必须退出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必须取得联合国的合法地位，这一点不但是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合理要求，也是全世界一切进步舆论的迫切愿望。朝鲜问题和亚洲重要问题的和平解决，离开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声明指出，美国政府在其侵略军遭到失败的今天，提出先停火后谈判，这显然是为着美国可以取得喘息时间，准备再战。

12月24日 致电彭德怀：“目前伪军及美军一部在三十八度至三十七度之间站住脚跟，组成防线，对于我军各个歼灭该敌，最为有利。目前伪军集中于我有利，分散则于我不利。因此不但我军于此次战役后收兵休整可以向后撤退一步，使伪军又能集中起来，构成防线，以利下一次歼击，而且对于原定人民军第二、第五军团深入敌后分散敌人兵力的计划，值得重新考虑。该两兵

〔1〕这个决议于1950年12月14日联合国大会通过。

团在此次战役后暂时和志愿军一同休整，不要南进，待下一战役后再行南进，似较适宜，究应如何，请你酌定。”

同日 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从十一月二十五日开始到本日胜利结束。此役于十二月六日收复平壤，十七日占领咸兴，二十四日收复兴南，共歼敌军三万六千余人，收复了三八线以北除东部沿海的襄阳以外的全部地区，迫使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扭转了朝鲜战局。

同日 复信黄炎培：“十二月二十三日来信及附件，已收到阅悉，当即转寄饶漱石、陈丕显二同志，并请他们予以调查，酌量处理。”

12月26日 复电彭德怀、朴一禹并告金日成及高岗：“（一）彭、朴十二月二十六日给吴、周〔1〕转告金雄等同志电，已阅悉，你们的处置是正确的。（二）在此次战役结束后，全军主力（包括人民军第二、第五军团、均应撤退至利于休整的适当地区，休整一个月至两个月，补充新兵，恢复体力，总结经验，筹备粮弹，修通道路，补齐衣被鞋袜，整顿纪律，改善中国同志与朝鲜同志的关系（那些以恶劣态度对待朝鲜同志的人们应受到严格批评，重者应予以撤职处分），改善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严格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好居民群众工作（包括帮助受难人民解决一部分物质困难），并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动员（不消灭朝鲜境内的敌人不回国、为春季作战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三）现在的形势和十一月间的形势相比已经改变了，十一月间决定派人民军两个军团深入朝鲜南部的计划，现在应加改变。现在敌人在三十七度至三十八度之间构筑防线，是有利于我军各个歼击的。

〔1〕吴、周，指吴瑞林、周彪，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2军军长、政治委员。

美军主力守汉城区域，其一部守浦项、釜山区域，在这两者中间，直至春川、江陵之线则是伪军九个师，这样，就使我军能够不要走很远的路便能找到伪军及一部美军作战，而各个歼灭之。因此，人民军第二、第五军团如果现在插入朝鲜南部，威胁敌人后方，就有分散敌人，使敌人变更部署，不敢在三十七度以北地区建立防线的可能，而汉城美军则有放弃汉城集结大田、大邱一带的可能，这样，将使我军作战发生很大困难，不易各个歼灭。因此，不但人民军二、五军团现在不要深入南部，而且全军主力（包括人民军）在此次战役后，应当后退几十公里进行休整，使美李两军感觉安全，恢复其防线，以利我军春季歼敌。此点要使朝中两国各主要干部充分明了。（四）战争仍然要做长期打算，要估计到今后许多困难情况。要懂得不经过严重的斗争，不歼灭伪军全部至少是其大部，不再歼灭美英军至少四五万人，朝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 同日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中央人民政府做了一年工作，算是有成绩的。工作中也发生了许多缺点和错误，尤其在上半年的税收、公债工作中，下半年的镇压反革命活动工作中。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人民责备我们是“有天无法”和“宽大无边”，现在情况已开始好转了。干部在工作中的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和强迫命令作风，是与政府的政策不对头的。对反革命应镇压，在人民内部应实行民主。今年六月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前后，政府公布了许多法令，使以后工作逐渐走上了轨道。现在法令比过去完备多了。到后年，我们就可以使国家情况基本好转。现在要继续努力，准备一切条件，有计划地进行建设。现在的情况是：敌人是倒霉的，失败的，向下的，悲观的，没有前途的；我们是胜利的，向前的，发展的，是有前途的。总之，我们要稳步前进，不打无把握之仗。会上，郭沫若

作出席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报告后，毛泽东说：和平运动在全国、在全世界有很大效力，再过两年效力会更大，使帝国主义者要打的战争打不成。现在有些人对战争与和平搞不清楚，不清楚为什么又要打仗，又要搞和平运动签名，又要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打仗，是打侵略者，不赶走侵略者，就得不到和平。和平运动签名和参加军事干部学校，都是为了反对侵略，反对战争。对于这个问题，要加强宣传。

同日 阅杨得志等十二月二十五日关于第十九兵团许多干部要求去朝鲜参观向中央军委的请示报告，批示聂荣臻：（一）参观团应速去；（二）军委应即去一电告十九兵团整训要点。”

12月27日 审阅修改中央军委对征调老兵补充志愿军的决定稿，加写几句话：“须补充相当数量的老兵，方能争取援朝战争的最后胜利。”“每百人中至少有五十人参加过一次以上战斗者。”“对于这些被征调老兵的缺额，即由各区用新兵补充之。”

12月28日 就发表《实践论》等致信胡乔木：“此两文已看过，可以发表。第一天发表《实践论》。第二天发表《真理报》的评论〔1〕。分两天登报。可先在《人民日报》发表，然后新华社再用文字广播。”

同日 阅胡乔木本日就重新发表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2〕等文件的请示信，批示：“不但‘领导方法决定’，而且有许多其他文件，都有在报上重新发表一次的必要。此事请与陈伯达商量一下，开出一个文件单，加以审查，然后发表。”

〔1〕指苏联《真理报》1950年12月18日发表的编辑部评论《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

〔2〕这个决定收入《毛泽东选集》时，题目改为《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同日 致信胡乔木：“学习理论的指示是否有可能在数日内改好送我一看看，或者在一月十日前交我也可以。过了一月十日则我暂时不能看了。”

12月29日 就打好第三次战役和准备春季攻势，复电彭德怀并告高岗：“十二月二十八日二十时电〔1〕悉，同意你的计划。此次战役如发展顺利，以六十六军或四十二军占领春川、洪川，以人民军一部占领襄阳、江陵，分储粮弹，准备春季攻势。其他各军，于战役完全结束敌人新部署亦已明了之后，即分置于粮运较为便利地区（不论三八线南北八部署休整两个月。所谓三八线在人们脑子中存在的旧印象，经过这一仗，也就不存在了。我军在三八线以南或以北休整，均无关系。但如不打这一仗，从十二月初起整个冬季我军都在休整，没有动作，则必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甚多揣测，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人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如我军能照你们目前部署，于一月上半月打一个胜仗，争取歼灭伪军几个师及美军一部，然后休整两个月，准备春季攻势，则对民主阵线及资本主义各国人民大众影响甚好，对帝国主义则给以新的一击，加重其悲观失败情绪。菲里波夫同志对志愿军的领导认为是正确的，他批评了许多错误的议论，他了解朝鲜作战中的困难，他自动提议增加汽车二千辆，解决你们的困难问题。军委已通令全国军队（除新疆及西康外），每连抽老兵二十人，如进行顺利，可于二月间集中第一批四万余人补充志愿军。敌军新指挥官李奇微〔2〕中将已到汉城，代替已死的沃克中将，他一

〔1〕指彭德怀1950年12月28日20时关于占领三八线的意见给毛泽东并高岗的电报。

〔2〕李奇微，当时任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1951年4月任“联合国军”总司令。

到就下令美伪军各部死守，不许后退，这对我军寻找伪军及一部美军歼击，甚为有利。假如他在此次战役后固守汉城不退，则对我更为有利。我们现在不怕敌人固守汉城及三七度线以北区域，只怕他退出该线而扼守大邱、釜山狭小地区。但后一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你们要准备对付这种情况。”

同日 将邓子恢、谭政等十二月二十四日关于中南军区剿匪经验的报告，批转给陈毅、张震，贺龙、邓小平，张宗逊、甘泗淇，说这些经验是很有用的，请他们加以研究。同时，又致电邓子恢、谭政等，指出：“对桂、粤、湘三省剿匪仍望加紧督促，务于五月三十一日以前彻底完成剿匪任务，使广西的一个军（是否四十五军适宜）及二十一兵团能于六月上旬集中梧州地区待命调动入粤，应付可能发生的事变〔1〕。湖南应准备以一个军至迟于五月间最好能在三四月间集中郴州、衡州线上待命。总之广东有事须由四野负责独力应付，保证战胜可能入侵之台湾匪军，巩固广东防务，望按此方针筹划剿匪工作及兵力部署。”

同日 阅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十二月二十五日关于广州市预防空袭疏散物资情况的报告，批示请周恩来电话告饶漱石、陈毅、邓子恢，停止疏散物资，保持安定状态。

同日 致信黄炎培：“近日土改情报数份送上一阅，请掷还。其中有关于松江区的过左行为的报道。另华东局指示电一件。”

同日 复信周世钊：“囑写的字给你写了，不知可用否？临行一信，长沙一信，都收到，很感谢！所说各事都同意，可以做（有些是要逐步地做师范教育会议，待与马先生〔2〕一谈，大略是可以的吧。晏睡的毛病正在改，实行了半个月，按照太阳办事，不按月亮

〔1〕 指台湾国民党军队可能在广东登陆进犯。

〔2〕 指当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马叙伦。

办事了。但近日又翻过来，新年后当再改正。多休息和注意吃东西，也正在做。总之如你所论，将这看作大事，不看作小事，就有希望改正了。”嘱写的字，指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题词“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并应该校九六班毕业生的请求，为他们制作毕业纪念章题字“湖南第一师范毕业”。

同日 致信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技术部全体工作同志：“你们的工作很有成绩，配合了正义战争的胜利。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为争取完全的胜利而奋斗。”

12月30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镇压反革命的第二次指示，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这是关于镇压反革命的全套策略问题，如果不在干部中弄清楚，并加以严密掌握，就有为反革命所利用，为民主人士所不满，为人民所不同意，使我党陷人被动的可能。目前几个月，肃反正在高潮，务望注意策略，达到团结各界人民彻底镇压反革命的目的。”中南局的指示指出：镇压反革命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必须密切配合，要使这几个方面的打拉策略步骤配合得宜，而不可无策略地多面出击，引起全局紧张，孤立自己。因此肃反工作必须强调打得准、打得狠、打得稳，要做到有准备、有重点、有区别、有分寸。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西北局十二月二十六日关于工会工作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上海、北京、天津三市委，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各地工会工作存在着严重的缺点，而各级党委一般地说来注意得很不够，或者完全没有注意，这是不对的，必须改变这种情况。现将西北局十二月二十六日关于工会工作的报告转发给你们，望你们加以研究，定出自己的方针，并报告中央为盼。”

同日复信才旦朋杰和扎西才让〔1〕：“你们的来信，已经收到了。我很高兴知道你们同到达你们那里的人民解放军结成了朋友。人民解放军开入西藏的目的，是为了帮助西藏人民解脱外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的压迫，所以一切开入西藏的人民解放军，到处都同西藏人民结成了朋友。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对待西藏各界人民的办法，已经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司令部的联合布告〔2〕内说得很详细，现在已命令前线部队将这个布告抄给你们，希望你们用各种方法把它散布开去，并多多地寄到拉萨方面去。你们对这个布告如有什么意见，请告诉我。你们所提出的五条请求，其中第二条已在布告里说明白了。其中第一条、第三条，你们两个邦保〔3〕要同当地解放军军官进行和谈，我完全同意。至于西藏高级官员如要进行和谈，也可以把和谈的意思经过当地解放军军官转达给我。其第四条，人民解放军入藏部队都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决不侵扰老百姓。如果西藏官员都像你们一样同解放军合作，那么开进的部队就可以少一些。其第五条，人民解放军官兵的行动，只要不妨碍军事秘密，可以预先通知你们，这件事由当地军官同你们商量办理。我感谢你们的来信，并问候你们和两个邦保的人民。”

同日 致电王震：“复才旦朋杰和扎西才让的信，望经前线部队转交。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司令部联合发布的入藏布告（新华社于十一月十日重庆电），望告知前线部队广为散布与宣传。”

〔1〕才旦朋杰、扎西才让，当时是西藏阿里地方政府的代表。

〔2〕指西南军政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司令部为正确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各项政策联合向西藏人民及进军西藏部队颁发的布告。这个布告刊登在1950年11月11日《人民日报》。

〔3〕邦保，藏语“官员”的译音。

12月31日 应杨之华〔1〕的请求，为《瞿秋白文集》出版题写一段话：“瞿秋白〔2〕同志死去十五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在文化事业方面。”同时，复信杨之华：“来信收到。瞿秋白同志文集出版，甚好。写了几句话，不知可用否？”

同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邓华、朴一禹、洪学智并告第九兵团电：“我志愿军全部从十月十九日入朝鲜境作战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包括西北两战役、东北战役〔3〕战场上的伤亡失踪人数，冻死冻伤、病死及因病离队、在运动中炸死炸伤人数在内，每军数及全军总数，请查明电告为盼。”

同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宋时轮并告彭德怀电：“九兵团近日情况如何，是否都吃得上饭了，衣被鞋子是否解决了，伤病员处理情况如何，共有多少伤病员，此次东线作战减员总数多少，以上请查明电告。”

同日 晚上，设宴招待即将回国的尤金。在北京的中共中央

〔1〕杨之华，瞿秋白的妻子。当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部长。

〔2〕瞿秋白，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苏区坚持斗争。1935年2月从江西往福建转移途中被国民党逮捕，6月18日在福建长汀就义。

西北两战役，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进行的第一次战役和第二次战役中西线战场的作战。东北战役，指第二次战役中东线战场的作战。

政治局委员及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出席宴会。席间，毛泽东说：美帝国主义在朝鲜的侵略，对中国人民是一个很好教育。不数月间，美帝的一切原形均已暴露无遗，中国人民对美帝的认识提高了一步，抗美援朝的运动得到很大的开展。由于美帝冻结了我国的资金，我们一夜之间，决定接收受美国津贴的大学十六所、中学二百五十所、小学一千六百余所，保护了我们祖国的教育事业。目前我们在朝鲜的作战，有极大的胜利，我们不怕美军守，只怕他走，走了就很不好。当我军收复平壤时，如果直追下去，可能把美军赶走，但这不好，不能让他跑掉，逃走了对我们是不利的。

1951年五十八岁

1月1日 下午，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新年团拜会。在致词中祝大家努力把做得更好，更加团结起来。

同日 《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元旦社论《在伟大爱国主义旗帜下巩固我们的伟大祖国》。社论回顾了一九五〇年经济战线上取得的伟大成就和抗美援朝取得的胜利，并提出一九五一年中心任务。毛泽东对社论稿作多处修改。将社论稿中的“中国劳动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一句，改为“中国劳动人民的生活有些得到了显著的改善，有些得到了初步的改善，有些正在完成着改善生活的条件。”在社论稿讲到恢复和发展经济处，加写：“而认真地改善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则是顺利进行这一切经济工作的重要条件之一。”

1月2日 复电张云逸、李天佑、莫文骅、卢绍武〔1〕并告邓子恢、谭政：“俭电〔2〕所述剿匪计划甚好，你们过去几个月剿匪工作有很大成绩，甚慰。”

同日 阅周恩来本日给毛泽东、江青的信和他送阅的彭德怀

〔1〕卢绍武，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省军区参谋长。

〔2〕指张云逸、李天佑、莫文骅、卢绍武1950年12月28日关于广西剿匪计划给中南军区党委的报告。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给中央军委的电报后，得知毛岸英已在朝鲜牺牲。周恩来信中说：“毛岸英同志的牺牲是光荣的。当时我因你们都在感冒中，未将此电送阅，但已送少奇同志阅过。”

“高瑞欣亦是一个很好的参谋。胜利之后，当在大榆洞及其他许多战场多立些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烈士墓碑。”当时，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牺牲的成千成万，无法只顾及此一人。事已过去，不必说了。”

1月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南分局并告中南局电：“同意你们对海南岛的工作计划，请你们认真督促海南区党委加紧实行。海南有老区为核心，土改工作似可较为加快，似可在一九五一年秋季完成一半，一九五二年春季全部完成。只要土改完成，海南就在基本上巩固了。”

同日 为转发华东军区、中南军区党委分别关于征调老兵补充志愿军的指示电，起草中央军委给各大军区并告志愿军司令部、第九兵团的批语，指出：“此次在全国范围内征调老兵（除新疆及入藏军），不但对志愿军的补充有极大意义，对整个人民解放军亦有极大意义，因为这样就使整个人民解放军的各部分均有志愿人员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这件事的教育意义是很大的。请各大军区均认真进行这一征调工作，按时完成任务。”

同日 阅黄克诚关于对湖南军大旧军官中反动分子的处理意见给邓子恢并毛泽东的电报，致电邓子恢并告黄克诚：黄克诚同志的处理意见，“我认为正确的，不知你已回答否，如未回答，即照黄电意见处理为宜”。黄克诚的电报说：对军大的这批学员，不宜采取急躁处理办法，除其中个别特别反动的分子应逮捕惩治外，不宜逮捕惩罚过多，因为他们的罪恶都是过去的，解放后并无罪恶。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高岗电：“你十二月二十九日致各

省委及万毅〔1〕等同志关于与苏联军事人员建立良好关系的指示电，我们完全同意，望即照此实行。在关内各地亦应如此。”同时，为中央起草转发高岗的电报给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党委等的批语：“中央完全同意这一指示。你们各地凡有苏联军事人员之处均应采取此种态度。”

同日 复电西南军区党委：“你们去年十一月十日关于军事计划的报告早已收到，甚好，望即照此实施为盼。惟扩大地方武装二十至二十五万一事，仍应照军委原规定扩大地方武装及新兵各十万，不要再增加五万，使中央及地方预算都无法负担。”

同日 对斯大林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祝贺毛泽东五十七岁生日的电报，批示外交部：“此类来电均应复电致谢，但来往电均不要发表。”

同日 写信给李讷〔2〕：“你病了，我很念你。你好好养病，早日好了，大家欢喜。下大雪了，你看见吗？”六日，再次写信给李讷：“你是不是好一些？爸爸很想你。不要烦躁，耐心将病养好。”

1月5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致中南局并湖南省委的电报稿，加写一句话：“陈渠珍〔3〕是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对他的处理应取慎重态度，不要轻率处理致使我们陷入被动。”

同日 审阅修改中央军委致彭德怀、宋时轮的电报稿。电报指出：朝鲜战报现为全国、全世界所注视。凡军事上有重要发展，例如攻克要地、获得重要战果，及采取释放敌俘等重要步

〔1〕万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兼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1952年8月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2〕李讷，毛泽东的女儿。

〔3〕陈渠珍，曾任国民党军湘鄂川黔绥靖分署副主任、湘西行署主任，1949年8月参加湖南和平解放工作。

骤，均宜由新华社在不泄露军事机密的条件下随时发表。现新华社经常不发战报或报道太晚的状况需要改变。望你们督促新华社随军记者认真加强报道工作，除战绩及战地通讯仍照旧发来外，望对每一重要发展，均令其写出新闻，发给新华总社审定公布。

1月6日 阅黄炎培转来的一些工商业者兼地主说新解放区土改“斗争过火”、“偏差很大”，要求“和平土改”的信，致信黄炎培：“华东局一月四日给所属党委关于土改的指示电（1）一件送请察阅，并请掷还。”十日，致信饶漱石、陈丕显：“黄炎培先生收到许多地主向他告状的信，我将华东局去年十二月所发关于纠正肃反工作中缺点的指示及一月四日关于纠正土改工作中缺点的指示送给他看，他比较懂得了一些。黄先生准备于本月内赴苏南各地去巡视，我已嘱他和你们接洽，到时望将全面情况和他详谈。”

1月7日 写批语将陶铸关于广西剿匪工作的报告转发给陈毅、饶漱石，邓小平、贺龙，习仲勋、张宗逊参考，并请他们转发所属剿匪尚处严重情况的地方和军队阅看。批语肯定广西最近时期的经验是很好的，值得研究。陶铸的报告总结了两条基本经验：首先是做到了更大地集中兵力与更好地组织党、政、民、财力量的配合；其次是镇压、收枪、反霸、地方武装建设等几项剿匪的主要政策更加明确，执行得更好。九日，毛泽东复电陶铸并告广西省委、中南局，指出：“既然两大重点区（2）土匪可以在三

（1）指示电中讲了华东第二次土改典型试验会议后各地放手发动群众取得的成绩，同时指出个别地区也开始产生“左”倾偏向。指示电要求：各级党委在土改全面展开时期，必须集中力量加强领导，及时检查工作，及时纠正运动中的偏向，保证土改的顺利进行。

（2）指广西郁江、左江以南地区（即由梧州、南宁至龙州整个沿江以南直至钦州、廉州沿海）和大小瑶山及周围县境这两个匪患较严重的地区。

月以前剿清，请考虑进剿西北部土匪是否可以只要二十一兵团去而不要四十五军去，以便将四十五军从剿匪中解放出来于三月间即开至梧州地区整训待命，准备应付广东方面的万一情况。”

1月8日 中央军委会议就中央军委文电的审批权限作出规定：凡属政策性的送毛泽东审定。

1月9日 就第四十五军、第四十六军集中整训和广西、广东剿匪等问题，致电邓子恢、谭政、赵尔陆并告叶剑英、方方：（一）广西方面剿匪进展顺利，据陶铸说三月以前南北两重点区剿匪即可完成。似此四十五军应即于三月内集中梧州整训，湖南的四十六军应于二月内集中郴、衡〔1〕线上整训，只要这两个军能于二、三月内集中上述地区，就可应付万一。（二）江西南部的四十八军情况如何，如有紧急需要，该军是否亦可向广东调动，盼告。

（三）二十一兵团在广西南北两重点区剿匪工作完成后，如广东方面无紧急需要，应开到广西西北部剿匪以求锻炼，否则亦应集中梧州整训，究应如何届时再做决定。（四）广东剿匪工作现在是否已特别抓紧进行，何以很久没有剿匪成绩的报告，请叶、方检查电告。”

1月1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北京市委关于工商界抗美援朝运动报告的批语：“中央希望各中央局，分局，市委，省委，区党委，对于工商业家的爱国运动，加以充分的注意。”

同日 阅宋时轮一月九日给彭德怀、邓华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批示：“周、聂：九兵团要求改善装备，补足骡马，早补新兵，请考虑解决。”

1月12日 复电邓子恢、谭政、赵尔陆：“即照你们的部署，从四月起集中六个军应付广东方面的情况，从六月起，再增

〔1〕郴、衡，指湖南郴州、衡阳。

加四十七军两个师。请督促各军按期完成此计划。”

1月13日 致电陈毅、饶漱石，邓子恢、谭政，叶剑英、方方，转告一月八日获得的蒋介石计划准备用二十至二十五万兵力攻占厦门、汕头等情报。电报指出：“蒋匪进攻厦门、汕头可能性很大，望迅速研究对策。”“请陈毅同志考虑对厦门增加防御兵力，加强防御工事，加强炮兵及高射炮，储备粮食弹药，派去得力指挥人员，并须预备由大陆向厦门的增援计划，务达击退进犯匪军，确保厦门之目的。请通知叶飞速筹对策电告。”“汕头及海陆丰必须迅速部署两个军，其办法为从广东三个军中以一个军的全部（三个师及军部）集中于该区域，湖南的四十六军立即出动直开该区域，并设立指挥两个军的指挥机关。请邓、谭筹划电告。”“福建、广东两省剿匪工作务须加紧督促，早日完成，不得迟误。”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对朝鲜战争宣传应注意之点给西北局的电报稿，删去“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狂妄打算已遭受严重的打击”一句，并批注：“美国并没有准备在目前发动世界战争。”

同日 会见黄炎培。黄再次提出到苏南去看看。毛泽东说：你们去看看很好，可以选择好的、差的一二处考察，可以听到各级领导干部、农民、地主富农三方面的意见。十九日，黄炎培一行离京南行。

1月14日 致电邓小平：“张宗逊一月九日的电报你是否已看到，他提议以七百五十人及一千匹马的青海骑兵支队，携带一个半月粮食，配合十八军入藏，到拉萨及日喀则以后供给问题全由你们负责解决。你们是否同意此项提议，望考虑电告。”十七日，又致电张宗逊并告习仲勋及贺龙、邓小平：“同意你的提议，用青海骑兵支队携带一个半月的粮食配合西南军队入藏，到拉萨及日喀则后由西南负责解决给养问题。请即照此作准备，并请注

意：（一）从青海藏人中招收少数志愿兵，例如二三百人马，给以训练武装，加入骑兵支队；（二）班禅集团随军入藏的各项准备工作；（三）该支队受十八军指挥，并编入十八军序列。”

同日 阅斯大林一月十三日致周恩来电及周恩来批注的意见“金能协彭来此一谈最好”，致信周恩来：“我已告彭，叫他和金暂时不要来，他们定二十四日开干部会，不可能来北京。因此，请你改写一个给金日成的备忘录，我看后用电报发去征求金同意。”斯大林在电报中，表示支持中国政府致苏联政府备忘录中提出的“在同意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的基础上举行有关各国的谈判，以结束朝鲜战争”等四项提议，并建议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也知道中国政府的这些提议。随后，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国政府致朝鲜政府备忘录经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同日 复信徐悲鸿〔1〕：“十月十三日给我的信并附石永懋先生所为书〔2〕二本均已收到。同意先生的意见应对石先生予以照顾。最好在先生所办的学校予以位置，如不可能则请持此信向中央文教委员会接洽酌定解决办法。”

同日 复信李思安〔3〕：“两次来信，均已收到，甚为欣慰。同意你来北京，如果你愿意和蒋竹如同学他们一道进革命大学学习一时期则可以进该校，否则另想工作办法。来时可持此信向中共中央统一战线部李维汉部长接洽入学或工作问题。”

〔1〕徐悲鸿，画家、美术教育家。当时任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2〕指在天津当过中学教员的石永懋所写的《论语正》一书。

〔3〕李思安，新民学会会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去印度尼西亚教书，1950年回国，后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同日 复信戴毓本〔1〕：“十二月二十八日给我的信收到了，甚慰。假如你下了决心，又能吃苦，我同意你来北京进人民革命大学学习一时期，然后再做你所熟习的工作。或者不进学校，来京径做医务工作也好。来时可持此信向中共中央统一战线部李维汉部长接洽。如果你在湖南已有工作，并能安下去，则以不来为好。”

同日 批示同意罗荣桓、傅钟〔2〕、萧华关于出版《八一杂志》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八一杂志》于四月二十日创刊。

1月15日 致信马叙伦：“关于学生健康问题，前与先生谈过，此问题深值注意，提议采取行政步骤，具体地解决此问题。中共华东局一月十一日电报一件付上请察阅，其中第三项即谈到此问题，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我以为是正确的。请与各副部长同志商酌处理为盼！”

同日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成立题词：“努力学习，保卫国防。”

1月16日 就确保厦门和加强江浙沿海防务等问题，复电陈毅并告饶漱石：（一）同意你的第一步和第二步计划，福建有四个军已很够了。厦门必须确保，有三十一军全部位于厦门及其附近当能担负这个任务。该军战斗力如何盼告。（二）厦门必须多储粮弹，布置积极防空（不是消极防空），对守军指战员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加强纵深工事，务必长期确保厦门。（三）空军准备赴朝鲜参战，不可能顾及华东。（四）除福建首先是厦门为敌人进攻重点已有部署外，江浙两省沿海亦需准备对付敌人进袭，因此二十四军应在常州地区照常整训，不要去福建。华东全

〔1〕 戴毓本，杨开慧在湖南长沙福湘女校、岳云中学读书时的同学，五四运动后曾在毛泽东等创办的自修大学学习。

〔2〕 傅钟，当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

军除剿匪者外，均须提高警惕，加强整训，准备对敌。（五）请督促福建担任剿匪的四个师两个团积极动作，每星期要有成绩，成绩多者应受奖励，少者应受批评，犯错误应受处罚，务必早日肃清匪祸。（六）华东全军应完全自力担负歼灭蒋匪进攻部队，不要希望外援。（七）江浙散匪必须限期肃清。”

1月17日 关于镇压反革命要稳、准、狠问题，致电各中共中央局负责人，指出：“顷接中南局转来湘西四十七军关于镇压反革命情况的报告，在湘西二十一个县中杀了匪首、恶霸、特务四千六百余人，准备在今年由地方再杀一批，我以为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只有如此，才能使敌焰下降，民气大伸。如果我们优柔寡断，姑息养奸，则将遗祸人民，脱离群众。”“当然，我们不应重复华北老区在一九四六年及一九四七年许多地方所犯过的乱捉乱杀错误，在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各新区必须注意这一点。”“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不应杀者，当然不杀）。”

1月18日 阅杨尚昆关于朱德患肺炎已痊愈但需休养的报告，批示：“同意朱总司令休养计划，时间应长一点。”

同日 复电新疆和田专区各民族人民：“和田区军民联欢大会一月一日来电已悉。感谢你们积极拥军优属，并为抗美援朝与保卫世界和平的努力，祝你们永远的团结和进步！”

1月19日 接见参加第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各中共中央局和大城市党委统战部负责人，并同他们谈话。在谈到抗美援朝运动时指出：这个运动应普及到所有的工厂和农村，也要让佛教界参加到这个运动中来，使得家喻户晓，大家都参加。在宣传上应当采取攻势。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是当前的三大运动。在谈到民主人士到农村视察问题时指出：各地不要以此为累赘，应当让他们去听听农民的诉苦，看看农民的喜悦，看看

我们有些什么缺点和错误。这是一件有益的事情，应该欢迎他们去。状元三年一考，土改千载难逢。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直到孙中山都没有做过，我们才做。你们对民主人士不要估计不足。对于工商业家、宗教界、校长、教员、开明士绅和爱国分子，我们都应采取积极态度团结和教育他们。有话应当让他们说，好的接受，不好的解释，决不能置之不理。在谈到佛教问题时指出：对佛教问题的处理，要研究一下。要使他们参加到运动中来。佛教如何改革，要同他们里面的开明分子商量。他们中有人说，他们没有信教自由，庙都被占了。北京市恐怕要给他们腾出几个庙来，五台山关系蒙、藏两个民族，恐怕要重修一下。在谈到民主党派组织发展问题时指出：去年说要巩固，今年说要发展，如果今年还只是一个巩固，那是不行的。因为社会上有他们的阶层和人物存在，所以就应当发展。所有民主党派不到二万人，今年发展一倍也不过四万人，并不算多。应该在运动中使民主党派进步，放手让他们去做。这是积极的有益的方针。应当使全党了解，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是可以进步的。要用积极态度去组织民主人士、民主党派，教育他们，使他们参加斗争，带领他们共同前进，这对劳动人民是有益的，对进入社会主义是有益的。在谈到统战工作问题时指出：直到地委一级均应有统战部门的组织，县如何办，也研究一下。各中央局至区党委，每年都应当开两次统战工作会议，一次大的，一次小的，你们当中要出一些专家，要熟悉人物和历史，精通此中门道。

同日 审阅修改彭德怀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军以上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上的报告稿，致电彭德怀：“这个报告稿的内容很好，但为了避免由中国人对朝鲜的政策和工作作出决定的语气，为了避免泄漏军密的可能（许多事实和数字可以口说不要

写出、并为了使行文更为简洁，现将你的报告稿在文字上和某些意思上略加修改发上，请再依据情况予以斟酌，并请事先送金首相阅正，商得其同意。”毛泽东在报告稿的最后加写一段话：“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和人民军，在朝鲜五年来的斗争中有了伟大的成绩，他们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了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政权，建立了英勇的人民军，和苏联、中国及其他人民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现在又正在和美国侵略军及李承晚匪军进行着英勇的斗争。因此，一切在朝鲜的中国志愿军同志必须认真地向朝鲜同志学习，全心全意地拥护朝鲜人民，拥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拥护朝鲜人民军，拥护朝鲜劳动党，拥护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同志。中朝两国同志要亲如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斗到底。中国同志必须将朝鲜的事情看做自己的事情一样，教育指挥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如同我们在国内的想法和做法一样，这就是胜利的政治基础。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最后胜利就一定会得到。”一月二十五日，彭德怀在联席会议上作报告。

1月21日 为转发中共河南省委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我们希望各省委市委区党委都有一个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总结性的报告。”同时，为中央起草致中南局并转河南省委电：“我们收到了河南省委一月十三日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报告，我们认为这个报告是很好的，业已转各中央局及省市区党委参考。请中南局亦将这个报告用电报转发湘、鄂、赣、粤、桂五省参考，请这五省每省写这样一个总结性的肃反报告。”

同日 复电中共上海市委并告饶漱石、陈毅，指出：“你们准备在一月份中给予反革命分子以有力打击，望你们对此进行周

密的侦察布置。布置好了，同时动作，做一次准确的逮捕。然后好好清理审讯，处决一大批真正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

1月22日 阅邓小平一月八日关于中共中央西南局一九五〇年十一、十二两月工作情况的报告，复电邓小平并告各中央局负责人：“报告收到阅悉。方针正确，成绩很大，甚慰。你们的第一次城市工作会议开得有成绩，甚好。假如可能的话，在今年五月一日以前，请你再召开一次城市工作会议，对城市工作，主要是对工会工作，对工商业的领导方向和对城市政权问题，加以深入研究，并做出某些决定，为四中全会讨论工会工作准备材料。四中全会准备在五月开〔1〕，请按此部署工作。”报告说：关于减租退押，目前主要还是防止束手束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和包办代替、命令主义，以免“煮夹生饭”和“吃回头草”。等到退押浪潮过去，大部退了的时候，及时转入清理，说服群众，分别对待中小地主。城市工作会议的主要收获，在于自此以后，我们将加强对于城市工作的研究和指导。会议中着重批判了党内较为普遍的看不起工人的思想，明确了依靠工人阶级应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应把它贯彻到各项工作、各个部门中去。

同日 复电叶剑英、黄永胜、萧向荣〔2〕、尹林平并告中共中央中南局：“一月十七日电悉。广东情况已明了，你们的部署是正确的，希望努力完成任务。此外，望注意镇反工作。凡与剿匪有关的匪首、恶霸、大特务，可由军区、军分区的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凡与剿匪无关的反革命重要分子，则由地方法院及军管

〔1〕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后来在1954年2月举行。

〔2〕黄永胜，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兵团司令员兼广东省军区第一副司令员。萧向荣，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52年1月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

会的军法处判处死刑；乡村普通恶霸及不法地主，则由农民斗争、监视及由人民法庭判刑，如此分三方面进行，可期迅速，又较妥当。”

同日 致电陶铸并告邓子恢、谭政、叶剑英、方方，指出：“四十五军争取早日结束剿匪待命开韶关、广州线整训备战；二十一兵团确定在广西境内剿匪及驻防；四十九军争取在五月或六月以后能集中使用，望按此意图进行部署。”

同日 关于编印土改材料，致信彭真：前次收集土改材料中，可择其不需要修改的若干篇，连同江西省委一月七日指示〔1〕一件，印一本发党内及民主人士。篇数少点不要紧，有六七篇即可。又有一件关于纠正错划阶级成分的，是浙江省委向所属的指示，请你找来加印进去。

同日 阅杨秀峰〔2〕一月十四日关于阜平、曲阳两县灾情及解决办法给河北省人民政府转政务院的报告。报告说：鉴于河北省阜平、曲阳两县今年雹、冰、风、虫灾均重，建议再增拨棉被、寒衣各十数万套。同时应对这两县山地实行封山育林，故逐年贷款扶助生产实有必要。如果这两县今年贷一百五十万斤米，全省山地生产贷款两千万斤米，即可做很多事情。这样，三五年后可以收很大效果，较之年年救济并不多费。毛泽东批示：“周：应当批准此项要求。”

同日 致信年近八十岁、渴望了解家乡情况并曾要求参加土改的张澜：“西南局书记邓小平同志给我的报告〔3〕一件，送上请

〔1〕指中共江西省委1951年1月7日关于纠正土改中缺点给各地委的指示。

〔2〕杨秀峰，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统战部部长、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

〔3〕指邓小平1951年1月8日关于中共中央西南局十一、十二两月工作情况的报告。

察阅（可要您的秘书念给您听）可以看出西南工作的一般情况。阅后请予掷还。先生身体好吗？甚为系念。”二十四日，收到张澜复信，将其转给邓小平。复信说：报告中关于退押进行情况言之甚详，处理亦甚当。押租实在是一种剥削。今天地主佃关系已不存在，当然应该退押。目前退押发生困难的是一部分小地主或者也是知识分子。待到退押浪潮过去转入清理时，对于确有困难的中小地主多在“缓”、“少”、“不”三字做文章，对顽固的则交法庭处理。将来能够切实审慎照此去做，是很好的。二十八日，毛泽东再致信张澜：“西南去年剿匪工作，颇有成绩，消灭匪众八十余万，缴枪四十余万，残余匪众已不足四万，两三个月即可完全剿灭。送上西南军区最近由地面送来之总结报告一件，假如您有精神的话，可以一阅。可以慢慢看，一星期内还我即可。”八月三十日，又将人民日报社编印的《情况与资料》第九十一号刊登的《西南经济建设情况与问题》一文，送张澜阅。

1月23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推销土产工作情况等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华北局关于推销土产的经验，“应在全国推行起来，请你们务必加以研究，仿照推行为要”。报告介绍华北局推销土产的经验主要是：国营商店、合作社和私商，积极恢复和开辟新旧商业网；根据产、运、销三者有利的原则，广泛推行代购、代销、运输等各种形式的合同；选择经济要地，建立有强大吞吐能力的货栈；动员和组织私商经营土产，党政给以帮助；组织群众性的运输；动员群众进行短距离的推销。

同日 复信陈伯达：“我还是和过去差不多，拟于一周后去附近地点正式休息一时期，行前当找你一谈。关于介绍《实践

论》，《学习》上有了一篇〔1〕，我没有全看，你写文章时请翻阅一下。你文章写成时，如有时间，可以给你看一遍。〔2〕”陈伯达写的《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一文，作为《人民日报》一月二十九日社论发表。

1月24日 为转发邓小平一月八日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负责人的批语。批语指出：邓小平同志的报告中，“提到西南已开了一次城市工作会议，着重地批判了党内较为普遍的看不起工人的思想，明确依靠工人阶级应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应把它贯彻到各项工作各个部门中去等语。现在华东、中南、西北各区正处土改和镇压反革命等工作的高潮，许多同志当然很忙，但请你们考虑，腾出一段时间，在五月一日以前，召开一次城市工作会议，着重地研究和解决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问题，工厂管理问题，工会工作问题，为四中全会讨论这个问题准备意见。四中全会拟在五月召开，请你们按照这个时间部署工作”。

同日 就防备台湾国民党军队侵犯东南沿海而构筑工事问题，致电邓子恢、谭政、赵尔陆、苏静并告陈毅、唐亮、张震、周骏鸣和叶剑英、饶漱石、陶铸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省军区。电报说：“过去未经你们察看〔3〕设计，盲目地构筑工事，浪费甚大，是一教训。以后凡需支用经费，构筑工事要塞，修建道路、房屋、仓库等项，均需经过你们派人察看设计，做出预算，经过中央审核批准，然后动手兴建，否则不予报销。”“汕头至大亚湾

〔1〕指1951年1月15日出版的《学习》杂志第3卷第8期的社论《〈实践论〉——学习和工作的指南》。

〔2〕陈伯达1951年1月21日致信毛泽东说：近日在写一篇《学习〈实践论〉》，写完后，不知您能否给看一遍？

〔3〕这里的“察看”和下文中的“察看”，应为“查勘”。

一线及其他海岸线与内地，根本不要修筑什么工事或要塞，敌来让其登陆，并须诱其深入，然后聚而歼之。军队须离开海岸线驻在便于按照上述意图歼灭敌人的适当地点，从事整训，不要去守海岸线。为稽查特务潜人及打灭少数匪众登陆，应由保安队及地方武装担任。”“只有虎门、厦门、舟山、吴淞四处及珠江口外某些海岛必须确保，不令侵入。其余一切海岸线，都不要守而要让他进来，以利聚歼。”“许多共产党员打了二十几年的仗，忽然把经验都忘了，到处修工事，畏敌如虎，你们应加教育，叫他们不要如此。”“在厦门、舟山、吴淞三处修建阵地及福建、浦东等地修理道路桥梁，请陈、唐、张、周指示下面注意只择十分必要者好好设计修建之，务须避免浪费。”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东局一月二十二日关于镇反工作应注意的问题给福建省委的指示电，起草给各中央局负责人的批语，指出：“华东局给福建省委电所说肃反应注意之点，我以为是对的。即为了打落敌焰，伸张民气，对匪首、惯匪、恶霸及确有证据的重要特务和会门头子，应当放手杀几批。为了不致弄错，使自己陷于被动，对尚无证据的特务及会门头子，应当进行侦察，取得确证，而不要随便捕人杀人。分清这两种情况的界限是必要的，请你们转知所属注意为盼。”

同日 为转发中共山西省委一月九日关于取缔一贯道情况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关于取缔一贯道，以山西的经验为最完全，最正确，也最彻底，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1〕）的总结也写得很好，特转给你们研

〔1〕赖若愚，当时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山西省军区政治委员。1951年2月又任山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同年11月任中共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全国总工会秘书长。

究，各地均可仿行，以期有计划地彻底地取缔一贯道及其他各种会道门，并消灭其中反革命重要分子。和作战一样，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山西省委在准备和实行取缔一贯道的大规模斗争中是做到了这一点的，故成绩甚大，值得全党研究。”山西省委的报告说：为了彻底取缔一贯道，准备工作搞了整整一年，其中包括确切掌握一贯道的全面情况，选择重点试验取得具体经验，组织宣传攻势，批判麻木不仁的态度等。全省范围同时动手搜捕，十天内基本上完成了任务。

同日 致信彭真：“请考虑，将学校反美斗争文件，清出若十件，例如西南局一月二十日的报告及早一向南京市委的一个报告〔1〕，印一本，发各民主人士及党内高级干部。”

1月25日 阅苏南区党委统战部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关于召开民主党派座谈会给中共中央华东局并华东局统战部的报告，批示李维汉：“此件可印发到统战会议的各同志，并可要他们带回去给更多的同志看看。请要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的统战部一律定期召集，或有大事召集各民主党派代表人士开会，如苏南这次会议一样，并向中央统战部作报告，不开会不报告者认为失职。”报告说：苏南区党委统战部召开的这次民主党派座谈会，就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关系和民主党派的工作交流了情况，增进了了解，统一了思想，加强了相互间的团结，到会的各党派代表都非常满意。

1月26日 就董其武率领的绥远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三兵团后的进步情况，致信傅作义：“二十二兵团最近情况报告一份，送上请察阅，阅后请予掷还。二十三兵团进

〔1〕指中共南京市委1950年12月7日关于南京学生反美控诉运动情况向华东局并中央的报告。

步如此之大且快，可为庆贺！”

同日 下午，和李济深、张澜、林伯渠、周恩来等出席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为印度国庆举行的招待会，并致祝词。祝词说：

“印度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印度人民是很好的人民。中国、印度这两个民族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几千年以来是很好的。今天庆祝印度的国庆节日，我们希望中国和印度两个民族继续团结起来，为和平而努力。全世界人民都需要和平，只有少数人要战争。印度、中国、苏联及其他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团结起来，为远东和平、为全世界的和平而努力。”

1月27日 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中的文字缺点的指示稿，二月八日改定。指示说：现在党政军来往电报及其他报告、指示、决定等文件，写得好的，确实不少。这些电报和文件写得清楚明确，生动活泼，发生极大效力。但同时尚有许多文电在文字上存在着严重缺点，必须予以纠正。这些缺点之最常见者，有滥用省略、句法不全、交代不明、眉目不清、篇幅冗长五类。指示就上述五类问题，提出具体的纠正方法。关于纠正眉目不清的问题，指示说：一切较长的文电，均应开门见山，首先提出要点，即于开端处，先用极简要文句，说明全文的目的或结论，唤起阅者注意，使阅者脑子里先得一个总概念，不得不继续看下去。然后，再作必要的解释。长的文电分写几段时，每段亦应采用此法。关于纠正篇幅冗长的问题，指示说：凡文电必须认真压缩，必须注意文字的简明扼要，条理清楚，便于阅读。但压缩是指分清条理，去掉空话，并不是说可以省略必不可少的词类，可以违背文法，也不是说可以不顾文字的形象性和鲜明性。有些写得好的报告虽然篇幅颇长，却能引人阅读，使人不厌其长。有些写得不好的报告，虽然篇幅不长，却使人难看。这里的区别就在是否有条理，是否说空话和是否合文法。指示最后说：中央

为认此种文字缺点的纠正，将使我们同志的头脑趋于精密，工作效能有所提高，故须予以重视，对已存缺点认真地加以改革。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就印发这个指示批示胡乔木：“可以印成小本发给党内外较多的人看，不要在报上发表，因此件并无给群众看的必要。而一般文法教育则应在报上写文章及为学校写文法教科书。”

同日 就齐白石来信反映日本友人送给他的放置于湖南老家的铜像在土改中被打碎一事，写复信：“白石先生：来信收到，已转寄湖南省人民政府王首道主席请他酌情处理。”

1月28日 复电彭德怀：“（一）一月二十七日二十四时给我的电报及给各军准备作战的命令均已收到：（二）我军必须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以歼灭两万至三万美李军占领大田、安东〔1〕之线以北区域为目标。（三）在战役准备期间，必须保持仁川及汉城南岸桥头堡垒，确保汉城，并吸引敌人主力于水原、利川地区。战役发起时，中朝两军主力应取突破原州直向荣州、安东发展的计划。（四）中朝两军北撤十五至三十公里，发表拥护有限期停战的新闻是不适宜的，敌人正希望我军撤退一段地区，封锁汉江，然后停战。（五）第四次战役后，敌人可能和我们进行解决朝鲜问题的和平谈判，那时谈判将于中朝两国有利。而敌人则想于现时恢复仁川及汉城南岸桥头堡垒，封锁汉江，使汉城处于敌火威胁之下，即和我们停战议和，使中朝两国处于不利地位。而这是我们决不能允许的。（六）我军没有补兵，弹药也不足，确有很大困难。但集中主力向原州、荣州打下去，歼灭几部分美军及四五个南朝鲜师的力量还是有的。请你在此次高级干部会议上进行说明。此次会议应即作为动员进行第四次战役的会

〔1〕这里的安东，位于朝鲜半岛南部。

议。（七）我中朝两军在占领大田、安东之线以北区域以后，再进行两个月至三个月的准备工作，然后进行带最后性质的第五个战役，从各方面说来，都比较有利。（八）宋时轮兵团，应即移到平壤、汉城、仁川、水原区域休整，并担任巩固该区域，防止敌人在仁川及镇南浦登陆。在将来的第五次战役中，该兵团即担任西部战役之作战。（九）执行第四次战役时，请你考虑将中朝两军主力分为两个梯队，各带五天干粮，第一梯队担任突破及一段追击，第二梯队担任又一段追击，以便能使战役持续十天至十二天，歼灭更多敌人。（十）你的意见如何盼告。”同时，致电斯大林：“目前美国军队企图向仁川及汉城附近的汉江沿岸进攻，有使中朝两国军队不能不中断正在进行的休整，立即着手准备打第四个战役的形势。现将本日我给彭德怀的电报一件发给您，请考虑：我这样做，在国际形势上是否适宜，并以您的意见告我为盼。”二十九日下午，彭德怀在中朝两国军队军以上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电报的内容，并作战前动员。

同日 审阅《惩治反革命条例〈修正稿〉》并阅刘少奇关于发布这个条例的来信，致信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此件关涉军事及法院权限，应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开一次会通过，并用主席名义公布。事前召集政协常委及政府委员，法院，司法部，检察署，公安部人员开一次座谈会取得同意；在此次会上，应有人报告最近时期镇压反革命的情况。”对刘少奇信中讲到的“审判反革命罪犯仍依照现在办法归各地军事法庭为好”的意见，批注：“在军管时期应当如此。”二月二十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二十一日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公布实施。

同日 就嘉奖西南军区剿匪部队一事，致电贺龙、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并告华东、中南、西北各军区及福建、广东、广

西省军区：“你们一月六日送来的一九五〇年一年剿匪工作总结报告，收到阅悉，路线正确，方法适当，剿灭匪众八十五万人，缴枪四十余万支，成绩极大，甚为欣慰，望即通令所属，予以嘉奖。尚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干净剿灭残存匪众近四万人而奋斗。”总结报告说：自成都战役结束后，即以全力剿匪作为全军的中心任务。剿匪的主要措施是：组织一元化的剿匪斗争；集中兵力，重点进剿；军事进剿、政治攻势和发动群众三者密切协同；开展捕捉匪首运动与镇压匪首工作；争取少数民族参加剿匪。

1月29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工会工作。毛泽东说：各级党委应当专门地经常地讨论工会工作。五月间将召开的四中全会，即以工会工作为中心，同时应涉及到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工厂管理、工厂支部工作问题。今后大计，应该是三年准备、十年建设。所谓三年准备，应当是从一九五〇年算起。各级领导同志都应该心中有数，有一个计划，有步骤地去进行工作。诸如政治、经济、文化、工、青、妇等，均应包括在内，否则时间很快过去，到那时毫无预先布置，将推迟我们的建设。如有十年建设，一切均会改观，各种气象均会为之一新。领导方法上应注意多介绍经验，好的坏的经常通报，使之交流，工作就会推进的。各地在四中全会之前，应当专门讨论一次城市工作，为党的四中全会准备材料。

同日 复电张云逸、莫文骅、李天佑、卢绍武并告中南军区、广东省军区、华东军区，指出：“一月二十五日电悉，所提修建边防工事计划，根本不适合我军的作战要求。如敌来攻，海上者应当让其登陆，而不要阻止其登陆。越南者应当让其侵入，而不要阻止其侵入。”“你们计划到处设防，到处修工事，摆

〔1〕指逃入越南的国民党军残部。

成被动挨打的姿势，使我军丧失主动，丧失歼敌的机会，是完全错误的。目前你们工作的重心，应是减租、退押、清匪、反霸，有步骤地有把握地实行土地改革，严厉镇压反革命，大杀几批匪首、惯匪、恶霸及罪大的会门头子与特务分子，这些，就是最重要的巩固国防的工作。广东方面，除虎门必须筑要塞及珠江口外某几个岛上应修必要的工事和堡垒之外，其他地方亦一概不修工事，不守海岸线，敌来诱其深入，聚而歼之。华东方面亦只在厦门、平潭、舟山、吴淞四处的某些必要地点修筑要塞和工事（这些是确定要修的），其余亦一概不修。”

同日 致电陈毅并告饶漱石及中南军区、广东省军区、广西省军区、华东军区：“鉴于广东方面过去时期未经中南军区勘察指导设计，到处做工事，结果无用，浪费极大，此次华东在厦门、平潭、舟山、吴淞四处修筑要塞或工事，在福建修南平、同安公路，务请你们注意事先给以指导。第一，不要在指定地区不经研究设计随便修建，以致无用浪费；第二，在指定地区内亦只择最需要者做，不要到处做；第三，大陆海岸线及内地根本不要做；第四，大陆兵力，位于纵深地区，敌来应让其登陆然后相机歼击之，不要到处防守，不要阻其登陆；第五，建筑材料，必要者不可吝惜，照需要支给，但仍须防止浪费，注意废物利用，注意节省。”

同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致西南军区电：“一月二十四日西北军区给你们的电报，你们谅已收到。该电第二项所述入藏部队必须携带之皮衣、皮帽、帐篷、饭锅、水桶、黑矾、大蒜、料袋、牛绳等二十余种物品，十八军是否业已准备好，望查告。”

同日 阅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一月二十五日关于达赖喇嘛（1）近期情况和他的代表索康扎萨到新德里后的情况给李克农的

（1）达赖喇嘛，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

报告。袁仲贤在报告中请示两个问题：（一）索康扎萨到新德里时，如来见我，是否接见？（二）如再要派人员去北京，我是否可同意。毛泽东批示：“周：（一）应接见；（二）应同意来北京。” **同日**复电云南镇康县各民族人民：“你们欢迎中央访问团大会的来电已收到。我深深感谢你们，并祝你们日益团结与进步。”

1月30日 复电陶铸并告中共广西省委、中南局及叶剑英、方方，指出：“必须把一切股匪潜匪肃清，一切匪首捉起，一切非法枪支起掉。” “张云逸同志现去广州休养，提议陶铸代理省委书记，不要回武汉，或者回来报告一次立即去广西。总之广西极为重要，工作必须做好，上述提议是否适宜，请中南局考虑电告。”

同日 将中共青海省委向西北局报送的玉树地委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医疗和贸易工作的报告转发邓小平，批示：“此件，不知西北局发给你们没有，如未，可看一看，并请转告十八军同志注意玉树的经验。”

1月 为转发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发动群众做好土改工作的指示，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负责人的批语：“土改工作主要应注意是否真正发动了群众，由群众自己动手（由上面派干部帮助）推翻地主阶级，分配土地。只要合乎这个方向就是好的。有些偏差，例如侵犯中农，破坏工商业，划错阶级成分，消灭富农，使地主一律扫地出门以及捉人太多等等，应由省委、地委两级随时指导纠正。” “北京若干民主人士到各省去看看，有益无害。是我们叫他们去的，不是他们自己要求的。他们到了，是则是，非则非，老老实实地向他们讲明白，他们不会妨碍土改的。”

2月2日 审阅修改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关于联合国大会非法通过诬蔑中国的决议的声明稿，批示：“照发。”三日，《人民日报》发表这个声明。声明指出：联合国大会及其第一委员会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代表参加，而且在侵越安全理事会的权限情况

之下，竟通过美国诬蔑我国的提案，显然是非法的、诽谤的、无效的，中国人民坚决表示反对。

2月5日 将彭德怀本日致毛泽东并高岗电转发斯大林。彭德怀的电报说：金日成同志来此〔1〕商谈。他对目前力争停止敌人前进，稳步打开战局，并从各方面加紧准备，仍作长期艰苦打算的方针是完全同意的。

2月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抓紧春耕和召开城市工作会议的指示，指出：“春耕即到，土改工作应在短时间内告一段落，领导农民全力从事春耕，争取今年的丰收年成，这是极端重要的。在春耕期内，各中央局，分局，市委，省委，区党委，除指导春耕，总结土改经验，训练土改干部，清理镇反积案，总结镇反经验等项工作之外，请划出一段时间，召开一次城市工作会议，总结一九五〇年一年城市工作经验，将城市工作的几个主要问题，例如：（一）依靠工人的思想问题；（二）工厂管理问题；（三）工会工作问题；（四）城市建政问题；（五）城市建党问题；（六）城市肃反问题；（七）城市统一战线问题等，加以研究和总结，指导所属增强对于城市工作的领导，并为五月开会的四中全会准备意见。”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分阶段进行土改的指示，指出：“我们同意杜润生〔2〕所提的方法，即首先在各县普遍发动群众，进行减租退押反霸及镇压反革命的斗争，整顿基层组织，将此作为一个阶段，接着转入分田阶段。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而且也

〔1〕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中朝联合作战司令部所在地—朝鲜成川郡君子里。

〔2〕杜润生，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是最迅速的。土地改革的正确秩序，本来应当如此。”“我们所说广东土改工作应当加快进行，并不是要求广东同志违反这样的秩序，群众还没有起来，基层组织还不可靠，就要生硬地不成熟地进行分配土地的工作，而是要加快发动群众，整顿基层组织，接着进行分田。”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饶漱石的复电：“你一月三十日关于工会工作的报告很好，已转发各地仿行。华东方面你可将这个报告发给各省委、市委及区党委，叫他们照做，改善工会工作。”饶漱石的报告说：要顺利开展生产竞赛，必须解决和生产密切相关而为广大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这样才能发扬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使生产运动持久巩固下去。工会工作的好坏主要要以生产的好坏作标准。工会要在发展生产运动的基础上展开工人福利事业、文化教育工作及建立工会工作制度等，工会工作才有丰富的生动的内容。

同日 阅周恩来关于志愿军在朝鲜战场轮番作战的兵力部署问题的来信，复信周恩来并告聂荣臻。复信说：在你计划轮番作战兵力时，请将杨得志三个军、西南三个军、杨成武两个军、四十七军及董其武兵团两个军编成为第二番作战兵力。而以现任第一番作战兵力中的第十三兵团六个军撤至后方补充休整三个月至四个月，改为第三番作战兵力。九兵团全部则回华东任守备。二月九日，审阅中央军委二月八日《关于轮番作战问题的指示》稿，批示“照发”。指示指出：从目前朝鲜战场上正在进行的战役中，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目前敌人的作战意图是：在站住阵地之后，经过休补，寻找机会，向前反攻，一方面可扩大其侵占地区，另一方面不容我在前线作较长期的休整。同时对朝鲜沿海的袭扰，运输线的轰炸，也正为配合这一意图。为粉碎敌人之意图，坚持长期作战，以达大量消灭敌人完

全解决朝鲜问题之目的，决定在朝鲜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

同日 复电云南昭通地区各民族人民：“我完全赞成你们同其他民族团结一致，为打击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建设我们各兄弟民族友好合作大家庭而奋斗的决心。”

同日 致信柳亚子：“遵嘱写了六个字，未知可用否？”题写的六个字为“上天下地之庐”〔1〕。

同日 复信刘策成〔2〕：“大示及所为《齐物论集解补正》收到，甚谢。工作一事，已函告统一战线部李维汉部长，请与该部接洽为荷”。

2月8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二月五日关于镇反工作的报告，起草给薄一波、刘澜涛、高岗、张秀山并告饶漱石及山东分局的批语，指出：“漱石及山东分局所采方针、办法，是完全正确的。山东分局在此电中所述恶霸、匪首、会门、特务活动猖獗情形，在华北、东北有同样情形的地区，务须给以同样的处理，应杀者均杀之，应判徒刑者均判徒刑，应管制者均给以管制，务使反动势力彻底肃清，民气伸张，政权巩固。”

2月10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北局二月九日关于重新部署镇反工作及对留用人员试行三查〔3〕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的批语，指出：“华北局的报告中又提出了用整风方式审查留用人员及新知识分子的问题，这在华北是应该开始做了，在取得经验后再向你们通报。在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各区则

〔1〕这是毛泽东为柳亚子乔迁新居题写的匾额。

〔2〕刘策成，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历史教师，庄子研究专家。后任中央文史馆馆员。

〔3〕指对留用人员和新参加工作的知识分子查历史、查立场、查工作。

尚未到时机，还须等待一个时期，但亦应当开始注意这个问题。”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东局二月七日关于镇反的补充指示，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委党委的批语：“中央认为这个指示所述的方针、策略和办法是完全正确的。”补充指示说：根据各地经验，只要首先把镇压的锋芒，对准为群众所痛恨的匪首、恶霸及确有证据的特务、会门头子和解放后继续活动的国民党重要党团分子，就不致抓错杀错。在镇压反革命工作中，必须强调打得准、打得稳、打得狠的原则。

同日 就引导民主人士参加土改等工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各中央局的批语：“从西南局、中南局两个报告〔1〕证明，对民主人士应采积极态度，引导他们参加土改等工作，有极大益处。”

2月11日 为转发陈丕显二月四日关于苏南镇反工作计划给饶漱石并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委党委的批语：“我认为陈丕显同志的进一步镇反计划是完全正确的，那些镇压反革命尚不甚坚决和明确的地方，应当以此为法。”

2月12日 为祝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一周年致电斯大林，电报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不但对新中国的建设有了极大的帮助，而且在反对侵略、维护远东及世界和平与安全上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同日 复信马叙伦：“一月二十三日信收到。学文化三字照写〔2〕，不知可用否？注音问题采取慎重考虑的态度是对的，我亦尚无成熟意见。”

〔1〕指中共中央西南局1951年2月6日关于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报告和
中南局1951年2月1日关于民主人士参观土改问题的报告。

〔2〕这是为《学文化》半月刊题写刊名。该刊于1951年3月1日创刊。

2月14日 下午，主持召开有各中共中央局负责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几项重要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高岗、彭真、林伯渠、张闻天、邓小平、饶漱石、陈毅、薄一波、李富春、邓子恢、刘伯承、叶剑英、聂荣臻、李立三、习仲勋、李维汉、杨尚昆、胡乔木、安子文。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说：一般工作都做得好。抗美援朝、土改、镇反均有大成绩。财经工作、军事工作、文化工作均有成绩，有的大，有的小。去年十月会议之后，朝鲜取得了胜利，各方面都较开朗，人心振奋，缺点是钱用得较多（四至五亿美金）希望在三年内（包括一九五〇年）把工作做好些，创立条件，以备由一九五三年之后即走入计划经济（五年计划），争取这三年内完成这些准备工作，是可能的。已过了十四个月，还有二十二个月，要在这二十二个月中为此奋斗，应使全党主要干部都了解。朝鲜战争何时结束，是另一个问题，应争取结束。最好把胡志明处也搞好，我不出兵，使我有平静的环境。抗美援朝还需要大大地开展，大做宣传工作。财经工作还有不少事情，要能控制各行各业，要调查研究，要搞核算制。土改、镇反均需停一下，以便整理队伍，检查工作，如打仗一样，需休整一下。用积极的态度做好统战工作，有所反对，有所团结。民主党派应发展，必须给以帮助，吸收中间及中间偏左的分子参加。应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民。对宗教界也如此。肃反工作去年是准备“宽大无边”，今年则是“宽大有边”，当然不是“镇压无边”。肃反有外层、中层、内层（1），也应有两年计划。目前着重搞外层。

（1）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分为外、中、内三层。清理“外层”，指清查隐藏在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清理“中层”，指清查隐藏在军政机关内部的反革命分子；清理“内层”，指清查隐藏在共产党内的反革命分子。

工会工作今年做了四件事：建立组织；反封建、废除把头制度；调整劳资关系；救济失业工人。

2月15日 下午，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听取各中央局负责人汇报后说：各地工作很多，各项工作都有成绩，提高了信心，但有严重问题，如镇反，有外、中、内层问题，应引起注意。镇反成绩很大，各地如此。广东、广西、福建、云南原想缓些，现在要提前，基层组织不在我手里是大问题，要搞快些，是可以快的。

2月16日 下午，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2月17日 致信黄炎培：“刚才送上广东纠正宽大无边情报一份，现又送上广西的一份，请参阅。这两处是最典型的例子，其他地方不如此两处之甚，但亦大体相去不远，引起群众不满，极为普遍。不杀匪首和惯匪，则匪剿不净，且越剿越多。不杀恶霸，则农会不能组成，农民不敢分田。不杀重要的特务，则破坏暗杀层出不穷。总之，对匪首、恶霸、特务（重要的）必须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群众才能翻身，人民政权才能巩固。当然，对可杀可不杀的那一部分人，应当判处徒刑，或交群众监视，用劳动去改造之，不要杀。如同宽大应有边，镇压也应有边，无边是不对的，已经解决了问题、群众已经满意的地区，即不应再杀人了。”

2月18日 下午，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要点》的主要内容是：（一）“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要使省市级以上干部都明白。（二）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运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推行，务使全国每处每人都受到这种教育。（三）土改。农忙时一律停一下，总结经验。凡条件不成熟者，无论何时何地不要勉强去做。土改完成，立即转入生产、

教育两大工作。争取今年丰收。（四）镇压反革命。判处死刑一般须经过群众，并使民主人士与闻。严密控制，不要乱，不要错。谨慎地清理旧人员及新知识分子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谨慎地清理侵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十分加强保密工作。（五）城市工作。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委今年必须召开两次城市工作会议，向中央作两次专题报告。加强党委对城市工作的领导，实行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明确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工厂内，以实现生产计划为中心。力争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工人生活。在城市建设计划中，应贯彻为生产、为工人服务的观点。（六）整党及建党。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这是主要方面，必须加以肯定。但是存在着问题，必须加以整理，并对新区建党采取慎重的态度。整党应以三年时间实现之。普遍进行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使所有党员明白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城市及新区建党必须采取慎重的方针。城市着重在产业工人中建立党的组织。对于愿意接受党的教育的积极分子，进行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经过这种教育然后将其中确实合于党员条件者吸收入党。（七）统一战线工作。要求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委一九五一年召集两次会议，讨论统一战线工作，并向中央作两次关于这方面的专题报告。必须向干部讲清楚为什么要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理由。知识分子、工商业家、宗教家、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必须在反帝反封建的基础上将他们团结起来，并加以教育。认真在各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推行区域自治和训练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是两项中心工作。（八）整风。一年一次，冬季进行，时间要短，任务是检查工作，总结工作经验，发扬成绩，纠正缺点错误，借以教育干部。二月二十五日，这个《决议要点》发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和大市委。

同日 为转发中共北京市委二月十三日关于解决房荒计划的

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

“北京市委所提组织公私合营的房产公司，修建房屋解决房荒的计划，各大城市凡严重缺乏房屋者均可仿行。现在大城市房屋缺乏，已引起人民很大不满，必须有计划地建筑新房，修理旧房，满足人民的需要。”

2月21日 在玉泉山听取彭德怀汇报朝鲜战争情况。在彭德怀提出前线兵员不足和后勤保障问题时，毛泽东说：“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在彭德怀介绍毛岸英牺牲情况并作检讨后，毛泽东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岸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现在美国在朝鲜战场上使用各种飞机约一千多架，你们千万不能疏忽大意，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司令部的安全。

同日 为转发中共察哈尔省委关于取缔一贯道的经验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消灭一贯道，第一要有充分准备，同时动作，方能一网打尽；第二要布置展览会，向群众作宣传工作。这两点是和消灭国民党特务组织时所应采的办法大体相同。除山西消灭一贯道的经验〔1〕已通报你们外，现又有察哈尔一个成功的经验，值得参考。”

同日 复信符定一：“退押事及房契一件已交统战部李维汉部长，与先生商酌处理，请与统战部接洽”。

2月2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印发和组织学习三个镇反文件的通知：“中央人民政府已于二月二十一日颁布了惩治反革命条例，在二月二十二日的报纸上已发表了这个条例及彭真同志

〔1〕指中共山西省委1951年1月9日关于取缔一贯道的情况给华北局并报中央的报告中所介绍的经验。

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人民日报》并写了《为什么必须坚决镇压反革命》的长篇社论，以上三个文件，请你们迅即印成一本，广泛发行，并组织干部及民主人士普遍地进行学习，务使镇压反革命问题在全党及全国人民中获得正确的了解，批评各种错误的思想，以达坚决彻底地镇压反革命的目的。”

2月23日 就《新民报》北京社社会服务部来信反映纺织工业部漠视北京市民田建发明的浆纱剂得不到推广一事，批示李富春：“此事请你处理一下，查明纺织工业部为什么采取那样的态度，并请该部负责人给我写一报告。”

2月25日 为转发中共北京市委的镇反计划，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各大城市除东北外，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一般地说来，还未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地实行。从现在起应当开始这样做，不能再迟了。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汉口、重庆及各省省城，这是反革命组织的主要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下面是北京的镇反计划，请你们研究仿办。其中说到拟先召集区以上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和各大工厂大学校，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次会，报告反革命情况及各种罪行和犯罪证据，提高大家对反革命的仇恨，然后再分批执行，这是完全必要的，各地都应这样做。”

同日 为转发西南军区二月二十三日转报的川西军区清匪情况的报告，起草给各大军区及各中共中央局的批语，指出：“西南的经验是县、区、乡均建立有党外民主人士参加的清匪委员会，保〔1〕有清匪小组，区有捕捉队，此外尚有情报站与检查站

〔1〕保，是旧时的户籍编制单位。这时全国农村已普遍废除旧保甲制度。

的组织。再则清匪必须与反霸、减租、退押或土改相结合进去，必须杀掉匪首、惯匪与恶霸，并必须由党委统一领导，全力以赴，才能发动群众，根绝匪祸。”

同日 就王震二月二十二日反映从新疆入藏的先遣部队遇到的严重困难问题，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王震并告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区电：入藏的“先遣部队既如此困难，请考虑于开山后将该部队撤回新疆，尔后新疆即解除入藏任务，你是否同意这样做，盼告”。

2月2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各中央局的批语，请他们将北京市委二月二十一日关于北京市第三届各界代表会议在市政建设方面拟解决的几个主要问题的报告，转发各大中城市市委作参考。报告提出拟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一）城区、郊区和村两级人民政府，一律经过区人民代表会议或村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二）进一步改组全市工业，使之尽可能适合农民需要，同时照顾城市人民的需要。进一步组织公私力量开展城乡贸易。（三）组织公私力量，增建新房一万五千至两万间，以减少本市房屋恐慌。（四）指导、帮助并强制所有三十人以上的工厂、作坊，特别是大工厂，单独或联合设立卫生所或小型医院，以解决工人治病问题。（五）增加业余学校的技术学习，并扩大业余学校。（六）关于下水道、道路等项市政建设，因限于经费，本年只能进行一些极必要的建设，并对已有的加以修整。

同日 阅冯文彬〔1〕二月十八日关于开展体育运动计划与建立政府体育机构的请示报告，批示：“刘、周、陈阅。其中有关政府机构问题，请周酌定。此件似可照办。”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央人民政

〔1〕冯文彬，当时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

府体育运动委员会。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工业计划问题。李富春介绍制订工业计划的情况。毛泽东说：执行计划要在两年之后，那时形势如何当能明白，但不管如何，总能计划。将来地方部队和正规军均可减少，在土改完成和土匪肃清之后是完全可能的。农业发展是会刺激工业发展的，工业利润也是会增加的。财力是要创造的，应有所增加，即创造工业利润，应看到广大市场的开辟。我们有一个广大的市场，但工业品缺乏，这是一个矛盾。解决了这个矛盾，就有了工业基础。中央、地方对轻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应有所分工，以发挥其积极性，中央各部门应了解此方针。不要因为战争还在继续、时局未定，就不搞准备工作。对一切工作均需有所指导，有指导即能推进工作。

同日 就继续剿匪问题，致电叶飞、成钧、刘培善、陈铁君（1）并告陈毅、饶漱石，指出：“剿匪成绩甚大，极慰。望继续不懈，坚持到底，于三月底以前肃清福建一切股匪。如那时尚有残匪未清，仍须以地方武装及民兵继续坚持清捕，直至完全消灭匪众为止。在清匪斗争中，对于一切为民众痛恨的匪首、惯匪及恶霸，必须在人民同意下坚决迅速地处以死刑，是为至要。”

2月27日 为转发川东区党委二月十四日关于镇反问题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华东局、中南局、西北局、华北局并转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我们认为这个报告完全正确。其中所说给胆怯同志撑腰，派干员出去检查，强调策略，严格批准手续

（1）成钧、刘培善、陈铁君，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0兵团兼福建省军区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副参谋长。

几点，都是很必要的。”

2月28日 就向各界人士解释镇压反革命的必要性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并转分局、省委、大城市市委、区党委及各省军区的指示。指示说：“请注意利用中央政府发布惩治反革命条例的机会，结合当地反革命活动的具体情况，向知识分子、工商界、宗教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广泛地解释镇压反革命的完全必要，使他们赞同我们的方针。中央司法部长史良所写的《坚决正确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一文〔1〕，写得很好，她是司法部长，又是民主人士，各地应注意利用此文说服那些存有错误思想的社会人士及胆怯的人们。将史良此文和中央的条例，彭真的报告〔2〕及《人民日报》二月二十二日社论〔3〕印成一本，广为传播，并组织党内外学习。”

同日 为转发西南军区党委二月十五日关于镇反工作的报告，起草给各大军区并告西南军区的负责人及党委的批语，指出：“所谓胁从不问，是指被迫参加而未作坏事，或未作较大坏事者。至于助恶有据，即是从犯，应当判罪，如主犯判死刑，从犯至少判徒刑，有些罪大的从犯应判死刑，不在胁从不问之列。军队中混入反革命分子问题，必须引起充分注意，并着手审查清理，以其结果上报。”

同日 为转发中共北京市委二月十三日关于摧毁一贯道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大中城市市委、区党委的批语，指出：“关于摧毁一贯道，北京的经验是很成功的。”

〔1〕此文刊登在1951年2月24日《人民日报》。

〔2〕指彭真1951年2月20日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所作《关于镇压反革命和惩治反革命条例问题的报告》，刊登在1951年2月22日《人民日报》。

〔3〕社论的题目是《为什么必须坚决镇压反革命》。

一是长期侦察布置，不是仓促举行；二是临事向群众宣传，孤立道首；三是布置展览会；四是退道款；五是与反迷信分开。以上各项可作各地参考。一贯道在全国有几百万被欺骗的落后群众，各省凡有大批一贯道存在的地方，党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必须采取慎重和适当的态度。”

3月1日 就朝鲜战局和中国人民志愿军采取轮番作战方针问题，致电斯大林〔1〕。电报指出：一、“从目前朝鲜战场最近进行的战役〔2〕中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我应作两年的准备。目前敌人的作战意图是企图与我进行消耗战。”二、“为粉碎敌人意图、坚持长期作战，达到逐步歼灭敌人之目的，我中国志愿军拟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中国志愿军已决定编组三番轮流的部队”。三、“在敌人未被大量消灭前及我尚无空军掩护条件下，我如过早逼敌南退，反不利我分割歼敌。”“我们计划在我第二番部队到达后，在四月十五日至六月底两个半月内，在三八线南北地区消灭美军及李承晚军建制部队数万人，然后向南汉江以南推进，最为有利。”“总之，在美国坚持继续作战，美军继续获得大量补充并准备和我军作长期消耗战的形势下，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电报还提出：彭德怀希望苏联尽快派空军掩护中朝军队的后方线；我们仍希望在今年下半年从苏联增加六千辆运输汽车的贸易订货。三日，斯大林复电同意轮番作战方针，并同意增派两个苏联驱逐机师入朝在别洛夫将军指挥下作战，增建机场，供给六千辆汽车。十八

〔1〕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改后发出。

〔2〕指第四次战役。

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感谢您关于派遣两个驱逐机师在别洛夫将军指挥下进入朝鲜境内作战，并增派一个大驱逐机师至安东，以掩护中朝军队后方的决定。”

3月2日 致信胡乔木：“三月一日《人民日报》载萧乾〔1〕《在土地改革中学习》一文，写得很好，请为广发各地登载。并为出单行本，或和李俊龙所写文章〔2〕一起出一本。请叫新华社组织这类文章，各土改区每省有一篇或几篇。”

3月初 乘专列离开北京到达石家庄，住一所保育院。在这里，对拟将收入《毛泽东选集》的文章进行编辑和修改，并继续指导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运动。此前，毛泽东对汪东兴说：搞《毛选》，在北京事情太多，要找个地方，集中精力搞出来。《毛选》现在中国需要，苏联也催着要，要集中突击一下。要找个地方，离北京不要太远。不准占老百姓的房子，也不要住招待所。汪东兴选中石家庄胜利公园〔3〕东侧的保育院。

3月5日 阅刘少奇二月二十八日在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致信刘少奇：“此篇演说很好，可即发表。”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刘少奇的这篇讲话。

3月8日 致信陈伯达、田家英〔4〕：“《矛盾论》作了一次修改，请即重排清样两份，一份交伯达看，一份送我再看。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意不畅，还须修改。其他有些部分也还

〔1〕萧乾，当时任《人民中国》杂志（英文版）副总编辑。

〔2〕指政务院参事李俊龙写的《战斗中的湖南农民》一文，发表在1951年2月10日《人民日报》。

〔3〕胜利公园，今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烈士陵园。

〔4〕田家英，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负责人。

须作小的修改。此件在重看之后，觉得以不加入此次选集为宜(1)，因为太像哲学教科书，放入选集将妨碍《实践论》这篇论文的效力，不知你们感觉如何？此点待将来再决定。你们暂时不要来，待《矛盾论》清样再看过及他文看了一部分之后再来，时间大约在月半。”

3月9日 为转发罗瑞卿三月四日关于浙江省镇反情况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目前几个月，各地领导同志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向下面指导的重心，仍然是对那些优柔寡断的市委、地委、县委给以检查和督促，使他们坚决行动起来，严厉镇压反革命。当然，在那些已经实现了彻底镇压方针的地方，则要停一下，不要多捉多杀了。无论什么地方，都要有计划，讲策略，作宣传，不杀错，这些也是当然的。”

同日 批示杨尚昆：“镇反工作的重要材料，请随时送给我。”二十日，又批示杨尚昆：“凡各地镇反电报及综合报告，均请清出送我。此外，其他电报，你认为值得看的，也请清出送我。”

3月11日 为转发西南军区党委三月六日关于镇反问题的指示，起草给中央军委直属军事领导机关及军事学院，各大军区党委，志愿军党委等的批语，指出：请你们也照西南军区党委会一样，均一律重新作一次检讨。“我们认为在一切军事机关、学校、部队中引起注意镇压反革命分子问题，并作出正确的处理，是目前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凡对此任务忽视者，应当受到批评。”

同日 复信戴毓本：“临行一信，到兴城一信，均已收到。”

(1) 《矛盾论》编入了《毛泽东选集》，最初编入1952年3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后移入1952年7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重排本。

达到你所愿望的工作岗位，为你庆贺。已与习梅〔1〕兄见面，谈了许多乡情。他不久可进学校。”

3月14日 致信胡乔木：“三月十三日《光明日报》载有一篇天津通讯，题为《天津天主教徒奋斗前进，积极展开自立革新运动》，写得很好，请予广播，并在《人民日报》转载。**同日**该报还登了天津津沽大学教授张羽时的一篇文章，题为《和天主教教友们谈怎样爱教》，说明天主教革新的理论根据，很有说服力，请考虑在《人民日报》转载。”本日和十五日，《人民日报》先后转载这两篇文章。《人民日报》转载前一篇文章时，将题目改为《天津市天主教徒积极展开自立革新运动》。

3月15日 致信田家英：“《矛盾论》的原稿请即送来。凡校对，都须将原稿连同清样一起送来。以前的一切原稿均请送来。”

3月18日 就山东省军区政治部主任黄祖炎三月十三日被反革命分子王聚民在一次会议上刺杀事件，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指示指出：“这是我党高级干部被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所刺杀，而为过去所少见的，应当引起全党警惕。王聚民为山东惠民军分区政治部宣教科副科长，一九四一年混入我党，家庭为恶霸，在土改中被斗，王行凶后当场自杀。据山东分局及军区来电说，此事显系反革命分子在我党及人民政府坚决镇压反革命之际的报复行动。特此通报，务请你们注意：（一）严防反革命的报复。应当肯定反革命的报复是必然会有的，必须预先采取防制的办法，千万不可疏忽。除加强警卫外，最重要的是采取积极手段，破获反革命的组织，消灭反革命的巢穴，坚决迅速地杀掉一切应当杀掉的反革命分子，使反革命措手不及，无力施行报复手段。

（二）必须认识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已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混

〔1〕习梅，即彭习梅，戴毓本的丈夫。

进来，决不可认为太平无事。现在就应开始注意这个问题，考查可疑的分子，聚集材料。”二十日，为转发山东分局三月十四日就黄祖炎被刺杀对所属市委、地委的指示，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大军区并转发至省军级，并告志愿军党委及中央军委各部门首长的批语，指出：“中央认为这个指示是正确的，特转给你们，请你们连同中央三月十八日为此事而发的指示一道加以讨论，并做出自己的决定，指导所属，坚决执行。中央严重地唤起你们注意，务须重视此事，切勿等闲视之。”

同日 为转发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三月八日关于财经、交通部门清理反动分子工作的总结报告，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城市市委的批语，指出：“在留任人员中清理反动分子，湖北省一级已有一个经验，现在西南方面又有了一个更完全的经验。可见这不但是应当做的，而且是现在就可以做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必须认真去解决。”

同日 就民主人士参观土改一事，致电饶漱石、邓子恢、邓小平、习仲勋：“民主人士及大学教授愿意去看土改的，应放手让他们去看，不要事先布置，让他们随意去看，不要只让他们看好的，也要让他们看些坏的，这样来教育他们。吴景超、朱光潜（1）等去西安附近看土改，影响很好。要将这样的事例教育我们的干部，打破关门主义的思想。”

3月19日 复信周世钊：“三月十四日给我的信收到了，谢谢您。一月二十九日的信及学生们的签名信也收到了。你的三项计划很好。进研究院很有意义，可以安心读几个月书。读完去东北、华东考察一次也极好。第三项计划可能有些困难，如在两三

（1）吴景超，社会学家。当时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朱光潜，美学家、文艺理论家。当时任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教授。

年后实施也有可能办到。”

3月20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中南局三月十六日关于城市镇反的指示，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和大中城市市委的批语，指出：“城市镇反工作极为重要。最近华北、东北两区各大中城市均已动作起来了，反映极好。”“应在一切大城市中等城市及小城市（包括县城及大市镇）布置镇反展览会，此种展览会作用极大。”

同日 为转发邓小平三月十三日关于清查处理西南军政机关成分复杂问题和云南党组织不纯问题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大军区并转省市区党委、省军区，并告志愿军党委、中央军委各部门首长等的批语，指出：“这个报告是完全正确的，请你们加以研究。这个报告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军政机关成分极为复杂的问题，中央直属各军政机关、各大区军政机关、各省市军政机关，均是如此，不过略有程度上的差别而已，必须立即开始研究清查和处理的办法，并有计划地布置清查处理工作。”

同日 为转发中共北京市委三月十八日关于人民群众拥护镇反情况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城市市委的批语，指出：“凡工作好坏，应以群众反映如何为断。直至现在党内还有不少干部不了解坚决地正确地镇压反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你们应将镇反经验及群众欢迎镇反的反映随时通报各地，使此项经验及反映迅速传播，以利仿行，并使胆怯的同志振奋起来。下面是北京人民欢迎镇反的反映，可以看看。”报告说：（一）各阶层人民普遍拥护镇压反革命。工人、农民、学生、教职员、工商业者普遍反映做得对，“为人民除暴，大快人心”，“枪毙的都是罪大恶极的”，“惩治反革命条例如果早点公布，就可以使人民少受些损失”。郊区农民普遍反映“人民政府睡醒了”，“政府给人民除了大害”。（二）反革命的气焰压

下去不少。不少过去没有坦白登记的特务与反革命党团分子到公安部门办理了登记手续；有些缴出了藏匿的枪支、子弹、电台或军用电话机等；有些补充了材料，供出了其他特务的线索。不少一贯道道首自动登记。

同日 复信胡乔木：“（一）宣传会议〔1〕可自五月五日至十五日开十天，如十五日以后四中全会还未开会再延长五天，否则不要延长。（二）理论教育决定〔2〕可先以草案发各地，通知照发。（三）选集〔3〕提前发表的少数文章，待看后送你，四月或可发表一二篇。《学习》上不要发表我的文章。”

3月22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关于军队干部参加地方领导工作的意见的电报，起草中央给华南分局、中南局并告华东局、西南局、西北局的批语。批语指出：（一）华南分局三月十五日电报中所述的决定，我们认为是正确的，请中南军区对在粤各军发出指示，在指示中应指出军队干部必须和本地干部发生正确的关系，好好地帮助他们而不要看不起他们，这点极为重要。分局应召集有军队和地方两方干部在一起的会议，明确地指示任务和双方发生正确关系的重要性。（二）广东这种办法，请其他中央局考虑，是否在某些干部弱工作难于开展的地方，有采

〔1〕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于1951年5月7日至23日召开。

〔2〕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根据毛泽东1951年3月20日批示的意见，中共中央当天将决定草案下发各地。决定草案指出：现在国内战争已经基本结束，党正面临着建设新中国的复杂任务，全党有系统地学习理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有更好的条件，也更加迫切需要。决定草案要求全党按照党员理解能力的发展程度，将学习分为三级，同时对学习时间、考试制度、理论教员等作了明确规定。

〔3〕指《毛泽东选集》第1卷。

用广东办法的必要。”

3月23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东局三月九日关于镇反中如何对待民主党派成员问题的指示，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城市市委的批语，指出：“镇反问题中各民主党派有组织关系的登记、审查、逮捕、审讯等事，华东局于三月九日有一个文件作了明确的规定，中央认为是正确的，各省市均可照办。”华东局的指示说：上海在对反动党团、特务分子的登记中，公安局曾动员各友党成员登记，甚至并无充分证据，即行逮捕友党分子。此事现已制止。华东其他各地亦有类似事件发生，应从速纠正。各友党成员的历史问题，应由各友党作为审干问题解决，自行处理。各友党中现行犯可以逮捕，但必须证据确凿。对其他有证据的特务分子及反革命分子，应由公安部门与统战部商定后，方可逮捕。对现行犯及其他反革命分子的审讯，应尽量争取其所属党派人士参加。

同日 为转发罗瑞卿三月二十日关于几个大中城市的镇反工作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城市市委及所属公安部门的批语，指出：中央认为罗瑞卿的报告是正确的。“当此镇反工作紧张时期，上级派出负责同志或工作组去各地检查和帮助工作有很大的作用，请你们尽可能派人出去为要。”

3月24日 复电饶漱石转中共上海市委，指出：“镇反是一场伟大的斗争，这件事做好了，政权才能巩固。镇反包括：（一）社会上的反革命；（二）隐藏在军政系统旧人员和新知识分子中的反革命；（三）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镇压这三方面的反革命，当然要有步骤，不能同时并举，但是对于党、政、军的某些最重要部门特别是公安部门则须及时清理，将可疑分子预作处置，使这些机关掌握在可靠人员手里，则是完全必要的。”

3月27日 复信李达，信中说：“两次来信及附来《〈实践论〉解说》第二部分，均收到了，谢谢您！《解说》的第一部分也在刊物〔1〕上看到了。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2〕，此处暂仍照原。”毛泽东对《解说》第二部分主要作了如下几处修改：（一）在《解说》谈到中国人民对列强作排外主义的自发斗争的地方，加写：“中国人民那时还不知道应当把外国的政府和人民、资本家和工人、地主和农民加以区别，我们应当反对侵略中国的外国地主资本家和政府官员，他们是帝国主义者，而在宣传上争取外国的人民，并不是一切外国人都是坏人，都要排斥。”（二）在《解说》谈到孙中山当年倡导的民族主义完全以清政府为对象，从未提起过反帝国主义的地方，加写：“虽然辛亥革命实际上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作用，因为推翻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满清政府，当然就带着反帝的作用，因而引起了帝国主义对于辛亥革命的不满，不帮助孙中山而帮助袁世凯；但是当时的革命党人的主观上并没有认识这一点。”（三）把《解说》中的一句话“唯物论的‘唯理论’是今日教条主义来源，唯物论的‘经验论’是今日经验主义的来源”，修改为：“唯物论的‘唯理论’与今日教条主义相像，唯物论的‘经验论’则与今日经验主义相像。”

〔1〕指《新建设》杂志。《〈实践论〉解说》第一部分，刊登在1951年出版的该刊第3卷第6期。

〔2〕《毛泽东选集》第1卷出版时，《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的那句话，尚未按毛泽东在这里表示的意见修改。

3月29日 致信胡乔木：“三月二十八日《光明日报》载吴景超的文章《参加土改工作的心得》，写得很好，请令《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令新华社广播各地。又：三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左下角一条新闻《北京市人民广播电台播送讨论镇压反革命的录音》，亦请用文字广播。惟其中有几句是讲三月二十八日要求听众做什么的，广播稿应改写一下，写成一条北京的新闻。”

3月30日 为转发黄克诚三月二十三日关于湖南镇反问题的意见的电报，起草给黄克诚并告各中共中央局负责人的批语。批语指出：“我认为黄克诚同志三月二十三日的意见是正确的。镇压反革命无论何时都应当是准确的精细的有计划的有步骤的，并且完全应由上面控制。捕人要仿照天津专区发拘捕证，照证捕人的办法，不能乱捕。凡各地有如黄克诚所说‘逮捕范围扩大、处理方式简单’的情况者，应立即加以收缩，进行检讨，并作出结论。畏缩不前尚未开展者，则应当推动其开展。请你们严密注意这两种情况，好好掌握，不要出乱子。如你们认为有必要，请将此电转发各省市。”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三月五日关于镇反工作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发至地师一级党委的批语。批语指出：“山东有些地方存在着劲头不足的偏向，有些地方存在着草率从事的偏向，这是全国各省市大体上都存在的两种偏向，都应注意纠正。特别是草率从事的偏向，危险最大。因为劲头不足，经过教育说服，劲头总会足起来的，反革命早几天杀，迟几天杀，关系并不甚大。惟独草率从事，错捕错杀了人，则影响很坏。请你们对镇反工作，实行严格控制，务必谨慎从事，务必纠正一切草率从事的偏向。我们一定要镇压一切反革命，但是一定不可捕错杀错。”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中南局三月二十二日关于加强镇反宣

传工作的指示，起草给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并转发至地委和地方军区一级的批语，指出：“对镇反工作宣传不足是普遍的现象。对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报纸揭露太少。对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各界民主人士参加镇反工作，真正与闻其事，各地做得太少。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杀反革命。这种情况必须立即改变。”

同日 为转发川西区党委三月十五日关于组织党外民主人士参加土改的经验报告，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并转发至地委一级的批语，指出：“除抗美援朝工作必须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一起去做不必再说外，土改、镇反两项工作，也必须使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参加，越多越好。”“只要他们愿意去，就要欢迎他们去。不要怕他们去，不要向他们戒备，因为他们不是反动派。好的坏的，都让他们去看，让他们纷纷议论，自由发表意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至于城市中的镇反工作，更要让他们参加”。

同日 就组织民主人士参观土改、镇反问题，致信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李维汉：“今年还有九个月，应从北京、天津两市组织四五批至七八批参观团或参观组，到南方各省（主要是华东、中南，如有飞机也应去西南）去参观土改和镇反工作。各民主党派的中央一级人员凡愿去的都让他们去。是否可行，请考虑酌定。”五月和九月，全国政协参加三大运动筹备委员会组织七个土地改革工作团和六个土地改革参观团，共一千七百余人，分别到中南、西南、华东、西北等地参加或参观土改工作。十月，又组织三十一个土地改革工作团，共三千六百余人，分赴中南、西南、华东、西北和绥远等地参加土改工作。

同日 审阅刘少奇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稿，批示：“看过，同意。”又批注：“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思想，请你在

会议中讲一下，使他们有所准备。”

同日 就召集各界代表人物开会通报镇反情况一事，致电中共中央东北局：“你们开座谈会讨论镇反工作的经验很好。在各城市及新区进行有计划的大批逮捕反革命之前及逮捕以后，要召集更多的各界代表人物开会。北京曾召集一次五千五百人的会，天津曾召集一次一万多人的会，均是各界代表人物，不是普通群众。在下面则应召集代表人物的和普通群众的两种会，使家喻户晓。”

3月31日 致信彭友胜〔1〕：“三月十四日来信收到，甚为高兴。你的信写得太客气了。不要这样客气。你被划为贫农成分，如果是由群众大家同意了，那是很好的。工作的问题，如果你在乡下还勉强过得去，以待在乡下为好，或者暂时在乡下待住一时期也好，因为出外面怕难于找得适宜的工作位置。如果确实十分困难，则可持此信到长沙找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程星龄先生，向他请示有无可以助你之处。不一定能有结果，因程先生或其他同志都和你不相熟，不知道你的历史和近来的情况。连我也是如此，不便向他们提出确定的意见。如果你自己愿意走动一下，可以去试一试。去时可以将你在辛亥革命时在湖南军队中工作过并和我同事（你当副目，我当列兵）一点向他作报告，再则将你的历史向他讲清楚。”同时，致信程星龄：“此人叫彭友胜，据我过去的印象是个老实人，四十年的历史不清楚，辛亥革命那一年在湖南军队充副目（即副班长），我在他那一班充列兵，后来在广州见过一面。现来信叫苦，我已复信叫他待在乡下，不要出外；如果十分困难，又出于自愿，不怕无结果，则可持我的复信到长沙找你，向你请示：是否可以对他有帮助。”“他来见时，

〔1〕彭友胜，辛亥革命爆发后，曾和毛泽东在湖南起义的新军中共过事。

请你加以考察，如果历史清白，则酌予帮助，或照辛亥革命人员例年给若干米，或一次给一笔钱叫他回去；如有工作能力又有办法，则为介绍一个工作而不用上二项办法。请酌定。”

3月下旬 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4月1日 就福建剿匪等问题，复电叶飞等并告陈毅、饶漱石、邓子恢、谭政、张鼎丞、叶剑英，指出：“只要消灭了土匪，镇压了反革命分子，在大部分地区完成了土改，厦门、平潭的防御工事又做好了，福建的形势就改变了，台匪如敢进攻，你们就有完全的胜利把握了。广东现已集中了六个军，全省也在做这些工作。你们两省互相配合，力量是很雄厚的。”

同日 就《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致信田家英：“《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矛盾论》，请不要送去翻译，校对后再送我看。已注好印出的各篇，请送来看。”

4月2日 为转发饶漱石三月二十九日关于目前华东几项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起草给饶漱石并告各中共中央局负责人和彭德怀的批语。批语指出：“关于镇压反革命，目前重点仍在‘外层’，但对‘中层’‘内层’的首脑机关及要害部门必须及时加以清理，对某些已有材料或可疑的分子必须及时进行处理，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华东局并规定了几项清理和处理的步骤和办法，都很正确和必要，请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加以注意。志愿军虽然处在作战的环境，亦须加以注意，保证各级首脑机关及各要害部门的安全和纯洁。”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中南局三月二十二日关于传达讨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的报告，起草给邓子恢并告各中央局负责人的批语。批语指出：“同意这个报告所提出的各项方针和计划。

将土改过程明确地划分为三个阶段〔1〕是很必要的，各新区均应教育干部照三个阶段的各项步骤去做，不要省略和跳跃。土改后，农村的任务规定为生产、教育、民主三项，也是对的，即除生产、教育两项任务之外，还有一项建立民主生活的任务。在中南这样的地区，各省召集一次苏区代表会议是必要的，但请注意在报纸上公布消息时采用老红色区域的名称，不要用‘苏区’这个名称。在工厂企业内，凡未进行过控诉旧制度和克服官僚主义这两项工作的，均普遍进行一次，很有必要。在镇反问题上，报告内指出要强调加紧宣传、防止不准两点是很对的。防止不准的办法是，拘捕前由地委、市委一级精细地审查名单，然后按名单进行拘捕。这即是说，将过去规定的县有捕人权，收回到地委一级来。”

同日 为转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大张旗鼓经过群众进行镇反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发至地委一级的批语。批语指出：“镇压反革命必须严格限制在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反动会门头子等项范围之内，不能将小偷、吸毒犯、普通地主、普通国民党党团员、普通国民党军官也包括在内。判死刑者，必须是罪重者，重罪轻判是错误的，轻罪重判也是错误的。最主要的是捕人杀人名单的批准权必须控制在地委、市委一级手里。镇压反革命的运动现在可以说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各级党委的注意力，主要应放在精细审查名单和广泛进行宣传这两点上，抓住了这两点，就不会犯错误。北京市委因为抓住了这两点，所以获得了很大的成绩。”

〔1〕土改三个阶段是：第一阶段，普遍进行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打掉地主政治优势；第二阶段，划分阶级，没收、征收，消灭地主阶级；第三阶段，实行复查教育，发土地证。

同日 复信李介侯：“请持此信去统战部找徐冰同志，或其他同志，和他商量是否有办法为你妹妹找一个免费的或半工半读的学校，如产科、护士或其他学校。我想，只要有可能，是应当替她解决学习和工作问题的。”十七日，又就李介侯四月十日来信要求在工商企业中给他安排工作一事，批示：“请王副部长（1）考虑是否可以给予李介侯一项适当的工作。”后李介侯被安排到对外贸易部机械进出口总公司工作，任工程师。

4月3日 为转发广东军区党委关于派遣工作组检查和帮助镇反工作的指示，起草给陈毅、饶漱石，邓小平、贺龙，习仲勋、张宗逊的批语：“请你们检查命属各省各分区有无广东那样的情况（2），如有这种情况，请你们仿照广东办法，由各省军区派遣工作组分赴各分区各县加以检查和帮助当地的镇反工作，坚决而正确地执行镇反任务。地方镇反工作亦须由省级机关派遣工作组，分赴各专区和各县检查和帮助当地的镇反工作。此事甚为重要，请加注意为盼。”

同日 复信张云逸：“三月十四日的信收到了。病况甚为系念，宜注意充分休养，可作半年休养计划，以便安心调治，不为工作所牵挂，待病全好后再恢复工作。”

4月6日 复信尤金。信中说：“我向你重提你在北京临走以前我们谈过的那件事，就是请你于今年再来中国一次，一则到满洲和华北各地向我们的干部作讲演，二则帮助我们的同志研究东方各国兄弟党的工作，三则我的选集还有一些文章要请你看一看。今天我已向斯大林同志提出了这个请求，如果他同意，你又

（1）指轻工业部副部长王新元。

（2）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党委派赴珠江、北江一带地区的工作组发现某些县在镇压反革命中存在的严重右倾现象。

同意的话，就请你偕同你的夫人再来中国一次。当然这是一件很烦劳你的事情，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来的时间请你酌定。我的意见，七月到满洲讲演，八月到北京，在北京及华北各地留三四个月，未知可能否？”

4月7日 为转发福建省公安厅四月一日关于福建镇反情况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负责人的批语：“福建有些地方情况特殊，反动派多，处决的比例较大，这是可以理解的，别地不应援例也杀这样多，但有些情况相似者，亦可仿照办理。福建方面最值得重视的经验是发动最广大群众参加镇反工作和派遣工作组下去巡视镇反工作。关于工作组，我认为各省都应当注意，即由省级机关组织几个有训练有能力的工作组，分往各专区，直到县级去巡视，有偏差者帮助纠正，积案太多者帮助清理，不敢放手者帮助开展工作，发动群众不足者告知发动参加的办法。这样的工作组，对于坚决而正确地开展镇反工作，当有很大的帮助，请你们研究推行为盼。”

同日 致电斯大林：“中共中央热烈地希望得到你的允许在北京将《斯大林全集》翻译为中文。我们认为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劳动人民是一个重大政治事件。”《斯大林全集》中文版共十三卷，由人民出版社在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六年间先后出版。

同日就《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致信田家英：（一）送来的文件，缺少《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军委给解放军的命令》（1）一篇，请补印送校。（二）请将《兴国调查》中《斗争中的各阶级》这一章的原文清出送阅，在我这里的印件中缺少这一章。（三）已注文件，请速送阅。”

（1）这个命令编入《毛泽东选集》第4卷时，题目改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4月9日 致电彭德怀：“我尚在休养，对朝鲜战况不甚清楚，请将你对敌情的估计和我方企图撮要见告。关于十三兵团的任务，在新的战役中除以一部位于元山、咸兴防敌登陆外，主力（应补充新兵）似宜位于战场附近，担负歼灭敌可能降落的伞兵，协助各兵团作战，待战役完结该兵团始进入正式休整。”

同日 阅罗正纬〔1〕四月六日的来信，就其要求照顾生活困难一事，批示李维汉：“此人当过北洋政府时代的国会议员，在国民党时代似乎没有做过坏事，他有许多子女在人民政府工作。本人现六十九岁，来京住湘潭会馆，生活困难，要求照顾。请你派人找他谈一下，给以生活上的照顾。”

4月13日 为转发中共南京市委四月二日关于镇反工作情况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城市市委的批语。批语指出：“关于在镇反工作中有计划地统一逮捕和有计划地广泛宣传这两点，现在华北、华东、东北三大区均已实行，或者正在准备实行。请中南、西南、西北三大区亦研究这样做。如不能做到各大中城市同时动手统一逮捕，至少应做到一个城市统一逮捕（重庆、兰州已是这样做了）。至于事前事后使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宗教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少数民族的代表人物，真正与闻其事，并向全体人民展开宣传讨论，使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更是非常重要的。”

同日 关于第五次战役的部署，复电彭德怀：“四月十日二十四时电悉。（一）完全同意你的预定部署，望依情况坚决执行之。（二）为防敌从元山登陆，似须以四十二军主力位于元山城

〔1〕罗正纬，辛亥革命后湖南全省高级中学（后改名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创办人之一。

内及其附近，确保元山，请酌定。”彭德怀的电报说：拟从金化至加平线，利用这一带大山劈开一个缺口，将敌人东西割裂，然后用九兵团和十九兵团对西线敌人进行战役两翼迂回，三兵团正面攻击，以各个分割歼灭敌人。力求在三八线北歼灭敌人几个师，得手后再向敌纵深发展。

同日 就《毛泽东选集》部分文稿的校对和译成俄文事，致信田家英：“这些请你送给陈伯达同志看一下，即付改印，照此校对勿讹。除已批明再送我看者外，即可送交俄译组校译。”十六日，又致信田家英：“此九篇请送陈伯达同志阅后付排改正。其中，和英国记者谈话，和中央社等记者谈话，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等四篇〔1〕，我已照原件修改，请即照此改正，新送来这四件稿子我就不必看了。以上这些及昨付第二次看过的一大批，都可付翻译——惟其中的一篇，即《井冈山的斗争》，请送来再看一次。”十九日，再致信田家英：“这些请再印校正后，即可付翻译。”

4月17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西北局四月十四日关于加强镇反宣传工作的指示，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城市市委的批语：“西北局这个指示强有力地指出在镇反工作中展开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并规定了五条办法，一切地方都应当这样做。凡属现在仍然小手小脚，不敢大张旗鼓作宣传，不敢吸引广大党外人士共同参加镇反工作，以致引起许多人对我们不满的地方，尤其要即刻改变作风，并且愈快愈好。”

〔1〕这4篇文章中的前两篇，编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题目为《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第3篇《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编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4篇编入《毛泽东选集》第4卷，题目为《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同日 为转发天津市公安局四月六日关于天津召开两个会议讨论和开展镇反工作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城市市委的批语：“天津镇反工作做得很好，团结和教育了各界人民，一切地方均应照此办理，坚决地打破神秘主义和关门主义的作风。”报告说：天津市于三月二十七日召开各界协商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镇压反革命问题。又于二十九日召开一万五千人的各界人民代表扩大会议，揭发控诉反革命分子的罪行，组织五十万市民收听大会实况广播。

同日 为转发许世友、向明〔1〕四月十三日关于镇反和审查不良分子问题的报告，起草给各大军区并转各省军区并告中央军委直属各部门及各特种兵司令部的批语：“山东军区布置镇反工作很认真，规定方针和办法也很恰当，可为各军区参考。”报告中规定的方针和办法是：必须严厉地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对不良分子的审查，必须分清政治问题、阶级成分问题、社会成分问题、纪律问题和思想问题，作不同对待和处理，绝不能混同。我们的要求是绝不能让一个不能改造的不良分子留在或打入我们的部队，但也绝不随便抛弃一个还可以改造的不良分子。

同日 就彭德怀四月十四日关于朝鲜东海岸的对敌部署问题的来电，复电彭德怀并告高岗：“你对于三十八军、四十二军的部署及开辟中间运输道路的计划，均甚好。但尚有一事请注意，即敌人若从中间各地降落伞兵，例如敌冒险以一个伞兵团在熙川、球场、德川区域降落，以一个伞兵团从破邑、谷山、遂安、

〔1〕许世友，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省军区司令员。1952年12月又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一副书记。向明，当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二副书记、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省军区副政治委员。

伊川区域降落，到处乱窜，扰我后方，此种可能性很大，请速筹对策。五十军现在何处休整，是否可以用于这一地区的防卫。”

4月19日 为转发罗荣桓、罗瑞卿等关于黄祖炎被害事件的调查报告，起草发至地师一级的批语，指出：兹将调查报告“发给你们研究。像王聚民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很早就有许多罪恶表现，全党全军如有类似这样的人，务须注意及时处理”。调查报告说：凶手王聚民现年三十四岁，恶霸地主出身，一九四〇年混入我军，一九四一年混入我党。土改时因家中被斗公开发表谬论，谩骂群众，诬蔑土改，但未作处理。一九五〇年十一月调惠民军分区后，企图借组织力量向群众倒算，遭到群众联名告发，除揭发其父亲的历史恶迹外，还揭发他在一九三八年曾向敌密告我两个地下党员，要求给予他处分。军分区政治部领导既未严肃处理，也未向山东军区报告。王聚民发觉群众控告后，情绪突变，军分区亦未引起警惕，三日后仍令其到军区开会，致使阶级异己分子王聚民乘机直接行凶报复。

同日 复电陈毅：“你在四月十二日关于巡视福建工作的报告收到阅悉，甚好。”同时，将这一报告批转邓子恢、谭政、赵尔陆并叶剑英：“兹将陈毅同志关于福建军队整训、厦门防御部署及核减海防经费七百多亿等项情况的电报发给你们参考。广东现在集中了六个军，虎门修了防御工事，希望你们加以检查，做出像福建那样的成绩。”

4月20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北局四月十二日关于河北省农业厅三查经过及经验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并转发至大中城市市委、省军区、志愿军司令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等的批语，指出：“华北局这个关于审查旧人员和新知识分子的典型经验极好。有了这个经验，就使我们对于全国现有参加工作的百余万旧人员和新知识分子的审查有了充分的把握，请你们

充分地利用这个经验。”报告介绍的主要经验是：高级领导机关首先需要三查（查历史、查思想、查工作）。在非党干部中进行三查要和党内有区别。必须抓住重点，即抓住问题严重的分子，抓住历史问题与政治问题，不要钻到生活细节中，更不要扭在次要人的身上。妥善解决三查和工作的矛盾，时间不宜拖长，要紧凑和适可而止。

4月21日 为转发师哲四月十七日关于陪同费德林〔1〕到济南等地参观的情况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和华南分局的负责人等的批语，指出：师哲同志的报告中说到“各地招待外宾的缺点，请加注意，尔后不要过分和不适当”。报告说：一些地方同志组织不必要的夹道欢迎和宴会；还有个别领导干部随便送礼物，不适当地题字，乱送不适当的材料和文件，在某些场合讲些有失立场和无分寸的话，造成不好影响。

4月22日 就正确解释对旧人员实行“包下来”的政策问题，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城市市委，各大军区并转各省军区，中央军委各直属部门，各特种兵司令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的电报。电报说：“关于在政府系统中和军事系统中审查旧人员和新知识分子的工作，各地各部门现已开始着手进行。在答复‘包下来’的问题时，我们看见有说得不适当的。”“一九四九年四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约法八章的布告，内称：‘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者，人民政府当予分别录用。’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从来也没有说过可以把有‘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人们包下来。现在审查旧人员（还有新知识分子），就是要将那些混入军事系统和政府系统（包括国营工矿）中的有‘严重的反动行

〔1〕费德林，当时任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

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人们清理出来，分别加以惩办或淘汰。同时对于那些并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人们（这些人占大多数），则因为清出了那些有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人们，而使他们显得历史清白或虽有问题但不严重，利于团结和改造。这后一类人又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历史清白没有问题的；第二部分是有些问题，但不严重，只要坦白承认错误，可以继续工作的（其中有些人须调动工作岗位）。”“所谓有严重的反动行为，包括恶霸、匪首、惯匪、特务、欺压过许多人的行政官吏（这些人多属国民党及三青团的重要分子）、反动的军官以及反动会道门的头子等。”

4月26日 阅李六如〔1〕四月二十四日报送的关于中央军委订制二百万件军用雨衣被奸商诈骗、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简报，批示：“必须严肃处理，教育干部。”

4月27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东局四月二十六日关于十六个大中城市将进行统一镇反行动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城市市委的批语，指出：“在大中城市中，在各工厂，各学校，各机关，各里弄（街巷或胡同）建立群众的肃反委员会，有检举控诉和监视反革命分子的权力，但除现行犯外无捕人的权力，各城市均可仿行。”

同日 复信司徒美堂〔2〕：“四月十四日来信收到，甚慰。鹤山农民同志们送来的礼物也收到了，请先生转告他们，并致谢意。先生在南方暂留一时期很好，希望先生能于六月上旬返京，

〔1〕李六如，当时任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2〕司徒美堂，爱国华侨领袖，曾任美洲致公党主席。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

面聆教益。”司徒美堂在信中介绍了他在广东侨乡参观土地改革情况。

同日 上午，接见中共石家庄市委书记、市长和市公安局局长。毛泽东说：石家庄是兵家必争之地，很重要。所以，我们在解放战争中首先解放了石家庄，这对国民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孤立北平、解放北平都起过重要作用。毛泽东还对石家庄的工农业生产、城市建设和工商业改造谈了意见。下午，乘专列离开石家庄回北京。

4月28日 审阅修改中央军委本日关于同意第五次战役作战方针给彭德怀并告高岗的电报稿，加写一段话：“请注意在此次战役中，对伪一师，美三师、二十五师、二十四师，土耳其旅及英二十八旅给以尽可能大的打击。目前这几天似乎还有此种可能，如能在此战中歼灭敌军一万五千至二万人，则于今后作战很有利。”

4月29日 复信陈文新〔1〕：“你的信和你母亲的信都收到了，很高兴。希望你们姊妹们努力学习或工作，继承你父亲的遗志，为人民国家的建设服务。问候你的母亲。”

4月30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西南局关于镇反问题的指示，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大中城市市委的批语。批语指出：“杀人不能太多，太多则丧失社会同情，也损失劳动力。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不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有特殊情况者可以超过这个比例，但须得中央局批准，并报告中央备案。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凡有血债或其他重大罪行非杀不能平民愤者，应坚决杀掉，以平民愤而利生产。凡无血债或其他引

〔1〕陈文新，陈昌的儿子。当时是武汉大学农学院学生。陈昌，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1930年2月牺牲。

起民愤的重大罪行，但有应杀之罪者，例如有些特务或间谍分子，有些教育界及经济界中的反革命等，可判死刑，但缓期一年或二年执行，强迫他们劳动，以观后效，如他们在劳动中能改造，则第二步可改判无期徒刑，第三步可改判有期徒刑。（凡判徒刑一年以上者，一般都应组织他们劳动，不能吃闲饭。）这样，主动权抓在我们手里，尔后要怎样办都可以。这个问题，即将提到五月十日在北京开会的公安人员会议上讨论，并做出决定。”

同日 审阅修改中央军委关于志愿军干部调配的规定稿，加写：朝鲜战争“我们至少应准备再打一年至一年半”。

4月会见正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的周世钊、蒋竹如。在了解研究院情况和他们的学习打算后说：你们能够请假学习一年好极了，有机会学习是最好不过的事，学习完成后再往东北、华东参观也很重要。我呢，也很想请假两三年学习自然科学，只可惜可能不允许我有这样长的假期。

同月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学校题词：“为建设强大的人民炮兵而奋斗”。

5月1日 上午十时，和朱德、刘少奇、李济深、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检阅首都八十万群众游行队伍。

5月2日 邵力子率领的中央治淮视察团离京前往皖北、河南、苏北三省区视察治淮工程，带去有毛泽东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锦旗。此前，张治中曾致信毛泽东，说因病不能出行，请邵力子代理中央治淮视察团团长。

5月4日 为转发华北军区党委报送的第二十三兵团党委关于开展民主运动的总结报告，起草给邓子恢、谭政，贺龙、邓小平，张宗逊、甘泗淇、王震的批语，指出：这个报告“可作你们改造二十一兵团、二十二兵团及其他起义部队的参考。二十三兵

团即傅作义部，董其武为司令员、高克林为政治委员，全部由绥远开至河北整训，现已基本上得到改造。二十一兵团及二十二兵团的改造情形，请邓、谭及王震责成该两兵团党委向军委作一次报告”。

同日 为转发刘澜涛〔1〕关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开展“忠诚老实政治自觉”运动情况和经验的报告，起草批语：“此件发华东、中南、华南、西南、西北、东北各局，作为在机关、学校、部队中清查反革命分子的参考，这个经验是很有用的。”报告说：这次运动的主要经验是：目的明确，主要是为了弄清革命和反革命，不是搞思想意识、生活作风或学习态度等问题；号召有问题的人看清前途，相信政策，扫除顾虑，老实坦白；分化和孤立反动分子，形成群众性的拥护镇反的优势；组织强有力的领导机构；对罪恶很大又拒不坦白的分子予以逮捕，对真诚悔过、不完全悔过和完全不悔过者，区别对待。

同日 阅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江南五省春荒情况的报告，批示：“请陈云同志注意。”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转发西南局关于重庆市处理教授中的反动党团关系登记办法指示的批语稿。批语指出：“中央认为，此问题甚为重要，各地均应酌量采用重庆的办法妥善处理此项问题。”重庆的办法主要是，在教授中一般不进行群众性的坦白运动，在学校中一律停止要先生向学生坦白的做法。教授中的反动党团关系问题，可由本人向文教部或统战部个别声明解决，不必由公安机关登记，更不应追逼。

同日 就川东区放宽杀人尺度的错误，批示饶漱石、邓子恢、叶剑英、习仲勋、薄一波、高岗：“川东的教训请加注意，

〔1〕刘澜涛，当时兼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校长。

不要重复。”

5月6日 复电斯大林：“你给我的五月六日的电报收到了，我们完全同意你们对美国政府对日和约草案的答复。”斯大林来电通报了苏联政府关于准备对日和约问题拟定的给美国政府的复文，其主要内容是：准备对日和约草案不应由美国政府单独进行，而应由中、苏、美、英等国共同进行准备，并吸收所有对日参战国一起参与。对日和约应在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和雅尔塔协定的基础上制定，并以日本应当成为和平、民主、独立的国家，作为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保证，限制日本武装力量使之不得超过自卫的要求，对日本和平经济事业发展不加任何限制等，作为指导原则。

5月7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镇反问题的指示，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委、地委的批语。批语指出：“中央认为华北局这个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各地均应照此施行。兹定于六月一日起，全国除现行犯外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专一级，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级，离省远者由省级派代表前往办理。各地一律照此执行。清理积案是目前几个月内的一个极其艰巨的工作，各地必须调集大批干部，在几个月内将积案基本处理清楚，整理监狱，组织劳动改造工作。在清理期内，各地除现行犯及由各中央局决定的少数地方外，一律停止捕人，待积案清理完毕后再捕应捕之人。兹定六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计四个月为清理积案时间，亦即停止捕人时间。在此四个月内，‘中层’及‘内层’重点审查必须认真进行，有少数要犯须逮捕者须报请中央局批准。”华北局的指示提出，为了坚决而稳当地贯彻中央关于严格控制杀人比例的指示，决定将捕人权一律收到地委和专署，除现行犯外，县级不得批准捕人；将死刑批准权收到省委和省政府。

同日 为转发谭震林〔1〕五月一日关于杭州市逮捕反革命分子情况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委、区党委、大中城市市委的批语：“谭震林的报告很好，杭州的经验可在一切尚未这样做的城市应用。特别是吸收党外人士参加审查反革命案卷一事，各地必须认真地做，坚决地打破在我们党内存在着的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同时，在报告内作一些批注，主要有：（一）“有血债及其他引起群众痛恨的汉奸分子，应当在此次镇反中解决。”（二）“应当这样慎重地做，有些地方草率从事是错误的。”〔2〕（三）“不做好宣传不要杀人。”（四）“我公安机关对于隐藏的反革命分子的侦察工作，在许多城市都很差，应当在此次镇反中认真建立这个工作。”（五）“各城市均应当这样做，不要怕麻烦。”

5月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决定指出：“在共产党内，在人民解放军内，在人民政府系统内，在教育界，在工商界，在宗教界，在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内清出的反革命分子，除罪不至死应判有期或无期徒刑、或予管制监视者外，凡应杀分子，只杀有血债者，有引起群众愤恨的其他重大罪行例如强奸许多妇女掠夺许多财产者，以及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其余，一律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在缓刑期内强制劳动、以观后效

〔1〕谭震林，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1952年8月又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2〕这条批注，是对报告中说的由于事前准备充分，审批手续严格，各方面力量组织得好，逮捕秩序很好，均未抓错这段话写的。

〔3〕这条批注，是对报告中说的吸收党外人士参加镇压反革命的审查案卷、核实材料、讨论量刑问题和宣传解释等工作这段话写的。

的政策。这个政策是一个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错误。这个政策可以获得广大社会人士的同情。这个政策可以分化反革命势力，利于彻底消灭反革命。这个政策又保存了大批的劳动力，利于国家的建设事业。因此，这是一个正确的政策。” “如果这些人中有若干人不能改造，继续为恶，将来仍可以杀，主动权操在我们手里。” “应执行死刑的极少数人（大约占死罪分子的十分之一二），为慎重起见，一律要报请大行政区或大军区批准。有关统一战线的重要分子，须报请中央批准。此外，对于农村中的反革命亦只杀那些非杀不能平民愤者，凡人民不要杀的人一律不要杀。其中有些人亦应采取判死缓刑的政策。人民要求杀的人则必须杀掉，以平民愤而利生产。”

同日 审阅修改《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草案）》，批示彭真、罗瑞卿：“此件请提付会议讨论，征求意见，加以修改，再送我看。”九日和十五日，再次修改决议草案，将标题改为《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十六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转发决议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批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的决议，中央认为这个决议是适时的和正确的，全党全军均必须坚决地完全地照此实行。”毛泽东对决议草案加写的内容，主要有：“应明确地规定：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遵照中央指示在今年夏秋两季，采用整风方式，对留用人员和新吸收的知识分子普遍地初步地清查一次。其目的是弄清情况和处理一些最突出的问题。其方法是学习镇反文件，向着留用人员和新吸收的知识分子，号召他们中间有问题的人（不是一切人）用真诚老实的态度，交清历史，坦白其隐藏的问题。这种坦白运动必须由首长负责主持，采取自愿原则，不得施行强迫。每一单位时间要短，不要拖长。其策略是争取多数，孤立少

数，以待冬季的进一步清查。”“在政府系统、学校和工厂中进行此种清查工作时，必须有党外人士参加此种清查工作的委员会，避免由共产党员孤立地去做。”“全国各地，必须在此次镇压反革命的伟大斗争中普遍地组织群众的治安保卫委员会。此项委员会，农村以乡为单位，城市以机关、学校、工厂、街道为单位，经过人民选举组织之。委员人数少者三人多者十一人，必须吸收可靠的党外爱国分子参加，成为统一战线的保卫治安的组织。此项委员会受基层政府和公安机关的领导，担负协助人民政府肃清反革命，防奸、防谍，保卫国家和公众治安的责任。”“为了使镇压反革命的伟大斗争完全遵守上述工作路线，避免犯错误和纠正已经发生的偏向，中央一级，大行政区一级，省（区）市一级和专区一级，共四级，均必须派遣多数的视察组，每组三人，向下一级至几级检查各地的镇反工作。”

5月10日 阅中南军区关于华南地区海防战备概况给中央军委的报告，起草复电：“五月六日报告收到甚慰。望继续督促广东军区及各军加紧备战整训及其他必要措施，特别注意指导各军审查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纯洁内部。”同时，将这个报告转发给华东军区，要求他们督促所属加强备战整训和必要的备战措施，并将情况上告，指出“派人下去检查是很重要的领导方法”。

同日 审阅聂荣臻关于在朝鲜战局结束前夺取金门之战以推迟为宜的报告，批示：“同意你的意见。”

5月12日 审阅李维汉报送的和平解放西藏协定及两个附件（1）的草稿，批示：“退李维汉照此翻译付议，协定前言拟好送我看。”十三日，审阅修改和平解放西藏协定的前言（草稿、批

（1）指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向中央人民政府提出的几项希望的记录，和对于清朝时代驻藏士兵与藏族女子结婚所生后代的谅解。

送刘少奇、朱德、陈云即阅，退李维汉办。

同日 审阅聂荣臻关于中央军委兵工委员会对今后兵工建设方针问题的意见的报告，批示：“同意此项计划。退聂办。”报告说：根据目前的国际形势，要争取朝鲜战争的胜利和维护大陆的国防安全，需要保持六十个军一百八十个师的国防军。同时指出，我们国防军的装备必须向着生产自给的方向努力。报告还提出以徐向前为团长的兵工代表团赴苏联谈判的方案。五月的一个晚上，毛泽东约见徐向前，向他交代去苏联谈判的任务：一是购买武器装备；二是多搞点技术项目，发展自己的兵工生产。还说：帝国主义如此欺负我们，我们没有自己的兵工工业，不解决部队的武器装备问题，是不行的。要学习苏联，把先进技术拿到手，自力更生，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

5月15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纠正镇反中关门主义倾向的指示，起草给各中央局的批语。批语指出：“中央公安部正在组织十五个视察组，每组三人，分赴华东、中南、西南、西北、东北各省区检查镇反工作，定于六月十五日由北京出发。请你们即派若干视察组先去各县市实行检查，迅速纠正已经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特别是中南方面杀人最多，宣传最少，极不相称，存在着很大的关门主义倾向，必须立即纠正。从中南局五月十二日的电报看来，中央和中南局历次指示在汉口这样的地方并未实行，等于说空话，必须立即派人下去检查，问明责任，纠正错误，不可一刻延缓。此电请你们一直转发至地委，并请迅速转去。”

同日 为转发苏南区党委关于清理“中层”的计划和华东局批转这个计划的指示，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发至大中城市市委一级的批语，指出：“清理‘中层’问题现在即应开始解决。除中央对此问题即将发出指示（1）外，苏南区党委五月七日的计划及

（1）指中共中央1951年5月21日关于清理“中层”、“内层”问题的指示。

华东局五月十二日给苏南区党委的指示电，均很好。请各中央局及省市区委党委在接到中央指示后，参考苏南此项计划及以前通报的华北革命大学的经验〔1〕，作出自己的计划报告中央为盼。”苏南区党委的计划提出，清理“中层”应取更加慎重和妥善的办法，通过群众性学习运动来进行。华东局的指示指出，对被审查人员，除个别该捕该杀的现行犯、有血债及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外，一律以不捕不杀为好。

同日 为转发中共察哈尔省办公厅关于万全县镇压反革命的通报，起草给各中央局并即转发至县委和小城市市委一级的批语：“兹将万全县的经验通报给你们，请你们仿照办理。全国各县市的镇压反革命工作是如何进行的，是否向群众大张旗鼓地做了宣传，是否举行了群众的控诉会，群众的反映如何，请每个县委书记和市委书记（除已写的市）都向我写一个报告，交地委和省委转送给我。我希望全国二千余县委和市委的书记同志都和我直接通信一次。这些通信收齐后将发一通报，其中最好的经验将如万全县一样转发各地作参考。”

同日 阅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关于同尼泊尔总理谈话情况给外交部的电报，批示李克农：“叫袁大使密切注意尼泊尔的动态，加以研究电告，并应努力与尼泊尔建立外交关系。”

5月16日 为转发邓小平关于土改、镇反、抗美援朝的综合报告，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负责人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城市市委的批语：“小平同志的报告很好，发给你们研究。我的意见附注在报告各段里面，并供你们参考。”毛泽东批注了九条意见。（一）在报告谈到西南的“淮海战役”（即清匪、反

〔1〕指毛泽东1951年5月4日批转的刘澜涛4月29日关于华北革命大学开展“忠诚老实政治自觉”运动的经验报告。

霸、减租、退押运动)和土改取得了巨大胜利处,批注:“所有这些都很好,都值得庆贺,一切尚未做到这一步的地方都应这样做”。(二)在报告谈到进行土改的地方,都必须坚持复查、减退、惩治不法地主、适当满足贫雇农要求、改造农会和乡村政权的领导成分的方针处,批注:“所有这些都是正确的,各地都应这样做。”(三)在报告谈到镇反和惩治不法地主两个问题上有的地方发生控制不严,领导决定收缩,下面继续杀人处,批注:“中南区也发生此种现象,也是控制不严的结果,必须记得这个教训,千万不可重复。”(四)在报告谈到上述现象经过西南局几次指示,四月底已经停止下来处,批注:“请中南、华东各省坚决一律都停止下来,方能控制。”(五)在报告谈到杀人批准权,除个别地委外,均已收到区党委处,批注:“必须无例外地一律收回到省委或区党委。”(六)在报告谈到镇反和土改后期,事前不报告、事后不请示,不按章程办事的无政府无纪律的风气又在抬头处,批注:“请中南、华东各省严密注意这些教训,坚决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绝对不容许此种坏作风抬头。”(七)在报告谈到西南全区干部从五月起进入整风,总结经验,并注意纠正无政府无纪律倾向处,批注:“请你们考虑可否仿照西南办法,在六、七两月来一次整风,在冬季再来一次整风,不要等候冬季作一次整。”(八)在报告谈到许多同志以为抗美援朝影响工作,而群众一搞起来,大大帮助了实际运动,扩兵这样容易,也出乎意料之外处,批注:“还有两件事是出于许多同志意料之外的。一件是不敢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不敢邀请党外人士参加审判委员会和我们共同审判反革命。结果恰好相反,愈是打破了关门主义的地方,情况愈好。这是对于人民和党外人士的积极性估计不足的一个例子。又一件是不敢邀民主人士、工商业者、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分批地大量地看土改,看杀反革命。叫他们去看,

也只让他们看好的，不敢让他们看坏的，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结果又相反，凡去看了的，回来都是好话，都有进步。华东局规定好坏都让人看，结果很好。这是对于党外广大人士的积极性估计不足的又一个例子。”（九）在报告谈到担心各地忽视争取今年丰收的中心任务，招致严重的后果，我们正注意对这一方面的指示处，批注：“此事我也很忧虑，务请你们密切指导，争取丰收。”

同日 复电广西省军区并告中南军区：“你们五月七日电收到，四月份全省歼匪近三万人，残余匪众只剩一万五千人，甚慰。尚望鼓励剿匪部队继续进剿，歼灭一切残匪。”

同日 关于将捕人杀人的批准权一律提高一级问题，复电邓子恢并告饶漱石、邓小平、习仲勋：“五月十一日电收到。为了不使步骤混乱难于掌握（目前中南、西南两区已有难于掌握的形势，必须严重注意、捕人杀人的批准权必须一律提高一级，不许有例外。在土改区可由省派代表至专区，由专区派代表至县，掌握材料，用电话向专区请示批准捕人，向省请示批准杀人，这样对于捕杀少数人仍是便利的。”

同日 为转发中共察哈尔省委关于进一步普及镇反宣传的计划，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发至县委一级的批语，指出：“中央认为这个计划是完全正确和完全必要的，全国各地均照此计划去做。”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各级党委宣传部将镇反的宣传作为当前工作重心之一。各区普遍召开一次各界代表会议，各村普遍举行若干次各阶层的座谈会，讲解《惩治反革命条例》，使群众明了政策。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关于一至三月处理群众来信工作情况的报告，起草发至县委、县人民政府党组一级，并告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党组的批语。批语如下：“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

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如果人民来信很多，本人处理困难，应设立适当人数的专门机关或专门的人，处理这些信件。如果来信不多，本人或秘书能够处理，则不要另设专人。下面是专门处理人民给我来信的秘书室关于处理今年头三个月信件工作的报告，发给你们参考，我认为这个报告的观点是正确的。”毛泽东审阅时，在报告谈到还有九千多封信，是地方组织动员群众写的成批致敬信，准备给该地以总的回信处，批注：“组织群众成批地写致敬信是不好的，以后不要这样做。”

5月17日 审阅修改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转发西北军区航空处镇反报告的批语稿，加写一段话：“中央已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发给你们，望全军一体执行不得违反。其中规定从六月一日起捕人杀人均要报请大军区批准，以昭慎重，望加注意。”

5月19日 修改胡乔木起草的《为什么重视〈武训传〉的讨论》一文，将标题改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并批示“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毛泽东对文章作了大量修改，改写和加写的几段文字构成这篇文章的主体。这几段文字主要是：“《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

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五月二十日，《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东局、皖北区党委和阜阳地委关于涡阳事件的三个电报〔1〕，起草中央给中南局、华南分局、西南

〔1〕这3个电报是：中共阜阳地委1951年4月28日关于涡阳县混入反革命分子处理情况给皖北区党委的报告；皖北区党委1951年5月7日关于阜阳地委处理涡阳事件的意见给阜阳地委并报华东局的电报；华东局1951年5月15日关于处理涡阳事件给皖北区党委、山东分局、各省市区委、华东军区党委并报中央的电报。

局、西北局、华北局并转发至地委一级的批语，指出：“请你们检查所属各县中是否有像皖北涡阳县那样的严重现象，如有，必须给以坚决的处理，否则是很危险的。”“我们认为华东局的意见是正确的。”华东局的电报，批评涡阳县对于混入内部的反革命分子镇压的决心还不够，表现在对那些血债累累的土匪、恶霸、特务未坚决处以死刑。

同日 为转发中共无锡市委关于组织民主人士参加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情况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发至县委一级的批语，指出：“使民主人士与闻镇反工作，要求一些具体形式。关于审查案卷方面，华东各地根据华东局的指示组织了‘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无锡实行的结果很好，各地都应仿照办理。实行这种办法，民主人士真正得到了学习机会，去掉了怀疑，和我党更加靠拢，我党也就更加主动了。”

5月21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清理“中层”“内层”问题的指示》，并为中央起草下发这个指示的通知。指示要求在一九五一年夏秋两季，采用整风方式，有计划有步骤地对机关工作人员普遍地初步地加以清理，以便弄清情况，处理一些最突出的问题，提高组织的纯洁性。

5月22日 审阅修改《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关于组织全国犯人劳动改造问题的决议》，并起草中共中央的通知，将决议发至县一级党政机关和各级公安部门等遵照执行。决议指出：对反革命犯和普通犯人必须根据惩办与改造相结合的原则，并适应全国各项建设的需要，组织劳动改造工作。凡有劳动条件的犯人，应一律强迫其参加。

同日 阅彭德怀五月二十一日电，来电反映为时已一月的第五次战役所遇到的运输受阻、粮食供应不上、部队伤亡较大等困难情况，建议部队后撤、主力休整。毛泽东复电彭德怀并告高

岗：“根据目前情况收兵休整，准备再战，这个处置是正确的。”从二十三日晚开始，志愿军主力停止进攻，向北转移。

5月23日 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在中南海勤政殿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之后，毛泽东听取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李维汉、张国华等的汇报。他说：协议的签订是办了一件大事，这是一个胜利。但这只是第一步，下一步要实现协议，还要靠我们的努力。他向张国华询问了进藏部队的思想和生活情况，要求部队很快进军拉萨，为实现协议而努力。强调：你们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

同日 阅谭政关于驻华南各军军事训练和海防等情况的报告，复电谭政：（一）华南各军军事训练的方针是正确的。（二）希望你于秋季再去广州一次，检查各军的工作和海防工作。你去时最好再找一二个在朝鲜作战有经验的高级干部同去广州，向干部们作报告，提高军事训练和政治工作。”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上海市委关于严防在控诉会上扩大打击面的通报，起草给各中央局的批语：“上海市委关于严防在控诉会上扩大打击面的意见是正确的，请你们加以注意。”上海市委的意见是：（一）控诉会的控诉对象一律确定为被捕罪犯，并以罪大恶极的为主。（二）控诉会不能变成斗争会，不能把打击面扩大到落后分子及有关生活作风、思想观点方面。（三）控诉会不能在一个基层单位连续不断地召开，一般的召开一次即可，如无具体控诉对象可不召开。

同日 为转发中共甘肃武威地委关于召开反革命家属座谈会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发至县委一级的批语：“武威的经验很好，全国各县市均应这样做，争取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孤立尚未消灭的反革命分子。”

5月24日 下午四时，接受班禅额尔德尼率领班禅堪布会议厅主要负责官员的致敬和献赠哈达与礼品。四时半，和朱德接受以阿沛·阿旺晋美〔1〕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团代表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的致敬和献赠哈达与礼品。在谈话中，毛泽东说：这次解放军进西藏，一是保卫边疆、巩固国防，再是帮助西藏人民解除痛苦。他们到西藏后，不论是军队还是地方干部，如果做了违反你们心愿的事，或者欺侮你们，你一定要带头跟我说，我们马上就改。

同日 晚上，为庆祝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的签订举行宴会，朱德、刘少奇、李济深、陈云、郭沫若、黄炎培、李维汉、班禅额尔德尼、阿沛·阿旺晋美等出席。毛泽东在宴会上讲话说：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特别是汉民族与西藏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西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反动的清朝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才达到的。这种团结是兄弟般的团结，不是一方面压迫另一方面。这种团结是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后，在这一团结基础之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

同日 致信达赖喇嘛：“感谢你经阿沛·阿旺晋美先生带给我的信和礼物。西藏地方政府在你亲政以后，开始改变以往的态度，响应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派遣以阿沛·阿旺

〔1〕阿沛·阿旺晋美，西藏地方政府派来北京谈判和平解放西藏问题的首席代表。当时任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副主任。1952年2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晋美先生为首的全权代表来到北京举行谈判。你的这项举措是完全正确的。现在，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在友好基础之上，经过多次商谈，已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这个协议是符合于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的利益，同时也符合于全中国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从此，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在伟大祖国大家庭中，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得以永远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和异民族的压迫，站起来，为西藏人民自己的事业而努力。我希望你和你领导的西藏地方政府认真地实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尽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和平开进西藏地区。我特派张经武(1)代表同你的代表们一道前来你处，以资联络。如你有需要他协助的地方，可随时与他接洽。附来礼物，至希收纳！”

5月25日 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布进军西藏训令。训令指出：“此次进军系在和平协议下的战备进军，各部万勿以和平协议已成而松懈战斗意志与战斗准备，因协议虽然签字，但尚未付诸实施，同时帝国主义必会用各种阴谋手段来破坏我们和平解放西藏的实现。因此应提高警惕性，随时都有应付意外情况的充分准备，同时必须加强部队的政策纪律教育，以保证解放西藏巩固国防任务的圆满实现。”“进军行动待军委进军命令颁布时实施之。”

5月26日 就目前志愿军同美英军作战的战略战术问题，致电彭德怀。电报指出：“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这是因为美军在现时还有颇强的战斗意志和自信心。为了打落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最后大围歼的目的，似

(1) 张经武，当时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兼人民武装部部长（均至1952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1952年3月又任中共西藏工委书记。

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这就是说，打美英军和打伪军不同，打伪军可以实行战略或战役的大包围，打美英军则在几个月内还不要实行这种大包围，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即每军每次只精心选择敌军一个营或略多一点为对象而全部地包围歼灭之。这样，再打三四个战役，即每个美英师，都再有三四整营被干净歼灭，则其士气非降低不可，其信心非动摇不可，那时就可以作一次歼敌一个整师或两个、三个整师的计划了。”“至于打的地点，只要敌人肯进，越在北面一些越好，只要不超过平壤、元山线就行了。”毛泽东批示，这个电报发出后，请译发斯大林。二十七日，彭德怀复电毛泽东：军事方针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当按照执行。惟目前敌利用机械化追击截击，我三、九两兵团很多部队被隔断，送不上粮，运不回伤员，相当混乱。原拟保持淮阳、平康、安边地区（铁原至元山线、现均有放弃之可能，元山亦难保存。根据以上情况，第三番部队请提前入朝，以防止局势恶化和打开目前局面。邓华已去金日成处，然后到京面报各项。为便于联系各野战军，志司似应增加陈赓为第二副司令、宋时轮为第三副司令。

同日 审阅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拥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加写两段文字：（一）“中央的这个政策（1），不但对西藏是如此，对国内一切占少数的兄弟民族都是如此。因为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项固有制度的改革以及风俗习惯的改革，如果不是出于各民族人民以及和人民有联系的领袖们自觉

（1）指《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规定的“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

自愿地去进行，而由中央人民政府下命令强迫地去进行，而由汉族或他族人民中出身的工作人员生硬地强制地去进行，那就只会引起民族反感，达不到改革的目的。”（二）“在西藏人民中，佛教有很高的威信。人民对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信仰是很高的。因此，协议中不但规定对宗教应予尊重，对寺庙应予保护，而且对上述两位藏族人民的领袖的地位和职权也应予以尊重。这不但是为和解藏族内部过去不和睦的双方，也为使国内各民族对藏族领袖引起必要的尊重。”还对社论稿的一段文字作了修改（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切进入西藏地区的部队人员和地方工作人员必须恪守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必须恪守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必须严守纪律，必须实行公平的即完全按照等价交换原则去进行的贸易，必须防止和纠正大民族主义倾向，而以自己的衷心尊重西藏民族和为西藏人民服务的实践，来消除这个历史上留下来的很大的民族隔阂，取得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的衷心信任。如果这些部队和工作人员中有违反民族政策和协议的行为，如果他们不守纪律，如果他们欺负西藏人民和不尊重与人民有联系的领袖人物，如果他们犯了大汉族主义的原则错误，那么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就应负责及时纠正。同时，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则有批评的权利和向上级人民政府和中央人民政府反映和报告的权利。这个原则，不但对藏族是如此，对一切兄弟民族都是如此。”

5月27日 约见陈赓和从前线回国的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听取解方汇报朝鲜战场情况。对志愿军的作战方针等问题，毛泽东指出：（一）志愿军总的政治任务是轮番作战。消灭美英军九个师（几个杂牌旅、营全计在内），则可解决朝鲜问题。打法上同意彭总提出的不断轮番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即“零敲牛皮糖”的办法，每军一次以彻底干脆歼灭敌一个营为目标。一次战

役使用三四个军（也可多一点），其他部队整补待机，有机会就打。如此轮番作战，在夏秋冬三季内将敌人削弱，明春则可进行大规模的攻势。如能提前于夏秋两季达到削弱敌人目的，即可于冬季打大仗，求得一次大量歼灭敌人。（二）应加强政治工作，使全体干部和战士对朝鲜战局的长期性、艰苦性有充分认识与思想准备，但同时应指出胜利条件，强调克服困难，战胜困难。（三）组织上，完全同意“统一集中，减少层次，精干组织，提高效率”的原则。兵团最好取消，加强志愿军司令部和军，变为精干指挥所也可以。（四）入朝部队六个月左右换班，调到朝鲜北部或我国东北、华北休整三个月左右，再参加作战。西南第三番三个军已到华北，干部太缺，短期内不能出动。杨兵团〔1〕两个军已准备好，可随时出动。（五）除注意建设与加速空军出动外，目前重点是加强反战车武器与防空武器，部队则应大力提倡打战车、打飞机。会见后，解方当天将毛泽东的谈话要点电告彭德怀、朴一禹、韩先楚、王政柱、杜平〔2〕。

5月31日 晨二时，复电彭德怀并告高岗：“各电均悉。（一）你令各军坚决阻止敌人于金化、铁原、朔宁一线及其以南地带的计划，将四十二军主力调至伊川以东地区、将四十七军调至南川、新幕地区的计划，都是很对的，望坚决执行。（二）杨成武两个军可即调动入朝，以一个军代替四十七军修飞机场兼顾海防，以一个军代替四十二军防卫元山方向的可能登陆。（三）为防止伪首都师由襄阳向北窜扰元山，必须使用一个有战斗力的师于高城、通川之线，人民军有此力量否？（四）六十军一八〇师的情况如何〔3〕，甚以为念？”

〔1〕杨兵团，指杨成武任司令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

〔2〕王政柱、杜平，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参谋长、政治部主任。

〔3〕在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的作战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0军第180师因处置失当，被敌机械化部队包围于芝岩里地区，遭受严重损失。

同日 晚十时，致电彭德怀：“请答复下列问题：（一）杨口、华川、涟川之线以北文登里、金化、铁原、朔宁之线以南地带过去所筑阵地坚固程度如何，我军扼守此线不让敌进，而于该线寻机多打小歼灭战，以求逐步削弱敌人，可能性如何？（二）你是否正在部署在文登里、金化、铁原、朔宁之线以北，金城、平康、伊川、南川店之线以南地带构筑第二道防御阵地，扼守该线的可能性如何？（三）四十二军在阳德地区，四十军在沙里院地区做了工事否？”

同日 就金日成电告拟来北京一事，复电金日成：“五月三十日来电收到。同意你来北京面商各事，请注意路上安全，坐火车为宜。”同时，致电高岗并告彭德怀：“顷接金日成同志电，拟六月一日晚自平壤出发，经安东来北京。我已复电同意，并要他坐火车来。他到沈阳时，请你和他一道坐火车同来一谈为盼（勿坐飞机）。”

同日 为转发邓子恢关于城市工作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分局负责人并转各省市区委的批语，指出：“工厂中，矿山中，码头上，街道上，必须发动群众对于素来欺压和剥削群众的反动分子举行坚决的斗争，分清敌我界线，给予这些反动分子以必要的打击，最严重者予以处决，这是完全必要的，请你们加以注意。”

同日 就薄一波报送的关于购棉储棉工作给各中共中央局负责人说明情况的电报稿等，复信薄一波：“（一）给各中央局的电报已批发；（二）中央的公开通知〔1〕退还你，请添上政务院发布

〔1〕指中共中央1951年6月1日为保证政务院指示中提出的购棉储棉任务胜利完成，发给各级党委的通知。这个通知于当天在《人民日报》发表。

指示（1）的时间，连同指示送新华社发表；（三）农业税是否增加及是否号召捐献问题，还须等几天中央才能召集会议讨论。”

5月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同周世钊、蒋竹如谈话。在谈到抗美援朝战事发展情况时说：我们志愿军的武器不如敌人，大炮都少，飞机更没有上前线，但常常打胜仗。这是因为志愿军战士都是翻身的农民和工人，他们认识到这个战争是为支援被侵略的朝鲜而战，是为保家卫国而战，因此奋勇杀敌，敢于牺牲。可以说，这次战争我们打的是品质战。谈话后，共进晚餐。

6月1日 致电彭德怀：“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我军反坦克武器和反坦克部队的问题。听说近来敌人的坦克增多了，我军必须增强反坦克武器，足以征服敌人的大量坦克，才能阻止敌人坦克的猖獗和大量歼灭敌人的步兵。你对此事有何意见，我军现在配备的反坦克武器是否够用，哪些武器最有用，每团是否应配备一个专门的反坦连，望告。”二日，收到彭德怀一日的复电。复电说：关于军队编制、装备和军工生产问题，已派邓华率第四十二军、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军长和第三十八军政委等日内到京面报。不仅团需要反坦克火器，连、营亦需要有反坦克火器。复电还提出关于采取积极防御作战的战术问题的意见。

同日 为转发中共云南省委关于初步整顿党组织的决定，起草中央给华东局、中南局、华南分局并告西南局的批语，指出：“中央认为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凡新区有与云南情况相同或有某些相同之处者，可以参考这个决定，整顿那里的党的组织。”云南省委决定的主要内容是：（一）调整主要骨干和培养干部。所有地委书记、专员、县委书记、县长，一律由经过土改、三查、

（1）指政务院《关于购棉储棉工作的指示》。这个指示的发出时间是1951年6月1日。

整党锻炼的外来干部担任。把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工农积极分子培养和提拔为党的各种干部。凡地富出身及和地富关系密切的干部，坚决调离本地。（二）在党内，对干部进行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党的整体观念、党纲党章、共产党员标准的教育。（三）审查干部，把坏分子立即清洗出去。（四）整顿支部。

6月2日 为转发中共武汉市委关于汉口特务纵火事件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发至地委一级的批语，指出：“汉口特务纵火，毁房二千余间，受灾一万余人，这一严重事故，一切城市均应引起注意，应组织群众防特放火，在开群众大会时尤须严防。零陵〔1〕和汉口两次特务放火事件，应引起一切城市的注意。”

同日 就彭德怀来电所谈由于指挥失当等原因，志愿军第三兵团遭受较大损失一事，复电彭德怀：“六月一日电收到。三兵团在阻击任务完成后撤至谷山地区整补，恢复元气，很有必要。但三兵团在华川至涟川一线阵地的防御任务极为重要，须有别部担负，是否由九兵团接防。”

同日 致电彭德怀：（一）金日成同志六月三日晚可到北京，他可能提出作战方面的意见。因此你准备给金雄同志的电报请暂时不要发出。（二）目前提高斗志，停止敌进，稳定局面，极为重要。（三）三兵团政治部的电报里说，“担任阻击的部队必须彻底的把休整的思想转变过来，认识阻击的意义”。这样指出很有必要。因此三兵团似应分为两种部队，一种是战斗力没有破坏或没有很大破坏的部队，留在前线担任阻击，继续作战，打些小胜仗，振奋士气，锻炼自己。一种是战斗力有很大破坏的部队，

〔1〕零陵，县名，后并入湖南永州。

这必须调至谷山地区整补，以备再战。十九兵团则主力应留在前线作战，一部分残破部队则开至近后方整补。

6月3日 关于对朝鲜战场目前战争形势的估计及应对方针和措施问题，致电斯大林。电报说：“因为我军技术条件比敌人差得很远，无法迅速解决朝鲜问题，而决定用长期战争的方针去解决它，则需要有一个逐步削弱敌人的阶段，然后转到最后解决问题的阶段。”“在削弱敌人的阶段中，打的地点和打的方法，必须适合情况。在三八线附近地区，山地甚多，利于防御，距后方近，补给较易。而在汉城附近及汉城以南这两个条件就差远了。”“敌人现在不但火力很强，战斗意志也还未衰落。我军过去总想用大包围的方法，企图一次解决敌人一个至几个整师，结果没有达到目的，而包围和歼灭敌军的几个连至一二个营的机会则较多。因此，不要做现在我军还不能做到的事，不要企图打大规模的歼灭战，而应精心设计，寻找机会，多打小规模歼灭战。这样就可能逐步削弱敌军，振奋我军士气，并可减少我军伤亡。”“我军每次进攻时，只能由战斗员自己携带七天的粮食和弹药。用完了，停下来，等候补给。如果没有解决敌人，只好撤回来。这是因为敌人用大量空军封锁我军战线的近后方，我们的车辆大部被击毁，粮弹送不上去。敌人已经完全明了我军的这种情况。当我军前进时，它就全线后撤。等候我军粮弹用完，它就举行反攻。我们现正组织人力运输队，使用最原始的手推车，试图解决这个火线上运送粮弹的问题。”“敌人已增加了坦克，我们正在想办法增强反坦克的火力。苏联的高射武器起了很大的作用，四月份和五月份打下了二百多架敌机。征服敌人的坦克，则还要想办法。此外，大炮也还要增强。”

同日 同金日成会谈，商讨今后的作战问题和应对可能到来

的朝鲜停战谈判〔1〕的方针与方案。

6月初 接见杨成武、张南生，听取杨成武汇报第二十兵团入朝作战的准备情况。毛泽东说：我们要有准备，思想的准备、物质的准备，再打他几个胜仗。为了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们要继续在全国进行抗美援朝的宣传。目前，中朝军队将“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打到了三八线附近，收复了朝鲜北半部领土。尤其是今年四月二十二日起，中朝军队发起了第五次战役，粉碎了“联合国军”将战线推至平壤、元山一线的计划，战争双方已转入战略对峙阶段。如今，美国开始有了一点谈判的意向，这是件不容易的事，说明我们的仗打得不错。美国当局已经意识到光靠军事斗争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其实，我们并不想打仗。我们希望有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建设自己的国家，既然敌人肯坐下来同我们谈判，我们当然同意，不过敌人也很有可能利用谈判搞点什么名堂。我们军队的同志，头脑要清醒，不能有速胜的想法。五次战役都证明了即使一次包围了敌人一个整师或者一个整团，也是很难歼灭的。要看到，我们有过用兵过猛、张口过大的教训。现在就是要作长期准备，争取早日结束战争。我们的方针是持久作战，积极防御，在进行军事和政治两方面斗争的同时，争取和谈，以打促谈。敌人是不会轻易认输的，所以我们还得准备打他几仗。现在中央已经决定，今后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以二十一个军分三番在朝鲜轮番作战。你们这次去，对部队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中午，毛泽东请杨成武、张南生吃饭。其间，毛泽东说：经过几

〔1〕在朝鲜战争转入相持局面的形势下，受美国政府指派的国务院顾问乔治·凯南以私人名义拜访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美国准备在联合国或在任何一个委员会，或是以其他任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

次战役，我们的战略反攻已经完成了保家卫国、援救兄弟邻邦的主要任务，现在实行战略防御就是要巩固前一阶段的战果。入朝后一定要眼观全局，在全局上有个正确的指导思想，这就是准备持久作战，准备打阵地战，同时争取和谈，以达到这场战争的结束。当前，美国一面表示要进行停战谈判，一面又宣称要继续抗击和惩罚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自五月二十一日开始，“联合国军”又向北压迫、推进、合围，妄图陷中朝军队于困境。中朝部队已于二十三日向北转移。二十四日在我主力北移之际，美国第一、九、十军和南朝鲜第一军以坦克为前导向北猛插，形势陡然间严峻起来。针对这一情况，彭德怀同志准备组织二道防线节节抗击，坚持到七月底。他估计，敌人很可能在北朝鲜中部东海岸港口元山登陆，南北对进，届时平壤、元山一线亦将难守。为此，你们第二十兵团必须在此之前赶赴朝鲜前线〔1〕，以稳定战线。你们在军事上必须准备持久作战，积极防御，不能轻易放弃一寸土地，不能轻易后撤。你们第二十兵团入朝后，在朝鲜东线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敌人正面不增兵、侧后不登陆的情况下，把防线稳定在三八线与三十八点五度线之间。

6月4日 致电彭德怀：有关情报称，“联合国军”将从东线向西北推进，自元山起至开城止一斜线，压迫共军撤至平壤之北。可能另组元山登陆部队，以促成共军提早放弃临津江以东地区。“此种阴谋肯定是真实的。我全军应振奋精神，加速准备，粉碎正面之敌及从侧面登陆之敌。”

6月5日 致电斯大林：“我们感觉我们在朝鲜进行的战争，在财政方面，在正面作战方面，在敌人从后方海岸线有登陆可能性的威胁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我们想派高岗同志于日内

〔1〕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于1951年6月19日入朝作战。

乘飞机去莫斯科向你作报告，并向你请示解决各项重要问题。同时金日成同志现来北京，他愿意偕高岗同志一道去和你商量这些问题。是否可行，盼复。”斯大林复电，同意高岗和金日成去莫斯科，并派专机来接。

6月6日 晨，审阅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加写一段话：“我们的同志中，我们的党政军组织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中，我们的文学家教育家和新闻记者中，有许多是精通语法、会写文章、会写报告的人。这些人既然能够做到这一步，为什么我们大家不能做到呢？当然是能够的。”社论于当天发表。

6月8日 阅张宗逊、甘泗淇、阎揆要〔1〕六月七日关于修筑进藏公路给中央军委的电报，批示聂荣臻：“是否有钱修这些路，请与陈云商酌，可缓者应一律从缓。”电报提出：（一）建议今年继续修通张掖至西宁公路，以便油料的补给；（二）立即准备一九五二年春开工修筑的黄河沿至玉树公路；（三）立即着手分段勘测玉树至囊谦及敦煌经柴达木、唐古拉山口、黑河至拉萨线。

6月9日 复电斯大林：您派的专机六月九日已到达北京。高岗和金日成两同志定于六月十日从北京起飞去莫斯科。增订武器及其他军事物资的订货单，由高岗同志带去，请您酌量决定。和战问题及志愿军聘请苏联顾问问题，均由高岗面达。

6月11日 就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六、七两月军事部署问题，致电彭德怀，指出：“已和金日成同志谈好目前两个月不进行大的反攻战役，准备八月进行一次有把握的稳打稳扎的反攻。〔2〕”“六、七两个月内如不发生意外变化〔即登陆、我

〔1〕阎揆要，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参谋长。

〔2〕后因朝鲜战场情况发生变化没有实行。

们必须完成下列各事：（甲）以积极防御的方法坚持铁原、平康、伊川三道防线，不使敌人超过伊川线；（乙）迅速补充三兵团及十九兵团至每军四万五千人，并有相当训练；（丙）十三兵团各军休整完毕；（丁）加强各军、师火力，特别是反坦克反空军炮火；（戊）迅速修通熙川至宁远至德川的公路至少一条，最好有两条，并于熙川、德川、孟山地区囤积相当数量的粮食，以备万一之用。你意如何盼告。”十二日，彭德怀复电毛泽东：由熙川至孟山至破邑公路，前令第四十二军工兵修了两个月，又加了一个工兵团，勉强可通车，还须两三个月才能加宽加固。如再加修一条公路目前不可能。加强反坦克和高射武器是非常迫切的问题。

6月13日 致电彭德怀：“（一）敌占金化、铁原后，动态如何，我军能否在该线至金城、平康、兔山线之间阻住敌人，我军部署如何，极念。（二）已令邓华同志及其他四同志于十五日动身回前方，中央各项重要决定由邓面告。”此前，曾接见邓华和第十三兵团各军长，听取邓华汇报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准备讨论的几个议题。毛泽东说：第五次战役打得急了一些，打得远了一些，打得大了一些。又说：总的方针是“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战略方针是“持久作战，积极防御”。毛泽东要邓华一行立即返回前线，坚持现在一带的阵地。

同日 复电高岗、金日成：“（一）六月十三日二时电悉。（二）和谈如何提法，我们觉得在目前两个月内朝中军队取守势的时候，不宜由朝中两国提出，而宜用下列方式：（一）等待敌人提出；由苏联根据凯南对马立克的谈话向美国有所表示。以上两种方式可以同时做，即一方面由苏联有所表示，另一方面如果敌人提出时，朝中两国可以表示自己的态度。究以何种方式为宜，请你们和菲里波夫同志商量决定。（三）和谈条件，三八线为界，

三八线南北可以各划一小段地区为缓冲地带，但不能只划北面的缓冲地带而不划南面的缓冲地带。南北朝鲜互不干涉。”“（四）已令邓华及十三兵团各军长立即返回前线，坚持现在一带的阵线。六、七两月加紧准备，八月举行一个有力的作战。在敌人不向我后方海岸线大举登陆的情况下，上述目的是可能达到的。只要敌人不增兵，不登陆，到了八月，我们就比较现在强得多了。（五）空军参战的问题正在开始计划。”

6月15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北局六月十二日关于通县〔1〕传达贯彻死缓政策情况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发至县委一级的批语：“河北省通县反映的情况值得注意。缓期二年执行的政策，决不应解释为对于负有血债或有其他重大罪行人民要求处死的罪犯而不处死，如果这样做，那就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向区村干部和人民群众解释清楚，对于罪大恶极民愤甚深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必须处死，以平民愤。只对那些民愤不深，人民并不要求处死，但又犯有死罪者，方可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

6月16日 前审阅修改杨耳〔2〕《关于武训和〈武训传〉的几个问题》一文，加写几段文字，并把标题改为《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这篇文章在六月十六日出版的《学习》杂志第四卷第五期发表。

6月16日 阅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关于叶剑英突然患病给杨尚昆转中央的电报，批示杨尚昆：“请查询广州是否有高明的医生及剑英病情告我。”

6月19日 致电陈毅：“看了几个你们属下的镇反工作报告

〔1〕通县，今北京市通州区。

〔2〕杨耳，即许立群，当时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及你们对这些报告的指示，证明华东军区系统内的镇反和清理工作，业已活跃起来了，甚好甚慰。望你抓紧这个问题，贯彻到底，务达纯洁内部，肃清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惟各单位的报告和你们对这些报告的批示，发给我们备案即可，不必要求我们每件再作指示，以免延迟时间。”

6月21日 阅胡乔木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文中几处提法问题的请示信，作批注。（一）对“对陈独秀说是当时‘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拟改为“有很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一句话，批注：“可以。”（二）对“‘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已经完全胜利’，此处用‘方式’意义不明确，拟改‘原理’或‘道路’或‘战略’或‘方针’。请示何者较妥”一段话，批注：“‘方针’为好。”（三）对“叙述整风时说‘党抓紧了这个局势比较稳定的时期’，但前面说这是敌人扫荡最残酷最紧张的时期，似合。可否改为：‘党抓紧了这个局势较少变化的时期进行了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一段话，批注：“这样好。”（四）对“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人数各说都是十三人，惟李达说是十二人，理由是包惠僧非代表。两说不知孰是？”一段话，批注：“是十二人。”

同日 致电斯大林。电报说：“我军在朝鲜作战八个月来，深感敌我装备的悬殊和急于改善我军装备的必要。曾由高岗同志向你请求六十个师的装备，已蒙允诺。这是我军在朝鲜战场今年内至低的要求。据高岗同志回称，你认为我们的要求对于每个师的装备还不够强，提议每师须配备坦克，增加炮火，我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这是对帝国主义作战所必需的，我已电徐向前同志完全照你们的意见具体商谈。”“据徐向前来电称，他已与苏总参谋部初步商谈，认为六十个师照苏总参谋部所提的编制意见，今

年只能运来十六个师（内含朝鲜三个师），其余四十四师须待明年至后年才能陆续运到，这样就使得朝鲜战场的需要与时间发生矛盾。”“为适应朝鲜战场的急需，我请你考虑照高岗交给徐向前办理的订货单，将六十个师的步兵武器及各种火炮、坦克、飞机、汽车及汽车零件和各种汽油、药品等武器和器材，能于今年七月间开始，到今年年底运完，每月运六分之一，使朝鲜战场各师团暂照现行编制得到补充，以利战局。”“由于我们的订单的提出迟缓了三个月，误事甚大，而今天我又突然向你提出这样大的数目和在六个月内运到中国的要求，这会使你感到很大的困难，特别是运输的问题不知能否做到？”这个电报还发给徐向前。

同日 复电徐向前：“六月十六日及十九日的来电均收到了。所提各问题分答如下：（一）高岗同志交给你办理的军事订单是朝鲜战场今年内所必需的和至低的要求，因为朝鲜战场敌人各种火力的强大，使我军各种武器的损坏和损失甚大，不断需要补充，加上自参战以来到今年底，我们动员了一百一十多万新兵，这些新兵都需要武器训练和带上武器上前线，这是与过去国内战争大不相同的。因此如果可能的话，必须请求苏联政府将订单中各种武器能于七月开始分批运来，每月运六分之一，年底运完，使朝鲜战场我军能暂照现行编制不断得到补充。（二）苏总参谋部所提的编制意见，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没有现代的装备，要战胜帝国主义的军队是不可能的……惟在进行改编时，必须适合朝鲜战场的要求，照你的来电称今年只能来十三个师的装备，其余须待明后年才能陆续运到，这就使朝鲜战场上得不到应有的补充。故我已电菲里波夫同志，请求他考虑将订单中的各种武器和器材按时运来，如（一）项所述。至于按照苏方所提编制的标准尚不足的武器则可于明年陆续运来。视武器运输的状况陆续抽调若干师团进行改编，逐步完成六十个师的新编制和装备。此点望与苏总

参谋部切实商讨。（三）我们订货的目的既如上述（朝鲜战场的急需）则与我兵工生产毫无矛盾。你们代表团关于兵工生产问题继续商谈时可按苏总参谋部提出的编制意见作为根据。唯六十个师的新编制和装备，可能成为我军首先现代化的骨干，而我整个国防军原拟定为一百八十个师，因之我们的兵工生产是为装备这样一个数目的，并应当于三年到五年内完成之。”

6月22日 同刘亚楼谈话，说：朝鲜战争可能出现停战谈判，空军要抓紧时间参战，以求得到战斗锻炼。新兵种初次参战不可能等到准备工作完全充分。初次打仗不要设想一鸣惊人，一鸣则已，不必惊人。二十四日，复信刘亚楼、吴法宪、王秉璋〔1〕：“六月二十三日你们给我的报告收到了。我同意你们这个计划。望你们按此计划进行切实的准备工作，以便九月实行作战，是为至要。”

6月23日 复信李烛尘：“六月十三日给我的信收到了。您的提议〔2〕很好。惟时机值得考虑，似以等待一个时期再去进行为宜。”

同日 复信曾以鲁〔3〕：“六月十二日惠书敬悉。以前两信均未收到，为殷洪乔所说〔4〕无疑。吾兄从事绘事甚好，尚望努力进修，日起有功，不胜祷祝。”

〔1〕吴法宪，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秉璋，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参谋长。

〔2〕李烛尘在信中提议，由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过去与国民党政府有关系的士人，开展对台湾的宣传活动。

〔3〕曾以鲁，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4〕殷洪乔，东晋人。“殷洪乔所说”，出自南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殷洪乔作豫章郡，临去，都下人因附百许函书。既至石头，悉掷水中，因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能作致书邮’。”后人常把因不可信托的寄信人而致书信丢失，称为“误付洪乔”。

同日 复信李介侯：“李君〔1〕有空军技术，可持此信去空军领导机关试行接洽，看可以收录否？因我不明李君的政治经历，要他自己向空军部门去说明一切。”

6月25日 为转发罗瑞卿关于犯人参加生产建设报告，起草中共中央批语：“中央批准罗瑞卿同志六月二十四日的报告，望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委按此报告所提处理犯人参加生产的办法办理，并迅速执行为要。”罗瑞卿的报告，汇报了劳改会议决定的犯人参加水利、铁路、公路等生产建设的办法。

6月26日 阅符定一关于询问文史研究馆何时成立，请求救济旅京老人的来信，批示：“请齐燕铭同志办。生计太困难者，先行接济，不使挨饿。”七月二十九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史研究馆成立，馆长为符定一。馆名为毛泽东确定。

6月27日 审阅聂荣臻本日关于空军参战准备工作的报告。报告说：现在空军参战部队由五个师增至十一个师后，必须提出紧急订货。拟由空军派一负责同志到莫斯科专办此事，不然空军出动即无保证。在我空军增加六个师参战的情况下，平壤及其以南的喷气式机场已不够用，必须增修二至三个机场才行。建议用周总理名义电金首相解决。毛泽东批示：“同意，请即抓紧办理。退聂办。”

6月29日 复电金日成并告彭德怀：“六月二十九日的电报收到了。我认为一方面，人民军和志愿军应当积极注意作战，不使敌人乘机获逞。另一方面，你们两人应当马上会商一次，就和平谈判问题加以考虑，准备派出适当的谈判代表，并以你们考虑的意见和谈判代表的人选告我。至于假如李奇微提出要求谈判的时

〔1〕指李启炽。李介侯1951年6月18日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李启炽有空军技术，请给予学习机会。

候如何回答的问题，可待李奇微提出要求时再行考虑回答的内容和措词。兹将葛罗米柯同志与美国驻苏大使寇克的谈话要点，发给你们，请加研究。”

同日 复电斯大林。复电说：“您在六月二十五日和六月二十八日给我的两次电报均收到了。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第一，关于六十个师的装备的交货时间，只应当按照苏联的生产和运输的可能条件去规定，即是说在三年内完成六十个师的订货，而在一九五一年内完成十个师的订货。第二，您提出的那个中国现代步兵师的编制表，很好，就照这个编制表办事。中国军队有了按照这个编制表装备起来的六十个步兵师，就较现在的军队要强得多了。”“马立克的演说〔1〕，使我们在和平谈判问题上取得了主动。六月二十八日，我接到了罗申同志交来的关于葛罗米柯同志与美国驻苏大使寇克的谈话要点，并在文尾说：每一方只有二人参加，并且这些代表应该是各有关部队指挥部的代表而不应该是政府的代表。这样，在中国方面是以志愿部队的代表身份参加这个谈判，而不使中国以交战国身份去参加。我认为这样做是很适当的。”“假如谈判真能举行的话，很需要您密切地指导这次谈判，以免上敌人的当。”

6月30日 下午二时，致电斯大林：“敌军司令官李奇微已于本日发表通知，建议在元山港内一个丹麦船上由交战双方的代表举行关于停战的会议。并称，必须有适当的保证，方能实行停战。关于此事，有几点请您考虑示复，并请您直接通知金日成同志：（一）金日成同志似应于七月二日或七月三日发表答复李奇

〔1〕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1951年6月23日在联合国新闻部举办的“和平的代价”广播节目中发表演说，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交战双方应谈判停火与休战，而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

微的通知,在此通知内说明:同意举行双方代表谈判停战的会议,并建议会谈的时间、地点和代表人数。(二)关于谈判地点,李奇微建议在元山港内。查此港是北朝鲜的设防海港,敌军正阴谋于此登陆,似不宜同意在此港开会,可否建议以三八线上的开城为会议地点。(三)为使我方代表对于会谈内容有充分的时间作准备,似宜建议以七月十五日为开会日期。(四)因为时间迫切与会议的重要性,我建议,请您直接与金日成同志通讯,密切地指导此次会议,同时将您的意见告知我就行了。”

同日 下午五时,致电金日成并彭德怀:一)本日我给菲里波夫同志电报稿一份,兹同时发给你们参阅,大约明天(七月一号)可能得到菲里波夫同志的复电。(二)请你以朝鲜人民军总司令的资格,准备于七月二日或三日发表一个回答李奇微的声明。(三)因为时间紧迫和会议的重要性,我已要求菲里波夫同志直接和你通讯,密切指导此次会议,请你也经常和菲里波夫同志联络,有问题时直接向他请示。(四)此次谈判,是以你的代表为主,中国志愿军的代表为辅,因此请你对于为了使此次谈判获得较良结果的各项内容和方法加以考虑和准备。(五)你和彭德怀同志会谈的时间,可在对李奇微的通知发表回答以后,择定一天举行。我这里准备派我们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同志及其助手于七月二日由北京动身,七月五日可到彭德怀同志那里,和你及彭商量并帮助此次谈判事宜,他是在内部帮助你们的,不公开出面。(六)你的意见盼告。”

同日 下午六时,和刘少奇、朱德、陈云等出席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举行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庆祝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报告。

7月1日 晚上,和刘少奇、朱德等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庆祝“七一”的盛

大酒会。

同日 金日成和彭德怀联名复电李奇微，同意为举行停止军事行动和建立和平的谈判而和李奇微的代表会晤，会晤地点建议在三八线的开城地区。

7月2日 晨四时，就准备和平谈判会议〔1〕的有关问题，致电彭德怀并金日成及高岗：“（一）同意彭留在联司〔2〕主持作战及七月十日的干部会议，不去平壤开会。（二）同意邓华同志代表彭出席和谈会议，请邓即日动身去平壤，务于四日晚上或五日晚上，到达金日成同志那里，彭对和谈的意见即告邓华带去。（三）李克农率乔冠华〔3〕及其他助手，于七月二日二十二时由北京乘车去安东，于七月四日傍晚由安东动身去平壤（不去联司），大约于五日早上，或五日晚上，可到金日成同志那里，和金日成同志及出席和谈的代表们（人民军的和志愿军的）会商有关和谈会议的一切问题，请金日成同志派人于适当地点接引他们。（四）请彭德怀同志命令位于开城地区的军队负责首长迅速布置在开城开和谈会议的房屋（如果没有房屋就须使用帐篷）、用具和食品等项，布置可靠的警戒，务必保障会议的安全，不许出乱子。敌方代表团的宿舍（可能有几十人，包括新闻记者），我方代表团的宿舍及开会的会场，均须布置得妥当一点。此外，还须为李克农、乔冠华等布置一所宿舍（距会场一二公里为此，请联司派一懂事的有能力的负责干部即去开城地区指挥上述布置事宜。开城情况如何，望速查告。”

〔1〕会议开始后的正式名称为朝鲜停战谈判会议。

〔2〕联司，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联合作战司令部的简称。

〔3〕乔冠华，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局长。

同日 晚十二时，致电彭德怀、高岗并金日成：“在和敌方代表准备谈判及实行谈判期间，大约有十天到十四天，请你们严格和充分地注意下列各点：（一）争取在十天内，用极大努力，加强第一线部队的人员特别是武器和弹药的补充。请高岗同志将后方应运人员、武器、弹药等，尽这十天内外运入北朝鲜境内。必须准备着一经签订停战协定，这些人员和物资就不能运输和调动了。（二）极力提高警惕。我第一线各军，必须准备对付在谈判前及谈判期内敌军可能对我来一次大的攻击，在后方，则举行大规模的空炸，以期迫我订立城下之盟。如遇敌军大举进攻时，我军必须大举反攻，将其打败。（三）杨成武两个军及五十军，须令其迅速开到指定地点，防止敌人乘机在元山登陆，我三十八、三十九及四十二军则应准备对付敌人可能在西边登陆。（四）请你们设想在停战协定成立以后可能发生各种情况，并预筹对策。”

7月3日 致电斯大林。电报说：“关于敌我双方军事代表会谈时我方应提出的条款，我们认为主要有五条，即：（一）‘双方协议同时发布停火命令。双方海陆空军自停火令发布时起，在朝鲜全境实行停火及停止其他敌对活动。’此条敌方可能无异议。（二）‘双方陆海空军各自三八线撤离十英里，在三八线以南及以北各十英里的地区，成立非武装区。该非武装区之民事行政，恢复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以前之状况，在二八线以北由朝鲜人民政府管辖，在三八线以南由南朝鲜政府管辖。’此条敌方可能提出某些异议，但我们这样提，是很公道的，敌方难于批评。（三）‘双方停止运输（包括陆运、空运、海运）军火、军队或补充部队，由朝鲜境外到朝鲜境内去以及由朝鲜境内运输到第一线部队中去。’估计敌方可能提出此项条文，故我方似应主动提出或者此条的后一句不要。（四）‘设立中立国监督委员会，由双方各推荐未参加朝鲜战争之国家之同等人数之代表组成之，负责监

督第一、二、三条各项之执行。’估计敌方可能提出类似条文，故我方主动提出此条。但实行此条将会招致许多麻烦，敌方推荐的‘监督委员’将在中朝国境线及北朝鲜的各交通要站检查我军的运输车辆。或者我方不主动提出此条，待敌方提出时再由我方接受之。究以何者为宜，请你酌定。根本拒绝设立监督机关，似不适宜。（五）‘双方释放战俘。在停战后四个月内，由双方各将对方战俘全部分批交换释放之。’敌方可能提出一个换一个，我方则应要求释放全部战俘。惟敌方俘虏北朝鲜人较多，并已补入南朝鲜部队内，此事可能引起争议。以上是我们想到的在双方军事代表会谈中应当解决的根本的五条。此外，尚有（一）‘一切外国军队，包括中国志愿军在内，限期（例如在三个月至四个月内）分批自南北朝鲜撤退完毕这亦是很重要的一条。惟敌方代表可能认为此事属于政治范围，不应在此次会议中解决。请你考虑我方应否将此条提出。（二）‘南北朝鲜双方的难民限期（例如在几个月内）遣回原地。’金日成同志希望提出此条。但此事实行颇为烦难，南北朝鲜的代表可能在此问题上发生许多争论，以致影响到其他主要问题的决定。或者可以提出去，在争论不决时则将它推到将来的政治性的国际会议上去讨论。以上各点，请将您的意见告我。”

同日 晚十二时，致电金日成并告彭德怀。电报说：李奇微已复电同意七月十日在开城举行和谈会议，他还提议在这以前举行一次双方联络官的预备会议。我认为可以同意举行预备会议，时间定在七月八日。预备会议是很重要的，李克农及我方和谈代表们及联络官们均需于七月七日晚上或以前到达开城地区，以便指导我们的联络官开好预备会议。请彭德怀同志命令解方及部队首长加速布置开城地区的开会地址等事宜，务须保障双方联络官及双方代表的安全，无论如何不许出乱子，此点至为重要。电报

附有毛泽东为金日成、彭德怀起草的七月四日给李奇微的复电，其中说：“你在七月三日给我们的复文收到了。”“我们同意你的建议，由双方派遣联络官各三人，在开城地区举行预备会议。如果你同意，我们建议双方联络官们的会晤时间，定在七月八日。”

7月4日 晨四时，致电金日成并告彭德怀：“我方是此次谈判的主人，请你派出一位负责同志，随带若干工作人员及必要物品速去开城地区，会同联司参谋长解方同志筹备会场及开会事宜。如该地无房屋，就须带帐篷去。双方会议人员所需物品及会场设备，均须带去。一切均须于七月八日以前准备完毕。”

同日 晨四时，致电彭德怀：“开城地区如埋有地雷，须加撤除，特别是李奇微代表的飞机降落地，汽车通道及会场附近，必须撤除干净，保障安全，不出乱子为要。”

同日 晚七时，致电金日成、李克农并彭德怀，发去将由我方提出的《朝鲜停战的协定》的提案。协定的内容为：“在朝鲜作战的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一方），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将军、中国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一方），双方被授权派遣代表举行关于在朝鲜停止作战与建立和平的会议，双方代表同意订立下列各条款：第一条于一九五一年某月某日双方同时发布停火令。双方陆海空军自停火令发布之时起，在朝鲜全境实行停火及停止其他敌对活动。第二条双方陆海空军各自三八线撤离十英里。在三八线以南及以北各十英里的地区，成立非武装区。该非武装区的民政事宜，恢复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以前的状态，在三八线以北由朝鲜人民政府管辖，在三八线以南由南朝鲜政府管辖。第三条双方停止运输（包括陆运、海运、空运）军火、军队或补充部队，由朝鲜境外到朝鲜境内去。第四条双方释放俘虏。在停战后三个月内双方各将对方战俘全部分批交换释放之。”

第五条一切在朝鲜作战的外国军队，包括中国志愿军在内，限于两个月至三个月内，分批自南北朝鲜撤退完毕。第六条南北朝鲜双方的难民，限于四个月内遣回原地。”电报说：“金日成同志对上述协定意见如何，盼告。如认为可行，即请你召集李克农、南日〔1〕、邓华等同志将上述协定提案交给他们，并向他们加以解释，然后令他们迅速前往开城地区。请告他们注意，联络官是谈开会细节的，不是谈判协定条款的。”“为使我方各代表的步骤和态度取得一致，提议由我方各代表及李克农、乔冠华等组成一个小组会议，由李克农主持，是否可行亦盼告。”

同日 晚九时，复电金日成并李克农、乔冠华：“金于七月四日十三时的电报，李、乔于七月四日十二时由安东发来的报告均收到了。”“李、乔及邓华均可于七月五日拂晓到金处，请金召集李、乔、邓及南日、金昌满、金一波〔2〕、柴军武等立即会商一次，如果可能的话，他们应于七月五日傍晚即由平壤出发于六日早上或晚上到开城地区准备各项事宜，早一点去较好。”“最好于五日夜车即去开城，愈早愈好。”

7月6日 为转发中共北京市委七月五日关于统战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此件很好。发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委参考，并请仿照办理，加强全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报告说，这次统战工作会议的主要收获有：（一）使干部认识了在新环境下各界民主人士的积极作用和进步的可能性，批判了对他们估计不足的错误思想。（二）纠正了对各界民主人士不敢领导和怕麻烦的思想。（三）进一步了解了民主党派的性质、

〔1〕南日，当时任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即将任朝鲜停战谈判朝中方面首席代表。

〔2〕金昌满，当时任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动员局局长，即将任朝鲜停战谈判朝中方面首席联络官。金一波，即将任朝鲜停战谈判朝鲜人民军联络官。

历史、作用和前途。(四)检讨了过去对统战工作不重视等思想,明确了今后工作的任务,增强了对统战工作的信心。

7月7日 对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关于如何处理纪念武训的学校、碑文和建筑等向中央宣传部的请示报告,批示:“可予同意。但应着重教育解释,其余可以从容处理。”请示报告说:首先对群众广泛进行教育,从思想上解决问题,然后再分别不同情况进行处理。凡私立武训学校,在对武训及电影《武训传》讨论渐趋成熟时,由他们自己提出更名和改组,我们同意批准,仍为私立学校。凡公立的武训学校,在教职员学生思想澄清后,更改校名。关于纪念武训的碑文、建筑等物,教育群众认清武训以后,由群众自觉地拆除。石刻、塑像、柱、碑要拔除,画像要涂抹,武训纪念林要改名,但武训墓和墓碑,我们认为应当保留。

同日 阅刘亚楼、吴法宪、王秉璋的报告。报告说:估计到朝鲜战场可能出现停战局面,我们考虑是否需要在宣布停火以前,以一部空军部队进驻北朝鲜各机场。毛泽东批示:“为不给敌人以口实,不要去。”

7月9日 晨一时,致电金日成、李克农并彭德怀:“(一)不要提赔偿问题,因为这样提出,一则可使英、法、美团结起来而不能孤立美国,二则美国可以发救济费的办法来作答复,而北朝鲜是不能接受美国的救济费的。(二)如果金日成同志认为交换难民对北朝鲜不利,则可将南北朝鲜交换难民一项条文取消不要提出,但应准备南朝鲜提出此项问题时的对策。(三)第二条中关于非武装区的民政事宜,同意写至‘恢复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以前的状态’为止,以下两句可删去。(四)不必提出‘禁止转交武器’的条件。(五)同意增加解方为代表。朝中两方的代表均应用真姓名,不要用假名。并须于本日(七月九日)发表公报,叙述人民军和志愿军的代表的官阶和姓名,请克农即刻

起草发金及我。”

同日 中午十二时，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七月八日二十三时电收到。（一）公报稿可用，已予发表。（二）南日、邓华两个发言稿（1）均可用。惟南日稿内称‘愿意接受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先生的提议并准备举行停战谈判’，改为‘愿意举行停战谈判’，将‘接受苏联’以下二十一个字删去，因为李奇微的声明在文字上并无愿意接受马立克提议的表示，如果南日这样说，可能引起对方的无谓的批评。邓华发言稿中所说马立克提议一段则是好的，不会引起批评的。如果你们认为南日发言稿中应有提到马立克提议的话，应在另外的地方去说。”

同日 审阅修改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纪念建军二十四周年的指不稿。将原稿中的“目前朝鲜战争有停战可能，但是停火和停战目前还不是事实，因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丝毫不应当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这句话，修改为目前朝鲜战争或者有停战可能，但是停火和停战目前还不是事实，并且有继续作战的很大可能。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丝毫不应当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而必须有继续战争的充分准备。因此，我前方部队必须鼓励士气，继续英勇作战，千万不可有丝毫的松懈，不要作此次可以和下来的打算，而应作此次和不下来，还须继续打，还须给敌人以大量的消耗和歼灭，然后才能和下来的打算。只有我们作了此种打算，才于争取最后胜利有益处，否则是没有益处的。”

7月10日 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同“联合国军”代表团在开城举行朝鲜停战谈判首次会议。

7月11日 晨七时，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来

（1）指南日、邓华分别准备在朝鲜停战谈判首次会议上的发言稿。1951年7月11日，两个发言稿在《人民日报》发表。

电收到。（一）撤兵一条必须坚持。（二）在各项谈判未得完全协议以前，不要让新闻记者参加。只有在获得完全协议、在举行签字的那一天，才可以让双方同等数目的新闻记者参加。”

同日 审阅修改伍修权〔1〕将在七月十二日全国政协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双周座谈会上作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发言稿，批示：“第一、第二两部分应大大缩短，不要讲长了，接着就讲第三部分。”发言稿的三个部分是：一、朝鲜战争是美国帝国主义战争计划的组成部分；二、抗美援朝的意义和成就；三、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是我们的一贯方针。

同日 阅薄一波本日来信。信中说：傅作义曾提出，在整风中是否要把他的历史问题向大家谈一下，我答以不需要。毛泽东批示：“同意你的意见。请妥善处理，团结傅及其一切可以团结的干部。并加强对这些干部的教育。”

7月13日 审阅胡乔木七月十日关于党的翻译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报告说：关于《毛泽东选集》俄译稿，拟由王稼祥、李立三、张闻天三同志校阅。提议组成党中央翻译工作委员会，由稼祥同志负责。但稼祥同志一再推辞，此事请中央决定。毛泽东批示：“同意你的各项意见。但委员会的主持人稼祥既不愿担任，就由你暂时担任为好，每月召开一次会，将来再考虑用他人。”

同日 将李克农从朝鲜发回的报告改写成新华社平壤十二日电讯稿。电讯稿说：“本社记者从朝鲜人民军总部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有关方面获悉：谈判朝鲜停战的联合国军代表团七月十二日未来开城，朝鲜停战谈判会议因此未能举行。”

同日 致电斯大林〔2〕，介绍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两天来的情

〔1〕伍修权，当时任外交副部长。

〔2〕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改后发出。

况和我方对谈判议程的意见。同时说明：“现我方对敌作战仍在加紧进行，并准备如谈判破裂，再打几个月，给以更大杀伤而促其变化。”十四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我们详细地讨论了与对敌谈判问题有关的一切事实，并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即您七月十三日来电中所述意见是完全正确的。”

7月14日 晨一时四十五分，复电李克农：“七月十三日二十一时半来件〔1〕收到，待修正后发给你，你在收到修正稿以后即可发给对方。北京广播当在七月十四日二十时即下午八时左右。”

同日 晨七时，致电李克农并金日成、彭德怀：“李奇微的通知是以划中立区为主题，来掩盖他因记者这个小问题而引起会议停顿的不妥当行动。我方为取得主动起见，决定同意他划中立区的提议，也同意他将新闻记者作为他代表团工作人员一部分的办法，以取消敌方的一切借口。”电报还提出代表团立即准备在敌方代表团重来开城时注意解决的几个问题。

同日 晨七时半，致电李克农并金日成、彭德怀，发去给李奇微的复文修改稿。复文说：你的七月十三日的来信收到了。为了扫除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的误会和争论，使和平谈判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起见，我们同意你所提的将开城地区划为在会议进行期间的中立区，在此区域内双方停止任何敌对活动，及将武装人员完全摒除于会址区域及你我代表团通往会址区域的通路之外的建议。此次引起停会的原因的新闻记者问题是一个小问题，值不得为这个问题引起停会。为了不因这件小事而使会议陷于长期停顿或破裂起见，我们现在同意你的建议，即将贵方新闻记者代表二十人作为你的代表团工作人员的一部分。

同日 上午十时，致电李克农并金日成、彭德怀，强调在划

〔1〕指金日成、彭德怀1951年7月14日给李奇微的复文稿。

中立区面积的问题上，以能保证双方代表安全为原则。

同日 起草新华社平壤十四日电讯稿。电讯稿指出：“昨日美方代表团借口新闻记者未得我方同意仍然不来开城开会，以致会议又停顿一天。昨日下午，此间收到了李奇微的一个通知，提出了划中立区的新问题。金日成将军和彭德怀将军本日已予以答复。为了扫除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的误会和争辩，使和平谈判得以顺利进行起见，我方在原则上同意将开城地区划为在会议期间的暂时的中立区。”“同时对于新闻记者问题也给了美方以便利。这样，就解除了美方在最近提出的一切借口，使开城会议有可能重开。”

同日 就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有关问题，致信陈伯达：“这些已看过，请照批改者改正。其中《古田会议决议》只选第一章，第二章以下均不收。《查田运动总结》，不收。《兴国调查》，不收。这样，就轻松多了。请送新的来校阅，我等着。”

同日 阅萧劲光七月九日关于因有多种疾病希望去青岛休养一个月的来信，批示：“同意这个休养计划。”

7月15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指出：关于议程问题，由于南日同志在第一日的发言中即提出了三项停战建议，我方已掌握了主动。今后，再经过几次试探和争论，便可提出我方所拟的五项议程：“一、通过议程；二、为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首先应确定双方的军事分界线，并建立非军事地区；三、为保证朝鲜不再发生敌对的军事行动，应商定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问题；四、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及监察问题；五、关于停战后双方俘虏的安排问题。”必须在美方同意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问题列入议程的条件下，我方才同意在议程上不提三八线的具体分界线，而留等进行该项议程

〔1〕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的谈判时再决定三八线为分界线，并同时将监察问题加入议程第四项，以便在具体讨论时，再加斟酌。

同日 复信黄炎培：“七月十四日大示收读。尊恙极念。完全同意休养一个月，如有必要，还宜延长一个月，以期全愈。时局诚如尊论。古人说：能战然后能和。我们也是如此。我方昨天采取了一个步骤对于剥夺敌方的借口以利会议续开一点，将是有益的。”黄炎培来信说，因神经和心脏方面的疾病，根据医生建议拟告假一月易地休养。信中还谈到对朝鲜和谈的看法。

7月17日 薄一波致电高克林、苏谦益〔1〕并告张苏、马国瑞〔2〕。电报说：关于团结傅作义、董其武及其干部，经请示毛主席后有一些重要指示，择要告你们，请妥善执行为盼。（一）对傅、董及其一切干部，必须妥善处理，团结傅、董及一切可以团结的干部并加强对于这些干部的教育。这是总方针。（二）第二十三兵团民主改革运动是正确的，对傅本人亦起了积极推动其进步的作用，但有缺点。（三）傅的绥远军政委员会主席和绥远军区司令员兼职，均应保持，绥远应向他报告工作，并经常保持接触，今后并应设法开会，使其能行使职权。（四）对傅的人，应以起义时间（九月十九日）为界限，以前犯罪的应一律宽大不追，此点必须坚持。在此次整风审干中，如只是牵涉到过去历史或是思想糊涂，一时分不清敌友，说错了话，或是受了他人牵连，均应予以照顾。（五）从工作、思想上来看，傅本人半年来确实有进步，对过去错误有较深刻的认识，对今后态度是力求进步。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3〕：“新的议程既已

〔1〕苏谦益，当时任中共绥远省委代理书记兼组织部部长、绥远省政协主席。

〔2〕张苏，当时任中共察哈尔省委常委、察哈尔省人民政府主席。马国瑞，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副书记兼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河北省政协副主席。

〔3〕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改后发出。其中用着重号标出的文字，是毛泽东加写的。这个电报还发给了斯大林。

提出，并已声明系正式的之后，你们即应采坚持的方针和态度，尤其对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问题应再三说明这是保证在朝鲜不再发生敌对行为的必要条件，使敌人意识到我们是坚持这项条件的。我们提此条是有充分理由的。各国派兵到朝鲜是来作战的，不是来旅行的，为什么停战会议有权讨论停战，却无权讨论撤兵呢？显然这种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此，我方坚持会议既然有权讨论停战，也就有权讨论撤兵。如果敌人不表示这种让步，我们仍应坚持，我们不提议休会，不表示破裂，但也不怕他们破裂。”

7月20日 晨三时，致电高岗：“菲里波夫同志同意我们的要求，再派尤金同志来中国帮助我们做理论教育等工作，为时三个月。”“他到东北后，请你和他恳谈一次。如他愿先来北京，则请派人护送来京。如他愿意先在东北各城市向我们的干部作理论讲演，及参观工厂、学校、农村，则请你给以布置，派出有能力的翻译人员、引导人员及保护人员，在各处布置适当数目的干部听讲会及座谈会。”

同日 晨三时半，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指出：估计到今日会议对方有可能拒绝讨论撤兵问题。如今日会议情形确向此种估计方向发展，你们便应抢先提出休会三天，以便双方考虑停战谈判的议程究应如何安排为好，以便取得主动。二十一日上午，我方代表团就对方拒绝将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问题列入议程事，提议休会三天。经双方同意，决定第九次会议在七月二十五日上午举行。

同日 就谈判情况和我方对策，致电斯大林〔2〕。电报说：朝鲜停战谈判复会后，经过五天的争论，在议程问题上已达成三项

协议：一，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二，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三，关于俘虏的安排问题。而关于撤退一切外国军队问题，敌人始终拒绝将其列入议程，虽经我方多次驳斥，敌人仍毫无让步征候。我们对撤兵问题，似应作重新考虑。我们认为，与其为撤兵问题而进行难以得到结果的长期战，不如不以撤兵问题作为停战谈判必须立即解决的条件，而以从三八线撤兵停战作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把从朝鲜撤兵问题保留到停战后去讨论。这样还可以保留对此问题的回旋余地，使其成为我们手中的斗争武器。如您认为我们这种看法和意见是对的，在得到您的回电后，我即准备取得金日成同志同意再给我方谈判代表团以指示。二十一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表示赞同中方意见。二十二日，毛泽东致电金日成，征询他的意见。金日成复电表示同意。

同日 审阅习仲勋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干部会上所作的《为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而斗争》的报告稿，将“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指针”一句话，改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指针。”

7月23日 晨三时，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指出：现在我们可以确定，此次停战谈判仍应以争取从三八线上撤兵停战为中心，来实现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你们应准备在七月二十五日复会时，由南日同志发表一篇声明，说明我方为求得早日达成停战协议，愿同意不将讨论撤退外国军队问题列入此次会议的议程，但我们提议在已协议的四项议程外，加入第五项“其他有关停战的问题”。这项议题的提出，为的是前四项议题都进行完毕并达成具体的协议后，我们将在进行第五项

议题时提议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在停战协定实施后一定期限内召开双方高一级的代表会议，协商从朝鲜分期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问题。

7月25日 晚十二时，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指出：根据今日谈判情形看来，对方有可能接受我们关于第五项议程的新建议。明日会议如在议程上达成完全协议，而进入实际问题的讨论时，你们对于双方军事分界线问题应坚持以三八线为界，南北各划出若干公里，建立非军事地区的主张不变。

7月26日 复电彭德怀：“七月二十四日电收到。敌人是否真想停战议和，待开城会议再进行若干次就可判明。在停战协定没有签订、战争没有真正停止以前，我军积极准备九月的攻势作战是完全必要的。”

7月28日 晨三时，就乔埃〔2〕七月二十七日在发言中，借口“海空军优势的补偿”，要求在离战线很远的我方实际控制区域内建立军事分界线，企图不战而攫取一万二千多平方公里土地一事，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3〕，指出：乔埃发言，狂妄荒谬，完全是战场的叫嚣，并非在谈判停战。你们准备的发言，必须首先质问其有无谋和诚意，还是在准备扩大战争的根据，然后再痛驳其所谓海空军给予地面作战的影响，及地面停战而海空不停战的奇谈。从乔埃的发言看来，我方在目前必须坚持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主张，并以坚定不移的态度，驳回其无理要求，才能打破敌人以为我可以一让再让的错觉。对于这一点，

〔1〕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乔埃，当时任朝鲜停战谈判“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

〔3〕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可以让它争论下去，也许要僵持几天，敌人才会重新考虑。如果敌人决心在这个问题上破裂，发表出去，他将完全陷于被动。

7月30日 复信张元济〔1〕：“去年十二月三十日，今年四月十五日和五月二十六日三次惠书并附大作及书一函，均收到了，谨谢厚意。积雪西陲一诗甚好。由于签订了协定，我们的队伍不久可以到拉萨了。尊恙有起色，甚以为慰。”

7月 对《武训历史调查记》〔2〕进行多次修改，加写和改写的文字二千七百多字。其中加写的段落主要是：（一）“根据上述各种材料，使我们了解武训是一个在鲁西许多县里的流氓群中有势力的流氓头子，他与鲁西数县的地主特别是大绅士大恶霸相勾结，与县城府城省城的大小官员相勾结，使自己成为大债主、大地主和大名人。武训就是这样一个在流氓、地主、官僚三种集团中极为活跃，因而脱离一切劳动人民，并和人民处于对立地位的特殊人物。”（二）“武训的始终不变的形象是行乞，武训和一切普通乞丐或流氓不同的特点是兴学。而这两点（行乞和兴学）互相结合在一起，就为一切时期的反动统治者所喜爱，而为之尽力宣扬。某些思想错误的人们也喜爱这样一个人物，而为之尽力宣扬。这样，就迷惑了许多天真的头脑简单的人们。因此，揭露

〔1〕张元济，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商务印书馆董事长。

〔2〕1951年夏，由人民日报社和文化部发起，组织一个13人的武训历史调查团，赴平原省（1952年撤销，所辖地区分别划归山东、河南两省）堂邑县（1956年并入山东冠县）、馆陶县（1952年11月划归山东，今属河北）和山东省临清县等地，共进行二十多天调查。《武训历史调查记》是根据这次调查的材料由几个人起草，经毛泽东多次修改而成的。调查记分作5个部分：一、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二、武训的为人；三、武训学校的性质；四、武训的高利贷剥削；五、武训的土地剥削。

武训和武训宣传者的真相，就成了必要的工作。”（三）“封建制度的生产关系，是地主阶级掌握主要的生产资料。地主阶级有政权、有军队，保护这种生产关系。因而只有地主阶级能够垄断文化，办学校。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是不可能受教育学文化的机会的。在封建地主阶级看来，使用简单工具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也没有要使他们受教育学文化的必要。这是几千年封建制度的规律，是唯物史观所指示的法则。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要在文化教育方面翻身，要自己办学校，学文化，受教育，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并取消地主与农民间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即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改变成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才有这种可能。在中国的解放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全中国，就有这种可能了。武训生在满清时代，他甘心为地主阶级服务，以‘为贫寒’的口号欺骗农民，而实际上为地主和商人办成了三所学校，这是合乎封建社会的规律的。”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人民日报》连续刊载《武训历史调查记》。

同月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会见周世钊、蒋竹如，了解他们就读的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的教学情况，谈到自学的重要性。在介绍自己在湖南图书馆自学的经历时说：一九一二年暑假中，我从湖南省立高级中学自动退学之后，寄居在湘乡驻省中学学生宿舍，实行自学。每天到三里之外的湖南省立图书馆去看书。早去晚归，中午为了节省时间，买两个烧饼，就解决了午餐问题。雨雪的日子也照样前往，从未间断过。这样从早到晚，没有什么休息，在这个图书馆自学了半年。当时，我十九岁了，十九岁的青年应该读了很多书，但我读得不多。我才到图书馆的时候，看到架上、桌上和藏书楼上都堆满了书，我借读了一些，觉得都有新的内容，都对我有所启发。我在图书馆借了严复翻译的

《天演论》、《穆勒名学》、《原富》、《法意》、《社会通论》以及西洋历史和小说等。觉得每读一本书都有新的收获，越读越觉得不肯抛弃，因此忘了疲倦和饥饿，一天只有中午吃烧饼的时候是我唯一的休息时间。半年多的时间不算长，而我在知识上的收获却不小。我最大的收获还不在这里。我在湖南省立图书馆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大地图。以前，世界究竟有多大，是不太明确的。当时，我认为湘潭县已不算小，湖南省当然更大，全中国古称天下便大得了不得。在世界地图上看到中国只占世界一部分，小了，湖南更小了，湘潭和韶山更没有影子了。世界真正大呀，世界既大，人就很多，每一个活人都要生活，既要过物质生活，还要过文化生活。据我看，一般人的生活应该是过得幸福的，但我在韶山、湘潭和长沙见到的，广大人民的生活是痛苦的，缺衣少食，挨冻受饿，目不识丁，做一世的文盲，还常常被地主、豪绅和贪官污吏勒索压迫，被卖被杀。为什么广大人民的生活过得这样痛苦呢？用今天的话来说，只是由于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的缘故。在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广大人民的痛苦生活不会变成幸福的生活。因此，我总觉得我们青年的责任极其重大，青年的前途极其广阔，因为要改变社会就要革命，革命就要靠革命青年。我想到这里，就下定这样的决心：我将以一生的力量为痛苦的人民服务，将革命事业奋斗到底。所以这回在湖南省立图书馆的半年自学是我读书历史中值得纪念的半年。

8月1日 就朝鲜战场九月战役的部署问题，致电彭德怀并告高岗，指出：一）以二十兵团替换九兵团一个军或两个军的部署甚好，但九兵团的主力仍以作九月战役的第二线兵力（第二梯队）为宜，不要调远了。（二）十三兵团的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应在八月上旬调至第一线积极准备九月战役，而从三兵团及十九兵团中抽出三至四个军接替海防兵力。（三）在最前

线修建多数粮弹储备库，为九月战役储备充分的粮弹，使作战时能随缺随补，此点极关重要。闻你已在筹备，未知情形怎样。

（四）以上各点盼复。”八日，彭德怀复电毛泽东并高岗，报告九月战役的作战部署，并说：如无意外，拟于九月十日下午发起战役攻击，如敌在八月底或九月初向我进攻，则在现阵地以逸待劳，适时举行反击为最有利。

同日 阅胡乔木关于中共中央东北局建议九月三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请示报告，批示：“请乔木另拟一电〔1〕，采用统一的‘九三’纪念。”八月十三日，政务院发出通告，规定九月三日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同日 致电斯大林：为培养中国工业干部，满足中国经济建设的需要，我们拟送三百七十五名留学生赴苏学习和八十八名年轻干部直接去苏联工厂实习二年。若您同意此事，请予电复。八月五日，斯大林复电同意。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2〕，指出：关于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的争论已达六日之久，我方理直气壮，南日同志的发言甚好，已取得有利形势。对此，应不管敌人企图如何，仍坚持依照程序首先解决以三八线为双方军事分界线的问题，即使继续坚持下去，也仍然对我有利。因为我方主张以三八线为分界线是公开的合理的，而且是这次谈判的基础，敌人却不敢公开自己的提议，而只能消极地反对三八线。

8月2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3〕，指出：东

〔1〕胡乔木1951年8月2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东北局并各中央局的电报说：同意规定9月3日为全国统一的战胜日本纪念日。除东北应改在此日庆祝解放外，全国军民及报纸均应于此日纪念八年抗日战争的胜利。

〔2〕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3〕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京盟军总部新闻处七月三十一日发表正式公报说，“关于我们必须获得协议的军事分界线，应在鸭绿江上的空军及海军战线与开城、平康、北汉江区域的陆军战线的中间某处”。这等于敌人已在公开他的提议。望你们针对这一公报，指示开城我方记者写一宣传报道速电北京、平壤，以便中朝两国报纸据此发表评论，好向全世界人民宣布美国政府这种无理要求及其空军对于朝鲜和平居民的继续狂轰滥炸。

8月4日 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指出：八月二日电想已收到，你们是否已经指示开城我方记者将美方关于在我方阵地以北建立分界线的无理要求，给以具体报道并予以严正驳斥？敌人很怕他的要求被公开出来会受到多数舆论非难，故仍在极力反对以三八线为分界线，以掩盖他的要求；同时却又暗示联合国所提出的沿目前的战线建立分界线，企图诱使我们在三八线问题上先松口，然后他再提出沿目前战线建立分界线，与我们讨价还价。我们的对策，应该在会议中坚持三八线的主张不变，并不断驳斥敌人的荒谬要求，在新闻宣传上具体地揭露敌人的荒谬要求，使会内外的斗争配合起来，逼敌人在这个问题上先松口，然后方可考虑提出我们的方案。因此，我们以新闻揭露与报纸评论来进行斗争，更为刻不容缓之举了。

8月5日 就“联合国军”代表团借口我方警卫部队误人谈判会址地区的偶发事件而不到开城谈判一事，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2〕，指出：为揭露敌人这一小题大做的伎俩，你们应告新华社开城记者写一报道，将上次复会后在七月十六日美军曾向我板门店中立地区射击一事，我方仅提口头抗议，而此次

〔1〕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仅为武装警卫部队误入会址地区，美方就这样小题大做，对照之下，就证明哪方具有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诚意，哪方是在玩弄拖延谈判的手腕，以掩盖其关于军事分界线的荒谬要求。

8月8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指出：敌人因为懂得我们不会在这类枝节问题上与之破裂，故乃一再使用流氓挑衅手段，向我进逼。七日向我板门店射击一事，便是敌人进一步的挑衅和恫吓。我们在这类事件上与之破裂是不必要的，但如表示软弱，不给以严正回驳，不立即抗议，那正中敌人的恫吓诡计。你们对昨日板门店事件，未立即提出抗议，颇失时机，且亦示弱。望你们根据已经取得的证据，先经过联络官向对方抗议，看对方如何反应。同时，望指示记者速即报道此事。

8月9日 复信李介侯：“承你转来刘伯强、刘德三〔2〕二位的信，收到了。请你转他们，在当地认真工作，在工作中学习。”

8月11日 晨七时，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3〕，指出：划分军事分界线问题，你们可考虑向对方作这样的表示，指出对方既已放弃其原先荒谬而不合理的提议，而主张大体上就目前战线划分军事分界线并加以调整，则我方提议的三八线是对于目前战线的最好调整，也是大体上合于目前战线的双方局势的。因此，我方现在愿提议：将三八线定为双方军事分界线的基线，依此基线建立非军事地区，双方可不必一律向后各撤十公里。我们采取这一步骤，可表示我方亦作了让步，看对方如何发展，再决定我方是否需要提出原定的方案。

同日 《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为革命老根据地人民的题

〔1〕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刘伯强、刘德三，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刘修秩的儿子。

〔3〕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词：“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8月13日 晨二时，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指出：敌人原来的提案只是为的换取我在三八线的主张上让步。至于敌人的真正盘子，就地停战加上不大的调整固然是他所求，但如果依地形及军事形势划一条线在三八线南北附近，即临津江以东划在三八线以北，临津江以西划在三八线以南，南北地区大致相等，而名字就叫军事分界线，大概敌人也就有可能准备接受。关于目前谈判的策略，你们应该将谈判的重点放在针锋相对地反对敌人的原有方案上头，而少提自己的主张，逼使敌人不能不答复你们的问题。不论敌人是承认放弃或修改其原来的方案，或是更提出就现有战线划分界线的主张，到那时，你们就可以提出我们八月十一日七时电告的方案。很可能，敌人仍不会接受，但我们在争论中就应该将三八线与现有战线联系起来，并将军事分界线与非军事区也联系起来，以便为下一个原先商定的折中方案做伏笔文章。

8月15日 审阅罗瑞卿八月十四日报送的《关于镇压反革命工作的报告》，批示：“已阅，很好。”报告说：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它成立不久，就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实行了坚决镇压反革命的重要措施，我们以为这是十分适时的，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其所以正确和必要，就是因为中国人民的敌人虽然已被推翻，但他们遗留下来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国民党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国民党军政官员中坚持反动立场的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以及地主阶级中的恶霸分子，数量还是很大。中国人民在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中，牺牲于他们的毒手者难以计算；解放以后，他们时时刻刻都在想方设法地进行各种各样的破坏活

动。在将近大半年时间里，在广大新区就有四万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被反革命杀害。刚刚胜利了的中国人民，如果不严重正视这种情况，不坚决地肃清大量普遍存在的反革命势力，就无法巩固自己的胜利，巩固人民的政权。这次镇压反革命，既肃清了大量敌人，又发动了广大人民的革命积极性，使得人民的胜利和人民的统治进一步地巩固起来了。报告指出：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过程，是正确的、健康的，一般地没有发生偏差和错误。这是由于：第一，集中力量打击那些罪大恶极、怙恶不悛、为人民群众所十分痛恨的反革命首恶分子；第二，走了群众路线，放手发动了群众，吸收了各界人士参加镇压反革命的工作；第三，有领导地进行这项工作，不仅有明确的政策，而且有惩治反革命条例作具体量刑的标准；第四，各级人民公安机关，对于镇压反革命工作，一般是有经验的，也是有准备的。在若干地区曾经有过草率和粗糙的现象，对于统一战线中应该照顾的方面也发生了若干照顾不够的偏向，但这都属于个别的性质，而且大体上都适时纠正了，并不影响镇压反革命的总的成绩。当前的斗争任务是：迅即加以收缩；对应当判处死刑者，一般以处决其中少数的罪大恶极分子为原则，其余多数均应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在今年六月到九月，除现行犯外，应一律停止捕人，以便集中精力清理积案；现确定全国一切地方捕人批准权属专署一级，杀人批准权属省一级；立即着手组织犯人劳动改造。

8月18日 “联合国军”为向朝中方面施加军事压力，发动夏季攻势，并开始实施所谓“绞杀战”。

8月19日 审定中央军委复彭德怀电。复电说：由于安东、平壤间需增修三个机场并推迟空军出动时间，我军目前作战方针不能不从各方面重加考虑。在作战上，也应与谈判的要求相配

合、相适应。从现在具体情况看来，不易使我们这次战役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设若战而不胜，反易暴露弱点。据此种种，望你对九月战役计划再行考虑，可否改为加紧准备而不发动，如此，既可预防敌人挑衅和破裂，又可加强前线训练和后勤准备。二十一日，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并高岗：九月战役改为积极备战，防敌进攻，准备适当时机反击。如敌暂不进攻，待十月再决。

8月20日 阅袁仲贤关于印度总理尼赫鲁催要毛泽东诗词的报告，批示：“外交部：不要送这种诗词。”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彭德怀（1）：我方代表团驻地应立即移到会场区外之中立区，并靠近中立区以外之我方部队，实行根据协议的武装警戒，以防敌袭扰和意外。

8月21日 致电彭德怀并告高岗，指出：邓华说“在军事上我应有所准备，纵目前不进行战役反击，也当尽可能作战术的反击，收复些地方，推前接触线，更好地了解敌人阵地及其坚固程度”。我认为这个意见值得认真考虑，请你计划一下，九月份能否进行此种战术反击，如何进行法，须用多少兵力，胜利把握如何，敌人的反应将会如何，请就这几点考虑电告。二十三日，彭德怀复电毛泽东：九月不举行大的战役进攻时，可选择伪军突出部队举行局部进攻。美军布防尚未发现其弱点。

同日 审阅聂荣臻、李富春报送的关于航空工业建设计划，批示：“照办。”计划提出了航空工业的建设方针、生产规模、厂址的选定等。

8月23日 晚九时，就美国飞机又于二十二日夜以我方代表团住所为目标进行轰炸和扫射事，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2），指出：致李奇微抗议书，你们可于明（二十四日）晨正

（1）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式送出。这样做，让会议停开一个时期，以压下敌人的气焰。在军事上应加紧准备，迎接敌人的可能进攻，在谈判上如果得不到我们认为满意的答复，就拖他一个时期，但不由我方宣布破裂。二十四日晨一时，再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指出：休会的范围，应不包括双方联络官的来往，我们仍应保持这个联络。

8月 下旬阅改袁水拍〔2〕起草的《武训历史调查记》的后记稿，将其改为《关于本书出版的几句话》。原稿说：开展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使原来在武训问题上所存在着的混乱思想得以澄清，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胜利”。毛泽东将“毛泽东思想”改为“马列主义”。

8月25日 晚十二时，再就敌机轰炸事，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3〕，指出：目前需要与敌人进行几次有力的文字的宣传斗争，以观其变化。代表团的任务是谈判兼打文仗。敌人如决心破裂，我们也要从各方面做足文章，使破裂的责任落在敌人身上。敌人如仍然是拖，我们应从拖中做主动的文章。你们应既不消极也不急躁地沉着应变，主动作战。

8月26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并告高岗电：“我军已决定九月不作大规模反攻战斗，敌人又有企图在镇南浦登陆的消息，因此，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及四十军均应位于原驻地，加强训练，并准备对付镇南浦方面的可能登陆。”

8月27日 审阅由周恩来起草的金日成、彭德怀给李奇微的复文，批示：“复文很好，请于今日发表。”复文指出：你方出现违反和破坏开城中立区协议的行为后，经我方提请你方注意或

〔1〕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袁水拍，诗人。当时任《人民日报》文艺组副组长。

〔3〕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向你方提出抗议，你方不是予以否认，就是不予处理，甚至抵赖一切。我们再一次向你提出：你方必须认真负责地处理这一严重的挑衅事件，然后停战谈判才能得到保证，才能继续进行。为使全世界人民能够明了事件的全貌和真相，我们要求你，能和我方一样，将你我双方来往的文电全文发表，并容许你方各新闻通讯社全文发出和各地报纸全文登载。

同日 致电斯大林〔1〕。电报说：敌人在谈判中因军事分界线问题相持不下，便采取了连续的挑衅行为。我们给了坚决的回击。我们宣告停会，等待敌人负责处理此事。如得不到满意答复，就让会议停开一个时期，以压低敌人的气焰，但我方不主动宣告破裂。等拖一个时期后，如果敌人有愿意重开谈判的进一步表示，我们拟主动地提出一个转弯的办法，促其接受。二十九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同意来电对情况的估计和采取的方针。

8月31日 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2〕，指出：敌人仍在空中和地上继续挑衅，其企图显然是示威和试探，我们除随时予以抗议和揭露外，更应在中立区内有计划地隐蔽地布置不带重武器的武装力量，准备消灭和捕捉仍将侵入中立区进行挑衅的对方武装人员。只有这样，才能打击敌人的挑衅和捉到活的人证，以证实其全部罪行。

9月2日 致电斯大林：“当此抗日战争胜利日六周年之际，谨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全中国人民向你和苏联武装部队、苏联人民致热烈的祝贺和深切的感谢。苏联在抗日战争中给予中国人民的巨大援助，以及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共同防止日本侵略势力再起的巩固同盟，使中国人民在反对远东侵略势力的斗争

〔1〕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中，获得无限鼓舞。”

9月3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对西藏各寺院及乞丐发放布施给张经武的电报稿，加写一段话：“发放的时机以在我入藏先遣支队及阿沛等人到达拉萨，西藏政府讨论了中藏协定〔1〕，并发出了拥护这个协定的通电之后为适宜，不要过早。”

同日 下午，同章乃器谈话，听取他关于率全国政协组织的西南土地改革工作团参加土改工作情况的汇报。

同日 同梁漱溟谈话并共进晚餐，了解他参加西南土地改革工作团期间，对西南土改和对四川的印象。在梁漱溟谈到土改有过火现象时，毛泽东说：你说的情况别的地方也有发生，但我们总的政策是斗倒地主，分田分财，给他出路。大多数地主有活路，不会自杀，也不会反抗。问题是贫雇农受苦受压多少年了，怒火一点着，就难以控制，于是对地主非打即骂。我们应该认真贯彻执行政策，努力说服教育农民。关键是土改工作队的干部，只要他们能执行好政策，就出不了大的偏差。梁漱溟说：四川解放不到两年，能出现这样安定的情势，不容易，变化这么快，出乎我意料。解放前我在四川若干年，那是一个很乱很复杂的地方。四川这一局面的取得，首先得推刘伯承、邓小平治下有方，特别是邓小平年轻、能干，所见所闻，印象深刻。毛泽东说：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9月4日 致信毛禹居、文枚清、张有成〔2〕：“接到枚清、有成二兄的信，想来京一游，我认为可行。如禹居兄有兴趣，亦可同来一游。来者以三兄为限，他人不要来。到京大约可住一个

〔1〕指《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2〕毛禹居，即毛宇居。文枚清，毛泽东的表兄。张有成，毛泽东少年时的朋友，同毛泽东在湖南起义的新军中共过事，大革命时期协助毛泽东开展农民运动，曾掩护毛泽东脱险。

月至两个月，太久则不方便。如三兄同意这几点，即可偕我这里派的同志一道来京。”

同日 发布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令，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和《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院暂行组织条例》、《各级地方人民检察院组织通则》。

9月5日 复信张元济：“八月二十九日惠书敬悉。解放歌〔1〕具见热忱慷慨。建议各事都好，编藏文小册子尤为急需，已告有关机构加力办理。我人藏先遣支队日内可到拉萨，沿途得藏人热烈欢迎，知注并以奉闻。”

9月6日、11日、15日 审阅修改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稿。毛泽东加写的内容主要有：整个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必须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之下。在镇压反革命确实已经达到了彻底程度的县、区、乡及某些市区，即应结束镇压反革命的运动，转入经常的对暗藏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工作。责成专署以上和师以上各级公安机关和保卫机关负责，收集各地反革命分子的暗害案件，加以清理，做出结论，报告中央公安部。

9月7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召开互助合作会议的通知稿。通知说：中央决定于九月二十日在京开会，请东北、华北、西北、中南、华东各中央局及山东分局，并转告河南、河北、山西省委，各派一位熟悉和管理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工作，并足以代表你们意见的同志（例如研究室主任或副主任、充当代表参加会议，并随带有关材料来京。

同日 上午，就教育工作问题打电话给钱俊瑞〔2〕：全国人

〔1〕指张元济写的诗《西藏解放歌》。

〔2〕钱俊瑞，当时任中共教育部党组书记、教育部副部长兼高等教育司司长、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总干事。1952年11月又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

民要我们办广大的教育事业，这是件大事，一定要办好。同意教育部召开的全国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会议〔1〕的精神和所议的办法。这样的专业会议，目的就是了解情况，解决问题。赞成大批派留学生到苏联去学习。在另一次电话中还说，要在三年内派遣一万名留学生去苏联，要注意政治质量。拟一个派遣计划，报中央批准执行。

9月8日 批示胡乔木将中共南京市委关于宗教改革工作的报告印发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委及其管理宗教事务的机关，并于文前加几句介绍的话。**同日**，又批示胡乔木将山东分局宣传部关于一九五一年上半年宣传工作的综合报告印发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委宣传部参考，并在文件加上几句介绍的话。

同日 就荆嗣佑〔2〕的工作安排问题，致信刘道衡：“荆嗣佑一信付上，请察阅。其中所述溆浦乡间对荆不尊重的事，请予查明酌办。荆在辛亥革命后曾当我们学校的英文教员，四十年来他做过些什么事，是否和国民党反动派有过关系，我完全不明了，请你向程颂云、程星龄诸人及沅陵地委问明，并决定是否帮助他在长沙解决工作问题。至于他要求去日本的事，现在没有此种可能。”同时，复信荆嗣佑：“八月二十二日惠书敬悉。所述乡间情

〔1〕教育部于1951年8月27日至9月1日召开第一次全国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会议。

会议讨论了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的现状，并决定今后的发展方针，认为：新中国的教育，必须有完全适合于当前国家情况与需要的制度，坚决为人民的政治、经济事业服务；旧教育的内容（首先是课程）和方法必须坚决改革；学校要真正做到为工农兵开门；经费开支要力求节省，反对铺张浪费；新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必须坚决面向群众、依靠群众。

〔2〕荆嗣佑，曾留学日本，任过李宗仁顾问、湖南省制宪会议主席。当时赋闲在家。后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况，值得注意，已将来信转给中共湖南省委查明办理。先生出外工作一事，也要湖南省委酌情帮助。如先生有兴趣，可与湖南省委统一战线部部长刘道衡先生通讯商酌。”

9月9日 为转发贺诚〔1〕关于全国防疫工作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发至县委一级的指示，指出：“中央认为各级党委对于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的缺乏注意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重大缺点，必须加以改正。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对卫生工作人员必须加以领导和帮助。对卫生工作必须及时加以检查。在经费方面，除中央预算所列者外，应尽其可能在地方上筹出经费。”“要将卫生工作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而决不应该轻视卫生工作”。

9月11日 阅马寅初〔2〕给周恩来的信。信中谈到北京大学汤用彤、张景钺、杨晦、张龙翔等十二位教授响应周恩来关于进行思想改造号召，发起教师政治学习运动〔3〕，并邀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前去演讲。毛泽东批示：“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我不能去。”九月二十九日、十一月十八日，周恩来、彭真分别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举办的报告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有关三大运

〔1〕贺诚，当时任卫生部副部长、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

〔2〕马寅初，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北京大学校长。

〔3〕这个学习运动在北京大学开展起来后，教育部认为这种学习对全国高等学校的教师是必要的，决定先由北京、天津高等学校开始，取得经验，推广全国。同时在教育部下成立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在天津成立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天津总分会，各大学成立学习委员会分会，以统一领导这个学习运动。

动的一些思想问题》的报告。

同日 晚十二时，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发去金、彭复李奇微信〔2〕。复信中说：你九月六日来信，仍然一味抵赖并拒绝处理自八月二十二日以来破坏开城区中立化协议的一连串的挑衅事件。我们现在再一次要求你迅速结束你方这种无休止的破坏协议的行动，负责处理我方所抗议的各次挑衅事件，然后才能使谈判在正常平等的基础上继续进行。否则，你方应对拖延和阻挠谈判的进行及其后果，担负全部责任。

同日 致信宁纯宦〔3〕：“九月六日及以前各信均已收到，甚为感谢。清况甚念，已函王首道主席酌予设法，是否能副尊望，则未敢必，因文物会〔4〕情况，弟不甚明了，兄可就近试为接洽。”

9月12日 阅石景山发电厂党总支书记王自勉、石景山钢铁厂党委先后的来信，信中反映工厂工资制度不合理影响到职工生产积极性，建议进行调整。毛泽东将这两封信批转李富春处理，并分别复信。复王自勉的信写道：“八月二十七日的信看到了，谢谢你使我知道你们厂里的情况和问题。我认为你的建议是有理由的，已令有关机关迅速和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此复，顺祝努力！”复石景山钢铁厂党委的信写道：“八月三十一日的信看到了，谢谢你们使我知道你们厂里的情况和问题。我认为你们的建议是有理由的，已令有关机关迅速和合理地解决这个问题。此复，顺祝努力！”毛泽东还对中央办公厅信访部门延迟了几天送阅这两封来信提出批评，说：“共产党员不为工人阶级办事，还

〔1〕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这封信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3〕宁纯宦，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长沙市新安巷小学校长。

〔4〕指湖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

算什么共产党员？”后来，有关部门经过调查研究，解决了这两个厂反映的问题，并对华北全区各类企业的工资制度也作了合理的调整。

9月13日 就人藏部队当前任务和兵力分布问题，致电邓小平：“我先遣支队已到拉萨，张国华所率部队不久亦可到太昭、拉萨一线。关于这些部队一九五一年的任务是以修筑公路为主，还是以生产粮食解决给养为主的问题，张国华在京时曾对我说应该是筑路而不是生产。张并认为明年一年即可修通甘孜至拉萨公路。但据后来所得情报，明年修通是不可能的，也许需要两年至三年才能修通。似此，如果我军不从事生产，则给养将成严重问题，靠藏政府供给，或靠购买，则对藏民影响不好。因此请你考虑是否可以定为生产与筑路并重，即令甘孜到拉萨沿途所驻部队以一部分担任生产，以一部分担任筑路，在生产季节以较多的人从事生产，在其他季节则以全力筑路。此点在现在就应确定，以便在冬季有所准备。此外，关于兵力分布问题，似应在几个月内，在日喀则和日喀则到拉萨的中间地点各派一部分军队进驻，并在这些地方布置生产，使班禅能回后藏，并便于展开工作。原先决定明年不进驻上述各点的计划似应改变，惟进驻时间可在张国华到拉萨和西藏政府的关系完全弄好之后，即在三四个月之后为适宜。以上望复。”

同日 晨六时，在乔埃十一日正式承认美军飞机扫射中立区事件后，就我方关于中立区与分界线的谈判对策问题，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电报说：（一）乔埃的表示，是敌人已在转弯。我方应掌握主动，提议或同意在开城复会。至于是否需要考虑将会场地址改在板门店，还应看情形发展再定，你们可将板门店本身及周围情况电告。（二）关于保证开城区中立化的

〔1〕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各项具体条款，望你们立即加以研究，务使空中地面、区内区外规定严密，不给敌人以任何可乘之隙。（三）复会后，我们应准备在小组会上主动地提出，双方可将原提议之分界线保留不谈，而各提可以接近并准备对方考虑的新分界线。如对方同意，我们可要他们先提一个方案，我们也准备一个方案。（四）我们现在就应考虑李克农八月二十二日电所提的第三类方案的最后防线，即是说，在什么线上，我们再不能让了。这一点，请金首相考虑见告。

9月15日 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尤金赴青岛招待问题给山东分局、青岛市委的电报稿，加写一段话：“并使他参观几处工厂、农村和学校（如果他有兴趣的话他是一个热忱地帮助我党提高干部理论水平的同志，你们对他的态度，应诚恳朴素。”

9月17日 致电金日成并告李克农：“兹因工作需要，现由边章五同志（二十三兵团副司令员）前往开城接替邓华同志任志愿军第一代表，出席停战谈判会议。”

9月19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及附上代拟的金、彭复李奇微信〔1〕。信中再次建议，双方代表应即恢复在开城的停战谈判，而无需要再去讨论恢复停战谈判的条件。

9月22日 复信黄炎培：“九月十五日大示收到。贵体康复甚慰。最近上海报告一份，可以一阅，阅后请予掷还。其中某些部分带有机密性质，请加注意。”黄炎培来信谈到近期他在大连、沈阳等城市休养、参观的情况。

9月23日 晚七时，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2〕，指出：同意给李奇微的复文应给以正面驳斥，仍应坚持在开城恢复谈判。晚十时半，再电李克农并告金、彭，发去金、彭复李奇

〔1〕这个电报和复李奇微信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微的信。

同日 致电邓子恢：“如果可能的话，希望你偕同小平、贺龙同志一道早日来京。”二十五日，邓子恢复电：“我昨夜始回汉，因要了解一些工作情况，又因家母前日病故，要主持丧事，故拟于过国庆节后去京。可否，请示。”二十五日晚十二时，毛泽东复电：“九月二十五日电悉。(一)向你的病故的老母致哀悼之意；(二)同意你于过国庆节后来京，如能于十月三日到京则甚好。”

9月25日 晨二时，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指出：九月二十四日二十三时电悉。同意你们所提在二十五日双方联络官会议中采取严词拒绝讨论任何有关复会条件的方针，并建议二十六日复会。晚九时半，再复电李克农并告金、彭〔2〕，指出：九月二十五日十五时电悉。对方想把停顿谈判的责任推到我方。你们现在应集中力量证明敌人在破坏停战会议之后，又在使用新的阻挠战术拖延谈判，同时应指示各新闻记者作配合此种揭发的报道。二十六日晨二时，第三次复电李克农并告金、彭〔3〕，指出：九月二十五日二十一时电悉。望仍按我在九月二十五日二十一时三十分电告的措辞于今早答复对方。

同日 关于印发纠正公文中存在的文字表述缺点问题的有关文件，致信刘少奇、周恩来、胡乔木、杨尚昆：“此四件〔4〕，加

〔1〕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审阅后发出。

〔3〕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4〕指中共中央华北局1951年5月10日关于文件、电报的文字缺点及纠正办法的报告，华东局办公厅1951年5月15日关于纠正文件、电报等的文字缺点的综合报告，西南局办公厅1951年6月27日关于检查电报、报告、指示、决定等的文字缺点的报告，东北局办公厅1951年8月10日关于文件、电报等的文字缺点的初步检查报告。

上中央一信〔1〕，共五件，请尚昆印在一起，分送各中央局，并要它们转发各省市区委；同时分发中央和军委各部门负责同志和中央政府各党组。请乔木同志看一遍。刘、周如有时间，可看一下；如无时间，不看也可以。尚昆写的信，自己就没有遵照中央那个指示〔2〕，有许多缺点，我已作了修改，请注意。”

同日 致电饶漱石：“如果可能的话，请你于过国庆节后即动身，于十月三日到京。”

9月29日 “联合国军”在夏季攻势失败后，又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发动秋季攻势。

同日 阅章士钊反映张之洞、段祺瑞〔3〕遗属情况的来信，批示：“请彭真同志查明情形，酌量处理。”并对来信作了几处批注：在来信谈到“曩者传谈偶及前清遗老与北洋军阀皆不是人民敌人，政府可能予以照顾”处，批注：“因时间已久，人民已淡忘了，非谓过去也不是人民的敌人。”在来信谈到段祺瑞“在派系私斗上虽有失德，却无反革命之举”处，批注：“有三一八惨案。”在来信说到段祺瑞“按其征讨复辟、对德宣战以及晚年抗日南下诸节，皆不失为革命荦荦大端”一句中“晚年抗日南下”处，批注：“只此节可取。”在来信谈到段祺瑞所遗吉兆胡同住宅“所谓经敌人购买一节”，“乞公批交有司彻查，加以了解，能不没收最妙，万一不能亦希别筹照顾方式”处，批：“此或可商。”

〔1〕指中共中央1951年9月25日为转发华北局等四单位贯彻执行中央关于纠正文字缺点指示的情况报告给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委等的信。

〔2〕指中共中央1951年2月1日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等的文字缺点的指示。

〔3〕张之洞，清末洋务派首领之一。曾任两广总督、湖广总督。段祺瑞，北洋军阀皖系首领。1912年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被任命为陆军总长。1916年袁世凯死后，曾任国务总理、中华民国临时执政。

同日 复信章乃器：“九月二十四日的信收到了，承转来各件亦均收到，谢谢您。”

9月30日 晚上，举行盛大国庆宴会。应邀出席宴会的有老革命根据地的代表、战斗英雄、劳动模范等一千四百余人，还有各国外交使节等。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林伯渠、周恩来等参加。

9月 一天晚上，请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的周世钊、李思安、蒋竹如等吃饭。其间，毛泽东说：抗美援朝战争所以能够取得胜利，主要由于我们的志愿军机智勇敢，不断想出对付敌人的新办法，坑道战就是新办法之一。现在挖掘了许多层的坑道，敌人想要破坏这些坑道是绝不容易的。一个美国记者说，美国的军队再花三十年也打不到鸭绿江。我看再打二百年，他们也没有希望打到鸭绿江。

10月1日 上午十时，和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林伯渠、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周年庆祝大会，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和群众游行队伍。晚上，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

10月2日 阅刘亚楼、吴法宪、王秉璋九月二十五日关于空军第四师在朝鲜同敌机进行多次空战的情况给中央军委的报告，批示：“刘亚楼同志：此件已阅。空四师奋勇作战，甚好甚慰，你们予以鼓励是正确的。对壮烈牺牲者的家属应予以安慰。”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

10月3日 阅彭德怀关于对朝鲜战争前途的估计和对国内备战工作的建议，批交周恩来研究酌办。同时，复电彭德怀：“国庆节日来电收到，已交有关同志研究酌办。”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经济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说：全力支持战争，克服财

政困难。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出席会议，饶漱石、邓子恢、邓小平、薄一波、李富春、杨尚昆列席会议。

10月4日 晚十时半，就对方企图再次转弯，急切地要我方提出一个在“双方可以平等控制的地方”复会一事，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指出：我方不宜再次拒绝更换地点，而应主动地提出在板门店恢复双方代表团的会议，在板门店复会的各种物质设备和警戒工作，请你们预先筹划。六日晚十二时，给李克农并金日成、彭德怀发去金、彭七日复李奇微信〔2〕。复信中说：我们建议：双方代表团应立即在板门店复会，并在复会后的第一次会议上规定关于扩大中立区范围及保障会场地址安全的原则。八日，李奇微回信同意会址设在板门店，并建议双方联络官于十月十日会晤。九日，金、彭致信李奇微：我们已命令我方联络官于十月十日上午与你方联络官会晤。

同日 致信徐冰：“全汝真的信付上。她是覃理鸣〔3〕的夫人，其子患病，要求照顾。请你派人调查一下，全汝真在政治上是否有问题。如政治上纯洁，对其本人及儿子，似应予以照顾。请酌办。”

10月5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陈云报告财政问题。周恩来报告关于节约兵力、整编队伍，减少机关、精减人员，收缩开支、清查家底，提倡节约、严禁浪费等问题。毛泽东提出，“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刘少奇、朱德、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饶漱石、陈毅、薄一波、邓小平、邓子恢、刘伯承、贺龙、李

〔1〕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金日成、彭德怀复李奇微信，由周恩来起草，经毛泽东审改后发出。

〔3〕覃理鸣，即覃振，字理鸣，早年加入同盟会。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

立三、叶剑英、聂荣臻、王稼祥、习仲勋、粟裕、王震、邓颖超（1）、陈伯达、罗瑞卿、杨尚昆、胡乔木、安子文、李维汉、杨立三、冯文彬、赵尔陆出席会议。

10月6日 对李维汉关于给班禅额尔德尼送礼等事的报告，批示：“送礼及像片题字均照办。吃饭时间，由你处酌定得我同意后办理。”报告提出，将以毛泽东的名义赠给班禅黄缎子袈裟料、砖茶等礼物及毛泽东亲笔题字的照片。

10月7日 复信朱少滨（2）：“九月二十五日惠书并附大作各件，均已收到，感谢先生的好意。”

同日 复信仇鳌：“十月五日惠书收到，甚为感谢。贵体宜于静养，谨祝新寓吉胜！”

同日 复信谭熙春（3）：“九月十四日来信收到。生活困难，甚为系念。毛禹居兄现在此间，待其还乡时，当与一商援助办法。”

10月8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0月10日 复信蒋竹如：“各示均收，甚谢。余盖兄已在湖南学习过，似不必再来京学习。他决来，我也同意。可持此信向校方接洽入学事宜，并请转告余兄，我就不再答复他了。”

同日 复信戴毓本：“九月九日来信收到。大有进步，甚以为慰。我同意彭习梅兄入革大学习，但须他自己下决心。如他决来，可持此信和校方接洽入校事宜。”

同日 复信李思安：“八月十五日来信早收到了，迟复为歉。”

（1）邓颖超，当时任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

（2）朱少滨，训古学家。当时任中山大学教授。

（3）谭熙春，1922年在安源从事工人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在韶山从事农民运动。当时在家务农。

周敦祥〔1〕先生已在湖南学习过，并已担任教育职务，似不必再来北京学习。如她坚决有志要来，我也同意她来，可持此信与校方接洽入学事宜。请你转告敦祥，我就不另复她了。”

同日 复信贺晓明：“九月十四日来信收到，承你告以许多事情，甚为感谢。你家分了土地，生活有了保障，向你祝贺。你在乡耕作甚好，不要来京。”

同日 复信文炳璋〔2〕：“七月五日来信收到，谢谢你。乡里来说，你家生活情况有了一些改善。你可安心在军队工作。”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10月11日 阅聂荣臻十月九日关于从朝鲜战场抽调三十万部队回东北地区以减少前线供应困难问题的报告，批示同意，请周恩来办。

同日 复信雷瀚〔3〕：“看到你十月八日给我的热情的信，甚为高兴。我对你的努力和进步表示庆贺！”

10月12日 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本日起在全国发行。

同日 在韩伯林〔4〕反映北京市住房紧张、房租高的来信上批示：“彭真同志：此事请市委讨论一下，找出解决办法，并给韩伯林工程师一个答复。”

10月1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志愿军党委电：“你们九月

〔1〕周敦祥，新民学会会员。曾任湖南周南女校学生会刊物《女界钟》主编。

〔2〕文炳璋，毛泽东的表侄。当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防空司令部通信连服役。

〔3〕雷瀚，早年留学法国。当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4〕韩伯林，当时任铁道部工程师。

二十日的电报〔1〕早已收到，我们认为你们的总方针是正确的。邓华同志现来北京，中央已将最近关于志愿军战略方针、节约兵力、节约资材、节约经费及两岸迫近敌人可能登陆处筑工事等项决定告诉了他，由他向你们转达。希望你们联系实际规定具体执行办法，争取朝鲜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央对于志愿军全体同志在志愿军党委和彭德怀同志的领导下进行了一个整年的英勇奋斗，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表示欣慰与慰劳。目前的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争取最后胜利。”

同日 复信陈叔通：“十月九日惠示敬悉，谢谢您。看土改事，同意您的意见。惟冬季气候是否适于先生身体，请加考虑，春季去似乎好些，那时还有土改。又先生这样高龄，只宜去看土改，不宜去做土改。并且看可以多走地方，做则限于一区一乡。还有，不单是土改一事，抗美、镇反、生产、教育、统战等项工作都宜在视察之列，如果精力上顾得及的话。有一份关于西北少数民族工作的报告，可以一阅，阅后请予掷还。”

同日 复信熊寿祺“十月七日给我的信及剪报，收到了，很高兴！你现在担任的工作很重要，望加意研究，做出成绩。”

10月16日 看望即将离京回国的尤金。

10月17日 将高岗十月十四日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报告，批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此件请阅，阅后请尚昆印成一个小册子，分送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同时发给中央各部门，中

〔2〕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党委1951年9月20日关于召开扩大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

报告谈到在扩大会议上讨论了第五次战役后部队阻敌的经验教训、整训情况、思想动态和后勤工作，并对持久作战作了具体布置。熊寿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中共红四军军委代理书记。当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央政府各党组，此次到中央会议各同志及到全国委员会〔1〕的各共产党员。”同时，起草中共中央发至地委一级的批语，指出：“中央认为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2〕是正确的。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地区的党委都应研究这个问题，领导农民群众逐步地组成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同时不要轻视和排斥不愿参加这个运动的个体农民。每个省区都要建立生产新式农具的国营工厂，以便农民购用此种农具。省、专区和县都要建立至少一个国营农场，以为示范之用。中央已经起草了一个关于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指示（草案），不久即可发给你们。”

同日 将中共中央西南局十月十日关于组织土改工作团参加土改工作经验的电报，转发给各中央局、分局仿照办理。西南局的经验主要是：一、组织土改工作团，应动员一批高级干部参加。二、对民主人士参加土改，要热烈欢迎、积极帮助，对他们的缺点错误要进行诚恳坦白的适当的批评。三、土改工作团应完全受当地各级机关的领导，并与当地土改工作干部混合配备。四、土改告一段落或土改结束后，召集民主人士座谈经验，并听取他们负责人的意见。

同日 阅聂荣臻关于阻击敌人秋季攻势的战果和拟补充志愿军兵力的计划的报告及周恩来的批示。周恩来的批示是“与节约兵力无碍。妥否，请主席批示”。毛泽东批示：“同意，请周、聂办。”报告说：这次敌人在朝鲜战场发动的秋季攻势，与今年上半年的几次进攻不同。它已由齐头并进的全线进攻，转变为逐段

〔1〕指即将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

〔2〕高岗报告中提出农村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指导方针是：根据群众的自愿与需要，加以积极扶助与发展，并逐步由低级引向较为高级的形式。

推进的局部进攻。最近，我军在阻击作战中战果辉煌，敌人伤亡已达四万五千余人。我军也付出了相当代价。报告提出了补充志愿军兵力的具体计划。

10月18日 晨五时半，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指出：目前我方在联络官会议中的方针，应是迅速促成复会，态度是既不急，也不拖，而要适时地主动地提出双方可以接受的办法，以解决一些枝节上的问题。凡是我们已经准备修改的办法，或非主要的问题，不要在头一天或前一次会上或在新闻报道上说得那样死，那样不可更改，应该为下一步文章留有余地。在敌人方面，自然仍有利用联络官会议以进行拖延和侦察的一面，我们必须坚定沉着，使敌人看不出我们整个意图。从敌人所提出的四次方案看来，也还不完全是不同意复会的，望你们掌握这一情况为要。

10月19日 将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开会词交付打印。二十日，分送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董必武、林伯渠、陈伯达、胡乔木、李维汉征求意见。

10月20日 审阅中央军委给志愿军司令部并告第三兵团、第二十兵团的电报稿。电报说：第二十兵团正面宽，部队伤亡大，敌人仍在猛攻。为加强该兵团之作战、迅速粉碎敌人对金城的进攻，同意彭德怀、陈赓、甘泗淇意见，将第十二军调给第二十兵团，望第十二军迅速出发，参加作战，争取胜利。

10月22日 晨一时，修改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开会词后，批示：“此件再印六份。以五份于十月二十二日上午十二时以前分送刘、周、陈伯达、胡乔木、李维汉五同志，请于下午六时以前批注修改意见，退还给我。另一份直接送我。”修改时加写

〔1〕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一段话：“不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历史时期中，曾经发生过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三个帝国主义国家企图称霸世界的事实，这种事实还是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许多人民民主国家没有成立的时候，但是结果如何呢？难道还没有证明这三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企图不是狂妄的和徒然的吗？难道不是适得其反，想要称霸的帝国主义却得到了被打倒的结果吗？现在的局面完全不同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许多人民民主国家成立了，世界人民的觉悟程度提高了，整个亚洲和北部非洲的民族解放斗争蓬蓬勃勃地起来了，整个帝国主义体系的力量极大地削弱了，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是我们最亲密的盟国苏联的力量大大地增强了。在这种时候，再有帝国主义国家企图重走过去德意日三国侵略者的老路，则其结果不是完全可以料到的吗？”

同日 下午，主持召开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会议决定：（一）以增产节约，继续加强抗美援朝运动为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中心议题；（二）筹备成立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推举陈叔通、李维汉、章乃器邀集有关方面进行研究，陈叔通为召集人。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指出：为不使对方作片面的歪曲宣传，你们应于明（二十三）日发表南日同志复乔埃短信，说明为了不使过去破坏协议事件再行发生以致阻挠谈判的进行，我方代表团受权批准双方联络官业已签订的《关于双方代表团复会事宜的协议》，并同意双方联络官业已取得的五项共同谅解在双方代表团复会日立即生效。复会日期，同意改在二十四日。二十三日晚十一时，再电李克农并告金、彭〔2〕，同

〔1〕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刘少奇审定发出，发后毛泽东阅。

〔2〕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意将复乔埃信中建议复会的日期改为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时。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指出：请于十月二十三日由平壤与北京**同日**发表下列消息：“新华社平壤二十二日电：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决定由边章五将军代替邓华将军为第一谈判代表。朝鲜人民军总部决定由郑斗困将军代替张平山将军为朝鲜人民军谈判代表。”

10月23日 下午三时，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毛泽东致开会词。他说：“在过去的一年中，在我们国家内展开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个大规模的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即将基本肃清。土地改革，除一部分少数民族住居的地区以外，即将于一九五二年全部完成。全中国人民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空前广泛地团结起来，向着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着中国人民的伟大意志，与朝鲜人民军一道，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企图侵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进而侵入中国大陆的狂妄计划”。“我们的国家已经实现了空前未有的统一。西藏问题业已用和平的方法予以解决。国防力量业已增强。人民民主专政业已巩固。而我们的金融和物价则继续保持着稳定，我们的经济建设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的工作，也已前进了一大步。在工业和农业战线上正在发展着的爱国增产运动，是我们国家值得庆贺的新气象。”“在我国的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中，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广泛地开展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这同样是我国值得庆贺的新气象。”“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一切事实都证明：我

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并且必须继续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为了继续坚持这个必要的正义的斗争，我们就需要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因此也就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任务。”“我们的敌人眼光短浅，他们看不到我们这种国内国际伟大团结的力量，他们看不到由外国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永远宣告结束了。”

同日 致信傅种孙〔1〕：“汤先生〔2〕追悼会需表示悼唁。遵嘱为数学杂志写了题名，不知可用否？”

10月24日 致信周恩来：“既然有各民主党派作了演说，抗美援朝决议似乎还是今日通过明天发表为好。”下午，出席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会议通过《关于抗美援朝工作的决议》。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3〕，指出：关于停

〔1〕傅种孙，当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长、《中国数学》杂志总编辑。

〔2〕指汤孟林，字璨真，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毛泽东在湖南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的同学。1951年10月9日去世后，毛泽东曾派秘书田家英到北京师范大学表示悼念。

〔3〕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战线问题，我方在复会后可主动提出，双方可将原提议的分界线保留不谈，而各提一个可以接近并准备对方考虑的新的分界线。如对方同意，便可照你们二十三日来电提出依照现有战线加以调整的方案。照此方案与对方争论的结果，有可能达到在就地停战加以调整的现实基础上划定军事分界线的目的。

同日 《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朝鲜二十三日电讯：一年来，朝中人民军队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胜利战役，随后又粉碎了美国等侵略军的所谓夏季攻势，目前在继续粉碎所谓秋季攻势，取得了重大胜利，收复了朝鲜北部的广大土地，并奠定了最后胜利的巩固基础。一年来，消灭敌军三十八万多，其中包括击毙、击伤、俘虏美国侵略军十七万多，李承晚伪军十九万多；击落、击伤和缴获敌军战斗机、轰炸机、侦察机等二千三百一十架，缴获各种枪支六万余支，击毁和缴获敌军装甲汽车、战车和各种汽车六千多辆，各种火炮三千五百多门等。

同日 复电米丁〔1〕：“来电收到。请原谅我因为工作繁忙，不能写纪念十月革命的论文。请考虑可否发表我在十月二十三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开会词。这篇开会词的英译已令布拉格的新华社分社送至你处。”

10月25日 “联合国军”在其发动的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均遭失败的情况下，重新回到谈判桌上。双方在板门店恢复自八月二十三日中断的谈判，继续进行第二项议程的讨论。

10月26日 晨五时，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2〕，指出：在驳斥对方方案不合理时，应着重说明对方将开城地区划

〔1〕米丁，苏联哲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当时任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社长。

〔2〕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改后发出。

入南缘以南之不合理，同时整个战线尤其是东线（即临津江以东）并未作重大调整，故我方提出的新方案，双方各退出相等的地区使东西两线都得到调整，这是最为合理的办法。

同日 致信刘少奇：“三个文件都看了，均同意。我这两天不大舒服，今天不进城了。请你邀集朱、陈、邓、习、富春、饶、安〔1〕、乔木、尚昆诸同志将三个文件传阅并讨论一次。如今晚来得及，则在今晚，如今晚来不及，则在明天，请酌办。”

同日 复电达赖喇嘛：“你于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四日的来电，已经收到了。我感谢你对实行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努力，并致衷心的祝贺。”

10月28日 下午二时，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出席，李维汉列席。

同日 下午三时，出席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

10月29日 晨五时，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2〕，指出：双方接触线确定后，我方应即主动地提出就地停战，稍加调整的方案。

同日 审阅修改罗瑞卿准备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作的报告稿，拟标题为《关于目前反革命活动的情况和我们的对策》，并加写两段话：（一）“委员们和诸位同志们，我认为有使同志们明了目前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情况，并对这种反革命活动提高警惕的必要，否则我们就要上反革命的当。”（二）“当然，我举出这些材料，不是说反革命活动比较一年前还更严重了，当然不是这样，反革命势力已经受到了我们一个极其严重的打击。但是

〔1〕朱、陈、邓、习、富春、饶、安，指朱德、陈云、邓小平、习仲勋、李富春、饶漱石、安子文。

〔2〕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他们还有残余力量没有肃清，外面还在不断派遣进来，里面的残余分子还可能发酵扩大，并且他们还在作疯狂的活动，危害人民的事业。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如果我们就此住手，不再向反革命作斗争了，那我们就会要上反革命的老当。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提高警惕性，必须继续打击反革命，只要还有反革命分子存在，我们就要彻底消灭他。”

10月30日 下午三时，出席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

10月31日 晨一时半，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指出：同意你们在三十日二时电中所提的我方应于三十一日主动提出就地停战稍加调整的原则的意见。如对方坚持其在十月二十五日提出的方案，我们应在当时或下午会议中予以严正的驳斥，揭露对方反对就地停战、划分军事界线，而仍企图深入我方战线后方的阴谋，逼使对方在我们的方案上达成协议。如果对方坚持以高城、金城以南的突出部分来交换开城区域，我方宁可采用就地停战、各退二公里划分南北界线的单纯就地停战方案，逼使敌人接受，不要纠缠在交换区域的争论中。

11月1日 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闭幕会上讲话，说：“我们的团结是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更亲密，一年比一年更加生气勃勃。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一步一步地形成的，它是一个包括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在内的几万万人的统一战线，它是以工人农民为基础的，它是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它又是采用自我批评方法的，因此，它能够巩固地团结一致，它能够越来越有生气，越来越有力量，它就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

同日 聂荣臻致信毛泽东并刘少奇、周恩来：“为加强华北军区的工作，提议杨成武为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徐向前免兼华北军区副司令员职务。”当天，毛泽东作了两条批示：（一）“征求向前同志同意，如果向前同意的话，可以这样办。”（二）“向前同志：前次见面时，我说可抄一些报给你看。后来我觉得你还是静养，不看电报为好，故未叫机要处抄给你。”六日，罗荣桓、赖传珠、徐立清致信毛泽东，关于杨成武、徐向前的任免问题，“提议仍不变为好”。七日，毛泽东批示：“同意不变动。”

11月3日 中午，同张鼎丞谈话。晚上，同陶铸、王首道谈话。

11月4日 晚上，先后同林彪、邵式平〔1〕谈话。

11月5日 审阅修改关于清理厂矿交通等企业中的反革命分子、整顿工人阶级队伍和民主改革的指示（草案将文件名称改为《中共中央关于清理厂矿交通等企业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在这些企业中开展民主改革的指示》，同时为中央起草关于印发这个指示的通知，要求各地遵照执行。指示阐述了对厂矿、交通企业内的残余反革命势力加以系统的清理，对国营企业内所遗留的旧制度进行民主改革的必要性，并对清理工作的领导、政策界限、防止反革命破坏、保持生产正常秩序，以及后期的制度建设和组织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转发全国民主妇联党组关于第一次妇女儿童福利工作会议的报告的批语稿，加写：“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希望你们注意妇女儿童福利工作。”

同日 下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出席，林彪列席。

〔1〕邵式平，当时任江西省人民政府主席。

11月6日 上午八时，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指出：敌人因已知我方趋向于就地停战各退二公里的原则，故乃抢先提出四点建议，企图吓我一下。为此，我们不应片面强调敌人所说“开城的所有权将由武力而非谈判来决定”这句话，好像怕他进攻开城似的。如果敌人敢于抛开开城中立区向开城以北进行迂回进攻，那就给我们以极好的歼敌机会。此点，请德怀同志予以注意，并进行必要的准备。在谈判上，你们应于明日小组会上主动提出我方对案，内容可以包括下列四点：“（一）关于军事分界线与非军事地区，应根据就地停战各退二公里的原则，予以确定；（二）小组委员会应根据上项原则，校正目前双方前沿接触线，以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并由此线上各退二公里，划为非军事地区；（三）非军事地区的行政管理仍维持现状不变；（四）停战协议全部商定后，双方前沿接触线如有某些出入，届时小组委员会必须根据这些实际变化，作相应的变更。”如对方同意这个建议，我方准备在双方代表团通过这次议程的四点规定后，即提议进入议程第三项的讨论。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主动而敌人难于直接拒绝。

11月7日 晨七时半，复电李克农并金日成、彭德怀〔2〕，指出：关于议程第二项的四点规定，同意来电所提将第三点抽出留待讨论议程第三项时再提。你们应注意，敌人在目前如此无理取闹地阻挠谈判的顺利进行，很大可能想在联合国大会期间至少在圣诞节前保持朝鲜谈判的紧张状态，因此，我们必须在合理的问题上迅速而主动地提出办法，使敌人难于直接拒绝，而对敌人的流氓恫吓和无理要求，则又必须严词驳斥，并配合我前线上

胜利，以打击敌人的拖延政策。

11月9日 批示同意周恩来关于提议粟裕为中央军委第二副总参谋长仍兼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的请示报告。

11月10日 晨七时半，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指出：敌人在最近我军出击中损失甚大，加以军队轮换制不能完全实现，已受其国内外舆论的重大压力。所以他才以调整战线和临时协议两个方案与我纠缠。对此，你们应理直气壮，坚持我方提案，不要无休止地作防御性的解释，愈解释将愈被动，而要采取进攻性的驳斥，指出对方两个方案的无理、荒谬和矛盾，并主动提出如来电所说的新的三项建议及一项附加。

同日 复电达赖喇嘛： “班禅额尔德尼先生人藏事宜，已嘱西北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帮助，一俟准备停当，即可起程。”

11月11日 就志愿军党委对精简节约的部署，复电彭德怀、邓华、陈赓并志愿军党委，指出：“我们认为志愿军党委决定各项是正确的，望即照此施行。如此，你们在朝鲜，我们在国内，一致配合进行大规模的切实可行的精简节约，加上国内的增产运动，明年的一切工作就很好做了，就确有把握完成任务了。我们和敌人进行的谈判能成功固好(成功的可能性较大、即使不成功，我们也确有把握使战争继续打下去，直到争取胜利为止，同时毫不妨碍国内的国防建设和其他建设，各项工作均可蓬蓬勃勃地发展下去了。”

11月12日 审阅修改《中央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草稿)》，批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胡乔木、杨尚昆：“此件经彭真同志起草，并征求各中央局书记意见加以修改，又经陈伯达同志作了一次修改，我看过，可

用。现送请你们审阅，如有意见，请即提出，如无意见，请尚昆再打清样二份，一份连原稿送陈伯达，一份送我，看一遍，即可发出。”这个指示在强调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清除学校中的反动遗迹的重要性后说：必须立即开始准备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于一年至二年内，在所有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中和高中学校以上的学生中，普遍地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的工作，培养干部和积极分子，并在这些基础上，在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中和专科学校以上（即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中，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

11月13日 阅周扬来信〔1〕，批示：“（一）题字照办了，但不要印给别处，因别处的任务不都是在农村。（二）在你动身参加土改的时候，可找一时间一谈，目前没有时间。”

11月14日 致电斯大林〔2〕，通报从十月二十五日朝鲜停战谈判恢复以来的谈判进展情况和中国政府一九五一年财政预算情况及对策。电报说：谈判的中心问题，是确定军事分界线，敌人已从将军事分界线深入到我方战线以内的要求上，退到在签订停战协议时的双方实际接触线上建立军事分界线。我们则主张就地停战，在现时双方接触线上建立军事分界线，到各项议程达成协议时，双方接触如有变化，可作相应的修正。关于遣俘问题，我们反对一对一的原则，而主张有多少遣多少的原则。今年因为

〔1〕周扬在这封信中说，皖北滁县专区文工团的两个小团员写信给他，要他转请毛泽东为他们的文工团题“面向农村”四个字。信中说，目前地方系统的文工团有三百多个，团员在三万以上，他们主要在农村工作。如能为他们题几个字，则对在农村坚持工作的广大的新文艺工作者将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2〕这个电报由周恩来于1951年11月13日起草，毛泽东审改后于11月14日发出。

抗美援朝的关系，中国政府的全年预算已较一九五〇年预算增加了百分之六十，而总预算中百分之三十二均直接用于朝鲜战场，苏联政府给我们的军事贷款还未计算在内。因此，如现在不立即采取紧缩节约方针，则明年预算必更膨胀，财政必受影响，物价必大波动，势必使前方战争打不好，后方建设亦搞不好。故现在我们这样的打法和做法，正是为着在朝鲜谈判中，和固有利，拖亦不怕，而打下去一定能打出一个结果来，国内各项工作均好做，并有把握争取政治和经济的继续稳定和发展。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致张经武的电报稿，加写一段话：“因达赖送礼事〔1〕与你回中央一事有关，但中央认为你暂时应留拉萨帮助国华〔2〕等工作一个时期，何时回来将来再定，因此达赖送礼事亦应缓办。”十六日，就张经武工作安排问题，在李达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张经武数月内应留拉萨，是否长留再考虑，请罗迈〔3〕电知。”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军事问题，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出席，林彪、刘伯承、陈毅、聂荣臻列席。

11月16日 为转发薄一波、刘澜涛关于中共中央华北局扩大会议情况及华北局一九五二年工作计划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所规定的方针是正确的。中央希望各中央局自己，并且指导所属分局及各省市区党委，根据中央的方针和当地的情况仿照华北局那样，都订出一个一九五二年的简单明了的工作计划，电告中

〔1〕指达赖喇嘛准备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赠送礼物。

〔2〕国华，即张国华。

〔3〕罗迈，即李维汉。

央及中央局批准施行，并且希望这种工作大纲的订出不要迟于本年十二月二十日。”华北局一九五二年的工作计划，主要包括抗美援朝，城市工作，农业生产，精简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反对贪污，镇压反革命，整党、建党、整风，培养干部、办好党校，加强人民代表会议，宣传教育和统一战线等十项工作。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宣传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党组关于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给中央的报告，批示胡乔木：“此件（1）很好，可照此实行。惟赖若愚调总工会为秘书长，陶鲁笳是否能调出待考虑，江青是否适宜做处长也值得再考虑一下。”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彭德怀：“你的气喘加重应及时注意，现派医生及护士各一人去你处，并同时派伍修权、柯柏年（2）两同志前往帮助你们工作一时期。”

11月17日 为转发中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党组关于交通部党组对团结民主人士问题检讨报告的通报，批示：“周：此件转发给中财委系统以外的各部门党组研究。对那些问题严重的部，如内务部，要他们照交通部党组办法写出检讨申明书。”财经委员会党组通报说：根据交通部经验，与民主人士和其他党外人士要合作好，必须做到：（一）要使党外人士有职有权得到不折不扣的实现；（二）一切重要决定，应有党外的部长、副部长参加决定；（三）有些日常处理的重要事情和上级的指示、下级的报告，均应使职权范围内的党外人士看到；（四）人事问题应与党外人士商酌，党外人士举荐的人，能用者应尽量录用。

（1）指中共中央宣传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党组 1951 年 11 月 15 日关于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给中央的报告。其中提到拟调陶鲁笳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政治教育处处长、文化教育委员会干部教育局局长；拟任江青为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

（2）何柏年，当时任外交部美洲澳洲司司长。

11月18日 阅中共河北省委党校阴一刚、罗云路的来信，他们对一九五一年七月《中央关于工人阶级和半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问题的解释》〔1〕提出质疑，希望毛泽东给予答复和指示。毛泽东批示：“送刘少奇、胡乔木、安子文同志阅，请安子文同志提出意见和处理办法。”在安子文提出对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提法应予修改的意见后，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致信在杭州休养的刘少奇：“据安子文、胡乔木等同志说，像河北党校阴一刚等来信那样表示不同意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2〕的人，尚有许多，许多地方整党中都提出了这个问题，而这种提议是有理由的，现在不能不改正整党决议草案中的那种提法。此事现已陷于被动，只有改正才能恢复主动。现将电文〔3〕一件，安子文报告一件，河北党校阴一刚等来信一件，送你审阅，征求你的意见，请予示复，并交来人带回为盼。”十九日，刘少奇复信表示同意改正整党决议草案的提法。二十三日，毛泽东致信周恩来、朱德、陈云、安子文、胡乔木、杨尚昆：“此问题曾去信征求刘

〔1〕1951年三四月间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根据刘少奇报告起草的《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草案）》中，提到“中国革命在过去是城市工人阶级和乡村半工人阶级领导的，在今后更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1951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工人阶级与半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问题的解释》中，将这句话改为“中国革命在过去是城市 和乡村的工人阶级与半工人阶级领导的”。

〔2〕关于工人阶级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中历来是明确的，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提法，只在建国前后的个别文件中出现过。1948年2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时曾经使用过这一提法，说“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贫农）为人民民主革命和新民主国家政权的领导阶级，而无产阶级则是主要的领导阶级”。

〔3〕指准备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中国革命领导阶级问题的修正指示》。

少奇同志意见，现得回信，请阅。我又在电文上作了一些修改(1)，并觉得宜将阴、罗二同志的信及安子文的信连同中央电报印发各地，才能将此问题弄清楚，并使中央在此问题上取得主动。如同意，请尚昆办。”随后，中央正式发出《关于中国革命领导阶级问题的修正指示》，指出：“关于中国革命的领导问题，无论过去或今后，均应只提是工人阶级（通过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不应再把半工人阶级包括在内。”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2〕，指出：对方在我军事压力及其国内外要和的压力下，已提出与我接近的方案，我们应准备在这项议程上与对方达成协议，但今日小组会上还不忙提出我方修正案。晚十二时，再致电李克农并告金、彭〔3〕：为了取得时间考虑修正案及三、四两项议程的内容，望你们于十九日晨以电话通知对方，提议小组会停开两天，到二十一日再行复会。

同日 复信李介侯：“十月十五日来信收到。汤臻真兄家属善后事，已与师范大学当局商妥，予以照顾。”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

11月19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4〕，原则上

(1)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中国革命领导阶级问题的修正指示》草稿的修改主要有两处。（一）将指示稿中叙述党的文件中几次提到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时，说半工人阶级也是“包括在内的”之后的一句话改写为“过去的这种提法，中央认为是不适当的，而河北省党校阴一刚、罗云路二同志的意见则是正确的”。（二）在指示稿的末尾，毛泽东加写一句话：“随电并将安子文同志为此问题向毛主席所作报告一件，河北省党校阴一刚、罗云路二同志向中央来信一件发给你们，可在党内刊物上发表。”

(2)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3)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刘少奇审定发出，发后毛泽东阅。

(4)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同意对方提出的关于军事分界线的四项建议，并发去我方对四项建议的修正案和谈判第三项议程（关于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时我方的五项原则建议。同时提出在谈判第四项议程时，应反对敌人所提一对一换俘的原则，而坚持我们有多少送多少即全部换俘的原则。

11月20日 为转发高岗十一月一日《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发至省级党政军组织和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党组的批语：

“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请你们重视这个报告中所述的各项经验，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在展开这个运动和这些斗争之后，每一部门都要派出必要的检查组检查所属的情况，总结经验，向上级和中央作报告。”

同日 审阅刘亚楼、吴法宪、王秉璋十一月十九日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参战问题的请示报告，批示：“亚楼同志：意见很对。必须迅速组织新部队参战，越快越好。”

同日 晚上，会见章士钊。

11月21日 为转发中共河北省委十一月十三日关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发至地委的批语：“河北省委这个报告很好，请你们加以研究，吸取其中有益的经验在各省推广施行。此件并可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中央希望看到各省省委都有一个关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专题报告。”报告说：今年的农业生产，贯彻了“生产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的方针，紧紧掌握了以下几个环节：（一）加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深入贯彻发展生产的政策。（二）战胜自然灾害。（三）加强对合作互助的领导。按照不同的生产情况，发展各种合作互助组织。（四）改进农业技术。

同日 就李醒安〔1〕来信要求在学习上给予照顾一事，致信王首道：“请酌予此人以生活上的照顾。据周世钊校长说，此人一生办教育（曾在第一师范当过教员），似无劣迹。”一九五二年三月，李醒安任湖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

11月22日 致信李维汉：“周世钊兄等数人（又陈奎生〔2〕兄亦想参加），于革大毕业后，想去沈阳、大连、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处参观学校教育，并经浙赣路返湘。我认为可行，如你也同意的话，请为他们办理旅行手续。”

11月23日 朝鲜停战谈判小组委员会双方代表，对于第二项议程“作为在朝鲜停止敌对行为的基本条件，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地区”，正式达成协议。二十七日，协议经过双方代表团会议通过。至此，双方在实质性问题取得第一个协议。

同日 晚上，同罗荣桓、萧华谈话。

11月25日 为转发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一九五二年全国农业生产计划，起草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各分局、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批语：“中央批准这个计划，你们可根据这个计划的方向规定自己的实施计划。此外政务院还将发表有关农业方面的适当文件。”

同日 就朝鲜停战谈判会议的第三、第四项议程问题，两次致电李克农并金日成、彭德怀〔3〕。关于第三项议程，电报指出，不管我方提得如何周密，对方都会提出许多不同的或修正的意

〔1〕李醒安，原名李廉翹，1915年至1920年曾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体育教师，长期从事教育工作。

〔2〕陈奎生，1921年起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楚怡中学、明德中学等校任教，1932年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

〔3〕这两个电报均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见，因此，除我方应抢先提出者外，有些问题可待对方提出意见后，我方再提对策较为有利。关于第四项议程遣俘问题，电报指出，我方应反对一对一的交换办法，而坚持有多少就遣送多少的原则，并同时要求南朝鲜应将掳去的北朝鲜人民放还。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朱德、周恩来、彭真出席，林彪、薄一波、王稼祥、胡乔木、李维汉、罗贵波〔1〕列席。

11月26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决定在文艺干部中进行整风学习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指出：“请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区党委自己和当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负责同志都注意研究这个报告，仿照北京的办法在当地文学艺术界开展一个有准备的有目的的整风学习运动，发动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文艺干部中的错误思想，发扬正确思想，整顿文艺工作，使文艺工作向着健全的方向发展。为使这一整风运动获得良好的结果，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区党委的负责同志和宣传部负责同志必须亲手抓紧对文艺界整风运动的领导，先将你们的计划报告中央和中央宣传部批准。”

11月27日 致信薄一波：“总预算及收入、支出两方面的说明文件，请于修正完成后，印成一本，于二十八日开会〔2〕前印好（印十余份），二十八日下午交我为盼。”

11月30日 为转发邓小平十一月二十五日关于西南区党政军三个会议〔3〕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批语，指出：报告中

〔1〕罗贵波，当时任中共中央驻越共中央联络代表，中国驻越南军事顾问团团长、总顾问。

〔2〕指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后改在1951年11月30日召开。

〔3〕指1951年11月先后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和西南军区第一次党代表会议。

“第三项所提反贪污、反浪费一事实是全党一件大事，自从东北局揭露大批的贪污犯以后，我们已告诉你们严重地注意此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第三书记刘澜涛十一月二十九日关于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调查处理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

“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兹将华北局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给中央的报告发给你们研究，望你们注意发现所属的同类事件而及时加以惩处。”华北局的报告说：刘青山、张子善先后动用全专区地方粮折款二十五亿元、宝坻县救济粮折款四亿元、干部家属补助粮折款一亿四千万元；从修潮白河的民工供应站中，苛剥获利二十二亿元；贪污修飞机场节余款和发给群众房地补价款合计四十五亿元；冒充修建名义向银行骗取贷款四十亿元。总计贪污挪用公款二百亿元左右投入地委机关生产，作投机倒把的违法活动。刘、张日常生活铺张浪费，任意挥霍。张为消灭证据，曾亲手焚毁约计一亿五千万元的单据和其他单据一百七十八张。根据其所犯错误和罪状，经华北局讨论，

总理批准，决定将张子善逮捕法办，刘青山归国后亦予逮捕。(1)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朱德、周恩来、彭真出席，林彪、李富春、薄一波、刘澜涛列席。

11月 为贵州大学题写校名。为湖南农学院题写院名。

12月1日 就要求补报重大贪污犯的处理情况一事，起草中共中央致薄一波、刘澜涛电，指出：“你们十一月二十九日关于华北方面发现的贪污事件的报告收到了。在这个报告中没有说到对于那些重大贪污犯，党和政府是如何处理的，请你们将处理的情况补告我们。”八日，华北局向中央提交补充报告。

同日 为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起草中央给中央和军委各部门首长，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并转各省市区委，各大军区并转各省军区党委，志愿军党委的通知，要求他们遵照执行，并在一定范围内组织阅读和传达。毛泽东对决定草案作了三次修改，加写和大部改写的内容主要有：

“一九五二年是我们三年准备工作的最后一年。从一九五三年起，我们就要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了，准备以二十年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完成工业化当然不只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一切必要的轻工业都应建设起来。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社会化。但是首先重要并能带动轻工业和农业向前发展的是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为了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就要付出很多的资金，而资金的来源只有增产节约一条康庄大

(1) 张子善，曾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天津专区专员。刘青山，曾任中洪天津地委书记、石家庄市委第一副书记。1951年11月、12月，张子善、刘青山先后被捕。1952年2月，刘青山、张子善被河北省人民法院临时法庭判处死刑。

道，这是应为全党同志所明白了解的。因此，中央于一九五一年十月召开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决定了这一方针；并于**同月**至十一月一日经过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通过了这一方针。”“它是带动我们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全局都将迅速进步、并奠定将来伟大建设基础的方针。”“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现在必须向全党提出警告：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员，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中央人民政府不久将颁布惩治贪污的条例和惩治浪费的条例，各级领导机关必须仿照实行惩治反革命条例那样，大张旗鼓地发动一切工作人员和有关的群众进行学习，号召坦白和检举，并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督促和检查。一切贪污行为必须揭发，按其情节轻重，给以程度不等的处理，从警告、调职、撤职、开除党籍、判处各种徒刑、直至枪决。”“浪费和贪污在性质上虽有若干不同，但浪费的损失大于贪污，其结果又常与侵吞、盗窃和骗取国家财物或收受他人贿赂的行为相接近。故严惩浪费，必须与严惩贪污同时进行。浪费的范围极广，项目极多，又是一个普遍的严重现象，故须着重地进行斗争，并须定出惩治办法。”“反贪污斗争和反浪费斗争的开展和深入，必将接触到各方面存在着的各种程度的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工作作风。这种作风，是贪污和浪费现象所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中央要求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在此次精兵简政的工作中，在展开全国规模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中，在进行反对贪污和反对浪费的斗争中，同时展开一个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为着有力地彻底地消

灭贪污现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现象，必须奖励那些不贪污、不浪费和毫无官僚主义习气的模范的单位和人物，从这些单位和人物与那些贪污者、浪费者和官僚主义者之间划出明显的界线来。”

“为使本决定的基本方针和各项办法能充分见之实行，必须不厌求详地向干部进行解释，使他们明确地认识全局的情况和任务的重要性。”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中南局扩大会议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的计划，并起草中央批语将中南局的计划转发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委参考。中南局扩大会议提出的计划是：（一）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的指示；（二）土改还是全区工作的中心；（三）进行民主改革；（四）目前省以下领导精力，还是首先集中于乡村工作。

12月2日 就朝鲜停战谈判讨论第三项议程的有关问题，两次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前一电报指出：在二日会议上，同意你们继续反对对方控制我方海岛及限制军事设备的无理，并着重说明这是一个停战协定，双方只应保证不从朝鲜境外在任何借口之下进入军事力量、武器和弹药，并从对方后方的沿海岛屿和海面撤走一切武装力量，使朝鲜停战局面得以稳定，以利双方高一级的政治会议的迅速进行。至于限制双方军事设备，并进行自由视察，那是干涉对方内政，且涉及政治性的问题，这是超过军事停战的范围，我方绝对不能同意。后一电报指出：在三日会议上，可在我方原建议五条外提出如下两条补充建议：“第六，为保证军事停战的稳定，以利双方高一级的政治会议的进行，双方应保证不从朝鲜境外以任何借口进入任何军事力量、武器和弹药。第七，为监督第六条规定的严格实施，双方同

〔1〕这两个电报均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意邀请在朝鲜战争中的中立国家的代表成立监察机构，负责到非军事区以外的双方同意的后方口岸，进行必要的视察，并向双方停战委员会提出关于视察结果的报告。”“如对方拒绝我方补充建议，仍要求由双方作自由视察，应予坚决反对”。

12月3日 上午，会见陈叔通。**同日**，致信郑振铎〔1〕：“有姚虞琴〔2〕先生经陈叔通先生转赠给我一件王船山手迹〔3〕，据云此种手迹甚为稀有。今送至兄处，请为保存为盼！”

同日 审阅修改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部队整编工作的政治指示》稿，批示：“照办。除发军队外，同时发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指示说：“为了继续争取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为了保卫祖国的和平建设和东方与世界的持久和平，我们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建设强大的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为了完成这个任务，第一，必须建设国防工业和其他工业，而为了发展工业就要发展农业，并训练大批从事工业和农业的干部；〔4〕第二，建设强大的空军、海军、装甲兵、炮兵及各种技术兵种；第三，整训民兵，准备实行义务兵役制；第四，统一编制，适应高度集中性、组织性的需要；第五，抽出大批干部，实行轮流入学，提高文化与军事科学知识，培养大批掌握新技术的人才。”在指示的末尾，毛泽东加写：“本指示同时发给地方党委阅看，以利配合。”

12月4日 起草中共中央批语，将华北局关于把领导的重点放在工业生产上来的决定和关于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

〔1〕郑振铎，当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华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常委。

〔2〕姚虞琴，画家。1953年任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

〔3〕指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世称船山先生）的《双鹤瑞舞赋》。

〔4〕第一条是毛泽东加写的。

转发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委参考。

同日 复信董必武：“我认为你给饶漱石同志的信〔1〕的内容是正确的，可以抄发华东以外各中央局负责同志一阅，促其注意这件事。可以连同你此信〔2〕和我答复你的几句话，一起抄发。”

同日 晚上，为转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展开反贪污斗争的报告，起草中央指示。指示指出：“中央批准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四日晨北京市委关于北京市工作人员的贪污现象及今后展开反贪污斗争的意见的报告，认为这个报告是完全正确的。”“中央责成你们在接到本指示三星期内，至迟在一个月內，有计划地初步地检查自己单位和所属下一级各单位工作人员的贪污现象，仿照北京市委所订各项办法，发动党内外最广大群众（包括各民主党派及社会民主人士），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检查和惩治贪污人员。”“中央责成你们大体上仿照北京市委的报告样式，在收到本指示后一个月內，向中央作第一次关于检查和惩治贪污人员的报告。所有中央和军委各部门，均分别向中央和军委作报告；所有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各分局、各省委、各市委、各区党委、各地委、各县委，均按级向中央及其上级作报告。……凡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凡推迟报告时间者，须申明理由。”

〔1〕指董必武1951年10月18日关于乡村政权建设问题给饶漱石的信。信中说：加强下级政权机关的工作，可以而且应该由上级政权机关领导着去做；各级党委对各级政权机关的领导，应经过在政权机关中工作的党员来实现，其中如有党员3人以上，应组成党组以保证党的领导，党直接做政权机关的工作是不好的。

〔2〕指董必武1951年12月3日关于政权建设问题给毛泽东的信。信中对给饶漱石写信的背景情况作了说明，并对县、乡政权建设问题提出3点意见：（一）下级政权机关的建立，党应经过上级政权机关领导着去做比较好些；（二）县、乡两级建政工作，目前县级建政是关键；（三）县、乡建政是一件大事，在组织上和思想上都要有充分的准备。

12月5日 为转发中共贸易部党组关于大张旗鼓地反贪污的报告，起草中央指示，指出：“中央批准中央贸易部党组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四日关于发动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民主人士）大张旗鼓地公开地反对贪污现象和惩治贪污人员的报告，认为这一报告是完全正确的。”“请你们遵照中央十二月四日二十时的指示，参照北京市委和中央贸易部党组的分析和办法，迅速订出自己的反贪污计划，并开始着手发动这一斗争。各地党委应统一布置这一斗争，使政府系统（重点在财经部门及总务人员）、军事系统（重点在后勤部门）、党派团体系统都同时动作起来。”

同日 为转发装甲兵司令部十二月二日关于精简节约工作的报告，起草给中共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各大军区等的批语。批语指出：“（一）这是我们所收到的军事方面的第一个精简节约的报告，特转发你们参考。（二）反贪污应和精简节约及反对浪费分开来做，须作全面的调查分析，号召坦白和检举，才能彻底暴露一切贪污人员而加以分别的处理。装司这个报告着重在精简节约和反对浪费方面，并且还只是部分的开始，但已很有意义，使人高兴。（三）望全军立即展开这一斗争，发动全体指战员，进行（甲）精简节约，反对浪费，（乙）反对贪污，并将这二者既分开而又联系起来。（四）一切军事部门均应向军委作报告。”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周恩来介绍中央军委的《军事整编计划（草案）》。会议讨论通过：（一）中央复员委员会（1），主任周恩来，副主任林彪、李富春等；（二）中共中央节约委员会，书记薄一波；（三）中央党派团体节

（1）1951年12月7日，中共中央决定将各级复员委员会改名为转业建设委员会，以统一领导全军转业建设工作。

约委员会，主任朱德，副主任安子文、杨尚昆；（四）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副主任彭真、沈钧儒等。朱德、彭真出席会议，薄一波、李富春、林彪、聂荣臻、李维汉列席会议。

12月7日 将外交部情报司摘报的美国《纽约时报》、《新闻周刊》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刊登的关于朝鲜停战谈判交换战俘问题的三条新闻，批送周恩来阅，指出：“美国人宣布被俘的仅一七四人，其余一万多人列为‘失踪’的，他们没有理由向我们索取每一个‘失踪’的人。”对《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一条新闻中说的“有人建议做这样一笔交易来解决停战监督和俘虏交换问题，即美国放弃视察的要求，共方则交出所俘的联军。为了换取落在共方手中的美国兵，联军准备冒一下共方阴谋集结兵力的危险”，批注：“这一点亦可注意。”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指出：敌人在其国务院和国防部相互间矛盾的影响下，停战谈判拖的可能性又增长了，但仔细研究敌人这次提出的八项建议，比其以前七项建议和四项原则，不能说是倒退了，是带有暗示让步和讨价还价性质的，同时也还夹着对中立国视察的戒心。为要达到敌人从沿海岛屿和海面撤走的目的，我们更应坚决反对敌人有关轮换和补充的要求。在这一点上，敌人的道理很弱。在谈判和宣传上，你们应抓住这一点。

12月8日 阅中共福建省委询问北京市委十二月四日关于反贪污斗争的报告和中央的指示可否印发至县委的来电，为中央起草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进行的指示。指示说：“应当发至县委，军队则发至团党委，并且应当在党内刊物上登

〔1〕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发后毛泽东等阅。

载，使更多的同志看到，使科长级以上的党员都能看到。”“所有地方县委以上均应向中央作报告，军队团级以上均应向军委作报告，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1）才能解决问题。”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东局一九五二年工作纲要，起草中央批语，指出：“将这个工作纲要发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请加研究和参考，中央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完备的工作纲要。”华东局的工作纲要包括十个部分：抗美援朝；增产节约，禁止浪费，严惩贪污，反对官僚主义；城市工作；土地改革及土地改革后的农村工作；建政工作；整党建党工作；展开思想改造运动；镇压反革命工作；统战工作；青年和妇女工作。

同日 上午九时，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2〕，指示我方代表在这两天中，应将限制军事设备、自由视察、从岛屿撤走、轮换和补充、中立国监督五个问题联系在一起与敌人谈判。晚八时，再致电李克农并告金、彭〔3〕，指出：如在轮换和补充问题上对敌人作有限度让步，以交换敌人从我方的岛屿撤走

（1）1952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批转安子文《关于结束“三反”运动和处理遗留问题的报告》中说：在“三反”运动中，“经中央和大行政区批准判处死刑的四十二人（内有杀人犯五人），死刑缓刑九人，共计五十一人”。

（2）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3）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并承认我方关于中立国监督机构视察双方同意的后方口岸的六、七两条建议，则我方在视察双方空军口岸上可不再让步。

12月9日 为转发罗瑞卿关于在公安部及整个公安系统开展“三反”斗争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批语。批语指出：“请各级党委严格指导各级公安机关，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公开地开展这一斗争。”“中央已决定：党中央各部门、军委各部门和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的党组织，一律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审查党的工作，发扬成绩，纠正错误，扶持正气，打倒邪气，并选举党委会。在目前时期，关于纠正错误、打击邪气方面，应着重于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自我们占领城市以来，快三年了，大多数部门还没有召开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现应一律在短期内召开完毕。然后由党政军三大单位分别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此种代表大会亦规定在中央直属总党委领导之下，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党中央直属党代表大会已于今年五月开过），任务同前。各大行政区一级、省市区一级和专区一级的直属党组织，亦应照此办理，请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督促进行。”

12月10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指出：你们在今明两日会议中，应指明限制双方设备和自由视察的要求是干涉内政，对方必须收回，我方沿海岛屿，对方必须撤走，双方后方口岸的视察，只能邀请中立国担任。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出席，李富春、薄一波、林彪列席。

12月11日 为转发中共邮电部党组十二月七日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指出：“因邮电事业普及全国，

〔1〕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贪污问题又很严重，故应将此件转发县委，提起大家注意。”

同日 为转发中共铁道部党组十二月七日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指出：“这个报告写得比较好，值得研究。”“请你们向所属各单位，亦用限期要报告的方法，推动这个斗争向前发展。”

同日 为转发华北军区后勤部党委十二月八日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起草批语，指出：“军事系统各部门，特别是后勤部门，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情况极为严重。很多党员，甚至负责干部，沉埋于事务工作，政治思想极不发展，党内生活极不健全，因此许多人陷入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泥坑，许多人本位主义极为浓厚，只顾小局，不顾大局。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必须在整个军事系统，特别着重在后勤部门，展开整党整风，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严重斗争，并号召一切指战员参加这个斗争。”

同日 为转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在部队实施政治和文化教育等工作的报告，起草给军委各部门、各大军区并转各级军区，并告志愿军、各中共中央局的批语，指出：“在推行整党并实行政治教育的同时，在一九五二年的头几个月，应按各部门和各军区情况，规定一段时间，在全军，仿照镇压反革命的方式，大张旗鼓，发动群众，展开一个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严重斗争，分别轻重，惩治或批判一切犯有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罪行或错误的人员，并一定要获得结果。”

同日 致信毛泽连、毛远悌：“慰生六婶〔1〕及泽连均不要来京，也不宜在长沙住得太久，诊病完了即回韶山为好。现在人民政府决定精简节约，强调反对浪费，故不要来京，也不要来长沙

〔1〕指毛泽连的母亲。

住得太久。泽连家境困难，待将来再设法略作帮助，目前不要靠
望。远悌在印厂工作，可在工作余暇进行学习。请你们代我问六
婶好！”

12月12日 复电西南军区党委并告各大军区及各中共中央
局，指出西南军区党代表会议的决议是正确的，要他们从发现浪
费现象，去发现贪污现象。复电提出：“注意资产阶级和旧统治
阶级腐化我党我军的严重危险性，迅速布置一个大张旗鼓的吸引
广大群众参加的（一定要有民主人士参加）反贪污斗争，并以所
得经验见告。”

同日 复电西北各族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全体代表：“感
谢你们给我的电报。过去一年多以来，西北区各族人民在抗美援
朝的爱国斗争中，作了很大的努力，得到了很大的成绩。你们的
这次代表会议，决定进一步团结各族人民，增加生产，厉行节约，
开展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很
好的。帝国主义过去敢于欺负中国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各民族不
团结，但是这个时代已经永远过去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
那一天起，中国各民族就开始团结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足以
战胜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且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繁荣强盛
的国家。祝你们的会议成功！”

12月13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开展“三反”斗争
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要求各中央局及各省市区竞委仿照华北
局的办法，统一布置“三反”斗争。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中南局十二月十日关于土改工作的报
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批语指出：“中
央认为，在目前这种时机，在全国各新区的土地改革大约已完成
了一半、但尚有一半必须集中大力去做才能完成（已分配完毕者
尚有复查问题），如果只顾赶急图快，就有流于形式不能切

实解决问题的危险的这种时机，中南局同志们提出这一分析，是适时的和完全必要的。请各中央局和各省区党委不要因为中央提出依土改完成情况适时地转移省级以上的主要领导方向到城市和工业方面的方针，而放松了对于一九五二年土改工作的领导，如果这样做，那就会犯错误。中央指出：关于农村和城市、土改和工业的领导上注意力的分配和领导重点的转移问题具体解决，请各中央局、各省委区党委精密地掌握着，不要分配不适当和转移不按时。”

同日 为转发习仲勋十二月十一日关于分析西北贪污现象和准备立即开展反贪污斗争的报告，起草给习仲勋并告各中共中央局负责人和彭德怀的批语。批语说：“我认为你的分析、布置和其他意见，都是正确的。你于十二月八日召开的那次座谈会开得极好。只开一天会，已使你了解情况，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以后动员群众，开展斗争，即将迎刃而解。发现贪污问题的严重性和大规模地惩治贪污分子，从东北开始，是由高岗同志亲自动手的。中央方面委托薄一波同志负总责，北京市由彭真同志负责，现已全体动起来了。请各负责同志注意此种经验。我们大家都很忙，但对此事只须抽出几天时间，专心致志加以调查研究（要有人和钱的数目字，即使是估计的数字也好、弄出头绪，写一个指令，开一个干部动员大会，斗争就可以展开，以后继续推动斗争向前发展，就很容易办了。”

同日 阅外交部为转发张闻天关于中国驻东欧国家各使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处理意见的报告给中国驻苏联和东欧各国使馆的电报，批示外交部：“这个文件看过，很好，照发。这个文件在我这里压了近一个月，这是我的不对，但你们不催也有责任，近几日还是因为你们催，我才从积压的文件堆中清出来看了。因为伍修权同志起草此件的时间是十一月三日，文中‘最近将有统

一使馆组织机构的规定发出’，如果这种‘规定’已经发出，就须加以字面的修改。”

同日 复电准备由青海玉树返回西藏日喀则地区的班禅额尔德尼：“感谢你的来电。我完全同意你的这种志愿，即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与达赖喇嘛紧密团结，为彻底实行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驱除帝国主义在西藏的影响，巩固国防和建设新西藏而奋斗。并祝你顺利地到达目的地。”十二月十九日，班禅额尔德尼及其行辕全体人员自青海玉树启程，于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抵达拉萨。

同日 批示同意萧劲光报送的海军今后五年建设计划（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就海军一九五二年订货问题致电斯大林，电报说：“由于这个时期，国家财政主要用于支援朝鲜战事，因之对建设海军经费极为有限。在此情形下，我们原订之海军三年建设计划，拟改为自一九五二年起至一九五六年止的五年建设计划。”“请您考虑可否将若干种舰艇蓝图转交我们，并在中国尚不能解决主要造船材料时，供给我们以主要机器和武器，并派出造船专家帮助我们制造。”

12月14日 为转发高岗关于在工矿企业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省市区委、政府工业部门党组和工会党组的批语，指出：“根据这个报告，东北单是国营公营工业部门，在一九五一年，截至十月底止，除完成原有生产计划之外，就为国家创造了价值一千多万吨粮食的财富，这是因为我们的工作深入了车间得来的，因而也就改善了工人的生活。这种经验应在全国一切工矿企业中传播，并按自己的条件适当地仿照实行。”

同日 复信杨立三：“十二月十三日来信收到。我很赞同你的这种态度，对自己在所任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作全面的检讨；

同时要对整个后勤工作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当然要正确地肯定成绩。这样，你就有了主动。这样做，可以引起别的同志也都进行自我检讨和相互检讨，别的同志也就有了主动，就可推动整个后勤工作的改革。据我所知，我军整个后勤系统长期缺乏这种民主的自我检讨和相互检讨，以致政治空气极不浓厚；党的生活极不健全；许多领导同志胸襟狭隘，思想不开展，作风不民主，只顾小局，不顾大局；后勤系统中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极端严重，这种严重性至少不下于政府的财经系统和公安系统。所有这一切，均应以这次后勤会议为开端，彻底地进行批判和改革。因此，我很赞成你在来信中所取的态度，我看了你的信甚为高兴。如果你同意的话，请将你给我的信和我这封复信，一起印发给此次后勤会议到会的同志们阅看。印出来之后，同时发给我一份。”

同日 批示同意许光达、聂鹤亭〔1〕关于准备建一所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专门技术干部学校的请示报告。

12月15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并起草中央通知。同时批送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伯达、彭真、胡乔木阅，请杨尚昆印发各中央局并请他们转发下去。通知说：（一）兹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一件发给你们，请印发到县委和区委。请即照此草案在党内外进行解释，并组织实行。这是在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都要解释和实行的，请你们当作一件大事去做。这个决议草案可以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但不要在党外报刊上发表，因为还是草案。

（二）这个草案比十月间发给一些同志带回去的草案有了一些修改，请将十月草案收回作废。”毛泽东修改决议草案时加写了一些话：一、决议草案说，要克服农民在分散经营中的困难，

〔1〕聂鹤亭，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副司令员。

使广大农民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就必须提倡组织起来。毛泽东在“丰衣足食的道路”之后，加写：“要使国家得到比现在多得多的商品粮食及其他工业原料，同时也就是提高农民的购买力，使国家的工业品得到广大的市场。”二、决议草案说“必须在农村中提出爱国的口号，使农民的生产和国家的要求结合起来”。在这句话之后，毛泽东加写：“片面地提出‘发家致富’的口号，是错误的。”三、在决议草案说国营农场应该推广，每县至少有一个至两个国营农场这一段话的末尾，毛泽东加写：“在农民完全同意并有机器条件的地方，亦可试办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例如每省有一个至几个，以便取得经验，并为农民示范。”

同日 为转发志愿军党委关于精简节约、反对贪污浪费的指示，起草中共中央发至省市区党委、各级军区并告志愿军党委的批语。批语说：“今天接到志愿军党委十二月十四日关于精简节约、反对贪污浪费给所属党委的指示，中央极为高兴，特转发你们参考。志愿军在前线作战，尚且应该和能够精简节约，我全国党政军处在和平环境，当然更加应该和更加能够大量地彻底地实行精简节约。志愿军准备节约的许多项目，你们应当参照施行。”

同日为转发陈毅十二月十二日关于华东军区开展精简节约、反对贪污浪费的报告，起草给陈毅并告各大军区等的批语：“我认为你在这个报告中所提的方针及办法都是正确的，望即照此施行。并将这个报告发给各大军区参考。”报告说：华东军区决定在一九五二年三月以前，以整编部队、办好转业建设和复员生产工作为主要中心，同时把开始进行反贪污、反浪费也作为中心工作之一，将两者既结合起来又分开来做。群众性的反贪污、反浪费运动，则拟在三月以后结合整党来进行。

同日 阅陕西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明等十二月三日的来信。来信提出，值此全国军队将要大整编之际，应命令全军清查

家当，全部交军委统一管理（据估计，这笔钱是非常巨大的、以便投入重工业建设和加强抗美援朝、增强国防力量，以利部队工作之进行。毛泽东批示：“此种意见值得注意，似应来一个大清查，并统一和适当地清理全军各单位的资财。”

同日 为转发中共平原省委十二月十日关于反贪污案件的检查、处理及今后发动反贪污斗争的通报，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各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平原省委这一文件集中地暴露了地方干部中存在着严重腐化情况，足以发人深省。望在党内刊物上发表。希望各省市区党委都要发出这样一个文件。”

同日 审阅罗荣桓、赖传珠、徐立清关于军队高级干部任免和军委下发文件审批办法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提出：（一）凡军以上干部之任免、处分及提升等级待遇等问题，报呈主席审查批准，副主席、总参谋长阅。（二）凡师级干部之任免、处分及提升等级待遇等问题，报呈副主席批准，总参谋长阅。（三）凡以军委名义拟发之电报、指示、决定等文件，涉及有原则性的问题，均呈主席批准，副主席、总参谋长传阅，如一般问题则呈副主席批准。毛泽东批示：“这样规定是适当的。周、朱、林、聂阅，退荣桓办。聂应召集一次会议，将军委各部门文件及军委自己文件的核阅，规定一个办法。其中应包括紧急情况时，有些文件先发后看一项。”

12月17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西南局十二月十三日关于大张旗鼓地开展“三反”斗争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和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及志愿军的批语，指出：“西南局指出，过去反贪污斗争之所以效果很小，是由于没有像镇压反革命一样大张旗鼓地作为一个普遍的运动来发动，没有形成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这是完全正确的。”

同日 为转发萧华关于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实行精简节约、开

展“三反”斗争的报告，起草给中央军委各总部、各特种兵司令部等的批语，指出：“萧华同志十二月十六日关于总政治部在自己部门中实行精简节约，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分析和布置的报告，我认为是正确的，现将这个报告发给你们参考。各部门凡未作这种分析和布置的，都应作出自己的分析和布置，并向中央作报告。”

同日 就试办集体农庄等问题，复电王震并告习仲勋、张宗逊和各中共中央局、各大军区。复电指出：“在你的计划中有利用军队集体劳动的经验，试办十个农民的集体农庄的计划，这个计划很好。中央在即将发出的‘关于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里，已将每省试办一个或几个集体农庄一点加上去了。这种集体农庄在目前当然只能是少数的，即每省只能办一个至几个。新疆因为是将军队垦出的一部分土地、军队修好的一部分水利和房屋让给农民，如果又能给以机器援助，农民可能很乐意干。望将这方面的经验随时报告。”“各军区和各地方，凡已有用机器耕种收割的国营农场和个别集体农庄（例如河北天津县廊房地方的农民集体农庄），或准备这样做的国营农场或集体农庄，均望将这看作一件大事，用力经营，随时总结经验报告中央。”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出席，李富春、薄一波列席。

12月18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中南局召开紧急会议专门讨论和部署“三反”运动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批语说：“顷接中南局十二月十四日报告及十二月十六日附告消息，我们甚为高兴。我们认为中南局这个报告是正确的，有分析，有决心，又有周详的办法，其中许多足以补充中央过去指示的不足。因此，请各地同志加以研究，采纳那些自己所未想到的意见和办法。请将中南局这个报告印发给地委和县委，并在党内刊物

上登载，要使科长以上的党员都能阅读，犯贪污罪、浪费罪尚未逮捕和开除党籍者也要使他们有阅读的机会。”中南局的报告说：运动大体按三个步骤进行。第一步坦白检举，第二步清查处理，第三步教育建设。整个运动中，一方面是有声势、有规模的群众运动，广泛的坦白、检举和批评自我批评；一方面是专门机关所领导的调查研究、处理和审讯工作。惩治严重贪污浪费分子，而又保护、表扬、奖励模范干部人员和单位。在处理各种犯错误分子时，要注意掌握政策界限，区别对待。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西南局关于逮捕和判处反革命分子的批准权问题的六项规定，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兹将西南局十二月十三日关于逮捕和判处八方面及工矿交通企业中反革命分子的批准权问题的六项规定转发给你们。中央认为这些规定是正确的和必要的，各地均应照此办理。”西南局的六项规定中所说的八方面，指党、政、军、民和各民主党派五个方面的干部，宗教界中的骨干分子及社会知名人士，文教界的工作者，工商界中的主要资本家及在工商界中有影响的知名人士。六项规定对上述人员中和厂矿交通企业的职员、干部中的反革命分子的逮捕权，作出了具体规定。强调：在逮捕前，必须充分掌握材料，各级党委要逐级详细审查。坚持可捕可不捕坚决不捕的原则，和只杀罪该处决中的十分之一、二，以防止打击面过宽，波动过大，便于争取群众，孤立和打击其中少数坚决的反革命分子。

同日 阅北京被服厂缝纫工人的来信，来信反映虽然增产很多，但这次调整工资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的生活反而不如过去。毛泽东批示：“彭真同志：北京被服厂的工资情况，请你派妥人去切实调查和研究一下，如真如信中所说那样不合理，应给予解决。”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海外侨民工作指示草案，批示王稼祥：“此件看过，可用。我只在第三页第一面上作了一点小的修改，其余都是少奇同志修改的。此件在我这里压了很久，近日还是因为你处催促才清出来看了，这是我不对；以后如压了文件，请注意催我。此件周、罗〔1〕已看过，请胡乔木同志看一下。”

同日 阅反映苏南康复医院志愿军休养员到戏院看戏时无端寻事殴打职工情况的来信，和反映南昌第五预备医院休养员殴打护士、医生及无理关押院领导等情况的来信。在两封信上分别批示：“罗荣桓、萧华同志：接到这样的信好几次了，应作必要的处理，请总政研究和决定办法。”“请总政查明酌处。这恐怕不只是南昌一处如此。”

同日 阅反映中央各机关用汽车接送育英小学学生浪费汽油，建议改进接送办法的来信，批示：“尚昆同志查明酌办。这个建议值得注意。”

12月19日 为转发西北军区党委十二月十五日关于精简节约、反贪污浪费问题的指示，起草中央军委批语，指出：“这个文件中说：整编工作必须结合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去进行。孤立地进行整编工作，整编就会失去应有的意义，整编内容就会残缺不全。只有通过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才能真正做好整编工作。我们认为这个意见是正确的，请你们予以注意。这个文件又规定了许多具体办法，都很好，请你们参酌办理。”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农业贷款和私商联营问题给邓子恢并中南局并告各中央局的意见稿。修改的主要内容是（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这种私商联营，在价格政策上与

〔1〕周，指周恩来。罗，指罗迈，即李维汉。

国营贸易和合作社对抗，对农民和城市人民都很不利，居然由我们的工商局或税务局出面提倡，并且如你所说强迫不愿参加的商人也要参加，这显然是错误的。”“上述五种私商联营形式（1），我们认为前三种均接受国营经济的领导，对我们是有利的。第四种则是错误的。最后一种按照共同纲领人民有结社自由的规定及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的规定不能认为它不合法，所以应该允许其存在，但如果他们要警醒投机倒把、走私漏税，破坏国家所规定的价格政策等情事时，则应组织国营贸易和合作社与之进行严重的斗争，使他们不能为害。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于第四种私商联营不但不能予以支持，而且应设法将其拆散。对于第五种，则应组织我们的经济力量与之合法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

12月20日 为转发中共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党组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批语。批语指出：“中央文委党组十二月十九日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报告，很好，现转发你们参考，可在党内刊物上登载，并请督促各地方文化教育机关的党组织仿照办理。”

12月21日 为转发华北军区党委十二月十五日关于军区高干会议情况的报告，起草给中央军委各部门、各大军区、志愿军

（1）这里所说的私商联营的5种形式是：（一）公私联营。1949年上海联购棉花、天津联购麦子，是公私联营的。（二）私资联营。1950年7月进出口商实行统一报价、统一议价、统一收购和统一出口，这是在贸易部领导下的私资联营。（三）私资联合下乡采购。出现于1951年一二月间，也是由贸易部或工商局领导的。（四）在工商局、税务局领导下进行的工商业全部联营，并发动农民参加联营，不参加合作社。（五）城乡资本家自动组织起来的联营，其目的主要是同国家贸易、合作社争夺市场，并对抗国家的价格政策。第四、五种私商联营形式，出现于1951年三四月以后。

的批语，指出：“这个报告写得很好，有事实，有分析，有办法，有结论，有决心，全军都可参照实行。”报告说，为了防止在整编中可能发生的贪污浪费现象，关于大张旗鼓地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应先于整编工作去做。

同日 关于部队在整编前应进行一次“三反”斗争，复电中南军区党委并告华东军区、西南军区。电报说：“根据华北军区、西北军区、广东军区和广西军区的报告，在应整编的部队和机关中，在实行整编之前应当和可以进行一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对于你们要求‘各省军区在明年一月中旬以内，各军分区在明年二月以内，应集中力量办理部队的转业与机关本身的整编’，并不妨碍。如有妨碍，即应予以调整。请你们密切掌握这一时间和精力的调整，务使反贪污、反浪费斗争不妨碍整编工作。至于一切不在明年三月完成编整任务的部队及机关，自应立即发动这一斗争，使贪污浪费的狂澜早日停止。”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指出：对方是在企图转弯并寻求妥协办法的。不过对限制机场和自由视察两项要求确未死心，还会在第三项议程上做点讨价还价的工夫。这一切，就是目前敌人在谈判中的主要情况。故你们在今日会议上的方针，应主动提出我方的全部修正条文，并根据敌人的六条修正文字，将我方所绝对不能接受的限制机场（第四条）、自由视察（第六条）两项文句完全删掉，将需要修改的“其他地点”（第五条）及中立国监察机构的任务（第六条）两点加以适当修改，而留下岛屿和轮换两点作带伸缩性的修改，以便当场议价。

12月2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批准和转发中央一级机关总党委第一书记周恩来给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的批语，指出：“（一）

〔1〕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中央批准中央直属总党委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向中央所作的报告，请总党委即按这个报告所定计划施行。（二）将这个报告发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自治区党委作参考；并请考虑在各大行政区一级直属党组织和各省市区一级直属党组织亦组织总党委，以期统一这些党组织的领导，定期召开各部门和各大单位的代表大会，发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健全党的生活，提高工作效率，团结党外人员，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克服资产阶级对于党的侵蚀作用。”周恩来的报告说：在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一级机关总党委，领导中央直属、军委直属、中央人民政府直属和中央一级民众团体的一切党组织以后，我们即召开了一次会议，研究部署当前的工作。（一）总党委目前的中心工作，是集中力量领导与组织中央一级机关（包括党、政、军、民）的精简节约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二）因为目前必须集中力量进行“三反”，我们决定，除若干单位在有准备的条件下，可以在短期内结合“三反”运动召开党代表大会外，大多数单位的党代表大会，均需放在一九五二年三月以后去开。（三）为便利领导，对各系统党的组织决定作必要的调整。（四）提议以下列九人组成总党委，即周恩来（第一书记）、安子文（第二书记）、杨尚昆（第三书记）、萧华、罗瑞卿、张经武、徐立清、龚子荣、曾三，并请批准萧华为第四书记。

同日 为转发中共甘肃省委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批语指出：“照甘肃省委的意见，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从发动到结束只需要一个月。甘肃省委这个意见是基本正确的。有些同志认为发动这个斗争很不容易，需要几个月时间才能结束。这种意见，不甚正确。当然，要将一切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问题全部彻底解决清楚，包括许多大贪污案犯的调查、公审、判决、处理，许多基本建设工程重新审查其旧

的浪费的设计、建立新的节约的设计，当然不是一个月所能完成，而需要更多的时间，有些可能拖得很长。但就一般情形来说，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也就差不多了。” “也不是停止一切工作不做，专做三反斗争，而是和各项工作结合，特别是和整党整风工作结合去做，三反斗争就是目前整风的主要内容。”

同日 为转发中共武汉市委十二月十九日关于开展“三反”运动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批语指出：“继北京市委之后，在大城市中，武汉市委已经发动了一个大张旗鼓的、雷厉风行的、吸引广大群众参加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他们做得很勇敢，公开揭露和惩处了一批敢于压制群众批评的担负重要职位的干部。他们所定的方针、步骤和办法都很适当。中央希望天津、济南、青岛、上海、南京、杭州、南昌、广州、长沙、重庆、成都、昆明、西安、太原及其他大城市，一律发动这样一个斗争，希望这些大城市的市委都有武汉市委这样勇敢和有步骤有办法，都向中央写一个有分析有内容的报告。请将武汉市委的报告在党内刊物上发表。”

同日 复信章士钊：“十二月二十日赐示敬悉。所教一节，近日稍忙，容后图之。有江子愚〔1〕者从成都来信，附所作清平乐一首，颇觉不恶，寄上一观，请予掷还。先生如知此人生平，祈示一二。”次年一月九日，复信江子愚：“来信并清平乐和作收到，甚为感谢！”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一九五二年财政预算问题，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出席，薄一波列席。

12月23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东局的“三反”报告，起草

〔1〕江子愚，即江椿，曾任《巴蜀时报》总主笔。1953年任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中央批语：“这个报告很好，请在党内刊物上发表。”华东局的报告说：华东地区贪污浪费现象极为严重，为此特作如下六项决定：（一）普遍进行“三反”的思想教育。（二）在所有国营工矿企业、财经部门、政权机关中，无例外地展开群众性的民主检查运动。（三）充分运用各种宣传工具，揭发贪污腐化、铺张浪费及官僚主义的典型人物和事件，表扬、奖励廉洁奉公、保卫国家人民利益及积极为国家和人民创造财富的模范人物和事迹。（四）把从上而下的检查和从下而上的检举相结合，坚决反对只整下不整上的做法。（五）注意调查奸商并发动群众检举不法商人，以便内外配合，彻底肃清贪污分子。（六）从检查“三反”过程中，整顿各级党政机关的组织机构，建立健全的组织生活。

同日 阅华南军区政治部十二月十三日关于团结改造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批示：“罗荣桓同志：此件很好。建议：（一）印送各大军区政治部及各级政治部，仿照办理；（二）在总政的刊物上予以发表。”华南军区政治部的指示，要求在党和军队特别是全体干部中，广泛地切实地进行一次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教育：（一）重视团结知识分子，热情地爱护他们，把他们当作党的宝贵财富之一；关心他们实际生活中的困难，并帮助他们有效地加以解决。（二）积极地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教育改造，严肃地对待他们轻视工农、轻视具体实践的错误倾向，耐心地加以教育。（三）大胆地使用知识分子，必须使之有职有权，在实际工作中经受考验。

同日 复信陈玉英〔1〕：“十二月十八日给我的信收到了，很

〔1〕陈玉英，1926年冬至1931年春在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家里做保姆。1930年10月随杨开慧一起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在狱中同敌人作了不屈的斗争。

高兴。已有人告诉我，你过去在反革命面前表示很坚决，没有屈服。这是很好的。为了节省，你不要来京。你在长沙做工很好。你如果有困难，可告诉我，设法给你一些帮助。祝你身体健康！”

同日 晚上，同章士钊、叶恭绰〔1〕谈话。

12月24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西南局关于西南军政委员会文化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教师思想改造问题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的批语，指出：“西南局这个报告很好，特发给你们参考，可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中央希望华东、中南、西北三大区，在适当时机，有准备地开一次大规模的学校教师思想改造会议。在会议中，仿照西南的办法，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推动大中小学教师及教育行政人员的思想改造工作。华北和东北是否还要开这样的会议，亦请华北局和东北局加以考虑。”西南局的报告说这次会议的主要经验有：（一）发动积极分子带头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在自我批评的基础上进行与人为善的批评。（二）采用民主方法，提倡自由辩论，展开分析批判。（三）领导上亲自作指示，各小组均有党员负责干部做骨干。

同日 阅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转报的全国合作总社收购棉花经验的报告，批示：“中财委：我认为全国合作总社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九日的报告是原则上正确的。合作总社提议国家对棉花和粮食两种农产品都委托合作社收购。除棉花一项，一九五二年，应全部委托合作社收购，由三个头改为合作社一个头，已为毫无疑问，不须多说外，粮食一项，一九五二年由国家收购的近二百亿斤商品粮，似应按照合作社的组织能力，全部或大部委托他们收购。至于尚有约三百亿斤商品粮目前是由商人收购或农民自己运至城镇卖的，一九五二年尚不宜由合作社去收购。一则对

〔1〕叶恭绰，当时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商人挤得太快了，二则合作社目前恐怕也无此种能力，应当分作几年逐步实现这个计划。如能在三年至四年内做到全部商品粮的百分之八十由合作社收购，就是很好的了。此事请你们加以研究，订出一个适当的计划，交中央审查决定。”全国合作总社的报告，总结了一九五一年包收棉花的初步经验，提出改变过去由花纱布公司、合作社、私商三个头收购棉花的旧办法，实行由合作社一个头收购棉花的新办法。

同日 为转发中朝联合铁道军事运输司令部党委十二月十九日关于开展“三反”斗争情况的报告，起草给各大军区并转所属单位和志愿军的批语。批语指出：“联运党委这个报告很好，请你们参酌办理，并在党内刊物上发表。有些人以为开展三反斗争须要很长的时间，这是不对的。除复杂案件外，每一机关、部队有半个月至多一个月就够了。联运党委所规定的时间不到一个月，这是很对的。如果铁道兵团在朝鲜那样每天受轰炸和极为紧张的工作情况下能够这样做，那么国内的机关、部队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

同日 复电谭政并告陈毅、贺龙：“十二月二十二日来电悉，其他文件亦收到。我的意见，已见复中南军区党委会电，即是运动是要发动的，但不要使它妨碍整编工作，应由你们用电话和各军区密取联络，调节时间和精力。”“一切受整编的部队都要有一短时间进行这一斗争。一切暂时不受整编的部队则可有较长时间去进行这一斗争，但也不要拖得很长，至多有一个月也就够了，并须结合其他工作去做。”

12月25日 审阅中共中央为转发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十月下旬向毛泽东的工作报告给各中央局并转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邮电部党组的指示电稿。对指示电稿中的一句话作了修改（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在这个报告中所说关于某些党政机关动员群众写致敬信、发祝贺电，以及机关团体和群众给中央送锦

旗送礼品的事情，不但是一种浪费，而且是一种政治错误。”

12月26日 为转发新华社关于西南区已停止了原计划的整党学习、全力转入“三反”的内部报道，起草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的批语，指出：“中央认为西南局停止原订整党学习计划，全力转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是完全正确的，请各中央局也照这样做。”

同日 为转发中共湖北省委十二月二十四日关于“三反”运动初步情况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委的批语：“湖北省委这个报告很好，中南局在这个报告前面所说的话也好，很值得看一下。请在党刊上发表。”中南局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说：湖北省委的报告说明，一切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不放手、不坚决、不站到运动前头去领导运动，均会陷自己于被动地位；怕群众民主，一定会遭到群众反对。只有用发扬民主，而又适时引导的方法才能使运动向着健康的道路前进，才能既教育了群众又改善自己的领导地位。

12月28日 就“三反”斗争和整编工作结合进行问题，复电陈毅并告各大军区、各中共中央局等：“十二月二十五日长电及十二月二十六日短电，均已阅悉，很好，请即照此执行。我们的方针是必须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和整编工作结合进行，并力争于三月底完成第一期整编。抓得紧，配合得好，是可以完成的。但如因三反斗争妨碍了整编工作，则宁可稍为推迟若干天（例如半个月）去完成整编，决不可让被整编的人员带着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精神去转业和进学校。这一点，陈毅同志说得很好。华北、西北两大军区，华南军区和广西军区，均有

报告照这样做。李达、王新亭〔1〕二同志昨来北京面报，西南也是这样做的。请中南军区务必注意此点，务必将整编和三反结合去做，二者不可缺一。如果下级军区有不清楚者，务必明确地坚决地指示之，至要至要。”

同日 晨三时半，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十二月二十八日一时来电〔2〕、两组简报及附件均悉。同意来电所述各点。并且不要怕拖，要准备再拖一个较长的时期才能解决问题。只要我们不怕拖、不性急，敌人就无所施其伎了。”

同日 审阅罗荣桓、赖传珠、徐立清关于加强中央军委各部门干部配备和提议准备任命的干部名单的报告，批示：“同意。惟陈赓任总高级步校校长一事，应去电志司征求意见，或须待停战实现才能调动。”陈赓于一九五二年五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

12月29日 复信黄炎培：“十二月二十八日惠书敬悉。轻工业部发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并已开始收效，甚为欣慰。讲演稿〔3〕很好，只须将第一面有四处括号内数字去掉，就可发表。”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朱德、陈

〔1〕王新亭，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2〕指李克农1951年12月28日晨1时关于第三项议程（机场建设问题）小组和第四项议程（交换战俘问题）小组谈判情况给毛泽东、金日成、彭德怀的电报。电报说，我们计划：（一）对于第三小组，如对方继续采取拖延政策，根本不讨论什么问题，则我亦不急。他提议休会我即同意休会，表示我们不怕拖。（二）对于第四小组，继续以四万四千战俘的问题和对方的所谓五万多战俘的问题对抗下去。

〔3〕指黄炎培1951年12月8日在轻工业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的报告，题为《我们要彻底地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而斗争》。这个报告1951年12月30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云、彭真、林彪、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胡乔木、杨尚昆出席。

12月30日 为转发西南军区党委关于“三反”斗争的一周通报，起草给各大军区、志愿军并告各中共中央局的批语，指出：

“西南军区党委会十二月二十七日所发一周通报，很好，很正确，很有力量，在三反斗争中表现了革命军人的战斗姿态，毫无畏首畏尾拖泥带水模样，读之使人十分高兴。请你们于收到后即刻仿照办理，并即刻转发给各级军区直至团级，一概仿照办理。各级领导同志都要学贺龙同志那样亲自‘上前线’，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务必取得胜利，并且务必于一九五二年一月上半月取得显著成绩，下半月取得更大的成绩。”

同日 阅聂荣臻关于编余部队和机构的调拨计划的补充报告，批示：“朱、林、聂：我希望调拨为工程部队和屯垦部队的数目能有三十万至四十万，此事待周病愈和中财委同志商量一下，再行酌定。如能办到，其利极大。其余均同意。”

同日 复信易南屏〔1〕：“十二月二十六日来信收到，很高兴。划为中农成分，为你庆贺。旧日抄本承保存甚感，倘蒙赐还，尤所企望。”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又复信易南屏：“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六日惠书及抄本两册，均已收到，甚为感谢！体弱多病，不宜外出，更不要来京。寄上人民币三百万元，借佐医药费用。乡间情形，尚祈时示一二。”

同日 为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大张旗鼓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起草批语，指出：“将这个指示发给各大军区及志愿军，并转发所属各级军区一律仿照办理。必须这样做才能取得主动，

〔1〕易南屏，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否则就会使自己陷于被动。华东军区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有些被动，但现在已完全主动了。”

同日 关于中央、大行政区、省市三级的一切工作部门向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作“三反”报告的问题，起草中共中央指示。指示要求“在一九五二年的头四个月内，须每月作一次报告，以便中央有所比较，看出各级领导同志对这一场严重斗争哪些是积极努力的，哪些是消极怠工的（消极怠工的原因，一种是领导人官僚主义，一种是领导人手面不干净），以便实行奖励和惩处。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须推迟时间作报告者须申明理由。这些报告，各级党委应负督促之责”。

同日 阅董必武、彭真、罗瑞卿关于中央政法部门五个机关实行合署办公和动员开展“三反”斗争初步情况的报告，写批语。批语说：董必武、罗瑞卿阅后，交彭真阅办。“报告第四条第一项所说‘利用民主人士打胜仗’（1）的人是些什么人，姓甚名谁，他们如何利用民主人士去打仗的，请补报。这样的人已丧失作为一个严肃的共产党人的立场，必须按其情节轻重给以必要的纪律方面的党内处罚，请你们议定处罚办法（邀同本人参加）报告中央核办。”“报告第四条第二项所说对三反运动采取自由主义态度的党员是些什么人，姓甚名谁，请补报。对于这样的人，应给以一个限期（例如十天），遵照中央决议，认真发动群众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否则即须撤职。如果本人有贪污实据，还须开除党籍；严重者须送法院惩办。”“报告

（1）董必武、彭真、罗瑞卿报告中的第四条第一项说：“党内有些本位主义的思想，常常不自觉地给党外人士的权位思想作了支柱，妨害内部工作上应有的统一领导。过去各部门间经常有些不从实际工作出发，单纯地搬《政府组织法》闹工作关系问题的现象，甚至有所谓‘利用民主人士打胜仗’之说。”

第四条第三项所说只要‘一反’，不要其余‘二反’（1）的民主人士，是些什么人，姓甚名谁，请补报。”

同日 为转发志愿军党委关于开展“三反”斗争的补充指示，起草给各大军区、各中共中央局的批语：“志愿军亦定于一月展开全军的三反斗争，二十六军在最前线作战亦能展开这一斗争。有些人认为既要整编就不能同时进行三反斗争，这种意见显然是不正确的。”

12月31日 为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结合“三反”进行整编给所属装甲兵党委的电报，起草给谭政和各大军区的批语。批语指出：“十二月二十九日华东军区党委批评华东装甲兵党委的电报，很好。没有这种批评，彻底的三反斗争是不能完成的。就全军情况来看，最落后的是中南军区，至今没有一个彻底发动三反斗争的号召文件。相反地被整编一事所吸引，深怕发动这个斗争妨碍整编。其实，如同华东军区党委所规定，一月以三反为主，结合整编；二、三两月以整编为主（指军区及被整编的部队），结合三反，两者不但不妨碍，而且只有这样做，才能使整编做好。务望中南军区和各大军区取一致步骤，务必‘在一月份全军整整齐齐进入三反斗争’。下面各单位，有不执行此命令者，立即予以批评，严重者须以撤职相威胁。每天交流经验，表扬好的，批评坏的，使运动迅速发展。中南军区各部门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情况和各地一样严重，何以至今毫无动作，速即电告。”

同日 阅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四四期上刊登的《北京市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现已进入号召贪污、行贿分子的自动坦白阶段》的内部通讯。这篇通讯说：现已有北京市人民政府税务系统的一些工作人员坦白交代了自己的受贿问题，同

（1）指只要反贪污，不要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

时揭露了工商界中许多商人的行贿漏税不法行为。税务人员的坦白有力地推动了工商界坦白运动，工商界坦白运动的开展，又推动了各机关的坦白运动。许多有贪污受贿行为的人，怕商人把他检举出来，坐卧不安，不得不自动坦白。毛泽东将这篇通讯转发各中共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指出：“请注意上述经验，并将其推广。”

本年 应陈望道〔1〕代表复旦大学师生的请求，题写“复旦大学”校名。

〔1〕陈望道，当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文化部部长，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52年五十九岁

1月1日 晨二时，阅中南军区党委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关于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和谭政十二月三十日下午三时关于将军队整编和“三反”运动结合进行的电报后，对中南军区党委的指示写批注并复信谭政。对指示第五项中的“在贪污可能较少，铺张浪费可能较大的部门，则以反铺张浪费为主”这句话，批注：“这一条不妥。一般机关人员从司令部、政治部到连部，也有贪污人员，他们可以这一条为借口，只反浪费，不反贪污。必须使一切机关、部队、学校既反浪费，又反贪污，凡有贪污现象者皆须彻底肃清。”对指示第九项中的“这一运动的发动时间，可依整编转业任务而定，就是整编转业工作繁忙的单位，为了不致妨碍整编转业，应在整编转业工作布置大致就绪后发动，并与整编结合进行”这句话，批注：“这样规定不妥。各级军区和被整编部队均可以这一条为借口，注重整编不注重三反。”毛泽东给谭政的复信说：“你们对整编与三反的矛盾已大体上解决了，你们就有了主动。但有两点不妥，我已批在文内，请考虑改正。此外，请注意：（一）对各军区以电话、电报严加督促，勤加指导，务使每天都有收获。（二）亲手抓紧直属部门，三天一会，五天一报，照西南的办法，做出成绩，取得经验，通报各

处。盼望你们的捷报。”晨三时，致信林彪：“已将批评中南的电报〔1〕停发，因为谭政的思想已扭转过来了。谭写的另一文件是基本正确的，有两点不妥处，我已批在文内，于今夜派专人送给谭政，并告诉他一些做法。”毛泽东随即派机要秘书持此信乘飞机到汉口面交谭政，要谭政亲收，并写收条。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2〕，指出：敌人是急于取得妥协，但他们仍然坚持限制机场，干涉内政，这是我们绝对不应该妥协的。我们不要性急，还应拖他几天。这两天仍要着重痛斥其干涉我方内政的无理狂妄要求，表示我方绝对不能接受。

同日 下午，和张澜、李济深、黄炎培、陈叔通、马叙伦、章伯钧、马寅初、郭沫若、傅作义、张奚若、彭泽民〔3〕、邵力子、朱德、董必武、林伯渠、薄一波、李维汉、胡乔木、杨尚昆、齐燕铭等二十九人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在怀仁堂举办的元旦团拜会。毛泽东致祝词，祝贺各条工作战线在过去一年中所取得的胜利，并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接着，出席团拜宴会和音乐舞蹈晚会。宴会后，由出席中央人民

〔1〕指毛泽东 1951 年 12 月 31 日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结合“三反”进行整编的电报的批语。

〔2〕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3〕张奚若，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常委、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1952 年 11 月又任教育部部长。彭泽民，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

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的各民族代表向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献礼、献旗。

1月2日 为转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党委关于开展“三反”运动的报告，起草给各大军区并各中共中央局的批语，指出：“志愿军已有两个军（二十六军和四十二军）及一个兵团响应中央号召开展三反斗争和做了节约计划，国内则除六十六军外，还没有收到报告。原因何在，速即查报。”

同日 为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和关于所属各部推迟报告时间的请示报告，起草批语，指出：“将这个指示发给各大军区及志愿军，并转发所属各级军区一律仿照办理。必须这样做才能取得主动，否则就会使自己陷于被动。华东军区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有些被动，但现在已完全主动了。”

“批准华东军区党委会关于所属各部推迟报告时间的请求，只要团以上各级负责同志下定决心结合整编工作有力地、深刻地发动三反斗争，第一次报告推迟至一月底是可以的。”华东军区党委的指示说：华东部队中贪污浪费的倾向是严重的，其原因主要是各级领导上存在官僚主义作风，布置整编工作时忽视了“三反”。因此，必须加强“三反”工作，在干部和部队中进行广泛和深入的动员工作，发动群众性的坦白、检举运动并进行检查，揭露和处理最严重的贪污浪费腐化案件；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到领导“三反”斗争上。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发出修改后的我方对案〔1〕。对案提出：双方保证于停战协议签字并生效后，不从朝鲜境外进入任何增援的军事人员、作战飞机、装甲车辆、武器与弹药；双方各指定同样数目的委员组成军事停战委员会，负责

〔1〕这个电报及我方对案，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监督停战协议的实施及协商处理任何违反停战协议的事件；双方同意邀请可为双方所接受而未曾参加朝鲜战争的中立国家，在得其同意后，派出同等数目的代表，组成监察机构。

1月3日 晨一时至三时四十分，听取薄一波汇报中央直属党、政、军、团、群机关处以上干部参加的中央直属总党委扩大会议部署限期发动“三反”斗争的情况。

1月4日 晨五时，审阅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发动群众的关键何在？》，批示：“很好，可即发表。”在社论稿中的“必须立即在全国范围内，毫无例外地充分发动群众，把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形成一个广泛的群众运动……”一段中的“必须立即在全国范围内”之后，加写：“在一切党组织，一切政府部门和军事部门，一切国营和公营的工业、交通、银行、贸易的机关和事业，一切合作社组织，青年团组织和人民团体的各级领导机关，以及一切和上述各方发生关系的私人工商事业，都应”。将“像刘青山、张子善等大贪污犯，则不论他们有多大功劳，都是不可宽恕的了。对于这样变质的分子，有多少就必须清除多少”一段中的“变质的分子”，改为“叛徒和毒虫”。社论于本日发表。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的指示》。指示如下：“中央财政部党组这个报告〔1〕很好，请你们仿照办理。请你们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缩短学文件的时间（有四五天就够了、召开干部会，限期（例如十天）展开斗争，送来报告，违者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

〔1〕指中共财政部党组1952年1月2日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即财政部党组1952年第4号报告。

撤职查办。在干部会上应指名批评落后的单位及其领导人，指名奖励做得好的单位及其领导人，宣布撤职的名单及理由。中央直属总党委于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召开党政军团群部长至处长级的数百人的扩大党委会，由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宣布中央决定，限期一月一日至一月十日，各院委、部、会、院、署、行、局、处及其下面的一切单位，务须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坦白检举，于一月十一日送来报告。违者，不论部长、行长、署长、处长、局长、科长、股长或经理，一律撤职查办。并在会上指名宣布几个部是做得很好的，几个部是中等的，很多部是落后的，并指出部长姓名。”“这样一来，全场振奋。当日回去，连夜开会。元旦整日开会，很多部长、副部长到一下团拜会就回去，戏也不看了。至一月三日差不多所有单位都开了坦白检举的群众会议，纷纷送来报告。这样的高级干部会议，现规定每十天开一次，除重病不得请假。估计到一月底，中央一级可以基本上解决问题。这一经验，供你们参考。此外，中央已指定薄一波同志（他是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用电话和各大区负责同志联络，在目前三反紧张时期，每三天至五天通话一次，检查各区三反进度。中央此电，连同薄一波同志给毛主席的信（1）及中央财政部党组第四号报告，均可在党刊上发表。”

同日 为转发中共江西省委关于“三反”运动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江西省委这个报告很好，认真地和有力地解决了问题，和有些地方党委所作空泛无力的报告大不相同，请在党刊上予以发表。”江西省委的报告提出了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三反”运动的主要措

（1）指薄一波 1952 年 1 月 3 日为报送中共财政部党组关于“三反”运动的报告给毛泽东的信。

施：（一）省级机关拟召开代表会议，进一步动员群众，组织公审，处决几个突出的贪污犯，以打开局面；（二）首长负责，亲自动手；（三）监委、纪委、检查署和法院联合成立节约检查委员会，专门处理重大案件和接受群众控告、检举。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华东局一月二日关于大贪污犯的逮捕权及判决权问题回复山东分局并向中央请示的电报，批示：“请薄一波同志拟复，同时告知各区。”六日，审阅修改薄一波起草的中央给华东局的复电稿。在复电稿的“一月份内只应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发动群众检举、揭发贪污案件并进行审讯，而不必忙于处决”一句后，加写：“各地如有需要杀几个贪污犯才有利于发动群众，亦可杀几个。”复电稿同意华东局在电报中的意见，即：将一般的大贪污犯的逮捕批准权交地委及各直属市委；对有影响全省及全国影响的人士因贪污需加速捕者，应报请省委或区党委批准，重要者应报华东局或中央批准；对贪污犯的判处徒刑和死刑，应该经过司法机关并按惩治贪污条例办理。

同日 审阅聂荣臻一月二日关于各种工程部队和屯垦部队的调拨与建设计划给毛泽东并朱德、周恩来、林彪的请示报告，批示：“这个计划很好。按照铁道兵团的经验，以四十万军队转为工程军和屯垦军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在经济上是很合算而有大利的，国家又立即增加四十万工业工人和使用机器的农业工人。应即刻筹办，并请苏联帮助，中财委订购工程和农业的机器，开办工程学校和农业技术学校。”报告提出将全国工程部队增至二十一个师二十一万人，另以十九个师十九万人组成屯垦部队等计划。

同日 审阅聂荣臻一月三日关于山东回民支队整编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在整编中，应从政治上考虑，保留这个部队和它

的原番号，并留在地方部队中。毛泽东批示：“刘格平〔1〕阅后，送聂荣臻同志办。（一）同意保留原番号，作为地方部队；（二）过去华北编散回民部队的经过望聂查明报告；（三）请刘格平同志经常注意，有对回民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处置不妥当的，向我直接提出意见。”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2〕，指出：今日会议可仍本既定方针，着重驳斥敌人现在叫嚣着的几个荒谬论点，必须揭穿敌人正在增加兵力，企图造成威胁，如此何能达成公正平等的协议，而我方所主张禁止增加兵力、反对干涉内政，是利于稳定停战局势而达到和平解决目的。

1月5日 为转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批语指出：“将这个报告发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委和地委，在各大中小城市中一律仿照办理，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违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违法行为，特别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及各省省城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争取在两个月至三个月内基本上完成此项任务。请各级党委对于此事进行严密的部署，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在这个斗争中，对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应酌予照顾，注意组织三反斗争的统一战线。”北京市委的报告指出，在工商界方面，主要是贿赂和勾通工作人员，偷

〔1〕刘格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政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税漏税，偷工减料和对公家高卖低买，而最普遍的是用“回扣”、“送礼”等方式来勾引工作人员贪污。

同日 为转发华东军区党委一月三日关于组织检查团检查“三反”工作的决定，起草批语：“华东军区组织检查团互相检查的办法很好，望各党政军民系统仿照办理，迅速推动三反斗争的发展和完成。”

同日 阅中共浙江省委一月一日关于开展“三反”运动情况的报告，批示：“薄一波、彭真同志阅。请你们对贪污浪费轻重大小如何处理问题加以研究，于十天内将惩治浪费条例起草出来，并将惩治贪污条例加以修改，于一月十六日交我为盼。”浙江省委的报告提出了对浪费处理和对贪污处分的意见。

1月7日 晚上，听取薄一波汇报。

1月8日 晨，听取彭真汇报天津市“三反”运动的情况。

1月9日 就军事系统的“三反”运动报告的处理问题，批示萧华：“军事系统的三反报告有需处理的，一概请你们处理，包括军委各部、各大军区及志愿军的一般问题在内。只有若干特殊问题，必须经过我才能解决者，则由我来处理。我主要是管党政军民都有关系的一些问题的指导。”

同日 为转发中共甘肃省委一月三日关于“三反”斗争给西北局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和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志愿军的批语，指出：“甘肃省委对三反斗争抓得很紧，很认真，反映了真实情况。有些贪污情况比甘肃还要严重的地方，在其报告中却说成不甚严重，贪污人数甚少，款数不多，这是不真实的，请你们加以注意，不要被下面的不真实报告欺骗了。”甘肃省委的报告列举大量事实，说明全省贪污浪费现象极为严重，大小干部都有，只是程度不同，中央提出开展“三反”斗争是非常适时、万分必要的。

同日 晚上，同粟裕谈他的工作分工问题。粟裕曾于一月四日致信毛泽东，说已出院开始工作，请求以半个月时间了解各方面情况，再行具体分工。十日，中央军委办公厅通知：粟副总参谋长分工负责管理作战、训练及海军、空军和各特种兵的工作。

1月10日 晨，听取薄一波、安子文、杨尚昆汇报工作。

同日 为转发罗瑞卿一月八日关于公安部开展“三反”斗争的报告，起草给中共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和省市区党委及公安部门等的批语，指出：“请你们密切指导公安部门都照中央公安部的方针和办法在全国三十万公安人员中开展一个彻底的猛烈的三反斗争，将一切污毒洗干净。哪一处公安机关（包括警察）的斗争比不上中央公安部，就是那里的领导人不行，方针和办法不对，必须立即加以检讨和改正。中央公安部的作法也是一切机关部队所应仿效的。”公安部的报告说：一周来，公安部的“三反”斗争已经进入贪污分子坦白和群众性检举的高潮。运动的步骤是由上而下、先内后外，即先把领导人检查好，群众满意了，领导人进入阵地并取得运动的实际领导权，斗争火力就立即烧到贪污分子特别是大贪污分子身上。

同日 为转发空军党委一月四日至八日逐日的“三反”斗争情况的报告，起草给各大军区、志愿军并告各中共中央局的批语，指出：“空军党委的方针和办法是正确的。只要这样做，无论什么贪污分子也能揭露出来，浪费和官僚主义均将一扫而光。像空军直属部门这样的大单位，除复杂案件外，大约有两星期左右即可解决问题。这是具体生动的报告，可供各单位参考，请在党刊上发表。空军党委在三反紧张期间每天反映情况的方法，也是很好的。”空军党委的报告详细汇报了每天运动开展的情况，

说他们开展运动层层实行首长负责，带头检讨，从而发动了群众，敢于揭发批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已转到广泛号召犯有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人自动坦白，同时组织调查小组到商人中去调查，设立征求意见箱让群众进行检举。

同日 为转发彭真一月九日关于天津市“三反”运动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批语，指出：“中央同意彭真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述天津市委在干部超支问题上所作的三类分析，认为这种分析是正确的。请各级党委即照这种分析在党内外传达，以利开展三反斗争。”报告把干部超支分为三类：不可避免的超支、生活铺张性质的超支和腐化性的挥霍。经过这样分析，特别是进行了检讨后，有些仅有第一、二类超支，尤其是仅有第一类超支的干部，在“三反”斗争中就心平气和、理直气壮了。

同日 阅山东省军区党委一月六日关于军区第二届生产会议的报告，批示：“薄一波同志阅后送粟裕同志：山东军区关于部队生产问题所采取的方针我觉得是好的。军事系统的生产问题，暂时还只能这样办。这就是以大军区或二级军区为单位执行‘管而不动，听候命令（即经批准才能开支）’的方针。”山东省军区党委的报告说，他们将三级军区的企业全部由二级军区原封不动地接管，严格控制生产盈利的开支，必须在先造预算经审查批准后才能开支。

同日 为转发西康省军区党委一月六日关于“三反”运动的紧急指示，起草批语：“此件很好。真是雷厉风行，没有拖泥带水，发给各大军区及志愿军参考。”西康省军区党委的指示，要求各级组织改变平时工作方法，大张旗鼓，雷厉风行，集中力量进行“三反”斗争，整编工作一律暂缓。要在一月份内做出显著成绩，彻底解决问题。

1月11日 晚上，接见回国汇报工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副

司令员兼后方勤务司令员洪学智，了解朝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志愿军的作战和后勤保障情况。在谈到朝鲜战局时，毛泽东说：对朝鲜战争要作持久的打算。在得知有的部队不少战士由于营养缺乏得了夜盲症时说：应该给战士增加营养，给他们每天吃一个鸡蛋，我们还是做得到的。要想想办法解决运输中鸡蛋容易打碎的问题。又说：你回去以后对彭总讲，你们要经常向金日成同志请示汇报。如果彭总工作太忙走不开，就由邓华和你去汇报。

1月12日 晚九时，听取薄一波汇报各大军区“三反”运动的情况。

同日 晚九时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薄一波、李富春、刘景范〔1〕出席。

1月13日 为转发饶漱石关于华东各地“三反”斗争情况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并转分局和省市区党委等的批语。批语指出：“机关生产在三反斗争中已名誉扫地，很多机关要求立即交出，但由政府马上接收还有困难，在目前几个月内仍应责成原机关负责管理，并不得抽动任何人员和财产，听候政府处置。这就是‘管而不动，听候命令’的方针。”“华东向资产阶级作斗争的办法很好，北京、天津也是这样做的，请各大中小城市都照这样做。对于一切犯法的资本家，无例外地均应抓住其小辫子，分别轻重大小，予以不同的惩治或批判。一部分罪大恶极者，没收其资产。这是人民政府在全国胜利后第一次大规模惩治资产阶级的犯法行为，这是完全必要的。请你们依据当地具体情况，精密地组织这一场斗争。在斗争中注意组织三反的统一战线，酌情照顾民主人士。”

〔1〕刘景范，当时任中共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党组书记、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秘书长。

同日 阅中共中央中南局一月四日关于处理机关小家当的请示报告，批示：“请陈、薄、李〔1〕三同志商复，请薄主稿。这不是中南一处的问题，是全国的问题，要研究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包括党、政、军、民在内。如一时不能拟妥，迟几个星期也可，可先用电话通知邓子恢同志。”中南局的报告指出：中南地区机关小家当异常普遍，财产很大，估计有两万多亿元，可能达到三四万亿元。其中很大部分用于铺张浪费，特别是用在少数干部身上，为贪污受贿大开方便之门。从已经暴露出来的大量问题看，小家当利少害多，需要有步骤地予以取缔。

同日 指示同意薄一波一月十二日的来信及转报的李富春关于中国科学院“三反”运动情况的报告。报告说：科学院下一步“三反”运动的布置，首先是确定对科学人才必须保护不伤的原则，已检讨者如不能过关，则帮助其过关，未检讨者（如所长）不必点名要其检讨。对著名科学家的住房、汽车、暖气等问题，首先在党团员中说明这是政府批准的，不是浪费，更不是贪污，然后在适当时机向群众说明。其次，决定科学院进行“三反”运动的方针需要与科学院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主要使科学家了解贪污浪费及官僚主义的错误的危害性及其来源，即在科学院中也有此种问题。科学院的“三反”运动，在科学家中主要的是启发思想与思想改造相结合。

同日 阅习仲勋一月十日关于入藏干部应做好民族工作的来电。来电提出：我入藏干部应根据实际情况做好民族工作，防止过急过高要求。内地藏族聚居地区暂不进行土地改革，喇嘛寺的土地目前均以不动为好，特别是佛教寺院的土地过早征收于我不利；在游牧区也不应提“反恶霸”口号，半农半牧区也不进行土

〔1〕陈、薄、李，指陈云、薄一波、李富春。

改。有了以上措施，才可大大地安定牧区人民和发展牧区经济。毛泽东批示：“请李维汉、刘格平二同志商复。习仲勋同志的意见值得注意。”

1月14日 为转发陈云、薄一波、李富春关于“三反”运动以来市场物价情况的报告，起草给中共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和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和志愿军的批语，指出：“陈、薄、李一月十一日关于市场物价的报告很好，发给你们研究。过去一个多月的三反斗争在经济和财政方面已开始见效，国家的支出已开始表现正常，资产阶级的反动行为已开始受到打击。望我党、政、军、民各级领导同志坚持奋斗，彻底完成三反任务。”报告说：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份物价较上月下落百分之一，较九月底的指数下落百分之二点三，一反过去每月上涨百分之一的情况；同时货币流通量增加，存款增加，外汇、金银黑市下落，出现了金融和物价进一步稳定的局面。这是开展“三反”运动以来所收到的初步成效。

同日 为转发内蒙古自治区集宁军分区一月九日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起草给各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和各军的批语，指出：“我们愿意看见各级军区和各军有像集宁分区这样的检讨，不愿意看那些好像太平无事的报告。集宁分区只说了浪费和生活腐化，还没有提到贪污事件。像一个军分区一定有大批的贪污犯，望各地严格注意。一切没有切实暴露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机关和部队，必须从头做过，做好了三反再做整编，三反一天没有做好即一天不进行整编。”

同日 为转发贵州遵义军分区一月五日关于“三反”运动的综合报告，起草给各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和各军，各中共中央局并转分局和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遵义分区这个报告比刚才转发的集宁分区的报告接近事实得多。一个分区，一

个军，一个小市，一个县，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这是决然无疑的。凡说那里只有浪费而无贪污，或贪污甚少者，必不可靠，千万不要相信。在一阵风停止浪费之后，必须立即穷追贪污。不能自己解决贪污问题者，上级应即派遣检查组下去督追，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

同日 就我方在朝鲜停战谈判第三、第四小组会上的对策问题，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指出：“同意来电所提意见，坚持既定方针，不稍动摇犹豫。”“新华社十三日讯，敌机一批十六架，于十三日十二时二十七分侵入沈阳、本溪、抚顺及辽东清原、新宾上空侦察。**同日**十二时七分，敌机四批，分别侵入辽东省桓仁、辑安、通化〔1〕、宽甸一带上空侦察，其中一批飞机四架，余三批各为十六架。敌机这种行动，目的在迫我就范，故你们愈要坚定，不稍示弱”。

1月15日 晨二时，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你们方针很好，望主动积极反击敌人。”李克农十四日晚十一时来电说，第三小组会上，我方将仍坚持既定方针，集中打击对方的挑衅行为，但不回避修建机场问题；第四小组会上，则继续历数其提案在战俘问题上的荒谬之点，在任何情况下保持说理的态度，不给对方以抵赖的借口。

同日 为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南京部队“三反”情况的通报，起草给各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和各军，并告各中共中央局的批语，指出：“看了华东军区党委一月十三日的报告，甚为高兴，方针正确，劲头很大，望全军仿办。以此为标准去检查所属各单位的报告，凡属不痛不痒敷衍塞责者，其领导人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这类报告应立即予

〔1〕通化，今属吉林省。

以批判。”

同日 为转发西南军区党委关于“三反”运动第三周情况的简报，起草给各大军区、志愿军并告各中共中央局的批语：“西南军区党委一月十二日报告很好，其经验和华东军区党委一月十三日报告所述经验，大体相同。我们不怕贪污人数多，款数大，只怕不能发动群众斗争，不能把大中小各类贪污分子全部弄清楚。拿华东军区和西南军区这两个报告为标准去检查各级军区和各军的报告，就可以看出哪些是认真作检讨和认真发动群众斗争的，哪些是空话连篇，敷衍塞责的。对于这两类报告，必须表扬前一类，批判后一类，使三反斗争迅速开展。”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东局一月十三日关于划分贪污和浪费界限的四类标准的电报，起草中央批语，指出：“中央同意华东局一月十三日电所述划分浪费与贪污界限的四类标准（第一条略有修改），这和天津市委的三类标准是基本上一致的，望各地注意这种划分，以利开展三反斗争。”华东局将浪费基本上分为四种类型，即经验不足造成的浪费、制度不完善造成的浪费、经过组织批准的个人超支或为提高机关集体生活而造成的浪费、腐化性的挥霍，前三种不能和贪污相提并论。

同日 为转发贵州省军区党委关于“三反”运动三日简报第一号，起草批语，指出：“无论党、政、军、民哪一系统，哪一机关，只要是大批地管钱管物的，就一定有大批的贪污犯。很多机关压制民主，群众怨愤极深。有些机关官僚主义极为严重，领导者脱离群众，闹得不像样子。凡此一切，均须彻底揭发，才能解决问题。请你们以贵州的报告作标准去检查所属的报告，一切不痛不痒的报告，千万不要相信。”

同日 审阅聂荣臻一月十五日关于原冀中回民支队仍编为地方民族部队的请示报告。报告建议，在全军第二步整编时，将原

冀中回民支队由六十八军调出来，照山东回民武装办法，组成地方性的民族部队。毛泽东批示：“同意所拟办法。送刘格平、李维汉同志阅，退聂办。”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薄一波关于最近“三反”运动情况的汇报，讨论“三反”运动下一阶段的工作，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薄一波、杨尚昆、安子文、萧华、杨立三出席。

1月17日 阅张经武一月十六日关于拟请毛泽东等为西藏军区成立题词给聂荣臻的报告，批示：“聂：中央诸同志不要题词，张经武亦不要题词。”

1月18日 阅陈毅一月十六日关于华东部队“三反”运动分三个阶段进行和建议把士兵代表会议定为经常制度的报告，起草给陈毅并告各大军区、志愿军和各中共中央局负责人的批语，指出：“请注意在第二阶段中要集中精力尽可能查出一切大中小贪污犯，即是嫌少不怕多，有多少就应查出多少来。特别注意查出大贪污犯，不达目的，不应停止。”“我完全同意把士兵代表会议规定为经常制度，每月或每两月开会一次，每次开一天至两天，做两个工作：通过领导者的检讨报告和通过财经报告。这个建议极好，可以在三反后保持群众民主斗争的锐气。”

同日 晚八时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天津市“三反”斗争等问题，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薄一波、刘澜涛、黄敬出席。

1月20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在各地的企业、学校、办事处的“三反”斗争由各地党委领导的指示稿，加写第二条：“（二）凡各大行政区，各省、市、区政府及军区和军队在各大城市所设办事处、采买处，均由所在城市的党委

领导进行三反斗争及整党，有阻碍三反及不服从领导者照上条(1)办理。”

同日 审阅吴法宪一月十六日关于空军参战各师是否算志愿军的请示报告，批示：“应算作志愿军。”

1月21日 审阅修改薄一波关于中央各机关“三反”运动情况及对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并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薄一波报告的批语。薄一波的报告提出，为了把“三反”运动推向高潮，必须向干部和群众说明几个政策性问题，包括：《共同纲领》规定的民族资产阶级应有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仍然没有改变；在对资产阶级斗争中应集中打击少数大的不法工商业家；对犯有贪污的国家工作人员，根据不同情况分别给予刑事处罚、行政处分或免于处分；对民主人士、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政策，基本上是坚定地团结他们，又使他们在运动中受到阶级斗争的锻炼等。毛泽东对报告所作的修改主要有：（一）加写：“贪污一百万元左右的，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对这些人，一般均须从轻处理。”（二）在报告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所应有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仍然没有改变”一句后，加写：“如果认为对这个基本政策已有改变，那是错误的。”（三）在报告的“在对资产阶级斗争中，应集中打击少数大的不法工商业家，对于罪恶不大的工商业家，应争取他们自动坦白、悔过自新”一句后，加写：“争取他们拥护政府的政策，至少使他们保持中立态度。对于作正当经营的工商业家，必须予以保护，并团结他们向不法商人作斗争。”（四）在报告的“在对于贪污不满一千万元的国家工作人员”一语后，改写一段文字（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

(1) 指指示的第一条，其中规定：凡有阻碍“三反”斗争或不服从当地党委领导者，由当地党委负责处理，并向中央作报告。

“其情节较重者应判处一年以下的徒刑；其情节较轻，又能真诚坦白，酌情退赃，在群众面前公开悔过，并保证以后不再贪污者，一般可免于刑事处分，而分别给以行政处分，如撤职、调职、降级、记过等。其中有些对革命有功、偶然失足、情节甚轻者，可免于处分。还有些迹近贪污，但按实际情形不能叫作贪污者。所有免于刑事处分的人应责成他们积极参加反贪污工作，争取为人民立功。这样规定，就可使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免于刑事处分，以期更快地教育改造他们。”中央批语指出：“（一）批准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同志一月十九日向中央所作的报告（中央作了一些修改），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地。（二）将这个报告发给各级党委和党组（地方至县委为止，军队至师委为止），一律遵照办理。”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指出：二十日第三小组会上，你们的态度近于消极应付。“应正面说明‘为了保证停战协议的稳定，我方已经就第三项议程的条文，作了一切合理的建议，再不可能有任何改变。现朝鲜停战谈判已经基本上达成协议，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都承认了这一点，而你方还要蛮横坚持干涉我方内政的限制机场的无理要求，这完全是为了拖延和破坏谈判，没有其他任何理由’。”

1月22日 致电中南军区谭政和华东军区陈毅并告各中共中央局、大军区和志愿军，指出：“你们两个大军区规定一月份以三反为主，结合整编，我们亦已同意。现在看来不妥，必须以全力进行三反，三反完了再整编，全军不许有一人例外。时间照前通知延至二月十日。请你们至少每三天和各军区各军用电电话通话一次，不要单靠电报。你们两大军区所属各军区和各军的三反报

〔1〕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告，有许多单位劲头不足，空话太多，不能令人满意，请你们给以批评，严令他们限期检讨，尤其注意打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

同日 为转发华北军区党委关于“三反”运动的报告，起草给各大军区、志愿军并告各中共中央局的批语，指出：“华北军区一月二十日的报告很好，这即是中央的意见，请你们一体遵行。”“三反必须做彻底，做完再整编。”“请你们注意打大老虎。”华北军区党委的报告提出下一阶段集中力量捉“大老虎”的部署。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华北局机关“三反”运动补课情况的报告，起草给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和省市区党委等的批语，指出：“华北局所提出的问题（官僚主义）应在此三反斗争中予以解决，并将解决的结果报告中央。”

同日 阅钟赤兵一月二十一日日的检讨报告，批示：“检讨很好，只要尽情揭露和适当处理民航机构一切贪污浪费事件，并加以整顿，建立新制度，就算完成了此次三反斗争任务。对个人生活则加以约束，遵守制度，也就好了。”

1月23日 阅纺织工业部一月二十一日关于部属经纬纺织机器制造厂盲目施工造成严重质量问题的检讨报告，批示：“周、朱、陈、富春阅。此事值得注意。如此盲目施工，危险极大。”

同日 为转发空军党委一月二十二日关于空军直属机关“三反”运动的报告，起草给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和省市区党委等的批语，提出“三反”斗争展开后要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批语指出：“凡属大批地用钱管物的机关，不论是党、政、军、民、学哪一系统，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而且必定有大贪污犯〔大老虎〕。”“早几天还以为中央文教机关一个老虎也没有，经过最近两天的寻找研究，就发现至少可以捉到十五个贪污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因此，

请你们注意，在每一部门、每一地区三反斗争激烈展开之后，就要将同志们的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

同日 为转发中共山西省委一月二十日关于“三反”斗争的综合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委等的批语：“山西省委这个报告极好，务请同志们精读几遍，注意仿行，并在党刊上登载，使广大干部看到。”报告说：从已突破的大贪污案看，多数是由几个贪污分子甚或与奸商共谋的。要发动工商界开展反行贿、反偷漏、反盗窃、反暴利的斗争，作为反击资产阶级进攻的一个正面战场与“三反”运动密切配合。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薄一波、李富春、安子文、杨尚昆、萧华出席。

1月24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指出：关于增加空军能力一点，可在驳斥对方荒谬要求时说明：我方所提双方不得从朝鲜境外进入任何增援的军事力量，包括作战飞机的条文，即是双方不得在停战期间增加空军力量的保证。至于朝鲜境内任何设备的修建，则完全属于内政范围，你方绝对无权过问。

同日 晚上，同本月初赴杭州、南昌、长沙、武汉视察刚回北京的刘少奇谈话，周恩来、朱德参加。

1月25日 同粟裕谈话，指出：华东军区最近的“三反”措施是好的。这次“三反”运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已经钻到我们内部来了。但对资产阶级中奉公守法的还是要团结。打“老虎”要彻底，“老虎”不打光，就不整编。打“老虎”先要把领导人从楼上接下来，并解放中小贪污分子，孤立大贪污分子。北京已宣布贪污五百万元以下又能自动彻底坦白者免除刑事处分，五百万元至一千万元者按情况从轻处分，因而争取了多

〔1〕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数，组成了“打虎”的部队。但各地要注意两点：第一，不要宣布得太早，要在本单位中小贪污分子大体上搞完时宣布；第二，对贪污五百万元以下的，如果是贪污党费、慰劳捐款及使公家遭受巨大损失的，仍要视情况给以行政处分。

同日 阅第一航空学校党委一月二十二日关于“三反”斗争一周情况的报告，批示：“少奇同志阅后，送杨尚昆同志：中央办公厅须要开一次这样的会，范围可在科级以上，认真检讨全厅工作，制止浪费，并定出追查大中小贪污的计划，一定要把一切贪污分子查出来。”

同日 阅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党委的“三反”斗争报告，起草给志愿军党委并告东北局的批语，指出：“从你们的指导文件看来，也是着重在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而没有着重反贪污。当然，运动开始可以从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入手，以此作为运动的第一阶段，但第二阶段必须使各级领导者和群众将斗争的火力集中到反贪污的目标上去”。“运动的第三阶段是组织精干力量捕捉大贪污分子，捉大小老虎（一千万元以上的为小老虎，一亿元以上的为大老虎）。”“这是极为要紧的一个阶段。”

同日 致信钟壮湘〔1〕：“一月七日来信收到，甚为感谢。生活困难，甚念。睽违日久，不悉吾兄经历，未知所宜何事。惟据来信说，曾以教育为业，如愿从事教职，似可与当地主持教育的同志试为谋之。”

1月2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指示指出：“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

〔1〕钟壮湘，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在这个斗争中，各城市的党组织对于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作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只要形成了这个统一战线，那些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就会陷于孤立，国家就能很有理由地和顺利地给他们以各种必要的惩处，例如逮捕、徒刑、枪决、没收、罚款等等。”“全国各大城市（包括各省城）在二月上旬均应进入‘五反’战斗，请你们速作部署。”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北局一月二十六日关于结束“三反”要经过批准等问题的紧急指示，起草给各中央局、大军区和志愿军的负责人的批语：“华北局这一文件应成为各地的共同方针。不许草率收兵，必须扩大战果。停止讲空话，必须看成绩。”

1月27日 为转发中南军区党委关于从民主检查转入清查贪污的指示，起草给各大军区、志愿军的批语，要求“全军一切落后单位至迟均须于二月十日或十五日进入打虎阶段”。

同日 为转发华东军区党委一月二十六日关于“打虎”部署的报告，起草给各大军区、志愿军并告各中共中央局的批语，指出：二月份全军发动打大老虎。二月份不整编，全力做“三反”。争取在二月二十八日全军老虎打完，结束“三反”。

同日 阅朱德一月二十六日关于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报告，批示：“刘、周、朱、陈、彭真阅。同意这样作，请安子文同志根据此项意见用中央名义起草一个简单的指示（不要太长）。”朱德的报告说：为了克服对重要案件的处理软弱无力和对一般案件不能及时检查处理等缺点，提出以下意见：一、责成各级党委加强对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领导；二、健全办事机构，充

实专职干部；三、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与各级人民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分工合作，互相辅助。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薄一波、李富春、李维汉、安子文、杨尚昆、刘澜涛、萧华出席。

1月28日 为转发中共北京市委一月二十七日关于“打虎”经验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和省市区党委等的批语。批语介绍了北京市“打虎”的情况和办法，说“据称此种办法甚为有效，许多原以为没有或很少老虎的，查出了许多老虎。现在北京市机关企业暂定大老虎一百只，工商界三百只，共四百只，看来只会多，不会少。请你们参考中央和北京市两处经验，规定自己的打虎目标”。

1月31日 关于处理小贪污分子和检查、处理违法资本家，致电高岗并告各中共中央局、大军区和志愿军的负责人。电报指出：处理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不给刑事处分的小贪污分子，按照中央已通知的方针，除个别情节甚轻只要坦白悔过，酌情退款，保证不重犯，可以不给行政处分者外，一般都应分别给以行政处分，以示严肃。对付资本家须有准备，准备不好，不要动手。各城市准备条件不一致时，不要同时动手。又须有步骤。我们可以争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大中小资本家站到我们方面，或者保守中立，使百分之几（北京是百分之六）的反动资本家完全陷于孤立，社会舆论也就完全变得于我们有利了。这时我们对于大约占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的最反动的资本家（即行贿盗窃罪大恶极的资本家），在经过检查取得确实罪证之后，就可以给予惩处。我们打击百分之一左右的最反动资本家，可能争取绝大多数资本家拥护我们，而不会怨恨我们。这样也就可以用内外夹击的方法，把资产阶级安置在我们内部的堡垒即大贪污分子全部地清查出来。

同日 致电斯大林〔1〕：“最后达成停战协议的可能性已在增长。当然我们从来就没有、现在依然没有只从这一种可能出发，我们随时都警惕着美国统治者由于其国内外矛盾的发展仍有利用谈判的拖延甚至破裂以紧张国际局势的某种可能。在这方面，不论军事上、政治上，我们都准备以坚决的打击，不使敌人得逞。”

2月1日 审阅修改薄一波准备在北京市公审大贪污犯大会上的讲话稿，晨三时批示：“有所修改，请周酌定，于上午十时以前退薄一波同志收。”毛泽东修改时加写两段文字：（一）“王丕业和夏茂如一样，是个建筑工程师。他在此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中帮助人民政府检查出许多营造业奸商的偷工减料行为，追回金额共达八十亿，算是做了赎罪的工作，但因他的贪污罪不是自动坦白的，而是被迫说出的，故应处以五年徒刑。又因其坦白尚彻底，并已立功赎罪，故予缓期执行，以观后效；另在行政上予以撤职处分。孙建国原是共产党员（早已开除党籍），又是革命军人，竟敢勾结私商，贪污受贿，本应严办，姑念他在此次反贪污斗争中完全自动坦白其罪行，并帮助人民政府检举奸商，故处以十年徒刑，缓期执行，以观后效；另在行政上予以撤职处分。夏茂如、杭效祖，则均应给以降一级使用和记大过一次的行政处分，以示惩戒。”（二）“政府现在规定：只要贪污的情节严重，并有了确实的证据，不管他本人怎样拒不承认，满一亿元或者不满一亿元，都可以定其为大贪污犯，判处死刑。”

同日 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布关于部分部队集体转业命令。命令指出：“同志们要知道，中国民族和人民要彻底解放，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而我们已作了的工作，还只是向这个方向

〔1〕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刚才开步走。同志们要知道，在新民主主义建设中，以及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国内外的敌人会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和抵抗，我们还必须大力加强国防建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巩固国防，来保障祖国的建设；而发展工农业生产，又是加强国防建设的物质基础。”“我们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从创建之日起，就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本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英勇奋斗，艰苦奋斗。今天，我们人民解放军，将在已有的胜利基础上，站在国防的最前线，经济建设的最前线，协同全国人民，为独立、自由、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而继续奋斗！”“为此目的，除各特种兵和大部分陆军，应继续加强正规化现代化的训练，警惕地站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保卫祖国国防外，我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 XX 军 XX 师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XX 师的改编计划，将光荣的祖国经济建设任务赋予你们。你们过去曾是久经锻炼的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战斗队，我相信你们将在生产建设的战线上，成为有熟练技术的建设突击队。你们将以英雄的榜样，为全国人民的，也就是你们自己的未来的幸福生活，在新的战线上奋斗，并取得辉煌的胜利。”“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

同日 致电张宗逊并告习仲勋，指出：西北军区所属各级军区和各军二月全月应深入进行“三反”，着重反贪污，尤其着重打老虎，老虎不捉净不许收兵，不许整编。

同日 阅刘亚楼、吴法宪、王秉璋关于志愿军空军第三师八十六天战况的综合报告，写批语：“向空军第三师致祝贺。”综合报告说，第三师飞行员在与敌二十三次作战中，取得击落敌机五十四架、击伤九架的战果。

2月2日 就乔埃致信南日提出双方指定小组代表团以讨论

第五项议程的建议一事，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指出：即由你们起草南日同志的复函，说明我方同意在讨论第三、第四两项议程的同时，讨论第五项议程。现拟定原则草案如下：

“为保证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兹建议由敌对双方，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政府为一方，联合国有关各国政府为一方，在朝鲜停战协议签字并生效后三个月内各指派代表五人举行政治会议，协商：（1）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问题；（2）和平解决朝鲜问题；（3）与朝鲜和平有关的其他问题。”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局并陈毅、粟裕电：“接二月一日十四时粟裕同志来电，知饶漱石同志病情严重，必须休养。中央决定饶漱石同志立即开始休息两个月，各项职务由陈毅同志代理，由谭震林同志秉承陈毅同志主持华东局和华东军政委员会的日常实际工作。关于饶漱石同志休养的地点我们认为必须离开上海，最好到北京来。请粟裕同志再到上海和漱石同志当面商量决定，并和漱石同志同车来京为盼。”

同日 为转发李富春在中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党组一月三十日汇报会议上的“打虎”总结报告，起草发至省军级的批语，指出：“打虎必须从算账入手，许多同志忽视算账，专去逼供，这是不对的。”“大老虎不限一亿元以上，富春报告中所说的六条都应算作大老虎〔2〕。”“跟着清查经济内奸的发展，必能清

〔1〕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李富春报告中提出的6条是：（一）个人贪污1亿元以上者；（二）贪污不满1亿元，但对国家经济损失很大者；（三）满1亿元以上的集体贪污案的组织者、主谋者；（四）贪污在5000万元以上，但性质严重，如克扣救济粮、侵吞抗美援朝捐款者；（五）坐探分子，与私商勾结盗窃经济情报，或利用职位自肥，使国家损失1亿元以上者；（六）全国解放时隐瞒吞没国家财产或官僚资本未报，价值在1亿元以上者。

出许多政治内奸，有些经济内奸本人即是政治内奸，务请同志们注意这点。”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天津工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彭真、薄一波、李富春、杨尚昆、刘澜涛、罗瑞卿、安子文、萧华、黄敬出席。

2月3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转发中南局组织部将整党报告改为“三反”报告的通知的批语稿。在批语稿中的“各级党委、政府、群众团体和部队的领导机关，在三反斗争中，应该对所属干部作一次深刻的考察和了解，必须毫不迟疑地开除一批丧失无产阶级立场、贪污蜕化分子出党，撤销一批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和那些居功自傲、不求上进、消极疲塌、毫不称职的分子的领导职务”这段话后，加写：“（其中有些也应当开除出党），对于开除这些人出党和撤销这一些人的职务，不应当有可惜的观点，这是毫不可惜的，如果没有开除和撤销他们的决心则是错误的。过去我们党内对于这类坏人所存在的自由主义思想，必须坚决地加以克服”。

同日 晚上，同薄一波谈话。

2月4日 为征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对参加中立国监察机构的意见，分别致电贝鲁特、哥特瓦尔德〔1〕：“中立国监察机构，美方提议双方各请三个没有部队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每个国家指派一个将级军官为代表，共六人，组成这个机构。我们已同意这个办法，并拟请苏联、波兰、捷克三国派出代表，以便与美国拟请的瑞士、瑞典、挪威三国的代表平权议事，并好行使否决权。”

〔1〕贝鲁特，当时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主席、波兰人民共和国总统。哥特瓦尔德，当时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主席、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

同日 为转发三个关于“打虎”的文件，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大军区和志愿军的负责人的批语，指出：“现在中央一级和大行政区一级都已有了丰富的经验，但省市一级和地委一级则还不能说都有丰富经验，特别是地委一级经验尚少，所以还有许多报告说不出内行话，而是属于‘空话连篇’一型的。对于这类报告，必须立即予以批判。”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工矿企业中如何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稿，加写一条：“在三反期中注意领导生产，不要脱节，不要因此减产。如因三反忙不过来，致有部分的减产，也不要减产过大，并要在三反以后的增产中弥补三反期间减产的损失。”

同日 致电胡志明，感谢他对中越建交两周年的祝贺，指出：“我确信：越南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祖国独立与自由的坚决不懈的持久斗争，在您的领导下，在亚洲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同情下，终将获得最后的胜利。”

2月5日 致电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并告华东局、华东军区等的负责人，指出：你们打虎成绩还很小，你们还没有订出全省包括县以上党、政、军、民各系统的打虎预算，你们对下面督促不严，没有批判干部中对大贪污分子认识不足的右倾思想，这些就是你们打虎无成绩的原因。军区系统打虎也不起劲，应由分局负责统一指挥他们。无论何方面，凡打虎不力者立予批判，严重者撤销职务。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局、中南局、华南分局电：“中央决定派彭真同志去华东帮助三反和五反工作，重点放在帮助上海市委开展五反斗争。派罗瑞卿同志去中南帮助上述同样的工作，重点放在广州。”

同日 审阅修改中央军委给华东军区党委关于对三名贪污犯的处理决定的复电稿，加写一句话：“我全军对于贪污腐化犯法

乱纪情节严重的分子，必须一律予以惩办，不得姑宽。”

同日 下午，同罗瑞卿谈话。

2月6日 阅中共劳动部党组二月六日关于资产阶级向劳动行政部门进攻情况的报告，批示：“刘、周、陈、薄、富春阅，退李立三办。应通令各级劳动行政部门照所拟办法揭露和处理各种错误和犯法行为。应公开在报纸上予以揭露和批判。”报告提出的办法主要是：对接受资本家贿赂，处理劳资争议中袒护资本家、出卖工人利益的人，要比普通贪污分子加重处罚；各地劳动行政部门应选择上述典型，进行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做一次组织上的清理工作等。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薄一波、饶漱石、杨尚昆出席。

2月7日 阅薄一波二月六日关于中央一级机关“打虎”总结和部署的报告，起草给薄一波并告各中共中央局、大军区和志愿军的负责人的批语，指出：“请各中央局考虑在二月份仿照中央一级二月一日审判七名大贪污犯的办法，审判各大行政区一级的数名大贪污犯（一亿元以下的中小贪污犯暂时不要审判），其中有判死刑的，有判死刑缓期的，有判长期徒刑的，有判短期徒刑的，有判徒刑缓期的，有判免予处刑的（此项须给行政处分），借以推进打虎斗争。”

同日 批示彭真：“北京市公审资本家，提议推至下星期举行，以便在下星期一以前我们再研究一下。”

2月8日 阅杨耕田（1）二月五日关于判处大贪污犯死刑的请示报告，批示：“周：我已要彭真将北京公审资本家事延期举

（1）杨耕田，当时任中共察哈尔省委书记、察哈尔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察哈尔省军区政治委员。

行。张家口目前不要公审为宜。”

同日 审阅修改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连队中开展“三反”运动应注意事项的指示稿，加写一段话：“有些连干军阀主义严重，团营领导上须作充分准备，使连干在战士面前作好检讨，否则群众不平之气突然爆发，连干将无所措手足。连干中之错误严重不撤不足以平公愤者应予以撤换。”

2月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春耕工作的指示。指示如下：

（一）春耕即到，各省级、专区级和县级除对春耕作出全盘布置外，并应指定专人负责经常领导春耕工作，争取今年丰收，不得疏忽。（二）春耕前及春耕中，区乡两级均不得进行三反斗争，应以全力从事春耕工作（有些新区还有土改工作）。区乡两级的三反应放在春耕完成以后去做，并应在各中央局、各分局、各省委区党委的统一部署和统一号令之下进行。区乡两级已经发动三反斗争者，除县级以上党委为了典型试验的少数地点外，均应停止，以防发生混乱现象。”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中小贪污分子处分问题的补充指示。指示如下：“鉴于贪污一千元以下的中小贪污分子占全体贪污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五至百分之九十七，带着很大的群众性，中央已规定除对其中情节严重者应予以刑事处分外，其情节不严重者一般应免于刑事处分，而由其工作机关按其情况，予以不同程度的行政处分，以示严肃。其有在革命工作中一贯表现好，偶犯贪污错误，数量甚小者，还可以免于行政处分。此外尚有一些迹近贪污、按其实际不能叫作贪污者，不应以贪污论。如此规定，大约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中小贪污分子可免刑事处分（即不送法院，不判徒刑），而只给以行政处分，便于争取团结和教育改造这一批人，以利开展三反斗争和建设工作的。关于行政处分的项目，除中央已规定撤职、降级、调职、记过等四项外，兹再

增加警告一项，共为五项。估计有很多小贪污分子，例如五十万元以下而情节不严重者（此类人占全体贪污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上下），只须给以警告就可以了。关于贪污一千万元以下而免于刑事处分者，如是党员团员，他们的党籍团籍问题，如何处理，中央尚无成熟的意见，请你们根据三反斗争中处理贪污分子的情况提出意见，电告中央考虑。关于一切应给刑事处分的人均须立即开除党籍团籍，中央已有通知，请你们一律遵行。关于一千万元以上的贪污犯（即所谓大中小老虎），也应按其情节分为死刑、死刑缓期、无期徒刑、各种有期徒刑以及免于刑事处分而给以行政处分等类，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法院已于二月一日审判七名大贪污犯的事件中，给了方向的表示。”同时，批送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林彪、聂荣臻：“此件主要目的，是行政处分中增加警告一项，使大多数小贪污分子减轻对抗情绪，利于团结改造。是否适当，请审示。”

同日 阅高岗二月六日关于东北“打虎”计划的报告，复电高岗并告各中共中央局、大军区和志愿军的负责人，指出：“东北计划打大虎四千只，中小虎二万五千只，为全国六大区第一位。各大区虽然不能都向东北看齐，但要根据自己情况逐步提高预算，批判干部中的右倾思想。”“个别单位（例如华北第十军的几个师）已出现用逼供信的方法打虎，结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已纠正各地如出现此种情况请予迅速纠正。”

2月10日 阅刘澜涛二月九日关于华北军区后勤部“捉虎”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大军区和志愿军的负责人的批语，指出：“大贪污犯是人民的敌人，他们已经不是我们的同志或朋友，故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将他们肃清，而不应有丝毫的留恋或同情。”

同日 阅张宗逊、潘自力〔1〕关于西北军区整编问题给所属并报中央军委的指示，复电张、潘并告习仲勋及各中共中央局等的负责人，指出：“你们二月六日指示各部研究整编中的干部配备问题，是不合时宜的，是错误的。这只会分散各级领导者的注意力，是对于三反斗争的一个打击。请你们立即重发指示全力进行三反。禁止下面谈整编，首先要禁止你们自己谈整编。”

同日 为转发中共济南市委关于“五反”斗争中举行劳资见面会议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各大中城市市委的批语，指出“济南市委的领导艺术是成熟的，各城市正在开展五反斗争，必须研究济南同志的经验”。济南市委的报告说：在“五反”的坦白限期内和限期过后进行检查时，都要以厂店为单位举行劳资见面会议。会前必须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与组织准备。要争取多数直至全部职员投入“五反”斗争。

同日 为转发王鹤寿、吕东、安志文〔2〕二月四日关于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打虎”情况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大军区和志愿军的负责人的批语：“王鹤寿同志等的打虎经验极有用，请你们仿行，并在党刊上发表。”报告说：从已经查出的大贪污犯来分析，几乎所有大贪污犯都与资本家有密切关系，互相勾结；大贪污犯本人有不少就是钻进国营企业的资本家；已经暴露有过贪污腐化行为，而又经手过大批资财者，深究下去，往往就是大贪污犯。

同日 阅王首道转报的湖南常德专署专员对荆江分洪工程勘察后的报告，批示：“此事请周总理商水利机关查明情况，速予处理。”报告提议，在进洪闸未建成前暂不分洪，以免使长江改道，湘

〔1〕潘自力，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2〕王鹤寿，当时任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部长。吕东、安志文，当时任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副部长。

西北受灾。二月十七日至十九日，水利部召开会议，研究荆江分洪工程问题。二十日，周恩来召集水利部负责人和湖南、湖北两省有关人员开会，研究紧迫的荆江分洪工程问题。会议提出《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草案二十五日，毛泽东阅周恩来的来信及决定草案，批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及政务院决定，并请周将他的信抄寄邓子恢。三月三十一日，政务院作出《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其中指出：“一九五二年不拟分洪。如万一长江发生异常洪水威胁荆江大堤的最后安全，在荆江分洪工程业已完成的条件下，可以考虑分洪，但必须由中南军政委员会报请政务院批准。”

2月11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地、县、区“三反”运动和土改工作配合问题的指示，起草中央给中南局并各中央局的批语，指出：“关于在县、区、乡三级进行三反斗争必须有准备、有步骤和不违农时，中央已有指示。在中南、西南、西北这些土改和复查今年还是严重任务的地区，中央同意这样的观点，即‘如将乡一级算入，三反运动势将成为贯穿全年的严重斗争’，这是因为既须不违农时，又须先完成土改和复查，方能进行认真的二反斗争。在东北、华北、华东三区只须注意（一）不违农时，（二）待省、地、县三级三反基本完成腾出手来，（三）准备好下乡的三反工作队，就可以进行区乡三反，并争取在秋收前完成，这是完全可能的。”

同日 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两周年，致电斯大林，感谢两年来苏联政府和人民给予中国的援助。电报说：“这些援助大大帮助了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及国家的巩固。”“中苏两国强大的同盟是不可战胜的力量，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维护远东和平及安全的坚强保证，也是争取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胜利的保证。”

同日 下午，先后同王稼祥、彭真谈话。

2月12日 为转发第六十六军党委二月七日关于“打虎”经

验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大军区和志愿军的负责人的批语。批语指出：“许多部门的领导者不愿意担负多打老虎的责任，打虎预算甚低。上级分派任务，勉强承认，信心不高。有些人知道虎多，办法很少，打不出来。都因为没有认真研究情况，照六十六军同志们的话来说，都是官僚主义作怪。六十六军一个军的打虎预算是二百多只，是他们自己主动规定的，不是上级分派的（上级分派的任务太小）他们完成任务很快，是因为他们真正钻研了问题，想出了办法。他们也发生了一些‘左’的偏向，但随即纠正了。我希望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同志都有六十六军同志那样的主动性，将全部应有的而不是无中生有的老虎通通捉干净，否则运动结束，势必留下大批暗藏的老虎遗祸将来。”

同日为转发中共中央华东局二月九日关于华东局直属机关“打虎”经验的通报，起草给各中央局、大军区和志愿军的负责人的批语，指出：“华东局的九条打虎经验极好，文字亦生动易读。请各同志将此件连同本日通报的六十六军的经验一起印成小册，发给所属打虎小组阅看。华东局直属机关的九条经验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条，不打倒‘思想老虎’，老虎是打不出和打不净的。目前全国县团以上干部大多数尚未完全从思想上解决打虎问题，请各同志严重注意这一点。”

同日致信邓拓：“请将王芸生〔1〕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予以转载。文尾我修改了一点。”王芸生文章原载二月九日上海《大公报》，题为《资产阶级有没有猖狂进攻？是我们“制造阶级斗争”吗？》毛泽东删去文章的最后一句话“如此，我们人民民主政权的‘四友’就团结得更为亲密，共同胜利走向社会主义的前途”。《人民日报》于二月十三日转载了这篇文章。

同日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

〔1〕王芸生，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大公报》总编辑。

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薄一波、李富春、杨尚昆、刘澜涛、安子文、萧华出席。

2月1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公审大贪污犯问题的指示。指示如下：“二月下半月至三月上半月，除大行政区在得中央批准后可以公审方法审判一批内部的大贪污犯以外，工商界的大盗窃犯目前不忙于审处。各省市则内部的大贪污犯亦不忙于审处。至批准手续，华北局二月十日电所述应经中央和政务院总理批准，中央认为为慎重计，在头几批审判，是必要的。请你们加以注意。”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东北局二月十一日关于在“三反”运动中必须注意完成各项经济计划和防止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的批语：“东北局此电所说在三反中注意维持经济工作和对付反革命活动两点，在全国都适用，请各中央局同样加以注意为要。”

同日 复电彭德怀、邓华、陈赓、甘泗淇并告高岗、贺晋年：“二月九日、十二日两电收到，你们的处置是正确的。敌人很有可能乘我三反举行进攻，我军必须立即准备击退敌之进攻，第一线部队应完全停止三反，全力对敌。”

2月14日 审阅修改周恩来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两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稿，加写一段话：“我们不要侵犯任何国家，我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的斗争是为打退向我国边疆前进的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而去的。从去年七月开始在开城和板门店举行的敌对双方的停战谈判，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表尽了极大的努力，促使谈判走向成功。如果不是美国方面的故意拖延，谈判应当早就成功了。今后谈判能否成功，仍系于美国政府有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诚意。如果美国政府在朝鲜方面也和我们一样具有和平解决问题的诚意，则停战谈判是可能获得成功的。”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指出：可告对方，我方的三个中立国为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并声明双方应对彼此所提的三个中立国家同时表示同意。

同日 视察空军领导机关，对刘亚楼说：我们国家还很穷，经济还有待恢复，我们还要买苏联的飞机，要保障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人人都应注意节约。建设空军是很费钱的，我们一定要把钱花在刀刃上。朝鲜战争时间估计不会长了，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抓紧时机进行实战锻炼，要十分重视实战锻炼对空军部队的意义，哪怕求得打几个空战也是好的。“三反”运动可以推迟以后进行。二月十五日晚十时，审阅刘亚楼、吴法宪、王秉璋本日下午六时报送的关于空军部队作战计划的报告。作战计划提出：正在参战的空六师、空十九师要加紧寻找战机，求得锻炼；准备参战的空十二师、空十七师、空十八师陆续进入安东地区作战，从而使空军已组成的驱逐机部队到三月底前大部分能得到实战锻炼机会。毛泽东批示：“刘亚楼同志：我同意这个计划，可即照此施行。”

同日 视察海军领导机关，同萧劲光、刘道生、罗舜初〔2〕等海军负责人商量：因抗美援朝战争的急需，希望海军把准备购买舰艇的外汇先给空军，买抗美援朝战争急需的飞机，解决空军的问题。你们利用国内资金买材料，自己造，先造小舰。这样花钱不多，来得快，还可以积累经验，把我们自己的造船工业逐步搞起来。

同日 同彭真、薄一波谈话。

2月1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五反”中对各类资本家的处理意见的指示。指示指出：各城市市委、市政府均应于开展

〔1〕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刘道生，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罗舜初，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二副司令员。

“三反”和“五反”斗争的同时，注意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如果在一个短时间内出现了不正常状态，亦应迅速恢复正常状态。为着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除对没有问题的守法的工商户，应鼓励他们照常营业外，对于问题不大的半违法半守法的工商户，应于“五反”斗争开展后分作几批做出结论，安定他们。这一类工商户占全体工商户的绝大多数。上述两部分资本家，即守法资本家和半守法半违法资本家，占着全体资本家的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只有把他们争取过来，才能使占百分之五左右的反动资本家完全陷于孤立。大约占百分之五左右的资本家，又可分为两部分：

（甲）严重违法但不是完全违法的资本家，这类人约占百分之四左右，我们的政策是进行检查、补税、退财、罚款，但不捉人。

（乙）完全违法的资本家，这类人约占百分之一左右。又分三类。第一类，补税、退财、罚款、捉人，但不判徒刑。第二类，补税、退财、罚款、捉人、判徒刑，直至没收其财产。这类人不宜太多，尤其没收财产不可太多。第三类，判死刑，没收财产。这类人要极少。各地杀资本家要得中央批准才能执行。

同日 复电习仲勋：“二月十三日电〔1〕收到。（一）中央一级不准备对中小贪污犯举行审判；（二）西北大行政区准备在二月审判一批贪污犯是好的，应选择一亿元以上的大贪污犯，暂时不要审判一亿元以下的。并请先以量刑要点电告。”

同日 复信毛岳乔〔2〕：“二月八日来信收到，以前的信则未收到。你的生计困难，甚为系念，但我不便有所介绍，仍望在

〔1〕习仲勋在1952年2月13日电报里，建议中央推迟召开原拟于2月16日召开的公审贪污犯（包括若干情节严重的中小贪污犯）大会。

〔2〕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曾得到毛岳乔父亲在经济上的帮助。毛岳乔去世时，毛泽东曾寄去300万元（旧人民币）。

原地自己设法解决。”

2月16日 阅周恩来二月十五日来信。信中说：今日政务会议散后，我与陈云、薄一波两同志谈到“三反”斗争中业务停顿问题，现在已到应该予以解决的时候了。照中央一级“三反”斗争的情况看来，每个机关各级领导干部中抽出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人来专搞业务，留下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人继续“打虎”是完全可能的，而且不至于影响“打虎”工作。信中还说，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主席给黄敬指示的办法是主要的一面，同时，机关业务的恢复，也是必须解决的另一面。在中央及京、津两地的各机关，从现在起就可这样做，在全国，至迟三月一号也可以这样做了。毛泽东阅后批示：“周总理：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请速予调整。”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出席。

2月17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中南局的“打虎”新计划，起草给中南局、各中央局、大军区和志愿军的批语。批语肯定中南局二月十三日“打虎”新计划，认为这个计划把全国各大行政区的“打虎”水平提到了目前时期的最高度，请各中央局在适当时机酌量修改自己的计划。批语指出：“就大城市大工矿区，铁道运输系统，国营贸易系统，税收系统来说，则必须在运动正式发动后两个月至多两个半月内基本做完，否则于经济不利。并且在运动紧张期内必须指定一部分得力干部负责日常工作，维持正常财经工作的进行，生产、运输、金融、贸易均不能停顿。在当地三反运动正式发动一个月至多一个半月后，就应逐步增加领导日常工作的干部，这点很重要，请各同志注意。”

同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志愿军党委电：“转来三十九军二月十六日电收到。该军主力停止打虎，转入战斗，处置很对。其

他第一线各部凡发生同样情况者亦应如此处置。”第三十九军党委的电报说：今日五时半起敌人向我全线阵地猛烈炮轰，出动战车四十余辆，有大举进攻模样。为此，已令一一五师、一一七师暂停“打虎”，全力动员作战，粉碎敌人的进攻。

同日 为转发习仲勋关于西北全区“打虎”的报告，起草给习仲勋并告各中共中央局、大军区、志愿军的负责人的批语，指出：各级军区的“打虎”工作，一定要受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和地委的统一领导，否则不利，你们已经注意这点，很好。

“可疑错，不可打错，防止逼供信”，提得很好，在运动到了高潮时期，必须唤起同志们注意这一点。你们规定判徒刑须经超两级批准，判无期徒刑和死刑概归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批准，这是适当的。但撤职逮捕只宜一般规定须超两级批准，在“打老虎”的紧张期间有些须迅速处理者，在证据确实的条件下，应给可靠的主持人及其组织以当场处理之权，然后再上报追认。

同日 致信高岗：“为了解东北五反斗争情况，派陈伯达同志到沈阳看一看，有时间的话去长春、哈尔滨两处看一下，一星期到十天回来再去上海一带。陈到后请你给他以指示。”

同日 晨六时，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根据停战协定草案第二条第三十八款对方自己所提关于中立国的定义的规定，对方绝无理由拒绝接受苏联为中立国。晚八时，又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2〕：关于敌人拒绝我方提名苏联为中立国一举，必须予以严厉驳斥。应指责敌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反对我方提名苏联为中立国，苏联是在联合国中不仅一向反对干涉朝鲜战争而且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最力的国家。

〔1〕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月18日 为转发罗瑞卿二月十六日关于中南军区后勤系统“三反”工作的报告，起草给陈毅、贺龙、张宗逊、刘澜涛、高岗、彭德怀、杨立三的批语，指出：“请对你们那里后勤系统的三反打虎工作，严密掌握，务期彻底。至要至盼！”罗瑞卿报告中说，后勤部门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问题极为严重，不仅中南后勤如此，全国后勤大体如此，应引起严重注意。

同日 阅公安部二月五日关于“三反”运动情况的报告、劳动部二月十三日给大行政区及省市的劳动部门的指示，批示：“陈、薄、李及彭真同志：中财委及政法委各部门，都应仿照中央公安部和中央劳动部的作法，根据自己已得经验向各大行政区及省市的所属部门下达指令，指示他们进行反贪污和反资产阶级的进攻，指令内容要生动有力，不要一般化。”

同日 为转发中共贸易部党组和机关党委二月十八日关于“打虎”情况的报告，起草发至省市区党委，各财政、金融、贸易、工业及后勤部门等党组的批语，指出“大家注意肃清资产阶级的坐探及国民党派来的经济特务和政治特务”。报告说，贸易部已打的“大虎”中，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派进来或拉过去的经济坐探，占了半数以上。估计各大行政区贸易部和区公司、大城市商业局和市公司，也一定会有坐探。

同日 晨六时，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指出：对方既不肯解释拒绝苏联为中立国的理由，你们即应按照十七日六时去电精神猛力追逼，放松则易陷被动，对宣传不利。

同日 致电彭德怀并告李克农〔2〕，指出：双方现已同意的中立国定义是：“其战斗部队未曾参加在朝鲜的敌对行为的国

〔1〕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家”。因此，我们不必反对无战斗部队参战的挪威和瑞典。如敌方坚持反对苏联，我亦有权反对敌方所提的三国，因双方必须一次同时同意对方全部提名。

同日 下午六时半，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指出：政治会议如果开成，必然是以派遣军队参战的国家为限。说中国无参加的权利，否认我国为有关一方的政府，那是吓唬人的，不要理他。如果敌人再说，应理直气壮地告他：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政治会议是无法开成的，更说不到解决问题了。

2月19日 为转发南汉宸、胡景运〔2〕二月十四日关于“三反”以来金融市场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大军区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一）银行负责同志这一报告，如同中财委所说，除对国营和私营工业最近减产情况没有正确反映外，其余各项估计及所提意见都是正确的。（二）请各中央局和省市区党委注意这个报告建议各项中有关当地能做的几项，领导金融机关在三反和五反中予以解决。”报告汇报了“三反”运动以来金融市场的情况：物价继续下落，财政情况日趋好转，国家银行存款继续增加，贸易略有缩小，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入超和外汇不足情况已有转变，工业生产正常进行，私营商业加速改组。报告提出在此情况下，银行拟采取的措施有：结合私营工商业的“五反”，请各地党政部门积极掌握合营及私营银行钱庄的“五反”运动，彻底整顿改造行庄；适应物价稳定的新情况，对私利率及时下降百分之二十，货币储蓄月利率降至百分之一二左右；货币发行不应紧缩，银行可适当增加贸易放款；加强外汇的运用，以避免风险；银行的“三反”运动继续开

〔1〕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南汉宸、胡景运，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副行长。

展；本年公债可考虑不发，印制债券工作似可停止。

同日 阅聂荣臻关于敌人在朝鲜战场大面积空投苍蝇、跳蚤、蜘蛛的报告，批示：“请周总理注意此事，并予处理。”报告说，估计美军在搞细菌战，如此，防疫工作即须火速以大力进行。当晚，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报告已计划加紧化验前方业已送回的昆虫细菌和往前方派送防疫队与疫苗、粉剂及其他器材等。

2月20日 为转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三反”、“五反”的两个报告，起草给北京市委，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委的批语，指出：“请各大中城市市委根据中央已发关于五反的指示去指导五反斗争，并吸取北京市的经验。”北京市委的一个报告说：“三反”、“五反”运动深入并进入最高潮后，对贪污犯和违法资本家要严格控制逮捕名单。只捕那些非捕不可的；可捕可不捕的或者可以缓捕的，即不逮捕或暂不逮捕。逮捕人数，工作人员不超过总人数千分之三，工商界不超过总户数千分之十。北京市委的另一报告，提出了对一些拒不交代的大的严重违法工商户进行检查的具体办法，并说准备二月底以前把百分之九十的工商户基本处理完毕。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新的“捉虎”计划的报告，起草给华北局、各中央局并告各大军区、志愿军的批语：“华北局二月十七日新计划收到，很好，发给各同志参考。其中说到追赃款及须有五天至七天的休整等项，是必要的，请同志们注意。”报告说：对于捉住的“老虎”，要查清赃物、赃款的下落，并令其吐出全部、大部或一部。各级党委和政府应抽出一定人员管理其他日常工作，特别是春耕和工矿企业生产部门的工作。地委以上领导机关应随时纠正“捉虎”中逼供和硬凑“老虎”的现象。各地在组织两三个战役之后，应有五天至七天的停顿，以清理案件，总结经验，整顿队伍，然后再战。

同日阅中共中央华东局批复南京市委“五反”报告的电报，为中央起草复华东局电，指出：“在五反斗争真正开展、同志们头脑很热、很想多捉人多封店的城市，如济南、南京等，按照中央指示予以适当节制是必要的。在还没有开展的城市，如青岛、无锡、上海等，则不要强调整制，而应继续批判右倾思想，强调开展斗争。”

2月21日晨二时，致电金日成并告彭德怀、李克农〔1〕，指出：“敌人自一月二十八日起，连续在朝鲜前线以飞机撒放毒虫病菌，经化验业已证明其中含有鼠疫、霍乱及其他病菌，现除令前方进行动员随时扑灭、焚毁外，已于今日起以飞机赶送三百四十万人份的防疫苗，五千磅的杀虫粉剂及其喷射器材到安东转运前线，并加派若干防疫队前往。除此，我们应在世界人民面前进行控诉，并动员舆论反对。”

同日阅聂荣臻关于美军在朝鲜进行细菌战我方应采取的对策的请示报告，批示：“同意。第二项〔2〕是否马上办，请周酌定告我。”随后，周恩来批示聂荣臻、粟裕：“第二项现暂缓办，视情况发展再定，已报告主席。”

同日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出席，薄一波、李富春列席。

2月22日为转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处理不法工商户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北京市委、各中央局并转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批语指出：“已告北京市委将守法工商户由一万户扩大为一万四千户左右，即是对有些有小问题的工商户向他们当面指出，他们

〔1〕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请示报告的第二项提出，建议我国政府成立非常防疫委员会领导处理有关防疫事宜。

有小错误，这是不对的，以后不要再犯，但因其问题不大，应归入守法资本家一类。这样处理，使守法面大一点，对我们有利。”

“哪些是守法户，哪些是半违法半守法户，在实行处理时，除要资本家自报公议，并须由经理和会计分别签字于调查表格外，还一定要本厂本店工人店员讨论通过。”“上海要三月上旬才能正式大规模发动五反斗争，至快要三月下旬或四月上旬才能这样做。上海迟一点发动五反对整个经济有利。其他城市，请各地同志酌情决定。”“城市中在处理了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的守法和半守法两大类资本家以后，人心就大定了，暂时停顿或半停顿或不活跃的经济活动就可恢复了，占百分之五左右的反动资本家就完全陷于孤立了，我们也就可以腾出手来从容地惩治这些反动资本家。”

同日 为转发谭政二月二十日关于中南军区“打虎”部署的报告，起草给谭政并告各大军区的批示：“请各大军区亦按中南所提部署去做，力争三月底完成全军三反任务，包括营连和县大队独立团的三反在内。四月一号起实行整编。”

同日 为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打虎”战绩与今后部署的报告，起草给华东军区党委、各大军区及志愿军党委的批语，指出：“目前全军打虎战斗已达高潮，再有一两个战役，即可基本解决问题，转入营连及县大队独立团的三反斗争。因此目前第一要注意打尽老虎，不要松劲；第二要注意调查研究，算大账，算细账，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注意这两条，就可获得全胜。”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局电：“兹派薄一波同志来你处，其任务是在华东局的决定下考察及帮助上海方面的三反和五反工作。彭真同志因事暂不能来。”

2月23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五反”斗争的报

告，起草中央给中南局、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请各省委就省城的五反加以精密研究，作出结论，以便正确地指导省城及全省城市的五反斗争，务使五反在全国范围内不出大的偏差。”“因为三反、五反同时进行并要同时保证不犯错误，必须将县、区、乡三级的三反及县城和县范围内的市镇的五反，除少数典型试验外，一律坚决推迟到春耕完成以后去做。”“各中央局和省委还应派员帮助一二个地委研究一二个中等城市的五反部署，并以经验电告中央为盼。”中南局的报告分析了在“三反”、“五反”斗争中中南区经济生活呈现的不正常状态及其原因，并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

同日 阅中共上海市委关于“打虎”不力问题的检讨报告，复电陈毅、谭震林和上海市委，指出：“希望你们从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十日，分为三期，每期五天，共十五天，抓紧检查督促，改进方法，基本上完成上海市各系统内部的三反打虎任务。从三月十一日起阵容整齐地正式开展上海市工商界的五反斗争。”

同日 下午，会见从朝鲜战场短期回国治病的陈赓，聂荣臻、萧华、杨立三参加。

2月2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县、区、乡三级暂不进行“三反”和“五反”的指示。指示说：“县、区、乡三级的三反，除省委地委为了典型试验之目的，可以个别地进行以外，一律待春耕完成以后再作，以免引起混乱，此点前已通知。”“县、区、乡某些违法资本家中的五反，目前一律不要进行。已进行者，一律停止。将来何时进行及如何进行，中央将根据情况另行通知。”中等城市的“违法资本家中何时进行五反及如何进行五反，须由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区党委根据中央二月十五日指示严格审查控制，逐一批准，以免混乱”。

同日 致电习仲勋：“中央宣传部同志们根据他们检查《群

众日报》二月五日和七日的言论，有一个电报给西北局宣传部〔1〕，提出了批评。我不明了西安市‘五反’斗争的实际情况，不知中央宣传部的批评是否适当。请你对西安市的工作加以检查，并以你的意见电告为盼。”二十八日，习仲勋向毛泽东报送了检查西安市“五反”斗争的报告，其中说：中央宣传部对西安市《群众日报》的批评完全正确。《群众日报》二月五日和七日关于西安市两个会议的报道和言论以及西安市某些负责同志的发言，确有严重错误。在西北局的帮助和指导下，西安市纠正了“五反”初期发生的右的倾向。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2〕，指出：巨济岛事件亦已通知新华社发消息，《人民日报》准备社论进行配合。

〔3〕关于目前谈判，在限制机场、自愿遣返及苏联参加中立国监察机构的三个问题上，我们绝对不能让步。

同日 晚上，同彭真谈话。

2月26日 阅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二月二十五日关于

〔1〕指中共中央宣传部1952年2月23日关于西安《群众日报》发生右倾错误给西北局宣传部的指示。指示对《群众日报》2月5日刊载的西安市协商委员会扩大会议的报道等材料，提出了批评，认为报道和言论违背了中央历次指示的方针，表现了严重的右倾思想：主张“五反”运动不是反击资产阶级进攻的一次阶级斗争，而是资产阶级内部的事情；主张这场斗争所依靠的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资产阶级自己；主张这场斗争的领导权不属于工人阶级，而属于资产阶级；主张进行这一斗争的方针不是发动群众，而是由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去反对另一部分。

〔2〕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3〕1952年2月18日6时，在巨济岛上美国第62号俘虏营中，美方人员把中方被俘人员五千余人包围起来，进行所谓“个别讯问”，强迫实行“甄别”，遭到中方被俘人员的拒绝，双方发生冲突，美军开枪射击，中方被俘人员死亡75人，受伤139人。美军死1名，伤二十余名。对巨济岛事件，新华社23日播发消息，《人民日报》24日进行了报道。

“打虎”工作的报告，批示：“此件很好，发各同志〔1〕参考。强调要材料，要证据，普遍推行算大账、算细账、追赃款、追赃物的方法，严禁逼供信的方法，是目前打虎作战是否能取得完全胜利的关键的所在。”

同日 阅新华社福建分社二月二十五日给总社的电报。电报说，美蒋特务最近计划谋害陈嘉庚〔2〕，以嫁祸于我，破坏“五反”运动。毛泽东批示：“周总理：请指示福建当局加强对陈嘉庚的保卫工作，或劝陈来京。如何，请酌处。”

2月2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分步骤开展城市“五反”斗争的指示。指示指出：“直到现在大多数中央局、分局、省委、区党委的精力，主要还是放在三反方面，未对五反作精密的研究，或虽有研究尚未向中央作报告，也未对下面作明确的指示，这是不妥当的。第一，必须确定暂时不在县、区、乡搞五反。第二，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和区党委，必须在自己所在地的城市（包括大城市和一部分中等城市）对五反斗争作精密研究，每五天或七天找市委书记和市长开会一次，分析情况，决定策略，取得经验，推动斗争，并将情况和意见随时电告中央。从三月一号起，各中央局、分局、省市自治区党委向中央报告的内容五反多于三反。因为三反时间较久，情况较清楚，策略已熟，经验已多；而五反则时间短些，情况尚不甚清楚，策略尚不甚熟，经验尚不甚多。第三，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区党委对所辖境内的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大体应分为三个步骤开展五反斗争。”“请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区党委和大中城市市委，凡未向中央作五反报告的，

〔1〕指各中共中央局、各大军区和志愿军的负责人。

〔2〕陈嘉庚，爱国华侨领袖。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常委、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

均于电到五日或七日内向中央作第一次报告，以后并要随时作报告。”

同日 复电高岗：“二月二十六日的电报〔1〕收到。你的意见很好。凯丰〔2〕电报中主张拍军队一点是正确的，已采纳，恩来同志已将提纲〔3〕作了修改（加上拍军队和拍民主人士），我已看过发出。凯丰电报中的其他部分则是不正确的，已托陈云、陈伯达〔4〕二同志向你及凯丰说明。凯丰有意见（不论意见正确与否）打电报给我是好的，他以后有意见还可打电报来。有意见不打电报则不好。以上请转告凯丰。”

同日 阅萧华二月二十七日关于对最近毕业的一批女飞行员进行宣传的安排的报告，批示：“请周调查一下是否可行，如可，请告萧华办理。”报告说：据空军报称，航空学校最近毕业了一批女飞行员，她们已掌握驾驶运输机技术。为在“三八”节配合宣传中国妇女积极参加国防建设，拟在三月八日以三至六架运输机在北京上空散发传单，派代表在北京市妇联召集的纪念会上讲话，并作适当的文字报道和拍摄新闻电影。二十九日，周恩来批示：“同意照此办理。”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5〕，指出：巨济岛

〔1〕高岗在这个电报里，转述了凯丰对反映“三反”的纪录片拟出现某些领导人的镜头有意见，要求向毛泽东反映，并说他有意见向主席提出，这是应该的。

〔2〕凯丰，即何克全，当时任中共沈阳市委书记。

〔3〕指中共中央宣传部1952年2月19日关于“三反”运动大型纪录片的摄制提纲（草案）。

〔4〕陈云1952年2月底至3月初在东北视察工作。陈伯达1952年2月受中央委派在东北了解“五反”斗争情况。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事件仍应继续提抗议，予以追击，以便配合我方在自愿遣返问题上所施的压力，逼其让步。如对方问奉谁之命提抗议，可答以奉我方司令官之命。关于细菌问题的证据，敌机所投纸弹有已爆炸及未爆炸者，你们可向志司索取照片。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出席，李富春列席。

2月29日 复电薄一波：“二月二十七日的电报收到。你和华东局、上海市委诸同志共同决定将上海五反停止下来到三月二十号再行发动的方针及各项处置是完全正确的。这样既有利于现在的三反，也有利于三月二十号以后的五反，也有利于全国的经济形势。”

同日 阅李富春二月二十七日报送的他起草的追赃规定初稿和附信，批示：“周总理：此件须加修改，请你处理，并请与彭真商酌，吸收北京市的经验。此外，关于百万元以下的人大部予以解脱，宜发一电示，亦请你酌定。”附信介绍了追赃规定初稿有两个重点：一是严肃地贯彻中央政策，凡是确定为贪污犯者（五十万元以下者已决定不算贪污，我还主张一百万元以下者不算贪污），分别情况处理。二是关于赃款归谁接收，公款一律归国库，群众性的款物分别交还原主。

同日 阅陈毅二月二十五日关于华东军区“打虎”情况和部署的报告，复电陈毅，指出：“中央正在考虑不单是五十万元以下而且是一百万元以下的所谓贪污分子，一般不算作贪污而算作占小便宜或公私不分，以便解脱更多的人，利于教育；但少数情节恶劣者仍应算贪污。此点中央当另有通知。”“军队不要举行公审。”“连队三反尚无经验，可先在若干单位试行，连队的严重问题是军阀主义，也有贪污，应来一次改革，但做法应与机关有别，以教育为主，同时搬掉若干坏的。”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指出：从敌人的发言稿可以看出敌人的所谓让步只是将中立国小组从访问战俘营改为在交接地点访问全部战俘，将自愿遣返改为不强迫遣返，这在实质上并无不同，你们在驳斥对方的所谓让步时必须强调此点。从原则上讲，我们既不能同意有条件地遣返战俘，亦即不强迫遣返战俘，也不能同意将我方战俘强分为战俘与所谓南朝鲜平民两类，因此，我们不能在条款上承认此项规定。

同日 阅聂荣臻关于敌人仍在朝鲜战场撒放昆虫及可能进行战术性原子武器试验的预防措施的报告，批示：“照办。”

3月1日 关于“五反”中不提反暴利口号写信给各中共中央局、大军区的负责人：“西南局二月二十九日的电报〔2〕是正确的，发给你们参考。当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处提出反暴利口号时，大资本家即迅速接受，因为这个口号可以被他们利用去威胁中小资本家，说他们的利润中也有暴利。就目前时期来说，真正违反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暴利，已包含在五反的各项对象中，故只应提五反，不应再提反暴利。隐匿侵吞敌产、逃走外汇两事，国家已有法令，又可包括在‘盗窃国家财产’一项内。倒卖金银、偷卖鸦片白面两事，国家亦有法令，可依法办理，不必于五反外另立项目，变为六反七反。”

同日 阅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对《福建日报》一九五二年一月“三反”报道的意见和福建省委宣传部关于《福建日报》

〔1〕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指中共中央西南局1952年2月29日对川西区党委关于“五反”中资本家不法行为临时计算办法的批示。批示认为：暴利的提法是很不妥当的，因为它不好计算，掌握不紧就容易形成以算剥削账的办法去算暴利，造成混乱，从政治上说也不够策略。暴利应列入盗窃国家财产或因此而使国家受到的损失为好。

“三反”报道发生错误的检讨报告，批示各中央局：“我希望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委党委的宣传部都照华东局宣传部（前已通报）和福建省委宣传部一样检查一次自己的工作，是否在三反、五反斗争中管好了自己的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的工作？”

同日 审阅李富春本日报送的关于起草处理贪污分子的规定和追赃规定稿的报告，批示：“请周酌处。还要宽一点，富春说的还太严了。”

同日 为转发薄一波二月二十八日关于华东“三反”、“五反”情况及部署的报告，起草批语：“华东部署很好，各区均可仿行。”报告介绍了华东全区“打虎”汇报会议作出的五项决定：（一）大行政区、省、地三级内部“三反”规定到三月底完成，县一级规定在四、五、六三个月内分批完成，区、乡级争取在秋收以前完成。一面贯彻“三反”、“五反”，一面维持经济，并只许做好，不许做坏，拖长时间是必要的。（毛泽东对这段话批注：“请各区照此办理。”）（二）“三反”必须搞彻底，不许有夹生饭。（三）坚决执行中央关于抽出三分之一的人来维持生产、维持经济的方针。（四）以后不单独提打“大虎”战役，而是要把大中小贪污犯都清理出来。（五）全区“打虎”任务不再追加，力求有多少打多少，实事求是，防止逼供信。城市“五反”着重在既能痛惩资产阶级，又能很快地形成“五反”统一战线。

同日 晚上，同彭真、刘澜涛谈话。

3月2日 为转发中共上海市委三月一日关于“打虎”第三战役情况及今后部署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华南分局及罗瑞卿的批语，指出：“上海自确定暂停五反，专力三反以来，成绩很大。所定各项打虎策略和注意维持经济秩序，都是正确的。各地如有三反、五反不能同时兼顾者，应暂停五反先搞三反，待打虎基本胜利，腾出手来，再搞五反。”毛泽东对报告中的“对全

市十六万三千工商户进行排队工作，把其中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具体数字和比例指出来”这句话，批注：“应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五类。”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军事系统大贪污犯公审办法的指示：“军事系统的大贪污犯不要单独举行公审，要由中央局和大行政区政府主持统一举行公审。此种公审有一次即够。公审名单先报周总理批准。中南局三月一日电所说办法〔1〕，各大区可以仿行。”

同日 下午，同彭真谈关于加重处罚向干部行贿者的问题。

3月3日 为转发华北军区党委关于目前“三反”情况和今后部署的报告，起草中央军委给各大军区、志愿军党委并转发至师一级党委的批语，指出：请你们亦照华北军区对贪污分子那样按照不同的情况分别给以处理。“在三反运动的最后一个阶段，必须号召各级干部关于自己和资产阶级的关系〔家庭、亲戚、朋友〕，用开会和写检讨报告的方式，交代清楚。这一点很重要，望照办。”

3月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在“三反”中检查和解决公安、司法机关违法乱纪行为的指示。指示指出：“请你们务必注意在此次三反中全面检查和彻底解决所属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的违法乱纪行为，不惜将违法乱纪和贪污蜕化分子撤销职务，严重者判处徒刑。其最严重而有民愤者，应予枪决。”“长沙市委、市政府和湖南公安厅对于长沙市公安局如此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负有责任，应由湖南省委、省政府对情况加以周密审查，分清责任

〔1〕中共中央中南局1952年3月1日给中央并周恩来的电报中说：拟于3月10日以前召开一次包括中南局、湖北省、武汉市和中南军区4个系统公审大贪污分子大会，打算对7至9名大贪污分子分别给以死刑、死刑缓刑、徒刑、徒刑缓刑、释放等处理，借以推动目前正在紧张进行的“打虎”运动。

轻重，给以适当处分，并将结果报告中南局和中央，同时通知全省党政机关，引为鉴戒。”“与此同样，各地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如发现有与长沙公安局同样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当地党委、政府和上级公安司法机关亦应受到适当的处分，以为放纵不法行为及以官僚主义态度对待工作者的鉴戒。”

同日 为转发谢觉哉三月四日关于“打虎”工作给各大行政区民政部长和各省市、行署民政部门厅局长的指示，起草给中共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的批语，指出：“三反以来，除若干部门注意了给下级以三反和打虎的指导以外，大多数部门只顾自己打虎，忘了指导下级，同时也忘了本身业务。这种状况，应迅速改变过来：要一面打虎，一面维持业务，一面用电报电话与所属下一级至下两级联系，指导其打虎工作与业务工作。”**同日**复电高岗：“二月二十八日电〔1〕悉。拟俟陈云同志回后，就苏联冶金设计院院长对鞍钢的恢复与改建的设计工作的成就，以我名义电斯大林同志致谢。对设计院院长赫列波尼可夫同志本人，拟由政务院送给感谢状一纸，如其很快回国，则此感谢状将另行补去。”

同日 阅王震三月一日关于新疆党政军“三反”情况的报告，批示：“刘、周阅后，转王震阅：此报告中（二）条〔2〕（2）（3）两项似太严，还要宽一点。究竟如何才恰当，请周研究后找王震一谈。其他各条办法都好。”报告说：鉴于新疆有复杂的民族问题和起义军队等问题的特殊情况，对军委直属队及第二、第

〔1〕高岗在这个电报里请示：是否以毛泽东名义对参加鞍钢设计与改建的苏联冶金设计院院长给予奖励，或者致电感谢斯大林。

〔2〕这个报告的第2条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三反”斗争中的一些问题的处理意见。

六两军，第二十二兵团，第五军和本地民族干部在“三反”斗争中的问题，拟分别不同情况在政策上区别对待。

同日 阅粟裕本日转报陈毅当天上午电话内容的报告，批示：“刘、朱、周阅，交粟裕办。同意陈毅同志提议：上海市委工作，由陈丕显同志负实际责任。华东局工作，在饶漱石同志病假期内由谭震林同志代理书记；但大事仍应和陈毅同志商酌，取得陈毅同志同意然后处理。如刘、周、朱同意以上各点，即请粟裕以电话告陈、谭。”三月九日，起草中共中央复陈毅并华东局、上海市委电：“三月六日电报收到。同意在饶漱石同志病假期内以谭震林同志代理饶漱石同志职务，但大事仍须取得陈毅同志同意而后执行。上海市委因陈毅同志事繁，刘晓同志病假，同意以陈丕显同志代理第一书记职务。”

同日 阅林业部二月二十二日关于一九五一年全国森林火灾情况的报告。报告说：一九五一年上半年全国共发生森林火灾四千二百七十次，森林被害面积达三千四百五十万亩，损失木材六百七十七万立方米。这些火灾以东北为最严重，主要是松江和黑龙江两省。东北所损失的木材占全国森林火灾损失木材数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毛泽东批示：“应给松江〔1〕、黑龙江两省党政负责人以处分，不知是否已有处分？”

同日 为转发萧华关于中央军委直属部队开展“打虎”运动情况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大军区和志愿军的负责人的批语：“军委直属部队打虎经验很好，各部可以仿行。”报告说：整个军委直属部队的“打虎”运动一般是健康的，但个别已发现“左”的逼供信偏向。军委直属总党委决定：要求各单位一般争取在三月十五日以前圆满完成任务，并防止与纠正“左”的偏

〔1〕松江省于1954年撤销，所辖地区划归黑龙江省。

向。着重靠调查，算细账。领导上不要急躁，不要冲动。禁止人格侮辱和变相肉刑，不得采用“疲劳战术”和“车轮战术”。

同日 为转发华东军区三月二日对营连及县区武装“三反”工作的指示，起草给各大军区和志愿军的批语：“此件很好，你们应根据自己的情况发布同样的指示。”指示说：连队“三反”运动的目的，除了肃清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之外，还应明确提出克服军阀主义、加强官兵团结、增强斗志、提高战斗力。连队“三反”必须掌握稳健慎重、教育为主的方针。

同日 阅沈阳三日讯资料《抚顺市郊发现大批昆虫》，批示：“周总理：请准备在辽东、辽西两省全体军民中注射防疫苗。冀东、冀中及京津也要作准备。是否有这样多的疫苗，望告。”资料说：三月二日东北军区卫生部接到公安一师的报告，在抚顺市以南七十华里的北大沟该师驻地发现大批昆虫等，当即派出检验人员到现场采集标本。东北军区卫生部已派出三十人的防疫队，配合当地政府组成防疫委员会进行室内消毒，并将上述抚顺市以南地带加以封锁。

3月5日 晨，听取彭真汇报天津情况。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在“五反”中对工商户处理的标准和办法的指示。指示的主要内容如下：“中央批准北京市委建议《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处理的标准和办法》〔1〕，认为这是

〔1〕中共北京市委的这个文件共有9条。毛泽东审阅时在第9条“偷税漏税、偷工减料两项违法所得，一般只补退1951年的，1951年以前的免于补退。但拒不坦白及情节特别严重者，得酌情令其补退一年半或二年，二年半或三年”之后，加写一段话：“其他各项违法行为所得一般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算起。惟隐匿侵吞敌伪财产应自日本投降之日算起。其中隐匿侵吞敌伪财产的数量不大，并对国家无严重危害作用者，可以不予追究。”

正确的。” “这个文件所采取的基本原则是过去从宽，将来从严（例如补税一般只补一九五一年的）；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望各级党委在五反中掌握这几条原则。” “在五反目标下划分私人工商户的类型，应分为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五类。就大城市说，前三类约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后二类约占百分之五左右。” “我们既要在此次五反中处理这一大批小资本家，给他们做出结论，也应尽可能努力将和小资本家数目大略相等的独立工商户加以处理，给他们做出结论，这对于目前的五反和今后的经济建设都是有利的。这两种工商户一般都无大问题，给他们做结论是不困难的。做了结论以后，我们就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 “将完全守法户和有些小问题的基本守法户分开，又将基本守法户中偷漏税一百万元以下的和偷漏税二百万元以下的分别对待……这样做，可能发生很大的教育作用。” “行贿性质严重，必须严肃处理。但行贿的人很多……若只处罚少数人而对多数人不予处罚，则很不妥当，若均给处罚，则受罚者超过全工商户四分之一，打击面又太宽了。故于北京建议第六条中加上‘情节轻微者除外’一句。” “各大中城市中，有些市委，对于各类工商户的情况极不明了，如何分别对待这些工商户的策略观点又不明确，工会和政府工作队（或检查组）的组织和训练甚为潦草，便仓卒发动五反，引起了一些混乱，望这些市委提起注意，迅速加以克服。此外，检查违法工商户必须由市委、市政府予以严密控制，各机关不得自由派人检查，更不得随便捉资本家到机关来审讯。又无论三反、五反，均不得采用肉刑逼供方法，严防自杀现象发生，已发生者立即订出防止办法，务使三反、五反均按正轨健全发展，争取完满胜利。” “县、区、乡现在一律不进行三反、五反，将来何时进行及如何

进行，中央另有通知。个别已在县城试做五反在区试做三反者务须严格控制，不得妨碍春耕和经济活动。中等城市也不要同时一律进行五反，而要分批进行，并须在严格控制下进行。这一点前已通知，现再重复说一遍。”

同日 为转发薄一波三月三日关于上海“五反”准备工作和部署的报告，起草批语：“此件发各中央局转各城市市委参考。在任何城市进行五反，必须分析情况，确定策略，组织工人、组织干部（工作队）、组织指挥机关，并做出全盘计划，方能真正开展五反斗争，并在斗争中不断修改自己的计划，决不能盲目地进行五反。市委须每天指导各区，几天总结一次经验。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须几天讨论当地五反工作一次，决不能满足于只发一二个原则指示。”毛泽东对报告作了一些批注。报告说将全市资本家分为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四类，毛泽东批注：“应按中央新的划分标准，划分为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违法半守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五类。”报告提出“五反”运动应“加强领导、规定纪律、严密控制”，毛泽东批注：“严密控制，非常需要。有些城市控制不严，出了乱子。”

同日 阅西北军区党委三月二日关于对第二十二兵团贪污犯的处理意见的电报，批示：“周：还是王震规定的时间（派去政治委员和建立共产党时开始算起），你与王震谈时请以此告他。”西北军区党委认为，清查处理二十二兵团的贪污犯，应从该部起义时查起，不宜一般地缩减这一时限。毛泽东不同意西北军区党委的这个意见，同意王震在三月一日关于新疆党政军“三反”斗争情况的报告中所重申的“把清算贪污的界限划定从改编建立共产党的领导（政治工作）以后算起”。

同日 阅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第四十四期上的一篇内

部通讯，批示：“下面是新华社南京记者发来的内部通讯，说的是争取高级店员的经验，很好，特为转发，请各地仿行。”

同日 阅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党委三月三日关于“三反”斗争情况的报告，批示：“务请各级党委和政府党组加强注意力，肃清政法部门，特别是司法系统和公安系统的贪污分子，严惩大老虎。”

同日 审阅聂荣臻、粟裕三月五日关于美机到东北地区撒细菌和我们拟采取的防疫措施的报告。报告汇报了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1〕，分别向苏联总顾问和卫生部顾问介绍我们拟采取的防疫措施以及他们的意见。毛泽东批示：“照办。应严重注意这个问题，应用一切有效办法进行防疫工作。”九日，审阅聂荣臻七日关于国内防疫工作的报告，批示：“退聂办。很好，照办。京津一带速办防疫。”九日当天，周恩来和聂荣臻、贺诚等商议在美国将细菌战扩大到中国东北境内后，国内应采取的紧急防疫措施。十四日，中央防疫委员会成立，领导和组织反对细菌战的工作，主任周恩来，副主任郭沫若、聂荣臻，办公室主任贺诚。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李富春、陈伯达、刘澜涛、黄敬出席。

3月6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处理贪污浪费问题的若干规

〔1〕1952年3月4日晚上，周恩来召集聂荣臻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商议在东北和沿海地区进行防疫工作的措施，并指示聂荣臻分别向苏联总顾问克拉索夫斯基、卫生部顾问阿萨杜良介绍会议情况，并同其商议聘请苏联防疫专家、订购疫苗和请苏联再派一个全天候的喷气式驱逐机师来东北加强防空力量等问题。

定》稿〔1〕，批示：“刘、朱、陈、周、彭真阅。此件很好，并须迅即发出。如各同志有意见，请批明交恩来修改。”同时，起草中央通知将这个规定发至地方县委一级、军队师党委一级，要求一体遵照办理。这个文件对贪污及浪费问题的处理方针、对贪污分子的处理办法、对浪费问题的处理办法和处理步骤及批准权限问题作出明确规定。

3月7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对邓小平二月二十二日给毛泽东、中央并陈云、薄一波、李富春来电的复电稿，在复电稿中加写：“请各中央局严重地注意解决邓小平同志电报所提出的那些同样的问题。”邓小平的电报说：“三反”、“五反”运动开展后，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从外部来说，主要是工商业表现出暂时的显著的停滞现象，西南第一季度贸易额大大缩小，税收大幅度下降，许多私营工业已无事做，大量的建筑工人失业，并影响到大量城市贫民的生活，他们对“三反”、“五反”已开始表示不满。从内部来说，主要是一些财经机构垮了，目前骨干显得非常缺乏，这个问题如不设法解决，国家财经机关很难应付局面。

同日 阅叶剑英关于中共广州市委、华南军区直属部队、华南财委等五大系统“打虎”情况的报告，批示叶剑英并告邓子恢：“三月三日报告收到，财委、军区两系统好转甚慰，望加紧督促，争取本月基本完成军队及广州的三反。同时请严格掌握广州五反，不使引起混乱。某些陷于停顿的经济活动，应大力注意恢复。其他城市，非有充分准备，不要轻易发动五反。”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三反”斗争中处理科学家、学者的问题的指示稿。指示稿说：“三反斗争中对于这类有用的

〔1〕正式发文件时，标题改为《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增加了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內容。

专门科学家和学者的处理，应该以思想改造为主，对于解放以前有贪污行为者，均作为思想问题来解决。对于解放以后有贪污行为者的处理的办法，必须事先经市委批准，以免造成偏向。”毛泽东在“必须事先经市委批准”后，加写：八有些人须经省委或中央局批准）”。

3月8日 晨，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刘澜涛、黄敬开会。

3月10日 晨，召集刘少奇、刘澜涛、黄敬、杨尚昆开会，听取刘澜涛关于华北“五反”总结问题的汇报。

3月11日 阅钟赤兵三月十日关于民航局机构问题的报告，批示：“周总理：钟赤兵对民航局的建议值得注意。现在民航事业行政和业务混杂，领导多头，飞机和工厂浪费，他提议予以改变。请召集一会议予以研究，决定适当解决办法。”报告建议：（一）将民航现行机构分立为民航局和民航公司。前者为行政管理机关，尽量紧缩精简，后者为经营业务机构，按经济核算制来执行业务，在业务上财务上是独立的企业单位。（二）将民航局拨归空军建制，以利统一领导。（三）现有人员和干部由空军统一调整，以达到通盘筹划和充分利用之效。

同日 阅中共中央西北局三月六日关于西安等西北各城市的“五反”步骤和策略问题的报告，为中央起草给西北局的复电：“你们对五反的部署和策略是正确的。惟西安守法户和基本守法户合计只占百分之四十，似不合实际。在北京，这两部分共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为什么西安的比例这样少，请再加调查研究。”

同日 致电斯大林〔1〕：美帝国主义飞机除在北朝鲜散布细菌外，最近又好几次利用复杂气候条件或夜晚入侵我国东北地区

〔1〕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散布细菌，因此，请示您允许再派能在复杂天气及夜晚条件下作战斗飞行的一个苏联喷气式驱逐师（两个团）进驻中国东北，以便布置在辽阳及东丰（沈阳东北）两机场，担任拦击敌机之任务。十二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我们同意派去一个这样的师，并已指示陆军部执行。

同日 复信程潜：“三月六日惠书收到。在联席会议〔1〕上的发言，使我明了江湖利病所在，极为有益。此复。”

同日 复信周世钊：“三月六日来信及冬季由天津来信均已收到，甚谢。蒋竹如兄前后多次来信均到，晤面时请为道及。你的学校计划很好，逐步做去，便可能成功。我休息仍不多，但身体尚好。”

同日 复信杨开智：“二月二十六日来信收到。以前的信也收到了。岸英、岸青都到别地工作去了，他们给我来信亦少。我和江青及小孩们都好。老夫人面前请你替我问好。祝你们夫妇健进！”并附语：“江青问候你们。”

3月12日 下午，同陈叔通、李维汉谈话。

3月13日 阅薄一波三月十日关于上海工商户、上层资本家分类和行业排队及“五反”部署等问题的报告。报告说：上海十六万三千户工商户，按五类划分，第一类守法户，占总数的百分之十五点三；第二类基本守法户，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六点八；第三类半守法半违法户，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四点二；第四类严重违法户，占总数的百分之二点八；第五类完全违法户，占总数的百分之零点九。关于“五反”的部署，为照顾上海特点，避免生产下降或停滞，避免增加失业和减少税收，拟在掌握好排

〔1〕指中南军政委员会于1952年3月召集的讨论荆江分洪工程计划的联席会议。

队材料和具体对象后，有步骤地有控制地分批地进行，预计一个半月基本解决问题。报告还提出了为使生产不致因“五反”而停顿，做到一面生产一面斗争准备抓的几件事情。毛泽东批示：“请周研究。此件一般很好。惟五类中第二类宜增加，第三类向第二类移过来一部分，是否可能，请你和一波通话时征询他的意见。”十五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并刘少奇等的报告说：“已与一波通了电话。他认为照主席指示，将五反中上海工商户第三类向第二类移过来一部分的可能是有的，具体计算，当在五反执行中解决，大约第一、二类可达到全数百分之六十。”

同日 为转发中共山西五台县委三月三日关于发动退赃运动的情况与经验的报告，起草批语：“请各单位认真组织贪污分子退赃，做到有始有终，不要虎头蛇尾。”报告说，在反贪污运动中，发现了不少贪污分子特别是较大贪污分子不愿意退赃的思想，有的公开抵抗退赃。

3月15日 致信刘少奇：“（一）你批发的上海市委综合报告，已阅，很好。嗣后，关于三反、五反各地来报请你多看，需要批转各地参考的，请你负责批转。（二）李立三在劳动部将施复亮〔1〕当作共产党人一样去斗争，迫着施复亮写了几个完全错误的声明文件，你那里如未有，请找来一看。我已于昨日下午向罗迈指出了这个错误，叫他找立三、富春二人一起谈清某些问题，并想出转弯办法。罗迈对民建会及对章乃器、施复亮的政策也是有严重错误的。”四月七日，阅李立三关于对在施复亮问题上的错误进行纠正的各项办法的报告，批示：“已阅，很好。”

同日 同黄炎培谈话，就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工作讲了一些意

〔1〕施复亮，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劳动部副部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

见。毛泽东在询问民主建国会“三反”运动情况后说：有人不承认自己是代表资产阶级，其实代表资产阶级，没有什么不好。资产阶级的存在，是《共同纲领》规定的。民建里面有了坏的资产阶级分子，但也有好的资产阶级分子。毛泽东说：我们要从经济观点，向大的远的方面看。现在中国的私人资本，在全国工商业经济上，比重还是相当大，向着社会主义走，公私双方都需要发展的。私人资本在新中国经济建设上，它是有贡献的。只不要让它向坏的方向发展。谈到民建过去政治上走的是“中间路线”时，毛泽东说：民建从前走“中间路线”倒不必讳言。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时候，两党对立，很自然地会产生“中间路线”。如果那时民建、民盟、民革都不走“中间路线”，那另外会有人出来走的，历史告诉我们是这样的。不过时势演变起来，“中间路线”会分化：一部分走向反动那边去，一部分走向革命这边来。毛泽东说：资本家唯利是图，人家说是不好，但“利”可以分析一下，一部分是国家的利，一部分是工人的利，其余一部分是资本家的利。如果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他们所图的利，三方面都能够顾到，正是希望他们、需要他们来“图”，只不能让他们光图私人的利。毛泽东说：“五毒”〔1〕俱全的，完全违人的，一定不要，守法的及基本守法的要争取，半守法半违法的也要争取，要教育改造他们。中间还要特别重视工业，劝导大家在人民政府领导之下，依据国家经济需要，有步骤地把商业资本转向工业，于国家是有利的。商业中间特别是投机商，于国家人民全无益处，绝对不要。毛泽东说：我希望民建注意两件事：一是帮助资本家去掉“五毒、二是要好好地学习《共同纲领》。不要光是谈马列

〔1〕五毒，指“五反”运动所反对的资本家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经济情报5种违法行为。

主义，而是应该劝一般人学习并实行《共同纲领》。毛泽东问黄炎培：你看这次运动影响到团结上是怎样？黄说：是好的。毛说：这次运动是为了团结，斗争是为了团结，这次运动的成功，应该是增进了团结。

3月16日 阅中共上海市委三月十四日关于一周“打虎”情况及今后“三反”、“五反”部署的报告，为中央起草复上海市委并告薄一波电：“三月十四日报告及早几天薄一波同志的报告均已收到。你们的计划很好。惟五反计划中我们希望从第三类移一部分到第二类，对坚决保护和一般保护的资本家数目能增加一些就好，望酌情处理。”

同日 阅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三月十五日报送的防疫工作资料。资料说：志愿军各部防疫组织已普遍成立。各部均开展卫生教育，搞好住区环境消毒及个人卫生，控制水源，清除垃圾，组织捕虫等。毛泽东批示：“周总理阅后，送聂、粟：应通令东北军区、华北军区、华东军区及华南军区仿志愿军办法组织防疫机构，进行清洁卫生工作。”

同日 致信杨尚昆：“请你告知新华总社负责同志，请他们将《内部电讯》中有关五反的最好的经验，随时发给各中央局、分局及各省市区党委作参考。例如山东分社二月十三日关于济南五反经验的报道，即可通报各地。有关三反的消息不要通报了。”

3月17日 阅刘澜涛三月十五日关于华北疫病防治情况的报告，批示：“周总理：似宜通令全国各地普遍注意疫情，有疫者治疫，无疫者防疫，并将华北防治时疫文件转发各地参考，请酌办。”报告说：人春以来，华北各地疫病相继发生，并蔓延发展，主要是流行性感冒、麻疹、猩红热、白喉等。经过努力，大部分地区疫病已经扑灭。但目前仍处于传染病流行季节，必须防止麻痹思想，完全消灭现有疫病。

3月18日 在接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新任驻中国大使权五稷递交国书致答词时说：“英勇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在其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爱国战争中，表现了战胜一切困难的高贵的牺牲精神，并取得了显然的胜利。中朝两国人民为反对我们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我们两国的安全与远东的和平，正进行着共同的斗争。诚如贵大使所说，中朝两国人民长期互助的友好关系，是用共同斗争的高贵的鲜血凝结起来的。这种斗争已经使我们两国人民的巩固团结成为一种保卫和平事业的巨大力量，只要中朝两国人民永远团结在一起，共同奋斗，就一定能够粉碎美帝国主义对我们两国的侵略计划，并且对保卫远东及全世界的和平有极其重大的贡献。”

3月20日 就遣返战俘问题，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指出：“我们认为，在提出时，条文方面，仍可定为‘双方规定应被遣返的全部战俘数目，我方一万一千多人，对方十三万二千多人，其名单应由双方参谋加以最后校正。’其交换细节则规定为：在我方凡志愿军被俘人员和人民军中属北朝鲜籍的被俘人员均须全部遣返，凡人民军中属南朝鲜籍的被俘人员，均得自愿遣返；在对方凡联合国军被俘人员及南朝鲜军中属南朝鲜籍的被俘人员均须全部遣返，凡南朝鲜军中原属北朝鲜籍的被俘人员均得自愿遣返。此项细节可作口头协定，不写入正式条款之中。”

3月21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2〕，指出：“对方是要尽速解决问题。因此，我方应采取主动，在二十一日会议上即提出二十日二十三时半去电所提原则条文：‘双方规定

〔1〕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应予遣返的全部战俘的数目，我方一万一千多人，对方十三万二千多人。其名单应由双方参谋官予以最后校正。’但成立此项协议的前提是对方必须放弃其毫无根据的五万三千人的要求。如对方同意成立此项协议，则讨论细节时可以举行机密会议，成立口头协定。”

3月22日 为转发志愿军第三十八军党委关于认真做好“三反”甄别工作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批语：“甄别工作值得全党全军注意。兹将志愿军经验一件发给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参考，望指导所属认真切实地做好甄别工作。”报告说：三十八军目前发现了假“老虎”。军、师各派出两个工作组到连队检查，各团也组织两三个甄别工作组进行甄别“老虎”的工作。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东局给毛泽东的第一次“五反”综合报告，起草中央给华东局、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委的批语，指出：“这个报告综合了五反的全面策略观点和部署计划，望各大中城市参酌仿行。”报告概括了“五反”准备阶段与坦白阶段的一些经验：运动开始前，须明确“五反”内容是反什么，不反什么；“五反”发动的时机是在“打虎”运动基本结束以后；“五反”准备工作包括进行舆论动员、搜集材料、建立坚强的指挥部；必须坚决依靠工人阶级；召开“五反”坦白检举大会，体现政策；根据坦白检举的材料适时地、分批地对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做出结论，以团结争取多数，迅速形成“五反”统一战线。

同日 审阅聂荣臻本日关于彭德怀需回国治病〔1〕，志愿军前方指挥拟由陈赓代理的报告，批示：“同意，请即派陈赓去朝，彭来京治疗。刘、朱、周、陈阅，退聂办。”四月二日，毛泽东

〔1〕当时根据前方所报病情诊断为肿瘤，后确诊为良性脂肪瘤。

请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致彭德怀急电。急电说：“德怀同志并告陈、宋、甘〔1〕：四月一日电悉。德怀同志病状既经医生诊断，认为愈早施手术愈好，即应按照大家提议马上回国治疗，绝对不应推迟至五月。”四月十二日，彭德怀回到北京治疗。

3月2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在“五反”斗争中及其以后必须达到的八项目的的指示。指示指出：在此次“五反”斗争中及其以后我们必须达到下述目的：（甲）彻底查明私人工商业的情况，以利团结和控制资产阶级，进行国家的计划经济。情况不明，是无法进行计划经济的。（乙）明确划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肃清工会中的贪污现象和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清除资产阶级在工会中的走狗。（丙）改组同业公会和工商联会，开除那些“五毒”俱全的人们及其他业已完全丧失威信的人们出这些团体的领导机关，吸引那些在“五反”中表现较好的人们进来。除完全违法者外，各类工商业者均应有代表。（丁）帮助民主建国会的负责人整顿民主建国会，开除那些“五毒”俱全的人及大失人望的人，增加一批较好的人，使之成为一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主要是工业资产阶级的合法利益，并以《共同纲领》和“五反”的原则教育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各部分资本家的秘密结社，例如“星四聚餐会”〔2〕等，则应设法予以解散。（戊）清除“五毒”，消灭投机商业，使整个资产阶级服从国家法令，经营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尽量发展私人工业（只要资本家愿意和合乎《共同纲领》），逐步缩小私人商业；国家逐年增加对私营产品的包销订货计划，逐年增加

〔1〕陈、宋、甘，指陈赓、宋时轮、甘泗淇。

〔2〕“星四聚餐会”，是重庆一些资本家的秘密结社，它进行了一系列严重违法的活动，在“五反”运动中被揭发和取缔。

对私营工商业的计划性；重新划定私资利润额，既要使私资感觉有利可图，又要使私资无法夺取暴利。（己）废除后账，经济公开，逐步建立工人、店员监督生产和经营的制度。（庚）从补、退、罚、没中追回国家及人民的大部分经济损失。（辛）在一切大的和中等的私营企业中建立党的支部，加强党的工作。其中关于工人监督生产一项，须待几个大城市选择几个大的和中等的厂店，在取得资本家同意后试办取得经验，方能由中央最后作出决定。

3月24日 为转发徐子荣三月二十三日关于公安部门惩治和洗刷违法乱纪分子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委、公安部门及政府党组的批语，指出：“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望指导所属公安部门照此实施。司法部门的情况亦很严重，必须同样惩治，请你们同样注意。”报告说：“三反”运动深入以后，若干城市公安局在派出所和人民警察中开展“打虎”运动，揭发出旧警察和留用人员中大量的十分严重恶劣的贪赃枉法、违法乱纪的问题。不仅贪污受贿现象很普遍，而且利用公安工作职权，进行敲诈勒索、卖放反革命分子、包庇不法资本家的罪恶活动，使少数派出所变质，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大的损失。对于这些严重问题，必须通过“三反”运动来一次全面的认真的检查和彻底的整饬，使人民公安机关真正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有力武器。

同日 下午四时，和刘少奇、周恩来等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参加三八国际妇女节飞行表演的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

同日 下午四时二十分，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出席。

3月26日 阅聂荣臻、粟裕三月十八日关于创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的报告，批示：“同意。退粟裕办。”

3月27日 审阅周恩来报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草案》。对条例草案作两处修改：（一）第二条说“一切国家的机关、企业、学校及其附属机构的工作人员，凡侵吞、盗窃、骗取、套取国家财物，强索他人财物及收受贿赂及假公济私违法取利之行为，均为贪污罪”，毛泽东删去其中的“及假公济私违法取利”九个字，批注：“侵吞、盗窃、骗取、套取、强索、受贿均是假公济私违法取利，似可不要再立‘假公济私违法取利’一目。”〔1〕（二）第十四条说“对犯本条例之罪者，任何人均有向该主管行政部门、人民监察机关、人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检举人认为适当的其他机关或首长实行检举之权。收受检举的机关或首长，应即作适当的处置，不得拖延、推诿或置之不理”，毛泽东删去其中的“收受检举的机关或首长，应即作适当的处置，不得拖延、推诿或置之不理”一句，批注：“事实上不是所有检举都要处理的，故此句不要。”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统战部三月二十七日关于各民主党派“三反”运动结束时几项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指示稿。在指示稿中加写一段话：“在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内，不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有自己的立场和思想，这种想法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是一种幼稚可笑的思想。在三反和五反中，我党已有些党员产生了这种错误思想，应予纠正。”

3月2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严查走私巨案的指示。指示如下：“北京破获地下电车公司三年来私售车票至一千一百余万张。北京、锦州、沈阳、天津、上海均破获私商勾结干部大量偷运物资或走私贩毒。太原、西安破获大批贩毒制毒犯。所有这

〔1〕 条例正式通过时，将毛泽东删去的“及假公济私违法取利”，恢复并修改为“以及其他假公济私违法取利”。

些均不及衡阳铁路局破获走私案之巨大。衡阳破获的走私案牵涉到一千八百多人，走私物资值七千亿元之巨，其中有很多违禁物品。中南方面已通令各省市严查此类走私巨案。望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委研究衡阳经验，特别是各大铁路局和上海、天津、沈阳、广州等大城市必须注意严查此类巨案。衡阳路局郭维城、刘慎之两同志的报告〔1〕是有价值的，望加研究。”

3月29日 为转发薄一波关于上海“五反”策略和部署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薄一波和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委的批语，指出：“薄一波同志三月二十五日关于五反的策略和部署很好，各城市均应仿行。上海五反的重点首先放在占六十二万人中的四十三万人方面，是正确的。尤其不误生产，极为重要，各城市凡误生产者，均应立即改变做法。”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上海市委三月二十五日关于在“三反”、“五反”工作中严格执行各项纪律的决定，起草中央给上海市委和各中央局、分局的批语，指出：中央同意上海市委的这个决定，“望各中央局、分局指令所属机关派在上海工作的人员注意执行。同时全国各城市在三反、五反中均应照上海的办法规定严格纪律，切实制止混乱现象”。上海市委决定的主要内容是：

〔1〕衡阳铁路管理局局长郭维城、管理局政治部主任刘慎 1952年3月20日给中共中央中南局并铁道部的报告中，汇报了衡阳铁路管理局在“三反”中清查走私武器、黄金、白银、毒品等情况。报告说：衡阳铁路南邻香港、澳门、海防3个大港口，中连云贵烟土产区。北接长江及各主要铁路干线，通渝、汉、沪、京、津各大埠，解放前走私极为猖獗，解放后并未显著敛迹。走私为害之大，不仅在经济方面，同时亦是政治破坏、军事破坏，更严重的是毒害人民的生命。报告建议中央早下决心，乘“三反”、“五反”之威，内部外部一网打尽，订出有关走私案犯具体处理办法，以便遵行。

(一) 本市各机关团体，如欲逮捕“三反”中有关人犯，必须经市委批准，交市公安局与区委联系后依法执行。中央及华东各地在沪各单位，则须经华东局批准后，与市委接洽办理；华东以外各大行政区所属各单位，除经当地最高机关之批准外，并须来市委接洽办理。(二) 无论本市外埠任何机关团体，如因“三反”而须传讯本市有关人员，须经市委批准，再与区委联系后，由公安分局以传票传至公安分局讯问，对被传之人，未经补办扣留手续，不得扣留过夜。(三) “三反”中退赃、追赃，不宜由各单位径自进行。(四) 凡因“三反”追赃而须将私人资财加以冻结、扣押，或对私人产业加以查封、没收时，一律必须经市增产节约委员会批准后，由军管会军法处或市人民法院依法执行。

3月30日 致信杨尚昆：“请询新华社是否已将五反材料中的精彩部分发给各大中城市参考。例如这一期的前三条〔1〕消息就都是可以发的。”

3月31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出席，李富春列席。

3月下旬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三月二十五日转发西安市“五反”策略报告的批语稿，加写一段话：“（二）五反中，市委和各区委及其所领导的一切力量，其工作方向，应分为前后两期。在前期，应以百分之八十的力量放在弄清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的工商户即前三类工商户〔2〕的问题，并作出结论，组成五反统一战

〔1〕指新华社1952年3月29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70号刊载的3条消息：《上海五反第一战役即将结束》、《天津几个大工业资本家已被保护过关》、《天津召开市协商委员会安定资本家的心》。

〔2〕指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和半守法半违法户。

线这一方面，而只以百分之二十的力量放在后二类工商户〔1〕方面；在后期，则反过来，以百分之八十的力量放在后二类工商户方面，而以百分之二十的力量处理前三类工商户的未了问题。决不可颠倒这个秩序，以致拖延时间，既不能迅速组成五反统一战线，又使经济生活不能早日恢复正常状态。望各地充分注意此点。”

4月1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本日关于西藏工作问题给张经武、西藏工委和西南局的复电稿，加写一段话：“拉萨等地物价高涨，康藏公路短期难通，军队生产今年尚难自给，我们对西藏人民的物质福利一时尚难有所改进。总之我们在西藏的基础在目前和今后一年至两年内还是不稳固的。因此我们在政治上必须采取极端谨慎的态度，稳步前进，以待公路修通、生产自给并对藏民物质利益有所改善之后，方能谈得上某些较大的改革。”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转发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三月二十二日关于如何巩固“五反”胜利报告的批语稿。在“关于在私人企业中工人监督生产问题，中央已有指示，现在只提监督生产和经营，不提参加管理”一句后，加写：在资本家同意下，可以实际上参加管理，而不要有管理的名义，在名义上仍是监督而不是管理。）”

同日 晚上，同彭真、黄敬谈话。

4月3日 阅上海市劳动局一名干部关于私营企业中工人监督生产的建议，写批语：“这是上海劳动局一个同志关于工人监督生产问题的意见。请尚昆同志印发在京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全总党组、中财委及其所属各部门党组，并从陆地寄送各

〔1〕指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

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作为研究这一问题的参考材料。”建议提出：对私人资本主义仅靠国家政权机构和国营经济机构自上而下的监督非常不够，必须同时依靠发动私营企业中工人群众对资本家的自下而上的监督，严格建立私营企业中工会及工人对生产的监督制度刻不容缓。只要把工人监督权明确规定在《共同纲领》范围之内，不会发生对资本家限制得太死太大的弊端。

4月4日 为转发中共上海市委“五反”第一期总结报告，起草中央给上海市委，华东局，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的批语：“上海市委四月二日关于五反的十条经验很好。这是五反以来最完备的一次经验总结，望一切正在推行五反或准备推行五反的城市党组织，注意研究，一体遵行。并可在党刊上发表。”这十条经验是：（一）充分准备，不打无把握的仗。（二）“五反”必须结合生产。（三）明确交代政策，破除各种顾虑。（四）从诉苦运动着手，充分发动群众，引向“五反”斗争。（五）争取高级职员是取得“五反”胜利的重要关键。（六）对资本家充分利用矛盾，多方实行分化。（七）充分运用党在资本家中间的影响和力量。（八）在政治上打掉资本家的威风，要他们全面交代违法事实。（九）充分发动群众与严密控制相结合，这是保证运动正确发展与彻底胜利达到反而不乱的关键。（十）巩固胜利，妥善收兵，做到有始有终。

同日 为转发陆定一关于《学习》杂志错误的检讨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各大军区等的批语，指出：“（一）中央宣传部三月二十九日关于《学习》杂志错误的检讨，中央认为是必要的和适当的。此次错误重在检讨和改正，不拟给予处分。（二）将中央宣传部这个检讨文件发给各级党委。望各级党委组织宣传文教工作人员

予以讨论，并可在党刊上登载。”陆定一的检讨报告说：《学习》杂志在一九五二年第一、第二、第二期，发表了一系列的带有严重的错误性质的文章。这些文章实质上是否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还存在着两面性，而认为只有反动的腐朽的一面，从而达到了根本否定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仍有其一定的积极性的结论，这样就公开地违反了党的路线和党的政策。在中央宣传部的刊物上连续地发表违反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文章，这对于我们，实在是个严重的教训。毛泽东在陆定一的报告中加写一句话：“在四月份的《学习》杂志上准备转载上海《解放日报》发表过的冯定同志的一篇文章〔1〕，这篇文章的观点是基本正确的（其中有些缺点我们作了修改）。”

4月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罗瑞卿、华南分局并告中南局的复电：“瑞卿同志四月三日关于广州五反的报告收到，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所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上海五反的十条经验已发你们谅已收到，请加研究仿行，特别注意五反中继续维持生产和经营。广州五反必须注意给香港、澳门的中国工商户以好的影响，你们注意了这一点是完全对的。广州五反中我们掌握的真实材料甚少，是很大的缺点，必须在斗争过程中从争取高级职员去解决这个问题，在这点上上海的经验也是很有用的。上海还有一条经验是先搞大户以利经济，此条在你处是否适用请加研究。又五反时间不宜拖得太长，这就需要严格控制和训练工作队，以十天为一期，先作充分准备，限期完成任务。”罗瑞卿的报告说：根据

〔1〕冯定，哲学家。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他写的这篇文章题为《学习毛泽东思想来掌握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资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原载1952年3月24日《解放日报》。《学习》杂志1952年第4期转载时，题目改为《关于掌握中国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中国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问题》。

广州工商业的情况，把主要的打击对象即第四、第五两类工商户控制在总户数的百分之四左右，是适当的，也是有利的。理由是广州的商人特别是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大商户，许多都是一只脚在港澳，一只脚在广州，有些是人和主要资金都在港澳，而他们所经营的事业，目前多数还不能完全代替，如打得太重，他们索性就不回来了。因此对这种人应该有意识地放宽尺度打得轻一点，使他们感到继续下去还有利可图，这样就可能争取一部分回来继续营业。

同日 为转发薄一波关于上海工商业户的具体分析和“五反”第二战役部署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薄一波，上海市委，华东局，各中央局、分局的批语。批语指出：“大资产阶级所有的企业，因其技术进步，工人众多，产品量大，不论在经济上政治上都较中小私人企业为重要。过去有些同志重视中小，轻视大的。在民建会和工商联的组织问题上亦认为重点宜放在中小。这种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中小应予组织起来，在五反中应将其问题迅速弄清，早日组成五反统一战线，以壮声势，孤立“五毒”深重的大投机商人，这是完全必要的。但大资产阶级除掉少数有害无益的投机分子以外，我们必须用大力向他们的企业中进行工作，加强工会工作和党的组织工作，在五反中照天津和上海的办法按其情况有分别地适当地对待各类大资本家。此点务请各大中城市加以注意。”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四月五日关于干部交代同资产阶级关系的指示稿。对指示稿加写两句话：“干部中有和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地主阶级有关系者，亦须在此次交代清楚。”“对于在政府中工作的某些民主人士及军队中某些起义人员应令其交代者，必须先由各单位党委或党组开出名单，经过讨论决定，并经上级批准，方能令其交代。”

4月6日 关于西藏工作方针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给西南局、西藏工委并告西北局、新疆分局的指示。指示指出：“我们基本上同意西南局、西南军区四月二日给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的指示电，认为这个电报所取的基本方针（除了改编藏军一点外）及许多具体步骤是正确的。”“我们惟靠两条基本政策，争取群众，使自己立于不败。第一条是精打细算，生产自给，并以此影响群众，这是最基本的环节。……第二条可做和必须做的，是同印度和内地打通贸易关系，使西藏出入口趋于平衡，不因我军入藏，而使藏民生活水平稍有下降，并争取使他们在生活上有所改善。只要我们对生产和贸易两个问题不能解决，我们就失去存在的物质基础，坏分子就每天握有资本去煽动落后群众和藏军反对我们，我们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政策就将软弱无力，无法实现。”

“西南局四月二日电报的全部意见中，只有一点值得考虑，这就是短期内改编藏军和成立军政委员会是否可能和得策的问题。我们意见，目前不要改编藏军，也不要形式上成立军分区，也不要成立军政委员会。暂时一切仍旧，拖下去，以待一年或两年后我军确能生产自给并获得群众拥护的时候，再谈这些问题。”

“看来不但是两司伦〔1〕，而且还有达赖及其集团的多数，都觉得协定是勉强接受的，不愿意实行。我们在目前不仅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物质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群众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上层基础，勉强实行，害多利少。他们既不愿意实行，那末好吧，目前就不实行，拖一下再说。时间拖得愈久，我们的理由就愈多，他们的理由就愈少。拖下去，对我们的坏处并不

〔1〕司伦是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达赖下面的最高行政官职。这里的两司伦，指代理司伦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代理司伦称司曹。

大，或者反而有利些。” “最近拉萨的示威〔1〕不应看作只是两司伦等坏人做的，而应看作是达赖集团的大多数向我们所作的表示。其请愿书内容很有策略，并不表示决裂，而只要求我们让步。其中暗示恢复前清办法不驻解放军一条，不是他们的真意。他们明知这是办不到的，他们是企图用这一条交换其他各条。在请愿书内批评了十四辈达赖，使达赖在政治上不负此次示威的责任。” “我们应当在事实上（不是在形式上）接受这次请愿，而把协定的全部实行延缓下去。” “我们目前在形式上要采取攻势，责备此次示威和请愿的无理（破坏协定），但在实际上要准备让步，等候条件成熟，准备将来的进攻（即实行协定）。 ”

〔1〕即拉萨骚乱事件，指1952年三、四月发生在拉萨的“人民会议”的非法活动。

“人民会议”是一个由西藏分裂主义分子支持和操纵，于1951年11月下旬组织起来的非法组织。他们在司曹鲁康娃和洛桑扎西等的支持下，起草“请愿书”，反对改编藏军，提出人民解放军“迅速撤出”西藏，破坏《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实行，并组织反动武装“解放大队”。1952年3月11日，他们组织武装包围中共西藏工委驻地，向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提出“请愿”。4月1日，开枪袭击曾任西藏地方政府派到北京谈判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首席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的住宅。4月17日，两司曹私自将驻防日喀则的藏军炮兵代本调入拉萨，以策应骚动。原驻拉萨的藏军占据拉萨周围的制高点，“解放大队”暗藏武器进行活动，流氓喇嘛滋事寻衅。他们还密令各宗截断人民解放军粮食运输，以待机攻击驻藏人民解放军。中共西藏工委根据中央有关指示精神，对达赖喇嘛采取支持和爱护的态度，对所谓“人民会议”的非法活动的幕后策划者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予以彻底揭露，对于受蒙蔽参加所谓“人民会议”的一般成员不予追究，争取、团结、教育西藏地方政府的大多数官员。4月27日，达赖喇嘛撤销鲁康娃和洛桑扎西的代理司伦职务。5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和西藏地方政府分别发布告，宣布“人民会议”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李富春、李维汉、刘伯承、粟裕出席。

4月7日 复信黄炎培：“数次惠书并承写赠大作一册，均已收到，甚为感谢。这几天稍忙，待数日后当约先生面谈。上海报告一件，可以一阅。”

4月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西南局、西藏工委的指示电：“四月七日十一时西南局来电收到。同意西南局意见拉萨骚乱事件由中央直接处理。中央并决定嗣后关于我方和藏方发生的政治、军事、外交、贸易、宗教、文化等交涉、商谈和处理事件，均集中由中央解决，西藏工委直接向中央作报告，同时告知西南局。西南局对这些问题的意见向中央提出。关于西藏党和军区的内部事宜，包括编制、部署、整训、生产、修筑、支援等项仍由西南局和西南军区主管。西藏工委凡关与藏方发生交涉事件及对印度、尼泊尔等国的外交事件，均应每事报告请示，方能办理。最近在拉萨创办小学一事没有报告和请示，是不对的。此外似乎还有一些事也未事先报告和请示。此点务请工委严格注意。必须认识藏族问题的极端严重性，必须应付恰当，不能和处理寻常关系一例看待。”

同日 起草中共中央批语，将华北局关于华北区十二个省属市的工商联和同业公会改造问题的情况通报发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委参考。在通报中写一个批注：“工商联委员的成分，在大城市应以大资本家为主，这和中小城市是不同的。因为中小城市大资本家很少，中小资本家很多，故大资本家所占委员数目不能太多，但亦应尽可能吸收一批大的参加。——中央注”

同日 为转发薄一波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批语：“薄一波同志四月六日关于上海五反第二战役经验的报告是正确的，发给各地仿行，请各城市在五反中都注意这些新策略。”报告说：上

海“五反”第二战役从四月一日开始，六天以来，进展极为顺利。第二战役的策略是“检查少数，俘虏多数，严阵以待，不战而胜”。其办法是：首先将资本家情况搞清楚，充分发动群众并争取高级职员，准备好随时都可以投入战斗的一切条件。另外召开老板会议，交代政策，实行分组评议。然后，表扬坦白较好的工商户，免于检查；对态度极不老实不肯交代的才派检查队进入厂店检查。这样先礼后兵，效果很大。

同日 阅徐子荣四月八日关于公安人员贩运盗卖毒品及包庇毒犯的情况报告，批示：“富春同志阅后，送徐子荣同志：前次富春同志提议组织处理毒品问题专案机关及其他问题专案机关，请即提出名单，并找徐子荣同志一商。徐子荣同志所提意见是好的。”报告说：“三反”运动以来，揭发出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中很多严重的贩毒犯罪行为。为此，必须于“三反”运动末期，配合铁路、交通、海关等部门，再发动一次群众性的清毒运动，惩处吸食、盗卖、贩运、制售毒品或包庇掩护毒犯的公安人员，不予宽恕。

同日 致信邓拓：“本日《光明日报》登载的《三千多种商品牌价为什么能够降低？》一稿可在《人民日报》转载〔1〕，并请告新华社予以广播。”

同日 阅湖南宁乡县二区竹山乡全体农民三月十三日来信。

〔1〕《三千多种商品牌价为什么能够降低？》一文说：最近全国各地国营贸易部门和合作社陆续降低了大批商品零售的牌价。这些商品牌价降低的幅度，由百分之二到百分之四十左右，平均约在百分之八左右。这是全国人民反贪污、反盗窃运动的重要的直接收获之一，使广大人民，特别是工薪劳动者和农民，直接享受了相当程度的现实的物质福利。《人民日报》于1952年4月15日将这篇文章作为社论转载，题目改为《降低商品牌价的重大意义》。

就来信检举周震鳞〔1〕解放前剥削压迫人民、贪污民财，解放后私藏枪支、抵抗减租退押，要求将其女儿从北京拿回斗争等事，批示：“周总理阅后转李维汉同志阅存。此事不应当依照农民的意见处理。这些坏事是可能的，但周是老同盟会员，一向不附蒋，现为政协委员，应予以保护。”

同日 阅周震鳞请救济老同盟会会员何子奇的来信，致信彭真：“周震鳞先生的信及附件附上，请派人一查何子奇情况，如实属困难，又未做坏事，似可酌予救济。”信中说：何子奇年逾七十而又无儿女，生活无着，听说北京市政府对于贫老而有革命历史者有月给生活救济小米三数百斤的规定，希望给予照顾。

同日 对曹彦昆〔2〕献赠《清明上河图》画卷作批示：“复曹彦昆一信致谢。将曹信〔3〕交齐燕铭同志一阅。画件请齐燕铭同志考虑是否可以交可靠匠人重新裱褙，并作其他适当处理，以免虫蚀和霉坏。”

4月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各中央局、分局的指示电：“西北局定于四月下旬开西北局委员全体会议。各中央局、分局如果在最近期间未开会议者，最好在四月下旬召开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因为在五月上旬或中旬，中央可能召开有各中央局主要负

〔1〕周震鳞，1903年同黄兴组织华兴会，曾任中国同盟会湘支部长，参加辛亥革命和讨袁护法斗争，后任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49年随程潜在湖南起义。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湖南军政委员会顾问。

〔2〕曹彦昆，当时在四川荣县任职。

〔3〕曹彦昆在信中说，《清明上河图》是我的先辈遗留下来的，已有五世了，一贯是顽固的珍藏起来。现在英明的毛主席领导着我们，并且我已受过了一段时间的革命教育，明确了这些东西不应该再顽固的保守下去，因为这是国粹，应该交给国家保管。信中还简要介绍了该画流落民间的历史。

负责同志及某些分局的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同日 阅贺诚、傅连障〔1〕四月七日关于北京市防疫工作会议的报告。报告提出几个请示解决的问题：一、建议北京市召开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对防疫工作再作一次动员。二、为改善环境卫生，拟将全市污水沟的十二处明沟改为暗沟，修整陶然亭污水苇池为游览湖池，施工预算为五百亿元，望中央批准拨专款解决。三、为防止急性传染病蔓延，建议北京市建一所拥有二百个床位的隔离病院。毛泽东批示：“贺、傅二同志阅后，送彭真同志、周总理酌办。我认为拨五百亿元办理本件所讲的卫生工程，并建一隔离病院是必要的，是否可行，请周召集一次会议予以决定。”

4月10日 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本日起在全国发行。

4月1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西藏工委并告西南局的指示电：“本日复你们四月八日请示一电刚发〔2〕，接到你们四月十日二十一时的电报〔3〕，甚为高兴。你们的方针和步骤是正确的，这是一个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和步骤，望即坚决而镇定地付诸实行。”

同日，为中央起草给西藏工委并告西南局的又一指示电，指出：“你们四月十日二十一时电所取方针，撤掉两司曹〔4〕，解散‘人民会议’，追究主谋分子（即你们所谓帝国主义侵略分子，

〔1〕傅连障，当时任卫生部副部长、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中华医学会总会理事长。

〔2〕中共中央对西藏工委1952年4月8日电的复电，因情况变化没有发出。〔3〕中共西藏工委给中央并西南局的这个电报，提出了处理拉萨骚乱事件的具体部署。

〔4〕指鲁康娃和洛桑扎西。

亦即鲁康娃、洛桑扎西、索康〔1〕等人）是完全必要和完全适当的。经武在噶厦〔2〕会议上指出‘人民会议’为非法的三条理由（举行叛乱，破坏团结，反对达赖），并指出除主持此次叛乱事件的帝国主义侵略分子及国民党特务分子以外，一律不予追究，以安定多数人，都很正确。”“为了完成军事准备及利于持久，你们要加紧储粮集弹，筑工事，此外油盐及柴火也要储集，至要至要。”

4月1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西藏工委并告西南局的指示电：“四月十一日电悉。中央四月六日电所说妥协政策目前不要提，须待目前的政治斗争得到确定胜利后看情形再决定。目前你们只作政治斗争，对改编藏军、成立军分区、成立军政委员会等事根本不要谈。否则可能被反动派认为我示弱。”

同日 听取从朝鲜于本日回到北京即来中南海的彭德怀汇报当前朝鲜前线敌我军事态势、我方备战情况和今后对敌作战的方针。

同日 就彭德怀四月三日反映的朝鲜境内普遍发生饥荒一事，致电陈赓、宋时轮、甘泗淇：“关于粮食救济问题，金首相已经过朝鲜驻中国大使权五稷向我政府提出请求接济二万吨粮食，我已准备供应。你们在驻军附近，可酌情对断粮居民予以适当救济，但如有大量集中数目的粮食，仍宜送给朝鲜政府转发。”

4月1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西藏工委并告西南局的指示电。指示电指出：“四月十二日二十三时电所告中央代表给达赖的通知收到。这个通知是基本正确的。如已送出，即照那样。如未送出则请你们略加修改，即在叙述两司曹罪恶事实的三条中，第二条说两司曹反对成立军分区、反对改编藏军及说解放军把藏

〔1〕索康，即索康，旺清格勒，当时任西藏地方政府噶伦。

〔2〕噶厦，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最高行政机构。

军打得头破血流等语应删去，而改为‘不执行协议规定。他们对协议中几项重要规定例如改编军队等都持反对态度，他们完全不了解全部协议条文都是对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的前途和幸福有利的。他们也不是对协议中某些条文的实行步骤和方法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而是根本反对实行协议’。这样写法较能争取多数，也埋伏一笔我们可能在某些条文的实行步骤和方法上接受合理的意见。”“如果他们问什么是‘实行步骤和方法的建设性意见’，你们可告以请大家想一想，凡是有利于汉藏团结和妥善执行协议的意见都是建设性的意见，如果有这类意见，我们愿意听取，也愿意磋商；但不要轻易表示自己的具体意见，以免陷入被动。”

“看样子，拉萨的藏军恐非逐步加以改革不可。其他地区的藏军可以慢点改革。并且要一部分一部分地做，不要同时一起做。改革的步骤，是在阿沛等爱国派当政后，逐步撤换一些最反动的军官，而将其余的军官分批调出受训，逐步使藏军中有靠拢我们的军官，用这种办法逐步达到改编藏军的目的。”

同日 下午，同李维汉谈话。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周恩来汇报四月八日中央军委会议商议成立国防生产研究组的有关情况，刘少奇、朱德、陈云、彭真、彭德怀、李富春、刘伯承出席。

4月15日 晨四时，为中共中央起草给西藏工委并告西南局的指示电。指示电说：“（一）你们还没有将中央代表的书面通知送交达赖，先由经武向达赖和噶厦作口头通知，详细说明对两司曹撤职查办的理由和我们的意图，是很适当的。（二）达赖既然尚在犹豫，还没有下令撤掉两司曹的决心，同时噶厦又将为此事召开会议，则我们应当等候噶厦会议的结果，然后再定是否将通知书交给达赖。如果他们决定采取辞职的方式使两司曹下台，则要求撤职的通知书就不要送出，为着撤两司曹的会衔布告也用

不着了。（三）充分使噶伦〔1〕及其他文武官员及三大寺〔2〕喇嘛明了两司曹的罪大恶极，军事叛乱行为及非法‘人民会议’的不能容许，并经过噶伦去影响达赖，使他造成撤掉两司曹的决心（如果两司曹不辞职，就应撤掉他们），是很必要的，这就需要几天甚至更多的时间。横直我们已集中了军队，不管反动派用文的和武的方法和与我们作斗争，我们都能战胜他们。因此通知和布告这两个文件暂时都不拿出去。”

同日 审阅薄一波四月十三日关于上海“五反”第二战役基本总结及第三战役部署的报告。在薄一波报告中关于工人监督生产问题的一段文字后，批注：“（必须在此次五反后实行工人店员监督大中厂店的生产和经营，此事一定要实行，并不能延缓。望各大中城市党委迅速研究具体办法，电告中央为要。——中央注）”并批示：“请周恩来同志拟电答复，并转发各地参考。”十六日，审阅周恩来为中央起草的复电稿时，加写：“此外，工人监督生产一事极为重要，而各地反映甚少，似未认真研究。望立即研究具体办法电告为要。”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上海市委关于争取违法资本家立功赎罪的经验报告，起草中央批语：“上海市委四月十二日的报告很好，发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仿行。”报告指出：上海“五反”第一个战役中，七十四户重点户终于低头认罪，但由于怕受到严厉处分，无心生产。为此，我们于四月三日召集这些资本家开会，宣布他们的“五毒”罪行是严重的，虽是经过检查斗争才交代，亦作为自动坦白，从宽处理，只退补不加罚，免于

〔1〕噶伦，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中司伦之下的行政官职。

〔2〕指拉萨的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这三大寺是西藏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主要寺庙。

刑事处罚。如能积极检举，协助检查其他不法工商户，立功赎罪，退补还可酌减。听到政府宣布这些政策后，这些资本家一致感谢政府宽大处理，表示愿意立功赎罪。

同日 和周恩来联名签署中央军委、政务院《关于集体转业部队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适应国防建设和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决定从人民解放军中调拨四十一个整师、十一个整团共四十六万五千人转为各种工程部队和屯垦部队。

同日 晚十一时，听取萧劲光关于准备同苏联谈判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建设有关问题的汇报。十六日晨一时，在周恩来关于海军去苏联谈判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上批示：“已找萧劲光谈过，同意这个提纲〔1〕。”

4月16日 晨六时，为中共中央起草给西藏工委并告西南局的指示电：“（一）四月十五日十七时的电报〔2〕收到。你们处理所谓‘人民会议’的方针、步骤和办法，我们认为是适当的。

（二）在处理‘人民会议’的过程中，必会发生许多新情况，请你们在采取每一个具体步骤时随时向我们作报告，其中重要者须

〔1〕指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萧劲光、第二副司令员罗舜初报送的去苏联谈判的几个问题。

〔2〕中共西藏工委的这个电报中说：根据西藏的情况，决定对所谓“人民会议”的处理采取扶持爱国主义者进步势力，争取团结中间势力（包括稳定动摇分子），完全孤立反动分子的方针，在这次政治斗争中，只坚决打击两反动司曹，把他们打下政治舞台。对其他分裂主义的头子，如索康等，暂采取麻痹态度。对所谓“人民代表”，则采取宽大的方法，彻底清算其亲帝分裂主义、举行武装叛乱、反对和平协议、反对汉藏团结的反动言论和行动，并要向西藏地方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履行登记手续，写悔过书，悔过自新，免于惩办。公开出面代表及个别重要头子，如卸职机巧堪布等，则交政府看管，或是分别处理，随传随到，以便追寻帝特线索和反动组织的内幕，作为一件重要反动案件来处理。对被迫受骗参加的人员，一律宣布不予追究。

得中央批准，然后执行。你们已经有了确定的总方针，在采取具体步骤时就须要又坚决、又慎重，才能准确地打中敌人的要害，争取广大的群众。因此，宁可花费一些时间和中央交换意见以后再去动手为有利。”

同日 上午八时，为中共中央起草给西藏工委并告西南局的指示电：“四月十五日二十四时的电报，收到。（一）十五日布达拉会议决定取缔‘人民会议’，并由达赖出布告。如果能实行，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在达赖出布告以前，应向‘人民代表’的多数及文武僧俗官员经过噶厦及你们先行揭露两司曹及帝特分子的反动罪恶，使布告一出，能得多数人拥护，而不感到突然。布告由达赖一人出名，经武不要联名。（二）在噶厦官员们到你处为两司曹说情请求不取撤职办法而由两人自动辞职的时候，同意你们的意见‘耐心揭露两司曹的罪恶，说服他们一致同意，要达赖下命令撤职’。这是因为中央代表的书面通知刚才送去，不好马上改口的原故；也是因为撤职较辞职打击为重，对于惩治反动、影响群众更为有力的原故。但是请你们注意达赖及噶厦多数的态度，如果他们再三再四地请求以辞职方法使两司曹下台，而觉得撤职办法他们接受不了的话，你们应当准备同意采取辞职的处置。因为他们已在‘人民会议’问题上同意了我们的意见，向我们作了一个很大的让步，我们如果一定要取撤职办法，则可能引起达赖及中间派不满，显得我们整得太过分了。此事请你们和阿沛、计晋美、平措旺杰（1）三人详商，究以何种方法为妥，并告我们为盼。”

同日 审阅修改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本日关于赴朝参观团的补充规定。在第一条规定“入朝参观人员仅限于野战军和特种兵的军长、师长〔不含地方军区〕，目前部队工作则由各副职干部及

（1）平措旺杰，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委员、昌都分工委副书记、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副主任。

政治干部主持之”一句后，加写：“军长、师长凡无重病者都要去参观，不许不去。”在第五条规定“各大军区参观团名单，务请于四月二十日前电告”一句后，加写：“四月二十五日左右启行，五月初到达朝鲜参观实战，不许推迟。”同时加写第六条规定：“入藏十八军不在参观之列。”

同日 审阅修改彭真准备四月十八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草案的说明稿，批示：“恩来同志阅后，送彭真同志：此件少奇同志修改了一些，我又作了较多的修改，觉得可以用。如你们同意这些修改，请于付印时将清样校正清楚。”十七日，再次对草案说明稿进行修改，批示：“周总理、彭真同志：再作了一些修改，觉得较好些，请再阅。如可用，即可付印分发。”以下是毛泽东对说明稿修改较多的几段文字（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三反’和‘五反’运动，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和工人阶级领导下，清洗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除了对于国家工作人员中一部分完全违法的大盗窃犯以外，这种斗争仍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采取群众运动和自我批评的方式，用《共同纲领》的原则改造社会上和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坏作风的斗争；是拥护《共同纲领》的广大群众的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对于一部分堕落腐化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分子的恶劣作风的斗争；是按照《共同纲领》和国家法令进行合法的私人工商业经营道路对于行贿、偷税漏税、盗取国家资财、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违法经营道路的斗争。”（二）

（1）中共西藏工委这个电报中说：今日下午，藏政官员共20人到我处，替两司曹讲情，几次要求免于撤销两司曹职务。我们则加以耐心说服，进一步揭露两司曹的罪恶，说明这是政治路线的斗争，不是个人恩怨的斗争。特别强调从拥护达赖执政、西藏人民利益、汉藏团结和保证执行协议等立场出发，请他们同意中央方面提出的意见，要达赖下令撤职。

“在过去这一时期，就各大城市的情况来看，小资产阶级（这里指的是一般不雇工人店员的独立手工业户和家庭商业户，不包括摊贩）和资产阶级的总数中，守法的约占百分之十左右；基本守法但有轻微违法行为的约占百分之六十左右；半守法半违法的约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约占百分之五左右，他们是带有很大投机性的或完全投机的资本家；而其投机性最猖狂最恶劣的，约占工商户总数百分之一左右，数目还不算很大。这最后一部分人就是所谓大盗窃分子，已经不是我们的朋友，而是罪犯，因此，除坦白悔改并有立功表现者外，必须予以法律制裁。上述比例数中，守法户和基本守法户占工商界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其中的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分子，但也有不少资产阶级分子，并且有一些大工商业者。”（三）“最严重最恶劣的大贪污分子也是少数。这些大贪污分子也已经不是我们的同志，而是盗窃国家和人民财富的罪犯，因此，除坦白悔改并有立功表现者外，必须从我们的队伍中清除出去，并予以法律制裁。”（四）“经过‘三反’和‘五反’运动，我们已经完全可以看出，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专政是极大地巩固了，财政和经济两方面的情况是极大地改善了，知识分子的不利于人民事业的旧思想也获得改造了，或者正在改造中。”

同日 批示同意萧华关于中央军委直属机关和部队的“打虎”运动现已基本结束的请示报告。

4月17日 中午十二时，为中共中央起草给西藏工委并告西南局的指示电：“四月十六日二十四时的电报〔1〕收到。说情的_____”

〔1〕中共西藏工委这个电报中说：今日下午，藏政官员共20人到我处，替两司曹讲情，几次要求免于撤销两司曹职务。我们则加以耐心说服，进一步揭露两司曹的罪恶，说明这是政治路线的斗争，不是个人恩怨的斗争。特别强调从拥护达赖执政、西藏人民利益、汉藏团结和保证执行协议等立场出发，请他们同意中央方面提出的意见，要达赖下令撤职。

人们没有说两司曹辞职的话，说的还是挽留两司曹的话，只说解散‘人民会议’，意在以解散‘人民会议’交换两司曹不辞。因此，你们在几天内还不要松口，仍然坚持一要解散‘人民会议’，二要将两司曹撤职。等到达赖的布告已经发表，‘人民会议’已经解散，然后再看说情的人们是否提出以辞职换撤职。如果他们不提辞职，则你们仍坚持撤职。如果他们提出辞职，则你们就可以看势转弯，同意辞职。西藏贵族们是善于干政治斗争的，你们也要学会这一套。也许他们要将交换条件（即两司曹留任或辞职）讲妥才出布告，你们应主张解散和撤职同时做，也可以先解散后撤职。如果他们一定要以留职和解散相交换，则你们应采坚决不同意态度。如果他们以辞职和解散相交换，则你们可以和他们妥协，同意辞职办法。望相机处理。”

同日 下午四时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出席，林伯渠、李富春列席。

4月18日 下午四时，出席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听取并批准彭真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草案的说明，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和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华北行政委员会及撤销中央人民政府华北事务部的决议。二十一日，毛泽东发布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

4月19日 下午四时，出席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听取和批准陈云所作的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报告。

4月21日 阅中共北京市委二十日报送的关于北京高等学校的“三反”简报，批示：“彭真同志：送来关于学校思想检讨

的文件都看了。看来除了张东荪〔1〕那样个别的人及严重的敌特分子以外，像周炳琳〔2〕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时间可以放宽些。北京大学最近对周炳琳的作法很好，望推广至各校，这是有关争取许多反动的或中间派的教授们的必要的作法。”简报说：为了帮助周炳琳更好地解除对思想改造的顾虑和端正对“三反”的态度，北大党组织派人同他谈话。在张奚若、马寅初同周谈话和给周的女儿（共产党员）做工作后，周的态度有所转变，表示愿意听取大家的批评，进一步作思想检讨。

4月22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地方各级财委和军队后勤部门应作违反财政纪律的检讨报告的指示稿。在指示稿指出地方财政发生若干困难的客观原因之后，毛泽东加写：“这是使地方财政机关发生违反财政制度和财政纪律的一方面的原因。但是在另一方面，在各级财政领导机关和后勤机关方面，也有自己的原因，不能完全推之于上面没有完备正确的制度。”在指示稿列举各种违反财政纪律的现象之后，毛泽东加写：“这些情况应当在此次三反运动结束的时期做一次综合性的检讨，这对于总结经验、整顿财政纪律和建立完备的财政制度将有很大的帮助。”在指示稿责成各大区、省（区）、市和专署的各级财委，军队的师和军分区以上的各级后勤部门进行一次彻底检讨之后，毛泽东加写：“此种检讨应是全面的，真实的，没有隐瞒的。在检讨之后，就使自己立于主动地位，理直气壮地好向下级说话。否则就会留下包袱，总有一天要重新进行检讨，那将使自己处于被动地

〔1〕张东荪，原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燕京大学教授。因出卖国家重要情报，被免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职务，但从宽处理，不逮捕法办，并照发工资。随后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决定开除其盟籍。

〔2〕周炳琳，当时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位，并要受到指责和处分。”“上述检讨报告，限于五月底以前按级交到中央财委和军委总后勤部，不得违误。”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西藏工委并告西南局的复电：“四月二十二日二时电报收到。我们认为你们对三个问题的处理和答复是妥当的。”西藏工委的电报说：藏政官员会议决定将于二十三日向西藏工委提出三个问题。我们拟作如下口头答复：一、中央与地方是上下级的领导关系，为保证彻底执行协议，藏政官员应是爱国主义分子，有能力，有威信，忠实于达赖和西藏人民；人选应与中央方面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再由达赖任命。二、中央进藏工作人员和解放军如果违反协议，保证藏族官民完全有权向中央控告，并有向中央提出有关建设性意见的权利。三、对于藏政官员违反政策纪律或地方政府制度的事情，当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辨明是非，合理地处理。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指出：“同意在二十二日两组会议上的方针，继续采取强硬态度。只有这样做，才能使自己立于主动地位，和迫使敌方让步。为了这个目的，我们还应准备在谈判中和敌人拖几个月。关于停止行政会议，将谈判公开，可就对方完全脱离了我方三月二十一日的折中调整方案，并利用行政会议的机密性质来进行欺骗和蒙蔽两点理由，准备于二十三日提出停止行政会议，恢复公开谈判。”

4月23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2〕，指出：提议停止行政会议恢复公开谈判时应准备两个发言稿：一个指出对方利用行政会议的机密性质，一面欺骗和蒙蔽世界舆论；一面推

〔1〕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修改后发出。文内标有着重号的文字是毛泽东加写的。

〔2〕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翻关于第四项议程谈判的基础，坚持其违反日内瓦公约的自愿遣返。因此，行政会议已失去推进谈判的任何作用，而只能是变成对方拖延谈判并蒙蔽世界人民的工具。为此，我方提议取消行政会议，恢复公开谈判。另一个发言稿则须更进一步驳斥对方四个方面的荒谬论点。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给上海市委关于“五反”运动第三战役部署等问题的复电稿。将复电稿中使用的“第二战役”、“第三战役”的军事术语，均改为“第二期”、“第三期”。在复电稿末尾加写：“以后五反中不用军事术语，如第一战役、第二战役等，中宣部已发通知〔1〕”。

4月24日 下午，同彭真就他请示的几个问题进行谈话。

4月26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2〕，指出：“一切发表的文稿，望将问题集中在主要方面并要打中敌人要害和弱点，并将文字写得简练些、明确些。”

同日 晚上，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李维汉、王稼祥开会，讨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

4月27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3〕，指出：将三个问题一起提出讨论的建议〔4〕，仍可稍缓再提，先看一下对方在今天究竟做出什么文章。我们在会议中对战俘问题可集中于

〔1〕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52年4月17日发出通知说：新华社上海15日电关于“上海五反运动第二战役”的报道，用了许多军事术语。在关于“五反”运动的公开消息中，用许多军事术语是不妥当的。今后在公开消息、文章、广播中，关于“五反”运动，不要用军事术语。

〔2〕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3〕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4〕指李克农在1952年4月27日晨1时的电报中提出的可否考虑趁机将战俘问题、机场问题、中立国问题一起提出来，一并讨论和解决。

攻击对方违反日内瓦公约关于无条件遣返战俘和不得侮辱虐待和伤害战俘两条原则，并强调我方三月二十七日所提折中原则的公平合理，以利宣传。

4月29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指出：同意你们所拟对案，以中立国问题换对方在机场问题和战俘问题上的让步。提出此方案时，应准备一强硬发言稿，强调我方在中立国提名问题上的合理，驳斥对方坚持机场问题是干涉我方内政，并指出我方在战俘问题上实已作了很大让步，因此对方应有让步的表现。在对方撤销其干涉内政的机场问题并在战俘问题上让步时，我方可同意将每方各提三个中立国改为每方各提两个中立国。此两个中立国，并不忙提出具体国名。在中立国提名问题与机场问题对消之后，如果对方对战俘问题并未表示让步，我们尚不忙作折中考虑，而仍要强调对方应在我们三月二十七日调整原则的基础上解决问题，准备拖他一些时间，到对方有让步表示时再说。

4月 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题词：“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注意业务，又注意政治。”

5月1日 上午十时，和朱德、刘少奇、李济深、张澜、林伯渠、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检阅首都五十万群众游行队伍。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2〕，指出：关于中立国提名问题，同意你们的意见。须在对方询问每方各提两国是否即指对方所提的瑞典、瑞士，我方所提的波兰、捷克，我们才可表示就是这四个国家，并要加重说明我方这一让步是必须以对方放弃机场问题的无理要求和在战俘问题上同意我方的折中方案为前提

〔1〕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的，因我方的折中方案已经是很大让步，而对方并未作任何让步。

5月3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指出：三日会上应采取强硬态度，对对方发言予以痛斥，指出其所谓提案是最后的不能更动的说法，完全是有意拖延并企图破裂谈判，完全不是谈判的态度，而是施行威胁。并斥对方所谓让步了的地方，其实只有一点，即机场问题，而这根本不是问题。在俘虏问题上对方根本并未让步，并还向后倒退。我方所让的中立国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实质问题，并且我方在三月二十七日的折中方案中，已经对俘虏问题作了很大的让步，因此下一步必须由对方走。如果对方有意拖延或破坏谈判，应该明白表示，不容含混。看其反应如何。行政会议可继续两天，如果对方还是采取这个顽固态度，应准备提议公开行政会议，对他拖一些时候。

5月5日 阅施复亮四月二十二日写的《五反后北京工商界的情况和问题的简报》，批示：“刘、周阅后，送彭真同志处理。这是施复亮给劳动部的报告，由李立三送来的。其中所述的问题应予迅速妥善解决，请彭真同志注意，并请彭告黄敬注意，在五月份内解决这些问题。”同时批示：“退李立三同志。施复亮文件已阅，已告彭真同志注意解决这些问题。这些是普遍的问题，中央已指示各地注意妥善解决。施复亮另有关于他对民建会性质任务的新的提纲一件也收到了，尚未研究，便时请告施。”简报反映了经营管理权、工人监督、工资、房产所有权、补税、劳动纪律、小企业劳资关系、资金、分红与利润、职工福利等十个方面的问题。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陈云、彭德怀、薄一波、李富春出席。

5月8日 起草中共中央批语，将中南局五月四日关于防止

〔1〕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追赃时发生错误的指示转发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仿照办理。中南局的指示说：今后在定案追赃工作中必须按以下规定执行：（一）要先定案后追赃。（二）不准直接派人到贪污分子家庭特别是劳动人民家属那里去逼赃。（三）贪污分子供称赃款存投于商店而又无证件、“五反”中商人又坚不承认者，同样应采取慎重怀疑态度，不应草率肯定，硬追硬逼。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指出：敌人目前企图以所谓七万人对一万二千人的战俘交换来欺骗世人，压我让步，并准备在压不下时，拖一些时。我们必须将其诡计予以戳穿，并须做既不受压、又不怕拖的准备。八日发言重点，首先应放在痛击敌人强迫扣留我方被俘人员，即所谓“自愿遣返”，指出其利用蒋李特务用血腥犯罪方法来实行强迫扣留。同时，并应利用日内瓦公约揭发对方违反该公约的各种行为。应坚决反对所谓甄别，指出按照日内瓦公约，根本不许可有任何甄别。

5月9日 为转发罗瑞卿关于华南军区纠正在“三反”定案中许多干部的右倾思想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各大军区、志愿军党委和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批语指出：“各处如有同类偏向，必须立即纠正。必须将一切真正的贪污犯、贪污嫌疑分子和弄错了的人按照中央历次指示和政府法令认真地如实地加以判处和审查清楚，不得放纵一个坏人，不得冤枉一个好人。对赃款凡能追出者必须一律坚决追出，惟不得累及无辜家属，不得派人到农村追赃款（除个别确有大赃存在农村，社会舆论认为应追者外），不得硬追那些本来追不出的部分。所有这些，均请各级军区党委和各级地方党委注意掌握，务使三反斗争完全胜利结束，不受虎头蛇尾的右倾思想所影响。”

〔1〕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五反”定案、补退工作等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委、区党委和已经进行“五反”的城市市委的指示。指示指出：在“五反”斗争中，工作组和工人对资本家违法所得数一般都算得很高，在定案时必须合理地降下来，使合乎经济情况的实际，必须使一般资本家在补退之后还有盈余。谭震林同志提出上海清算出十万亿违法所得数，超过了资本家一九五一年的实际所得，他们准备降至四万亿，提出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比例。我们认为二分之一的比例太多，三分之一的比例则稍微少一点，以照三分之一略多一点为适宜。薄一波同志回京报告，广州新药业原定违法所得一千亿元，由我们几次主动核减，最后定为三百六十亿元，出于资本家意料之外的宽大，大家高兴。这个比例即是比三分之一稍微多一点。请各市委衡量全局，大体按此比例定案，我们就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取得主动，而使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使资本家重新靠拢我们，恢复经营积极性，使工人不致失业。补退时间，除少数确能和确愿早日补退者以及极少数应没收者外，大多数资本家的补退时间一律推迟到九月或十月开始为适宜。数大者可分多年补退，一部分还可作为公股不要交出出现金。这样于活跃市场、防止失业是完全必要的。罚款可只施行于极少数人，判刑尤其要少。各城市应由省委书记、市委书记亲手审查几家大厂店，做出模型，说服干部和工人（必须适当地着重地去说服他们），同时即向一切违法资本家宣示我们的宽大和认真的态度，显示我们的“五反”斗争，主要不是为了搞几个钱，而是为了改造社会。在付工缴费方面不应当采取苛刻政策，应当说服干部积极从事经济工作，不要采取消极态度。工人监督生产一事，势在必行，但不宜行得太急，中央同意目前只在少数厂店举行典型试验，待资本家喘过气来，到秋季或冬季再行逐步推广。工人福利问题，必须解决，但又必须解决得

合乎实际的经济情况，不能太低，但又决不可太高，致陷自己于被动。“总之，三反和五反的胜利是极其伟大的，毫无疑问应当进行三反和五反，不进行这一正义的斗争我们就会失败。现当三反、五反最后定案之际，我们必须本斗争从严处理从宽、应当严者严之应当宽者宽之的原则，好好结束这场斗争。”

同日 晚八时，和周恩来会见以宣传与文化部部长柯别茨基为团长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会见后，毛泽东接受柯别茨基代表哥特瓦尔德总统赠送的一辆汽车。随后，和周恩来又先后会见印度文化代表团团长、国会议员潘迪特夫人和全体团员，缅甸文化代表团团长、政府宣传部部长宇吞帕和全体团员。

同日 晚九时，和朱德、刘少奇、李济深、周恩来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音乐舞蹈联欢晚会。晚会由匈牙利国家人民文工团、印度舞蹈家、缅甸音乐家和中国的合唱团舞蹈团联合演出。演出休息时，会见匈牙利国家人民文工团团长。

5月10日 为转发中共重工业部党组关于“三反”追赃定案经验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指出：“现当三反运动进至法庭审判、追赃定案的阶段，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总之，必须做到如实地解决问题，主观主义的思想 and 怕麻烦的情绪，必须克服。这是共产党人统治国家的一次很好的学习，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义。”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指出：敌人十分强调中立国、机场、战俘等三个问题的全盘解决，估计因怕将俘虏问题孤立起来不好办。因此，我们不要再强调全盘解决，而应说剩下的问题既可一次解决，也可分别解决，以孤立遣俘问

〔1〕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题。而遣俘问题敌人从未作过让步，这是敌人的致命弱点。在谈判会议上，对方既采静坐怠工方法，我们即可采正面攻势，每日就对方各种无耻论点依序选一问题予以精练有力的驳斥，次日即以公报发表，并由记者发来消息进行配合，以彻底揭露敌人的各种欺骗和武断宣传。

5月12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指出：乔埃发言态度极恶劣，应根据事实予以痛斥，并质问其决不作任何退让之词是否准备破裂，但这种恫吓手段，除在全世界证明对方毫无谈判诚意外，不论在会场上战场上都已遭受到并且还要遭受到惨重的失败。

5月13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彭德怀、薄一波、李富春出席。

5月14日 阅彭德怀本日报送的陈锡联〔2〕、万毅、苏进、邱创成〔3〕五月十三日关于志愿军火炮损失情况及筹补方案的报告，批示：“恩来同志：此事解决办法，除你所说的几个炮团调去以外，请考虑（一）从国内守备各军调一部分，（二）从在朝二线各军调一部分。是否可能，请与彭、聂、粟商讨决定为盼！”“此外，向友方购炮，是否可能，请再研酌。”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4〕，指出：敌人今日发表了关于杜德事件〔5〕中美俘虏营长官柯尔生致我方被俘人

〔1〕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陈锡联，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

〔3〕苏进、邱创成，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

〔4〕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5〕1952年5月7日下午，为了反抗美军对战俘的迫害，巨济岛上美军76号战俘营的中方被俘人员扣留了美方战俘营负责人杜德准将，并向美方提出四项要求。经美方新任战俘营负责人柯尔生准将复信表示接受后，5月10日杜德离开战俘营。

员的答复，其中承认俘虏营“有过流血事件发生，结果有许多战俘被联合国军队打死或击伤。我可以向你们提出保证，将来这个俘虏营里的战俘可以希望得到符合国际法原则的人道待遇，我愿尽自己的一切力量使暴力行动和流血事件不再发生”。柯尔生并允许：“我们不再对这个战俘营里的战俘进行强迫甄别，或任何重新武装的行动”。你们在十四日会上应即抓住这两点，引用原句，加以痛击，指出柯尔生是代替杜德的敌方俘虏营负责人，其负责的答复已经承认了对战俘的不符合国际法即日内瓦公约的待遇，承认了有暴力行动，承认了有强迫甄别。由此可见对方的自愿遣返完全是暴力行动和强迫甄别的结果。

同日 阅周恩来、贺诚五月十二日关于反细菌战防疫工作情况的报告，批示：“此件很好，应通报各地。”报告说：四月间，敌机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华东及华南地区继续撒布毒虫毒物。据此，继续开展了群众性的卫生防疫运动，主要任务是捕鼠、灭虫、改善环境卫生和预防注射；在防疫研究上主要是东北的脑炎问题；在宣传工作上主要是筹备了美帝细菌战罪行展览。

5月15日 为荆江分洪工程全体员工题词：“为中国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十九日，水利部部长傅作义视察荆江分洪工程工地，慰问全体员工，并颁发印有毛泽东题词的四面锦旗。

5月16日 致信陈嘉庚：“惠书早已收到，迟复为歉！遵嘱写了集美解放纪念碑七字未知合用否？先生近日身体如何，时以为念！”

同日 阅叶恭绰、柳亚子、李济深、章士钊五月十四日的来信，批示：“请彭真同志查明处理。我意如无大碍，袁崇焕祠墓应予保存。”二十五日，致信叶恭绰：“数月前接读惠书，并附萨

镇冰〔1〕先生所作诗一首，不久又接读大作二首，均极感谢。萨先生现已作古，其所作诗已成纪念品，兹付还，请予保存。近日又接先生等四人来信，说明末爱国领袖人物袁崇焕先生祠庙事，已告彭真市长，如无大碍，应予保存。此事嗣后请与彭市长接洽为荷。”

同日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出关于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后方勤务学院的命令。命令说：为了国防建设需要，及时培养后勤干部，加强后勤领导，特决定军委创立后方勤务学院，负责训练团以上后勤领导干部，定于一九五二年八月一日开学。

5月19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本日关于西藏三大寺统战工作和庆祝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一周年给西藏工委的复电稿，在末尾加写：“再一次指出，你们和西藏人相关的各项工作，每项均须事前报告中央，经过批准，然后执行。此点工委应向所属各机构发一严格的通知，责令遵行，不得忽视。”

5月20日 审定中共中央本日关于争取“五反”斗争胜利结束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并为中央起草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区党委和各大城市市委的通知。通知说：“兹将中央关于争取五反斗争胜利结束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一件发给你们，希望你们认真研究，严格执行。”指示规定：定案处理的原则，是“斗争从严，处理从宽，应当严者严之，应当宽者宽之”，务要做到实事求是，合情合理。对资本家违法所得数目，必须按照中央五月九日指示所规定的控制比例重新计算定案。对违法工商户一般只退财补税，少数才予罚款。除对国计民生有极严重危害或破坏作用者、违法行为属于罪大恶极者、确系敌伪产业为人非法窃取

〔1〕萨镇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曾任代理国务总理、海军总长。1952年4月10日去世。去世前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军委委员、福建省人民政府委员。

者三类外，一般不予接管或没收。凡在“五反”运动中发现的带有反革命性质或其他政治性的案件，除现行破坏分子外，均先处理经济问题，然后再交公安或其他适当部门处理。凡“五反”运动中发现的贩运走私毒品之类的案件，应按中央禁止贩毒指示专案办理。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彭德怀、薄一波、李富春出席。

5月22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指出：二十二日会上可继续就釜山事件〔2〕追击对方，并提出对方正使用国民党特务、暴徒来共同迫害我方被俘人员，这完全是破坏日内瓦公约，违反人道的举动。每日发言应只就一二点集中攻击，使之精简有力，利于宣传。

同日 晚七时，同林伯渠、徐冰谈话。八时，同陈伯达谈话。

5月23日 为庆祝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一周年致电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3〕：“感谢你们五月二十三日的来电。值此西藏和平解放周年节日，你们来电表示愿为逐步彻底实现《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而努力，极为欣慰。我庆祝你们和全体西藏人民更加亲密团结起来，与全国各兄弟民族人民，同心协力，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和繁荣幸福的新西藏，并庆祝你们的成功和健康！”

同日 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接见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与朝鲜人民军访华代表团。毛泽东向全体代表致意，并勉励中国与朝鲜两国人民在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大家庭中紧紧

〔1〕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1952年5月20日美方在釜山战俘营中，屠杀中方被俘人员，伤亡达86名。5月21日朝鲜停战谈判代表团大会上，朝中方面首席代表南日奉命就这又一次的血腥事件，向对方提出严重抗议。

〔3〕班禅额尔德尼这时正在从青海回西藏途中。

地团结起来。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指出：二十二日会上，乔埃态度十分无礼，你们必须予以还击，否则哈利逊〔2〕必将继续使用乔埃这种流氓态度，因为乔埃在前几次不等翻译完他的话就无礼退席，我们当场既未还击，事后又未痛斥，故他乃敢再三再四耍此流氓手段。当场还击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事后痛斥，应该严厉指斥这种流氓无礼态度完全失掉军人身份，而且这种行为本身就足以证明对于谈判毫无诚意。关于每日就一两个题目打击敌人的痛处甚好，但必须注意每次内容不要将一切有关问题都平铺直叙地重述一遍，致使主题不明，失掉攻击重心，同时要注意发言简练扼要，生动有力，不要前后重复，牵扯太多，致失掉攻击和宣传的效能。

5月24日 阅关于美蒋妄图骚扰华南沿海的情报，批示：“请周考虑中南军区迅速迁至广州，并加强对海南岛的部署。”

5月27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出席，薄一波、李富春列席。

5月31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五月二十七日关于一至四月份群众来信反映失业情况和要求解决职业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批示：“周总理：失业问题仍颇严重，此件请一阅。似宜由中央劳动部或直接由政务院召开一次失业问题处理会议，由各大城市及各省派员参加，订出可行的处理办法。请酌定。”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出席，薄一波、李富春列席。

6月1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

〔1〕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哈利逊，当时任朝鲜停战谈判“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

有关北京、上海、天津情况的汇报，刘少奇、周恩来、彭真、薄一波、李维汉、刘澜涛、曾山、黄敬、潘汉年〔1〕出席。

6月2日 阅中共中央统战部办公室报送的对马光斗〔2〕五月六日所作搞好劳资关系报告的反应的材料。这份材料说：这个报告在资方及工人中产生了不同反应。资本家听了后都很满意，认为政府明确规定他们有财产所有权、经营管理权、用人权，保障了他们的合法权益。有些竟因此气焰嚣张，对工人、店员进行讽刺、打击或威胁；有些资方想乘机找理由报歇业，辞退工人；有的打击“五反”中的积极分子。大多数工人、店员不了解报告内容，见资方得意嚣张，对政策表示怀疑和不满。毛泽东阅后批示：“彭真同志：除资本家有三权外，应同时告诉资本家不得向工人报复，否则法办，以免引起资本家嚣张，工人丧气。”

6月6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统战部起草的《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草稿）》，将决定稿中的“中间阶级、中间阶层”提法改为：“资产阶级、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即雇有少数几个工人或店员的小资本家）、一部分从地主阶级分化出来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分子以及和这些阶级、阶层相联系的知识分子”。并批示：“罗迈同志：此件已阅，略有修改，请再酌。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同日 下午六时，同叶剑英谈话。晚九时五十分，同邓子恢谈话。

6月8日 阅中共中央统战部办公室六月七日印发的《统战

〔1〕潘汉年，当时任上海市副市长。1950年3月至1952年2月曾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党组书记，1952年10月再任这一职务。

〔2〕马光斗，当时任北京市劳动局副局长。

部长会议中所反映的问题简报》第一号，批示：“周总理：此件（二）项关于南京的情况可看一下。在南京这类城市，补退的数字、时间、比例均值得考虑一下。”《简报》说：南京市共有二万五千工商户，但实力很贫乏。全市私营工商业总资金共三千二百亿元，“五反”中经几次审核降低，现拟退补八百至九百亿元。

6月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陈毅并华东局、上海市委的复电：“六月八日来电〔1〕收到。同意你的各项意见。谭震林同志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在饶〔2〕治病期间代行主席职权，待提交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后即可就职。同意上海市府党组书记仍由潘汉年同志担任，方毅〔3〕同志改任副书记。同意上海市总工会党组书记仍由刘长胜〔4〕同志担任，钟民〔5〕同志改任副书记。军队整编转业应加紧督促，达到‘转业给饭吃、走向生产’之目的，防止用大批裁员的办法，这些意见是正确的。”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6〕，发去由周恩来起草的金、彭致克拉克〔7〕的信。信中说：“现在阻碍着朝鲜停战谈判达成协议的，只有一个战俘遣返问题。我们认为，你我双方

〔1〕陈毅 1952年6月8日关于谭震林等任职和军队整编转业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表示拥护毛泽东和中央确定的边打边建边稳的方针及各项工作部署，但认为军队整编问题还抓得不够紧，建议中央在“三反”、“五反”以后进行号召和督促，并提出在整编中要防止大批裁员，而以转业给饭吃走向生产为宜。

〔2〕饶，指饶漱石。

〔3〕方毅，当时任中共上海市政府党组书记、上海市第二副市长。

〔4〕刘长胜，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上海市委第三书记、上海市总工会主席。

〔5〕钟民，当时任中共上海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市总工会第一副主席。

〔6〕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7〕克拉克，当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

代表应该不遗余力地协商解决这个问题，以实现世界人民所迫切希望的朝鲜停战。” “我方代表为实现这一保证，曾多次提出一个最切合实际的公平方案，即：双方所俘获的外国武装人员（联合国军或中国人民志愿军）应全部遣返回家；双方所俘获的朝鲜武装人员（南朝鲜军或朝鲜人民军），其家在对方地区者应全部遣返回家，其家在收容方面地区者得许其就地回家，不必遣返。这个方案完全符合于举世公认的一九四九年日内瓦公约的精神。” “你方所坚持的所谓‘自愿遣返’和‘甄别’的原则，不仅是不合理的，而且是不合国际公约的。” “基于上述原因，你方代表在谈判会议中就拒绝说理，拒绝协商，而一味重复你方强行扣留我方被俘人员的方案是‘坚定的、最后的、不能改变的’这种武断声明，同时，又经常提出无限期休会和定期休会等要求，来拖延谈判。” 信中还说：六月八、九两日，你方代表仍继续拒绝至板门店开会，这就使停战谈判的正常程序为之破坏。如果你方意欲借此破裂谈判，那你方就应公开宣布，承担责任。你方如尚有对于停战谈判的诚意，你就应该命令你方代表，按正常程序前来板门店开会。

6月10日 复信黄炎培：“六月八日惠书收到。一八四〇年是林则徐领导广州民众反抗英国进攻的那一年，即所谓鸦片战争的那一年，不是说陈胜吴广，先生记错了。中国现代的革命，首先和最主要的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故可以上溯到反鸦片战争的林则徐及广州的‘平英团’，上溯到二千余年前去纪念陈胜吴广，则太远了，那是古代的农民起义，不是现代的革命。”

同日 复信易礼容〔1〕：“六月九日来信收到。参加土改有收

〔1〕易礼容，新民学会会员，曾与毛泽东等创办长沙文化书社。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曾任中央委员，1928年后脱党。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劳保部部长。

获，甚好。承告以各事，甚谢。人们说你近年政治上进步不大，这种批评是值得注意的，我从去年的一次谈话中亦有此感觉，主要的是劳动人民的立场还没有站稳。此次参加土改，可能对你有帮助。政协全委会每周或每两周有一次学习座谈会，许多老先生都在学习，建议你去参加，请你自己酌定。”

同日 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同日 上午十时，同叶剑英、方方、陶铸谈话，十一时半又约邓子恢来一起谈。

6月11日 审阅聂荣臻六月六日关于中南军区领导机构南迁广州问题的报告，批示：“周、林阅，退聂办。（一）以四十三军移驻海南岛，四十六军移驻雷州半岛，即足以对付海南局四十四军仍位惠州一带不要动。这样可以东西机动，如海南岛有事再将四十四军调去不迟。（二）赵尔陆调出为军工部长，不要去广东。以上两点已与谭、赵〔1〕谈过。其余均同意。”

同日 阅空军司令部六月九日关于五月份战果情况给总参谋部的报告，批示粟裕：“空军作战成绩不佳，请你与空司同志研究改进方法，务于短期内改变敌我形势。刘亚楼回京后，应去前线指挥。”二十九日，批示聂荣臻并刘亚楼、吴法宪、王秉璋：“同意刘、吴、王六月二十八日报告所提组织三个梯队空军部队的指挥机构的意见，望迅即按此执行。”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

6月12日、13日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听取叶剑英关于华南分局工作问题的报告，并批评华南工作中存在“地方主义”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叶剑英同志在华

〔1〕谭、赵，指谭政、赵尔陆。

南工作是有成绩的，他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责任，更不能说他是搞地方主义的头头，大家要理解他。当然，包括剑英同志在内，各地的同志都应从这件事中总结教训，防止今后再发生此类错误。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子恢、薄一波、叶剑英、罗瑞卿、杨尚昆、安子文、陶铸、谭政、方方、赵尔陆出席会议。

6月14日 阅中共北京市委六月十一日关于中小学生学习费用负担及生活情况的报告。报告说：目前中小学生学习所负担的费用，对于劳动人民家庭和低薪制工作人员来说，是相当重的。中学生的伙食一般仍很差，医疗卫生设备少。为了改善这种状况，计划接管全部私立中小学，公私立中小学一律免收学杂费。报告还说：目前干部子弟学校中，学生待遇较一般中小学学生为优，但也极不一致，学校之间伙食费和津贴费的标准高低不同，同一学校之内又有大灶和中灶之分。干部子弟入普通学校的，其公费补助按家长革命历史和职位分为三等。上述差别对干部子弟和一般学生都影响极坏，应该改变。毛泽东批示：“周总理：（一）如有可能，应全部接管私立中小学。（二）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请酌办。”

6月15日 晚上，同高岗、李富春谈话。

6月17日 上午，约见傅作义。本日，薄一波就傅作义要将个人资产献给国家一事，致电马文瑞（1）：“六月十三日电敬悉。关于傅作义财产问题处理经过如下：三反开始以后不久，傅作义提出愿将其所经营的商店（约七八处）及现金全部献给国

（1）马文瑞，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家，并表明自己态度说有这多资产就很难接受工人阶级思想，因此愿丢掉包袱云云。后经主席指示‘傅作义这种举动是好的，应予以欢迎。但把私人财产献给国家不必要，可将经营的商业结束，现金全部存入银行，仍归傅自己所有’。（大意如此）主席这个指示主要是说目前不少起义人员及民主人士都有些钱，若接受傅的请求，陷其他人于被动是不妥的。因此，你们可以同意傅作义把款存到银行之意见。”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高岗、彭德怀、邓子恢、习仲勋出席。

6月18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指出：（一）由于亚历山大和劳埃德正在由日赴美途中，世界舆论又正对美不利，因此对方可能一面在谈判中耍流氓，一面在军事上对我施用压力，以表示其强硬。我们应一面在谈判中坚定回击，猛攻敌人弱点，一面在军事上严阵以待，不使敌人得逞，以揭穿敌人外强中干的软弱性。（二）关于此次对方的无礼的挑衅举动，同意你们的对策和意见。〔2〕”

6月19日 就王震十八日来电说医生提出赛福鼎因高血压病严重不宜高空长航一事，致电赛福鼎：“你的身体是否宜于坐飞机，请你和医生商量决定，如不宜高空长航则不必来京，如身体许可则来京开会。”

同日 阅周恩来、贺诚六月十八日关于五月份敌机撒布毒虫毒物及防疫工作等情况的报告，批示：“此件应通报各大区及各

〔1〕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李克农1952年6月18日来电中说，17日对方再次走出会场，建议采取见怪不怪其怪自败的方针，一方面坚决反对他们的拖，但另一方面又充分表示我们完全不怕拖。

省、市。”

同日 上午，同张宗逊谈话。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高岗、彭德怀、邓子恢、薄一波、李富春、李维汉、习仲勋、杨尚昆、安子文出席。

6月20日 致电斯大林〔1〕：“由于经济建设即将成为我们国家的中心任务，我们拟即参考联共（布）中央的经验加强我们党的中央机构〔2〕，为此，我们要张闻天同志和你所指定的一位同志作一些谈话，以便使他了解联共（布）中央在这方面的经验。请你允许张闻天同志和你所指定的苏联同志作这样的谈话，不胜感谢！”

同日 晚上，同萧劲光谈话。

6月21日 晚上，和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同六月二十日从朝鲜战场奉调回国的陈赓谈话。在听取汇报朝鲜战场情况时，毛泽东说：有人说美帝国主义是不好惹的，其实中国人民也是不

〔1〕这个电报由刘少奇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中共中央1952年6月20日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的电报说：

“由于经济建设即将成为我们国家的中心任务，党和政府的中央机构必须加强，中央拟将各中央局书记及其他一些干部调到中央工作，并拟参考联共中央的经验来建立党中央的机构。为此，我们研究了前年中国党的组织工作参观团在苏联参观后有关联共组织工作经验的报告，但我们对于联共中央的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三个机构的组成、职权和关系还不清楚，我们想了解联共中央有关这三个机构的经验作为我们建立中央机构的参考，请你去找马林科夫同志或联共中央其他负责同志作一些谈话，在谈话中，请你问明这三个机构的性质、任务、组织成分、职权、工作、会议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各共和国和直属州的党机构等，以及你认为需要了解的其他事项，然后向中央作一报告。”

好惹的。它用“联合国军”名义，也没有把我们吓倒。要是我们有了现代化武器装备和掌握先进技术的干部，把敌人赶出朝鲜是不成问题的。为了彻底打败美帝国主义，我们必须抓紧培养现代化军事人才，下决心解决技术装备的落后问题。在谈到党中央决定办一所军事工程学院时说：朝鲜战争爆发后，斯大林在援助我们部分技术装备时，就提出建设现代化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必要组建一所高等军事技术院校。我们接受了这个建议。国防现代化需要大批技术军官，苏联也要派专家来协助我们办学院，我看就由你来当军事工程学院的院长兼政委吧。七月十一日，毛泽东签署中央军委命令，任命陈赓为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八月二十二日，军事工程学院筹备委员会成立。

6月23日 为转发朱德关于全党纪律检查工作的总结报告，起草中共中央发至省军级的批语：“兹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关于全党纪律检查工作的总结报告一件发给你们，可在党刊上登载。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报告说：“三反”运动对于我们党来说，是一次有领导的、发动群众的、全体规模的、有系统的纪律大检查运动，使广大干部受到了教育和考验，证明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犯有违法乱纪错误的干部受到了应得的处分。同时，暴露出我们在纪检工作和干部工作中存在的相当严重的缺点和应当吸取的教训：第一，过去有些党的组织发现了党员干部有违犯党纪的错误，不是正面地及时地提到原则高度予以批评纠正，对于犯有严重错误不宜继续担任原来工作的高级干部，没有坚决地从领导岗位上撤换下来，使党纪松弛，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更加发展。第二，某些党的组织平时对干部的了解很差，不听群众的反映，不深入检查他们的工作，一些坏干部利用这些缺点骗取信任，以达到个人的目的。第三，有些部门用人单纯强调技术，忽视政治，放松党的领导和党内的思

想斗争，造成了干部中违法乱纪的严重情形。因此，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反对自由主义，就成为当前十分迫切的任务。第四，必须加强纪检工作，健全党内的组织生活和民主生活，充分发挥支部的堡垒作用，发动对党员干部违法乱纪行为的揭发和检举，经常向党员进行遵守纪律的教育。第五，在处理党员违纪案件中，要克服姑息养奸和简单化两种倾向。第六，在“三反”斗争的建设阶段，各级组织可适当地进行一次遵纪守法的教育，使党员干部逐渐地养成奉公守法的习惯。

同日中午，同习仲勋谈话。

同日由瑞典、法国、英国、意大利、巴西、苏联、中国等国科学家组成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开始到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对美国进行细菌战的事实进行调查。该委员会于八月完成调查，九月十七日发表调查报告，进一步证实了美国军队对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使用细菌武器的事实。

6月24日致电斯大林：世界和平理事会组织的调查细菌战事实的“国际科学委员会”到北京后，苏联代表费勒什尼克夫同志看了展览会及材料之后，建议请苏联科学院的专家共四人，立即乘专机来北京帮助我们准备向“国际科学委员会”提出的关于细菌战事实的报告。我们希望这四位专家能在最短时间到北京来。二十六日，斯大林复电：四名专家将于最近期内飞赴北京。

同日下午一时，同滕代远谈话。四时，同粟裕谈话。

6月25日阅原国民党军官费帖六月十六日关于要求就业的来信，批示：“周总理：此信代表失业旧军官，值得注意。请交失业救济会议处理。”信中说，像他这样的一些国民党下级军官正陷于失业，要求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到文教局办理失业知识分子登记和请求劳动局介绍工作等，都遭到拒绝，走投无路，要求国家予以收容和改造，不使流浪社会。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彭德怀、薄一波、李富春、杨尚昆出席。

6月27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新疆问题。会议决定：王恩茂、徐立清、张邦英、赛福鼎分别担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书记。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彭德怀、薄一波、李维汉、李富春、习仲勋、王震、张宗逊、杨尚昆、安子文、徐立清、刘格平、汪锋〔1〕、包尔汉、王恩茂、张邦英、赛福鼎、高锦纯、饶正锡〔2〕出席会议。

6月29日 下午，会见英国坎特伯雷教长约翰逊和夫人、英国牛津大学国际问题讲师戴伊，周恩来在座。

6月30日 下午，在政务院礼堂接见参加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代表会议的代表，接受献旗，并接受出席这次会议的西藏地区代表的献礼。

同日晚上，同粟裕谈话。

6月 为成渝铁路通车题词：“庆贺成渝铁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天成路。”

7月2日 审阅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关于新疆农业区实行土地改革的报告》和《关于在牧区工作的决定（草稿分别将标题改为《关于在新疆农业区实行土地改革的决议（草案）》（一九五二年七月 日新疆党代表会议通过）和《关于在新疆牧区工作的决议（草稿批示：“此两件请周总理今晚即阅，明三日或四日至

〔1〕汪锋，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部长、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2〕高锦纯，当时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新疆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新疆省政协副主席。饶正锡，当时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组织部部长。

迟五日由尚昆派人乘飞机直送迪化交习仲勋、王恩茂二同志收，务于七月六日或七日送到勿误。原件应抄存一份。”这两个文件均曾经刘少奇审阅修改。

同日 晨三时，同周恩来谈朝鲜停战谈判问题。

同日 上午八时，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指出：对方在七月一日会议上改变了态度，并重提第五十一款条文而不再提七万名单数字，这是两个月来新的变化。估计敌人由于其国内外情况的变化，可能想从协商中与我们求得一个在遣俘问题上适合双方要求的解决方案，以实现停战。在七月三日的发言中，应指出：两个月来由于对方拒绝说理，拒绝协商，致使谈判毫无进展。七月一日对方的发言，改变了对方两个月来的态度，表示对于在朝鲜停战谈判中唯一剩下的遣俘问题，愿意寻求“一个在合理的程度上适合双方要求的解决方案”。我方对于这种协商态度，表示欢迎。现在对方既然承认交换战俘使之“回家过和平生活”是“一个反映双方的信誉的理智的与人道的行为”，那我们就更有理由提议根据第五十一款和第五十二款所规定的原则，重新进行分类，校正名单。如果对方同意我方这一建议，使交换战俘的问题达成“通情合理”的协议，就有可能迅速实现朝鲜停战。为利于切实商讨这一建议，我方并提议，将代表团大会改开行政会议。

7月3日 晨二时，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2〕，指出：你们应即照七月二日八时去电准备发言稿，并依照去电方针进行谈判。敌人七月一日的发言，显明地是在转弯，而且有一种可能由于其国内两党竞选及国外关系的原因而采取较快地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我们回答对方，亦应明快而主动地表明我方态度。这

〔1〕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并非示弱，而是有利于引导对方进入解决问题的具体谈判。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彭真、彭德怀、薄一波、李富春出席。会上，周恩来提议回国治病并已痊愈的彭德怀留北京接替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九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并朱德、刘少奇、彭德怀、林彪：前承中央同意并决定以彭副主席主管军委常务，我请求，自即日起解除我兼做的军委工作。我建议，彭德怀同志自即日起过问军委日常工作，直接向主席和中央负责。以后一切经过我处转呈主席或主席交我阅办的军委文电，均改送彭副主席处理。

7月7日 复信张有成：“前后来信都收到了，谢谢你。你于阴历五月初一给我的信很好，使我晓得乡间许多情形。粮亏猪贱，近月好些否？文家诸位给我的信均收到，便时请你告他们一声，并问他们好。乡里禁酒是因缺粮，秋收后可能开禁，你们也可以喝一点了。”

同日 审阅同意聂荣臻报送的在全国各省市转业建设委员会秘书长会议上的总结报告提纲。报告提纲说：全国第一期回乡转业建设工作，现已基本结束，共计办理回乡转业人员一百零三万余人，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一次。

7月8日 阅彭德怀关于进一步明确公安部队隶属关系的报告，批示：“刘、朱、周阅。请彭办。同意第二个意见（1），请叫萧向荣起草一个指示。”

7月9日 复信黄炎培：“七月八日惠书收到。会（2）开得很

（1）彭德怀报告中的第二个意见是：维持1951年12月10日中央和军委批准的关于公安部队隶属关系的决定中所确定的双重领导关系，但须明确以军区的领导为主。

（2）指1952年7月2日至7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二次总会扩大会议。

好，甚慰。六月二十六日的信也收到了，并以致谢。”

7月10日 签署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教职员和该院高级速成系及上级速成系的第一期毕业学员的训词。训词说：“军事学院的创办及其一年多以来的教育，对于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是有重要贡献的”。“中国人民的建军历史，已经走过了二十五年的长期路程，其革命经验之丰富，在国际上除苏联以外，无与伦比。”“我们现在已经进到了建军的高级阶段，也就是进到掌握现代技术的阶段，客观条件已完全具备了这种可能，只需加上不疲倦的主观努力，就一定可以实现。与现代化装备相适应的，就是要求部队建设的正规化，就是要求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就是要求实现诸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为此，就需要克服在过去时期曾经是正确的，而现在则是不正确的那种不集中、不统一、纪律不严、简单现象和游击习气等等，而必须加强整个工作上、指挥上，而首先又应该是从教育训练上来培养的那种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这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条件之一。”签署训词后批示：“特指定军事学院刘院长〔1〕代表军委向该院高级速成系和上级速成系第一期毕业之学员宣读军委主席之训词。”

7月11日 在达赖喇嘛的来信上批示：“转民委办。似应复一信，由代表们带回去。”对于达赖喇嘛赠送的礼物，毛泽东批示：“黄金五两，红花一桶，哈达一条，请田家英同志清出送存民委。”

同日 阅山东省财政经济委员会七月七日报送的山东物资交流大会情况的通报，批示邓子恢：“你们正在开城乡交流会，此件可作参考。”

〔1〕指刘伯承。

同日 复信毛宇居：“归去后来信均收到，甚慰。有复邹普勋〔1〕一信，请代转交。接毛泽连的信，六婶〔2〕病故，他自己又跌断了脚，不知实际情形如何，脚尚有诊好的希望否？他未提到要钱的话，不知他的生活尚过得去否？暇请查明见告。接张有成兄的信，乡里粮缺猪贱，不知现在好些否？风便望将乡情赐告。为了了解乡间情况，拟待秋收以后邀李漱清、邹普勋二位来京一游，请你征求他们二人意见告我为盼！”复邹普勋的信如下：“七月一日的信收到。你的生活提高一些，甚慰，为你庆贺。秋收以后，如你愿意来北京一游，可以偕李漱清先生一道来京住个把月。李漱清先生去年来信想来北京一次，但不知他今年尚有此种兴趣否，他的身体能出远门否？”

7月12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德怀、薄一波、李富春、杨尚昆出席。

7月1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叶剑英并告邓子恢的复电：“七月九日的电报收到。分局扩大会议开得好，甚慰。经过这次会议以后，我们相信华南的工作会有根本的转变，分局的威信也会提高。”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同意邓小平七月九日对西南局、四川省委、云南省委干部调配意见的复电稿，将第四条“望小平将西南工作布置后于最近即来中央，何时能来，望先电告”，改写为：“望小平将西南工作布置后于七月下旬即来中央一商，并在中央先行工作两三个月。何日可以动身，盼告。”

7月14日 审阅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日本人民争取独立的道路》，将标题改为《庆祝日本共产党的三十年》，并在社

〔1〕邹普勋，毛泽东少年时的私塾同学和邻居。其父邹春培是毛泽东的私塾老师。

〔2〕指毛泽连的母亲。

论稿末尾加写一段话：“光荣的英勇的日本共产党在其三十年历史中，获得了丰富的经验。这个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自己的，这个党是联系人民群众的，这个党是学会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的。因此我们有根据相信，这个党是能够领导日本人民革命获得胜利的。当此日本共产党建党三十周年之际，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谨以兄弟般的友谊致其深切的庆贺之忱。”同时批示：“少奇同志：此件应以庆祝为主题，故改换一个题目，并于最后加了一段鼓励和庆祝的话。很大的篇幅不很切题，但也勉强可用，不好作大改了。”这篇社论七月十五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同日 阅杨秀峰要求为河北清苑革命残废军人学校题词的来信，批示：“拟题字，即转交。”毛泽东的题词是：“加强团结学习，发扬光荣传统。”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出席，彭德怀列席。

7月15日 复电金日成并告李克农〔1〕。电报说：此事〔2〕经两日考虑，此间同志一致认为，在目前接受敌人这一挑衅性引诱性的并非真正让步的方案，并在敌人狂轰滥炸之后接受，显然对我极为不利。首先是在敌人轰炸压力之下而接受其挑拨性引诱性的方案，在政治上军事上我已处于不利地位，敌人必将利用我方这一弱点，继续采取攻势，并启其扩大挑衅之念。故在现时形势下，接受敌人这一方案必然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不接受，并准备敌人破裂，我们具此决心，敌人倒不一定破裂。如继

〔1〕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指朝鲜停战谈判“联合国军”代表团1952年7月13日提出的遣俘方案。按照这个方案，其中遣返朝鲜人民军战俘占应被遣返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左右，遣返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只占应被遣返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二。

续拖延，我坚持不退，敌人仍有让步可能。如不让或破裂，我应决心与敌人战下去，从敌人不得解决的战争中再转变目前的形势。

7月17日 嘱咐机要秘书：凡发给李克农的电报，除总理特别批要我先看再发出的以外，都可先发。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出席，彭德怀列席。

7月18日 阅聂荣臻、粟裕起草的军事建设五年计划及有关报告，批送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德怀：“聂、粟所拟军事五年计划及附件已阅过，基本同意，可即照此部署，请彭主持。”

7月20日 阅习仲勋关于新疆情况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针的报告，复电习仲勋并告西北局：“你于七月十六日晚写的报告今天收到阅悉。我们认为你对新疆情况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针是正确的，望即照此去做。”报告指出：新疆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左”的冒险急进错误是部分的，但是严重的。牧区社会改革是个错误的典型。

同日 晚上，同萧华谈话。

7月21日 批示薄一波、杨立三并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自几个月前中央发出指示，要求专署以上各级财务行政机关及军队军以上各级后勤部门向中财委及总后勤部作出违反财政纪律的自我检讨，限期上送，请你们饬专人检查一次，将已作检讨者与未作检讨者列成一张表，送给我及中央同志阅看，并提出处理意见。”

同日 阅粟裕七月二十日关于建设航空工业与增强空军后备力量问题的报告，批示：“此件请彭德怀同志审处。我意可以照办。请彭以电话与周总理一商。”报告说：我国幅员辽阔，海岸线漫长，一旦战争爆发，敌机随时可能轰炸我主要城市、工业区

及交通线，届时我空军如无足够后备力量，势难完成保卫任务。根据目前远东地区美国的空军实力和我国目前的情况，我国建设航空工业的困难虽多，在我国主观努力及友方援助下仍可克服解决，但飞行员不能像飞机一样可以日夜三班用机器制造，故飞行员的培养更属重要，似应多办几个航校，至少须于一九五三年、一九五四年各增加三个航校，并以大力推进航空工业的建设。

7月22日 阅吴晗七月二十一日再次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来信，批示：“我意还是暂不入党为宜。”〔1〕此后，吴晗又多次提出入党要求。一九五七年三月，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吴晗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彭真出席，薄一波列席。

7月23日 同彭德怀谈中央军委工作等问题。

同日 晚上，召集聂荣臻、粟裕、萧向荣、杨尚昆开会，商议二十四日中央军委会议的有关事宜。

7月24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聂荣臻、粟裕、张震、苏静等出席。毛泽东在会上说：今天这个会，算是军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席的交班会。我与彭总谈过，总理太忙了，今后军委的日常工作由他主持，但对外暂不公布。朝鲜战场，看来大打打不起来，最后是要和谈停战的，待停战后再正式公布。

7月26日 致电斯大林〔2〕。电报说：我们现决定由周恩

〔1〕吴晗1949年1月3日曾向毛泽东提出入党请求，同年1月14日毛泽东给他回信说：“我们同意你的要求。惟实行时机尚值得研究，详请恩来同志面告。”

〔2〕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于1952年7月27日发出。

来、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五同志组成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苏，向您报告抗美援朝工作及中国国内三年来的重要情况和今后五年建设计划的总方案，并向苏联政府商谈下列各项问题：一、向苏联政府提议缔结中苏继续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根据地，延长苏军驻在旅顺口地区期间的新协定；二、缔结中苏两国（或中苏蒙三国）对修中蒙苏之间从集宁经乌特〔1〕到乌兰巴托直通乌兰乌德的铁路协定；三、缔结中苏两国关于在中国种植橡胶的技术合作协定；四、请求苏联政府对于中国的地质勘测、工业设计和装备、器材订货及技术援助等项给以帮助；五、请求苏联政府对于中国的国防建设、军事装备、兵工生产、通信设备及朝鲜作战的军火补充等项给以帮助；六、请求苏联政府对中国五年建设计划中对苏贸易订货的差额给以贷款援助。五人代表团拟于八月十八日后乘飞机赴莫〔2〕，随员将有五十人左右。

7月27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转发薄一波关于检查违反财政纪律的初步总结报告的批语稿，在批语稿中加写：“（二）同意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同志七月二十六日关于检查违反财政纪律的初步总结报告，并将此项报告发给你们。中央责成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于九月间再行检查一次，看各级应做检讨的财政和后勤部门是否都将检讨做好送来。（三）此件和附件应在党内刊物上登载。”报告列举了地方财政机关、军队后勤系统、中央各企业部门违反财政纪律的主要表现后指出：无论哪一系统，也无无论哪一级机关，违反财政纪律的现象几乎是普遍的，国家所遭受的损失是严重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各部门的本位主义和局

〔1〕指扎门乌德。

〔2〕1952年8月15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往苏联，17日抵达莫斯科。

部观点作怪；其次是受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在贪污腐化方面开展竞赛，讲排场，讲享受，铺张浪费，左右相比，上行下效，相习成风；再次是工作上的官僚主义，没有严格周密的制度和切合实际的开支标准。

同日 审阅第二十一军司令部关于对浙江上下大陈岛国民党部队进行攻击的初步方案和预定作战方案，批示：“彭副主席：同意你的意见〔1〕，在朝战结束前不要进行对浙江上下大陈岛的作战。朝战结束后何时进行及如何进行此项作战，亦须慎重考虑。”

7月29日 晚七时半，同徐冰谈话。

同日晚八时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彭真、彭德怀、薄一波、李富春、粟裕出席。

7月30日 阅中央军委总后勤部七月二十八日关于赴朝鲜调查野战救护、卫生防疫和反细菌战等工作情况的报告，批示：“德怀同志：这个报告很好。其末条七项建议〔2〕是否可行，请你和有关方面同志商处。”

同日 审阅《“八一”建军节贺电》修正稿，将标题改为《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各民主党派为“八一”建军节给人民解放军的贺电》，批示：“此件可用。即送徐冰同志：（一）共产党不另发贺电，即在这个贺电上签名；和过去一样，先列政协全国委员会，次列中共，次列各民主党派。（二）你交我的修正稿，我又修改了几处。因中共列名，原文说到中共的地方都去掉

〔1〕彭德怀的意见是：“进攻上下大陈岛屿，美海空军亦可能参加，为慎重计，须待朝鲜停战实现后举行为宜，请主席考虑批示。”

〔2〕7项建议是：1. 连卫生员应增加到5名；2. 军、师、团均建立防疫组织；3. 医院、医疗队装备救护车；4. 扩大志愿军卫生部的编制；5. 师以下各级卫生机关直接归同级军政首长领导；6. 师休养所编制应与军的医疗所（队）相等；7. 派毒气专家及化学部队到前方担任防治工作。

了。（三）请再征求各党派代表们同意，即可发表。（四）对志愿军不要发贺电。”

7月31日 晚十时，同邓小平、贺龙谈话。

同日晚十一时，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彭真、彭德怀、邓小平、贺龙、薄一波、李富春出席。

8月2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指出：“八月三日复会时，我们应准备一个发言稿，痛斥对方片面体会七天之久，并在体会中又屠杀我方被俘人员的无理暴行，指出对方必须老老实实坐下来进行谈判。”

同日 阅刘伯承七月二十二日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整编工作的报告，批示：“此报告很好。刘院长很守纪律，不断有报告，不像军委直属许多部门那样不守纪律，很少执行请示报告制度。”

同日 阅聂荣臻关于七月二十九日召集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各部、各特种兵和总后勤部负责人会议研究如何向军委主席作报告的情况的报告，批示：“照此办理，应速实行。请尚昆将此件抄送刘、朱、周、彭、聂、粟及军委各部门首长。”报告说：过去的缺点是，没有把向军委主席作报告当作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任务来贯彻。虽然有个别问题的请示，但缺少系统的情况反映。定期的综合报告写得烦琐而冗长，而且不经常。今后各部门、各特种兵要做好下列工作：（一）研究有关本部门的情况，加以综合，定期写成简要的综合报告；（二）定期将有关本部门所做的工作、处理的问题、拟定的计划，择要写成专题报告或综合报告；（三）遇有紧急的重大的事情，随时请示。

〔1〕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8月3日 审阅修改薄一波准备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作的一九五一年度国家预算的执行情况及一九五二年度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修正草案），加写一段话：“在实施增产节约的同时，必须注意职工的安全、健康和必不可少的福利。如果只注意前一方面，忘记后一方面，那是不对的。”同时，批示薄一波：“此报告很好。有些小的修改。”薄一波的报告说：一九五一年度国家预算执行和核算的结果，出现了远比原来预计良好的情况：收支不仅平衡，而且还有结余。在支付上除完全保证了国防需要外，曾以极大的力量稳定了物价，一九五一年全国市场虽在朝鲜作战情况下，基本上做到平稳。在恢复与改造经济及文化事业方面拨付了比一九五〇年更多的资金，从而也就加速了经济及文化事业的恢复与改造的速度。由于国家经济力量的增长，人民生活已有所改善，人民购买力也有很大的提高。编制一九五二年度国家预算的基本方针是：继续巩固国防、稳定物价、并进行全面恢复和重点建设。

8月4日 审阅刘少奇转送的杨尚昆、安子文七月十七日草拟的关于加强党中央办事机构的意见，批示：“周、朱、彭、邓小平、贺龙、陈毅、刘伯承、谭震林、李富春、彭真、薄一波、马明方诸同志阅，退刘少奇同志办。（一）此件我认为可行。请你们审阅，如大体同意，即照少奇同志建议开始进行准备，从各地抽调一些人来建立一些机构。（二）至于整个方案，当然要待九十月间中央全会方能作出决议，付之实施。”意见指出：目前我们的国家正进入建设时期，各方面都要求中央的领导更加集中。但是，一方面党中央的负责同志过少，而工作却十分繁重；另一方面党中央的办事机构已远不能适应这样的要求。因此，拟于明年初将各中央局的书记抽调回来，以加强中央的领导，同时加强中央现有的各部、委、办公厅的组织及其工作，并增设一些

新的部、委。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转发华东局关于司法改革工作指示的批语稿，在批语稿的“各省、市、区以上党委，凡尚未向中央作司法改革工作报告者，务于九月内向中央作第一次关于你们的司法改革计划和执行情况的报告”一句后，加写：“否则以违纪论。自三反以来，中央为全盘改革司法工作曾发出多次电报，但各地除华东外，反映不多，许多地方既不报告执行情况，也不提出不同意见，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这是很不妥当的。今特重申前令，望即依限报告。”华东局的指示说：由于司法部门某些新老干部不同程度上受到旧法思想与旧作风的侵蚀，因而对现有法院要求予以改革，整顿组织，清除堕落蜕化和恶习不堪改造的坏分子，而且主要的还必须将旧法思想、旧作风加以清除。

同日 审阅中央防疫委员会关于八、九两月份卫生运动具体要求的指示稿，在文末加写一段话：“以上部署，准备在今年初冬召开全国防疫会议，予以检查，并规定一九五三年的防疫计划。同时在北京开一次全国卫生防疫展览会，比较各区卫生防疫成绩的优劣，并对优胜者给奖。此事当另有详细通知。”

同日 下午五时，出席全国政协一届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扩大）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去年这一年，我们是边打，边谈，边稳。去年抗美援朝战争的费用，和国内建设的费用大体相等，一半一半。今年不同，估计只要用去年的一半。现在我们的部队减少了，但装备加强了。我们过去打了二十几年仗，从来没有空军，现在空军也有了，高射炮、大炮、坦克都有了。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如果明年再打一年，全部陆军都可以轮流去训练一回。这次战争，我们本来存在三个问题：一、能不能打；二、能不能守；三、有没有东西吃。能不能打，这个问题两三个月就解决了。敌人大炮比我们

多，而士气低，是铁多气少。能不能守，这个问题去年也解决了。办法是钻洞子。关于吃的问题，现在每个师都有三个月粮食，都有仓库，有礼堂，生活很好。究竟打到哪一年止，谈判到什么时候？我说，谈还是要谈，打还是要打，和还是要和。为什么和还是要和呢？因为长期打下去对美国很不利。一、要死人；二、要花钱；三、他们国际国内都有难以克服的矛盾；四、还有一个战略问题，美国的战略重点是欧洲。说马上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吓唬人的。我们要争取十年工夫建设工业，打下强同的基础。我们要好好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孙中山先生是个好人，但他领导的辛亥革命为什么失败了？其原因：一、没有分土地；二、不晓得镇压反革命；三、反帝不尖锐。统一战线是否到了有一天要解散？我是不主张取消的。党外一个部长他当得很好，有什么理由撤销？能不能当部长，不是以党籍来作保证，而是以工作和为人民服务的业绩大小而定，一个国家只能以此为标准。各民主党派要进行教育，不要上帝国主义的当。我们国家建设有前途，有希望。过去想，国民经济是否三年可以恢复。经过两年半的奋斗，现在国民经济已经恢复，而且已经开始有计划的建设。

8月5日 复信张云逸：“陈毅同志带来的信收到。再休养一年很有必要，望安心静养，不要顾虑工作。”

8月6日 上午，会见周震麟、王季范、王首道。

同日 下午二时十五分，同罗瑞卿谈话。

同日 下午四时，出席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并讲话。在谈到军费减少问题时说：这样，我们的军队是不是减弱了？没有减弱，而且是增强了。所谓军费减少，是因为整个预算扩大了，还有一部分经费过去列在军费中，现在不列在军费中了。此外，全军进行了“三反”，大大节省了不应该用的钱。还因为土地改革以后地方武装减少了近一百万，

而且现在已经有几十个师、四十几万人，变成了人民解放军水利工程师、人民解放军铁路工程师等等。人民解放军的人数减少了，但是装备增强了，我们买了新式武器。在这一个意义上讲，和平更有保障了。在谈到国家预算问题时说：整个预算，去年有很大进步，财政收支更加集中统一了。现在已经建立了三级（中央、大行政区、省）财政制度，将来要建立四级财政制度，县也设一级。会议听取和批准了薄一波所作的关于一九五一年度国家预算的执行情况及一九五二年度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并通过了一九五二年度国家财政收支预算。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指出：“停战协定草案既已取得协议，望即组织宣传稿件发来，以便就唯一剩下的对方扣留战俘问题围攻敌人。”

8月7日 下午一时，会见梁漱溟。

同日 下午四时，出席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听取林枫〔2〕、张治中、陈毅分别作东北工作情况报告、西北工作情况报告、华东工作情况报告。会议批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与外国订立条约、协定、议定书、合同等的统一办法之决定》等文件，通过《关于调整中央人民政府机构的决议》和《关于调整地方人民政府机构的决议》。

8月8日 下午四时，出席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听取张难先〔3〕、程潜、邓小平、刘澜涛分别作中南工作情况报告、湖南工作情况报告、西南工作情况报告、华北工作情况报告。会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

〔1〕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林枫，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

〔3〕张难先，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区域自治实施纲要》。九日，毛泽东签署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

8月10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薄一波、李富春、刘伯承、陈毅、贺龙、林枫、谭震林、刘澜涛、杨尚昆、粟裕、马明方出席。

8月11日 审阅修改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本日关于四川黑水(1)地区剿匪的政策问题给西南军区的指示电稿。指示电稿说：“黑水群众在土司、头人剥削下生活甚苦，加一九三四年我军经过所给予损失甚大，为减轻其负担，对以前损失除考虑酌量救济以扩大我影响外，此时应基本上谢绝慰劳。”毛泽东在这句话之后加写：“只可对其慰劳品中约十分之一左右，当作人民的好意收受下来，并于数日后即向群众还礼，以此种办法增进军民间的友谊。”

同日 阅粟裕八月六日关于朝鲜战场步兵部队轮换方案的报告和关于在长山列岛等处设防问题的报告，批示：“德怀同志：（一）此两件请你处理。（二）关于轮换问题，整个时间似不宜延长到明年下半年才毕，似应从今年八月起，在十二月之内轮换完毕。轮换办法似以军为单位为宜。关于长山列岛等处构筑国防工事的两种不同意见，我倾向于同意粟裕等人的意见。但此两问题，似应在一次会上讨论一下，方能作出决定。此次会可在恩来等走后(2)开，邀请陈刘谭、贺邓(3)等同志到会。（三）此两件送刘、朱、贺、邓、刘、陈、谭七人轮阅。”八月中旬，彭德怀

(1) 黑水，位于今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内，红军长征时曾经过这里。

(2) 周恩来 1952年8月15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苏联。

(3) 陈刘谭，指陈毅、刘伯承、谭震林。贺邓，指贺龙、邓小平。

召集会议对上述两事进行研究。二十三日，中央军委对长山列岛等处设防问题作出决定。从一九五二年九月至次年二月，先后有七个军入朝轮换。

同日 阅彭德怀转报的杨立三、张令彬〔1〕八月九日关于一九五二年下半年全军缺汽油需要订购的报告，批示：“陈云同志：此件请阅。此事请你即在今明日内处理一下，或者由你交代一波请他处理，并以结果告我为盼！其中所提国内油价过高问题是否可能减低？如不能，理由何在，并是否向苏购买为适宜，可能性如何？”报告说，一九五二年下半年，全军尚缺相当数量的汽油需要订购，但国内油价比较高，因此希望能从苏联进口一些油。十三日，薄一波函告彭德怀并报毛泽东：国内石油售价确实过高，主要是由于照顾玉门油田的成本。昨天我与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局研究的结果，他们同意将现在油价减低百分之二十。我们意见，为节省外汇起见，今年不再进口石油。

8月13日 批示同意周恩来八月十日关于改组政务院党组干事会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报告。报告提出：鉴于政务院及所属委、部最近进行了人事调整，同时，为了便于照顾整个政府部门的工作，拟扩大原有政务院党组的范围，并更名为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直属中共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领导。新的政府党组干事会成员，除原政务院党组干事会书记周恩来，副书记董必武、陈云，干事罗瑞卿、刘景范、薄一波、陆定一、胡乔木、李克农、李维汉及齐燕铭等外，拟再增加邓小平、林伯渠、彭真、李富春、曾山、贾拓夫〔2〕、习仲勋、钱俊瑞、王稼祥、

〔1〕张令彬，当时任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副部长。

〔2〕贾拓夫，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西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安子文、吴溉之〔1〕、李六如、廖鲁言等，共计二十四人。拟以周恩来任政府党组书记，陈云、邓小平分任第一和第二副书记，李维汉任党组书记，齐燕铭、廖鲁言分任第一、第二副秘书长。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德怀、李富春、粟裕出席。

8月14日 审阅聂荣臻、粟裕及滕代远分别报送的关于烟潍铁路〔2〕修建方案的报告，以及周恩来、彭德怀分别批注的意见。周恩来办公室摘要的烟潍铁路修建方案说：军委所提修建烟潍路的方案，经铁道部研究后拟出了四个方案，其中以第一、四方案〔3〕较完善些。从国防意义上看，以第四方案较理想，但从技术观点看，以第一方案较易修。彭德怀批注意见，基本上同意第四方案。理由是：（一）不受敌舰威胁；（二）沿途隧道多，受敌空袭威胁感少；（三）从蓝村经莱阳至烟台后再东至威海卫，西至蓬莱，如此烟台、威海、蓬莱与青岛军事调度便利。毛泽东批示：“同意彭德怀同志的意见，即先修蓝村、莱阳、烟台线及龙口、烟台、威海卫线，待此两线成后，再修潍县、莱阳线或他线。修时应绕道多作隧道。”

8月15日 复信陈毅：“来信收到。休养两个月很有必要。你参加中央再一次会议之后，即可去适当地点从事休养。俟身体康复，再返华东工作。你的工作岗位现时仍以留在华东为适宜，因为留华东作用更大，那边还很需要你工作。”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刘少奇、朱德、彭

〔1〕吴溉之，当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2〕烟潍铁路，即山东烟台至潍县的铁路。

〔3〕铁道部提出的第一方案是，从潍县经昌邑、掖县、黄县、蓬莱、烟台至威海卫。第四方案是，从潍县或蓝村经莱阳至烟台，从龙口经烟台至威海卫。

德怀、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贺龙、薄一波、谭震林、林枫、安子文、马明方出席。

8月16日 阅薄一波八月十五日转报的叶季壮八日关于东南亚各国向我国洽购大米的情况及我们的初步意见的报告，批示：“同意售米给锡兰〔1〕、印度、印尼的计划。锡兰来京代表团首席如是其国贸易部长，我方到车站迎接者应以同等资格之人出面。”

8月17日 阅萧向荣八月十六日报送的《总后勤部情况简报》第一号摘要，批示：“这种情报有用，军委各部门均应做，由办公厅统一管理。”摘要报告了志愿军财务和军需会议的准备情况、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度各项军费预算的座谈会的情况、志愿军补给工作的中心关键汽车保证问题、如何处理文件积压和提高干部素质的问题等。

8月18日 复信达赖喇嘛：“五月十四（藏历水龙年三月二十日）来函及礼品均收到。感谢你的好意。西藏地方政府和僧俗人民都希望建设西藏工商业，发展西藏经济，是很好的。中央人民政府一定会帮助你们，使西藏的经济逐渐繁荣，人民的生活逐渐改善。随函附送十六毫米电影放映机一部（附《中国人民的胜利》、《中国民族大团结》影片各一部），黄缎二匹，请查收。”

同日 审阅邓小平八月十七日报送的政务院关于设置文史研究馆的决定草案，批示：“刘阅，退邓办。同意这个决定。加了一句。”决定草案中说：“全国各省及中央或各大行政区的直属市均设置文史研究馆（大区、专、县及省属市不必设立）。如某些省、市原已成立类似机构的，必要时可更换名称，不必重复设立。”在这段话后，毛泽东加写：“某些省市无设立此项机构之需要者，亦不必

〔1〕锡兰，今斯里兰卡。

设立。”

8月19日 下午，会见李济深、张治中、蔡廷锴、蒋光鼐〔1〕、邵力子，并共进晚餐和看电影。

8月21日 复信毛宇居：“来信收到。李漱清老先生及邹普勋兄前曾表示，希望来京一游。我认为可以同意，借此了解乡间情况。但请你向他们二位说清楚：（一）须他们自己下决心，出远门难免有风险；（二）到京住一至两个月即还家乡。如他们同意这两点，则可于阳历九月间动身北来。到长沙湖南省委统一战线部刘道衡部长处接洽，领取来京路费，办理乘车事宜。介绍信一件，请予转致李、邹二位。其余要来京者，今年不便招待。顺候近安。”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刘少奇、朱德、彭真、薄一波、王稼祥、李初梨〔2〕出席。

8月23日 阅洪学智八月二十二日关于朝鲜政府希望中国政府帮助解决朝鲜今冬三十万人的冬衣等问题给彭德怀的电报，批示：“彭：三十万套冬服，可作赠送。”二十八日，审阅外交部部长周恩来给甘野陶〔3〕关于赠送棉衣的电报稿，加写：“请告朝鲜政府，此三十万套棉衣作为赠送，不要付款，也不要记账。”

同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将于八月二十五日至九月四日在北京举行的青年团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的有关问题。毛泽东讲话说：你们（指青年团中央负责人——编者注）管的是一代人的问题。青年的特点是：英勇积极，知识不足，前途远大。

〔1〕 蒋光鼐，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纺织工业部部长、北京市政协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

〔2〕 李初梨，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3〕 甘野陶，当时任中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临时代办。

面对着一个新的时期，学习是更加特别突出的任务。青年共同的普遍的经常的任务是学习，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文化、科学、技术。还要注意体育，一定要把青年一代的身体搞好。新的时期到来，不懂几门技术是不行的，党也如此。干部领导群众靠两条，一靠政策，一靠技术。领导上要想办法帮助干部取得必要的专门知识。除懂得政策外，团的县、区干部必须懂得些农业知识，团市委干部必须懂得些工业知识。党委领导不但要交任务、交政策，而且要交经验。你们一样，不但要交数字，而且要交经验。要做好工作必须总结经验。不但要总结领导的经验，而且要着重总结群众生产的工作的各种经验。刘少奇、朱德、林伯渠、彭德怀、邓小平、薄一波、王稼祥、杨尚昆、安子文、萧华、廖承志〔1〕、陈伯达、周扬、钱俊瑞、赖若愚、邓颖超、章蕴〔2〕、冯文彬、胡耀邦、蒋南翔、李昌、荣高棠、高扬文、区棠亮、杨述〔3〕出席会议。

8月24日 阅罗荣桓、傅钟、萧华八月十四日关于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召开全军文化教育座谈会情况的报告，批示：“同意

〔1〕廖承志，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主席。

〔2〕章蕴，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兼上海市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华东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兼上海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1952年7月又任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秘书长。

〔3〕胡耀邦，1952年7月被免去川北区党委第一书记、川北人民行政公署主任，同年9月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蒋南翔、李昌、荣高棠，当时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高扬文、区棠亮、杨述，当时分别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组织部部长、国际联络部部长、宣传部部长，1952年9月又均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这个报告，可用指令发给全军照办。”报告说：七月二十一日至三十一日，总政治部召开的这次座谈会主要是由各地汇报最近文教实施情况与经验，解决文教工作中的一些具体组织领导问题，并制定了全军统一的部队小学语文和算术速成教学方案。

同日 阅聂荣臻八月二十三日关于中南军区部队第二期整编的报告。报告说：第二十一兵团原系陈明仁的起义部队，在这次整编中除已调出两个师转业为工程部队外，尚余一个师。现中南军区部队拟在这次整编中再将尚余的这个师编为该兵团所属三个炮兵团。目前火炮装备条件不够，故不可能将这三个炮兵团装备起来，势必再将其编掉。这在政治上是值得考虑的。因此，我们认为，在这次整编中仍应作为一个师编留较为适宜。毛泽东批示：“陈明仁部应当留一个师，不应编掉，也不要编为炮兵团。”

同日 阅聂荣臻八月二十三日关于经常向中央军委主席作报告的报告。报告说：根据您的指示，自七月二十九日我们召集总参谋部各部、各特种兵及总后勤部首长专门讨论之后，情况已有初步转变。今后应做到：应请示者随时请示；紧急情况随时报告，一般情况定期简要综合报告；报告按内容可分为各部门工作情况简报、专题报告和综合报告。力求改善报告的写法，写好报告不仅是文字技术的问题，主要还是思想方法的提高问题。毛泽东批示：“照此办理。刘、朱、彭〔1〕、尚昆阅。退聂办。”

8月25日 阅罗荣桓、傅钟、萧华八月二十三日关于八一建军节二十五周年全军体育运动大会情况的报告，批示萧华：“此件很好。请用中央和军委联署名义起草一个电报，致各大军区、

〔1〕彭，指彭德怀。

志愿军、各特种兵、军事学院，并告各中央局、分局，批准这个报告，对所提四项建议〔1〕责成各地实行。”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刘少奇、林伯渠、彭德怀、邓小平、薄一波、王稼祥、邓颖超、杨尚昆、安子文、陈伯达、赖若愚、胡耀邦、龚子荣、李楚离、王甫〔2〕和各中共中央局组织部部长出席。

8月30日 复电周恩来：“八月二十八日电收到。我们同意苏方提出的关于旅顺口的换文〔3〕。也原则上同意苏方提出的关于移交中长路的公告〔4〕。”

同日 致信赛福鼎：“根据你的意见，对疏附县帕哈太克里乡的农民同志们的来信，写了一封回信，烦为转交为荷！”回信说：“感谢你们今年三月在庆祝土地改革胜利时写给我的信。你们已经从地主阶级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中获得解放，希望你们在爱国丰产的口号之下，更加团结，努力生产，改善自己

〔1〕报告共提出5项建议：（一）竞赛要建筑在各级领导重视及平时训练工作的基础上。（二）部队体育运动必须是有组织、有领导、有制度的。（三）为达到普及与提高的目的，总政治部暨各大军区、各特种兵及其他重要单位，必须成立专业体育工作队或体育训练班。（四）文化艺术工作仍应继续贯彻“面向连队、为兵服务”的方针。（五）今后像这样的运动会，建议全军或以大军区为单位，坚持每年开一次，使之成为一种制度。

〔2〕龚子荣，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楚离，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人事部副部长。王甫，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员管理处处长。

〔3〕指中国外交部部长和苏联外交部部长关于延长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期限的换文。正式换文的时间为1952年9月15日。

〔4〕指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公告。公告于1952年9月15日宣布，中国长春铁路应于1952年12月31日前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移交完毕。

的物质生活；并在这个基础之上，一步一步地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

同日 复信朱其陞〔1〕：“来信收到，甚为高兴。寄上人民币二百万元，聊佐小贸资本。彭友胜尚在人间，曾有信来，知注附告。顺祝兴吉。”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胡耀邦、陈伯达、蒋南翔、李昌出席。

9月1日 阅刘伯承、陈士榘、陈伯钧、钟期光〔2〕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遗失文件泄露国家机密问题的报告。报告说：今年五月进行文件大清查，发现严重失密现象。对此，院领导已经采取各项措施，进行整顿。报告提出：年来学院领导对保密制度检查不严，纠正错误不力，造成了失密的错误，除今后督率所属严格执行保密制度外，请给院长以应得的处分。毛泽东批示：“一九五二年八月二十八日报告阅悉。大力整顿，已有成绩，免予处分。”

9月2日 阅赵尔陆九月一日关于二机部初建情况的报告，批示：“退赵尔陆同志。此件已阅，很好。注意保密与肃特，极为必要。”报告说：原隶属重工业部的航空、兵工、坦克三个工业局的领导机构与所辖工厂，已正式拨交二机部领导。在机关和工厂中，尚存在组织不纯、控制机密不严的严重情况。已责成各局领导即行全面了解情况，研究对策，以确实达到保障国家机密与军事工业安全建设的目的。

同日 审阅聂荣臻八月三十日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整编

〔1〕朱其陞，毛泽东的旧友。

〔2〕陈士榘、陈伯钧、钟期光，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教育长、副教育长兼学术研究部部长、政治部主任。

情况和部队轮换作战计划的报告，批示：“同意这个报告及轮换计划。明年三月至六月四个月内换七个军是否觉得太紧一点而须延长时间，可到那时再定。”报告详细汇报了部队轮换作战计划，并说：我们研究了主席对部队采取轮换作战的指示意图，主要是使国内部队不失时机地获得作战的锻炼，以求提高现代作战经验，同时也可照顾到出国作战较久的部队能得到必要的休整。

同日 致电斯大林。电报说：“在抗日战争胜利七周年的时候，请接受我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全中国人民向你和苏联武装部队、苏联人民的热烈的祝贺与衷心的感谢。苏联在抗日战争中给予中国人民的巨大援助，苏联军队歼灭日本军队的主力——关东军，帮助了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取得最后胜利。苏联在中国的恢复与建设过程中给予中国人民的兄弟般的帮助使中国人民的力量获得迅速的巩固与壮大。”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开会。

9月3日 晚上，同程潜、陈伯达、胡耀邦谈话。

9月4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开会。

9月5日 复信黄炎培。信中说：“北戴河的信，九月四日的信及讲稿〔1〕，均已收到，甚为感谢。讲稿用意甚好，惟觉太激进了一点，资产阶级多数人恐受不了，因此遵嘱作了某些修改，是否妥当，还祈考虑酌定。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例如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消灭个人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

〔1〕指黄炎培1952年9月7日准备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分会第四届会员大会上的讲话稿。

的宇宙观，或者如先生所说‘没有劳动，没有生活，不从劳动以外求生活，不从自力以外求生活’，这就是要求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这些对于少数进步分子说来是可能的，当作一个阶级，则不宜这样要求，至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不宜如此宣传。当作一个阶级，在现阶段，我们只应当责成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亦即接受《共同纲领》，而不宜过此限度。在现阶段，允许资产阶级存在，但须经营有益于国家人民的事业，不犯‘五毒’，这就是工人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领导，也就是《共同纲领》所规定的。”“对于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我同意先生的意见，可以向他们宣传社会主义，使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我想这是可行的，也是有益的。在中国的条件下这样的人可能出现，特别是在几年之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更加壮大，更加显示它对于国家和人民的伟大贡献的时候，这样的人可能逐步地多起来。先生近来思想前进甚快，例如北戴河信上所说国家主权的思想，此次所说社会主义的思想，都表示这一点，但在现在却是言之过早，在少数人想想是可以的，见之实行则是不可行的。因为先生对于我的高度的信任，故率陈鄙见如右，是否有当，还祈审察赐教。日内如有暇，想和先生面叙一次。”对于黄炎培的讲稿，毛泽东作了一些修改。把讲稿中两处提到的资本家应“接受工人阶级思想”，改为“接受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把讲稿中用“工人阶级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改为用“爱国主义的思想，《共同纲领》的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把讲稿中帮助资本家“改造思想”改为帮助资本家“改造那些坏思想，那些不合乎爱国主义和《共同纲领》的思想，即所谓‘五毒’思想”。在讲稿中“资产阶级分子有坏的，也有好的”一句之后，毛泽东加写：“就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来说，一个人的思想中有坏的方面，也有好的方面。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去掉坏的方面，发

展好的方面。”在讲稿的最后一段，毛泽东加写一段话：“我们在现阶段对于资产阶级的多数人的要求是如此。但在中国的条件下，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可能超过上述要求，而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即社会主义思想，而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他们一面开工厂，并不要求马上变更自己的成分和事业；一面看到社会主义事业对于人类的伟大贡献，想在将来做一个社会主义者，这种人是可能有的，我们应该表示欢迎。”

同日 阅张干八月三十日的来信，批示：“即送徐冰同志：请于日内致电长沙统战部通知此人，于九月中旬偕罗元鲲先生同来北京一游。此人是过去湖南师范学校校长。”张干的来信说：老友罗元鲲已接到湖南统战部通知，定于九月半间到北京参加国庆三周年庆典，希望能和罗元鲲结伴同行。

9月6日 复电周恩来：“九月四日电〔1〕收到。同意你们关于中苏蒙铁路的意见，并同意待铁路修成后再行公布协定。”

9月9日 审阅修改习仲勋七月十五日在新疆省第二届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删去报告中“封建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只是利用了宗教，而非由他们创造了宗教。因之，宗教不会随着封建剥削制度的消灭而消灭”一段话，加写：“宗教在阶级社会更加发展，并为剥削阶级所利用。因之，宗教的消灭，只有在人类消灭

〔1〕周恩来的电报说，同意苏蒙两国提出的中苏蒙三国对修中蒙间铁路协定草案。协定草案的中心问题有四：（一）双方〔中国为一方，苏、蒙为一方〕对修铁路至中蒙边境；（二）双方均按1524公厘宽轨修筑；（三）今年开始勘察设计，1953年动工，1955年内完成；（四）该路由内燃机车牵引，具备每昼夜对开12次列车的能力，将来经协议提高到每昼夜对开24次列车。关于协定公布时间，我们表示同意斯大林的意见，待铁路修成后再行公布。

了阶级并大大发展了控制自然和社会的能力的时候，才有可能。”并批示：“习仲勋同志的报告很好。惟在说到宗教的时候，他说，‘封建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只是利用了宗教，而非由他们创造了宗教’，这和历史情况不全适合，故将这一段作了一些修改。其他地方，有一些小的修改。”

同日 晚上，同饶漱石、张鼎丞谈话。

9月10日 在新华社九月九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〇七号上批示：“尚昆同志：这种提要〔1〕办法很好，办公厅也可照做。”

同日 同黄炎培谈话，询问“三反”、“五反”运动以后各地工商业情况，特别是中小工商业情况。在了解到中小工商业确有特殊困难，必须找出解决办法后，毛泽东谈了几点意见。他说：（一）中小工商业可以走向联营的道路。三五家、七八家、一二十家从业务的联合逐渐地趋向资金的联合，从此成为公司的方式。（二）从中小工商业的产生来说，大都依靠大工商业而来，尤其是小工厂依靠大工厂而产生。但在情势变化以后，尤其是经过这次“三反”、“五反”运动，大的对于小的，可能失掉了提携的作用。政府贷款和加工定货，不可能直接及于小工厂，这是无可如何的。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可以指定某家小工厂，责成一大工厂去扶助，政府向这一大工厂进行贷款，加工定货，附带一个条件，要求它负责扶助这些小工厂。例如加工定货，大工厂在监督指导之下，酌量一方需求情况，一方接受能力与合理的酬报，分配给予这些小工厂；小商店则由大商店尤其是国营百货公司之类，将货品依照合理的价格，批发给予它们经售。这样，小工商

〔1〕指新华社《内部参考》写的新闻提要。这种提要文字简短，一目了然，便于事务繁忙的领导干部用较少的时间了解较多的情况。

业得以恢复活动。当然，实行时还须商定出种种适当办法来。这种“大带小”方式，也许是中小工商业今后的一条道路。（三）在条件具备之下，中小工商业改变为合作社，当然这也是一条道路。这几条道路，究竟哪一条适宜，也许此外还有其他适宜的道路，都要看实际情况来斟酌采用。

9月11日 阅新华社九月十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〇八期刊登的《华北各地职工的疾病情况严重》的报道，批示薄一波：“请与华北局同志商量，是否可以为解决工人疾病问题，召开一次专门会，决定实施办法？”

9月12日 晚上，召集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聂荣臻、王稼祥、罗瑞卿、杨尚昆、安子文开会。

9月13日 关于清偿解放前人民存款问题，为中共中央重新起草给中财委党组的批语：“中财委党组：（一）基本上同意你们关于清偿解放前人民存款问题的方案，但尺度还须放宽些，望根据放宽的尺度制订一个具体清偿办法，再送中央核阅。（二）此事应在政协常委扩大会上征求民主人士的意见，可待周总理回国后举行。”中财委的方案提出：现在全国财政情况已经根本好转，为了维护社会信用，给银行贷款和存款创造有利条件，决定凡解放前的存款一律归还。处理原则是：首先照顾大多数小额存款户，适当照顾大额存款户；偿还倍数按目前银元牌价计算；所有存款一律还本金不还利息；分期偿还，先还小户，后还大户，小户凭单据一次还清，大户登记分期归还。

同日 阅邓拓九月十二日送审的《人民日报》准备发表的黄炎培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分会第四届会员大会上的讲话稿。将讲稿中第一句“毛主席给我们的指示”改为“今年三月十五日毛主席和我谈话时，曾对我们的工作有所指示”。并批示：“请黄副总理审阅，退还邓拓同志：（一）在文首加了一句，即可不

要补发消息了。（二）应于明日（十四）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并由新华社予以广播。”

同日 致电周恩来：“（一）即将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准备讨论朝鲜问题，墨西哥提出解决俘虏问题的三点建议。（即第一，双方俘虏已表示愿意返国者应予交换；第二，其他俘虏由其他联合国会员国给予暂时避难的权利，这些俘虏应按照以后确定的办法予以遣返；第三，在朝鲜局势完全恢复正常以后，这些俘虏的母国应该向他们提供一切保证和便利，以便他们能够马上返国，如果在朝鲜局势完全恢复正常以前，有些俘虏要求遣送返国，有关政府也应该同样办理，并应给予他们回国的种种便利。）看来在联合国讨论朝鲜问题是英国策动的，墨西哥的这个提议可能也是英国策动的，美国对前者表示愿意讨论，对后者尚未表示态度，我们对此二者应取何种态度，请与苏联同志商定。（二）印度和缅甸从侧面表示愿和我国签订互不侵犯协定，并表示希望你访问印、缅一次，其本意是尼赫鲁想来访问中国，然后希望中国总理还礼访问印度。此事是姚仲明〔1〕大使反映的，我看很有可能提出来谈，如印、缅正式提议我们不大好拒绝，究竟是否可以和印、缅签订上述协定，亦请和苏联同志一商。”十六日，再致电周恩来：“九月十四日电〔2〕悉。墨西哥三点建议是美国策动的，英国表示不满意，说要有所补充，或另提英国的方案。墨西哥建议是将俘虏分散到各国分配工作，‘不能违背他们的意志’云云。这个方案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9月14日 致信章汉夫：“周总理电告有关中长路的公告及

〔1〕姚仲明，当时任中国驻缅甸大使。

〔2〕指周恩来关于1952年9月12日同斯大林谈话情况的报告。

有关苏军延期撤出旅顺的换文〔1〕，即将于十五日或十六日在莫斯科签字，当日发表，第二日登报。请约邓拓、熊复〔2〕同志一商，立即起草一篇社论，并于十五日下午送我一阅。”本日晚，约章汉夫商议社论起草问题，指示他帮助修改。十五日晚，审阅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发展中苏同盟的强大力量》，并批示：“此件请少奇同志即阅，于今夜送还邓拓同志，明天见报。”社论说：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与苏联外交部部长关于延长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期限的换文，说明了中苏两国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根据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特别是根据我国的实际利益所采取的合作方式，完全是真诚无私的。前者更加充分地表明了苏联政府对于我国的国家独立与民族荣誉的尊重，和对于中苏兄弟般的同盟事业的无限忠诚。后者则和目前的国际形势有密切关系。在全面的对日和约没有缔结以前，延长苏军从旅顺口撤退的期限，这对于保卫东方与世界的和平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十六

〔1〕中长路的公告，即《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公告》。公告规定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完全归其所有。有关苏军延期撤出旅顺的换文，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外交部部长关于延长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期限的换文》。换文说，双方外交部部长同意将中苏关于旅顺口协定第二条中规定苏联军队自共同使用的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的期限予以延长，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和苏联与日本之间的和约获致缔结时为止。1954年10月12日，中苏两国发表《关于苏联军队自共同使用的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根据地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支配的联合公报》。公报确定苏联军队的撤退和旅顺口海军根据地地区的设备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应于1955年5月31日前完成。

〔2〕熊复，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

日，《人民日报》发表这篇社论。

9月16日 审阅中共中央为转发甘肃定西地委关于执行民族政策的检查报告给西北局并告西南局、中南局的批语稿，在批语稿末尾加写一段话：“中央希望西北、西南、中南每个有少数民族聚居或杂居地区的县委及地委都和甘肃靖远县委及定西地委一样，于切实检查所属区乡的工作情况后向中央写一个报告。此电及附件可在党刊上登载。”

同日 为天兰铁路通车题词：“庆贺天兰路通车，继续修筑兰新路。”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彭真关于如何开好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以及会议内部组织分工问题的汇报，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薄一波、王稼祥、杨尚昆、安子文出席。

9月17日 阅水利部九月十六日关于汉水黄家场决口和抢救情况的报告，批示邓小平、薄一波：“请商水利部提出根治汉水计划，考虑是否可以列入明年预算。洞庭湖、荆江北岸、汉水三处同治，财政上是否可能？”水利部的报告说：汉水黄家场在九月十三日凌晨二时半发生决口，已组织三百只船进行抢救，绝大部分人已被救出，仍有少数人被淹死。二十五日，审阅邓小平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同意水利部党组将根治汉水工程列入明年计划的报告给中财委党组的批语稿，加写一句话：“此报告转发各中央局、分局阅看，并可在党刊上登载。”

同日 致信李达。信中说：“《矛盾论》第四章第十段第三行‘无论什么矛盾，也无无论在什么时候，矛盾着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这里‘也无无论在什么时候’八字应删，在选集第一卷第二版时，已将这八个字删去。你写解说时，请加注意为

盼！”随信附寄应李达之请，为岳麓山爱晚亭〔1〕题写亭名。

同日 阅外交部九月十三日关于拟接受朝鲜技术人员、技能者六百余人来我国实习给中国驻朝使馆的复电〔2〕，批示：“小平同志：此电所说，与我们商定者不符。外交部发此电未先送审，请你查询告我为盼。”十八日，邓小平致信毛泽东：我已告章汉夫打电话去朝鲜驻中国大使馆改正电报的说法，说明：他们提出两千名技师、技工来华实习，均可接收，但以分批来为好。同时，我已告章汉夫：今后对朝方所提要求，除十分困难者外，都应答应。有关电文必须送审。**同日**，毛泽东批示：“周、邓阅，送章汉夫同志：外交部最近有些较重要的外交复件未送中央审阅，对朝鲜的复电与中央的决策及我们面告朝鲜同志者不相符合，是不妥的。以后请加注意，除例行事务外，凡较重要的外交复文，均须送总理及我审阅之后，再行发出，以免出乱子。此事去年（或者是今年上半年？）有一次即告诉过你，要事不送审是不对的，你曾作了自我检讨，如何又忘记了？”

同日 阅志愿军第十五军政治部九月四日关于“八一五”前后前线对敌政治攻势情况给兵团政治部和志愿军政治部的报告。报告谈到在阵地宣传方面，喊话已发展到对话和播音，我前沿干部战士对此非常欢迎。毛泽东批示萧华：“阵地播音极为重要，是否已普遍筹备了播音设备及播音人员？”

9月18日 阅中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党组九月十七日转报的轻工业部七、八月份工作综合报告，批示薄一波：“这种

〔1〕爱晚亭，建于清乾隆六十七年，1952年重新修复。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常同蔡和森、罗学瓚等同学来这里学习和锻炼身体。

〔2〕复电表示，因我国各业各工厂生产繁忙，来人多安排有困难，以少派为宜。

报告很好。请指令中财所属各部党组务必每两个月做综合报告一次，中财并应指定一人负责检查督促。”报告汇报了管理体制调整后轻工业部管辖的重点行业的情况，一九五三年的基建、生产控制数字草案和今年七、八月份的生产情况，并对卷烟专卖、改进轻工产品质量、统一规格标准、安全生产等问题提出了解决的方针和办法。

同日 将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普遍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等情况的报告批给陈伯达阅，并指出“此报告第四段有关于农村互助合作的情况和意见”。报告说：由于普遍开展了互助合作运动和加强了对农业生产具体的领导，今年夏季农作物已普告丰收。在丰产成绩上以国营农场居首，农业生产合作社次之，常年互助组与临时互助组又次之，单干户最差。今后除继续领导群众战胜各种可能的自然灾害外，必须大力加强对互助合作运动的领导，并普遍举办互助合作训练班。

9月19日 阅周恩来九月十八日关于尤金提议将《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俄文译本分为两卷的来电，复电周恩来：“《毛选》第二卷俄文译本可以照尤金的意见分为两卷，第三卷如太厚也可以分为两卷，请告尤金同志。”

同日 晚上，召集刘少奇、彭真、彭德怀、邓小平、薄一波、王稼祥、罗瑞卿开会。

9月21日 复电阜新发电厂工程队全体职工：“九月十七日电悉。庆祝你们在透平发电机安装工作中获得的成就。望继续努力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发扬积极性，在今后的建设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绩。”该厂工程队全体职工于十七日致电高岗并转毛泽东，报告胜利完成二万五千千瓦透平发电机及一号锅炉安装工作，并定于九月二十日开始发电运转。

同日 审阅周恩来本日发来的将于九月二十二日率领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离开莫斯科时在机场的谈话稿，批示章汉夫和伍修权：“此谈话应和回国新闻一同发表，请告新华社注意收听此项新闻，务必收清，一同发表。”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周恩来的谈话和回国新闻。周恩来的谈话说：中国政府代表团此行在斯大林同志亲自参加之下，业已圆满地完成了有关两国重要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的商谈，完成了毛泽东主席所委托的光荣任务，使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

9月22日 晚上，召集刘少奇、彭真、彭德怀、邓小平、罗瑞卿开会。

9月23日 复电高岗、林枫：“九月二十二日电悉。关于由东北帮助朝鲜收容两万六千孤儿和办一个两千人的工业大学，不须由外交部商谈，即由你们负责和朝鲜派来的人进行具体商谈妥善解决之，所须费用报中财委支付。”

同日 致电高岗：“请你早日来中央着手建立由你担负的工作，何时可来，盼告。习仲勋同志明日可到北京担负中宣及文委工作。周总理、陈云同志明日可回京，并告。”

同日 下午六时半，同凯丰谈话。

同日 晚八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薄一波汇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正在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的情况，刘少奇、彭真、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陈毅、曾山、叶季壮出席。

9月24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一五”计划轮廓问题同苏联商谈情况的汇报，并讨论“一五”计划的方针和任务。周恩来汇报后，毛泽东讲话。他说：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十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七届二中全会提出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问题，现在这个内容就更丰富了。工业中，私营占百分之三十二点七，国营占百分之

六十七点三，是三七开；商业零售是倒四六开。再发展五年，私营比例会更小，但绝对数字仍会有些发展，这还不是社会主义。五年以后如此，十年以后会怎么样，十五年以后会怎么样，要想一想。到那时私营工商业的性质也变了，是新式的资本主义，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工人监督、资本公开、技术公开、财务公开，他们已经挂在共产党的车头上，离不开共产党了。他们的子女们也将接近共产党了。农村也要向互助合作发展，前五年不准地主、富农参加，后五年可以让他们参加。又说，争取十五年不打仗是可能的。刘少奇、陈云、彭真出席会议，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陈毅、薄一波、习仲勋、聂荣臻、粟裕、罗瑞卿、杨尚昆、安子文列席会议。

同日 阅章汉夫的检讨，批示：“刘、周、邓、章汉夫同志阅，存周处：（一）锡兰代表所提两点〔1〕，不应拒绝，具体安排请周总理处理。（二）章汉夫同志检讨尚好，这是第二次，仍不拟给予处分；如将来再犯，再议处分。”

9月25日 审阅修改邓拓九月二十四日夜送审的《人民日报》国庆社论提纲，将提纲的“这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敌力量”一句中的“毛泽东思想”删去；将“毛泽东思想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一句，改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晨七时批示邓拓：“此件已阅，可照这样写。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

同日 晨，会见邹普勋、李介侯。

（1）锡兰（今斯里兰卡）贸易代表团1952年9月22日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两点希望：

（一）中国政府将来派代表团去锡兰；（二）代表团这次能会见毛泽东。

同日 阅王观澜〔1〕九月二十四日关于开凿胶莱运河的建议的报告，批示薄一波：“此件请中财委参考。这条河如果能修通并能走大船，那是好的，但不知头五年有此财力否？”报告建议中央考虑在胶东半岛颈部的胶州湾与莱州湾之间开凿胶莱运河，这样可缩短水上航程六百华里左右，大可加强渤海海面的控制，而工程在目前也可解决很多人就业问题。

9月26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习仲勋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给各中央局、分局的电报稿，修改后的电文为〔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中央决定习仲勋同志为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同志为副部长，并增加凯丰同志为副部长，其他原有各副部长照旧不变。”

同日 中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罗元鲲、李漱清、张干、王季范、邹普勋、李介侯，并共进午餐。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彭德怀、薄一波、习仲勋、曾山、贾拓夫和各大区财经部门负责人出席。

9月28日 为转发安子文九月二十七日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区委的批语：“中央同意安子文同志这个报告，并发给你们阅看。可在党刊上登载。”报告说：自中央发出关于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整党建党工作的指示后，各省、市委都先后制订了具体计划，并开始进行了工作。农村支部的整党，根据典型试验，一般应该解决三个问题：进行共产党员标准的教育；明确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即走组织起来互助合作的道路；严肃处理违法乱纪品质恶劣分子及其他坏分子等。

〔1〕王观澜，当时任农业部副部长。

同日 上午九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同章士钊、罗瑞卿、陶希晋〔1〕谈话。

同日 上午十时，召集彭真、齐燕铭、余心清〔2〕开会。

9月29日 复信黄炎培：“九月二十二日大示〔3〕收到，甚谢。因与财经机关商酌，迟复为歉。先生所提税收、劳资两问题，确是应当注意调整的。据财委同志报告，有些已经调整，有些正在调整，有些则尚待研究调整办法。上次我和先生谈的关于中小工商业的几点意见〔4〕，过于简单，不便发表。此类问题，宜由财经机关征询各方意见，加以处理，较为适宜。大函及几个附件我已交付陈云、薄一波诸同志负责研究去了。我处亦收到工商业者不少信件，可以看出他们对我们工作缺点的反映。近日颇忙，稍待当约先生面叙。”复信于十月四日发出，毛泽东又在信上批注：“黄任老：此信及所附各件因送给几个同志看，故今天才发出。”

同日 审阅修改《人民日报》国庆社论稿《我们伟大的祖国向着和平建设的大道前进》，批示：“已阅。加了几句。三十日广播，十月一日在北京及全国见报。”在社论稿的“苏联政府和人民在过去三年间给了我们以高贵的友谊的援助，对于我国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之后，加写：“最近中苏两国关

〔1〕陶希晋，当时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兼政治法律委员会秘书长。

〔2〕余心清，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兼典礼局局长、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北京市政协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

〔3〕黄炎培在信中谈到，上海中小工商业者为税收所苦，由于1952年1月至5月没有生意，1952年的所得税照1951年税额在1月底应先缴三分之一感到有困难。信中还谈到上海工商界的一些消极心理，认为要扭转这种心理，需从税收和劳资两点上入手。随信附送了毛泽东9月10日同他谈中小工商业问题的谈话记录，请毛泽东审阅。

〔4〕指毛泽东1952年9月10日同黄炎培的谈话。

于在重要政治经济问题上已经取得一致的成功谈判及其已经发表的文件，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指出：“你们对对方建议的处理方针〔2〕是对的。我们拟在十天内外向对方提出一个对案，给以打击。”

同日 下午，会见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泽登巴尔一行，林伯渠、周恩来在座。十月四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宴请泽登巴尔一行，朱德、李济深、林伯渠、周恩来、陈云、黄炎培、邓小平等参加。

9月30日 晚上，举行国庆宴会。致词说：“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纪念日到来了！过去的一年，为了人民的幸福和国际的和平，我们做了不少的工作；我希望在今后的一年我们能做更多的工作。”

同日 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离开北京赴苏联，参加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十月二十日，刘少奇在莫斯科致信斯大林，说毛泽东同志曾要我们就以下问题听取您的意见：一、关于中国怎样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问题。二、何时召集中国人民代表大会问题。刘少奇在信中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这

〔1〕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对方建议指哈利逊 1952 年 9 月 28 日提出的 3 种附加遣俘方案：一、一俟停战协定生效，各方收容下的一切战俘应有权获得释放与遣返。二、一俟停战协定生效，所有愿望遣返的战俘将予迅速交换，所有反对遣返的战俘将分成小批送至非军事区。三、一俟停战协定生效，所有愿望遣返的战俘将予迅速交换，将分为适当大小的各批，送至非军事区内相互同意的地点，并在此地被解除双方的军事控制。南日在发言中指出对方新提出的方案换汤不换药，并重申我方立场。同意对方建议休会 10 日。

两个问题作了系统阐述。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斯大林在十月二十四日同刘少奇等人的谈话中说：我觉得你们的想法是对的。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应该采取逐步的办法。你们对中国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

10月1日 上午十时，和朱德、宋庆龄、李济深、张澜、林伯渠、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庆祝大会，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和群众游行队伍。晚上，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

10月2日 阅谢觉哉九月三十日摘要转报的中央湖北灾情视察组的报告，批示：“小平同志：湖北和皖北今年灾情颇重，必须统筹救济，请你加以注意。”报告说，湖北省入夏以来，大部地区九十余天未下透雨，全省受灾人口六百七十五万、田地八百七十万亩，轻灾遍及三十九县，据说为三十年来所未有。

同日 全国政协主席毛泽东致电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1〕，指出：“会议的召开，对于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以及全世界的人民保卫和平的伟大共同事业，将有巨大的贡献。谨祝会议圆满成功。”

同日 复信毛宇居：“李、邹二位来京，收到你的信，并承佳贶，甚为感谢。毛泽连来信叫苦，母尚未葬，脚又未好，兹寄人民币三百万元，以一百万元为六婶葬费，二百万元为泽连治病

〔1〕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由宋庆龄、郭沫若等11位人士发起，1952年10月2日至13日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亚洲、澳洲及美洲太平洋沿岸的37个国家的代表，共378人。会议就日本问题、朝鲜问题、文化交流、经济交流、民族独立问题、保卫妇女及儿童福利的问题、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问题、关于中东及近东和平运动的情况的报告等，进行了讨论，通过并发表了《告世界人民书》、《致联合国书》和各项决议。

之费。请告他不要来京，可到长沙湘雅医院诊治，如湘雅诊不好，北京也就诊不好了。另寄二百万元给泽荣〔1〕（逊五）助其家用。他有信来，我尚未复，请转告他，不另写信了。这些钱均是我自己的稿费，请告他们节用。”

同日 复信谭熙春：“九月二十三日的信收到，甚以为慰。北游事，今年不要来，明年如有可能，再作决定。”

同日 晚上，和彭德怀同韦国清〔2〕谈话，对他前往越南帮助越南人民军组织抗法战争的西北战役作指示。十月十六日，韦国清到达越南。

10月3日 晚上，同彭真谈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问题。

10月4日 复电刘少奇：“十月三日来电收到。（一）联共同意胡志明同志秘密去莫斯科，现已定六日乘专机起飞，八日可到莫；（二）同意对贺电的修改文字，惟‘个别国家’宜改为‘各个国家’。”〔3〕并批示：“请陆定一同志照此修改，于塔斯社发表大会开幕消息的同时，发表这个贺电。此外，人民日报宜写社论一篇。”十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庆贺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

10月5日 复信齐白石：“承赠《普天同庆》绘画一轴，业已收到，甚为感谢！并向共同创作者徐石雪、于非闇、汪慎生、胡佩衡、溥毅斋、溥雪斋、关松房诸先生致谢意。”

〔1〕泽荣，即毛泽荣。

〔2〕韦国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副司令员。

〔3〕刘少奇在1952年10月3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建议对毛泽东致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贺电稿作几处文字修改，其中，在“正确地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前面，加上“根据个别国家的具体情况”几个字。

10月6日 审阅罗瑞卿本日关于王剑朋杀人案〔1〕的判处意见，批示：“周、邓阅，退罗瑞卿同志，并请罗转告蓝副检察长〔2〕，同意他维持原判，对王剑朋处以极刑立即执行。”

同日 下午三时半，同习仲勋谈话。六时半，同黄克诚谈话。

10月7日 阅聂荣臻本日关于志愿军第二步反击〔3〕开始第一天战况的报告，批示：“聂：待作战告一段落后，请用军委名义起草一个贺电给志愿军各部，以资鼓励。”报告说，志愿军十月六日开始的第二步反击的预定目标（十八个点）已打下十六个点，全歼守敌共二十个排的兵力。

同日 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4〕，就李克农十月五日来电中所说将在八日或九日会上提出我们的对案一事，指出：“根据多次经验，我们如在此时稍一松口，敌人又会发生错觉，气焰高涨，转使谈判再陷停顿。因此，我们首须揭露敌人提案的欺骗性，予以坚决拒绝，然后再提出可以诱致敌人走下一步的我方对案，但方案本身不要希图敌人接受。”随电发去周恩来为我方代表起草的十月八日发言稿大纲。

同日 同陈正人谈话。

10月8日 下午，和朱德、周恩来接受以柳霞·土登塔巴

〔1〕王剑朋曾任广州市企业管理局局长。“三反”运动中，因被揭发有贪污问题而受到监管。监管期间，王剑朋杀死了监管他的警卫人员和检举他的人。广州市人民法院决定判处他死刑，立即执行。广州市公安局和人民检察院对此提出异议，主张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后经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复议，仍维持原判，立即执行。

〔2〕指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蓝公武。

〔3〕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1952年秋季发起的全线战术反击第二阶段作战。这一阶段自10月6日起至31日结束，共毙、伤、俘敌一万八千九百余人。

〔4〕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为团长的西藏致敬团和昌都地区僧俗人民代表的献旗、献礼，并同他们进行谈话。毛泽东说：一、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二、分地的问题，与宗教问题有所不同。在汉人区域已经分了土地，这里对宗教仍然是保护的。少数民族地区分不分土地，由少数民族自己决定。西藏地区现在谈不上分地，将来分不分，由你们自己决定，并且由你们自己去分，我们不代你们分。三、成立军政委员会和改编藏军是协议上规定了的，因为你们害怕，我通知在西藏工作的同志，要他们慢点执行。协议是要执行的，但你们害怕，只好慢点执行。今年害怕，就待明年执行；如果明年还害怕，就等后年执行。四、西藏地方大、人口少，人口需要发展，从现在二三百万发展到五六百万，然后再增至千几百万就好。还有经济和文化也需要发展。文化包括学校、报纸、电影等等，宗教也在内。过去的反动统治，清朝皇帝、蒋介石，都是压迫剥削你们的，帝国主义也是一样，使得你们人口不得发展，经济削弱了，文化也没有发展。共产党实行民族平等，不要压迫、剥削你们，而是要帮助你们，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就是要执行帮助你们的政策。开始进去的时候不会有帮助，三四年之内也不可能有多多的帮助，但以后就能帮助你们的，那是一定的。如果共产党不能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那共产党就没有什么用处。你们来了，我很高兴。最近你们可以到南京、上海、天津、广州、东北等地去参观。以后西藏僧俗各界如果能够有更多的人到内地各处参观，便可以加强我们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友爱的关系。毛泽东最后叮嘱：将上述讲话传达给西藏民族的各方面的人，让大家都知道。毛泽东这次谈话的要点，不久由柳霞·土登塔巴在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播出的他对西藏地方政府僧俗官员和全体藏族僧俗同胞的广播词中加以引述。

同日 下午，和朱德、周恩来接受朝鲜、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的华侨回国观光团以及遭受帝国主义迫害的马来亚归国华侨代表的献旗。

同日 下午，同刘仁、张友渔〔1〕、吴晗谈话。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2〕，指出：对于在八日会上对方可能提出的问题的答复，我们应坚持固守我方所提方案的范围这个方针，不作任何带有增减这个范围的解释。

10月9日 审定彭德怀十月八日报送的中央军委《关于纠正放松军事教育和军纪废弛现象的指示》，这个指示于十月十三日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签署发出。指示指出：自今年五六月以后，在部队训练上，表现出两种相反的现象：第一，文化教育普遍抓得很紧，因此掀起了全军文化学习的高潮，并取得很大成绩，这一方面是好的。第二，军事教育和军事纪律普遍放松，因此产生了部队生活散漫，技术降低，体力减弱和严重的损坏武器、装具、马匹等现象，这一方面是严重地不应该的，是必须立即纠正的。

同日 晚上，听取彭真汇报。

10月10日 致信宋庆龄：“承赠大著《为新中国奋斗》，极为高兴，谨致谢意。另承赠他物，亦已收到，并此致谢！”

同日 复信周世钊：“十月五日的信及所附报纸，收到，以前的信也收到了。文章已看了，很高兴。蒋竹如兄的工作问题，尚未解决，我已将他的信转致湖南文教厅请其酌处，不知近日已

〔1〕刘仁，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张友渔，当时任中共北京市人民政府党组书记、北京市副市长。

〔2〕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解决否？便时祈向文教厅询及。”

同日 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指出：同意你们对敌人这一行动的分析及对我们应采取的态度和步骤的意见〔2〕。南日同志的抗议，望针对敌人这一行动，指出敌人蛮不讲理地坚持其所谓自愿遣返实即强迫扣留的原则，拒绝协定，中止谈判，企图以此压迫即将开会的联合国大会赞同其破坏谈判、扩大战争的阴谋，同时说明我方坚守日内瓦公约的正义立场及业已达成协议的停战协定条文，对双方遣返全部战俘的原则绝不放弃，但对释放和遣返全部战俘的方法和步骤，从来就主张可以协商。两相对照，对方应负拒绝协定、破坏谈判的全部责任。为此，我们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其承担一切后果负责。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朱德、周恩来、高岗、彭德怀、邓小平、薄一波、习仲勋、罗瑞卿、杨尚昆、安子文出席。

10月13日 阅中央军委技术部提供的关于国民党军队给其在大陆残余力量空投装备的情报，批示彭德怀：“似宜指示西北军区及西北局，让敌空投装备充足，并集中兵力向夏、洮区域进攻，并让其深入占领一块地方，然后我军集中兵力包围歼击为有利。”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朱德、周恩来、高岗、彭德怀、邓小平、薄一波、习仲勋、罗瑞卿、杨尚昆、安子文出席。

〔1〕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李克农在1952年10月9日的请示电中说，8日对方片面宣布无限期休会，未等我方发言即走出会场，这是对方有计划有准备的行动。因此，我们觉得应由南日同志向哈利逊提出书面抗议，驳斥其片面休会之荒谬，指明其破坏谈判之严重责任。同时，可以由南日同志在联大开会前发表一篇长篇谈话，总结一下美国侵略朝鲜、谈判经过及战俘问题，并在这篇谈话里表示一下我们有理有力的立场。

10月14日 “联合国军”为谋求在停战谈判中的有利地位，扭转在战场上的被动局面，改善金化地区的防御态势，以志愿军上甘岭防御阵地为主要目标发动了猛烈的“金化攻势”。志愿军开始在金化以北地区，依托以坑道工事为骨干的坚固阵地，顽强地进行上甘岭防御战役。

10月15日 阅陈云十月十四日报送的关于青浦县小蒸乡农民状况的材料〔1〕，致信谭震林：“陈云同志所得青浦县小蒸乡的情况，很值得注意，兹寄上请阅，并请抄寄苏南区党委。据薄一波同志说，他在上海时，已知浙江、苏南两区去年征粮太重，华东局决定退还农民一部。不知此事结果如何？两区共退了多少？解决了多少人的问题？今年收成如何？征粮数是否大大减轻了？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建议你们召集两区负责人及两区若干典型县的县委书记到华东局开一次专门会议。在开会前，由你派出两个调查组，一个往浙江，一个往苏南，直到几个县的乡村，调查十几个乡，专门调查农民公粮及其他负担的实情，以为会议讨论的根据。总之，过去因负担太重无以为生的农民，必须切实解决救济问题；今年征粮必须不超过中央规定的比率〔2〕，大大减轻民负。望将你的意见告我。”

同日 下午，同包尔汉、习仲勋谈话。

〔1〕这个材料是一个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读书的学生暑假回家时写的，他遵陈云之嘱作了一些调查。材料反映由于接连三年农作物歉收、征粮比例过高和人多地少，造成农民生活普遍困难等情况。

〔2〕政务院1950年2月规定在新解放区征收公粮的比率，为“到农业总收入之百分之十七。地方人民政府附加公粮不得超过正粮的百分之十五”。1952年6月，政务院《关于1952年农业税收工作的指示》规定：“晚解放区已经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1952年应施行统一全额累进税制，累进税率从百分之七到百分之三十止（一律不准再征附加税）”。

10月16日 阅萧劲光关于海军党委八、九两月的综合报告，批示：“十月十五日的综合报告收到阅悉。希望在下一次综合报告中看到各项缺点的改进情形。”报告说：海军于八月份抽调六十余人，分赴华东、中南、青岛各地进行了四十多天的工作检查，既反映了优点，也反映了缺点。缺点概括来说，主要是业务技术学习还很不够，组织和机构仍不健全，骄傲自满情绪普遍存在，官僚主义的领导作风很严重。

10月17日 阅张有晋希望留京工作的来信，批示：“请罗迈同志酌处。如留此人在京，则张干（原一师校长）、罗元鲲（原一师历史教员，此人诚笃，较二张为优）亦有请求留京之可能。”十一月八日，李维汉致信毛泽东：我曾和张干、张有晋、罗元鲲三位谈过话，罗仍要回湘，二张决留北京文史馆。十一日，毛泽东在李维汉来信上批示：“我已和张干、罗元鲲二位谈了，劝他们回湖南，北京生活费用较高，不如湖南好，他们在湖南都有顾问、参议一类的待遇。他们已同意回去。”

同日 阅聂荣臻本日转报的傅连璋关于粟裕病情的报告。报告说，粟裕昨日下午在办公时突然血压升高，医生建议卧床休息，并需住院检查及作睡眠疗法，然后再休息一个月。毛泽东批示：“同意休养一个月，病好再工作。”

10月18日 审阅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十月十五日给军委的报告。报告提出，一九五二年国防建设费预算需追加五千五百多亿元，请中央批准从国家财政预算中拨款。毛泽东批示：“尽可能在本年度军费中调整开支，不追加总预算。”

10月19日 复电刘少奇：“（一）十月十八日电报〔1〕收到；

〔1〕指刘少奇关于参加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主要收获和体会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电报。

(二)中央同意你及稼祥同志在苏休养一个月至一个半月,王光美、朱仲丽〔1〕二同志即去莫斯科;(三)中央全会可待你们回国后再召开。”

同日 阅李维汉本日关于中国民主同盟工作近况和意见的报告。报告说:民盟目前的中心问题有两个。一是民盟今后的活动,要找出怎样参加和配合国家的文教建设工作的办法,以发挥其可能发挥的积极作用;二是在民盟内外条件已有新的变化的情况下,要使其领导机关中各派的关系得到必要的调整。毛泽东批示:“同意这个意见。据吴晗向我表示,民盟中央和北京支委各种会议,只谈人事,不谈工作,使他们感到极为苦闷。一个政治团体不谈工作,是无法维系成员的,也势必永远陷在人事纠纷中。此件中所说‘找出参加和配合文教工作的办法’,是必要的。其他民主党派恐亦须解决此问题。”

10月20日 阅黄克诚十月十八日关于乡一级规模划分问题的来信,批示:“陈、薄、邓小平同志阅,周总理处理。此件经明日中央讨论后请周重新拟处。”信中说:全国把乡统一划大,平均每乡人口划二千五百人到三千人,脱产干部三个,觉得乡太大而脱产干部又太少,不便群众参加政权管理和解决问题,不便政权联系群众,还会增加农民负担,耽搁生产等。乡划小一点,就可避免上述缺点。乡划小后,为减少中央乡村的预算经费,可以把脱产干部改为半脱产,采轮流值班制。

同日 阅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十月十七日关于检查三年来对苏联专家使用情况给所属各部的指示,批示:“聂、萧华阅,请彭处理。军事方面的苏联专家,亦宜仿财委办法,下一指令,总结经验,纠正我们方面的缺点。如何,请酌处。”指示说:检

〔1〕王光美,刘少奇的妻子。朱仲丽,王稼祥的妻子。

查三年来对苏联专家的使用情况，我们对专家工作的安排是恰当的，但一般说来各部门还有很大的缺点。为了充分发挥苏联专家的力量，决定凡聘有专家的部门，一律将本单位三年来专家工作情况与经验认真加以检查、总结，并提出今后使用专家的方针和办法。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贸易问题和农业税问题，朱德、周恩来、陈云、高岗、彭真、林伯渠、彭德怀、邓小平、薄一波、邓子恢、习仲勋、刘澜涛、罗瑞卿、杨尚昆、安子文、黄克诚、叶季壮、陈正人出席。二十三日晚上，会议继续进行。会议决定一九五二年度农业税为三百三十亿斤小米及其他事项。

10月22日 复信罗元鲲：“十月十九日赐示敬悉。李先生交来两件〔1〕，均已拜读，极为感谢！自传兴会飙举，评论深刻，可为后生楷模。另件所述‘特色’诸点，得之传闻，诸多不实，请勿公表为荷。两件奉还。袁先生墓文〔2〕遵嘱书就，烦为转致。新化古寺有所毁损，极为不当，此类各地多有，正由政务院统筹保护之法，故不单独写字，尚祈谅之。僧尼老者守寺，少壮从事劳动，此论公允，已转政府有关机关酌处。”

同日 晚上，和朱德、宋庆龄、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中国福利会儿童剧团的演出。毛泽东对宋庆龄说：儿童剧团应多排演一些适于儿童看的戏剧，因为由儿童上演儿童剧比之由成人演给孩子们看，更生动，更能引起儿童们的兴趣和喜爱。

10月23日 审阅萧向荣十月二十一日关于在中央军委设立审计机关的报告，批示：“此件请周一阅。关于军委设审计机关

〔1〕指罗元鲲托李漱清交给毛泽东的两篇文稿。一篇是罗元鲲的自传，一篇是罗写的《第一师范时代的毛主席》。

〔2〕指毛泽东题写的“袁吉六先生之墓”。

问题，似有必要。如同意，即请彭主办；如有意见，请与彭商处。”

二十四日，周恩来批示：“同意军委设审计机关。具体方案，请彭主办并与中财委一商。”

10月24日 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邓华、杨得志、甘泗淇及志愿军各级领导，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各大军区，军委各部门及军事学院各首长的电报。电报说：“我志愿军协同人民军从九月十八日开始对全线敌军的战术性的反击作战，在一个月內，歼灭和击伤敌军三万人以上，获得重大胜利，中央和军委向你们及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致以热烈的祝贺。此种作战，在若干个被选定的战术要点上，集中我军优势的兵力、火力，采取突然动作，对成排成连成营的敌军，给以全部或大部歼灭的打击；然后在敌人向我军举行反击的时机，又在反复作战中给敌以大量的杀伤；然后依情况，对于被我攻克的据点，凡可以守住者固守之，不能守住者放弃之，保持自己的主动，准备以后的反击。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自从去年七月我军采取坚强的阵地作战以来，给予敌军损失的数量，远远地超过去年七月以前在各次运动战中给予敌军的损失数量。而我军的损失则大为减少，其中人员损失，单就志愿军来说，从去年七月以来的十五个月中，比较以前的八个月，平均每月减少三分之二以上（前八个月平均每月为二万五千人，后十五个月平均每月为八千人），这种情况，就是依靠阵地实行上述作战方法的结果。而在九月十八日开始的这一段期间内，则此种作战方法表现为更有组织性和更带全线性，所以特别值得重视。现当志愿军出国作战两周年之际，希望你们总结经验，更加提高组织性，提高战术和节省弹药，更加亲密地团结朝鲜同志和朝鲜人民，在今后的作战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委党委的批语：“（一）批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于一九五二年十月十八日向中央所作的报告；（二）将此报告发给各级党委及其纪律检查委员会遵照办理；（三）此报告可在党刊上登载。”中纪委的报告说：为了贯彻中央认真地、严肃地、慎重地处理党纪问题的方针，对已经处理的案件进行一次复查是必要的。复查要有重点，要抓住弄清事实这一中心环节。报告提出了在处理党纪案件和复查中应掌握的几项原则。

10月25日 晨，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天津、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视察。杨尚昆、罗瑞卿、滕代远、黄敬等同行。

10月26日 上午，在天津同黄火青、吴德⁽¹⁾、李烛尘谈话。随后前往济南，黄火青等也同行。下午六时，到达济南。在驻地同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负责人许世友、高克亭、王卓如⁽²⁾等谈话，听取山东工农业生产和发展地方工业等情况的汇报。

10月27日 上午，前往济南市南郊四里山黄祖炎烈士墓凭吊。在谈到黄祖炎遇害时说：祖炎是个好同志，对党忠诚，办事认真，能文能武。他跑完了艰苦的长征路，经过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没有倒下，却遭反革命分子枪杀。我们必须严防反革命分子的报复，切不可疏忽大意，认为天下太平无事。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绝不可姑息养奸，要坚决镇压。当许世友说到

(1) 黄火青，当时任中共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兼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天津市政协副主席（1952年12月任主席）。吴德，当时任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市代理市长。

(2) 高克亭，当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工业部部长、职工工作委员会书记。王卓如，当时任山东省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952年11月任主任）1952年11月又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财政经济委员会书记、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山上还埋着济南战役的部分烈士，并准备把其他地方烈士墓也迁移过来建立一个烈士陵园时，毛泽东说：好啊，真是青山处处埋忠骨，有这么多的英烈长眠在这里，四里山就成英雄山了〔1〕。

同日 签署中央军委命令，发出《关于辽东半岛设防的决定》、《关于山东半岛设防的决定》。两个决定指出：在美帝国主义积极备战和武装日本的情况下，对我沿海的战略要点和重要作战方向作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筑永久性的国防工事，已成为我国国防建设的重要任务。

同日 上午，游览趵突泉、漱玉泉、跑马泉、珍珠泉、黑虎泉。

同日 下午，游览大明湖。在游艇上谈起王尽美、邓恩铭时说：他们都是你们山东党的创始人，参加了党的一大。王尽美原来不叫这个名字，叫王瑞俊，参加革命后改名叫王尽美，意思是实现尽善尽美的共产主义理想嘛！在北极阁向许世友了解济南战役中活捉王耀武的情况后说：你们布下了天罗地网，整个战役歼敌十万，不简单！这次战役证明了我们人民军队的强大攻击力是国民党军队无法抵御的，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加强了解放区的经济实力，为更好地支援战争打下了基础。下午，参观历城县黄河泺口大坝，称赞大坝修得好。

同日 晚上，听取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分管水利的负责人汇报黄河山东段情况。

10月28日 上午，乘专列前往曲阜参观孔庙、孔府、孔林。

同日 下午，到达徐州。晚上，接见中共徐州市委副书记华诚一、市长张光中。

10月29日 上午，登徐州南郊云龙山，游览兴化寺、俯瞰古战场、察看黄河故道。在看到徐州周围山上树很少，有人说这

〔1〕四里山后改名英雄山。

可能与古战场有关，清朝乾隆皇帝还讲这个地方是“穷山恶水，泼妇刁民”时，毛泽东说：那是对劳动人民的污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穷山可以变成富山，恶水可以变成好水。要发动群众，上山栽树，一定要改变徐州荒山的面貌！在山上循着黄河故道自北向南眺望徐州城，说：黄河故道穿城而过，威胁人民的安全，市委、市政府应及时采取措施，变灾为利。

同日 下午三时，离开徐州。晚七时，到达河南兰封〔1〕，住宿在专列上。

10月30日 晨，到专列停靠地附近的许贡庄向农民了解情况，并走访一户农民家庭。

同日 上午，乘专列前往黄河大堤。在专列上，听取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随即谈治理黄河问题。在王化云〔2〕谈到制订修建三门峡水库的规划时，毛泽东说：这个大水库修起来，能防洪，能发电，还能灌溉大量农田，你们的规划是可以研究的。到黄河大堤后，在东坝头、杨庄险工地段察看大堤和石坝。午饭后，继续了解黄河的有关情况。王化云说：他为了了解从民江上源引水入黄是否有可能性，查勘了金沙江上游通天河。毛泽东说：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一点来是可以的。在得知东坝头还不能看出黄河是“悬河”后，决定到开封去看“悬河”。

同日 下午，乘专列到达开封。参观开封铁塔、龙亭两处古迹。后换乘汽车到开封北郊黄河柳园口看“悬河”。

同日 晚上，同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就河南工作和治理黄河问题交换意见，强调“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午夜，查阅《河

〔1〕兰封于1954年和考城合并为兰考县。

〔2〕王化云，当时任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

南通志》、《汴京志》和《龙门二十品碑帖》，了解黄河泛滥史。

10月31日 晨，乘专列前往郑州。行前，对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军区、黄河水利委员会负责人再次强调：“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同日 上午，到达郑州。来到黄河岸边的邙山山顶，观察黄河在这一带的走向、水势、流量和黄河铁路大桥情况。对陪同的河南省委、郑州市委负责人说：黄河既是养育中华民族的摇篮，又是旧中国连年征战、滥砍滥伐上游树木造成的一条危害人民的害河。历史上黄河不知决口有多少次，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不知造成多大的危害，现在到了我们手里，一定要制服它，决不能再让它出乱子，要确保黄河的安全，确保黄河铁桥的安全。你们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不然，我是睡不好觉的。

同日 上午，乘专列到黄河北岸新乡境内的大型引黄灌溉水利工程——人民胜利渠。在渠首，听取有关人员汇报人民胜利渠建设和引黄灌溉的情况，了解干渠、支渠情况以及灌溉后的防碱、治碱等问题。针对有了渠灌忽视井灌的情况说：有了渠也不能忽视井，要合理安排渠灌与井灌。井灌是游击战，渠灌是阵地战。随后，乘汽车沿着渠道察看人民胜利渠的整个干渠。中午，来到新乡市郊人民胜利渠进入卫河处。在看到黄河水引入枯竭的卫河的情景时说：今天看了小黄河〔1〕，在人民手里，害河可以变益河。

11月1日 上午，由罗瑞卿、滕代远、潘复生〔2〕等陪同，

〔1〕指人民胜利渠。

〔2〕潘复生，当时任中共平原省委第一书记、平原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平原省军区政治委员。1952年11月平原省撤销后，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河南省政协主席。

视察平原省〔1〕安阳市郊小屯村。向安阳地、市领导人了解安阳镇反情况、城市恢复情况，还询问盘庚为何迁都到安阳、殷纣王为何在这里建都及殷纣王墓在何处、殷墟的范围与发掘等情况。

同日 乘专列到达邯郸。到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凭吊，为烈士陵园题词：“英勇牺牲的烈士们千古无上光荣”。

11月3日 晨，回到北京。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讲话中提出：消灭资本主义工商业要分步骤，一是要消灭，一是还要扶持一下。朱德、周恩来、陈云、高岗、彭真、林伯渠出席会议，邓小平、邓子恢、薄一波、谭震林、习仲勋、罗瑞卿、刘澜涛、杨尚昆、安子文列席会议。

11月5日 阅张干请求进中央文史研究馆的来信，批示李维汉：“此人是前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国民党时期没有作过坏事。请考虑是否可以加入文史馆。”

11月6日 下午，会见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团长吉洪诺夫及苏联艺术工作团领导人、苏军红旗歌舞团团长、苏联电影艺术工作者代表团团长等。陪同会见的有朱德、宋庆龄、高岗、周恩来、陈云、郭沫若、邓小平等。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首都各界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五周年大会，和由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主办的苏联艺术家表演晚会。

11月7日 阅杨成武十一月四日关于同华北军区的苏联顾问团交谈情况的报告。报告说：十月二十五日和华北军区苏联顾问团全体顾问进行了一次交谈。苏联顾问对我们总的意见是，主动地系统地向他们介绍情况不够，对他们的意见重视不够，因此

〔1〕平原省，1952年11月撤销，所辖地区分别划归山东、河南两省。

他们的工作尚未高度发挥力量，要求顾问团的负责同志能参加军区党委会议，在各部队工作的顾问能参加各该部队党委会议。毛泽东批示：“周：似应允许顾问参加党委会议。此件可转各处参考，并要各处均照此作出检查报告。以上请酌定，如必要请找聂及萧华、萧向荣一谈。”十一日，审阅中央军委关于同意苏联顾问参加部队各该级党委会议给杨成武并告各大军区等的电报稿，加写一段话：“凡有苏联顾问之单位，务必彻底解决干部中是否全心全意向苏联专家学习的问题，凡不虚心学习者应受到批评。”

11月10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朱德、周恩来、陈云、高岗、邓小平、薄一波、邓子恢、谭震林、习仲勋、刘澜涛、罗瑞卿、杨尚昆、安子文出席。

11月12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朱德、周恩来、陈云、高岗、彭德怀、邓小平、薄一波、邓子恢、谭震林、习仲勋、刘澜涛、黄克诚、罗瑞卿、杨尚昆、安子文出席。

11月13日 致信周恩来、朱德、陈云、高岗、彭德怀、邓小平、薄一波、邓子恢、谭震林、习仲勋、黄克诚、刘澜涛、罗瑞卿、杨尚昆、陈伯达、胡乔木、安子文：“此事（1）因为我过去说时，没有如同在十一月十二日的会议上那样，明确说明此种意见的性质（尚不是决议），传达范围和什么人不要传达，故有些同志在相当范围内传达了。此事不应由他们负责，而应由我负责。罗瑞卿同志因此事请给处分，应无庸议。”

（1）指毛泽东1952年9月24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所说的我们 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至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这个问题。

同日 下午，同高岗谈话。

11月14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妇联和青年团的工作，邓小平、邓子恢、陈伯达、安子文、邓颖超、帅孟奇、章蕴、康克清、罗琼、曾宪植、刘亚雄〔1〕、胡耀邦、廖承志、蒋南翔、李昌、荣高棠出席。

11月15日 下午，出席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改变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机构与任务等问题的报告。毛泽东插话，谈朝鲜战争和保守国家机密问题。他说：美帝国主义要打就让他打下去，打下去就只有失败。上个月仅在一个四平方公里的地方，他们就死掉两万人。其中在两个很小的阵地，战争来回进行了二十多天，结果是杀伤了敌人达一万八千人。志愿军不仅可以打运动战，现在还能打阵地战。我们在山腰上挖了许多的壕洞，就像“北京饭店”一样，敌人攻到山顶，还不能占领我们的阵地，这个“北京饭店”后面还有一个饭店。敌人攻上来，我们退到后面，等他们进入阵地，我们就给他杀伤。如此反复几次，敌人伤亡极大。过去我们战士住的是平房，设备很简单，现在住的都是“北京饭店”，又能防守，又能打击敌人。美帝国主义打起仗来有四个不利：一是死人，我与敌人的死伤比例过去是一比一点八，现在则是一比二点五。二是用钱，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争中用钱是我们的八倍至九倍。三是战略，东西两线不能兼顾。四是吵架，人民向他们吵，国内两个党派吵，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吵。美方代表团在十月

〔1〕帅孟奇，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管理处副处长、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常委。康克清，当时任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妇女儿童福利部部长。罗琼，当时任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秘书长。曾宪植，当时任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秘书长。刘亚雄，当时任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城市工作部部长。

八日朝鲜停战谈判中，说他提出的方案是“坚定的、最后的、不可改变的”。你是三个“的”，我是一个“打”，总要迫使美方把它提出的方案改变为“动摇的、不是最后的、可以改变的”。毛泽东说：我们只有先把机械、钢铁、煤炭、石油、化学这几样东西搞好了，我们国家才能建设。苏联对我们是尽力的帮助，机密的东西也教给我们。今后我们国家的机密会一天比一天多起来，不论财经、军事、文教各方面都有。各个部门、每个同志都有责任来保守国家的机密。自己身边的机要秘书和工作人员也要切实审查，发现不可靠的就把他换掉。文教系统也不要轻视这一问题。我们一定要划清敌我界限，是站在中国人民民族利益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外国帝国主义的立场上。

11月16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商业的指示稿。在指示稿的“商业中公私比重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但私营商业金额的过急下降或过早下降，则一定会增加失业人员，并影响城乡交流和人民的生计。因此我们必须予以调整”一段话后，加写：“目前已在广大区域内形成了公私关系的紧张形势，失业人员已在大量增加，许多中小工商业者、家庭商店及摊贩，已在埋怨我们。”在指示稿的“目前保持私商的营业额，不但无害于国营商业的领导，而且可以补助国营商业的不足”一句后，加写：“也使中小工业家、手工业者和农村家庭副业的产品找到较多的销路，不使他们发生困难。”在指示稿关于调整商业措施第五条末尾加写：“在零售方面，公私商业的比重，就全国平均数来说，目前仍应按今年六月中央财政会议所规定的百分之二十五和七十五的比例，如有增减，应报中央批准。”审改后，批送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再阅，要求今日看完，明日发出。

同日 阅中共中央中南局十一月十一日关于湖南省秋征工

作情况和问题的通报，批示：“陈云、一波同志：此件似可转发各地参考。我看乡或区内的小仓库应与县及大市镇上的仓库结合起来，二者不可缺一。以上请加考虑酌处。”

同日 为全国各级军校毕业证书题词：“为建设强大的国防军而奋斗”。

11月17日 晚上，同萧华谈话。

11月18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开会。

11月20日 康藏公路康定至昌都段提前通车。之前，毛泽东为此题词：“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

11月2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印发贯彻婚姻法的指示的批语：“兹将中共中央关于贯彻婚姻法的指示发给你们，望即遵照执行，并在党刊上发表。”中央指示强调：贯彻婚姻法的首要工作，是宣传婚姻法，在思想上划清封建主义婚姻制度与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的界限。婚姻制度的改革是一种反封建的民主改革，但它不同于土地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革。婚姻制度的改革完全是人民内部的事情，不能采取粗暴急躁的态度与阶级斗争的方法。以一九五三年三月为宣传贯彻婚姻法的运动月，务期达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从而改变空气，移风易俗。建议各级人民法院建立专门的婚姻法庭，负责处理婚姻案件。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对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十一月十七日的报告的批语稿。将批语稿中的“我们认为对于第一个问题，即‘技术一边倒’的提法，确有不当之处，但在目前尚无 害处，暂时不必公开批判”一句，改写为：“我们认为对于第一个问题，即‘技术一边倒’的提法，虽有不恰当之处，但这

只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这一口号的简称，因此不要当作一个问题来批评，正式的口号应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1〕

同日 阅贺诚十一月六日关于将在十二月上旬召开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的报告。报告说，这次会议拟总结爱国卫生运动及三年来卫生建设情况，并评奖爱国卫生运动模范，举办带有评比性的卫生展览。报告请毛泽东为这次会议题词。毛泽东批示：“贺诚同志：（一）题词可写，请你们拟出几个简单语句送我择书；（二）此次会议准备工作甚为重要，应和习仲勋、胡乔木同志商酌，并在文委党组加以讨论。”毛泽东的题词是：“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看川剧《柳荫记》。

11月27日 晚上，同邓小平谈话。

11月28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薄一波、李维汉、罗瑞卿、杨尚昆、安子文出席。

11月29日 就李济深、黄绍竑、齐白石、程砚秋〔2〕等八十一人要求成立中国古典艺术研究会一事，批示：“周总理、

〔1〕中共中央于1953年4月26日发出关于纠正“技术一边倒”口号的指示，指出“技术一边倒”的提法是不恰当的，应以“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和技术”来代替。指示说：技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同，并没有阶级和阵营的分别，技术本身是能够同样地为各个阶级和各种制度服务的。在技术上并不存在不是倒向这边就一定倒向那边的问题。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并不排斥可以吸收资本主义国家中技术上某些好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而“技术一边倒”的口号的片面性和它的不能服人的地方，就在于它好像表示我们完全拒绝这种必要性似的。

〔2〕程砚秋，京剧表演艺术家。当时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常委。

胡乔木同志：此件请阅。这件事不应拒绝，而应表示赞助。发起人中有些人政治情况不明，但其提议内容似不能非议。过去我们对于古典艺术，除戏曲外，我们不去领导，所以这些人只得与民主人士联系”。“我意此事应由中央文化部在中央宣传部指导下先作些调查，然后找这些发起人和某些赞助人开一个会，表示可以同意他们公私合营的方针，拟出具体办法，让他们办起来。如周同意，即请乔木同志找钱俊瑞、周扬二同志商办。”

同日 阅上海惠司丁内衣厂行政负责人的来信，信中反映上海的失业问题及造成的原因，并提出迅速解决的办法。毛泽东在信上批注：“此人曾经来信，说拟来京求见。秘书室经政府告他，可将意见函告，不必来京，故此人复发此信。此信抄送周总理、小平、陈云、薄一波、李维汉、谭震林、陈丕显各同志，请陈丕显酌拟处理意见告我为盼。”

11月 审阅中共中央转发的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党组对邮电部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在指示的“邮电部提出立即采取措施向广大干部职工讲清楚邮电事业应从对国家和人民所负的责任和作用上来检查自己是否完成任务，而不应单纯从盈利和积累国家财富上着眼，以纠正目前普遍发生的单纯任务和单纯营利的观点和作法是必要的”一段话后，加写：“这是目前应当注意的主要方面。”

同月 审阅萧劲光等十一月十七日报送的《一九五三年海军计划》，批写一段话：“为了肃清海匪的骚扰，保障海道运输的安全；为了准备力量于适当时机收复台湾，最后统一全部国土；为了准备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从海上来的向我国的侵略，我国必须在一个长时期内根据工业建设发展的情况和财政的情况，有计划地逐步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

12月1日 和周恩来联名签署中央军委、政务院《关于人民解放军一九五二年回乡转业建设人员处理办法的决定》。决定指出：“为着加强国防力量和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人民解放军在保留一定基干和减少现役人员的原则下，必须抽出大批人员转入建设，以加强农业、工业等各方面的生产建设，并参加组训民兵的工作，以便积蓄力量奠定今后实行义务兵役制度的基础。这是我军当前的中心工作。”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董必武、彭德怀、邓小平、薄一波、曾山、叶剑英、聂荣臻、吴玉章、徐特立〔1〕、滕代远、刘澜涛、李维汉、萧劲光、王从吾〔2〕、陈郁、程子华、陈赓、罗瑞卿、黄克诚、吕正操〔3〕、张宗逊、邓颖超、王首道、李立三、杨尚昆、安子文、陈伯达、胡耀邦、胡乔木、赖若愚、萧华、万毅出席。

12月2日 阅罗瑞卿十一月二十五日关于进剿东北长白山地区美国空降特务情况报告等材料，就歼灭美国空降特务问题致信罗瑞卿。信中说：“从东北的材料看来，已发现和剿灭的是长白山区的五处（五个县所属此外敌尚企图在小兴安岭山区和闾山区空降，目的是建立游击根据地和派人侵入城市爆

〔1〕 吴玉章，当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徐特立，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2〕 王从吾，当时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华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

〔3〕 吕正操，当时任铁道部副部长、中央军委军事运输司令部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副司令员。

炸和暗杀。另据悉，马良〔1〕在草地已准备机场，美机可能在那里着陆。另据朝鲜所获敌机特务所供，敌机在新疆西部、新蒙边境、甘孜附近、西康西南部都曾着陆接送特务。” “由此判断，敌在我全国各省的森林、沙漠、草原等无居民区，例如大巴山，大别山，武夷山，罗霄山，五岭，秦岭，绥蒙、豫西、湘西、云贵川康甘青等地，都可用直升机和大运输机在夜间空降或着陆，除已知者外，说不定有许多我们并不知道的。在非山区也可空降特务。据说北京、天津附近即已空降过。请你考虑由公安司令部对此事专门作一次布置，例如在长白山区，小兴安岭区，闽山区（似即地图上之翳吾闽山），内蒙草地，大巴山区及其他山区设立武装便衣侦察据点许多处，责成每个大军区和每个省各设若干这样的据点，专为对付敌人空降而设。无事则在山里生产和学习，有事即报信和捕捉特务。如有必要，应召集各区的一些人来京开一次专门的会议。美国制定了所谓‘共同安全法’，每年拨款一亿美元专为此类用途，空降特务即系由此而来。”

同日 阅《一九五三年兵工生产会议备忘录》，批示杨尚昆：“在你们正在拟制的分工条例〔2〕中，应增加一项：各委、部、会讨论重要问题时，应做出简明记录送阅。军委已由萧向荣这样

〔1〕马良，曾任国民党军马步芳部团长。1951年在甘肃、青海、四川边界的藏族地区组织武装叛乱。1953年被捕。

〔2〕这个分工条例后来形成为中共中央1953年3月10日发出的《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决定草案中规定，政府各部门将会议所讨论的或所决定的重要事项，用最简明的文字记录出来上报，可以作为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一种方式。

做，很有用处。此件是封永顺〔1〕做的，也很好，比做长报告送阅，经济得多。”

同日 阅中共中央华东局十一月二十四日通报的上海国棉二厂团结技术人员解决生产关键问题的经验材料，批示：“陈、薄：此件有用，似可由你们通报各厂仿行。”

12月3日 阅外交部办公厅编印的《两周外交工作汇报》第二期〔2〕，批示：“周总理：印度调停朝鲜及我答复经过，应于日内公开发表，不宜太迟。可用新闻方式历叙各次答复内容，而着重最近一次。至于印方最近又来长文，因印荒谬提案已在联合国通过〔3〕，似无答复必要，以上是否适当请加考虑酌定。”

12月4日 复电班禅额尔德尼：“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三日（藏历水龙年九月十六日）关于九、十两月份的工作报告阅悉。感谢你为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的帮助，并庆贺你在爱国团结工作上的成就。后藏为西藏的一部分，后藏地区在建设方面需要中央帮助

〔1〕封永顺，当时任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军械部副部长。

〔2〕这一期汇报中说：“对印度和印尼提出的解决朝鲜俘虏问题的建议，于11月24日及29日由章副部长和周总理分别答复，指出其意见和美国的‘自愿遣返’实质上一样。答复前，他们都急欲知道我方态度，答复后又力辩其建议和美国的不同，尼赫鲁并要赖嘉文大使向我表示印度政府将进一步澄清此问题。”

〔3〕联合国大会1952年12月3日第399次全体会议，根据印度提案通过了关于遣返朝鲜战争战俘问题的决议。12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在给联合国大会主席皮尔逊的复电中指出，联合国大会根据印度提案所通过的这个以战俘遣返问题为中心内容的非法决议案，是完全以美国方面一直无理坚持的、被公认为违背日内瓦公约和国际公法的所谓“自愿遣返原则”或“不强迫遣返原则”，亦即实质上强迫扣留战俘的“原则”为其基础的。

之处，请就近与张经武代表商洽，经他通盘拟议后报中央审核。”

同日 审阅修改中央军委关于在各大区动员新兵给各中共中央局、各大军区、志愿军司令部的指示电，加写：“并注意不要动员独子入伍。”

同日 下午，会见宋庆龄。

12月6日 阅邓华十二月四日报送的《关于朝鲜战局形势与明年的方针和工作任务》的报告。报告说：朝鲜战争目前面临两种情况，一种是停下来，一种是拖延下去，继续打。而打又有小打、大打两种可能，小打基本上是僵持局面，战争仅限于正面，大打则是敌人在我侧后登陆，战争更激烈地进行。在报告讲到美军有可能在我侧后登陆并分析几种可能登陆地点处，毛泽东批注：“应肯定敌以五至七个师在汉川、鸭绿江线大举登陆，并在我后方空降，时间应准备在春季，也可能更早些，我应十分加强地堡和坑道，部署五个军于这一线，其中要有四个有经验的军，划定防区，坚决阻敌登陆，不可有误。”“第二个登陆危险区是通川、元山线，第三个危险区是镇南浦、汉川线。”在报告指出如敌人在西海岸登陆则运输会很困难处，毛泽东批注：“决不能许敌在西海岸登陆，尤其不能许其在汉川、鸭绿江线登陆。”同日阅西北军区十二月一日关于部队点验工作〔1〕的报告，批示聂荣臻、张宗逊：“西北此种点验办法很好。各军区是否都在进行点验？嗣后每年应进行点验一次至二次，定为制度。”

同日 阅聂荣臻十二月五日关于组织部队机关干部到朝鲜进行实战锻炼的具体计划的报告，批示：“同意这个计划。政治、

〔1〕指对部队的人员、装备、物资等进行清点和检验，目的在于了解部队的实力和执行规章制度的情况，促进行政管理和战备工作的进一步落实。

后勤两系统，请聂告两处负责人拟出一个计划来。”十九日，阅萧华十八日关于组织政治工作干部分批轮换到朝鲜战场取得政治工作经验的具体计划的报告，批示：“同意这个计划。只是数目还觉小一点。”

12月7日 晚上，约见回国汇报朝鲜战争情况的邓华，谈朝鲜战场反登陆战备工作的部署问题。朱德、周恩来参加。毛泽东说：闻鼙鼓而思将帅。艾森豪威尔上台，看来会有新的动作。找你来，是要研究对付艾森豪威尔的对策。你四日写的报告，我看过了，批了几句话，总的意思是，志愿军应以肯定敌人登陆，肯定要从西海岸登陆，肯定在清川江至汉川间登陆这一判断出发，来确定行动方针。登陆的时间可能在春季，也可能更早些。应十分加强地堡和坑道，部署五个军于汉川至清川江一线，其中要有四个有经验的军，划定防区，坚决阻敌登陆。决不允许敌人在西海岸，尤其是在汉川至鸭绿江一线登陆。西海指〔1〕应当加强和扩大。最好你亲自去，你去了，我放心！邓华说：有一次，志司凌晨一点发出的电报，到两点就收到了回电，主席真是太操劳了。毛泽东说：兵贵神速嘛！我同秘书说了，凡前线来的电报，随到随报，一分钟也不得迟延。你们是在大炮底下，没有你们在朝鲜，我在这儿也不安稳喽！

12月8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朝鲜战局问题，朱德、周恩来、陈云、彭德怀、薄一波、聂荣臻、邓华、黄克诚、张宗逊、赵尔陆、王尚荣〔2〕出席。

〔1〕西海指，西海岸指挥部的简称，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联合指挥机构。

〔2〕王尚荣，当时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

12月9日 致信邓华：“应估计敌已决策在汉川至清川江线登陆，并在积极准备中，我方必须火急准备对敌，粉碎其登陆计划。”

同日 阅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十二月五日关于增加志愿军细粮分配比例的报告，批示：“请彭处理。我想是可以的。”从一九五三年一月一日起，志愿军细粮比数从原来的百分之七十增加至百分之八十。

12月10日 阅中共中央宣传部十二月九日关于在京高级干部学习斯大林新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等情况的报告，批示：“周总理阅后，送乔木同志：此件已阅，很好。前次谈到由中央补发公开发表的学习指示一事，我想不必补发这样的指示了，在报上发布学习总结性的新闻报道即可。”

同日 阅陈伯达、杨献珍、陈昌浩〔1〕关于他们同马列学院分院苏联教授谢甫磋夫等谈话要点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批示胡乔木：“将此件抄送各中央局宣传部长一阅，使他们初步了解中央准备成立红色教授学校〔2〕的意图及其伟大的意义。”

同日 阅中共中央宣传部十二月九日关于成立马克思主义教

〔1〕杨献珍，哲学家。当时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教育长。陈昌浩，当时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副教育长。

〔2〕1952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将陈伯达等的报告转送中央各同志、各中央局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并写了一段话：“中央最近决定设立马克思主义教师学校，为各大学、各党校和各地党委训练马列主义各科师资和理论工作人才，其性质任务略如苏联1921年至1938年间的红色教授学院，而与中央党校性质的马列学院相区别。”这所学校后来没有单独设立。1953年2月10日，中央决定马列学院分设两部，以第一部专负培养马列主义师资之责，主要是培养高等学校和党校的马列主义教师。原马列学院为第二部。

师学校和马恩列斯著作编译所〔1〕的负责人人选问题和两个机构的定名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请示：一、马克思主义教师学校负责人，提议以黄松龄〔2〕任该校校长。马恩列斯著作编译所提议由师哲任所长，陈昌浩、姜椿芳任副所长。惟陈昌浩的工作变动是否须俟刘少奇回国后再定。二、以上两机关名称是否即定为马克思主义教师学校和马恩列斯著作编译所，均由凯丰负责领导。毛泽东批示：“均同意。陈昌浩的工作，可以即行改变。”

同日 阅萧华十二月八日关于朝鲜要求提供为加强瓦解敌伪军工作所需的印刷机器、宣传器材问题的报告，批示：“同意尽量满足朝鲜同志的要求。”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周恩来、高岗、彭德怀、聂荣臻、邓华、黄克诚开会，讨论朝鲜战局问题。

12月11日 阅聂荣臻十二月十日关于防敌在志愿军侧后登陆等问题的具体计划报告，批示：“周、朱阅，退彭、聂办。同意这个部署，抓紧检查，务必完成任务。”当天晚上同聂荣臻谈话。

12月1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刘少奇电：“中央决定明年二月五日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3〕〔不是代表大会〕，请你于十二月下旬或一月初回国，以便准备议程。饶漱石、陈毅、刘长胜、李富春、张闻天五同志则请于一月中旬或下旬回国，以便出席会议。”

同日 为中央军委总参谋部起草致邓华、杨得志电：“兹接友方〔4〕《特别通讯》如下，望提起严重注意，加紧准备打敌在

〔1〕1953年1月成立时，正式定名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2〕黄松龄，当时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

〔3〕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后来推迟到1955年3月21日至31日召开。

〔4〕指苏联。

我后方登陆，务必完成任务。明年二、三两月是紧急时间，我军应在本月及一月加紧准备作战，特别注意汉川江、清川江、鸭绿江一线。”《特别通讯》说，美军可能将在一九五三年二月在朝鲜发动大规模的攻势，准备占领全部北朝鲜直抵鸭绿江。

12月14日 阅萧克十二月九日关于军训部两年来与苏联顾问合作问题的总结报告，批示：“彭阅，送萧向荣同志：请将此件发军委各部门及各大军区、志愿军、各军事学校、各兵团参考，凡有顾问者一律作出和顾问关系的检讨，改善我们和顾问的关系，认真地学习苏联的军事科学。”

同日 复信鞍山钢铁公司炼钢厂全体职工：“我很高兴地读了你们十二月二日的来信〔1〕。祝贺你们在平炉炼钢生产上的最新成就。你们以高度的劳动热情和创造精神，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创造了超过资本主义各国水平的炼钢时间和炉底面积利用系数的新纪录。这不仅是你们的光荣，而且是我国工业化道路上的一件大事。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完成一九五三年度炼好优质钢的新任务而奋斗。”

12月16日 就朝鲜战局和我们应采取的方针，致电斯大林〔2〕。电报说：“朝鲜战局由于停战谈判已告停顿，而美军在朝鲜的损失还没有达到它非罢手不可的程度，估计今后一定时期内（假定为一年），会趋向于激烈化。艾森豪威尔〔3〕正在为其上台后的朝鲜军事行动作准备。单就朝鲜战场的军事行动做估计，敌人从正面向我较坚固的纵深工事施行攻击的可能性不如向我后方

〔1〕 来信向毛泽东汇报了 1952 年 11 月 22 日鞍山钢铁公司炼钢厂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创造了 6 小时 9 分钟炼一炉钢的平炉炼钢全国新纪录的喜讯。

〔2〕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3〕 艾森豪威尔，当时已当选美国第 34 届总统，1953 年 1 月 20 日就任。

两侧进行登陆作战的可能性大。”“对我威胁最大的是西海岸的战略性登陆，因为我主要运输线是经过这个地区的。”“我如能坚守北朝鲜东西海岸，使敌人的登陆计划失败，并以正面战线的战术出击作配合，给敌人以更多更大的杀伤。那么，朝鲜战局就能更加稳定，而向着更加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为预防敌人登陆和提早发动进攻，我军必须继续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工作。”

“我们目前最大的困难，在于一九五三年内一般我们还不能生产朝鲜战场上所急迫需要的各种苏式火炮特别是各式炮弹……为着这一紧急原因，我迫切地请求您和苏联政府能够满足我们一九五三年关于在朝鲜作战的军事订货和关于兵工生产的贸易订货的要求。”

同日 阅萧劲光十二月十五日关于海军党委对反官僚主义布置的报告。报告说：海军党委拟于明年一月十日召开海军党委扩大会议，进行民主检讨，反官僚主义，重点检查全军工作的思想领导、重大任务的执行情况及有关克服官僚主义的组织形式、工作制度，并研究如何完成一九五三年任务。毛泽东批示彭德怀、聂荣臻、黄克诚、萧华、萧向荣：“海军党委这种反官僚主义的布置是很必要的。请你们考虑先在军委各部门择期举行党委扩大会议，其内容可大体相同于萧劲光所规定的那样。如彭认为有必要，请在军委例会上加以讨论，做出决定。俟军委做有成效时，再推广至各大军区。”

12月19日 审阅安子文十二月五日和十八日先后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为中央起草分别转发两个报告的批语。安子文五日的报告提出：目前农村整党建党中必须解决的问题是：一、农村整党，不提“三反”，而把它作为整党内容的一部分；二、教育党员明确农村发展方向，反对当富农、反对雇工剥削；三、控制受组织处分的党员的数字；四、当前整党工作的主要危险是简单急躁、整得过火。中央为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指出：

“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所提各项意见都是正确的，请即据此指导当前正在进行的整党和建党工作，务使少犯错误。”安子文十八日的报告说：东北全区三年来大胆提拔和培养了大批干部，他们的干部工作是很有成绩的。同时发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一、在执行干部政策上，单纯强调业务能力，忽视政治品质；凭个人喜恶和亲戚朋友关系提拔使用干部；喜欢知识分子，讨厌工农干部；强调资历，不敢大胆提拔年轻干部；歧视妇女干部。二、党的干部队伍严重不纯。三、在高级干部和主要领导干部中，有些人历史上存在问题，还没有经过严格的审查。中央为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指出：“中央认为东北局管理和审查干部的经验值得全党注意；其所发现的问题是各区各省市都存在的，必须认真处理。中央已决定于一九五三年春季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检查和总结干部管理工作方面的经验，并仿东北办法布置对干部的审查工作。请你们根据东北的经验联系自己在管理和审查干部工作方面的情况，加以分析，先作准备，使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能够顺利地完成任务。”毛泽东审阅两个报告后，致信安子文：“十二月五日关于整党建党报告，十二月十八日关于东北审干经验报告，均已收到看过，均很好，并已于今日批发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整党报告我拖延了阅看时间，是一损失。此事各地这两三个月正在紧张地进行，你的报告待发各县、区、乡，恐须一个月时间，似宜由你或你的助手用电话经常与几个中央局组织部长联系，叫他们也用电话与下级联系，迅速纠正偏差，方为适宜，请加考虑。”

同日 阅薄一波十二月十八日关于乡镇摊派名目繁多问题给毛泽东的信，批示：“周阅，退薄一波同志。似乎仍宜发一个指示，总结一下过去的情况，并指出方向，即将此信中所指各项原因及解决乡财政三原则以及统计表第一页说明中所述几项特点写

上，不要太长，也就可以了。”薄一波在信中说：乡（村）镇摊牌名目共计六大类，三百三十六种。分析原因主要有：乡政权未改造；中央及大行政区各系统各自布置工作，但不指明经费由何处开支；中央有些部门为了开展“业务”，而加重人民的负担；有些摊派大多是上行下效，如会餐费、典礼费、开会费等；有些摊派是由于地方干部过多过早地举办一些力不胜任的事。

同日 阅中共中央统战部十二月十一日关于查询苏南破坏寺庙情况给华东局统战部的电报稿，批示李维汉：“此件望加衔发给各中央局及各省市统战部加以注意。估计此类事各地皆有。”电报说，江苏有一些佛教徒反映，浦东和浦南有毁坏寺庙的情况，要求华东局统战部查明真相，作适当处理，并应注意其他地方有无类似情况发生。

12月2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志愿军党委各同志并告东北局、东北军区和军委各部门首长的关于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争取战争更大胜利的指示。指示指出：“根据种种情况（艾森豪威尔登台，谈判的中断，联合国通过印度提案），判断敌人有从我侧后海岸线特别是西海岸汉川江、清川江、鸭绿江一线以七个师左右兵力举行冒险登陆进攻的充分可能。”

“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有坚决粉碎敌人登陆进攻、争取战争更大胜利的任务。”指示对粉碎敌人登陆进攻作出具体部署，指定志愿军代司令员、代政治委员邓华兼任西海岸指挥部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梁兴初为西海指副司令员。指示说：“两年多以来，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在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军的英勇顽强的战斗中，取得了伟大的辉煌的胜利，已经摸清了敌人的底子，克服了很多的困难，积蓄了丰富的经验。美帝国主义采用了很多办法和我们斗争，没有一样不遭到失败。现在剩下从我侧后冒险登陆的一手，它想用这一手来打击我们。只要我们能把它这

一手打下去，使它的冒险归于失败，它的最后失败的局面就确定下来了。”

12月21日 审阅东北农村工作会议有关文件和中共中央十二月二十日给东北局并告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的电报稿，毛泽东批示：“周、朱、陈、薄阅，尚昆办。此件〔1〕经廖鲁言、陈伯达二同志研究过，其修改之点伯达和我谈过，并得高岗同志同意。你们如无时间，只看东北局报告及中央复电即可。”“另请尚昆将东北局给中央报告一件，中央复电一件，张明远报告一件，东北农业合作社试行章程草案一件，共四件，印送东北以外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中央的电报说：这个会议开得很好。东北局关于在农业生产中“依靠组织起来的农民，扶助贫困的农民，团结个体的农民，限制富农的剥削”的提法是正确的。

同日 审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致联合国大会主席皮尔逊的电报稿，批示：“退周即办。应于发电报时同时即予广播。”电报抗议美国军队在蜂岩岛打死朝中方面被俘人员八十七人、打伤一百二十人的彻底摧毁人道原则、根本破坏日内瓦公约的罪恶行为，指出这已达到了美方长期以来历次被迫承认的屠杀战俘数字的最高峰，并要求责成美国政府立即恢复板门店停战谈判。

12月22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转发中国人民银行党组、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党组十二月十日关于三年来侨汇、华侨投资情况及现存问题报告的批语稿，将批语稿的“我们原则上同意这一报告，请你们参考办理”一句，改为：“中央批准这一报告，请你们指导所属严格执行。对于过去在此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予

〔1〕指张明远1952年10月28日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上作的关于贯彻执行农业合作化决议和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的报告。张明远，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秘书长、东北人民政府秘书长。

以切实纠正。”中国人民银行党组、侨委党组的报告说：三年来侨汇收汇情况已达战前水平，主要是小资产阶级与劳动阶层小笔的赡家费，投资只占极少数。在侨汇工作中，由于在个别地区我们对私营侨汇业的组织工作较差，对侨眷所收侨汇处理上有严重的偏差，华侨汇款的潜在力量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我们对华侨投资的辅导工作也做得很不够。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纲要若干问题的指示稿，批示：“此件以电报发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委。”指示指出编制计划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一）我国大规模建设是在抗美援朝环境下进行的，必须按照中央的“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进行国家建设；（二）必须以发展重工业为大规模建设的重点；（三）编制计划时，必须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潜在力量，反对保守主义；（四）我们的计划必须正确地反映客观经济发展的法则；（五）编制计划时必须吸收群众特别是部门的先进人物参加讨论；（六）编制计划的工作必须首长负责，亲自动手，掌握国家的建设方针，采取科学的工作态度。

同日 阅周恩来十二月二十二日报送的第一六三次政务会议情况简报〔1〕，批示：“此件宜速办。傅的报告〔2〕似可摘要发表。”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福建修建铁路问题。朱德、周恩来、彭真、林伯渠出席，薄一波、李富春、李维汉、习仲勋、刘澜涛、杨尚昆、谢觉哉、安

〔1〕情况简报中谈到会议关于发动群众继续开展防旱抗旱运动的决定事项。

〔2〕指傅作义作的1952年防汛工作总结报告和1952年防旱抗旱运动中的农田水利工作报告。1952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摘要发表了这两个报告。

子文、陈伯达、胡乔木列席。

12月23日 审阅薄一波十二月二十二日关于福建修建铁路问题的报告，批示：“周、薄：（一）照昨晚所议，以先修南厦路（1）为宜；但时间应提早，请考虑能否于三年内修好，以利军事运输。（二）陈嘉庚下月来京，可与之商酌韶厦路（2）与南厦路之利害，将南厦路之军事、经济理由告诉他，取得他同意。因此他的来信可以不复。”

同日 晚上，同陈赓等谈话。

12月24日 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三次会议，讨论关于筹备并召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问题。

12月25日 阅高岗报送的他在学习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马林科夫报告的讨论会上的发言，批示：“周、邓、陈、薄、曾山同志阅。退高岗同志。此件很好，使人一看知道我们商业工作的问题在什么地方。不知此次商业部会议讨论的结果是否与高岗同志在此件中所说明相同，请曾山同志告我为盼。”高岗的发言结合马林科夫报告中讲到的苏联商业工作中存在的很少研究居民需要、服务态度较差和经营管理不善三个问题，对我国商业工作的实际情况作了分析，提出为改善贸易企业的经营管理，搞好经济核算的三条意见：要很好地研究军民需要，加强计划性；理清贸易企业的财产和账目；加强政治工作，建立超额奖励制度等。（3）

（1）南厦路，指江西南昌至福建厦门的铁路。

（2）韶厦路，指广东韶关至福建厦门的铁路。

（3）后来发现，高岗报送的这个发言稿，实际上是当时国家计委贸易合作局局长刘明夫关于商业工作的一个发言提纲。

12月26日 上午，同彭德怀谈话。

12月27日 复电邓华：“（一）十二月二十五日的电报〔1〕收到，同意你和金日成同志商定的各事。（二）你和杨得志同志在志司商定的各项军事部署〔2〕的电报均已收到，我们均同意。其中有个别事项，例如一三八师的使用，二十一军开进的时间等，由彭副主席在电话中和你们商定。铁路仍按龟城、球场、德川线修筑为宜。”

12月28日 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起草给华东局、华东军区、福建省委、福建军区，并告中南军区的指示。指示指出：“一、为了配合美军在朝鲜的作战，台湾、金门敌人有以一部兵力（据报一个军）攻我福建岛屿并向福建大陆攻占我二三个县的阴谋冒险计划。二、我福建军区有以现有兵力（不要依赖任何外援）粉碎上述敌军进攻的任务。三、为此必须：（甲）迅速地坚决地加强必守岛屿的防御工事，预储充分的粮弹饮水，鼓励守军作长期坚守的准备，不许再犯南日岛那样的错误〔3〕，否则须予负责者以应得的处罚。（乙）预计敌攻岛屿的几种可能，决定明确的增援计划。（丙）预计敌在大陆上某些可能登陆的海岸要点，

〔1〕邓华在这个电报中说，他在金日成12月24日召开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介绍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朝鲜战场今后作战问题的意见以及志愿军党委执行中央指示的具体措施，并提出关于反登陆作战几个问题的意见等。金日成首相与政治局同志商量后，表示完全同意中共中央对朝鲜形势的看法，同意志愿军党委的具体措施，并对有关问题作出了答复。

〔2〕指邓华、杨得志1952年12月17日发出的《朝鲜反登陆作战部署》和12月23日发出的《关于粉碎敌登陆进攻部署》、《西海岸作战命令》等。

〔3〕南日岛，位于福建沿海。1952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9000人侵犯该岛，人民解放军守岛部队，因寡不敌众，大部牺牲，解放军增援部队因指挥不当，也遭受严重伤亡，全岛一度被国民党军队占领。

做好若干非永久的战术性的防御工事，例如最近我以一个排坚守海岸工事，赢得时间，以一个连增援，歼灭了登陆敌人百余那样。这种以排以连以营为单位的战术性的若干防御工事，是必须做的，不是要你们做大规模的和永久性的大陆海岸防御工事。而在选定必守的岛屿上则必须是永久性的和十分巩固的工事。四、张鼎丞同志即回福建担任省委书记和省府主席，叶飞同志专任军事。在张鼎丞同志未到福州前，由他人暂行主持省委、省府工作，叶飞同志立即抽出身来全神贯注于对敌作战方面。从目前起两个月内是最关重要的时机，务必唤起福建全军及沿海要地党政及人民群众充分注意对敌斗争，不得疏忽大意，致遭不应有的损失。你们的部署望即告。”

同日 阅周恩来十二月二十五日报送的中共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党组会议简报，批示：“陈云、薄一波、曾山、贾拓夫四同志：近来政务院、军委、文委均采取会议简报的办法，很有用，极简单明了，使人一看即知道会议要点，比做长篇报告还有用些。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仿行，先用此种简报，长篇报告则放在后头，在中央会议上也可省去许多口头报告的部分。”并批示杨尚昆邀集各处办公厅主任商定一会议简报的办法。

同日 阅华北军区后勤部军需部干部李振宇十二月十九日关于解决志愿军坑道部队供给问题的办法给毛泽东、朱德的信，批示：“彭、聂、黄克诚、杨立三、萧华同志阅，存萧向荣同志处。解决坑道内部队一万至两万人经常的蔬菜、黄烟、遮水和娱乐设备等问题，使他们安心作战，甚为重要。请彭在军委例会上加以讨论，并作适当的决定。”一九五三年一月三十日，又在黄克诚等一月二十四日关于一九五二年冬季对志愿军供应情况的报告上批示：“刘、朱、周、高、小平同志：此件可阅，志愿军的日用品已得到较好解决。”

同日 阅赖传珠、徐立清十二月二十七日关于中央军委总干部部检查和苏联顾问关系给彭德怀并报毛泽东的报告，批示：“彭阅，萧向荣办。这个报告可发军委各部门、各大军区和军事学校（有顾问的）首长们参考。希望各部门都照这样正确地对待自己的顾问同志。”报告说，一年多来，我们同顾问的关系是比较好的，重要工作都是主动找顾问商量，重视学习苏联的经验。

同日 阅傅秋涛〔1〕十二月二十六日关于苏联顾问建议迅速建立各级兵役机构的报告，批示：“请在军委例会上讨论一下此件中所提的建立兵役机构问题。如果后年实行征兵制，则明年应建立兵役机构。”

12月29日 阅中共西藏工委十二月二十四日关于成立农牧部未报中央一事的检讨，批示：“邓小平同志阅，送交李维汉同志：根据中央过去规定〔2〕，我党委和军队一切与西藏人民和西藏政府有关的重要问题，都须报请中央处理，不归西南处理；西藏工委和军区有些事并未遵守这一条规定。请引据规定原文给以再次指示。”西藏工委的检讨说：西藏农牧部是在西藏工委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向西南局报告、经西南局于十一月六日批准后成立的，由于疏忽，只报告了西南局而未报中央，这是欠妥的。

同日 审阅修改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一九五三年全军政治工作任务的指示稿。主要修改如下（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现在美帝国主义仍旧企图非法扣留中、朝战俘，继续拖延和破坏朝鲜停战谈判；并且还有发动新的登陆进攻，扩大朝鲜战争的充分可能。故朝鲜战争还要延续相当时间，战斗可能更

〔1〕傅秋涛，当时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人民武装部部长。

〔2〕指中共中央1952年4月8日给西南局、西藏工委的指示电。见本卷第535页。

加激烈。不过即使朝鲜战争继续延长和扩大，只要我们能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坚决粉碎其登陆的企图，并使三八线上面作战比过去打得更好些，则美帝国主义者从这个战争中，除了彻底暴露其战略弱点，加深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矛盾，增大其兵员的伤亡和物资的损耗外，再也不会得到任何东西。”并批示：“此件已阅，退周、朱、彭、高〔1〕阅，退萧华办。”

同日 阅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权五稷十二月二十六日祝贺毛泽东生日的电报，批示：“此件亦应复函致谢。来往函电，一律不得发表。”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高岗、彭德怀、邓小平、薄一波、罗瑞卿、习仲勋、杨尚昆、安子文、陈伯达、胡乔木出席。

12月30日 为转发中共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党组十二月二十五日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起草中央发至县委一级和各级妇委及妇联党组等的批语，指出：“全国妇联党组在其关于当前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的报告中所提各项意见〔2〕，中央认为是正确的，应予批准，并在全国农村中予以施行。除在党刊上发表外，还应印成小册子发到农村中去。”

12月31日 就苏联向中国移交中国长春铁路一事，致电斯大林。电文如下：“在中苏两国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期间，苏联方面对于中国人民铁路建设事业作了巨大的贡献，中国人民对

〔1〕彭、高，指彭德怀、高岗。

〔2〕报告中提出各项意见主要是：要解决互助合作组织中男女同工同酬问题，批评轻视妇女的封建观点；解决妇女参加农业生产与家务劳动的矛盾；通过精耕细作、兴修水利、发展副业等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妇女劳动模范应发挥专长，减少兼职，少参加一般性会议等，以求巩固。

此兄弟般的友谊援助将永志不忘。兹值苏联政府根据一九五〇年的协定和一九五二年的公告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际，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和政府向伟大的苏联人民、苏联政府及您表示衷心的感谢。并祝苏联和中国伟大友谊的日益发展和巩固。”本日下午一时，负责办理中国长春铁路移交事宜的中苏联合委员会在哈尔滨举行该委员会会议终结纪录的签署仪式。中国长春铁路的中苏共管于本日北京时间十八时结束。此前，毛泽东为中苏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纪念塔题写塔名。

12月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改变管理干部的方法和建立财经工作部的决定草案，加写一段话：“党中央及各级党委对政府、对财经工作、对工业建设的领导责任是：（一）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都必须统一由党中央规定，制定党的决议、指示，或对各有关机关负责同志及党组的建议予以审查批准；各中央代表机关及各级党委则应坚决保证党中央及中央人民政府一切决议、指示和法令的执行，并于不抵触中央决议、指示和法令的范围内，制定自己的决议或指示，保证中央和上级所给任务的完成。（二）检查党的决议和指示的执行情况。”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12
ISBN 978-7-5073-3992-5

I. ①毛… II. ①中… III. ①毛泽东 (1893～1976)
—年谱—1949～1976 IV. ①A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8944 号

毛泽东年谱 (1949—1976) 第一卷

编 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主 编：逢先知 冯 蕙
副 主 编：陈 晋 李 捷 熊华源 吴正裕 张素华
责任编辑：杨茂荣 孙 翊
特约编辑：边彦军
责任印制：寇 炫 郑 刚

出 版：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网 址：www.zywxpress.com
邮 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680 X 960mm 16 开 242. 75 印张 2970 千字

ISBN 978-7-5073-3992-5 定价：390. 00 元 (1-6 卷)

www.mzdbl.cn

ISBN 978—7—5073—3992-5



定价：390.00元(1-6卷)